国旗飘风

张涛之◎著

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洞悉世事 成败之道 成败之道

点评风云人物 体味人情冷暖

下

新华出版社

国旗飘飘

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

张涛之　著

新华出版社

第五十七回　收心腹江青批《海瑞罢官》　结死党林彪骂全军比武

话说周恩来看到《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后，暗吃一惊，怎么这件事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他仔细地读完这篇文章，心情异常沉重。很明显，这次批判不同以往，是大有来头的。从1962年以来，报纸上每天都登大块批判文章，批《李慧娘》、批《北国江南》、批《早春二月》，批《舞台姐妹》，批“合二而一”，批“让步政策”，批“经济价值”，骂孟超，骂翦伯赞，骂孙冶方，骂杨献珍。这些人都是文化人，而撰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吴晗却是北京副市长。姚文元敢批北京市副市长，直接在北京市市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头上动土，没有最高领导的同意行吗？说不定，这篇文章就是最高领导授意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更严重了。搞这么大的动作，自然不会仅仅为了搞倒一个副市长，大概也不会单为打倒彭真，那么，还有谁呢？他不禁打一个寒噤。

过了两天，消息传出来了，姚文元的文章果然是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由江青秘密去上海组织的。本来江青先是要在北京找几个人写这篇文章，但北京没有人愿意写，于是江青就想到了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对，找柯庆施去。江青于是立即南下，找到了柯庆施，对他说：“柯老，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急迫的事要办，别的地方找不到人，主席让我来找你。”柯庆施谦恭地说：“是什么任务，江青同志你就交给我吧。”江青说：“好，我就知道柯老肯定会支持我，主席常夸你呢。你还记得去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主席和刘少奇的一场争论吗？”

提起这个问题，柯庆施是太知道了，他是政治局委员，就亲自参加了这个会嘛。那是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否定了刘少奇制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办法，讨论通过毛泽东制定的“二十三条”。后一个文件和前十条比较，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确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3年上半年开展起来的。当时，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在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湖南和河北的做法，决定在全国农村推而广之。接着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又称《前十条》），指出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教育人，尤其着重教育干部；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清经济，具体地说，就是清账目，清仓

库，清财务，清工分。故简称这个运动为“四清”运动。接着刘少奇又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去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摸底调查，王光美带着工作组进村来，一头扎到贫下中农里，摸底调查。

王光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桃园扎根串联，发动社教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讲了两年谁也不听。少奇同志一抓，就抓出了个桃园经验，把社教运动推开了。”

1964 年五六月，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在桃园经验的基础上，刘少奇又主持制定颁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也叫做“后十条”）。

此年，也就是 1964 年 12 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也在北京举行。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首先讨论了刘少奇在 12 月 15 日提出的关于在农村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和在城市举行的“五反”（后来也改称为“四清”）运动的几个问题，然后起草被称为“十七条”的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在 12 月 20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争论起来。刘少奇问毛泽东：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腐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回答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刘少奇争辩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强调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杜甫的诗写得好，“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刘少奇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了反问刘少奇：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这场争论过后，就到了 12 月 26 日。毛泽东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胡耀邦、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中央领导人、大区书记、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吃饭，过生日。这顿饭气氛异常紧张，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讲话：“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 71 岁了，我已经老了，也许不久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

人人都听得出来，毛泽东的语气中有几丝浓浓的悲愤之感。这时毛泽东提高嗓门说道：“今天李敏没有来，她没下乡，没有资格来。李讷没有回来，下乡了。”他讥讽和恼怒地说：“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

才怪。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

讲到这里，毛泽东不客气地大声问李富春：“富春啊，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

李富春知道，由于自己和毛泽东关系很深，毛泽东要批评什么时，经常拿他做个话头，说的是自己，批评的可是别人。毛泽东说起自己来毫无顾忌，只是更显得二人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李富春听了毛泽东的话，只是笑笑，什么话都没有说。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却是心情沉重，他们听得出来，既然毛泽东说“你们”，那就不是李富春一个人，还会有谁呢？

12 月 28 日，毛泽东手里拿着党章和宪法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晃晃这两本文件，不无恼怒地说道：“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又是一个“你们”。

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便在中间拨火添柴，加剧了两人的分歧。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一直开到过了年的 1965 年 1 月。1 月 3 日晚，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十七条”停止下发，会议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部分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各地出现的一些过左做法，但是却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路线抬起头来。

两位中央主席在会议上公开干起来了，与会者吓得心惊胆战。柯庆施、康生纷纷抢着表态：主席的说法符合马列主义，社教的重点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也觉得这样闹下去不好，便提议道：“说中央有后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吧。但可能在中央的一些部门里有他们的后台，是否改成‘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他人一听，也都觉得这样改较好。

会议散后，毛泽东又叫来秘书在文件的前面写一段话，把刘少奇说的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观点狠批一通，指出这些观点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十三条”通过了，但毛泽东很不痛快，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才慢慢入睡。

柯庆施想起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关心地问道：“那次会议，刘少奇把主席气坏了，主席最近身体好吗？”江青看看周围，小声地对柯庆施说：“主席很后悔，说自己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是看错了人，现在必须回到一线主持工作。”柯庆施高兴得直点头：“早该如此了。那么主席

有些什么战略部署呢?”江青再次看看周围，神秘地说：“我就是为此来找你的。先批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柯庆施佯装不懂地问：“为什么呢？写海瑞可是主席在上海会议上讲的。”江青瞪了他一眼：“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主席当年讲，海瑞敢讲真话，骂嘉靖皇帝是家家皆净也，可是嘉靖皇帝死了，他又哭得死去活来，是真忠臣。可是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什么？是为彭德怀翻案!”柯庆施又装糊涂：“这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吴晗，非党人士，区区副市长，何以这样大动干戈?”江青不满地说：“柯老，你怎么不听话了？你想想啊……”柯庆施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连擦冷汗，赶紧解释道：“我明白了，江青同志。我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一个是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这两个人有理论，文笔好，足以担当重任。”江青满意地说：“好，我见见他们吧。”

柯庆施心里明白，这事慢不得，当即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找来与江青见面。江青过去多次来过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见过面，也读过他们的文章，所以见面以后，江青没讲几句客套话就布置任务：“找你们来是想让你们写一篇批《海瑞罢官》的大文章。此事关系重大，全中国只有主席、我、柯老，再加上你们俩知道，你们一定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文章要写得快，写得好。现在是3月，10月份要定稿。”张春桥、姚文元眼见江青，也就是毛泽东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又高兴，又紧张。

从此，张春桥经常来往于京沪，见了熟人，只说是来听现代戏的，趁人不注意，一头钻进接头点，和江青讨论稿子。到1965年10月底，稿子如期定稿。11月10日，这篇稿子在上海《文汇报》上登了出来。考虑到种种原因，只署了姚文元一个人的名字。

谁知姚文刊出后，除了华东局所管辖的几个省的省委机关报转载外，北京的全国性报纸都没有理这个茬。非但如此，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还向上海市委打来电话责问：“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怎么不向书记处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江青眼看全国报纸按兵不动，北京还准备追查，不禁大怒，马上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状：“主席，他们都是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头的，按说应该闻风而动，可是现在他们都一个个按兵不动，还打电话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你看看，北京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应该想办法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毛泽东想想，果断地说：“让上海印小册子，全国发行。给我要北京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对全国报纸转载姚文作出安排。”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请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转载姚文问题。大家按照开会的时间，一早就来到人民大会堂等着。过了一会儿，彭真来了，他心事重重地坐下来，问邓拓：“老邓，吴晗现在怎么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大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时的处境很为难。明摆着，批判吴晗是不对的。吴晗写海瑞戏是当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经过胡乔木再三动员才写的。他写海瑞戏是开始于上海会议，几个月后才出现了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事件，两者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况且，今日批了《海瑞罢官》，明日又会怎么样？彭真不由得看了邓拓几眼，为他担起心来。这位邓拓在反右派运动中因为“引蛇”不力，被调离《人民日报》，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当了一名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前几年他为《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在上面发表了100多篇杂文，后来还结集出版。与此同时，他还与吴晗、廖沫沙等市领导合作为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开了一个专栏，名字叫《三家村札记》。彭真读过邓拓的《燕山夜话》，很欣赏他的文章，但也对其中的《专治健忘症》、《一个鸡蛋的家当》感到吃惊，他知道这两篇文章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写的，果然不久，他就听到了从上面传下来的风声。

彭真明白，他反对转载姚文，可能会遇到打击，乃至不幸。但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历史已经把他推到了政治大决斗的风口浪尖上，为了保护党的干部，为了中华民族不致沦入一场大灾难，他决计牺牲自己，尽力遏制这个来势凶险的“左”祸。

经过讨论，大家感到周恩来过问此事，不转载是不行了。彭真说：“转载可以，但一定要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以内，不要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后决定先由《北京日报》在11月29日转载，《人民日报》11月30日转载，其他报纸依次转载。

彭真作了这些部署后，怕吴晗精神上受不了这种打击，便把他找到国际饭店，对他交了底，鼓励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感激地点点头。这几天，吴晗坐卧不安，茶饭不思，他本来就瘦，这一来就更瘦了。

国际饭店正在开市委工作会议，吴晗走后，彭真找邓拓商量说：“老邓，你来写一篇文章，从学术的角度上批批吴晗，也可以为学术讨论引引路嘛！”邓拓想了想说：“那就写一篇从《海瑞罢官》谈谈道德继承的文章吧。”彭真赞许地点点头：“我看这个题目就好，你先写，写出后我再看看，由我修改定稿，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在作了这些部署后，彭真又准备起草汇报提纲。原来为了领导文化批判运动，中央已于7月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彭真任组长，康生任副组长，陆定一、许立群、姚溱是组员。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学术界争论较多，也有人想把《海瑞罢官》往政治上扯。彭真感到自己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有责任制定一个向中央提交的文化批判汇报提纲，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国，正确地引导运动。彭真把自己的想法向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汇报了，他们也觉得很有必要，让他快点写出来，送毛泽东审阅，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在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

多事之秋，日月如梭，眼看着就到了1965年的年底了，在京的中央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赴上海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专程从杭州赶往上海参加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到通知后个个心事重重。自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全国的政治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毛泽东在杭州又是指示周恩来督促彭真转载姚文，又指示上海新华书店印小册子在全国发行。江青、张春桥活动得很厉害，江青经常南下，张春桥经常北来，而且每次来行动诡秘，看来下面还有大文章。凡此种种，已使中国政坛大有山雨欲来之势。现在毛泽东忽然又要在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不知又要整谁了。

1965年12月初，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汇集上海，毛泽东和南下的中央常委们打了招呼，这次会议是专门解决总参谋长的问题的。据吴法宪写信揭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前，罗瑞卿曾托他转告叶群，要林彪下台，不要管军队的事了，军队的事由他罗瑞卿管就可以了。毛泽东生气地说："这明明是夺军权嘛！"刘少奇、朱德等人听了，确实大吃一惊，罗瑞卿平常工作不错嘛，怎么会夺军权。

明天就要开会了，会议驻地岗哨林立，气氛紧张。在林彪的住所里，有两个人正在紧张地进行谈话。一个是林彪的夫人叶群，一个是继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吴法宪按着林彪的要求，已经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揭发罗瑞卿通过刘亚楼传话夺军权。但他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见识过中央政治局斗争的大场面，一听说要他在明天的中央常委会上发言，不禁心惊肉跳，汗水顺着胖胖的脸流下来。叶群给他打气说："你怕什么，罗瑞卿和刘亚楼谈话是在病房里，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现在刘亚楼已经死了，你揭发他们谈了些什么，已经是死无对证了，你怕什么？"吴法宪说："不怕，不怕。"叶群鼓励道："这就对了，另外告诉你，林总已经通知总参，把你的级别由六级升为五级。"吴法宪赶紧表示忠心："你转告林总，我跟罗瑞卿势不两立，林总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一召开，吴法宪又拿出当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整彭德怀的劲头，大喊一声"我揭发"，在得到允许后，便慷慨激昂地揭发起来："罗长子在我们空军活动得很厉害，他对刘亚楼司令员说，有四条意见请他转告叶群，一、林彪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得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罗瑞卿还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马列主义顶峰。刘亚楼司令员后来识破了罗长子的阴谋，把这件事对我讲了，要我向中央揭发。"

吴法宪的话使常委们吃了一惊，刘少奇问叶群："刘亚楼是否向你转告过罗瑞卿的那些话？"叶群镇定地说："讲了，我来揭发。"她拿过麦克风，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对罗瑞卿大泼污水。刘少奇虽然不大相信这些话，但唯一的证

人刘亚楼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啊！

为了确证吴法宪和叶群的揭发是否属实，中央常委决定调查一下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这么大的事，关系到一家人的生死荣辱，刘亚楼不会不向自己的夫人说的。

吴法宪听说中央要调查翟云英，慌了手脚，连忙跑到叶群这里来讨教。叶群狠狠地说："吴胖子，你已经出了头了，现在只有一条道走到底才有生路。你要是半路退出，林总不会饶你，人家也不会放过你。栽赃陷害总参谋长，最轻也要判你个死缓。"吴法宪听了汗如雨下，哀求道："你不要吓我了，赶快教我个法吧。"叶群眼一转就有了主意："去找翟云英，让她写个证明不就得了。"吴法宪担心地说："她要是不写呢？"叶群突然发怒，骂道："你怎么这么废物，你手中的权是干什么的？"

叶群的布置正赶到点子上了，以后调查人员去问翟云英时，翟云英说，她曾看到刘亚楼在临终前看着她，似有话要说，但没有说出来就去世了。中央常委一商量，认为罗瑞卿确实讲过4点要求，必须把他的总参谋长拿掉，让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中央决定总长易人后，派了一架飞机去接罗瑞卿。

罗瑞卿这时正在昆明视察部队的大比武，他眼里看着比武场上龙腾虎跃的战士展示着高超的军事技能，心里却不时掠过一种不祥的感觉。今年2月，他去上海向林彪汇报自己的工作，林彪对他异常客气，笑眯眯地说："10个大将，陈赓已在前几年病逝了，现在的几位，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长子你还能用谁呢？"罗瑞卿不知林彪为什么这样客气，想着正好可以趁林彪心情好时汇报工作，便兴致勃勃地汇报起全军大比武的情况来。林彪耐心地听着，等到罗瑞卿讲完了才慢慢地说："罗总长，抓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可不能冲击了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引导全军学好毛主席著作。你是搞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身，希望在这方面多出些力，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军队忠于毛主席。"罗瑞卿一听林彪的话里有一种强调突出政治忽视军事训练的意思，便说："林总，我有一点想法。你的一些话总带有一些绝对化的味道，什么顶峰呀，最高呀，都到顶了，思想还怎么发展？"林彪没有想到罗长子这么不识抬举，气了个半死。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罗瑞卿又去看了刘亚楼。刘亚楼患肝癌在上海住院，罗瑞卿问了一些病情，安慰他说："老兄放宽心吧，就凭你这身体，再加上治疗，我保你还能再干40年！"刘亚楼伸出4个指头，苦笑着问道："40年？"他摇摇头没有再说话。

罗瑞卿绝对没有想到，他离开医院后几天，林彪、叶群先后来了医院，把人都支走，和刘亚楼单独谈了话。罗瑞卿回京前，又去看了刘亚楼一次，刘亚楼断断续续地说："感谢你来看我，我可能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罗瑞卿给他掖掖被子说："好好养病吧，别胡思乱想了。"

起初，罗瑞卿对刘亚楼的话不太在意，一个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会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正像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那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

后来越想越不对劲，一种直感告诉他，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不说别的，就拿林彪来说吧。林彪过去对自己的部下很少说客气话，但对自己很亲热，前几天离开上海前去见林彪，林彪还很亲热地拉他吃糖。难道他就不忌恨自己顶了他，罗瑞卿想到这里，感到似乎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向自己撒来。

罗瑞卿在昆明的视察还没有完，突然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了一架专机来接他去开会。罗瑞卿搞过多年保卫、公安工作，凭经验判断，这次去开会凶多吉少。果然，他在上海一下飞机，就被一群保卫人员送上汽车直接开到会场，一位他素来敬重的中央领导人在外面等着他，一看他从车里下来，便上前打招呼说："你来了，林彪同志揭发了你，向主席写了信，揭发你让刘亚楼转告叶群的4条意见，你要有个正确的态度。"罗瑞卿听了眼前一黑，自己的担心果然被证实了。只是这场横祸来得这么突然，这么离奇，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不过他有信心洗刷掉林彪泼向自己的污水，他以为，只要中央领导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林彪的阴谋就会败露。

然而罗瑞卿，这位声名赫赫的老公安部长，像当年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一样，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来到会场准备辩解，但没容他说上几句，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一拥而上，把他的话堵回去，而唯一可以为他作证的刘亚楼已经作古。

死无对证，罗瑞卿骤然想起了办案的这一最大的忌讳，顿时全身冒出冷汗来。他明白了，现在自己是有口难辩了。

林彪在上海会议上把罗瑞卿打下去之后，心中十分得意。这半年多来，他一直与毛泽东住在南方，共商文化革命大计。林彪几经试探，见罗瑞卿不肯为己所用，便经常在毛泽东面前中伤罗瑞卿，提醒毛泽东，在这个非常时刻，防止军队出问题。毛泽东也怀疑罗瑞卿在军队中调兵遣将，搞大比武，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便同意解决罗瑞卿问题，以稳住军队。罗瑞卿被收审后，毛泽东又调兵遣将，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正当林彪高兴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这几年来，他收到了好几封匿名信，都是揭发叶群的。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五十八回　挽狂澜彭真去职　参军机陶铸进京

话说林彪接到匿名信后，几经思考，决定把信交出去，让公安部查办此人。毛泽东得到林彪的报告后，认为不前不后，偏偏在上海会议揭发出罗瑞卿以后，有人寄匿名信给林彪，而且还是北京寄来的，肯定在北京确实有一个政变集团。他立即把信转给北京的中央书记处，要他们督促公安部限期破案。

彭真接到指示后，立即把匿名信呈送刘少奇。刘少奇反复观看，发现许多信署名王光义，发信地址是自己的夫人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址，但邮戳却是另一地区的。刘少奇很生气，这不是明摆着挑拨自己和中央常委的关系吗？偏偏又是在这个时候。他立即要彭真通知公安部，务必尽快破案，并要彭真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是12月21日回到杭州的。在去上海之前，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田家英、胡绳、关锋5个秀才找到杭州，对他们说："要提倡读马列，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但是马列的书很多，因此要选择出版几种，每部书上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找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事。"

然后，毛泽东谈如何选择和如何写序的问题。毛泽东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因为突然出了罗瑞卿问题，毛泽东要去上海，就未及再谈下去。

罗瑞卿问题解决后，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和秀才们谈起出书问题。也许毛泽东因为解决了罗瑞卿问题，自认为军队已经完全控制起来了的缘故吧，这次他谈得很开，海阔天空，从古到今，中美关系，文化批判，足足讲了有3个小时，临了说起姚文元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即12月8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的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戚本禹是《红旗》杂志社的一名17级研究人员）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快一个月了，田家英他们这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谈《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谈话结束后，田家英和胡绳商量了一下，觉得毛泽东谈学习马列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搞一个纪要。艾思奇身体不好，陈伯达又

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来往不便，田家英便根据回忆写了个谈话纪要。纪要写好后，田家英把胡绳和关锋找来，让他们看看，有无遗漏错误的地方。胡绳看完，表示同意。关锋问道："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的那几句话没有写上，是否妥当?"田家英不耐烦地说："主席主要谈的是学马列问题，那几句话是附带谈到的，与谈话主旨关系不大，就不必写上了。"关锋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田家英哪里知道，没有写上纪要的这几句话正是毛泽东谈话的画龙点睛之笔。第二天彭真、康生、杨成武到杭州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谈起了《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解释说："我们经过调查，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毛泽东拖长声音问道："是这样吗?康老，你说呢?"康生扶扶眼镜："组织上没有联系不见得思想上没有共鸣，搞阴谋还要订个君子协定吗?"毛泽东很欣赏康生的这几句话，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烟。

第二天，彭真给毛泽东的卫士打电话，要求单独和毛泽东谈谈。卫士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想想说："好吧，让他来吧。"彭真来了，和毛泽东在房里谈了好久好久。卫士们自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是看到彭真出来时，似乎很高兴。在北京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接到彭真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彭真在电话里大声地说："我和主席谈了，主席赞成我的继续放的方针，吴晗问题两个月以后再作政治结论，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我马上要赶回北京，向中央汇报。"

1965 年的岁末就在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中过去了。春节刚过，彭真就把五人小组成员找来开会，这是五人小组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彭真首先介绍了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学术讨论的情况，批评了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他有点生气地说："一年前，小平同志就批评有些所谓的左派乱打棍子，无限上纲，搞得别人不敢写文章，不敢演戏，新华社一天只收到两篇稿子。小平同志说这些人就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现在这样的人还有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人还有没有，我看有。这些人应该好好学习，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根据调查，吴晗写《海瑞罢官》是 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期间，当时主席提出要学习海瑞。胡乔木同志根据主席讲话精神，请他写学习海瑞的文章，那时还没有开庐山会议嘛，还没有发生彭德怀事件嘛，没有彭德怀罢官的问题嘛。《海瑞罢官》确实是庐山会议之前动笔写的嘛。吴晗怎么能事先知道 4 个月以后彭德怀被罢官呢?《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根本没有关系嘛，怎么能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呢?"

讲到这里，秘书进来对彭真小声说："关锋、戚本禹把他们写的攻《海瑞罢官》的要害的文章送来了，说要请你审查发表。"彭真大声吩咐秘书："告诉他们，我最近很忙，没有时间看文章。"

秘书走了，彭真建议说："学术批判要慎重，不要过头。现在是继续放，不要乱扯《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郭沫若同志都很紧张了，邓拓也很紧张，北

京市委刘仁同志和郑天翔同志都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我看有必要搞一个汇报提纲。康老，你看呢?”

康生似笑不笑地说：“大家讨论吧。”陆定一、姚溱、吴冷西都没有意见。彭真果断地说：“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请姚溱同志起草吧。今天是2月3日，后天中央常委要开会，最好能在会前把提纲写好。”

散会后，姚溱一头钻进钓鱼台宾馆，为了找个帮手，他又把许立群拉了来，连夜突击，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彭真立即把稿子打印，五人小组人手一份。由于稿子的内容完全是根据2月3日的会议内容写的，同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开始了，彭真未来得及再组织会议讨论，便交给了中央常委会，好在还有中央把关嘛。

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他接到彭真的报告后，召集在北京的常委们进行讨论。邓小平看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感到这个提纲很好，完全符合自己的想法，立即表示同意：“我一年前就讲过，对文化战线的批判过了头，要立即刹车，可我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采纳。现在必须刹车，我建议中央把这个汇报提纲发下去，让全党按提纲的精神开展学术讨论。”朱德、周恩来完全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刘少奇问列席会议的康生：“你是五人小组副组长，有什么补充的吗?”康生摇摇头，叹口气说：“唉，这两天我的痔疮又犯了，不能久坐，我先到外面走走吧。”

刘少奇望望顾左右而言他的康生，眼里闪过一丝疑虑，继而点点头说：“我看就这样吧。不过还得请示一下主席。彭真同志，你就去武汉一趟，直接向主席汇报吧。”彭真答应了。

彭真、陆定一、康生来到武汉后，立即乘车去武昌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东湖宾馆位于珞珈山下的东湖的湖心岛上，周围是万顷碧涛，岛上花草茂盛，树大荫深，是武汉的著名风景区和避暑胜地。彭真一进入岛内就感到凉气袭人。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彭真的汇报，一直不置可否。彭真汇报完了，毛泽东神色冷峻地问道：“吴晗写《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关系没有?”说完，逼视着彭真。彭真坦然地说：“根据调查，《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没有联系。”毛泽东拉长声音反问道：“是吗？我听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老，你说是吗?”康生支支吾吾了几句，别人也没听清他说的什么。毛泽东也没有再说什么，把茶碗的盖子扣在茶碗上，表示送客。

彭真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常委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中央常委见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汇报提纲，以为毛泽东基本同意了，便让彭真代中央写了批语，把“二月汇报提纲”发了下去。

彭真以为“二月汇报提纲”经毛泽东审阅，从此可以把涌动着的那股给全国人民可能带来巨大灾害的祸水的澜头按下去，但是他想错了。就在提纲发下去不久，江青就和康生跑到武汉向毛泽东告了状。江青这时刚在上海受林彪委托，搞了一个全军文艺座谈会纪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打成是黑线专政。过去由于罗瑞卿的反对，她一直不能穿军装，现在堂而皇之地穿起了新

式军装。其实，江青在过去不能穿军装怪不上罗瑞卿，因为穿军装就得佩戴军衔，江青没有军衔，自然不能穿军装。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军衔制度已于上年5月取消，新式军装没有任何标志，只在领口两侧缀有两块红领章，表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软檐战斗帽上缀有红五角星帽徽，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以江青现在可以很方便地穿起了军装。

人逢喜事精神爽，江青自延安和毛泽东结婚后，忍耐了20多年，现在终于可以大露峥嵘了。

3月28日，江青约上康生、张春桥去武汉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最近一直睡不好觉。江青、康生最近经常来反映情况，据他们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勾结在一起，要在2月发动兵变，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他和常委的讲话。虽然他不太相信这些人的话，但还是采取了许多措施，收审了罗瑞卿。不料，罗瑞卿竟于3月18日跳楼自杀，虽然没有摔死，只是跌断了左腿，但已使毛泽东异常恼火。再加上严慰冰写匿名信，彭真又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决心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从哪里着手呢？就在这时，江青、康生又上门告状来了。

江青、康生事先已研究了汇报策略，决定挑选毛泽东最忌讳的事汇报，挑起毛泽东的怒火，尽速把彭真等人拉下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尽快爬上去。汇报一开始，康生就挑拨道："彭真他们是反对主席的，他们包庇吴晗，公然反驳主席，他们眼里还有主席吗？"江青火上浇油，紧跟着说："北京已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就要出大问题。"

毛泽东沉着脸，一直在静静地听，但他拿烟的手指却有些抖动。康生察颜观色，知道这些话打动了毛泽东。果然，毛泽东听完汇报，一下掐灭烟头说："我看是时候了……"

康生从武汉回来，变得不可一世，他把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找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中又添油加醋地加进去了许多自己的话。周、邓并不知道康生等人去汇报的事，现在又不好打电话去向毛泽东核对康生传达的真假。不过从康生狂骄、蛮横的态度上，他们也猜到了康生这次是奉旨回朝，地动山摇。在康生的胁迫下，中央书记处只好召开会议，解决彭真的问题。会议从4月9日开始，连开4天，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一言不发，只听康生在会上发言。这位专门靠整人过日子的斗争专家，一来是觉得已经撕破了脸皮，只有斗争到底才有出路，二是取得了上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所以放胆批去，整整讲了4天，用一句后来发出的中央文件里的话来说，就是"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康生批彭真这般卖力，陈伯达唯恐落后，论功行赏起来没有自己的份，也不时地用他的福建方言大讲一通，就是所谓的"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与其说是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参加，不如说是康生

主持，陈伯达参加。周恩来、邓小平一心想保护彭真过关，康生、陈伯达则用毛泽东的指示来压他们，逼着中央书记处通过决议，撤销“二月汇报提纲”。

其实，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不过是一次预备会议。这次会议刚开完，毛泽东便通知中央常委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南下，他在武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更是声嘶力竭地大骂彭真，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因带头发难有功，都进了文化革命小组。从此，江青就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从幕后站到了台前，假毛泽东的威信而对其他上自刘少奇，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和国公民任意笑骂了。

整倒了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又接着整陆定一和杨尚昆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中央立即发出由毛泽东指定康生等人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文件因为是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也叫做“五一六”通知。通知在痛骂了彭真一顿后通知全党：

>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
>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立即被软禁起来，北京市委被改组，吴晗被囚禁，邓拓自杀，全国政治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被迫自杀。

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原本在会议结束后即赶回广州，不料他被留了下来，中央领导要找他谈话，直至5月29日，他才心事重重地回到广州。他的夫

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志好生奇怪，再三追问，陶铸才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呀，中央决定调我当中宣部长。"曾志立即反对："你不合适，中宣部长要理论文化、文字水平很高的同志担任，你胜任不了。"陶铸点点头说："紫阳同志也认为我不太适合这个工作。"曾志果断地说："你向中央提出辞职。"陶铸摇摇头说："没那么简单，中央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辞是辞不掉的。"曾志担忧地说："你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现在又是这样的形势，我担心搞不好会栽大跟斗。"陶铸无可奈何地说："可我是个党员啊。"曾志到此也无话可说，给他简单收拾了点行李，陶铸便乘火车北上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五十九回　乱北大聂元梓领贴大字报　稳首都刘少奇主派工作组

话说1966年5月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陶铸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在行政上他已是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现在他一身荣兼数职。在有些人看来，陶铸是中国政坛上正在冉冉上升的一颗明星，唯有他的夫人曾志对此番升迁反应冷淡，提醒陶铸小心摔得粉身碎骨。

曾志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就在中央下令调陶铸进京的当口，在钓鱼台里，当今政治核心圈中的两位实力人物正在议论即将到任的陶铸。钓鱼台地处北京城西，北宋时，曾有人在此地的小湖中筑台钓鱼，因而得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被建为国宾馆，园内流水淙淙，亭台翼然，一栋栋风格各异的豪华别墅式小楼散布其间。只有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级的国宾来访时，才有资格被招待住进国宾馆。“五一六”通知一发，文化革命狂飙骤起，这里即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驻地。此刻，住8号楼的康生和住15号楼的陈伯达在园内一边散步，一边议论。康生瘦而高，陈伯达矮而胖，一个山东口音，一个福建方言，但这并不妨碍二人进行密谋。

北京大学，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近日来报纸上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连篇累牍，篇篇都是杀气腾腾，邓拓已经自杀。前几天，又传达了中央下发的“五一六通知”，“通知”直接点名批判彭真，校园内到处是三三两两探测消息的人群。如果把这时的北大比成一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现在所缺少的就是一根导火线了。聂元梓等人贴出来的大字报犹如一根点燃了的导火线，一下子把这桶炸药引爆了。顿时，校园里贴出了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到处有人找聂元梓辩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师生也都纷纷跑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北京大学犹如闹市那样热闹。

这张大字报写了些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人们仔细看去，只见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干了些什么？”大字报攻击宋硕等人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到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斗争方式。”

毛泽东看完这张大字报的底稿后激动地说："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是何等地好啊！"他立即给康生打电话，指示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和首都许多大学一下子乱了起来，大字报满墙满院都是，学生教师也分成两派，互相辩论。

这时，陈伯达接受了毛泽东的命令，进入人民日报社，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6月1日，他们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他们又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首都的许多大学，开始出现揪斗领导干部和教授的违法事件。

陶铸就是在这个时间进北京的。他离开广州的当天晚上，就在列车里听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给党委贴大字报，这不就是当年右派干的事儿吗？既然广播了，也就是提倡的意思嘛，这样一来，岂不是天下大乱了。6月4日，车抵北京，这时北京市委已经改组，北大党委也被改组，北京的政治气氛异常紧张。陶铸下车后，立即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康生和陈伯达听说陶铸到了，立即去了9号楼看他，一则是拉他，二则是摸摸他的底牌。陶铸并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底牌，见了康生和陈伯达就着急地说："现在北京的这些大学乱得很，得想个法子才行，我看派工作组是个办法。"康生摇摇头说："现在是群众运动，谁个劣，谁个不劣，群众看得最清楚。"陶铸立即顶起来："照你这样说，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怪事，共产党的天下不让共产党当家。"康生劝道："老陶，你刚来中央，有些事多想想。运动刚开始，先不要急，看看再说。"

康生和陈伯达辞别出来。陈伯达问："你对老陶印象如何？"康生笑笑说："一头牛！他还不摸底，得让江青同志给他透透底，让这个蛮牛去顶中国的赫鲁晓夫。"

康生、陈伯达走了后，陶铸想了好久。形势的发展果如曾志所预料的那样越来越复杂了，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呢？毛泽东远在杭州，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过去为工作上的事，陶铸顶过刘少奇一次，刘少奇后来找他谈了一次，把事情说开了。虽然如此，二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芥蒂。不过为了尽快结束北京高校中的混乱局面，陶铸顾不上这些了，他决定立即去找刘少奇，把自己的想法谈出来。

出乎陶铸的意外，刘少奇极为赞赏他的想法，他焦急地对陶铸说："我一直在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总说不要急着派工作组。我和总理、小平等同志商量了一下，他们也都感到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必须把首都的严重情况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你也去吧，你刚从地方来，没有框框，看问题更客观一些。"陶铸同意了："我一定去。"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坐飞机赶到杭州，向毛泽

东汇报北京的情况。

刘少奇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在北京主持工作，自然是由他首先汇报："主席，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人都被学生揪斗，党委已经瘫痪。"刘少奇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但在说这几句话时，明显地流露出急躁和不安。他接着汇报道："北京新市委为了稳定学校秩序，建议仿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向各高校派工作组。"

与刘少奇急躁不安的心情恰好相反，毛泽东显得轻松愉快。他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满不在乎地说："乱一点怕什么，先让他乱一阵子。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自古治国的好办法。"

陈伯达立即附和道："主席说得对，我是不同意派工作组的。相信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要把群众当阿斗。"陶铸立即顶他："派工作组是我们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相信群众，群众还得由党来领导嘛。"

于是，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派，一种主张不派，大家在毛泽东面前争论起来，各自把理由摆足了，然后静下来望着毛泽东，听他最后裁决。毛泽东望望大家说："这件事不要急。"这话虽然有点让人感到模棱两可，但主要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并没有积极支持派工作组。刘少奇感到心中无数，请求说："下一步怎么搞，我确实不太清楚，还是请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吧。"毛泽东摆摆手，坚决地说："我这里还有些事走不开，北京的事你们商量着办吧。"谈完端起了茶杯。

刘少奇、邓小平这次来汇报，本想得到明确指示，但结果还是不得要领，两人多少有点失望地回到北京。这时不仅北京大乱，全国也开始乱了起来，北大发生的事在全国那些重点大学里都发生了，各地告急文书都送到了中南海，一些大学的师生跑到中南海门口请愿，要求尽快恢复高校秩序。怎么办？刘少奇有点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催促说："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派工作组。"刘少奇为难地说："可是，主席没有明确表态说派工作组啊。"邓小平接着话头说："可也没有表态说不派工作组啊。"刘少奇还下不了决心："小平，我有难处。我是主持中央工作的，万一主席翻脸，不好交代啊。"邓小平说："那好办，我们作出决定，请主席指示不就得了。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全党都看着你呢。"刘少奇没有说话，点了支烟坐在藤椅上抽了起来。邓小平也点上烟，两人谁也不说话，像比赛似的狠劲地吞云吐雾。忽然，刘少奇站起来，神色断然地说："开！派工作组，我要向党、向国家、向人民负责。"邓小平一把掐灭烟说："我马上去通知。"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了，中心议题是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首先反对："主席没有同意派工作组，工作组不能派。"邓小平反驳说："主席也没有说不同意派工作组啊。"

陶铸吼道："快派工作组，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要快派，就像消防队救火那样。"邓小平拍了一下桌子，强调说："老陶说得好，要像消防队救火一

样。现在我来念一下工作组名单，北京大学是张承先，已经去了。北师大是孙友渔，人民大学是赵一萍……”

工作组带着神圣的使命，立即进驻各大专院校，许多师生看到工作组进校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恢复校园的安静了。

康生、陈伯达见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立即向江青告状，要她向毛泽东反映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他们又另外找来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向他们密授妙计，三人得示而去。第二天，这几个大学里立即出现骚动，酿成一个个事件。

首先是北京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6 月 18 日上午，一些学生在聂元梓的指挥下，随意到校园内的各办公室和教授住宅，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教授抓出来，两个按一个，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墨汁，戴上用字纸篓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到处设置斗鬼台，把教授们推上台去，反剪两臂，使劲按下脑袋，形如苏制米格喷气式战斗机。一些流氓乘机摸女学生的胸部和大腿，校园里一派混乱恐怖的景象。

驻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事先已经得到一些报告。据查，昨天晚上，有的人和校外电话联络密切，今日一早，又发现几个身份不明的人骑着自行车满校园跑，他们跑到哪里，哪里就出现骚乱。张承先立即把工作组成员召来开会，要大家立即出动制止事态的发展，张承先自己也跑到两个斗争点讲了话，要他们立即释放被抓的教授。慑于工作组的威力，这些学生被迫释放了那些领导干部和教授。

江青得知北大发生的事件后，立即向毛泽东写信，诬告北大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毛泽东这时已不在杭州了，他于 6 月中旬离开杭州后，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居处离韶山毛泽东故居不远，位于半山坡上，地形隐蔽，风景优美，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十几天后，又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为什么说是白云黄鹤的地方呢？原来武汉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有仙人乘黄鹤来到武汉，栖止数日后又乘鹤而去。后来武汉人根据这个传说，在黄鹤栖止的长江岸边修建了一座黄鹤楼。唐时诗人崔颢登黄鹤楼，面对奔流不息的大江，深感人生易逝，乃慨然命笔，写下了千古绝唱《登黄鹤楼》，其中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所以后来人们也把武汉叫做白云黄鹤的地方。

毛泽东在房间里活动了一会儿身体后，拿起文件读起来，这是林彪 5 月 18 日的一次讲话，专讲政变，历数国际国内政变事例。毛泽东读了，心里一惊，还没有人这样讲过政变问题，同时心中也有些不安。

批完了文件后，毛泽东感到有许多话要对江青说，便提起毛笔写起信来：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

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回 批刘邓江青交底 讲党性陶铸摇头

话说江青接到毛泽东的长篇复信后，发现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不满，认为自己被迫当了20世纪60年代的钟馗。看到最后，只见毛泽东在信上叮咛自己，这封信现在不能公开；又告诉自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江青看完了毛泽东的信，心中有了底，知道决战即将开始了。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刘少奇得到报告，立即拿起电话同丰泽园联系，准备立即赶来向毛泽东汇报。卫士在电话里告诉他："主席很累，正在休息，明天再汇报吧。"刘少奇失望地放下了电话。但是不久他就得到报告，毛泽东连连召见康生、陈伯达等人，听了整整一夜的汇报。刘少奇心中有些不高兴，按组织原则，应该先听取副主席的报告嘛。

第二天午后，刘少奇去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态度冷淡地说："请吧。"顺手点了根烟抽起来。刘少奇汇报了北大聂元梓乱揪乱斗的事件，汇报了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闹绝食、向工作组长王光美施加压力的事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一句话。刘少奇汇报完了，满以为毛泽东一定会对自己派工作组的决策表示满意，谁知毛泽东严肃地批评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一席话似暴风骤雨，一下子把刘少奇打懵了头。他有点不明白了，派工作组是我党的传统做法呀，怎么一下子又错了。还未等他明白过来，毛泽东又下令："把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就是那期登载张承先汇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材料的简报予以撤销，把工作组从大学里都撤出来。"

刘少奇尽管很有意见，但毛泽东一言九鼎。他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通知全党："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毛泽东回到北京，重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使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如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蹦得更欢了。他们在北京的高校里窜来窜去，给聂元梓、蒯大富打气，听任他们缠住工作组，扩大事态。看着差不多了，陈伯达和江青就去北京大学煽风点火。

北京大学师生听说江青晚上要来讲话，早早地聚集在校内的五四广场上。

北京的夏天多雨，这天晚上又是小雨霏霏。广场上的灯都打开了。灯光里，学生仍打着伞，顶着塑料布，焦灼地望着广场入口处。

来了，一队队警卫战士进入广场，在主席台周围列队警戒，然后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依地位的高低，陆续进入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

忽然，一队警卫战士开进广场，在入口处布下警戒，主席台上的官员们也都站立起来，工作人员在主席台前跑来跑去，神态格外紧张。广场上的学生们一看这架势，知道江青要来了，一齐朝入口处瞧去。只见几辆“红旗”轿车在入口处停下来，一个身材修长，身穿军装的女人从第一辆车上下来，后面紧跟着陈伯达。顿时，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江青一边走一边含笑招手，神态分外潇洒。她走在主席台前的跑道上，思绪万千。经过20多年的斗争，她，江青，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流女演员，终于挣脱了抗战初期和毛泽东结婚时政治局为她立下的不许参政的三条规定，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号施令了。一想至此，江青心中好不得意，大步流星地向主席台走去。

江青登上主席台，随后陈伯达、康生也登上了主席台。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一看时辰已到，便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来看望大家，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北大学生们已从各种渠道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刘少奇、邓小平挨了批评，这时候，江青来北大讲话，肯定会带来不少的消息，所以不顾夜雨霏霏，个个聚精会神地听着。江青完全知道学生们的心情，一开始讲话就卖弄起她的权威人士的特殊身份来。她尖着嗓子，拉长声音喊道：“同志们，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学生们听了，顿时热血沸腾，整齐地呼叫着：“江阿姨，我们爱你。”聂元梓拉开破嗓门，在旁边的麦克风前喊起来：“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也尖着嗓子喊道：“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

喊得正热闹的当口，广场上一角突然响起几百年轻人一齐朗诵毛泽东语录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夏夜的广场上，几百年轻人一齐朗诵着这句富有战斗性的哲言，格外令人振奋。人们循声望去，只见广场一侧，整齐地列队站立着几百名青年男女，个个身穿发白的黄军装，显然，这些军装是他们的父辈征战沙场的历史见证，因此，也是这些青年们高贵门第的象征。最惹眼的是这几百名青年男女的右臂上都戴着红袖章，袖章上是三个醒目的黄色毛体字“红卫兵”，大概是集字而成的。再看看，他们都戴着北大附中的校徽，原来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

红卫兵这个名字及其这个组织的狂热的好斗本性立即引起了全场人们的注意，自然也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立即借题发挥道：“小将们，我们支持你们，毛主席也支持你们。可是有人就不支持你们，他们背着毛主席，镇压革命小将。当然，派工作组我们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毛主席主张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可是毛主席的话他们不听，我的话更不听，可是有的人的讲话好像是圣旨一样，他们可听啦。毛主席回到北京，一看大学都关着门，心里很难过，立

即开了中央常委会。中央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撤销工作组。”聂元梓听到这里，激动地高呼起口号来：“感谢中央文革小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趁着聂元梓领着全场学生喊口号，江青喘了口气。等口号声停歇了，她突然尖声喊道：“我控诉！”师生们听了，一下子屏住呼吸，以为江青要透露重要新闻。江青尖声喊叫道：“她从来就不是我们家真正的儿媳妇，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骗他和自己结了婚。”江青的这句话纯属造谣诬陷。

果然是一条重要新闻，没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家里竟也和一般老百姓家一样在闹家务，这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许多人极感兴趣地听她往下讲。陈伯达却拍拍江青的肩膀，示意她不要往下讲了，江青也感到讲漏了嘴，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也有损自己“文化革命旗手”的形象，便连忙转口：“我不怕，我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文革小组坚决站在革命小将一边，无条件地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江青讲到这里，忽然质问站在旁边的张承先：“你为什么要镇压革命群众？啊？我要你说！”张承先辩解道：“我们没有镇压革命群众呀！我们工作组只不过是制止了一些人随便打人侮辱人的不法行为。”江青冷笑道：“什么不法行为？天是无产阶级的天，法是无产阶级的法，我们就是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谁敢镇压群众，谁就没有好下场。”江青讲到这里，喘了口气。聂元梓乘机狂呼口号：“‘六一八’革命精神万岁！”几个事先预伏在主席台两侧的学生冲上来，按住张承先，让他坐喷气式。江青从一个学生手里接过皮带抽打着张承先，嘴里还狠狠地嚷叫着：“我叫你镇压革命群众，我叫你镇压革命群众。”

看着张承先挨打，聂元梓高兴极了，带着她的那伙人台上台下地乱呼口号，但台下响应者寥寥无几。陈伯达知道江青带头打人失了身份，引起了众怒，赶忙跑过来救驾，对着麦克风喊道：“革命小将们，我是个小小老百姓，我要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代表毛主席的，很重要，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

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成员当夜悲愤地离开了北大校园。清华大学工作组撤得却不那么顺利。由于首都的这几所高校中有许多高级干部子弟，刘少奇挨批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高校。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康生的支持下，清华学生蒯大富搞了个绝食事件，煽起部分学生对王光美的不满。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后，蒯大富立即反扑过来，揪住王光美不让走，周恩来得知后，派人以开中央会议为名把她接了出来。

王光美神情疲惫地回到中南海自己的家里，刘少奇歉疚地说：“都是我不好，让你受牵连。”王光美摇摇头，断然地说：“不，你没有错，你是对的。”她望望聚集在一起的沉默忧愁的几个孩子平平、源源、亭亭、小小说：“孩子们，你们要坚信，爸爸是对的。派工作组是中央集体做的决定，毛主席也没有

表示反对。”王光美正在做孩子们的工作，刘少奇的二女儿刘涛从清华大学回来了。由于革命战争时期长期的动乱环境，刘少奇一生共结过5次婚，前4个妻子牺牲的牺牲，分离的分离，留下了允斌、爱琴、允若、刘涛、允真5个孩子。刘涛和允真的生母是王前，这时还健在。前面几个孩子都工作了，刘涛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王光美待她如同己出，照顾甚周，这时她见刘涛回来，张罗着要厨师做几个好菜，孩子住校，生活上清苦些，前段时期刘涛又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起忙着学校里文化革命的事，累坏了。

但是，刘涛今天满脸愁容和困惑，不理睬王光美的嘘寒问暖，直截了当地问刘少奇：“爸爸，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派工作组？”刘少奇面对女儿的责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好保持沉默。王光美向女儿解释说：“涛儿，派工作组是你父亲请示了毛主席的，毛主席没有表示反对，然后中央集体做的决定，你父亲的错就在于他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他不承担责任谁承担？”刘涛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道：“爸爸，你推行错误路线并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啊？”刘少奇猛抽烟，脸色阴沉，继续保持沉默。王光美忍不住向女儿又解释说：“涛涛，你不要逼父亲了。你父亲是中央副主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跟你讲的。”刘涛这时翻脸了，站起来指着王光美吼道：“你不要解释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吧。”王光美没想到刘涛这么绝情，不禁悲愤交集：“涛涛，你太没良心了，你看着我们落了难，就这样欺负我们啊！”刘少奇掐灭烟，转过身来对刘涛严肃地说：“好，我来回答你。你知道吗？有人在清华大学设了个陷阱让我和你妈跳。蒯大富绝食，完全是康生在后面支持的，我当面问他了，他没否认。你现在明白了吧，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单纯。如果你想保自己，和我们划清界限，那也可以。”

刘涛听完父亲的话，没有再说什么，跨出了这个她以前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家。离开家门前，她不禁恋恋不舍地回头望了一眼，只见父亲、继母满脸的悲愤，但哭红的眼睛中又明显流露出疼爱和期待的目光。刘涛心里一酸，二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就这么一刀切断，她心里也有些不忍。但想到这个永远不会再翻身的家庭将会给自己带来的损害，毅然回头走了。

刘涛的出走沉重地挑断了刘少奇、王光美感情上的一根弦。王光美提醒刘少奇说：“涛涛被人做工作拉出去了。看来形势的发展凶多吉少，你要有所准备。”刘少奇还抱有信心地说：“主席历来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再说，我有多大的错呢？唉，现在真有点无所适从，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我也不晓得。明明是对的，人家却说你错了……”

刘少奇确实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但有几个人知道，江青就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个。这时，她正在找已搬到中南海的陶铸，向他交底。

说起来，陶铸和江青也是老熟人了。江青经常去广州休养，陶铸和曾志总是热情款待。别人在这位第一夫人面前都是恭敬之至，大气都不敢出，唯有陶铸可以无所顾忌地和她大叫大嚷。但是此时江青一身戎装地闯入陶铸在中南海

的新居时，陶铸却居然拘谨、客气起来。因为他明白，他面对的不再是那位牢骚满腹的无所事事的女人，而是正在受到毛泽东宠信的，专以挑弄是非为其职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她由于是主席夫人，还有着了解和传达中枢要旨的特殊身份。在动乱的今天，这些都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更何况，她今天来是向陶铸下达一项重要作战任务，这个任务又使陶铸十分头疼。

江青进来后，在沙发上坐下，头一句话就噎得陶铸说不出话来："噢，你搬家了，为什么不在钓鱼台住呢，在那里我们可以互相商量呢，别忘了你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呢。你是不是嫌文革小组名声太小，不如国务院响啊？"陶铸摇摇头，半天才说："哪能呢，在广州我是西瓜，在中央只能是个芝麻哩！"江青认真地说："你是芝麻？你才不是芝麻哩。你是西瓜，主席很器重你，林彪同志也很看重你。过去我每次到广州，你们每次都热情款待，我也很感谢你哩。"

陶铸心头滚过一阵热潮，连说："应该的，应该的。"江青脱下草帽说："虽说应该，也实难得。现在你到了北京，我也要多尽尽心。我问你，政治局生活会上的发言，你准备好了吗？"江青指的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政治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的生活会。陶铸在8月1日就接到了通知，让他准备发言。但是陶铸却一点没有准备，因为他一直到现在也看不出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有什么错误，更何况他对刘、邓在前几年的纠正浮夸错误的一些措施是非常赞成的。他不想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还要讲党性嘛。

江青看看陶铸吞吞吐吐的样子，知道他没有准备，便拉拢说："你是左派，你早就向刘少奇开过炮嘛。"陶铸一听，血液都似乎凝固了，同刘少奇争论过就是左派？难道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党内高层领导间存在着这么大的裂痕，这太可怕了。江青看陶铸脸色沉重，诚挚地说："你知道了吧，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底。多少人想摸这个底，我们都没有告诉。你是左派，你最有资格开头炮，所以我只向你交这个底。"

陶铸听了江青的话非常反感，这不是拉帮派、搞阴谋嘛。他暗下决心，宁死也不参与这种活动。然而当面拒绝江青的要求也不好办。陶铸喘着气，艰难地说："不行，我不能开头炮。"江青以为他害怕，鼓励地说："怕什么，主席给你撑腰，我们都和你站在一起，你还顾虑什么，你以前不是朝刘少奇开过炮嘛。"陶铸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不能落井下石。"江青这才明白陶铸的心思，原来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还蛮有感情的。她后悔自己看错了人，冷冷地说："你很有人情味嘛。"

江青失望而又气恼地从陶铸住所出来后，又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一听江青要他打头炮，一口答应。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许多中央委员被冲击未能到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校的聂元梓等人列席了会议。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宣布开会的话音刚落，谢富治就抢先发言，气势汹汹地大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错误。谢富治是二野出身，备受刘伯承、邓小平信任，

曾担任陈赓兵团的政委，协助陈赓抢渡黄河，展开战略反攻，这个兵团当时号称陈谢大军，是二野最强大的主力兵团。这时，他为了邀宠，当左派，不顾做人的起码品德，拼命往刘少奇和自己的老政委头上泼脏水。在谢富治凶猛攻击的带动下，有些人也跟着发言。毛泽东的目光在陶铸身上扫来扫去，陶铸有些慌神，他用求援的目光看着周恩来，只见周恩来埋头喝着香茶，一声不吭。陶铸有了主意，也学着周恩来的样子品着香茶，生活会开了几次，两人一起品尝，始终一言不发。

当然，这期间陶铸也不是没有动摇过，特别是当林彪激烈地批判刘、邓时，陶铸暗想，难道是我错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他尊重林彪，林彪信任他，把他提拔为四野政治部副主任。林彪南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又推荐他主持广东省的工作。陶铸对林彪向来非常佩服，每次进京，必先去看望林彪。现在林彪在会上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狠狠地批评刘、邓，从感情上讲，陶铸觉得应听毛主席、林彪，但实际工作的经历又告诉他，刘、邓是对的。陶铸见周恩来始终不发言，心里也就有了底。

中国的京戏里，每有统帅出场时，总是先有小兵出来摇旗呐喊，接着将军们依次上场摆队，等到戏台上站满了小兵、将军时，统帅才在幕后大叫一声，这时观众都知道主角要出场了，个个屏息静气地观看。只见那主帅倒退着出场，故意不让人看见他的扮相，到了台前，主角才做一个漂亮的动作，猛然转过身来，这就叫亮相。

政治局生活会开了几次，林彪、谢富治这些开头炮的，打先锋的摇旗呐喊过后，主帅该上场了。主帅就是毛泽东。8 月 5 日，毛泽东出场正式亮相，在全会的会议厅门口贴出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写道：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但是，有很多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深醒”。周恩来没有讲话，但他内心深处是同情刘、邓的。过了两个月以后，他终于冒着被打倒的危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保护刘、邓。陶铸也没有“深醒”，两个月以后为了保刘、邓，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八届十一中全会自毛主席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会议集中批判

刘少奇和邓小平。会议最后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取消了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刘少奇在常委中的排名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过了9天，中央又宣布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样，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中毛泽东是中央主席，林彪是副主席，其他人一概都是常委。文化革命的领导体制正式形成，刘少奇被取消了接班人的地位，林彪成为新的接班人。

这个名单的出现，其中缘由人们都已经明白。奇怪的是陶铸拒绝打头炮，居然升为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百思不得其解，只认为是毛泽东赏识他的忠贞的品格。全会结束后，他继续照着自己的想法干下去了。

转眼就是1966年的国庆节了，毛泽东要在国庆节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原来发源于清华附中。这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班的几十名高干子弟在附近的圆明园旧址集会，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决定成立一个战斗组织“红卫兵”，参加该组织的，最初都是高干子弟，人人身穿父辈穿过的发白的旧黄军装，右臂上佩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回京后给他们去了一封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身着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上，一些红卫兵代表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广场上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欢呼雀跃，红卫兵运动一下子在全国铺展开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处烧、砸、抢、偷，美其名曰“破四旧”，许多人被他们活活打死，千年古迹顿成废墟。此后，毛泽东又两次接见红卫兵，每次接见，广场上都是红旗如海，红卫兵们流着幸福的热泪，欢呼雀跃，如醉如痴。

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还发了陈毅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张照片后，把报纸一扔，怒气冲冲地嚷道：“见鬼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一回　救贺龙周恩来智布藏雄阵　保陈毅傅崇碧巧施脱壳计

话说江青看到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领导人照片上，邓小平站在毛主席跟前，不禁大怒，朝着前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陶铸吼叫着："这是见鬼了！"陶铸看着周恩来，周恩来翻着材料，似乎没有听见江青的话，可又马上合上材料，似乎是代陶铸回答："现在开会吧，陶铸同志，你先说说吧。"陶铸是第四号人物哩，理当先讲。陶铸望望江青，好意地建议道："江青同志在党政机关一直没有一个正式职务，这对于开展工作不利，我建议在党政机关中，给江青一个正式的职务。"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当时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给江青立了个规矩，不许她干预政治，所以江青一直没有正式的党政职务。现在她虽然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还是希望在政治局和国务院有个正式的职务。周恩来是当年在延安给江青立规矩的五大书记之一，对江青进入政界，干预政治深感忧虑。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对江青职务的递升则各怀鬼胎。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一听说陶铸建议给江青一个正式的职务，都注意地听着陶铸建议的下文。只听陶铸缓缓地说："我想请江青同志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也比较方便些。"

陶铸讲这话没有一点贬低江青的意思。多少上将、中将，戎马征战一生，战功赫赫，也还没摊上个副部长呢。江青要功无功，要学无学，当个副部长也算是破格提拔了。谁知江青听了大为生气，她原以为陶铸建议她当政治局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没想到只是去当个副部长，她禁不住脸红耳赤地叫了起来："亏你想得出，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周恩来知道江青野心很大，再说她的职务也不是他和陶铸能定的，便把此事用话岔开。谁知江青却不依不饶，挑起陶铸的毛病来："陶铸，你总是说这个左派有毛病，那个左派是国民党党员，你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陶铸见江青公然胡搅蛮缠，歪曲历史，气愤地斥责她说："胡说，那些人是什么国民党党员，我是什么国民党党员，我是大革命时期奉党的命令跨党的国民党员，当时毛主席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总理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事。你要是不懂，先去读读这段历史吧。"

自"文革"乱兴，江青这是第一次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顿时大喊大叫起来："陶铸，你想镇压我！你敢给我气受，你等着吧！"陶铸也吼叫起来：

“这是共产党组织，你乱干涉，还要不要组织原则?”江青听了，顿时哭起来，陈伯达、康生忙跑过来解劝，又帮着江青和陶铸吵嚷，中央文革碰头会闹翻了天。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说劝下，会场才平静下来，但江青从此和陶铸结下了仇。

中央文革碰头会散会以后，周恩来急匆匆地赶回西花厅。他没有进办公室，径直来到西花厅后面的一个院子里，这是他和邓颖超的起居之所。他推开一间房子的门，朝正在吃饭的两个客人问道：“贺胡子，住得怎么样啊?”那两位客人闻声转过头来，原来是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

贺龙为什么住到西花厅来了呢？原来这都是叫林彪、康生害的。林彪在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集中讲防止政变问题。据林彪讲，毛泽东在1965年底至1966年5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毛泽东说过这个问题，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提出后，毛泽东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在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泽东找人谈防止政变问题找的谁，林彪没有说。但要调兵遣将，那就少不了找林彪，林彪也乐得利用这个机会在军队等要害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

为了造成政变在即的恐怖感，以便进一步乱中夺权，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把中国历史上的政变历数一番，什么“玄武门之变”、“八王之乱”、“御河桥之变”、“商成逼宫”、“雍正谋位”等等，俨然是一位泛政变主义者。林彪的意思，无非是用政变吓唬毛泽东，让他把军权更多地让给自己，把军委中的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贺龙、叶剑英六大元帅都打下去。

林彪的诡计还真没有白设。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彭真由于是分掌总参、中办、中宣、首都四大要害部门、地区大权，被打了下去。林彪诡计初步得逞，接着就把手伸向仍在军委的六大元帅。但这六人都是开国元勋，功高位重，林彪难以下手。正巧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勾结要在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驻兵，发动二月兵变。

林彪得到这个消息后心中暗喜，这张大字报是一颗炸弹，扔到哪里哪里就炸。但要把大字报变成炸弹还得加加工。自己身为副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好亲自出面，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康生。此人是制造“莫须有”罪名的专家，只要他一张嘴，关羽也能被说成是奸臣。于是，林彪立即让叶群给康生打电话。康生正要午睡，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嘴里骂了一句“谁这么讨厌，偏偏在这个时候来电话”，拿起电话，不耐烦地问：“谁呀？啊，是叶群同志。”康生的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嗯啊哈地听起电话来，最后保证道：“请转告林副主席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放下电话，康生满脸浮现着得意的神色，又一个在林彪身上下本的机会来了。他立即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召到钓鱼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革命元老吴玉章，他年高体衰，不常到校，实际校务由郭影秋主持。

此年5月，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解散，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郭影秋被调到北京新市委任书记，又代表华北局参加文革小组。

郭影秋被召到中央文革驻地后，康生当着许多人的面，劈头质问道："郭影秋，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郭影秋点点头。"知道。"康生冷笑一声说："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汇报?"郭影秋镇静地说："这张大字报纯属子虚乌有。这事我知道得最清楚。当时北京卫戍区奉中央军委命令，为了加强战备工作新组建了一个团。但这个团的营房还没有盖起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就是在朝鲜战场率军血战铁原，掩护西线志愿军大部队转移的那位英雄军长）和我商量，能不能暂时借用一下人民大学的学生宿舍让这个团的官兵住一下。当时人民大学的许多学生下乡参加'四清'去了，很多房子空着。但我考虑到，校园里驻兵影响学校正常秩序，所以就拒绝了。后来这个团借用其他部队的宿舍安置下来。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二月兵变的事情，所以也无须汇报。"

郭影秋可不是一般的文人，他是历史学家，著有《李定国》等晚明历史专著多本。同时他又是一员儒将，曾任军政委、剿匪司令等高级军职，所以在康生的突然袭击面前，镇静自若，把话讲得透彻明白，竟使康生无话可讲，大丢面子。康生十分恼火，指使一些学生揪斗郭影秋，把郭影秋从中央文革小组赶了出来。不料郭影秋个人修养极好，待人和气，勤政廉洁。有一天晚上他的夫人突患疾病（郭夫人也是高级领导干部），郭影秋一不叫车，二不喊人，自己背着夫人跑了五六里路到海淀医院。医院领导大为吃惊，赶紧打电话叫人民大学派车来接。这郭影秋廉洁如此，对教授又非常关心，每月必看望所有教授一次。他对工人也亲如家人，每星期必和工人一起劳动一天。所以人民大学的教授、工人都非常喜欢这位温文尔雅的校长，一些学生受康生挑拨起来揪斗郭影秋，大部分学生都反对这样做，全校大部分工人和学生立即成立战斗组织保护郭影秋，为此两派学生在人民大学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彻夜辩论。会上，保护郭影秋的一派据理反对揪斗郭影秋，全校工人和从乡下赶来的京郊农民（郭影秋在这里搞过"四清"）嚷着要把揪斗郭影秋的学生带到乡下去监督劳动，会场气氛非常紧张。

郭影秋是邓小平的老部下，邓小平听说人民大学学生辩论郭影秋问题，连忙赶来参加，从晚8时一直听到第二日黎明。最后邓小平讲话，他一口否认了二月兵变的事情，"二月兵变没有这个事，当时是新成立的一个团没房子住，跟人民大学借房，郭影秋同志没有答应，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不存在二月兵变的事。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谁都调不动，彭真也调不动，没有这回事。至于郭影秋同志，我是了解的，大家也都了解，是个好同志嘛。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嘛!"邓小平的话博得了会场上数万人的掌声。

"不存在二月兵变的事"，这个消息一下子澄清了谣传。康生听了急了，也

跑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会场上去讲话："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事，是彭真策划的，他和一些人有勾结，调动部队，在学校驻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本来已经平息了的谣传叫康生这么一讲，又沸沸扬扬地流传开来了，各种简报、汇报如雪片般送了上去。康生又指使一些人把所谓的"二月兵变"和贺龙扯到了一起，他向一些亲信授意说："二月兵变的后台是贺龙，他主持国家体委的工作，把体委变成兵变的大本营，给体委发了枪，发了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还在北郊修了碉堡。"体委确实有枪，但都是体育比赛用枪。凡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用体育比赛用的枪支发动兵变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康生为了陷害贺龙，根本不管这些了，只要能安上的罪名，就捕风捉影地往贺龙身上栽。

周恩来知道林彪、康生居心不良，为防不测，干脆把贺龙接到了西花厅住下。

贺龙夫妇正在吃饭，周恩来进来后，他们站起来，周恩来忙让他们坐下，关心地问道："住得怎么样啊？"贺龙不安地说："好是好，只是连累你了。"周恩来摇摇头说："胡子，你怎么也和我客气起来了。"两人正聊着天，秘书推开门匆匆进来报告说："总理，事情不好了，贺老总住在这儿的事不知怎么让他们知道了，林办打来电话追问呢。"贺龙一听"霍"地站起来说："总理，你这儿我不能住了，我贺龙牺牲了没有关系，总理你可不能倒下去。只要你还当着总理，中国就有希望。"周恩来厉声命令贺龙坐下："慌什么，你先在这儿住着。我给你安排一下，安排好了你再走。"贺龙听了只好乖乖地坐下来。

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召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吩咐道："小傅，贺老总现在遭了难，你能不能找个地方先把他藏起来，别让红卫兵把他揪走。"傅崇碧想想说："有，在西郊有一个小院子，就让老总先住那里吧。"周恩来挥挥手说："走，咱们看看去。"

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轿车沿着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复兴路往西开去，街上是一群群狂呼乱喊的红卫兵队伍，许多队伍还打着红旗行进着。周恩来看看他们身上背的背包，知道是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现在，北京每天都有近一百万的外地红卫兵，大中小学都住满了，北京市的街道办事处都被动员起来接待红卫兵，这些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一切都由国家免费供给，国库里本来不多的钱又花去了一大把。周恩来心里直叹气，灾难啊，民族的灾难！但是他对此毫无办法。身为总理，他能做的也只是巧妙地和文革小组周旋，尽最大的可能减小这场灾难。

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最后在西郊群山里的一个小院落前停了下来。这里茂林修竹，从外面看不见院落。院子里整洁得很，房子不算很好，但作为避难之所也完全可以了。周恩来很满意，叮嘱傅崇碧："这里驻上一个加强连，一定要保证贺龙的安全。"傅崇碧说："总理你放心吧。红卫兵是绝对不会从这里抢走贺龙的。但是中央派人来要呢？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周恩来叹口气说：

“我明白，只要挡住了红卫兵，你就完成了任务。”

布置好了避难之所，周恩来连忙回到西花厅。贺龙问道：“总理，我可以走了吗?”周恩来点点头，难过地说：“胡子，你要保重噢。”贺龙点点头，和夫人薛明上了车，随傅崇碧而去。

贺龙搬家的事，立刻让林彪知道了，他立即下令逮捕贺龙，立专案审查。周恩来见事情捅开了，索性向毛泽东建议，由北京卫戍区成立特别监狱，把已被打倒分散看押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中起来，由部队进行看护。周恩来最担心的是这些老干部分散各处，警卫混乱，以致被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抓去。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这些老干部说被打死就打死了。如果把他们集中起来看护，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虽然照样不自由，但人身安全总可以得到保证了，然后再等待时机，把他们逐步解放出来。这本来是周恩来想出来的保护老干部的计策，没想到却也正合了毛泽东的心意，一口赞成，并责成周恩来组织实施。周恩来立即把傅崇碧找来，要他组织特别监狱，告诉他特监的政策是名为特监，实为看护。傅崇碧完全领会了周恩来的用意，在北京城西的什坊院找了一所隐蔽的小院作为特监。特监里有一座二层小楼，小楼前后有两个院子，前院驻有一个连，后院沿墙的平房就是监所。平房都编上号数，每间住一人，他们是：

1 号	陆定一
2 号	黄克诚
3 号	谭　政
4 号	彭德怀
5 号	孔　原
6 号	彭　真
7 号	马明芳
8 号	王尚荣
9 号	班禅·额尔德尼
10 号	荣高棠
11 号	孟用潜
12 号	万　里
13 号	陈克寒
14 号	冯基平
15 号	罗瑞卿
16 号	邓　洁
17 号	李井泉
18 号	赵建民
19 号	贺　龙

20号 刘 仁
21号 陈再道（暂空）
22号 郑天翔
23号 赵 凡
24号 林 枫

每间囚室为12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桌一椅，囚室朝院子的墙上有一门一小窗。小窗都已钉死，而且糊上了白纸，窗子下方有一小洞，挂着巴掌大的窗帘，供警卫战士们观察。

按照周恩来和傅崇碧的命令，没有卫戍区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把特犯们拉去批斗，即便被拉去批斗，警卫连队也必派干部带数名战士相随监护，一是防止他们被打，二是批斗结束立即带回特监。

特犯们被集中到这里后，环境安全稳定，和战士们一起吃食堂，病了有警卫部队的军医治疗，总算松了一口气。除个别人外，后来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活了下来，走出特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许多人和警卫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且说周恩来得到傅崇碧的报告，知道特监里的一切都已安排好了，但他还不放心，要坐车到什坊院去看看，亲自检查一遍。秘书跑来报告："红卫兵已经冲到人民大会堂门口了，要揪斗陈毅。"周恩来生气地说："打倒了贺龙，还要打倒陈毅。只要我还当着总理，就不能让他们揪走陈毅。"陈毅、李先念这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周恩来从自己在大会堂的办公室走出来，找到傅崇碧，让他布置部队加强戒备，自己带着陈毅来到大会堂门口。

红卫兵一看陈毅出来了，高呼起口号来："打倒陈毅，陈毅是个黑帮。"陈毅说："红卫兵小将们，毛主席的话你们听不听？"红卫兵们大声斥责说："陈毅，你不要狡辩，你执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交代你的罪行。"陈毅说："咱们先学段毛主席语录吧，我领着念。"红卫兵们安静下来，听陈毅念毛主席语录。陈毅一字一板地朗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们大哗，大喊口号："陈毅伪造毛主席指示，罪该万死。"

周恩来张起两手往下压压，高声说道："红卫兵小将们，陈毅同志刚才朗诵的确实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家对陈毅同志有意见，可以提，可以反映。现在毛主席交给陈毅同志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请大家不要干扰他的工作，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大家请回吧。"

红卫兵们听了周恩来的劝解，虽觉有理，但意犹未尽。忽然一个头头振臂一呼："陈毅必须跟我们回去交代罪行，不揪出陈毅誓不罢休，冲呀！"这个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跟着往大会堂门口冲去。

周恩来见他们蛮不讲理，大为恼火，大喊一声："站住！"他往前走了几

步，大义凛然地宣布："你们要揪陈毅，就从我的肩上踩过去。"红卫兵们过去见到的周恩来，都是满脸笑容，和大家一起唱歌，吃饭时还掰一块馒头把粥碗擦净，哪见过他雷霆大怒的情景。这时只见周恩来脸色铁青，眼睛喷射着愤怒的火焰，端着左臂站在他们面前，完全是一副舍生取义的伟人形象。红卫兵们被他的气势震慑住了，悄悄地溜下台阶。周恩来一转身，带着陈毅进了人民大会堂。

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周恩来突然感到一阵头晕，不由得身子往下倒去。秘书们忙扶住他，叫来医生。医生一检查，连说："不得了，是心脏病犯了。"立即就地抢救，周恩来很快脱离了危险。医生不满地问秘书："总理今天连续工作多长时间了？"秘书叹口气说："什么今天呀，他从昨天到今天，连续18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医生气恼地责备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让总理休息会儿，这病完全是累出来的。"秘书们叫医生骂了一通，个个无言可对，只有相对苦笑。周恩来解释说："你别怪他们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完就要爬起来去办公，医生忙按住，严肃地说："我今天要造你一点儿反了。你重病在身，得听我的。躺着，别动。"周恩来只好躺下，让秘书把傅崇碧找来。傅崇碧进来后，周恩来气喘吁吁地说："小傅呀，陈老总的事我交给你了，过几天他要去北京饭店开会，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啊！"傅崇碧使劲地点点头说："总理，包在我身上，你就放心吧。"

江青听说红卫兵没有揪出陈毅，大为不满，把他们批了一顿，又给他们透露了陈毅要去北京饭店主持记者招待会的机密，最后叮嘱说："这次可不能落空啊！只要揪出了陈毅，你们就立了大功，以后论功行赏起来，你们至少都是部长。"头头们听了，很是鼓舞，决心这次抓住陈毅。他们回来以后商量了一番，在北京饭店布置了一些人做眼线，大队人马藏在附近的一个机关里，单等陈毅到时开始行动。

来了。先是北京卫戍区的几辆中吉普驶来，从车上下来一群高高矮矮的、胖胖瘦瘦的军人，一色的红领章，红帽徽，分不出谁是军官，谁是士兵。这些军人下车后，匆匆地走进了北京饭店。红卫兵们知道，这是预先布置警卫工作的卫戍区军队，陈毅马上就要到了。果然，不一会儿，一辆大"红旗"在一辆中吉普的陪伴下到了北京饭店门口。红卫兵们正想行动，不料想来了两卡车的士兵，把北京饭店门口围起来，红卫兵头头稍一犹豫，就看见陈毅戴着大口罩和墨镜从车里下来进了北京饭店。

完了，现在只有等陈毅出来时在路上截他了。

北京饭店的会好容易散了，陈毅在一些军人的陪同下走出饭店上了车，车子随即开动，在一辆中吉普的护卫下离开北京饭店。原来先到的那批军人却迟迟没有出来，可能是认为已经完成了警卫任务，这时正在休息吧。红卫兵头头见陈毅座车警卫力量单薄，正好可以下手，忙命令按计划行动。

陈毅的座车行驶在大街上，突然一队红卫兵横穿马路，座车被迫停了下来。

那队红卫兵这时却不过马路了，哗啦一下子围过来把座车团团围住，打开车门，把陈毅拉了出来。一个红卫兵头头一把揪掉陈毅脸上的墨镜和口罩，原来此人不是陈毅，只是个和陈毅个头、体态相似的军人。这位军人厉声斥责他们："这是中央军委的车子，我身上带有林副主席的批件，你们怎么敢拦我，还要不要脑袋?"红卫兵们捉鸡不成蚀把米，怕耽误了中央军机大事要当反革命，赶紧赔礼道歉，那位军人让秘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然后悻悻地上车走了。

陈毅哪里去了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二回　保刘邓还演小城春秋　挽国殇再尝囚徒滋味

话说北京饭店会议散了以后好一会儿，那些先前来的军官们才走出饭店。这时饭店门口一片军人，军官们上中吉普，士兵们上卡车，只见许多红帽徽、红领章晃来晃去，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几辆中吉普沿着来时的路线疾驰而去，最后拐进一条胡同，在一所院子前停了下来。军官们下了车，护送一位老军人进了院子，便又钻进吉普车朝大街驶去。老军人进了房子，拿起电话："喂，傅崇碧吗？我是陈毅。我已经回家了，谢谢你的护卫。你这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妙计硬是要得。哈哈哈……"

得知陈毅没有出事，周恩来总算放了心。这时已到年底了，毛泽东要主持国务院、政治局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周恩来准备了一下，就去参加碰头会。

各路人马陆续来到了会场，江青一进来就朝陶铸吼道："陶铸，你为什么鼓动学生去调查我，搞我的特务活动？"陶铸反唇相讥："你不是到处讲怀疑一切嘛，你能讲怀疑一切，我就不能讲？"陶铸又吼道："我是政治局常委，讲一句话也得向你请示啊，你算老几？"江青恼羞成怒地大嚷起来："陶铸，你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你是哪个司令部的人？"陶铸坦然地说："当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主席前不久还保了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呢。"一下子噎得江青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报告："主席到了。"大家一齐站起来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进了会场，在桌子的中心位置坐下来，按按手，示意大家坐下。周恩来首先汇报起来："现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但是缺乏组织和引导，必须想个办法，让毛主席的指示能彻底得到贯彻。"

周恩来讲完话后，会场上一片静默。刘少奇、邓小平因为派工作组被说成是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现在处于被批判的窘境中。现在谁还不知趣，再提出派工作组之类的人下去。

毛泽东知道大家的心思，但彼一时，此一时也，情况不同了，现在派工作组有利于落实自己的战略部署。他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指示大家："我同意恩来的意见，派军队下去，把群众组织起来，对学生进行军训。文化革命再搞上几个月，也就差不多了，娃娃们该复课了。大家想想，军队下去，叫个什么名字呢？"

毛泽东的话使会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议论起来。毛泽东听了

几个提名，都觉得不好。周恩来见大家议得差不多了，便提议说："可否就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人们一听，齐声称赞这个名字起得好，毛泽东也笑着点点头，拍板说："好，就叫这个名字吧。"

派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的事就这么定了。没想到江青却叫了起来："我有意见！"与会者不知她又要放什么炮，不安地瞅着她，毛泽东也有些发怔。江青见自己已成会议中心，不禁得意起来，放肆地向毛泽东说："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没有想到江青当着中央这么多要员的面宣布造自己的反，有点儿手足无措。这要是换一个人，毛泽东立即会作出最激烈、最恰当的反应，但是江青是自己的夫人哪，又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不好办哪。毛泽东有点儿尴尬地坐在那里。

江青的话激恼了参加会议的开国元勋。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这位当年威震淮海的三野副政委、总前委成员早已对江青不满，这时更是怒发冲冠。毛泽东不好说江青，他却敢训斥她。只见他一拍桌子，朝江青怒吼道："胡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五百万解放军的统帅，你竟敢造主席的反！放肆，胡闹！你是什么东西？"

谭震林这一番大吼震得江青脸色发白、牙齿打战。参加会议的元勋们心中暗暗高兴，谁也不出来为江青打圆场。江青把目光投向毛主席，谁知毛主席说了一句"散会"，立刻离开了会场，其他人也纷纷退场。谭震林临走前，还怒视江青一眼，"哼"了一声。

江青无法下台，只好用大哭来掩饰。

从此，江青与谭震林、陶铸的矛盾越来越深。谭震林不是中央文革成员还好办些，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他是必须参加，免不了和江青在会议上吵架。陶铸有时穿军装进来，江青、姚文元就起哄道："陶铸，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陶铸冷冷地说："我是原来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我怎么没有资格穿军装？你们在军队里什么职务都没有，姚文元连一天兵都没当，你们又有什么资格穿军装？"一下子说得江青、姚文元哑口无言。陶铸有时穿便装来开会，姚文元又起哄道："陶铸，你怎么又不敢当解放军了？"陶铸反唇相讥地说："我不敢？我在东北率军打老蒋的时候，你姚文元在干什么呢？"又把姚文元憋了个脸通红。还是张春桥老谋深算，他在这种时候从不说什么，他明白这只会自讨没趣。陶铸是什么人，早在红军时期就组织过轰动中外的越狱斗争，后来有个作家还根据这个故事写作出版了小说《小城春秋》。陶铸东征西杀，和平谈判，率军作战，能文能武，跟他当面斗嘴能讨得了什么便宜。张春桥当面不说，背后指使一个学生写了批判陶铸的60张大字报贴到前门大街上，立即轰动了北京。

其实江青这个时候还是想把陶铸拉过来，挖苦他、贴他的大字报只是给他

施加一点压力，让他知道一点厉害。谁知陶铸抱定主意要保刘、邓，保老干部。江青最后绝望了，便下毒手，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托我向大家问好！"咦，陶铸呢？陶铸怎么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他是刚提拔起来的第四号人物啊，莫非陶铸发生了问题？参加大会的群众立刻听出来了江青的话中话，从此开始，炮打陶铸的大字报越来越多。

毛泽东深居丰泽园，但他对外面发生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陶铸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自己很不合拍，这一点毛泽东知道得清清楚楚，但他并不想同意江青的意见打倒陶铸。搞"文化大革命"固然要依靠江青这些人去放火，但他也深知这些人只会放火，不会干活。他还需要一批久经战阵考验的老革命家来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光靠周恩来一个人不行，还得有陶铸、谭震林、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刘伯承、谷牧、余秋里去协助他。特别是陶铸，位居第四号人物，是周恩来的有力助手，不能让他垮掉。

但是，陶铸和江青的矛盾日深，也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最好让陶铸和谭震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去外地搞调查，等过了这一阵再叫他们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好，就这么办。毛泽东立即拿起电话通知周恩来，让陶铸、谭震林到外地搞几个月调查，什么时候回京，听中央的通知。

毛泽东的通知由周恩来传达给了陶铸和谭震林。如果陶铸这时下去，事情就好办了。可惜陶铸这时还想着怎样协助周恩来做好工作，所以迟迟没有离开北京，他和江青之间的矛盾又因王任重问题上的冲突而成白热化了。

王任重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善于使用干部，理论水平很高，善于抓大事，每抓必有成功的经验问世，但小事又很放得开，所以他的工作既很出色，又有空暇写诗、拉琴、游泳、写文章。王任重的工作风格和喜欢事必躬亲的陶铸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但由于二人在观点上很接近，所以在中南局时陶铸和王任重很谈得来。

毛泽东对王任重很重视，称他有总理之才，经常找他一起游泳、写诗、谈文章。在省委第一书记中，王任重是和毛泽东最亲近的一个人。即使在中央要员中，也没有什么人能像王任重那样接近毛泽东。1966 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一直住在南方，其间还回韶山滴水洞住了一段时间。在韶山时，毛泽东由王任重陪同祭扫了父母的坟墓。由于去得匆忙，没有准备祭品，毛泽东折根墓旁松树上的枝条插在墓前，权当祭品。王任重百感交集，回来后即写了一首诗以抒怀，诗中称毛泽东为"老师同志兄长"，毛泽东看了这首诗后，深以为然，当即夸奖了王任重几句。

毛泽东这么看重王任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成立，便把他调来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但是，王任重同陶铸一样，看不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同时，他也是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的，这自然不能容于江青，二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剧烈。陶铸唯恐这样下去，王任重会给毁了，便反

复向毛泽东提议，还是让王任重回中南局去工作吧。毛泽东几经考虑，最后同意了陶铸的建议，让王任重回中南局工作，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提提意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尚未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文革小组全班人马也都赶来了，他们还把小组里的一般工作人员拉来壮大声势，摆出一副要和王任重决一死战的架势，陶铸不禁为王任重担起心来。不过还好，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大轰王任重，说了几句后似乎就无话可讲了，陶铸心中暗暗高兴。不料，王力突然转换话题，朝陶铸开起炮来：“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你是叫得最凶的一个，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检查自己的错误?”王力开了头炮，关锋、戚本禹紧紧跟上，江青、陈伯达、康生重点批判，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骂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刘邓的代理人”，声色俱厉，气势汹汹，大有炸平人民大会堂之势。

至此，陶铸才明白了，原来江青一伙已策划好，借用给王任重“提提意见”的机会，专门朝自己发动“集团攻势”，以便打倒自己。但是有一点陶铸还是不明白的，江青要打倒自己，是他们那一伙人的主意呢？还是已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这危急关头，他极想听到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但是，在现在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出乎陶铸的预料，3 天后中央办公厅即通知陶铸出席政治局会议，通知特别强调“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陶铸不知是福是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一见陶铸就大声问道：“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的错误?”陶铸心里一热，主席是要保我的。毛泽东扫了一眼江青，批评她：“陶铸来中央以后工作忙得很，积极负责，做了许多工作。他是政治局常委，怎么能不经中央正式讨论，就在会议上批判他，说他犯了路线错误。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江青就是太任性，随便伤人。”

江青等人被毛泽东一顿批评，个个垂头丧气，沉默不语。回到钓鱼台后，江青大为光火：“老娘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呢，陶铸你就等着吧。”张春桥眯眯三角眼，对江青说：“我有个好办法，保管叫陶铸下台。”江青急问：“什么办法?”张春桥咬咬牙说：“逼上梁山!”他看江青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便凑到跟前，放低声音对江青说：“主席要是不保陶铸，事情就好办了。”江青想想，恍然大悟地说：“我明白了。”

江青到底明白了什么，暂且按下。且说陶铸回家后，向夫人曾志高兴地讲了会议的情形，讲到兴奋处，情不自禁地拉住曾志的手说：“曾志呀，主席保了我。”一语未完，电话铃突然让人心惊肉跳地响起来。陶铸拿起电话，听了几句，脸色大变，扔下电话，气呼呼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嘴里连连嚷道：“反了，反了。”曾志关心地问：“到底是什么事呀?”陶铸气愤地说：“你听听，这简直是天下奇事。广州有一个专揪王任重战斗队，他们抓不到王任重，就抓了一个

中南局书记当人质，跑到北京，前几天还叫我接见，今天就改成勒令我必须去见他们，你看这不是反了吗?”曾志提醒他说：“你得小心点，我看这些人后面有大人物支持，小心陷入他们的圈套。”陶铸拍拍胸脯，轻蔑地说：“他们有什么招就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倒要看看他们的手段。”

陶铸按时赶到了中南海小礼堂，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去接见战斗队。小礼堂里挤满了人，一色的红袖章，充满了活力的青春的面孔，一一从陶铸眼前闪过。他们从广州挤坐着火车来到北京，身上满是汗腥尿臭味儿，一见陶铸进来，个个眼里冒出猛兽攫食时才会有的凶光，震耳欲聋的狂叫声似乎要把屋顶掀翻。陶铸忽然有一种感觉，似乎走进的不是一个接见会场，而是进入了一个庞大的狮笼。

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大家都知道，现在只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才是毛泽东最亲近的身边人，特别是小组核心人物江青，更是被人们认为是毛泽东的首席代表，他们的一个表态，会让这个大干部倒霉，也会让那个红卫兵组织垮台。因此，红卫兵们被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时，无不欢声雷动，但中央文革顾问陶铸这时却完全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相反，他这时享受到的，是被红卫兵们勒令、录音，是不断地炸响的充满了敌意的口号声。起先，陶铸还耐心地劝解他们，但这些人哪里听他劝。几个头头扑到陶铸眼前，指着他的鼻子，喊叫着：“我们勒令你立刻回答！快回答！你必须马上回答我们的质问!”陶铸见他们欺人太甚，只差在自己的头上拉屎拉尿，便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抬起头，怒斥道：“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我对你们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陶铸发了怒，会场顿时安静下来，但紧接着的是更大的喧嚣，“打倒陶铸”的口号声像混浊的恶浪，淹没了小礼堂。会场上乱纷纷的，一些红卫兵冲上来要抓走陶铸，会场上的警卫干部跑过来阻止，红卫兵们又大喊起来，“陶铸镇压革命群众罪该万死!”

就这样，陶铸被围攻6小时后才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离开了现场。是晚，“打倒陶铸”和“揪出陶铸”的大字报、标语、传单顿时贴满了全国。过了4天，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见“专揪王任重战斗队”，一齐正式表态，支持红卫兵小将打倒陶铸。他们的讲话一夜间传遍了全国城乡的每个角落，陶铸一夜间被解除工作，在家休息待命。

对陶铸的问题，毛泽东迟迟没有表态。陶铸和红卫兵在国务院小礼堂闹僵后，江青立即向毛泽东告状说陶铸镇压群众，毛泽东不太相信她的话，知道她嘴臭，便又问周恩来，周恩来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不好。”毛泽东也知道陶铸性子暴，便“哦”了一声说：“是态度不太好……”便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但江青并不罢休，接连不断地把陶铸的罪证材料送来。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陶铸，在他看来，江青送来的那些材料都是屁话。他只讲一句话，就可以使陶铸摆脱困境，但这样一来，江青的威信也就一扫而光，以后他还能靠谁去

四处点火，那么这样一来他的整个战略部署就将搁浅。

江青这种先打倒陶铸，造成既成事实的做法，使毛泽东大为光火。现在他必须在陶铸和江青之间作出抉择。经过7天的思考，权衡利弊，毛泽东选择了江青。在当天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正式表了态："陶铸是邓小平介绍的。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

毛泽东讲了话，陶铸的政治生命立即结束。从这天开始，他就被禁闭在家中，同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陶铸被打倒一事震惊了刘少奇。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和他的家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撼。先是女儿刘涛和他决绝而去，接着又发生了王光美被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指使一伙人绑架的严重事件。刘少奇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1967年1月6日，北京的天气阴沉而又寒冷，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中南海的家中议论"文化大革命"这只怪物，他们看不清怪物的轮廓，但却明白无误地感觉到这个大怪物已张开了血盆大口，要一口吞下他们这个家以及许多人家。正议论间，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急切地说："是王光美同志吗？你的女儿刘平平在学校作检查后的归途中发生了车祸，右腿被轧断，现在正在医院抢救。"王光美放下电话，脸色变得灰白，颤抖着嘴唇对刘少奇说："平平出车祸了，马上要截肢。"刘少奇着急地说："赶快到医院去啊！"王光美犹豫地说："可是总理给我留过话，叫我不要离开中南海啊！"刘少奇生气地说："什么时候了，还能顾那么多。你不去我去。"源源和亭亭建议说："我俩先去，爸妈准备一下再来。"刘少奇同意了。源源和亭亭先赶往医院，刘少奇和王光美办了手续，一起乘车出发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赶到了医院，只见医院里挤满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个个如临大敌，神色紧张。刘少奇走出汽车，到底是多年的党中央第二把手，气势慑人，学生们张皇失措。王光美问道："平平呢？"源源急忙跑过来说："妈妈，你快走，他们要抓你。"王光美斩钉截铁地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带着源源和亭亭回了中南海，一路上还惦念着从学校回家去的平平。一进院子，只见平平站在房子门口急切地张望着，刘少奇惊诧地问道："平平，你的腿……"平平一下扑到刘少奇的怀里，痛哭起来。刘少奇这才知道平平根本没有出车祸，而蒯大富等人把平平扣了起来，然后谎称平平出了车祸，把王光美骗了出来。

周恩来得知这一事件后，派人和蒯大富交涉，要他们把王光美放回来。蒯大富虽然有江青的支持，但也不敢违抗总理的命令，只好把王光美放了回来。

王光美被骗抓，中南海里机关的一些人接连到家里捣乱，使刘少奇陷于深深的不安和痛苦之中。他想，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自己的话，那就不如自己主动辞去一切工作职务，不要因为自己而使家人、战友、党和国家陷入一场浩劫之中。他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求毛主席接见，中央办公厅答应安排。

1967 年 1 月 13 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开到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前，一个秘书从车上走下来，对刘少奇说："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等着你，请上车吧。"刘少奇上了车，随秘书来到人民大会堂。

两位从 20 世纪 20 年代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时就一起战斗过来的老战友见面了。刘少奇心情平静，没有了老战友相逢时的激动。倒是毛泽东心情复杂，关心地问道："听说平平的腿受伤了，好些了吗?"刘少奇淡淡地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毛泽东"哦"了一句，不再说什么了，把烟递过来，请刘少奇吸烟。刘少奇客气地道了谢，点上一支烟抽了几口，然后才说起正事来："我犯了路线错误。经再三考虑，我向主席提出三个请求。第一，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完全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尽早把他们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一切职务，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三、请中央批准我去延安或湖南老家务农。"

听了刘少奇的申述，毛泽东沉默不语。两人都使劲地抽着烟。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才云山雾罩地说："还是认真地读几本书吧，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可以看看。"刘少奇莫名其妙，看来话只能谈到这里，便告辞了。毛泽东送到门口，叮咛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到家里后，王光美关切地问道："主席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刘少奇似为高兴地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还送我到门口，要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王光美低声自语道："这就怪了。按说主席如此恼怒，应该狠狠批评才是，怎么如此亲切，又避而不谈实质问题? 恐怕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刘少奇默默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她的想法。

过了几天，也就是 1 月 16 日深夜 12 时，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准备休息，电话铃声凄厉地响起来，王光美一把抓起电话，问道："喂，你是谁呀?"电话里对方回答说："我是周恩来呀。"王光美心里顿时滚过一道热流，哽咽着问道："是总理啊，有什么事吗?"电话里一片沉寂。王光美连问几声，周恩来才叹口气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王光美坚定地说："总理放心吧，我会对得起党的。"

王光美放下电话，对刘少奇讲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深夜来电，实属关照。既有考验，定有大变。刘少奇听着寒风在树梢头的呼啸声，对王光美说："看来我该有个交代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三回 骂国贼叶剑英断掌京西馆 斥奸雄谭震林怒争怀仁堂

话说毛泽东接见刘少奇后仅过了3天，周恩来即于1月16日深夜给王光美打去电话，要他们准备经受严酷的考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刘少奇原想通过家里的电话和周恩来保持联系，以便及时了解中央的精神。谁知第二天，几个人走进刘少奇的家，二话不说，拆掉了电话。刘少奇和政治局的唯一联系渠道被切断了，此后刘少奇和王光美仅靠几个孩子骑车出去搜集传单了解局势的发展。

这时全国的大动乱进一步升级，上海发生了大夺权事件。在这场反革命政变中，新冒出来一个打砸抢的明星人物，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洪文。王洪文曾当过兵，表现平平，转业后在上海一个纺织厂的保卫科当干事。他胆大妄为，野心极大。“文化大革命”浊浪一起，他觉得这是浑水摸鱼的好机会，遂联系一班和自己臭味相投的青年工人陈阿大、潘国平、黄金海等人于1966年11月6日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自任司令。11月9日，“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正式亮相。为了让中央和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的合法性，王洪文率“工总司”群众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北上请愿。列车行至上海附近安亭站时，被铁道部下令阻留，王洪文遂煽动人们在安亭卧轨拦车，沪宁铁路被切断30多小时，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破坏铁路交通的特大恶性政治刑事犯罪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后，陈伯达大耍两面派，一面通知上海市委要顶住，一面又派张春桥南下和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达成五点协议，公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顿使上海市委处于被围攻的状态。

上海广大工人对张春桥批准“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极为不满，便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赤卫队成立后发展极快，很快便拥有80万人，上海各工厂的生产骨干、工作骨干、劳动模范几乎全部加入了赤卫队。可是“工总司”上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张春桥直接插手指挥“工总司”的行动，下有王洪文等一班流氓无赖带头闹事，势头很大。“赤卫队”呢？人数虽然很多，但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消息不灵，这些老工人、老模范过去只知埋头干活，最讨厌打砸抢。两相比较，“工总司”搞起武斗来反处处占上风。1966年12月29日，在张春桥的告密和指挥下，王洪文调集“工总司”10万人向在康平路一带集中的“赤卫队”发动攻击，“赤卫队”完全没有防范，被打

得落花流水，康平路上，到处是鲜血。上海工人阶级自1927年4月12日在宝山路遭蒋介石大屠杀后，现在又遭到了“工总司”的血腥镇压。

康平路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完全掌握了上海市的权力，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上海市委、市人委被停止工作，大批干部被抓被斗。这就是当时被称为“一月风暴”的上海夺权事件。

上海“一月风暴”事件在全国造成了几个第一。第一个成立了除红卫兵以外的群众造反组织，第一个破坏交通运输的特大恶性事件，第一个夺取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政变。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骇人事件，告急电报频频传到中央。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武斗和夺权，秩序一片混乱。

毛泽东得到这些报告后，立即把周恩来找来，兴奋地说：“我在前些天就说过，上海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到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场夺权斗争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现在夺权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啊?”周恩来回答说：“一派组织夺了权，另一派又去夺，就那么夺来夺去的。”周恩来的回答使毛泽东明白了，全国已陷于一派混乱中。虽然他是主张大乱的，但有些部门却决不容乱，特别是军队。他颇为焦虑地问道：“军队的情况怎么样?”周恩来焦虑地说：“冲击军队的事连续发生，许多军队高级干部家里被抄，机密文件被抢走。军队院校学生要求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毛泽东“哦”了一声，没有说话，使劲地抽烟喝茶。

周恩来鼓起勇气，向毛泽东说：“主席，我有个担忧。”毛泽东瞟了周恩来一眼说：“讲嘛。”周恩来字斟句酌地说：“我担心，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这几个老帅一倒，林副主席的担子就重了。”响鼓不用重锤，周恩来一席话提醒了毛泽东，他确实担心林彪的担子“太重”，扳着手指头一个个地评说起老帅来：“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啊，长征路上，多亏他通风报信，你我才没有人头落地。陈老总，心直口快，从来不在后面搞小动作。向前同志的党性强啊，张国焘要陈昌浩在草地解决我们，是他出面阻止四方面军打我们。聂老总，是个大厚道人啊，顾大局，不揽权。这几位老帅谁也不能动，军队也不许去冲击，让剑英搞个东西发下去吧。”

叶剑英得到通知后，立即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副主席一致提出，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去找林彪汇报。叶剑英说：“我们几个军委常委议了一下，军队要搞个法，要搞个命令，军队的运动要有个限制，不能把军队搞乱。”林彪点点头说：“我在出汗，你们就搞个命令发下去吧。”叶剑英和聂荣臻回来后，立即和陈毅、徐向前商量，起草了个命令发给全军，命令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联。

但是，军委的命令下达后，军队照样被冲击，司令员照样被揪斗。各大军区的司令员纷纷来到北京，叶剑英把他们都安排在京西宾馆避难。北京驻军的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来斗去，档案被抢，文件被抄，武器丢失，通信不灵。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报告。每次电话打去，秘书不是说江青不在，就是说江青刚吃完安眠药入睡。叶剑英、徐向前再打电话给林彪，林彪的秘书总说“首长在出汗”。眼见局势越来越混乱，叶剑英、徐向前请来陈毅、聂荣臻、刘伯承商量。陈毅生气地说：“不就是个三连连长嘛，闯！”大家也都觉得这个主意好。叶剑英说：“就这么定了，我去闯！”徐向前把他拦住：“你是军委秘书长，在家坐镇，我去闯宫。我是军委文革组长，我去最合适。”大家也觉得徐向前去比较合适。临出发前，除毅拍拍徐向前的肩，关切地说：“你要当心些啊！”

徐向前带上秘书，坐着车直奔毛家湾，林彪的警卫秘书见是徐帅亲来闯宫，不好阻挡，客气地领他进了会客室。林彪和陈伯达正在会客室里交谈。徐向前一坐下，便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现在军队很混乱，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是出了乱子，无法向主席交代。”林彪听了眉毛一挑，问徐向前：“那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徐向前果断地说：“要搞几条正式规定，不许成立战斗组织，不许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林彪听着，连连点头，原来他也怕军队出事，毛泽东追查下来，他吃罪不起。徐向前讲完后，林彪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军队不能乱，军委发一个文件，内容就这样吧……”

秘书在旁边打开记录本，林彪口授文件内容：“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三、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四、一切外出串联的军人和职工一律返回部队；五、今后一律不许冲击部队；六、不许冲击战备系统，不许冲击保密系统，严禁强索档案资料，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一律封存；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单位一律进行正面教育。”

林彪口授完文件要点后，问徐向前：“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徐向前摇摇头说：“没有了。”林彪说：“那就请秘书整理一下，另外请剑英、荣臻两位老总来一下，咱们当场定下来。”

陈伯达对林彪口授的这些要点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反对，便起身告辞，向江青告状去了。叶剑英、聂荣臻得到通知后都赶来了，这时秘书已经根据林彪的口授内容写好文件的初稿，在林彪主持下，徐、叶、聂一起讨论了一下，认为七条内容很好，一致表示赞成。林彪笑笑说：“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了，那就还请三位老兄去钓鱼台征求一下中央文革的意见吧。”

中央文革小组已接到了林彪的电话，周恩来闻讯也赶来了，徐向前半路又把陈毅拉上，4 位军威赫赫的老帅再加上在军界享有极高威信的总理，一下子把中央文革的气焰压下去了。徐向前讲完文件起草的经过后，江青冷冷地讥讽道：“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但由于这个文件是林彪口授，又是讲军队

问题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人不敢在这个禁区胡闹，所以文件很快获得通过。陈伯达把文件一把塞到徐向前口袋里，厌烦地说："好了，文件已经通过，你快走吧。"

徐向前告辞出来，又驱车到了毛家湾，把文件交给林彪，林彪当即把文件呈报给毛泽东。很快，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了。把文件交给集中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司令们讨论一下，将军们讨论后，认为还应再加上一条"各级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不要让他们参加社会上的打砸抢"。徐向前根据将军们的讨论，又进一步修改了文件，形成了"中央军委八条"。文件定稿后，林彪又看了一遍，觉得没有问题了，便和徐向前一起驱车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接过文件，看了几遍，点点头说："很好，照发。"他拿起红铅笔，在文件上批写道："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接过批件，感动地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徐向前心里明白，林彪这次不是故意表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套，他无法向毛泽东交代。

从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出来，已是1月28日深夜了，徐向前连夜把文件发了下去。

"军委八条"下达后，部队的混乱情况稍微有所好转，但不久由于林彪和江青的操纵，又开始乱了起来。林彪想通过混乱，把老帅及一、二、三、华四个野战军的主要干部挤出军队，让四野的干部独揽大权。江青在军队中没有底子，她想通过乱，把一批造反派安插进军队，掌握军权，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操纵一些人继续冲击军事机关。

地方上的情况更为混乱，张春桥在上海夺权后，把上海的政权更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马上在外交部引起了反响。如果国家的体制发生变更，马上就面临着国际社会的重新承认问题。上海几十万人民不满意张春桥的蛮横和霸道，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运动。张春桥搬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牌子，出动4个连的武装部队镇压了这场运动。陈丕显、曹荻秋在危急中被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接到舰队设在上海的基地内保护起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全国各省市都在夺权，原来的大批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中央各部的部长们大都被揪斗，工厂停工停产。周恩来挺身而出，指示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工厂不要停产闹革命，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串联。通知还没有发出，起草指示的国家计委负责人谷牧就被揪斗，连批3天。林彪在一个会上公开骂"工交战线比文教战线更坏"，结果导致国务院抓生产的干部都被揪斗，只有余秋里还能坚持工作。余秋里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条胳膊，所以被人们称为"现在抓生产的只剩下一只胳膊了"。

这时，康生又操纵一些人把1937年经党中央营救集体出狱的薄一波等61名高级干部打成叛徒集团。由于张闻天、王稼祥当时参与了集体决定，康生又指使一些人把他们监禁起来，反复逼供，叫他们承认这件事是刘少奇决定的。张、王坚持事实，说明情况，康生根本不听，又准备把经过周恩来营救从新疆

盛世才监狱出来的干部打成叛徒集团，以便顺藤摸瓜，搞倒周恩来。天安门城墙上已经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

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老帅眼见奸雄猖狂，国贼祸乱，个个忧心如焚，都来找李富春。陈毅着急地说："富春啊，这些家伙要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不能不管啊！"谭震林气愤地说："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千百万人民大众，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要被断送了。"李富春一拍桌子说："要管，不能让他们这样胡来。"谭震林说："我当着主席的面已经骂过江青一次了，我还要骂她，看她能把我怎么样！"叶剑英焦虑地问大家："陈丕显同志来了没有？他留在上海是很危险的。"谭震林一拍胸脯说："下次开碰头会，我问张春桥，一定叫他把丕显放出来。"

说话间又过去了十几天，日历撕到了2月13日，这一天是预定的中央政治局开碰头会的日子。原来自1966年秋以来，经毛泽东决定，组织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政治局碰头会的成员有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江青。每次开会，周恩来坐在长桌的一端主持会议，一侧坐的是政治局元老，一侧是中央文革小组，阵线分明。

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也和往日一样，周恩来总理坐在长桌的一端主持会议；他的右侧，一溜排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他的左侧一溜排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双方互相敌意地对视一阵，便都打开文件夹，准备开会。

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他严厉地质问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要把军队搞乱。你们这样搞，想干什么？"徐向前也激怒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啦。我们老了，都不行了吗？难道你们要蒯大富这样的人指挥军队吗？"

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青云直上，给娇宠坏了，没想到今天坐在了被告席上。他们叫老帅们一阵猛轰，个个张口结舌。陈伯达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劝你们要读点书，看点报，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叶剑英立即嘲讽地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你们把上海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事，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你们眼里还有党中央吗？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你们干的这一套又是什么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开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几个老帅又来到京西宾馆开军委常委会。部队报了很多材料。有的司令员被揪斗犯了心脏病倒下去了，也不把人放回来。叶剑英看完这些材料，怒不可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发出一声巨响。他愤怒地骂道："野心家！国贼不除，国无宁日！"徐向前也激怒地掀倒桌子，怒吼道：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陈毅也怒冲冲地大发脾气，聂荣臻坐在一旁，大声说：“得跟他们斗，不能就这么完了。”

大家发了一通脾气，坐下来研究问题，叶剑英这才感到手掌钻心般的疼，聂荣臻忙唤来军医诊治，原来是因拍桌子时过分使劲，把掌骨拍断了。

过了几天，也就是2月16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又开会了，开会地点照例还在怀仁堂。下午3时，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来到怀仁堂门口，正好碰上赶来的张春桥。谭震林把他叫住，问道：“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三角眼一转，狡猾地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知道他在推托，训斥他道：“什么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两手一摊，轻巧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指着张春桥的鼻子骂道：“原来打击一大片，都是你干的好事!”

碰头会开始后，谭震林又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京?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张春桥推托说：“群众不答应，我有什么办法?”谭震林打断他的话，斥责道：“老是群众，什么群众，不要党的领导，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清华大学崩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愤怒地站起来，穿衣服，拿皮包，朝陈伯达一伙吼道：“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怒气冲冲地往外走，忙唤住他：“回来，不要走。”陈毅也叫住他：“不要走，要在里面斗争。”谭震林又回来坐下，朝对面的那一溜人直瞪眼。

陈毅接着发言，他斥责林彪、陈伯达这一伙人说：“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过去在延安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整错了多少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谁是反对毛主席的。”

陈毅还没有讲完，叶剑英插进来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去做工作。”余秋里拍案响应道：“叶老总讲得好啊!许多干部被揪来斗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那样干法，我就不去!”谢富治辩解道：“你不要和泥。”李先念斥责谢富治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都叫你当反革命给抓了。”

谭震林听到大家愤怒斥责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干部的罪行，眼圈有点红了，

拍着桌子吼道："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3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吼道："我也哭过3次，前不久总理主持开会，讨论抓生产，我们都来齐了，就是不见'一只胳膊'来。一问，才知余秋里同志被人揪走了，总理哭了，我们3个副总理都哭了。"

陈毅这时又开了一炮："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的？他们没有反对毛主席。现在有人要整总理，在延安，总理不是挨整吗？"

周恩来问康生："《红旗》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康生推托说："我没有看。"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把老干部要统统打倒，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康生被问得无话可说。

怀仁堂里老将军们怒斥奸雄时，王力、张春桥紧张地做着记录。会议一散，他们立即根据记录搞个发言摘要送给江青，江青又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报告大怒，指示江青等人："要抓军队，要抓地方，经济上要抓铁路、煤炭，要保邓小平。"

第二天，也就是2月18日晚，毛泽东把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成员召来，大发脾气说："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他们。十一中全会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

讲到这里，毛泽东喊了一声在场的叶群，对她说："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说完了又恼火地盯着陈毅等人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脾气发够了，丢下一句话走了："恩来，你来主持，处理中南海怀仁堂的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四回　周恩来恭读大字报　王光美舌战批斗会

话说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汇报后，把大闹怀仁堂的老将军们找来大骂了一通，并要周恩来主持会议，处理中南海怀仁堂事件。周恩来是完全站在老将军的立场上的，他怎么会去处理他们？但毛泽东交下话来，不得不处理。他只好召开会议，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的话，转述了毛泽东对这几位老帅多次肯定和赞扬的话，想以此保他们过关。反正毛泽东也没有明确说怎么处理，也不能说他处理不对。但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干，他们认为这是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搞下去的好机会。搞掉老帅，林彪可以完全掌握军权，毛泽东将不得不完全依赖林彪。搞掉几位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可以进入政治局和国务院，掌握党政大权。两股野心家们各自心怀鬼胎，在打倒老帅和副总理这一点上走到一起来了。林彪、陈伯达亲自出马，组织围攻。谢富治带头攻击，其他人紧紧跟上。江青、陈伯达又策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揪斗陈毅、谭震林等老帅。周恩来挺身而出，不计后果，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他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就要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大会堂，我一定要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跨过去。”

这段时间，周恩来经常是日夜工作，不得休息。就在这时，邓颖超又惊闻周恩来的秘书们集体造反，把大字报贴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她又急又慌，赶忙跑去看大家都给周恩来提了些什么意见。西花厅的门口已围了几个人，邓颖超一眼看出是几位老帅，他们大概是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邓颖超走过去，叶剑英回头看见了，赶忙招呼：“大姐快来看，总理的秘书们造总理的反了。”

邓颖超三脚两步地走到大字报跟前，只见大字报上写道：

>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的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
> 大字报的下面是西花厅办公室秘书们的签名。

邓颖超看完大字报，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是造总理的这个反啊，这个反

造得好。她正想和几个老帅们谈谈，只见叶剑英生气地说："总理的这个毛病是得改改了，像他这个干法，就是铁人也得倒下。"他立即要过钢笔，在大字报上签上了"叶剑英"。陈毅要过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李先念、杨德中也都签了名。康生、谢富治这时来了，也假惺惺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家同是签名，心境大不相同。陈毅等人明白，现在只有总理可以和林彪、江青抗衡，毛泽东不能没有周恩来。早在1957年批周恩来时，康生等人就向毛泽东提议，既然周恩来这么右，把他撵走得了。毛泽东轻蔑地看着康生说："你懂什么，搞经济建设，你们都不行。搞建设离不开周恩来。"其实岂止是经济建设，国防、科技、外交、治安，哪一样能离开周恩来。下头千条线，线线都通到周恩来这里，这就是力量，康生等人最怕的也就是这一点，别看他们嚷得厉害，国家实权都在周恩来这里。要是周恩来倒下治病，他们不就可以攫取国家实权吗？

陈毅见邓颖超还在聚精会神地看大字报，跟她开玩笑说："大姐，我们都造总理的反了，你要支持我们的造反行动啊。"邓颖超连连点头说："支持，支持，我也要造他的反呢。"她要过钢笔，在一张小方纸上写了5条补充建议贴在大字报的空白处。

邓颖超的小字报贴出来后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大家都挤着看起来。忽然，杨德中说："总理来了。"人们闻声一齐转过头来，只见总理下了汽车，朝办公室走来。平时由于忙乱，大家还不太留心，这时才发现总理一年多来老多了。

周恩来看见办公室门口挤了一堆人，情知有事，走过来一看，原来是张大字报。他仔细地看完了大字报，要过毛笔，在大字报左侧的空白处端端正正地写道："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当晚，邓颖超敲敲门，检查周恩来"诚恳接受"的情况。周恩来闻声出来，邓颖超关心地说："恩来，你不能这么拼了。为党、为国家，为这些受迫害的老干部，你得留点时间。你倒下了，陈老总他们怎么办？"周恩来无可奈何地说："我有什么办法，这么乱，我不出面收拾，谁收拾。唉，我是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时，毛泽东拿着一篇文章的清样仔细地看着，这是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表面上是批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批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支持这部影片，多次抗拒毛泽东批判《清宫秘史》的指示。毛泽东准备从发表戚本禹这篇文章开始，在报纸上半公开地点名批判刘少奇。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乃是系列批判的初战，兵法上讲要慎于初战，毛泽东要来清样亲自审阅，修改了一些句子，便发回去让《人民日报》发表。

刘少奇的电话被掐了，实际上已经变成罪囚。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孩子们在外面把报纸带回来，刘少奇看了后把报纸狠狠地摔在地上，对孩子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即《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

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上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越说越愤怒，孩子们越听越伤心。他们不明白，自己的爸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是个跺一脚神州大地就要抖动的人，怎么今天落到这个地步，连申辩的机会和权利都没有。他们想，如果毛主席不喜欢他们的爸爸，那就干脆免去爸爸的职务好了。但是偏不，名义上爸爸还是国家主席，一切都没有动，但实际上已形同囚徒，这是为什么呢?

没等刘少奇的孩子们想明白，他们家的生活又发生了大变。4 月 6 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大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家，勒令刘少奇从今天开始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改变作息时间。造反派又质问所谓的 61 个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刘少奇一下子发火了，激怒地说：“这个问题真是岂有此理，他们出狱之事，是党中央批准的嘛，当时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我们要赶快把这批干部保护出来，不能再让日军把他们杀害。”造反派被刘少奇说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家里重新安静下来。突然，一个不速之客走来，通知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刘少奇、王光美起先还没有太注意。还是平平了解情况，从清华大学回来报告说：“清华大学蒯大富要组织 30 万人大会批斗妈妈。”刘少奇一听大为震怒，推开饭碗，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你妈妈有什么责任。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批斗?”

王光美不让刘少奇去，安慰他：“你不要为我担心，我应付得了这个场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刘少奇坐下来，半天没有说话，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半晌，刘少奇才开口道：“光美，平平、源源、小小，你们都过来，我有话对你们说。”王光美和孩子们拥到跟前，刘少奇摸摸孩子们的头，悲凉地说：“孩子们，我是过不去这一关了。人家逼我当反革命，我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对过，江青反对过。我知道江青恨我。当年她和主席结婚时，我们政治局禁止她干预政治，她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进行报复。你们已经知道，从去年 8 月以来，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发展得更厉害，现在把错误都一股脑推到我身上，我成了人家推托错误的替罪羊。”

讲到这时，刘少奇猛咳一阵，又接着说：“我的日子看来不多了。你们记住，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王光美早已泣不成声，她绝望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刘少奇坚定地说：“要有信心，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你们要做好迎接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坚决地活下去，永远做人民的儿子。”

刘少奇讲完遗嘱，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

突然，房子外面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房门粗暴地被推开，冲进三十几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为首者凶狠地说：“王光美，跟我们走吧。”王光美拢拢头发，

昂着头，跟他们走了。

1967年4月10日一早，通往清华大学的路上挤满了各种载人的车辆和行进的队伍，批斗王光美的30万人大会今天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开始后，蒯大富下令："把王光美押上来。"几个清华大学学生押着王光美上来，一个学生头头把旗袍递给王光美，命令她穿上。王光美不穿，上来几个人对她一顿脚踢拳打，硬把旗袍套在她身上，又在她脖子上套上一串用乒乓球穿起来的大"项链"。王光美知道这肯定是江青的鬼主意。原来毛泽东出访苏联以后再未出过国，江青也因此不能随访出国，对经常随刘少奇出国访问的王光美非常忌妒。出于外交礼仪的考虑，王光美当然不能身穿干部服出访，必须稍加修饰，于是王光美每次出去总穿着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旗袍，脖子上戴一条小项链。江青是容不得别人比她多一点好处的人，当时无计可施，这次可以尽情报复了。

批斗会开始了，蒯大富这些人轮流质问，王光美作答。

问：你要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滔天罪行。

王：同意派工作组是由当时的中央常委会决定的。当然毛主席不在，刘要负主要责任。

问：刘少奇对清华作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指示很少。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针对的是谁，你清楚吗？

王：他暗指的是刘少奇。

问：你对此怎么看？

王：我在少奇身边工作几十年，觉得你们提的事实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六七月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问：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我怕什么？我不怕。

……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们以为30万人可以把王光美吓得瘫在地上，但他们想错了。王光美是何等样的人，早在辅仁大学念书时，就是学生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以后投奔革命，东征西杀，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今日批斗会上，她舌战群造，竟使他们无话可问，批斗会一时进行不下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五回　掩秽行收蓝苹丑闻　宣浩气辩伍豪逸事

话说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明眼人都看出来，蒯大富等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王光美是为了批刘少奇。他们想王光美是一个妇道人家，这么大的批斗会一定会把她吓瘫，到那时还不是问什么，她答什么，可以弄到刘少奇的许多材料。蒯大富可真是看轻了王光美。批斗会上，王光美面对30万人，神色自若，舌枪唇剑，或答或辩，滴水不漏，弄得批斗会开不下去了。蒯大富一看急了，亲自上来批斗她，喝道："赶快交代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王光美反驳说："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代什么？"蒯大富又喝问道："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王光美冷冷地回答说："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

王光美的回答又使蒯大富张口结舌。其实，蒯大富也是个极有心计、反应灵敏的学生。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蒯大富又是这些优秀学生中的佼佼者，"文革"之前，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文革"一起，又成为清华的头号人物，没有两下子是爬不上这个地位的。那么为什么他说不过王光美，王光美的每次回答总是那么无懈可击呢？蒯大富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阴谋，那些事只能在背后说，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而王光美的回答则完全是根据事实，这些事实大家也都知道，因此无法批驳她。

清华大学批斗会一完，很多人不禁佩服王光美的大智大勇，坚贞不屈。过去他们只认识穿着旗袍的王光美，现在他们才知道了王光美的厉害，红卫兵小报把批斗会上的问答都报道了出去，社会上的人们也都为王光美的答辩叫好。

批斗王光美没有捞到便宜，造反派又加紧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刘少奇、王光美，他们的家被抄了。刘少奇和王光美把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别人，准备被捕。很快，一队武装士兵来了，把刘少奇拘禁在前院，把王光美拘禁在后院。接着，又一队工人走来，在前院和后院之间砌起一道高墙，刘少奇真正成了一个囚犯，监狱就是他的家。

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开始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写的，以后又重印几次，全国党员几乎是人手一本。中央文革小组已经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写了题为《〈修养〉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毛泽东看到文章的清样后，立即召集中央常委会议进行讨论。

其实，这时的中央常委会已名不副实。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等常委被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就是陈毅、叶剑英等那些老帅也一概被排除。自大闹怀仁堂以后，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被取消，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因此，这时召开的中央常委会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会。文章是中央文革组织的，讨论者又主要是中央文革，自然很快就通过了。

文章通过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走了。周恩来被留下来，毛泽东要和他商量“五一”节谁上天安门的问题。这件事周恩来已有准备，他掏出一个名单递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地看起来。

排名单，在这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五一”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报纸是要报道的。谁在名单中有份，那自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或者是毛主席认可的人，红卫兵就不能随便动他。所以毛主席很重视这个名单。周恩来自然也明白这个名单的厉害，排名单时费了很大的劲，下了很大的决心把一些人列了进去。

毛泽东仔细地看着名单。周恩来有些担心，生怕毛泽东把那几位老同志的名字勾掉。不料，毛泽东看到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的名字时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很满意地点点头，在名单上面画个圈，表示同意。

从丰泽园回来，周恩来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这些老帅登天安门城楼。这些天来，老帅们连连被批斗，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虽未被揪被打，但也是身心憔悴。“五一”节被批准登天安门，他们感到极大的欣慰。这一段时期，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的王震等几位将军，也纷纷去电话向他们祝贺。

周恩来安排好了老同志登天安门城楼的事，又打电话请傅崇碧来，商量转移老干部的事。傅崇碧闻风而动，周恩来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傅崇碧就过来了。周恩来问了一下特监的情况，傅崇碧如实作答。周恩来知道现在能使这些特犯们有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地方休息就很不错了，为这傅崇碧还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呢。周恩来表扬了傅崇碧几句，问他：“现在贺老总发烧，301 医院又不好去住，你看北京军区的医院能不能住?”傅崇碧说：“五棵松那里有我们警卫一师的医院，比较安静，我看能行。”周恩来说：“好，你亲自去落实，药品不够，找我的保健医生。”

贺龙住进五棵松医院后，经过治疗，很快退了烧。

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江青耳朵里。“文革”开始以来，江青想整的很多人都叫周恩来给保起来了，住进了部队营房。红卫兵虽可揪斗，但由部队监视着，不能乱来。江青恨透了傅崇碧，但他是执行周恩来的命令。江青明白，要把这些老干部整死，就得把周恩来搞倒。同时她也知道，周恩来是她夺取党和国家核心权力的最大障碍，她要当女皇，也必须坚决除掉周恩来。为了实现政治野心，她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和西柏坡时对她的照顾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但是，要打倒周恩来谈何容易，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支点，失去了这个支点，权力制约系统就要失去平衡，就将发生可怕的事件，毛泽东是决不会答应的。要打倒周恩来，就必须找到一块坚硬的石头才行。

“五一”节刚过，江青一伙又操纵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攻击陈毅等人，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江青苦于找不到过硬的、一下子可以打倒周恩来的材料。突然，5 月 12 日，秘书给他送来了一封信，要她亲启。江青最近经常收到这样的材料，她漫不经心地打开信，看了一眼信和材料，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认真阅读起来。

信是天津的一些大学生写来的。1966 年年底以来，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个被整垮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一头钻进天津和全国的图书馆，找出了蒙着灰尘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报纸翻检起来。他们翻检什么呢？原来南开大学建校较早，文、理并重。学生们来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懂得了从报纸上搜集研究资料，由此也知道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旧报纸上有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处决的报道。他们这时想起来，报纸上也有可能有一些叛变的共产党员的自首书，只要把他们揪出来，不就是一大功吗？

南开学生很快就在报纸上发现了刘澜涛等 61 人在抗战初期出狱的报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重大秘密。其实，刘澜涛等人出狱是中共中央集体研究后营救出狱的，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都参与决策，毛泽东也没有反对，这是有文件可查的。但是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闭着眼说瞎话，把刘澜涛等人打成叛徒集团，当众表扬了南开学生几句。这些学生更得意了，到处钻图书馆、档案馆，大揪叛徒。一时间，叛徒集团到处都是，极大地损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无数在狱中或白区坚贞不屈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

现在，南开学生又有了新发现，他们在上海《申报》、《时报》等旧报纸上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就是周恩来在觉悟社时抽号定下的化名，当时周恩来就在南开大学读书。南开出了个周恩来，南开人都引以为荣，伍豪之名，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这些学生发现这则启事后，以为又捞到可以往上爬的政治资本了，他们立即把伍豪等启事抄下来，并写了一封揭发信送给江青。

江青接到这封信后如获至宝，亲手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 × ×），要求同我面谈。”信写完后，她把抄件夹在信里，让人送给林彪、周恩来、康生阅读。信发走后，江青高兴得睡不着觉，想着此事办好后，要好好夸奖一番南开的这伙人。

林彪在党内的资历较浅，另外，他掂来掂去，觉得从各方面考虑，不能让江青爬得太快，所以对江青的信不哼不哈。康生是完全知道这件事的经过的，当时，他就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临时中央特科工作。1962 年和 1963 年，康生两次对这个事件作过说明，指出“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可是，现在他却默不作声了。他有他的想法，他不愿开罪江青，再说，如果真能

搞倒周恩来，他也说不定还能捞到些好处，他要再看看。

周恩来看到江青的信后，怒火中烧，知道这是江青给自己的通牒，但他这时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和四川问题，无暇写信驳斥江青。四川和武汉的驻军自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三支两军”以来，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觉得支持大部分群众的合理要求，稳定社会秩序是部队“三支两军”的主要任务，但中央文革小组却偏要他们去支持少数打砸抢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打砸群众，而且冲击军营，抢劫武器，战士多人被打伤。四川驻军忍无可忍，在宜宾地区实行反击。这下子可不得了啦，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向毛泽东告状说成都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成都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出动部队镇压群众，制造了所谓的宜宾惨案。廖汉生、李井泉被撤销一切职务，调来北京。周恩来被授以处理善后之责，日夜找部队和群众组织的人谈话，稳定四川形势。这期间，内蒙古军区的战士又来京请愿，周恩来又多次接见他们，讲清形势，处理问题，一直忙到5月18日才算忙出个头绪来。于是在秘书的帮助下，他开始反击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略知一二，但并不十分清楚。因为他是1931年年底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伍豪启事则是1932年2月，其时他已经在苏区工作两个多月了。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上海报纸上刊出“伍豪启事”以后党中央采取的反击措施。

那是1932年2月底，上海地下党通过交通员给瑞金的苏区中央局送来了上海出版的《时报》、《新闻报》等报纸，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人打开报纸一看，原来上面刊登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大家不禁被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卑鄙的造谣手段激怒了，周恩来早就到中央苏区来了嘛，什么时候又跑出一个伍豪来了呢？毛泽东等同志商议后，决心进行反击。1932年2月，苏区中央局决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在苏区中央局反击的同时，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也通过交通得知还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陈云同志也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亲自组织反击。临时中央特科这时已查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即“中统”）驻沪调查员黄凯和“中统”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黄凯派人到申报馆送登。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了启事后说：“启事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二人脱党，但启事上只有伍豪一个名字，启事显然有漏洞，不能刊登。”启事遂被压下。但2月17日，《时报》却首先登出来了，《新闻报》也登出来了，这两家报纸当时经费紧张，正缺钱用，刊登这则启事，收到大额广告费。

本来，申报馆不愿意刊登启事，完全是报馆自己的事，申报馆不想挣这笔广告费。但国民党当局不干，派出上海新闻检查处官员督促刊登。申报馆无奈，只好刊登了“伍豪等脱党启事”，《时事新报》也接连刊登。

在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下，陈云派人去申报馆交涉，要求刊登“伍豪启事”，实际上这则启事是陈云派人代写的。申报馆老板史量才和总顾问陶行知自然知道“伍豪脱党启事”和“伍豪启事”的背景，他们商量了一会儿，采取了个妥善的办法，以广告处的名义在报纸广告栏上发表启事。启事称：“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这则启事登出后，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陈云又请申报馆法律顾问法国律师巴和刊登声明，说明真相。经许以重金，巴和律师即以周恩来别名周少山的名义在3月4日的《申报》上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内称：“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字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办公室里，一面翻阅着报纸，一面编写“伍豪脱离共党启事”出现的前前后后的大事记。顿时，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特科反击顾顺章叛变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浮现在眼前，这场斗争和“伍豪脱离共党启事”有直接关系。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得到打入“中统”内部、任“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的紧急报告，连夜转移了全部有关机关，切断了顾顺章熟知的一切联络渠道。这时周恩来、康生（当时叫赵容）得到情报，得知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准备向敌人告密，已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了联系。这太危险了，因为他们掌握和了解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地址。周恩来和康生商量后决定组织特科消灭这些凶险的敌人。1932年5月，特科秘密处决顾顺章家属共16人。此年11月，参加特科这次处决行动的号为“老先生”的王世德被捕叛变，供出了这次处决行动和埋尸地点。国民党遂下令挖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济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挖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16人。上海各报对于这样的重大新闻自然是非常重视，不但详细报道，还配发了照片，顾顺章看到报纸上的消息，破口大骂周恩来、赵容，悬赏大洋3000元，缉拿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想着，编写着，真是往事如烟，浩气长存。他编写好大事记后，又把报道这些事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和12月的报纸，《申报》1932年1月和2月的报纸分别装订成两本合订本，然后坐下来给毛泽东写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关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案，毛泽东是清楚的，他觉得这是组织上早就澄清了的事，是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嘛，所以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适逢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听到这件事后，来电询问，毛泽东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连许世友这样60多岁的将军尚且不明白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临时中央及特科面临的艰险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更不用说年轻一些的人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材料送到后，他立即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同时，毛泽东也感到江青指使一些学生查报纸，找材料，仅仅依据国民党报纸上的一些造谣诬蔑，就把一些高级干部打成叛徒完全是胡闹，别有用心。他立即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规定，禁止学生诬陷高级干部。6月中旬，这个通知经毛泽东审阅后发了出去。

江青妄想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打击周恩来，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损伤周恩来的一根毫毛，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实际上等于把南开学

生，也就是把江青批了一顿。江青坐下来，又仔细琢磨起“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看还能不能再找个空隙下蛆。想着想着，她忽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红卫兵翻遍旧报查叛徒，就不会看到报纸上的那些报道她当年在上海滩丑行的新闻和照片吗？扮演妓女，为蒋介石祝寿演出，还有那些争风吃醋的风流韵事。30年代初期的蓝苹，虽然在上海滩上只是一个三流女演员，但却擅于弄出一个接一个的桃色事件，是上海小报播弄黄色新闻的热点女演员。还有那最要紧的，蓝苹曾经被捕，有一些传言，涉及她的革命气节问题。江青被捕后是否叛变，尚无结论。江青心里明白，自己搞周恩来是无中生有，但报上报道的自己的那些秽行却是铁证如山。既然红卫兵能找材料整到周恩来头上，自然也会整到她江青的身上，怎么办呢？

正当江青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傅崇碧来到钓鱼台，求见江青。说起来，江青和傅崇碧还有过一段友谊呢。蓝苹刚到延安的时候，傅崇碧和她一起排练演出过文艺节目。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傅崇碧对她是能躲则躲，主席夫人啊，不好惹呢。江青见傅崇碧平时躲着她，今天突然主动上门来找，赶紧请进来，毕竟他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站在关键性的岗位上。傅崇碧进来后，取出一包材料递给江青说：“这是上海寄来的一包材料，我想还是由江青同志亲自处理吧。”

江青接过材料，抽出几份一看，有蓝苹为蒋介石祝寿演出的剧照，有江青的桃色新闻……江青脸色一沉，把材料装回口袋，一句话都没有说。

一个星期后，江青在钓鱼台的寓所召见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由于造反有功，聂元梓已荣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其他4人也都成为常委。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也被江青叫来一起会见“五大领袖”。

人到齐后，江青阴冷地说：“告诉你们，现在有人整陈伯达、康生和我的材料。”突然，她圆睁怒眼，凶狠地说：“今天，我把公安部长、卫戍司令叫来，就是要叫你们知道，哪个敢整康老、伯达的材料，哪个敢整老娘的黑材料，老娘就抓他！”

会场上一阵静默，江青盯着大家，厉声问道：“你们谁整过我的材料？”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六回 毛泽东莅汉保军区 独立师封湖扣王力

话说江青得知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立即把北京的几个造反组织大头头找来，把他们训了一通。蒯大富等人自然是不肯承认整过江青的材料。江青问不出所以然，又把气撒向傅崇碧，既然他把材料给自己送来，肯定看了材料。想到这里，她朝傅崇碧瞟瞟，狠狠地说："谁整了老娘的材料，我叫他不得好死。"

傅崇碧从楼里出来，问谢富治说："江青同志这是骂谁呢?"谢富治两手一摊说："谁知道。"两人还要再谈几句，谢富治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抱歉地对傅崇碧说："崇碧同志，中央最近要我和王力同志到四川去，李井泉被打倒后那里的问题比较多，我得赶紧找王力商量一下，不便奉陪了。"谢富治匆匆握别傅崇碧，去找王力商量入川的事去了。

谢富治、王力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入得川来，先后到了成都、重庆等地，接见造反组织头头，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及成都军区商议了许多事项。7 月 14 日凌晨，谢富治突然接到中办电报，让他们即去武汉准备迎接毛泽东主席莅汉。谢富治看了电报后，立即同王力、余立金乘飞机赶到武汉，海军政委李作鹏马上派人把他们接到宾馆。谢富治、王力到了宾馆会议厅，只见会议厅里人坐得满满的，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会议，为毛泽东主席莅临武汉作准备。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负有安全保卫的重任，周恩来免不得多嘱咐了几句。

毛泽东专列南下行程的消息不断传来。7 月 14 日晚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汉。车站上已经戒严，随毛泽东专列南下的中央警卫团的一师部队已经占领了车站各处要地，严密戒备。毛泽东从专列上走下来，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亲切握手，随后率随行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和总理一行驱车前往宾馆。这时虽然已是深夜，但武汉依然酷热逼人，大街小巷，摆满了露宿街头的市民们的竹床、凉椅，一队队佩戴"百万雄师"袖标的战斗队在大街上刷写大字报、大标语，广播高音喇叭也不时突然传出"通告"、"通令"，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部队巡逻在大街小巷。7 月中旬的武汉的政治气候，也如同这个城市特有的高温酷暑一样滚烫灼人．一场政治大决战已经在这里开幕了。

毛泽东在车里注意观察着街头的动静，一边同汪东兴交换几句意见。这一个时期来，毛泽东不断接到江青等人的报告，说武汉形势严重，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纵容支持独立师镇压造反派，给"百万雄师"配车发枪，

武汉军区已武装对抗起“文化大革命”来了。毛泽东不太相信江青的报告，又征询总理的意见。总理感到武汉问题在全国比较突出，必须集中力量解决，迅速稳定武汉形势。毛泽东从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情况后，决定亲自去武汉视察一下，一来是亲自坐镇解决武汉问题，二来也是想再畅游一次长江。

毛泽东在宾馆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立即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谢富治和王力首先汇报了一下在四川检查工作的过程。由于四川问题已被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毛泽东一下子把话题转到武汉问题上来。谢富治、王力又是首先汇报他们来武汉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其他人也接着说了说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们的报告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只是指示大家，“工人总部”应该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两派都应支持。毛泽东讲了自己意见后，当场指定周恩来总理负责主持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都要予以很好的配合。

会议散了以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连夜草拟了一份发言提纲，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一遍，觉得符合自己的意思，便叮嘱周恩来说：“解决武汉问题的关键不是别的，是要陈再道改变只支持一派的态度。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周恩来点点头说：“陈再道这个同志很耿直，我尽力做工作，让他转弯子。”毛泽东笑笑说：“那好，陈再道我是一定要保的。”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周恩来便让秘书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军区领导叶明、孔庆德、29 师政委张昭剑、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刘丰等军区师以上有关军官开会。谢富治、王力因负有协助周总理解决武汉问题之重任，也来到会场上听取汇报。汇报会从 7 月 15 日晚开始，一直开到 18 日，开了整整 4 天，陈再道、钟汉华全面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周恩来对武汉问题的认识更明晰了。

原来林彪上台后，一直在想办法排除红军时期红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出身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一、二、三野战军出身的干部，重用红一方面军和第四野战军出身的干部。当然用的是紧跟自己的，不紧跟自己的非但不用，还要去掉。其他几个野战军的干部只要表示愿意紧跟自己，也照用不误。1967 年初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都是原来四野的军长。几个大军区中，他也不断在安插自己的亲信。但这些大军区司令资格很老，战功显赫，毛泽东又很信任，很难动。林彪就挑动造反派去冲击军区机关，造成事端，然后再动手解决。有林彪做后台，造反派冲击南京、成都、武汉、济南等大军区机关。军区内配属的空军司令有的也不听军区领导的话，如武汉空军司令刘丰就按照吴法宪转达的林彪的指示，不听陈再道、钟汉华的招呼。

上海“一月风暴”刮起时，由于林彪和江青的支持挑唆，从北京南下的一些红卫兵和武汉的一些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占领了长江日报社所在的红旗大楼，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挑起武斗，社会秩序大乱。武汉军

民强烈要求军区采取措施，制止打砸抢事件。这时，军委的“八条命令”已经下达，陈再道当即下令抓捕打砸抢坏头头，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形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

林彪、江青等人看到武汉形势开始稳定，急谋对策，最后商定由王力起草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由林彪审定发布。这十条命令基本上推翻了前面发布的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的发布，又给造反派打了气。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造反派就到军区司令部支左办公室张贴大字报挑战，接着在武汉串校游行，大呼口号要揪出“武老谭”。江青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挑唆说：“成都、武汉，都是问题比较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武汉地区的造反派遂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在武汉到处挑起事端，大搞武斗，甚至绑架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武汉群众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十分愤恨，组成战斗组织“百万雄师”，迅速发展成拥有120万人的组织。“百万雄师”同造反派的观点完全相反，认为湖北省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武汉军区大方向是正确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反对搞乱社会秩序，反对冲击解放军。由于观点不同，“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冲突日益激烈。但造反派打砸抢不得人心，越来越孤立，被“百万雄师”围剿得四处躲藏。还是陈再道怕出问题，每每派出部队解围。部队虽然对陈再道的命令想不通，但军令如山，只好忍着气，解劝“百万雄师”把他们放掉。

周恩来听完陈再道等人的汇报，心情沉重，深深感到这个工作不好做。从感情上讲，他是同意陈再道的看法的。但毛主席已有指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按毛主席指示的办法解决武汉问题是唯一现实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武汉的形势还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陈再道说不定会被打倒，那将是周恩来最不愿意见到的结局。

正如周恩来预见到的那样，陈再道不肯承认是犯了方向错误，不愿检查。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我来武汉，不是为了打倒你，而是保护你们来的。主席也是保护你们来的。主席动身时还对大家讲，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陈再道不知道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主席已定了，倔犟地摇摇头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没有什么可检查的。”谢富治当即拍桌子训斥陈再道：“你们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你们要180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考虑。”陈再道也拍了桌子，毫不客气地顶道：“你这是胡说，他们好，又有你们中央文革捧着，我们军区保护着，为什么武汉人民都跑到‘百万雄师’里面去了？”

谢富治被驳得哑口无言。两位二野的将军曾经先后作为陈赓大将的副手协助过陈赓的工作，又长期在刘邓麾下并肩率兵作战，所以谢富治也不敢过于对陈再道放肆。王力不管这些，见谢富治败下阵来，大声对陈再道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陈再道的副司令员韩东山立即驳斥王力：“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谢富治听了这话，

瞪圆了眼睛，恶狠狠地指着韩东山的鼻子骂："你好大的胆子，敢反对林副主席。"陈再道拦住谢富治的话头，冷冷地说："不要乱扣帽子。"周恩来见他们要吵起来，连忙劝开。

会议正进行中间，突然有参谋进来报告说："武汉街头，一派群众组织正在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到汉。"会议暂停，只听得远远传来口号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来到武汉"，"谢富治、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打倒武老谭，揪出陈再道"。周恩来眉头一挑，不满地问谢富治："我告诉过你们，不要公开露面，你们为什么公开露面了？"谢富治诡辩说："主席让我和王力同志协助你解决武汉问题，我们得看看大字报，了解了解情况呀。这么热的天，又不能戴口罩，一出去就给人认出来了。"周恩来严肃地说："既然你们的身份公开了，那你们就得出去做他们的工作。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期间，大家不要搞游行，要创造一个联合的气氛嘛。"谢富治答应道："我们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办。"

当夜的会散了后，谢富治、王力即去造反派各据点做工作。谁知他们两人根本不守信用，一到造反派的据点里，谢富治就登上讲台为造反派打起气来："我和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来看望你们，你们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我们全力支持你们。"造反派听了，欢呼雀跃，感谢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谢富治、王力向造反派频频招手致意。

从造反派的据点出来，谢富治和王力又到了"百万雄师"的总指挥部。总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热烈欢迎他们到来，谢富治却沉着脸命令道："把你们负责人的名单开一个给我！"总指挥以为谢富治要找大家汇报，忙开了一个13人的名单给他。谢富治把名单往口袋里一揣就再不理他们了。王力跑到前面来斥责他们："你们把人集中在据点里搞武斗是错误的。"总指挥礼貌而又悲愤地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一回去就挨打。只好暂住在这里。"王力讥讽地说："你们'百万雄师'不是号称有120万人吗？不是在武汉市占绝对优势吗？你们怎么还不敢回去？"总指挥回答说："全市来说确实是这样，但就部分工厂来说，我们占少数，不敢回去。"王力蛮横地命令："你们必须得回去。"总指挥这才看出来，王力原来不是看群众组织来的，而是逼降来的，不客气地回答说："首长叫我们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声色俱厉地斥责道："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你们有什么权利管人家。"总指挥听了王力这话，不禁十分恼火，大声反驳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被驳得哑口无言，气得指着"百万雄师"的总指挥说："你、你……你好大胆，你等着吧，走！"

谢富治和王力气恼地走了，总指挥立即召集各部门、各下属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实地讲了谢富治、王力逼降的过程。这些"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个个

气得大叫起来，当即跑回去向本部门、本战斗队作了传达，“百万雄师”的百万群众都大骂谢富治、王力，连夜书写大标语、大字报，贴到武汉大街上。顿时，武汉大街上满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当兵去”，“王力到工农群众当中来”的大标语、大字报。另一派群众见了，也纷纷上街贴感谢谢富治、王力支持的大标语、大字报。他们自以为有中央文革支持，贴大字报、大标语时又随意覆盖“百万雄师”刚贴出的大标语、大字报，“百万雄师”当然不干，走过去干涉，往往发生斗殴。武汉形势不但没有和缓下来，反而更加紧张起来，犹如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桶。

几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武汉军区的汇报会结束了，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下，陈再道、钟汉华明白了周总理的良苦用心，答应写检查。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嘛，我带你们去见主席吧，我明天要回北京了。我走了以后，希望你们尽快解决武汉问题。”

毛泽东已经在宾馆等着了。周恩来带着陈再道一进来，毛泽东就问：“你们想通了没有啊？”陈再道气鼓鼓地说：“我们有错误，要检查，但我们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怕个么子，现在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小孩子偷个苞米也是路线错误。”毛泽东招呼说：“来，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陈再道等人把椅子往前挪挪，蛮有兴趣地听毛泽东讲起故事来。毛泽东抽口烟说：“我给你们讲——”下面就是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

原来“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去河南视察，偶然碰见中共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此人方脸大耳，相貌忠厚，谈话朴实，毛泽东与他很说得来。此次离京南下，眼见各地干部都被批斗，不觉想起了纪登奎。这时河南省已经由省军区军管，毛泽东召见省军区司令时，提起了纪登奎，问道：“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省军区司令听了心里一惊，连忙吩咐手下：“赶快把纪书记接来。”手下人不明白是哪个纪书记，省军区司令瞪了一眼说：“就是纪登奎同志。唉，你笨，办不了事，我亲自去接吧。”

省军区司令为什么改变主意，要亲自去接呢？一是要让毛泽东高兴，二是纪登奎早已被关起来批斗，现在毛泽东突然要见他，而且称“老朋友”，说不定要提拔，省军区司令可以用亲自去接这种方式，化解仇怨，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省军区司令来到纪登奎关着的地方时，见一群造反派正批斗他呢。纪登奎坐着喷气式，屁股撅得高高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省军区司令“噌”地登上台去，扶起老纪，流着眼泪说：“老纪，我来迟了。”又训那些造反派说：“纪书记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竟敢冲击，好大的胆子，把他们的名字、单位记下来，回来跟他们算账。”

省军区司令扶着纪登奎从台子上下来，马上就有理发员来理发修面。浴池师傅已把浴池打开，请纪登奎去洗澡。几个士兵又拿来了全新的夏军装和军帽，

帮纪登奎穿起来。纪登奎经这样一番打扮，戴上黑边眼镜，顿时跟刚才判若两人，分外精神，一副大干部的派头。纪登奎不知道自己交了什么好运，一下子从一个阶下囚变成座上宾，但又不敢多问，只好随省军区司令上了车。在车上，省军区司令才告诉他："毛主席到了河南，要见你呢。"纪登奎顿时心跳加快起来，原来是毛主席点名要见自己，怪不得这些人一个个忽然客气起来。

毛泽东见了纪登奎，一下子伸出手来，边握手边问："纪登奎，老朋友了。"纪登奎恭敬地问候说："主席好！"毛泽东拉他坐下，问道："这一向怎么样啊？"纪登奎轻松地说："无非是坐喷气式。"毛泽东又问："坐喷气式的滋味怎么样啊？"纪登奎笑笑说："没有什么，就跟做广播操一样，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高兴起来，站着，把腰弯下去，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大家看了哈哈大笑，赶紧过来把主席扶住，毛泽东欣赏地看着纪登奎说："干部们要都像你这样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好了。"

毛泽东讲完了故事，问陈再道："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你明白吗？"陈再道"嗯"了一声说："我明白，主席是叫我们正确对待群众。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毛泽东摇摇头说："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陈再道建议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不听中央文革的话。"毛泽东安慰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此晚和陈再道一直谈到 10 点钟，随后陈再道和谢富治、王力、刘丰把周恩来送到机场。周恩来临登机前再次叮嘱大家努力解决好武汉问题，随后乘飞机返回北京。

周恩来一走，没有了约束，谢富治、王力更加为所欲为了。他们干脆到造反派的据点、工事里窜来窜去，慰问武斗伤员。造反派特地召开紧急大会欢迎谢、王。王力在大会上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小将们，你们放心，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迫、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讲完话后，在谢富治的安排下，刘丰等武汉空军负责人挨个儿跑到台上表态，表示要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

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点燃了武汉即将爆炸的政治空气。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19 日，造反派的所有广播台都打开了，无数的高音大喇叭在武汉三镇播放着谢、王的讲话，广播车在街上跑来跑去，呼喊着"揪出武老谭"、"打倒陈再道"、"解散反动组织百万雄师"等口号。武汉军民听了，大为震怒，一张题名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出现在街头。大字报直斥王力以极左面目出现，在全国大搞武斗，大混乱，大流血，大破坏。大字报提问道："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大字报呼吁"把王力揪

住，交给湖北三千三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7月19日，武汉军区党委会常委会议召开，陈再道、钟汉华在会上作了检查。下午3时，武汉军区召集师以上干部，请谢富治、王力讲话。王力这时轻狂到了极点，傲慢地对这些将军们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王力正讲得起劲，突然从大街上传来阵阵沉雷般的呼喊声。陈再道大惊，忙派人出去打探，原来是“百万雄师”反对王力的大游行开始了。王力听了，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可是紧接着军区大院门口涌来了独立师和29师的大批战士，大声呼喊着要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解释清楚王力在武汉水电学院的讲话是什么意思。

陈再道怕王、谢出事，赶紧把他们从后门悄悄地送到东湖宾馆。这时军区大院门口已排列了100多辆汽车，几千名独立师的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负责人，王力凭什么要压制“百万雄师”，质问陈再道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陈再道等人见战士们义愤填膺，即委托几个领导做战士的工作。陈再道绕道来到东湖宾馆，对王力说明了军区大院的事，希望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王力听了，理都不理，听任事态发展。转眼间两个钟头的时间过去了。谢富治醒来，知道情况发生变化，埋怨王力早不叫醒他。这时，“百万雄师”的大队人马包围了东湖宾馆，嚷着要找王力。王力吓得躲了起来，陈再道和谢富治出来在草坪上会见他们。谢富治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一看形势不好，虚与委蛇，答应下午会见他们。“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就准备走了。

突然，宾馆又冲进来几百武装战士，多数是独立师的。原来他们在军区大院等了半天，不见王力出来，后来才听说陈再道把王力护送到东湖宾馆，他们遂追到东湖宾馆，在东湖一带设下岗哨，务必要抓住王力。他们冲进宾馆后，误把陈再道当做王力，上去就给陈再道一顿枪托，警卫人员连忙护住，连叫：“这是陈司令，是陈司令!”战士们方知抓错了人，便连忙搜寻王力。一个“百万雄师”的群众发现王力跑回了房间，便带路去抓王力。战士们找到王力后，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随王力来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几个学生大耍威风，辱骂战士，战士们不客气地回敬了一顿。一不做、二不休，他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往军区大院驶去。

究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七回　示信任周恩来单身赴汉　顾大局陈再道戴罪进京

话说1967年7月20日凌晨，王力被武汉军区独立师的几百名战士从东湖宾馆抓走，带到军区大院，要他回答军区战士们的质问。毛泽东当时就住在不远的东湖宾馆的另一处馆所。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立即跑到毛泽东的住所，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听说独立师“哗变”，抓走中央代表，十分恼怒，当即通知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被战士打伤，不好行动，又要坐镇东湖宾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走不开，便由钟汉华去找王力。钟汉华离开东湖宾馆，驱车去军区大院，只见沿路无数的大卡车载着“百万雄师”和驻汉部队武装游行，游行车辆几乎占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钟汉华站在长江大桥上放眼望去，只见车流滚滚，红旗如海，枪刺如林，呼声如雷。武汉市内“百万雄师”和部队的高音喇叭一齐播放着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1949年4月底百万解放大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后毛泽东有感而写的。武汉“百万雄师”即从毛泽东的这首七律中摘取了“百万雄师”4个字作为自己的组织的名称，既有气魄，又含义深刻。

钟汉华驱车驰向军区，一路是游行示威的武汉军民，广播车的播音员领着呼喊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打倒王力!”“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钟汉华的汽车挨着游行车队缓缓行驶，好不容易才到了军区。王力站在院子里被迫回答着战士们的质问。钟汉华和军区其他几个负责人叶明、孔庆德走出来劝说战士们放掉王力，战士们执意不肯。直磨到中午时分，大部分战士回去吃饭了，钟汉华才想法把王力偷出来，送到29师师部。师政委张昭剑也紧跟着来到29师师部，受军区的委托，专门保护王力。张昭剑回到师部，屏退闲杂人员，悄悄地对王力说：“首长，你处境危险，必须跟我走。”王力怀疑地问：“你是……”张昭剑说：“首长，你放心吧，我是29师政委，独立师抓你，我是反对的。”王力连说：“好，好。你路线觉悟高，我一定把你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这时，远远传来闷雷般的口号声。张昭剑吓唬他：“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要来抓你，已经逼近师部，外面的喊叫声就是他们的。”王力一听，

吓得快要瘫在地上，张昭剑叫来两个战士扶着王力上了洪山，躲了起来。

陈再道得知王力已被救出，便报告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馆所里气氛非常紧张，中央警卫团部队已在院里修起了工事，架起了机枪，戒备森严。汪东兴、杨成武、谢富治等人紧急磋商应变的措施。这时军官进来报告，邱会作已经来到东湖，有万分紧急情况面见毛主席。汪东兴等人连忙吩咐“有请”。邱会作满头大汗地走进来，大家叫他赶快脱去制服凉快凉快，邱会作却死也不肯脱。大家十分奇怪，见他执意不脱，也就不勉强了。汪东兴告诉邱会作：“主席正在休息，你稍等一会儿。”邱会作知道毛泽东昼眠夜作的习惯，也就坐下来和大家商议一下毛泽东转移的有关细节。可去的地方有长沙、上海、南昌，但到底去哪里，还得要主席定夺。

下午5时，毛泽东醒了，汪东兴立即安排邱会作见毛泽东。邱会作见了毛泽东，说：“主席，我这趟来是担着天大的担子。”他一边说，一边从贴身的汗衫内取出一封汗水湿透了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信，取了支烟抽起来。邱会作小心地说：“林彪、江青同志派我来送信，叫我一定把信亲自交给主席。江青同志叮嘱我，要我一定把信送到，否则提头来见。林彪和江青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最好去上海，张春桥已经到上海去了。”毛泽东将信将疑地说：“有那么严重吗？走，去哪儿？看看再说吧。”邱会作又请求说：“林彪、江青说请主席见信回他们几个字，以使他们放心。”毛泽东说：“信就不写了，你回去同他们说一声就是了。”

到了晚上8时，“百万雄师”和驻汉部队的大游行仍没有停止的迹象，千万道汽车灯光划破夜空，无数汽车喇叭声有节奏地响着，“嘟——嘟——嘟嘟，”远远听来，就成了“打——倒——王力”。汪东兴、邱会作等人再一次劝毛泽东赶快离开武汉，向上海转移，毛泽东同意了。汪东兴、谢富治立即叫来武空司令刘丰，布置转移事宜。深夜2时，刘丰派来的空军警卫部队到了东湖宾馆，毛泽东坐上一辆空军的普通汽车，由刘丰等几个人护送，悄悄地离开东湖宾馆。沿路行人谁也没有注意这几辆军车，汽车一直开到王家墩机场才停下来。这时，一架空军的专机已经隆隆启动。邱会作钻出汽车，又一次向准备登机的毛泽东讨回信，毛泽东摆摆手说：“不写了，不写了，你回去同他们说说。”

毛泽东为什么不写回信呢？原来毛泽东并不相信武汉军区真有兵变企图，如果写回信，信中免不了要对武汉军区表态，那么林彪、江青就可以以他的信为依据对军队下手，那样一来说不定真会造成部队的激变，真正危害到毛泽东的事业和人身安全。当然，走还是要走的，毛泽东也在提防事情发生变化。他一路从东湖出来，除了“百万雄师”和部队在街上有秩序地游行外，并未看到封锁交通、盘查行人、密布岗哨这些兵变时必然要采取的措施。他们坐的几辆汽车也是沿途顺利，没有什么人上来检查，毛泽东就更不相信武汉兵变之说，也更加不给邱会作回信了，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一到上海，张春桥立即前来迎接，毛泽东把汪东兴等人叫来商议武

汉问题。这场事变到底是不是兵变是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张春桥一口咬死这是一场兵变，毛泽东怀疑地说："不是林彪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听得出来，毛泽东对王力在武汉的做法很不满。

不论对武汉这场事变的看法如何，但问题已经发生了，总得解决，毛泽东把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了周恩来。7月20日下午4时，周恩来乘专机从北京起飞，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问题。飞机平稳地飞行着，大概到下午5时就可在武汉王家墩机场降落了。吴法宪这时已接到林彪密令，要他设法使周恩来见不上毛主席。吴法宪接令后，两眼一转，跑过来报告周恩来："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总理，我已命令改变航线，在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生气地说："航线改来改去会出危险的。"见事已如此，他也就只好同意了。

专机徐徐下降，周恩来俯视机场，只见机场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他问吴法宪："这是怎么回事？"吴法宪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为了防止兵变，空军空降部队已经占领机场。"周恩来摇摇头说："不要搞这么紧张嘛，我就不信陈再道会搞兵变。"飞机降落后，周恩来走出座舱，只见机场上一片刀光剑影。吴法宪要调空降部队保护周恩来进城，周恩来不要，随周恩来来汉的两个中队的中央警卫团部队也被周恩来留在山坡机场，他只带了两名卫士就单身赴会了。

山坡机场离武汉市足有60里地，周恩来乘汽车赶到东湖宾馆时，谢富治告诉他，主席已前脚离开武汉去上海了。周恩来暗叫一声"糟"，主席若在武汉，可以随时找主席商量，武汉的形势可以很快稳定下来，现在主席走了，问题就难办多了，林彪、江青可以任意插手武汉，把问题搞复杂。

周恩来住进东湖宾馆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部队还在游行。周恩来把陈再道等人召来，责令他们把王力送回东湖，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和军队代表坐一架大飞机去北京谈判，尽快把武汉形势稳定下来。但是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却故意和周恩来对着干，尽量制造事端，把武汉搅得更乱。

王力是当时武汉问题的焦点，武汉军区负责人派人去29师师部接王力，张昭剑等人拒不交出王力。陈再道等人闻讯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不交出王力，武汉军区无法交账，这一点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刘丰已探知王力在张昭剑那里，他秉承吴法宪的旨意，决定把王力转到空军司令部来。刘丰窜到29师师部，厉声问张昭剑："张昭剑，形势明摆着，你是听陈再道的话，还是听毛主席的话？"张昭剑机敏地说："我听空军的。"刘丰命令说："那好，你赶快把王力送到空军司令部来。"张昭剑赶快把王力从山上请下来，护送到武汉空军司令部。7月22日凌晨，李作鹏、刘丰又护送王力到山坡机场。刘丰向吴法宪打电话表功，说自己如何在满街独立师士兵的枪口下亲自把王力接了出来等等，吴法宪又立即把刘丰的话报告了林彪。

武汉空军的活动立即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把李作鹏、刘丰和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叶明、孔庆德等人找来，宣布叶明、孔庆德住到29师师部跟前的武汉军区指挥所去，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武汉空军仍由空军和军区双重领导，武汉空军要听军区的话；责成李作鹏迅速转告陈再道，赶快表态，争取主动。周恩来的想法是只要陈再道表了态，他就可以出来做工作，保住陈再道。但是李作鹏根本没向陈再道传达周恩来的叮嘱，陈再道也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也没有想到要去表态。林彪就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首先通过李作鹏由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部队发电报，要驻汉海军表态，于是驻汉海军发表“严正声明”，声称“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变”。游弋在长江上的东海舰队的军舰把炮指向武汉，舰上的广播喇叭里喊着：“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在江岸上游行的“百万雄师”和驻汉部队也用高音喇叭回骂，真是两军对阵，泾渭分明。驻汉空军违抗军纪和周恩来的命令，也跟着表态。张昭剑夺取29师军权，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周恩来闻讯大惊，严令张昭剑一定要保护好叶明、孔庆德。张昭剑表面答应，放下电话就令人把孔、叶二人赶出指挥所，叶明被早已等在那里的造反派抓住，打了个半死，最后被部队救出，送往医院。

周恩来眼见林彪直接插手武汉问题，李作鹏这些人根本不听他的话，陈再道也不表态，便向远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方略。周恩来接到返京的中央通知后，便先让谢富治和王力坐飞机返京，自己也随后乘飞机回北京。7月22日下午，飞机从山坡机场起飞，王力和几个北航学生俯视着江城，7月20日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历历浮现在眼前。北航的一个学生问：“首长，下一步我们该干什么呢?”王力说：“干什么？揪军内一小撮，先从武汉军区开刀。”

飞机飞到北京了，但机场通知飞机不要降落，先让总理的飞机降落。王力很奇怪这种安排。飞机在机场上绕着圈，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的专机过来了，在机场徐徐降落。周恩来下了飞机一看，机场上已聚集了数万人，无数横幅上写着“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归来”。周恩来奇怪了，王力他们不是比他早飞半小时吗，怎么还没有到？江青从欢迎的领导人中走过来说：“总理，谢富治、王力的飞机就要降落了，你不去欢迎他们吗?”周恩来这才明白江青他们的鬼花招，原来是用这种办法逼自己欢迎谢、王，壮大欢迎声势。他很气愤，但不想在这种小动作上与他们过多地纠缠。他明白，武汉这场暴风骤雨一起，还不知以后形势出现多大的变化呢，还不知有多少军队干部要遭到冲击呢，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自己得忍辱负重。

谢富治和王力回到北京的当天，林彪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改组武汉军区，把陈再道、钟汉华和独立师师长牛怀臣、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等武汉军区主要干部都调到北京来。

7月23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15人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命令。这时

武汉军民的大游行还在继续，如果陈再道振臂一呼，这些人完全会听从他的调遣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但是这样一来，内战将起，后果严重。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民族，陈再道决定徒手赴京。临行前，他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要家人不要难过，永远跟共产党走。

陈再道驱车去机场，他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已经胜利回到北京。据新华社消息……"秘书要关掉收音机，陈再道拉住他："别关，听听他们有什么计划。"陈再道听着广播，又向车外望去，武汉军民的大游行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停下来，解放军指战员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军容整齐地驱车前进，不断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陈再道心一热，两滴眼泪掉下来，心里默念着，亲爱的战友们啊，我再也不能带领你们战斗了，我是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可你们呢？王力他们能放过你们吗？

机场是空军的地方，陈再道一到机场，刘丰立即把警卫部队赶了出去，随陈再道来的警卫部队只有29师师长率领的一个排，寡不敌众，当即被刘丰出动机场空降部队缴了械，师长被扣了起来。陈再道和随后赶到机场的武汉军区干部都被刘丰下令软禁起来。

去北京开会的干部到齐后，刘丰命令陈再道等人和他们的秘书、警卫上了飞机，他亲自带领一排空降部队上机押送。7月24日，凌晨3时，飞机抵达北京，陈再道一行被北京卫戍区军官接到京西宾馆。陈再道到宾馆时，发现宾馆内外岗哨密布，显然是增加了守卫部队。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给陈再道等人安排好了房间，悄悄地对陈再道说："你就放心地住着吧，总理已命令宾馆严密封锁消息，增派了警卫部队，有事我会关照的。"陈再道感激地说："总理想得真周到。"

陈再道这时心力交瘁，想好好睡一觉，还没有睡熟，外面传来吵闹声，傅崇碧紧张地冲进房间，一把拉起陈再道就跑，把他塞进一架电梯，电梯立即上升，在中间停下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忽然，电梯间的电灯熄灭了，开电梯的战士向陈再道解释说："三军造反派要冲进来抓你，傅司令员要我们把你藏在电梯里。"

造反派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原来刘丰一下飞机，就把陈再道到京的消息透给了吴法宪，吴法宪立即告诉了文艺口造反派。他们冲进京西宾馆，到处搜寻陈再道，傅崇碧赶紧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担心地问："这个办法保不保险？能不能想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为难地说："造反派不听我的啊。我没有办法了，最好能让谢富治来一下。"周恩来说："好吧，我来想办法。"周恩来要通了谢富治的电话，对谢富治说："富治同志，现在造反派冲进了京西宾馆，你去劝他们退走，不要让陈再道出问题。"谢富治在电话里哼呀哈的，推托不去。周恩来火了，声色俱厉地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愣，转而一想，陈再道出了问题，毛泽东发怒追查下来担待不

起，于是跑到京西宾馆劝说造反派退走。在造反派眼中，谢富治是刚从武汉脱险胜利归来的“英雄”，他的话岂有不听的，于是造反派很快就退走了。

文艺口造反派刚退出，三军造反派又包围了京西宾馆，要揪出“陈大麻子”，一队一队的游行队伍从京西宾馆前面的大街上走过。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叫上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坐了几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给三军造反派打气。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的命令，全国各大城市陆海空三军和群众一道游行，声讨陈再道。7 月 25 日，林彪登上天安门，参加首都百万军民举行的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大会。蒯大富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心林彪、王力的举动，大会开完后把他的一班心腹召来密授要略：林彪当接班人，很多人不服，红军时四方面军保留下来的干部多，大军区司令中，武汉、南京、福州几个军区司令都是四方面军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随后他们成立军事情报组，准备再大干一番。

7 月 26 日上午，中央开会要解决武汉问题了。陈再道接到通知，通知还附了中央发给武汉军区的复电。这份复电毛泽东已经审定，毛泽东的批语是：“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陈再道再往下看去，复电共5 条，其中第二条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陈再道看出，自己的名字下面的同志两字是毛泽东特意加上去的，他不禁深为感动，就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条命。

中央常委碰头会于 7 月 26 日上午在京西宾馆会议厅举行，中央文革成员、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在第一排站着，接受审问。

会议一开始，先是由谢富治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在武汉“蒙难”的经过，指着陈再道的鼻子大骂：“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话，吴法宪紧接着发言。他破口大骂陈再道是叛乱头子，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周恩来见他满口胡说，打断他的话说：“讲主要的。”吴法宪不听，还是破口大骂，又把徐向前也扯进来：“徐向前早在 2 月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要负责任。”徐向前站起来斥责他：“胡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嘛！”徐向前说完，写了个条子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愤然退场。

徐向前退场后，陈再道想为自己辩解一下，吴法宪不等他说完，领着刘丰几个人跑过来。这时周恩来出去解决一个问题去了，吴、刘等人便对陈再道等

人拳打脚踢，摘去他们的帽徽、领章。接着一些服务员也利用休息的空隙对陈再道进行武斗。周恩来在休息室知道后骂了一声“荒唐”赶过来制止，那些服务人员早溜掉了。周恩来回到休息室把吴法宪狠批了一通，吴法宪有些沮丧，江青却把他拉到一边夸奖说：“吴胖子是造反派，很有造反派的精神。”

吃过晚饭后，批斗会继续开。陈再道已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小时，实在受不了，便向康生求情道：“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60 岁的人了，念我革命 40 年，让我坐下来吧……”康生恶狠狠地瞪着陈再道，训斥他说：“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30 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革命，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京西宾馆的批斗会开完后，林彪亲自在第二天主持军委会议，撤销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的职务，任命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陈再道当即被送往北京卫戍区特监，实行监护。

紧接着，林彪又下命令，宣布独立师为叛军，撤销番号，调离武汉解散。东湖宾馆的多年为毛泽东担任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被武装押送农场。“百万雄师”被解散，根据谢富治提供的名单，其负责人都被逮捕。驻军和造反派大抓大打“百万雄师”和支持过“百万雄师”的干部，武汉市被抓数十万人，6 万人被打死、打残。武汉，这个美丽的江城，已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八回 保机密杨成武种祸 乱部署王八七入狱

话说“七二〇”事件后，陈再道、钟汉华处境危险。徐向前因为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陈再道的老上级的缘故，被林彪打成陈再道的黑后台，被迫离开中央常委碰头会，独居家中，形同软禁。7 月 26 日中央常委碰头会结束后，很快就是“八一”建军节了，时值武汉军区改组，军队问题突出，谁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就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了。当然，和以往一样，出席建军节的招待会的人员名单照例要由毛泽东审定。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因后果，毛泽东心里像明镜似的十分清楚，他恼火陈再道不听招呼，但并不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是场兵变。到上海后的当天，毛泽东没有休息，一个劲地问张春桥等人：“情况有林彪说得那么严重吗？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能这样顺当地离开武汉吗？你们知道兵变是怎么回事吗？”

第二天，毛泽东饭后在住所的林荫道上散步，又问跟随在旁边的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杨成武回答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说的是实话。红军时期，他一直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工作，任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政治委员，率军在长征路上打开天险腊子口，使红一方面军和中央从此口北上。他同杨得志、杨勇是红一军团的著名虎将，号称“三杨”。抗日战争时期，杨成武又随由红一方面军改编的 115 师政委聂荣臻元帅（原红一军团政委）开创晋察冀边区，任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所部改编为华北野战军，他任华野三兵团司令员。陈再道呢，红军时期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当兵，从战士当到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由四方面军改编的 129 师工作，长期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指挥下作战，曾任陈赓大将为旅长的 386 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二野二纵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和陈再道同为人民解放军的几十名战功显赫的上将中的两员，但因长期在不同的战略区活动，所以并未谋面。新中国成立后，各路大军会师，1955 年两人同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才熟识起来。

毛泽东听完杨成武的一番解释后又问：“你说说，陈再道会反对我吗？”杨成武肯定地回答：“老陈是个粗人，只会打仗治军，性子又直，遇见看不惯的事就说。他对王力有点意见，但对主席那是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们军队干部都最清楚，没有主席，能有我们人民军队的今天吗？不但陈再道不会反对你，其他

军队干部也不会反对你。”毛泽东点点头说：“你说得不错，陈再道是不反对我的。他要是反对我，只要在东湖摆上一个营，我们就不能动弹了，还会这么大摇大摆地出来?”

毛泽东说完后，又默默地散起步来，时而双手摆来摆去，活动一下身子。忽然，他又问杨成武：“陈再道现在在哪里?”杨成武回答：“不清楚。”毛泽东停住脚，吩咐道：“你去问一下总理。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杨成武回答道：“是，我马上报告总理。”

第二天，杨成武去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正碰上毛泽东同新华社摄影记者老刘开玩笑：“老刘啊，我听小吴说你搞独身主义，和老婆不在一个床上睡觉，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刘惊讶地说：“呀，这样的小事主席也知道了。我那老婆也在新华社工作，她参加了对立面组织，我就不理她了。”毛泽东抽着烟，乐得哈哈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同志哥噢，这可使不得。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嘛，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不要冷清了同志妹哟。”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秘书送来了报纸，毛泽东打开报纸，脸就沉下来，指着报纸上林彪用毛笔字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手迹照片，问大家：“谁封我4个官啊?”毛泽东的话很幽默，但这次没有一个人笑了，这可涉及主席的亲密战友、副统帅林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了一句对林彪不够尊敬的话而被捕入狱。1966年冬，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女英雄舒赛因为贴了林彪的大字报被谢富治下令逮捕，震动京城朝野，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也熟知此事，还怎么敢议论林彪。

毛泽东批评完林彪的题词，又批评起各地塑造他的塑像的事来：“让我白天黑夜站在那里，日晒雨淋，受饥挨冻，替他们看大门。”他又嘲笑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望望沉默着的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不要宣传个人，要喊马克思主义万岁，喊马列主义万岁，不照马列去做是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讲得很厉害，听得人惊心动魄。大家都明白，自己已经涉足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第一次在一个小范围内批评林彪。毛泽东之所以会对他们讲，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这一时期，毛泽东心情有些烦躁，他想在下一年就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总是制造事端，逼他表态，他对林彪不满起来，也有了更多的戒心。毛泽东心情不好总想找几个熟人说说，这和平常人心里不痛快时想找人聊聊是一样的。但毛泽东不好对其他人说，只能找身边的人说说。

杨成武听着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心里着实吃了一惊。从这时起，他就给自己立个规矩，这些话绝对不能从自己嘴里露出去，那可是掉脑袋的事。

毛泽东看到杨成武进来，知道有要事汇报，便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杨

成武汇报了毛泽东交办的保护陈再道的任务，便又提起一件紧要大事来："有人不赞成将'八一'当建军节。首都有些高校已成立联络站，要把秋收起义的9月9日定为建军节，这事不知如何处理，总理特向主席请示。"毛泽东一下子把正端着的茶杯往茶几上一蹾，骂了一声："完全是胡闹，这些人懂个屁。'八一'、'九九'，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嘛，定'八一'为建军节是我1933年当中央政府主席时定的。他们不晓得，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方性的。'八一'是建军节，只要我活着，这个就不能改。"

毛泽东停停又说："今年建军节规模要大，老帅都要参加。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看总司令是红司令。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啊，草地上亏了他。陈毅心直口快，直爽可爱，是个好同志啊。还有聂荣臻，那可是个顾大局的老实人。1945年林彪出关，他一下子抽了几万部队让林彪带着出关，晋察冀部队都快抽空了，几十年了，他对此事一字不提，有功而不邀功。徐向前嘛，草地上一句话就堵住了张国焘的追兵，有大功于老夫。他们都要出席招待会，位置要前。"

杨成武准确无误地记住了毛泽东的话，乘飞机返回北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这时"八一"建军节招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周恩来派了秘书速速通知各位老帅。考虑到老帅们可能没有准备，周恩来又让秘书随带去理发师。秘书们到老帅家里后，一面给老帅修面理发，一边传达中央指示。老帅们理完发，换上礼服，直接坐车去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突然接到叶群的电话，请他务必来一趟，有要事相商。杨成武放下电话，按时赴约。对于林彪，杨成武心里是很尊敬的，老上级，能打仗。延安时，军队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平型关战役林彪负伤去苏联治疗，斯大林很赏识他，曾向中共提出用5个师换林彪参加苏联军队的卫国战争指挥工作。（这里所说的五个师，大概指的是五个师的装备，并不是要调五个师的苏联红军到中国战场——笔者。）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得到证实，但林彪能打仗、会治军，则是大家公认的。杨成武心里也明白，罗瑞卿下台后，中央任命自己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与林彪的举荐不无关系，红一方面军的老底子嘛。

叶群为什么这么急着请杨成武一叙呢？原来事出有因。1967年以来，不知是谁最先发明两个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很快便风行开来，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单位，组织开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时必须首先呼喊这两句口号。谁知到了此年5月，却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那天，为纪念毛泽东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不外是《长征组歌》、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毛泽东和林彪也观看了演出。大幕拉开，男女报幕员手捧《毛主席语录》，男报幕员举着小红书喊道："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忽然用臂肘碰碰身边坐着的林彪，笑着对他说："下面该你啦。"果然，女报幕员

紧接着举起小红书高呼："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毛泽东这一碰一语，似有意似无意。不过，林彪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浑身不自在。第二天，他即让叶群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转达林彪的意见：请中央发出通知，今后全国各种聚会，会上只许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不要喊"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建康"。

也许是林彪觉得这样还不足以剖白自己，过了些天，也就是这年6月16日，他又亲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泽东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信发出了，林彪仍不放心，叶群也不放心。他们急着想知道毛泽东近来对林彪的态度。最近"七二〇"事件闹得天翻地覆，涉及许多军队高级干部，毛泽东心里的底牌是什么，这只有通过跟随毛泽东去南方的人才能打听到。杨成武是跟随毛泽东去南方的，他的职务决定了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的角色，又是红一方面军的老人，新提拔的代总长，向他问一下不是最合适的吗？但此事林彪不便出面，还是由叶群约谈恰当些。

杨成武一到叶群那里，叶群端糖倒水，极为热情。寒暄一阵后，叶群即把话引入正题，问杨成武："主席最近讲到林总什么了没有？"杨成武心往下一沉，迟疑了片刻说："没有啊，主席最近忙着武汉事件，没有讲到林总。"叶群早已看出了他的迟疑，断定毛泽东肯定讲到了林彪，便装着无意的样子说："林总现在很忙，早想把你那个代参谋长的'代'字取掉，好帮他多做一些工作。红一军团的英雄团长，不用你还用谁呢？就是不知主席是个什么态度……"

杨成武明白这是叶群在向他暗示不要忘了林彪的知遇之恩。但主席的那些讲话是何等重要，可以说是现在中国的最高机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怎么能向别人泄露这个机密呢？杨成武艰难地摇摇头说："主席确实没说到什么。"

叶群不讲话了，脸一下沉了下来。

杨成武走了以后，叶群又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的电

话，对吴法宪她不必客套了，她直接问道："胖司令啊，你和余立金谈得怎么样啊？"余立金是新任命的空军政委，前一段随主席南下，也是"八一"前夕才从上海飞回来的。叶群紧握着电话，只听吴法宪在电话里气呼呼地骂道："这个余立金真坏。他一回到北空家里，我就登门拜访，他不谈。我打电话问他，他不说。我请他向林副主席汇报，他说没有汇报任务。我从晚上缠到白天，又从白天缠到晚上，好话说尽，他就是不理，说主席、总理指示，没有汇报任务，这个人不能在空军待。"

叶群放下电话，立即向林彪去汇报，两人密谈了很久。

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武汉造反派出动几万人到南京、福州大军区和一些军队机关"揪带枪的刘、邓"，清华大学、北航红旗也派出战斗队和他们一起冲击军区机关。军械被抢，战士挨打，连运送武器到越南的援越列车也被抢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造反派揪出在太阳底下罚站，军队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

王力从武汉回来后，成为风光一时的英雄人物，志高意满，受康生的指示，写了《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鼓动"揪军内一小撮"。此时的王力，到处讲话，到处捣乱，却没有想到"盈则亏，满则溢"这句古训。8月7日，他又接见了外交部造反派，外交部是周恩来严厉禁止夺权的部门，毛泽东也多次保护外交部长陈毅。造反派不懂得他们闯入了禁区，反要求中央文革接见。王力接见时为他们打气，要他们猛冲猛斗，肯定他们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王力装做气愤地问："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他指着一个造反派头头说："二十几岁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

外交部造反派见王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欣喜万分，回去后立即根据王力的讲话记录印传单，写大字报，把王力的讲话到处宣扬。这时，为了宣传上的方便，对于过长的政治术语常常予以简化，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简化成"走资派"，还有"三支两军"等，外交部的造反派为了简化字语，方便运用，遂把"王力同志8月7日的讲话"给简化成了"王八七讲话"，人们就再不叫王力的名字了，而称他为"王八七"。

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八七"的鼓动下，果真夺了外交部的权，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他们以外交部的名义向驻外机构发出指示，命令大使扫院子、打扫厕所，炊事员主持会谈，向驻在国提出种种荒唐要求，出尽洋相，丢尽面子。

8月下旬，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各地军队被围攻的告急电报雪片般飞来，毛泽东大吃一惊。他又看了《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才知这股逆风恶风的来源，不禁大怒，提笔在杂志上批道："毒草"，"乱军"，"还我长城"，然后把杂志退了下去。

当天晚上，林彪住所一片紧张气氛，原来毛泽东把林彪送审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退回来了，文件上所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句子都给批上"不

用”。自 1959 年以来，林彪还没有碰过这么大的钉子。很显然，毛泽东已洞悉林彪“揪军内一小撮”的险恶用心，林彪明白这一点，顿时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此件不发，也还属内部工作讨论范围，但他的宝贝儿子“老虎”——林立果已经以“红尖兵”的化名写了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发表了，万一追究起来，那可是躲都躲不开的。

林彪到底是元帅，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他思前想后，估计毛泽东还不会因此而将他和中央文革小组端掉，那么就有办法了。

林彪主意定了以后，正想叫叶群到钓鱼台去探探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哪知江青、康生、陈伯达比他还着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是中央文革小组搞的，毛泽东追究的话，先要追查他们。叶群的电话还没有打过去，江青的电话倒先打到林彪这里来了，原来他们商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妥善的办法，只好向林彪请教。

叶群听到秘书报告江青来了电话，喜出望外，连忙去接。江青在电话里说：“对于主席的批评，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如何落实的?”叶群说：“林副主席反复学习了主席的批示，认为主席的指示很重要，一句顶一万句，要认真落实。林副主席请江青同志查查，看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问题没有。”江青顿开茅塞，立即回答：“我明白了，请转告林副主席，我们马上去查。”

江青放下电话，即把陈伯达、康生找来，传达了林彪的指示精神。他们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告诉他们去找替罪羊。他们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几个人排了排队，准备抛出那么一两个用处不大的人去顶罪。

人选还没有定下来，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学着国内的样子办报，登了许多港英当局极为反感的文章。港英当局担心《大公报》、《文汇报》的宣传会在香港引起混乱，便以“违警”之名逮捕了两报的一些记者。消息传到国内，外交口造反派联络了数万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口示威游行。周恩来闻讯后，即命陈伯达、王力去劝说群众撤走。陈伯达、王力故意拖着不去，外交口的造反派以为中央文革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便冲进英国代办处放了一把大火，把英国代办处变成了火龙阵，然后扬长而去。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极坏，许多外国政府以为中国人要排外了，纷纷考虑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中国驻英使馆受到了严格的监视和限制，许多驻外人员遭到殴打。

与此同时，十几万人围住中南海要揪刘少奇，无数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喊叫，周恩来甚至无法办公了。照此发展下去，造反派说不定也会冲进中南海，那时可真叫天下大乱了。

周恩来坐镇北京，眼看局势失去控制，要想刹车，必须对中央文革小组实施休克疗法，先抓起地位较低，又最敢讲话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但是这是何等大事，没有毛泽东点头，周恩来连一个也动不了。于是，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对王力等人采取措施，并让秘书附上“王八七讲话”和英国代办处被烧等材料，派杨成武再去上海向毛泽东请示。

杨成武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形势。毛泽东让杨成武把材料留下，先看看材料再说。过了两天，杨成武奉召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把批件交给他，吩咐说："你回去告诉总理，就说我说的，王关戚是小爬虫，是坏人，立即抓起来。"杨成武拿着毛泽东的批示，登上飞机，连夜飞回北京，向周恩来呈交了主席的批件。周恩来让秘书召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出示了主席的手令。江青、陈伯达、康生听了，如雷震耳，毛泽东竟从中央文革小组开刀了！而且抓的第一个人就是不久前还被视为英雄的"王八七"，他们不禁个个汗流浃背。周恩来当即宣布了纪律，部署了行动计划。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就到8月底了。"王八七"近几天轻闲起来，中央文革小组有事也不找他了。他正感到奇怪，突然来了通知，让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他的车前面走，后面就跟来了一辆小轿车，没见过世面的王力一点也没有发现这个异常现象。

车子到了人民大会堂，"王八七"来到会议室，只见会议室气氛严肃、紧张，没有往日开会时的议论风生。过了一会儿，关锋也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坐在那里，个个面若秋霜，对进来的王力和关锋理也不理。

周恩来看看表，宣布："现在开会。奉主席指示，王力、关锋是坏人，立即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顿时瘫了，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听，眼睁睁地看着几个军人全副武装地冲进来，"咔嚓"一声给自己戴上了手铐……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九回　恶极生悲王关戚忽为小爬虫　尽职恪守杨余傅顿成阶下囚

话说王力、关锋被捕以后，全国冲击军队的现象顿时被刹住了。9 月 29 日，杨成武陪毛泽东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要求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总参谋部一些人写的题为《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总参政治部领导写的，署名为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写好后送给杨成武，由他送给尚在上海的毛泽东审阅。杨成武是搞军事的，对这种理论上的问题把握起来有一定困难，便在到达上海后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些天，毛泽东把文章退了回来，在上面批写着："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杨成武随后把文章寄北京，送交陈伯达和姚文元。此后，杨成武就把这个事忘了，没想到陈伯达"酌处"的结果，是要以他杨成武的名义发表。杨成武感到奇怪，明明这篇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怎么能以他杨成武的名义发表呢？便一口拒绝。

陈伯达见杨成武不接受"酌处"的结果，便搬动林彪，要林彪给杨成武下令，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林彪即要叶群给杨成武打电话。叶群要通了杨成武的电话，东拉西扯几句才转到正题上："林总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总参的那篇文章。"杨成武为难地说："林总的命令我当然得服从，可是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啊。"叶群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关系，党根据需要，可以决定以党员个人的名义发表党的重要文章。"杨成武无奈地说："理论上我是外行……"叶群打断他的话，不容解释地说："行了，就这么定了。"

于是，以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的文章登到了《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很恼火，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指着报纸上的这篇文章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文章居然登了出来，标题就是错误的嘛，权威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不是想树就树得起来的，形而上学，陈伯达干的好事。"杨成武看主席这么生气，深觉愧疚，连忙检讨："主席，我同意以我的名义发表，犯了严重的错误，请主席批评。"毛泽东指着杨成武说："这不是你的事。"

康生、杨成武都不敢说什么了。毛泽东望着窗外，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才放缓语调说："怨不得我生气，这不是个人小事，是关系到马列根本思想问题，要学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此次谈话后，毛泽东余怒未息。12 月 18 日晚，毛泽东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一坐下就点陈伯达的名字："陈伯达，你是怎么搞

的，书读得越多越蠢，糊涂到何等地步。你要大树特树谁啊，我看是树你们自己。你不是号称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怎么连标题中的问题也看不出来？你和姚文元搞这篇文章，塞给杨成武，我是不相信你们这些写文章的人，你们搞的那个标题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江、陈、康坐着叫毛主席训，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们感到近来中央文革小组老是出事。不久，一件更倒霉的事又来了。

且说王力、关锋反党乱军，在外交部制造事端，出动十几万人围住中南海，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当即被逮捕入狱。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严重警告。兔死狐悲，江青、陈伯达、康生虽是十二分的不愿意，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关被戴上手铐带走。

1967 年腊残冬尽，转眼就到了 1968 年。此年 1 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加紧整理周恩来的材料。从 1967 年以来，戚本禹就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大整周恩来的材料。有些人组织了“五一六”兵团，专门攻击周恩来总理，他们甚至把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贴到天安门的城墙上。“王八七”和关锋被捕以后，他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一意孤行，继续为非作歹。他绝对没有想到，毛泽东在 4 个月前就已对他的政治生命画上了句号。

电话铃骤然响起，是中央文革小组打来的，通知他去钓鱼台开会。戚本禹急忙锁好材料，坐车来到了钓鱼台。陈伯达、康生、江青已在会议室坐着，令人刺眼的是谢富治也在这里。戚本禹进来，他们理也没有理他。康生见人都来齐了，便站起来宣布：“戚本禹反对中央文革，分裂党中央，是刘、邓派到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根据政治局决定，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几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冲进来，麻利地给戚本禹戴上手铐，把他带走了。

江青、陈伯达、康生坐在会议室里，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最后康生打破沉默：“王关戚是刘、邓的小爬虫，现在发现了，是个大好事，我们中央文革的威信更高了。从现在开始，对王关戚的批判要提小爬虫，充分揭露他们和刘、邓、陶勾结，钻进中央文革内部，破坏中央文革的行为。”江青点头同意。陈伯达已被王关戚连续被捕吓得六神无主，这时也不敢再乱出主意了。

处理完了戚本禹的问题，江青又坐车去毛家湾。“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的地位上升得比火箭还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下子成为在全党全国说一不二的人物。毛泽东看她太轻狂，有时点她一句：“江青，你是个纸老虎。我一死，人家一指头就能打倒你。”

江青每次被毛泽东批评后，一种深深的恐惧袭上心头。她想到自己的地位虽然很高，但并没有多少实权，要抓权就要抓军权。可是军队是林彪的禁苑，怎么去插手呢？她想了好久，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先夺首都卫戍大权，二是控制军委办事组。夺首都卫戍大权她已有一个计划，控制军委办事组却非要经过林彪点头同意才行。

江青去了毛家湾林府，叶群热情地把她接进来。林彪迎出来，把她让进客

厅坐下，叶群亲手端来各色糖果，香茗冷饮，摆了满满一桌子。在刚过去的毛泽东追查反军的暴风骤雨中，两人携手合作，渡过难关，现在相聚，分外亲热，互道寒暄，气氛极为融洽。

说了几句闲话，江青切入正题："林副主席，现在军队的问题很复杂。为了揪出张再道、李再道，中央文革小组想更好地得到林副主席的直接指示，以后军委办事组是不是也应该多向中央文革小组通通气？"林彪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江青是要军权来的，这可办不到。林彪没有客气，一口回绝了江青的要求："主席没有这个指示啊。"江青诡秘地笑着说："看来林副主席是不想让中央文革多管军队的事啊，那好，以后我就不看军队的文件了，也不稀罕顾问的头衔。敬宜呢？我最近又收到一封信，谈起敬宜的入党问题，真烦人。"林彪听出了江青的话里的挟制味道，不禁大怒。他，四野的统帅、常胜元帅、国防部部长，岂能受江青这样一个女人的奚落，顿时大喊："叶群，叶群！"叶群从未听过林彪有这么大的嗓门，大吃一惊，急忙赶过来。林彪指着江青说："叶群，你给我把江青请走。"说完就走进屋里去了。

林彪对江青每次都是非常客气，今天敢撵江青，也是看出中央文革小组数人被捕，势力大挫。叶群却比林彪想得更实际，亲不亲，一家人哩，江青可不是能得罪的。她一屁股坐到江青跟前，歉疚地解释："副统帅最近心情不好，听说王、关被捕，要我好几次给你打电话，肯定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是一个大胜利。江青同志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我好好向你学习……"江青的面子挣足了，也高兴起来了，对叶群说："有人又告你的状，我给撕了，不过你得早点找到证明人。"

江青走了以后，叶群对林彪说："我的那个事怎么办？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林彪摇摇头说："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又不能给你写证明。"叶群哭起来。林彪听得心烦，便说："关键是有权，有权就好说话，无权就不好说话。你怕什么，你要是担心的话，找找熟人，我也让吴法宪、杨成武给你写两个证明。"

吴法宪很快就写了个证明，现在就只差杨成武了。叶群打电话把杨成武请来。已是早春3月，毛家湾的林府里还烧着暖气，天气还冷哩。

林彪迎出来和杨成武握手，笑容可掬，让他在沙发上坐下，叶群端来了糖果，连说："请吃，快吃，到这里如同到家，还客气什么。"叶群让过茶水以后，给杨成武丢个笑脸："你们有公事，我就不打扰了。"说完翩然而去。

林彪看着杨成武局促的样子，解释说："今天请你来也没有什么大事，你不要紧张。主要是叶群的一点小事，她很早就入了党，也有当年经手人写的材料，但是还没有一个有影响的领导人写个证明，你不是同叶群挺熟吗，就请你写个证明吧。"

在林彪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举手之劳，甚至可以说是林彪在向他示宠。试想一下，杨成武为叶群写了入党时间的证明材料，林彪还不是对杨成武信任有加，他总不能对能证明叶群身份的人下手吧。但是杨成武这个人办事挺认真，

叶群自称入党是1936年，那年叶群在北平，杨成武则刚从江西长征到达陕北，怎么能证明叶群入了党呢？所以杨成武连连推辞："这不行，林总你知道，1936年我俩都在陕北，叶群同志还在北平，我怎么能证明她这时入了党呢？"

林彪不悦地站起来说："可是，叶群同志不是很快就到了延安了嘛，她的情况你当时就了解嘛，你不是常来我窑洞聊天吗？"杨成武还是不愿写："那只是听叶群同志自己说。"林彪听到这里，也就不再说了，看了杨成武几眼，似乎杨成武是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

杨成武从毛家湾出来，心里慌慌的，自己已经数次得罪了林彪，看来今后林彪不会给自己好脸子看，可是，这样做不正是尽职恪守吗？想到这里，杨成武心里坦然了许多。回到家里，他泡了一杯茶，准备放松放松，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他拿起电话，对方通知他，立即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有重要事情商议。杨成武顾不上休息，放下电话便驱车前往钓鱼台。

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寻找丢失的鲁迅手稿。原来这年年初，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报告原收藏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手稿丢失。鲁迅是中国的大文豪，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气。20世纪30年代，他写了许多杂文骂国民党，陈赓大将在苏区作战负伤后，曾去上海治伤，鲁迅先生还秘密会见了他，询问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许多情况，准备写一部反映红军斗争的小说，终因对苏区的生活不熟悉作罢。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鲁迅先生还曾给毛泽东发过贺电。毛泽东写文章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许广平本是20世纪20年代鲁迅任教于女师大时的学生。鲁迅逝世后，她继承丈夫的遗志，长期做着校订整理鲁迅遗稿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鲁迅原在城里住过的故居改建成鲁迅博物馆，鲁迅的手稿就收藏在那里。现在鲁迅手稿却突然不见了，这还了得，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恩来主持追查工作。

周恩来讲了事情的过程，宣读了主席的批示，便指定由杨成武负责追查手稿，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公安部长谢富治协助。杨成武挠挠头说："这到哪里去找啊！"周恩来鼓励说："想想办法，先从接触过手稿的人查起。"

杨成武叫来傅崇碧商量了一阵。傅崇碧对这方面的情况熟悉些，便提议："先去问问戚本禹，从那里肯定能得到线索。"原来傅崇碧经常接触中央文革的这帮人，见他们动不动就谈起文物字画，看来都挺在行的。鲁迅手稿藏在鲁迅博物馆，一般人怎么能拿走，当然是有权势的人才能拿走。当今最有权势的就是中央文革这些人。傅崇碧判定，手稿就在他们手中。

杨成武、傅崇碧一行到了秦城监狱，把戚本禹从狱里提出来。呀！才几天未见，戚本禹就憔悴成这个样子了。只见他身穿黑色囚服，胡子拉碴，弯腰驼背，一下子老了10岁。但是戚本禹的这副可怜相并没有引起傅崇碧的多少同情，他见过戚本禹在批斗大会上操纵造反派残害老干部，许多老干部想有特监那么一个相对有法制的地方躲躲还不可得呢。

傅崇碧看看杨成武，杨成武点点头："开始吧。"傅崇碧便亲自审讯："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戚本禹答道："是我取走了。"傅崇碧心里一喜，果然如此。他又追问："放在什么地方?"戚本禹答道："我交给中央文革了。"傅崇碧又问："谁让你取的?"戚本禹回答说："江青同志。"

手稿的下落总算搞清楚了，一切都不出傅崇碧所料。杨成武急忙拉了傅崇碧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听了报告，赞扬他们办案迅速，要他们抓紧时间破案。既然手稿已经有了下落，杨成武回军委去处理一些问题，把稿子取回的任务就由傅崇碧带人去完成。

手稿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里，要去拿稿子必须先通过江青。傅崇碧打电话到钓鱼台，江青不在，江青的女儿肖力（李讷）接了电话。傅崇碧打完电话，便和工作人员坐了两辆北京吉普车赶往钓鱼台。在钓鱼台门口，傅崇碧让车子停下来登记。按规定，傅崇碧的座车可以自由出入钓鱼台，但另一辆吉普车要登记。登记完毕，陈伯达从里面打来电话，傅崇碧的两台车可以进来。

傅崇碧驱车到了中央文革会议室楼口，同姚文元打了招呼进了会议室。一会儿，江青来到会议室，见会议室有 5 名军人，顿时冲傅崇碧喊道："傅崇碧，你竟敢带人冲击中央文革驻地。"傅崇碧莫名其妙地说："我是来汇报的呀。"江青冷冷地问："手稿在哪里?"傅崇碧说："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里，你把保密员叫来一问就可以知道。"保密员被叫来了，江青命令他："傅司令员有话问你，你不要胡说。"保密员说："是。"傅崇碧就问他："鲁迅的手稿是在你那里吗?"保密员说："是啊，在我那里，整整 4 大箱，保存得好好的。"

闹了半天，江青就是贼。江青恼羞成怒，大骂保密员是大坏蛋，命令士兵把他抓起来，随后命令人把箱子抬下来。整整 4 只箱子，打开一看，全是鲁迅手稿。傅崇碧当众把 4 只箱子封起来，又放回中央文革保密室，随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报告毛泽东，鲁迅手稿找到了，经封存后又放回中央文革保密室了。

江青当众出丑，岂能善罢甘休，再说，她早想搬掉傅崇碧。她把杨成武找到钓鱼台，气冲冲地命令道："傅崇碧带人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下去中央文革的安全都没有保证了，你去批卫戍区，批傅崇碧。"杨成武想，不就是傅崇碧当众捉住了你的贼手，你要整傅崇碧嘛，便顶了一句："不行啊，我和卫戍区隔着几层，不能越过北京军区直接去批卫戍区。"江青一点也不退让："你是代总长，你去!"杨成武也火了："我不去，我没有下命令冲。"

江青听惯了恭维话，哪里受得了这口气。杨成武走后，她脚一跺，便去找林彪了，两个人密谋了很久……

3 月 23 日凌晨，这又是一个多事的凌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用电话把空军政委余立金叫醒，通知他到家里来一下，有要事相商。两天前，吴法宪曾对余立金说："我在军委办事组忙得很，空军的事情主要靠你了，有些事不用请示我，该办的、能办的你就办了。"

余立金却不敢擅自做主，正好趁此可以向他请示一些问题。

余立金和吴法宪的两栋小楼都位于北京京西宾馆跟前的空军大院的首长住区内，相距不到50米，余立金就没有叫秘书和警卫员跟着。快到吴法宪家时，突然冲出4名军人，用手电照住他的眼，麻利地给他戴上手铐，推进吴法宪家的客厅里。吴法宪在灯光下左瞧瞧，右瞧瞧，嘲笑地问："余立金，你的神气劲哪去了?"余立金大声抗议："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吴法宪冷笑两声说："晚了，我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逮捕大叛徒余立金。"

在余立金被捕的同时，一队军官来到警卫杨成武住处的部队营房，宣布紧急集合，立即开拔的命令。警卫部队以夜间紧急集合姿态开到景山开始休息。警卫部队开走后，一连部队又开进来。不过他们可不是接防来的，而是逮捕杨成武来的。部队开进来，立即把前后厅、楼梯口封锁了，所有的服务人员和家人都集中在客厅里。

杨成武吃了安眠药已经入睡，根本没有觉察到这场飞来横祸。他被人从睡梦中推醒，睁眼一看，床前站着邱会作和李作鹏。见他醒来，李作鹏命令道："快起来，穿上衣服，跟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说是去开会，后面却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杨成武以为发生了武装政变，训斥邱会作、李作鹏："你们要有点党性，不要当骗子。"邱、李也不说话，跟着杨成武走下楼来，朝人民大会堂驶去。

这时，北京卫戍区80多名团以上干部已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等待林彪和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接见。傅崇碧接到通知，也赶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卫戍区主要干部齐集这里不禁有些奇怪。这时，周恩来走过来，招呼傅崇碧说："你到这儿来。"傅崇碧料想自己要出事了。果然，他们刚坐好，林彪走进来宣布："现在宣布中央决定，调傅崇碧同志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说完，立即走了出去。

傅崇碧明白，这是明升暗降，说不定比这更糟糕。小会议厅里只有他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两人相对无言，都在等待着什么。

周恩来随林彪接见了北京卫戍区干部后回到了小会议厅，服务员端来几碗面条，周恩来端给傅崇碧一碗："吃吧，吃饱了好走路。"傅崇碧不满地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就这么调了我的工作。"周恩来也不说话，温和地看着傅崇碧，似乎在说：有什么委屈就对我说吧。傅崇碧看到周恩来把筷子在面碗里搅来搅去，无情无绪的样子，知道周恩来也为他的调职而难过，总理太难了，不能再让他作难了。

想到这里，傅崇碧站起来问："总理，我可以走了吗?"周恩来点点头说："走吧，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党，相信人民。"说完，他紧紧地握住傅崇碧的手，使劲地晃了几下。

傅崇碧出了人民大会堂，坐进轿车，两位高大的军人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

间，轿车飞快地朝机场驶去。

傅崇碧前脚刚走，杨成武后脚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周恩来、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都坐在沙发上。杨成武被押进来刚坐下，林彪就宣布："由于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要排挤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勾结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夺谢富治的权，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一切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林彪刚讲完，江青、陈伯达等人就一拥而上，大骂杨成武。他们骂足了，叫来士兵把杨成武押走。杨成武坐车到了机场，立即被押上一架飞机，飞到武汉，又坐车到了东湖宾馆，不过可不是住客房，杨成武被押到地下室关起来。

傅崇碧飞到沈阳后，被送到一所小楼，这里照样有秘书、警卫员，不同的是他们的任务不是为傅崇碧提供服务，而是看着他不许下楼。过了六七天，才有一位老军人来看他，傅崇碧一见来人，顿时欢欣异常。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回 林彪改军委密结集团 江青当阎王请吃烧酒

话说傅崇碧被押送到沈阳后，被关在一栋小楼里，不许下楼。六七天过去了，忽然一位老军人来访，傅崇碧心里一喜，原来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老战友。老军人坐下就掏出一张傅崇碧和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的合影照片，指着照片上的几位老帅劝道："老傅，你只要对他们反戈一击，马上就可以出来工作。"傅崇碧冷笑两声，原来是叫他害人来的。他讥讽地说："我不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吗？怎么还有个出来工作的问题？"老军人气恼地说："我是为你着想，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傅崇碧发火了，撕开衣服，指着朝鲜战场上留下的枪伤说："小子，往这儿打，当年美国人、日本人、蒋介石没打死我，你来打死我吧。"老军人气得说不出话来，指着傅崇碧的鼻子"你……你……"了一阵就走了。

老军人同北京派来的人向林彪汇报了谈话的经过。傅崇碧名义上是调任，林彪和江青还不能把他怎么样。依着江青的意思，是要把傅崇碧整死的，但林彪却另有想法，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江青不好硬插手，也只好作罢。

那么，林彪有什么想法呢？原来他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有了看法。

杨、余、傅被打倒后，林彪和江青分享了胜利的果实。"二月怀仁堂抗争"事件发生后，徐、陈、叶、聂被剥夺了军委领导权，他们的职务虽然没有取消，但军委日常工作由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领导。先是 1967 年 8 月 17 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看守小组，这个小组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 4 人组成，吴法宪总负其责，林彪完全控制了军委。不料，一个月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改组军委看守小组，组建军委办事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林彪不久又把李作鹏塞进办事组。杨成武也可算是红一军团的老人了，林彪着意拉拢，不料杨成武软硬不吃，不上贼船，这对于林彪是个很大的威胁，林彪这才下决心去掉杨成武，改组军委办事组，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任命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为组员。

黄永胜可算是林彪的基本干部，从井冈山时期就在红一军团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率部队来到东北，在林彪指挥下作战，是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与林彪关系特别密切。林彪南下视察，他都要从广州专门跑来迎接。杨成武一倒台，林彪特意把他从广州军区司令员任上调来任总参谋长。李作鹏是原红一军

团干部，新中国成立前是四野43军军长，吴法宪、邱会作也都是四野出身的干部。黄、吴、叶、李、邱不仅与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而且一直与林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与林彪结成了一个军事小集团，现在军委办事组完全由这个小集团包了，成了林彪的一统天下，林彪总算如愿以偿了。

在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江青突然向黄永胜发火："你们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向我封锁消息？你们变更军政部署，为什么不向我报告？难道中央文革就不能管军队的事吗？"江青的话不仅让黄永胜吃了一惊，也让周恩来吃了一惊。江青有什么权力指挥军队？她这是要夺军权嘛。黄永胜一是有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二是有林彪做后台，不软不硬地顶了她一句："江青同志，你误会了，我们这是按主席的批示办。主席指示军队的事只报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江青没想到黄永胜竟敢顶嘴，勃然大怒："你还嘴硬，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和吴法宪不准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你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的事取消。由总理、康老、文元和你们谈话，清理思想。"众人吃了一惊，江青一不是政治局委员，二不是政治局常委，居然对总理、康生下起命令来了，好像周、康二人不是政治局常委，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员似的。

林彪、叶群得到黄永胜的报告后，又惊又气，叶群连连问林彪："一〇一，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怎么办？你该出来讲讲话呀。"林彪没有说话，沉着脸回到自己那间神秘的卧室里。叶群等了半天，不见林彪出来，急忙推门去问。林彪只说了一句话："一动不如一静。"叶群不得要领，又催问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林彪诡秘地招招手："你过来，我给你解释……"

原来林彪已看准了，江青这次非吃亏不可。黄永胜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是早已通知了阿方的，阿方已作了充分的准备，黄永胜若违约不去，那阿方就会提出抗议。这是国际交往的大事，岂可因江青的一句话就变更。周恩来是主管外交的，他肯定会把此事报告毛泽东。江青在国内胡闹可以，如果闹到国际上，影响了毛泽东的部署，毛泽东是要发脾气的。所以与其出去和江青对着干，还不如静坐观变。

林彪看得还真不错，迫于外交礼仪，周恩来不得不去找毛泽东："主席，黄永胜去阿尔巴尼亚访问一事已通知了阿方，行期在即。江青同志忽然提出取消黄永胜出访，主席的意见是……"周恩来没有把话说完，毛泽东已有不悦之色，周恩来讲了事情的经过后，毛泽东果断地指示："江青，不要理她。"

周恩来把黄永胜找来，告诉他："出访日期不变。江青同志那里你们也要解释解释，消除误会，我带你们去见江青同志，去了慢慢讲。"周恩来带着黄永胜、吴法宪到了钓鱼台。江青明白他们是负荆请罪来了，但仍不依不饶地训斥他们："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中央，目无中央文革，这样下去还得了，啊？"江青训完了，周恩来问黄永胜："你们很快就要出访了，准备好了没有？"黄永胜赶紧接上话茬："准备好了，不知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没有？"江青"噢"了一声，闹了半天，她的话一点也没有用，黄永胜还是要走啊。她冷笑两声说：

“你走吧，中央文革管不了你的事。”果然，黄永胜出访时，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去机场欢送。阿方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接待上也就有些保留。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中央文革没有人去机场，很是恼怒，立即把周恩来找来，吩咐他说：“江青不像话，要开江青的会，叫她作检讨，马上就开。”

中央常委碰头会结束后，黄永胜立即打电话给叶群：“主任，江青挨主席批了。”叶群说：“你来一下，亲自向首长汇报吧。”说完，走进林彪的房间说：“你看得真准，江青这次可是碰了个大钉子，我已经通知黄永胜亲自向你来汇报。”林彪点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少见的笑容，欣慰地说：“黄永胜就是比胖子强，这次顶得好，没有辜负我的培养，是个人才，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叶群奉承说：“你选的人嘛，那还有错。不光是黄永胜，吴、李、邱三人也都是忠心耿耿，说一不二。”

林彪和叶群有一女一子。女儿名林立衡，林彪叫她豆豆。儿子名林立果，林彪叫他老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和叶群一商量，决定把豆豆和老虎放出去锻炼锻炼，让他们见见世面，好将来为官做宦，继承父业。这个任务当然是交给亲信吴法宪了。吴法宪巴不得多为林家做点事，便提出让林立衡和林立果到上海空军去锻炼，由上海空军政委江腾蛟负责照顾，叶群立即表示同意。原来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蹲点搞社教时，江腾蛟就常携厚礼来探望，叶群也就格外对他热情，从此江腾蛟就与林府挂上了钩。

豆豆、老虎到上海后，江腾蛟看林立衡身体瘦弱，就把她安排进了杭州空军疗养院，由杭州空军驻军负责人陈励耘照顾她；把林立果留在自己身边，让他结交沪杭空军将领，熟悉沪杭空军部署，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曲意巴结。林立果从小在林彪身边长大，熟悉上层，极力了解军队情况，物色干部，组成自己的势力，以便将来掌权之用。

林立果在沪杭锻炼一年多，吴法宪又把林立果调到空军司令部，让他到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同时又指定办公室的两位处长王飞、周宇驰协助他，林立果顿时成为空军司令部的特殊人物。他身无一官，但是吴法宪却还要经常向他请示工作。林立果异常骄横，尽力在空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黄、吴、叶、李、邱的这些异常动作自然逃不过江青的眼睛，但她上次挨批后，自知现在还不是夺取军权的时候，现在的头等任务还是打倒刘少奇，于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刘少奇专案上来。

刘少奇这时已处于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的非人待遇中。还在上一年，也就是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开始被中南海的一些人批斗。这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00万人的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中南海的一些人就在刘少奇家的院子里批斗他，以呼应广场上的大批判。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大汉反扭双臂，推搡到院子里，把他们的头使劲地朝下按，坐喷气式。刘少奇挣扎着不愿低头，立即遭到脚踢拳打；他们的几个孩子也被人押着在旁观看，最小的孩子小小看着凶暴的人群怒吼着扭打自己的父母，吓得大哭起来，拼命逃跑，马上被人抓

住。刘少奇较大的一个孩子源源勇敢地推开那些打手，把小小抱过来，看着那些打手行凶。

刘少奇这时已被打得鼻青脸肿，腿被打伤，鞋被打掉。王光美挣脱打手，扑向刘少奇，紧紧地拉起刘少奇的手。有人把他们冲开，但两双手又紧紧地拉在一起。刘少奇、王光美手拉手对视着，用目光互道永别。一个人冲过来，把一幅漫画套在刘少奇脖子上，从旁边看去，刘少奇套在绞索里，红卫兵的拳头和笔尖正好对着他的头。

批斗完了，刘少奇被推回他的办公室。他按铃叫来了机要秘书，这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国家主席的权力。秘书进来后，刘少奇吩咐他："我抗议对我的这种批斗，你把我的意见记下来反映上去。"他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着"国家主席"那一条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维护宪法的尊严，要罢免我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使我是一个公民，判的罪也要由司法机构来执行，我抗议这种践踏宪法的行为。"秘书当即写好汇报上去。第二天，刘少奇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抗议对他的迫害，正式提出辞去国家主席，声明"我已失去自由"。

刘少奇的这封信转到江青那里，江青看了看，冷笑着把信撕得粉碎，扔在电炉上烧了。

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自由。武装战士在门里门外站满了岗，刘少奇只能住在前院，王光美和孩子们只能住在后院。王光美被强迫背砖劳动。刘少奇没有人照顾，每当去食堂时只能自己扶着窗台蹭着移动。这天，刘少奇又弯着腰，扶着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扶着墙挪动着。忽然，他感觉有人在看他，抬起头一看，原来是3个孩子满眼热泪地远远望着他。刘少奇心碎了，家破人伤，周围都是仇恨的目光，孩子们是多难过啊！不，要挺起来，不能让孩子们看着他这个样子而难过！刘少奇苦笑着放开双手，想伸直打伤的腰，一阵剧烈的疼痛反使他跌坐在地上。孩子们看见，顿时哭喊着"爸爸"。看守人员呵斥道："哭什么，回去。"过了几天，一辆卡车来到刘少奇家的后院，把他的孩子们抓上汽车，赶出了中南海。这天晚上，一队武装士兵坐着吉普车又闯到刘少奇的后院，为首的军官对王光美宣布："王光美，你被逮捕了。"旁边的两个士兵立即给她戴上手铐，押上了吉普车。

从那时以来到现在，也就是1968年的仲夏，刘少奇因备受精神、身体的摧残，已衰弱不堪。这天起来，他穿衣服，因手臂被打坏，一件衣服穿了一个小时。中午，他到食堂去打饭。从住房到食堂只有30米，刘少奇扶着墙，足足蹭了50分钟才挪进食堂。食堂工作人员看到刘少奇来打饭，先呼喊了一阵口号："打倒刘少奇！"然后才把剩菜剩饭打给他，刘少奇端着饭，在食堂里坐下来，他的手不听使唤，把米饭弄得满头满脸都是。

到了晚上，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来，监守报告了上面。20多分钟后，立刻有一队医生、护士赶来抢救。要是往日，刘少奇看病，医生总是先用听诊器把

他打几下，喊一阵“打倒刘少奇”才开始给他看，刘少奇拿了药，护士一边用针头在他身上乱扎，一边恶狠狠地骂：“扎死你个赫鲁晓夫。”但此时来的这些医生、护士不一样，不喊口号，不打人，认真看病，认真打针。监守不满地责备道：“你们对刘少奇还蛮有感情的嘛。”带医生来的一个干部板下脸，训斥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快滚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很好地监护刘少奇，他要出了问题，我要你的脑袋。”监守碰了个钉子，赶快退到一边。医生、护士看完了病后，负责干部又留下一名医生在这里守诊，其他人都走了。

监守不明白上面为什么变得对刘少奇这么关心起来。人走了，他向留下的医生提出了这个疑问。医生拍拍他的肩说：“老兄，看来你是不懂。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要让他活着看到他被开除出党。”监守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也就适当地给了刘少奇一点方便，刘少奇瘫在床上，一天天地挨日子。

要开刘少奇的会了，江青一方面派人给刘少奇治病，让他不要在会前死去，一方面亲自指挥督促刘少奇专案组加紧逼供，一定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把王光美定成特务。在此之前，他们已把肝癌末期的原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张重一教授抓进监狱，逼他证明王光美是特务。张重一被关进监狱 27 天即死去。在 27 天中，江青、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这位垂死的老人突审 21 次。张重一教授不想陷害王光美，江青骂他是“花岗岩脑袋”，命令突审。在阴森恐怖的审讯室里，张重一因病疼得在床上乱滚，突审的人围住他的床大声喝问，见他实在不行了，命令医生输液抢救，在抢救时又突审。张重一回答着呻吟着，始终没有乱供“王光美是特务”。但是江青把这些语无伦次的话经过加工，把它变成了证明王光美是特务的口供。到了 1968 年春夏，江青更着急了。为了拿到稍微像样点的材料，她命令把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抓起来突审，逼他指认刘少奇是叛徒。王世英是 1925 年入党的老革命，一口拒绝专案组的要求：“你们要的东西我写不出来。”专案人员狠揍他，问他“写不写?”王世英愤怒地反抗道：“枪毙我也不写。”专案人员恶狠狠地冷笑说：“我们偏不让你死，要让你活受罪。”

专案组向江青报告了王世英拒不写材料的情况，江青呼地站起来指着他们的鼻子问：“他不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狠狠地斗，集中大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死就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这些专案人员已是够狠毒的了，但对江青这蛇蝎一般的狠毒心肠也感到头皮发麻，看江青说“阎王请他吃烧酒”时，咬牙切齿，满眼凶光，十足是一个女阎王。在江青的威逼下，专案组对王世英日夜不停，轮番逼供，终于使他死在狱中。

张重一、王世英都被江青“请吃烧酒”去了，崔月犁又接到了阎王“请吃烧酒”的请柬。崔月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是地下市委书记刘仁的副手。当时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这是美国出资办的一所教会学校，特别重视英语的教学，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很高。当时叶剑英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在北平军调部工作，因为要和美国军调代表打交道，特别需要英文翻译，

崔月犁就介绍王光美去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的英语翻译。由于有了这段历史，崔月犁被江青请去“吃烧酒”。

崔月犁被铐到审讯室里，只见灯光幽暗，阴森可怖，四五个大汉站在周围，个个狰狞凶狠。主审者拍一下桌子，喝问道：“崔月犁，你老实说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在什么地方?”崔月犁回答：“不知道。”主审者又问：“东四六条门牌有多少号?”崔月犁平常也不留心这些，只好回答：“不知道。”主审者冷笑一声：“请他吃烧酒。”几个大汉扑上来对他一顿狠揍，一边打，一边命令崔月犁数数。崔月犁无奈，从1数起，数到38，这些人命令：“停下。”主审者冷笑一声：“好，你终于供出来了，美国特务机关在东四六条38号。我再问你，你和杨承柞是怎样指使王光美打入军调部的?”崔月犁绝望地说：“我不认识杨承柞。王光美到军调部，那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哪里是把特务拉入党内。”主审者一拍桌子：“死到临头，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请他吃烧酒!”大汉们又一拥而上，把崔月犁打倒在地，主审者命令：“背百家姓，不背，还有更厉害的烧酒。”崔月犁只好背起百家姓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蒋沈韩杨……”刚背到“杨”，主审者就命令：“停！你承认认识杨承柞，知道杨承柞是怎样介绍王光美做特务的。你是怎样指使王光美打入军调部的?”崔月犁连喊：“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主审者努努嘴说“……他烧酒还没有吃够，再请他吃烈性的。”那些打手一拥而上，脚踢拳打，一个人猛踢他的下巴骨，崔月犁一阵剧疼，不觉昏死过去。

江青不断地“请吃烧酒”，伪证也就不断地制造出来。江青对“请吃烧酒”的成绩很满意，不断地在材料上批示督促。这天，她接见中国京剧团等演她剽窃他人作品搞的“样板戏”的演员们时自我吹嘘道：“你们不知道啊，我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你们的啊。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我还得重挑，还得重弄。我憎恨，我愤怒。我告诉你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啊，终于搞清了，刘少奇是个大反革命啊!”

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搞好后，林彪拿去审阅，9月20日，他给江青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结论，“向出色的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收到林彪的信，自然是非常得意。不料，她突然接到报告，10月5日上午，刘少奇突然大哭起来，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会不会是有人向刘少奇露了风，如果这样，刘少奇万一愤而绝食什么的，那大会上就没有了靶子，安排好的计划就要出现漏洞，主席责怪下来如何了得。江青下令彻查是谁透的风。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一回 陈少敏独作骇世举 张志新勇为真理言

话说1968年10月，江青得到报告，说刘少奇在10月5日大哭一场。江青怀疑有人给刘少奇透露了风声，下令彻查，查来查去，并没有查出什么。正在查的时候，刘少奇当天又大哭一场。一天之内，大哭两场，经监守报告，原来是刘少奇痛哭国家遭到浩劫，法制遭到践踏，人民遭受苦难。江青掌握了这些情况后，知道刘少奇没有听到要开他的会的半点消息，这才放了心。她心里非常痛快，几十年的气一下子出了，还能不痛快。她下令专案组加紧起草文件，准备向扩大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已有71%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现在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只有40人，不到全部中央委员97人的一半。不到法定人数，只好“扩大”，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都被“扩”了进来。既然是名正言顺扩进来的，那就不是旁听、列席，而是正式会议成员，都有表决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叶群、吴法宪这些“文革”新贵，不仅被“扩”了进来，还都成为会议分组的各组长，领导中央委员，真乃荒唐至极。

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之时，全国形势已有了新的变化。自1967年1月上海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以来，历经两年的努力，全国除台湾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央的指示，大批解放军军管了各个要害部门。1968年中央又决定把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个单位，工宣队和军宣队联合管理各基层单位。红卫兵运动已落下帷幕，各大学学生都已经有许多“毕业”，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军队农场和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学生该“毕业”的也都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被动员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北京火车站每天都挤满了去黑龙江、内蒙古农牧区插队落户的中学生。每当知识青年的列车开动之时，车上和站台上一片哭喊之声。但不论怎样，“文革”初期那种乱哄哄的现象已没有了，城市恢复了平静。那些过去毛泽东不喜欢的大干部，死的死、关的关。刘少奇危在旦夕，邓小平在家软禁。毛泽东想打倒的都打倒了，想提拔的都提拔了，按说是“形势大好”，但是毛泽东却并不是很高兴。他已感觉到全国人民对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怀着深深

的不满，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对此怀有深深的忧虑，如果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人们否定，被历史抛弃，那将是他一世英名的莫大遗憾。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不是喜气洋洋地祝贺胜利，而是首先要求大家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扩大全会的与会者自然明白主席的苦心，马上通过决议，一致赞同毛主席的意见，肯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虽然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决议，但毛泽东心里并不踏实，以后又不断提起这件事，而且调门一再降低，从“完全是必要的”降到三七开，这且不说了。

且说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到最后一天，也就是 10 月 31 日，开始表决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表决的方式是举手表决，谁如果不同意，那么立即会被发现。在这样的气氛中，谁还敢不举手呢？自然是要一致通过了，不料，有一位中央委员就没有举手，这位中委的名字叫陈少敏。

陈少敏是什么人？提起她的名字来，无人不晓。战争年代，她曾直接领导一个地区的工作和武装斗争，腰佩短枪，威震敌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工会工作，先后担任过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第八届中央委员，是正部长级干部。像她这样功劳大、资格老、职务高的女高级干部在全党还是不多的。

陈少敏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满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一开始，她就对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分组会上围攻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不满，不同意在会上点名批判朱德、陈云、邓子恢。康生注意到了陈少敏的不满情绪，特意把她找到自己在会议的住处谈话。一开始，康生对她非常热情，招待甚周，亲手把一杯香茗递给她：“少敏，喝一杯香茶，先消消火。”陈少敏接过茶杯，喝了一口。康生点燃一支香烟悠然自得地吸了几口。他相信，凭着自己的智谋和手腕，收降一个女干部易如反掌。

康生故作亲切地向陈少敏跟前挪挪，关心地问：“少敏，你来开会，家里都安排好了吗？孩子们都好吗？”陈少敏点点头说：“谢谢康老，孩子们都好。该下乡的都下乡了。”康生“噢”了一声，叮嘱说：“那你得多关心关心，儿走千里母担忧啊。”陈少敏没有说话。康生又说：“咱们都得向主席学习，为了革命，主席献出了多少亲人，在朝鲜战争中，毛岸英同志又光荣捐躯。”陈少敏眼圈红了。康生趁热打铁说：“现在主席这么大年纪，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还不是为了防修反修，让咱们不吃二遍苦，你要理解主席的苦心才是。”康生停下来喝口茶，似为诚恳地说：“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是刘少奇的余毒作怪，不应算在文化大革命的账上。只要把刘少奇的余毒肃清了，这些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所以你得对开除刘少奇党籍有个正确态度

啊。”陈少敏还是不做声。康生问了三次，她还是不表态。康生火了，批评道：“陈少敏，你不要执迷不悟，你要想想这样做的后果。你说，你对开除刘少奇是个什么态度?”陈少敏抱住头说：“康老，你让我回去想想。”康生说：“回去好好想想，一定要想通，我可是为你好啊。”

10 月 31 日，大会开始对开除刘少奇的决议进行表决。康生环视会场，只见会场上的人们都举起了手，特别是那些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们，一个个都把手举得高高的，唯恐主席台上的人看不见。只有陈少敏把右手压在胸前，全身扑在桌子上。康生再一次提醒大家，实际上是提醒陈少敏：“注意，现在开始计票。”但陈少敏动也不动，实际上是投了反对票。可是大会宣布的结果却是“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表决结束后，康生把陈少敏叫到自己的住处，恶狠狠地问她：“我给你打招呼了，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理直气壮地答道：“这是我的权利。”康生冷笑两声：“权利？你真是不可救药，你走吧。”

全会结束后，陈少敏回到家里，把孩子们召到一起，心情沉重地说：“孩子们，我最近可能要被捕。你们记住，我被捕是因为在全会上没有投票。我被捕后你们要好好想办法活下去。”

当天深夜，两辆吉普车开到陈少敏的住所前，从车上下来几个军人，敲陈少敏家的门。陈少敏问道：“谁?”来人答道：“查户口的。”陈少敏明白了，打开门，伸出双手说：“请吧。”那些人也不说话，给她戴上手铐押走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了，刘少奇并不知道他已被开除出党，相反，监守人员奉命严密封锁消息，任何人都不得透露此事。何时通知，由上面决定。原来江青已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日子让刘少奇知道这件事。11 月 24 日，这已是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整整 24 天的日子。一早来了几个专案组的干部，他们进了刘少奇的房间，看看刘少奇的病情，但并不问一句话。最后其中的一人大声命令监守，实际是说给刘少奇听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你们要加紧监视，不得出半点问题。”刘少奇一听，急问：“什么？你们说什么?”那些人看看在床上挣扎的刘少奇，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刘少奇顿时气得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吐血。他看看墙上挂的日历，猛然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他顿时明白，这些人是专门来给自己传递这个消息从精神上再进一步折磨自己的，不禁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监守看到刘少奇大叫一声，忙唤来医生。一量血压，血压竟达到 260/130，体温升到 40℃。医生简单地抢救了一下，刘少奇醒过来了。监守问他：“你听清楚刚才中央来人的话吗?”刘少奇睁着眼，一句话都不说。医生问他：“你感觉怎么样?”刘少奇还是一句话都不说。从此以后，刘少奇一句话也不再说了，用沉默表示抗议。

邓小平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 5 个孩子都被赶走了，家里只剩下他和夫人卓琳、继母夏培根 3 人。长子邓朴方原在北大读书，“文革”一起，在北大被学

生摔下楼，导致伤残，此时尚在医院中。

陶铸呢，他自从被揪出以后，一直被监禁在家，不时遭到中南海造反派的批斗，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每天被监守押送到中南海西门看大字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他被认为是“黑后台”，被中南海造反派揪出去批斗，他的夫人曾志也被人把胳膊往后一扭押去陪斗，直到很晚才回来。他们一进家，发现房里一片凌乱，箱子被撬开，柜子被砸开，所有私人的照片、信件、笔记本都被查抄一空，衣服、用品扔得满地都是。陶铸和曾志淡漠地看着大抄后的破家，懒得去收拾。

当夜，屋外一阵吵闹，一队警卫战士喊叫着冲过来。队长问陶铸：“是什么人在爬墙?”陶铸是听到了吵闹声，但他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人在爬墙。警卫煞有介事地喝问陶铸的随从：“院子那边就是春藕斋，主席常来这里散步，要出了问题还了得!”随后他命令增加监守，由原来的4个人增加到一个班，接着一个电工赶来给陶铸的睡床上方装了一个大电灯泡，陶铸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床顶上方装这么大的灯，这不浪费电嘛。

陶铸住所（准确地说是监所）晚上有人爬墙，威胁到春藕斋安全的消息被传播出去了。下午冲来一群中南海造反派批斗陶铸，他们按住陶铸的头，让他坐喷气式。陶铸却不愿意低头，挣扎着把头往上抬。造反派见他如此倔犟，从背后给他一拳。陶铸猛地挣脱束缚，扭头怒斥打人者：“你敢动手打人!”造反派仗着人多，又打陶铸，哪里还有什么顾忌，对陶铸又是几拳，打得陶铸口里流血，边打还边骂：“就打你个狗陶铸，你怎么着。”陶铸把一口血水吐在打人者脸上，怒吼着：“你才是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孙子。你们敢放开手，老子就敢跟你拼。”造反派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厉害的反抗，不禁有些胆怯。挨了骂，又不敢把陶铸打死，他们只好自认晦气，灰溜溜地走了。

江青1968年3月得知此事后，下令加强监守，一天24小时都不能离开人。对陶铸的监视骤然升级，来了两个班的士兵分成几班，日夜监管。无论什么时候，陶铸的身边总有3个武装士兵在监视着。一个站在门口，一个站在屋中，一个就紧贴着陶铸，像影子一样跟在他的身边，使陶铸每时每刻都处在严重的敌意之中。这是阎王江青新发明的一种精神折磨法，使你的精神没有一刻放松的时候。入夜了，一切进入黑暗，在陶铸看来总可以休息一下了吧。不，这时，监管士兵把屋子的灯打开了，也把安在陶铸睡床上方的灯打开了，耀眼的灯光刺激得陶铸根本无法入睡，“影子”又贴在床头嬉笑打闹。随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百万人批斗刘、邓、陶大会，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也在家里遭到批斗。回来以后，陶铸就头昏眼花、呕吐，但没有人给他诊治，过了好长时间一检查，发现陶铸竟患了癌症。

那些在特监里的特犯虽然有了一个暂时休息的囚室，但他们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审讯，每次批斗审讯总是被毒打一顿。

首先说说彭德怀吧。他自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一直在挂甲屯隐居。

1965 年 8 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一个月后，毛泽东办公室来了电话，通知彭德怀到人民大会堂去。彭德怀放下电话，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离开政坛 6 年了，6 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重新出来工作，但他明白，这只是个难圆的梦。但是，现在这个梦马上就要圆了，他怎能不欣喜流泪呢?

彭德怀刮了胡子，换上了整洁的制服，坐着“红旗”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彭真告诉他，中央决定他去成都任“大三线”副总指挥。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打来电话，约他到中南海来见面。

自庐山一别，转眼 6 年。6 年之后又要与主席重逢，彭德怀真是万分高兴，他的秘书、司机也都喜气洋洋，都以为是熬出头来了，要重见天日了。

车子在丰泽园门口停下来，警卫战士立正向他行庄严的军礼，彭德怀也举手还礼，手竟因激动而有些发颤。他进了丰泽园，毛泽东已站在颐年堂门前迎候着他。彭德怀几步跨过去，握住毛主席伸过来的手，两位老战友互相端详着，几十年征战打江山的历史在他们脑海里一幕幕闪过，两人都激动不已，半天说不上话来。

还是毛泽东打破了沉默：“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儿等着，你终于来了，请!”

两人一坐下，毛泽东埋怨起彭德怀来了：“老彭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来电话，也不写信? 这不好嘛。你有什么话应该给我说嘛，像在庐山一样骂娘也行啊。”彭德怀解释说：“我是想着主席忙，我又没有工作……”毛泽东插话说：“工作的事，中央已研究了。现在苏修在边界开始增兵，越南是炮火连天，东南沿海不平静，老蒋总想反攻大陆，要准备打仗啊。中央决定在西南加紧建设后方军火生产基地，你去担任副总指挥吧，将来打仗了还可以带兵去打仗。”

彭德怀担忧地说：“主席，我去西南。只是我这灰头土脸的样子怕做不好工作。”毛泽东点点头说：“你说的也是，中央发个通知，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对你看来是批评过了一点，等几年再给你纠偏吧，你自己也要振作起来噢。”

两人正说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来了，刘少奇紧紧地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 主席一直记着你，我们都希望你振作起来!”邓小平也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你去西南好好干吧，为人民立新功。”

从中南海回来没有多长时间，彭德怀就去了西南就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他在那里工作没有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1966 年 12 月，江青、戚本禹亲自指挥北航红旗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去成都揪彭德怀。周恩来知道后，怕彭德怀落在红卫兵手里，命令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随护彭德怀到了北京，由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出马，安排在特别监狱里。

特监里也不是世外桃源，彭德怀经常被拉出去批斗，肋骨打断、胳膊拧坏，胸部闷疼，回到监所后才能得到数天的休息。

第七十一回　陈少敏独作骇世举　张志新勇为真理言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彭德怀得知刘少奇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不禁百感丛生，心中暗想，老夫怕是不能活着走出特监了。

现在再来看看贺龙吧，贺龙被关进特监以后，周恩来坚持准许他的夫人薛明在特监陪伴。由于心情不愉快，生活条件差，贺龙得了糖尿病。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成了囚犯，常常悲愤地拍墙大骂林彪："你这个害人的三连连长，你为什么不让别人革命呢？你为什么要整人呢？"傅崇碧在时，警卫部队对他比较照顾，傅崇碧被押往沈阳后，警卫部队也换了。林彪、江青指使专案组加紧对贺龙的迫害，贺龙病情严重恶化，想喝碗水都不给。薛明也被他们撵走了。

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谭震林虽然没有被打倒，但处境也很困难。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被打成反党集团，分组揭批。聂荣臻被弄得发了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刘伯承因身体不好也住在这里。两人见了面，刘伯承叹口气说："老兄，这下你可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去了。"叶剑英想来医院探望，没有得到批准。叶剑英只好打电话给聂荣臻的夫人表示慰问。周恩来得知三老四帅被整得很紧张，在一份简报上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1969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黄永胜、吴法宪被林彪派来向"三老四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每传达完一个，便又传达林彪的指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三老四帅'）把身体搞好，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这年 4 月召开九大。毛泽东坚持"三老四帅"都要进中央，那当然都要当代表了。陈毅被分在上海选区。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阵子鬼，上海便给陈毅寄来了履历表，并附有一信。信中说："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几十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急速退回。"

秘书看了来信气得要撕，陈毅挡住他说："且慢。"他拿过信看看，轻蔑地说："既然今天上海选我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那说明我陈毅还有一点代表性嘛，却之不恭。"

林彪、江青这么整老干部，激怒了人民，人民用种种巧妙的办法同他们斗争。张春桥把陈毅作为右的代表。但陈毅因指挥过解放上海的大战役，又担任过上海市长和军管会主任，在上海人民中威信极高。张春桥、王洪文在会上骂陈毅，人民群众就会下大讲陈毅战功赫赫，文武双全，陈毅揭露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的，是陈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毛泽东请回来的等等。静安区一个党员在小组会上攻击"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立即被群起而攻之，挨训达 3 个小时。其他一些老同志也都受到上海人民的拥戴。张春桥们要批朱德，许多工人说"我从小就知道朱德的扁担（红军时期，朱德经常与战士一起从外挑粮进山。为了防止战士们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不让他挑粮，朱德特地在自己的扁担上刻上名字。这个真实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入

小学课本)。”张春桥们要攻击聂荣臻，上海许多知识分子、工人就说“聂荣臻乃是一贯正确的”。弄得张春桥们没有办法，干脆抛开党组织，按着造反派组织系统（即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往下传达。

全国很多党员和群众也都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主动起来和林彪斗争。1969年1月，东北盘锦大地上出了个敢和林彪、江青对着干的大英雄，她的名字叫张志新，是个俊秀的青年妇女。张志新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原是中共辽宁省委文艺处的干部。“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她也跟着热血沸腾过一阵，但不久就发现了问题。那些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怎么一下子都成了罪人，国家大乱到底是谁在搞鬼，为什么法制全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重大的损失。她想来想去，觉得这里面有鬼。她对人说：“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可靠吗？对江青、叶群这些人不能信任。”

天哪！这是什么话。按照谢富治搞的公安十条，这是马上要坐牢的。有的人好心地劝她放弃这些想法，张志新说：“我考虑的不是个人对与错的问题，我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

果然，张志新很快被送进了学习班（即批斗班）。到了这里，张志新不考虑个人问题，照样大批林彪、江青。她公开宣讲，林彪鼓吹的“顶峰论”（林彪自1965年以来，一直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是错误的，“对林彪没有什么信赖”。她问道：“江青说这个是叛徒，那个是特务，她自己怎么样?”

不久，有些搞专案的人来把张志新找去，要她交代问题。张志新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个小时，听得这几个人心惊胆战。最后，他们把记录交给张志新看，郑重其事地问她：“这些是不是你的观点?”张志新翻阅完后肯定地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得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她立即写了一篇长长的补充材料，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送给了来人。这些人小心地把材料放好，然后坐车走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二回　孙玉国初战珍宝岛　柯西金又开友谊线

话说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张志新，眼看奸贼当道，忠良被害，国家受损，人民遭殃，感到一个共产党员这时不出来为真理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于是挺身而出，经常痛斥林彪、江青。按照当时执行的公安十条，议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犯有这种大罪的人，不枪决也得判无期。到了 1968 年，毛泽东批发了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全国又都在学柳河，干部、教员都去了各种各样的干校。辽宁省委的干部自然也不能例外，都去了锦州附近的盘锦垦区的五七干校，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这时张志新对林彪、江青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放言批判林彪、江青，终被逮捕入狱。她被捕后的命运如何，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陈毅等人被作为右的代表准许参加九大，张春桥还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把陈毅拉到上海批判、消毒。毛泽东在 11 月 12 日批示："此文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如此一来，陈毅岂不是要被张春桥拉到上海批斗打倒。全国各省区都"参考"起来，你揪叶剑英，我揪徐向前，那"三老四帅"眼看着都要给打倒了。

且慢，就在这时，中苏边界线东端的中国领土珍宝岛上，连连响起苏联军队入侵的枪炮声和装甲车的隆隆声，紧急军情十万火急地传到北京，中南海大本营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亮到很晚。要打仗了，得有个大本营参谋小组，就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斯大林身边有个由朱可夫等几位元帅组成的参谋小组那样。这个参谋小组既可以帮助统帅部署作战计划，又可以代表统帅指挥一个大战略方向的作战。这个参谋小组的人选自然非得是威望很高的军事将领才行。罗荣桓元帅已经作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九大元帅才有资格进这个小组。九大元帅中，朱德年纪已大，刘伯承眼睛快要失明，彭、贺关在特监，毛泽东对他们成见很大，要出来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林彪已是副统帅，看来不能屈就。身体尚好，能出来工作的只有陈、叶、徐、聂了。现在他们正被作为"二月逆流"的干将遭到批判，如果能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将他们组成参谋小组，一可利于备战，二可使他们得到保护，岂不是两全其美。

周恩来在西花厅反复思考了半天，觉得这个方案肯定能得到毛泽东同意，便走出西花厅，踏着 1969 年 2 月的春雪，向丰泽园驱车而去。毛泽东也正在思

考这个问题。周恩来进来后，毛泽东放下《楚辞》，问道："恩来，北边的事情得有人专门抓一抓了，这件事还不能随便找几个人，你看谁来抓好呢?"周恩来缓缓地喝了口茶说："自然是林副主席了。"毛泽东点点头说："不错，不过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还得有人帮着干才行。"周恩来说："黄、吴、李、邱是军委办事组的，自然应该帮林副主席了。"毛泽东摇摇头说："他们还有一大堆具体事呢。我是说要找几位作战有经验，现在又没有具体工作的同志。"

周恩来拐弯抹角地探明了毛泽东的意思，才似有意无意地说道："那几位老总怎么样？反正他们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把他们组成一个军事小组，专门研究北边的情况，把他们讨论的结果每周报主席参阅。一旦打起来了，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毛泽东抬抬手，又慵懒地放下，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好吧，就这么办吧。你去告诉他们一下，另外就说我说的，叫他们把身体搞好。"

成立参谋小组的事就这么定了，参谋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第一次会议召开那天，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驱车来到五承殿，大家一见面就又发起牢骚来。徐向前瞧瞧大家说："咱们这股'逆流'又聚到一起了。那位四期生又该想法给咱们寻顶新帽子了。"陈毅头一摇："好嘛，再来两顶吧，看还能把我陈毅压趴了不。"

四位老帅正发着牢骚，周恩来进来了，一看大家都已到了，满意地笑着说："几位老总到得很准时嘛。我今天带来个人，你们认识一下吧，这是熊向晖同志。"熊向晖过去曾在军队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到外交部，当过驻英国代办，前不久又被调到总参谋部任一个部的副部长，几位老帅当然认识他。熊向晖走过来，恭敬地向几位老帅问了好，老帅们也热情与他握手。

周恩来宣布开会，首先讲了讲边界上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说起中苏边界，不能不提到《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原来现在苏联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在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清朝中期，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侵入这些地区。当时清朝政府在这些地区筑有尼布楚等城，驻有军队，俄国侵略者远道而来，被清军打得大败，在尼布楚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承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中国的领土。

清朝政府到了晚期，政治腐败，列强连连派来舰队挑衅，清军每次都是大败。清朝政府被迫割地赔款。俄国侵略者一看有机可乘，卷土重来。1850年秋，沙俄骑兵侵入庙街，中国士兵英勇抵抗，终因朝廷腐败无能，指挥无方，归于失败。沙俄骑兵占领庙街，改为尼古拉耶夫斯克。1854年，沙俄舰队又闯进黑龙江，清朝政府软弱无能，连连败北，被迫于1858年与沙俄代表穆拉维耶夫在瑷珲订了城下之盟，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拱手送给沙皇俄国。

消息传到欧洲，引起了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愤怒。不久前刚发表

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在地图前比画着议论远东传来的这一惊人消息。马克思愤慨地说："强盗，他们把妇女推入江里，把婴儿杀死，是一伙十足的强盗。"恩格斯在地图上比量着，惊讶而愤怒地说："卡尔，你看看这块土地有多大吧，它等于法国和德国加起来的总面积。"马克思量了量，点点头说："是的，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说，沙俄是一个更危险的敌人。当西方列强在争着占据中国东南的一些小岛时，沙俄却已经悄悄地夺去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人没有祖国。"

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列宁记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1920 年9 月27 日，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第一届苏维埃人民代表宣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现在我代表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苏维埃代表们对列宁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列宁的这一决定没有得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边界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提上议事日程。随着中国反对苏联政府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开始，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政府在中苏边界陆续增兵，陈兵百万。苏联军队不断派出小分队手持大棒侵入中国领土打伤中国战士，打死中国边民，不断地在边界制造事端。到 1969 年3 月，苏联军队在边界制造了近5000 起边界事件。

到了 1969 年2 月，苏联军队骤然加紧边界上的骚扰活动，中国的珍宝岛上不断传来苏军装甲车的隆隆声，边界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 平方公里，该岛本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长年累月的冲刷，才形成江里一小岛，每到枯水季节，水落石出，珍宝岛又与中国大陆连成一片。该岛 1915 年形成，两头尖，中间宽，形似古代的元宝，故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珍宝岛。早在岛子形成之初，便有中国渔民上岛居住捕鱼。此岛四周林木环绕，乌苏里江中马哈鱼成群，与岛子相连的中国大陆虎林县境内森林茂密，物产丰盛，棒打狍子瓢舀鱼在这里一点也不是神话。珍宝岛历史上归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是虎林县虎头村的一部分。守卫珍宝岛的是合江军分区公司边防站，公司乃是离珍宝岛不远的一个小村的村名，边防站就设在这个叫公司的小村里。站上共有 40 多名军官、战士，站长名叫孙玉国，瘦长脸，大眼睛，个头中等偏上，格外精神。他 1961 年入伍，任公司边防站站长以来，指挥部队与入侵珍宝岛的苏军进行了 22 次的说理斗争，斥退了他们的挑衅。

苏军为什么在珍宝岛加紧挑衅活动呢？原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坚持认为沙俄据以割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的《瑷珲条

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愿意和苏联政府解决边境问题，前提是苏联政府必须承认《瑷珲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一边倒，中苏友谊不断升温，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中苏两国的客轮相遇时，船上的中苏两国乘客总是热情地互相招手致意，在苏联莫斯科和中国北京之间，还架设开通了友谊电话热线，以方便两国领导人随时磋商重大问题。这条热线电话线路被人们称为“友谊线”。当时边界问题并不突出。

1959 年开始中苏交恶后，边境问题一下子突出出来。1960 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苏联政府建议进行边界谈判。1963 年，中国政府又向苏联政府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边界冲突的建议。苏联政府不仅不承认《瑷珲条约》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反而拿出沙俄政府单方面绘制的《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进一步向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其实，1861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上界线，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的水界。既然中苏两国现在根据不平等条约，把原来是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作为边界线，按照国际法，理应以江河的主航道的中心线为水国界。珍宝岛正好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当然是中国的领土。沙俄政府当年绘制的附图，是一张比例尺小于百万分之一的地图。地图既为沙俄政府自己绘制，图上穿过乌苏里江的红线也只能表示该江是中俄两国的界河，根本不能表明珍宝岛在江中的位置。中国政府据理力争，苏方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的归属，不得不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水界。

苏联在谈判中没有占到便宜，便想通过武力来夺取。在珍宝岛的对面苏联境内，苏联设有边防总站和边防站，人数多达 200 多人，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汽车、直升机，而中国边防站不仅人数少，装备更是无法和苏军边防站相比。

几位老帅听完周恩来的说明和熊向晖的介绍，也着实感到情况严重。周恩来说：“为了加强战备工作，我向主席建议，请你们来组成一个统帅部参谋小组，就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朱可夫元帅一样，专门研究战备工作，供主席和中央参考。主席已同意了，不知大家有什么高见?”陈毅气呼呼地说：“有副统帅嘛，还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右的代表嘛。”叶剑英劝解说：“老陈，你就不要提那个黄埔四期生了，今天是总理给我们布置任务，不要辜负了总理的苦心嘛。”周恩来笑着点点头：“既然各位老总愿意参加，那我们这个小组正式成立，就由剑英同志召集吧，熊向晖同志兼任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工作。”

小组成立后，情报源源不断地向小组送来。苏联境内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大军云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的陪同下，亲临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检阅新组建的空降部队。是日，只见两发红色信号弹升入空中，随之机声隆隆，100 多架重型直升机拔地而起，机群掩蔽了日光，如一大团阴云飞了过来。紧

接着，十几架火力突击直升机向假设的中国军队阵地开火，一时间，炮火连天，子弹如雨，硝烟弥漫。在火力突击直升机的强大火力掩护下，100 多架直升机次第降落，空降兵从机舱里冲出来，呐喊着冲上“中国军队”阵地。勃列日涅夫感动得眼泪直往下流，不断地赞叹道：“太好了，太伟大了。”苏联远东军区司令洛西克上将也热泪滚滚，对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嚷道：“你看见了吗？勃列日涅夫都流眼泪了，你应该给我们更多的飞机。”格列奇科一口同意：“洛西克将军，我比你更激动。我马上下令调一大批最新式的米 24 直升机给你们，让中国人尝尝远东军区的厉害。”

中国军队的装备比起苏军的装备差远了。面临敌军压境的严重局面，珍宝岛上的边防军人心怀祖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3 月 2 日，孙玉国带领巡逻队又上岛了。这时沈阳军区已调派部队来到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站，支持孙玉国。中国巡逻队来到岛上，还没走几步，只听得一片轰隆声。只见从对岸的苏联境内开来几辆装甲汽车，从冰冻的江面上向珍宝岛开来。装甲车开到珍宝岛的东侧，从车上跳下一大帮子苏联军人。往常苏联军人越境挑衅，总是大背着冲锋枪，手持长木棒追打中国军人。今天则不，一律手端冲锋枪，一下车就摆开了战斗队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孙玉国指挥的巡逻队包抄过来。孙玉国情知今日不同以往，激战就在眼前，立刻命令部队：“注意，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刷”一下都把大背着的冲锋枪端到手里，孙玉国看苏军包围上来，地形对我不利，果断地命令部队向后退去。苏军紧追不舍，一齐端起了冲锋枪。孙玉国叫声“不好”，命令部队：“趴下！”就在这时，一串子弹飞了过来，几个战士倒下了。孙玉国怒火填膺，举起冲锋枪射击，战士们紧跟着开了火，苏军倒下去一片。

孙玉国这里打成一片，岛的其他地方也响起了枪声，一个苏军指挥小组被歼灭。中国边防军由于苏军偷袭，猝不及防，也伤亡惨重。不管如何，由于中国指挥部布置得当，孙玉国在前方指挥得力，中国边防部队挫败了苏军的入侵偷袭，打了个胜仗。

捷报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去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主席，沈阳军区肖全夫来电。今天早上，入侵珍宝岛的苏军开枪偷袭我边防部队，被我边防部队击退。苏军被打死 30 人左右，我们有 19 个战士阵亡。”毛泽东一下站起来，气愤地说：“他们真动手了！好吧，来吧，我们不怕，怕也没用，他要打，我们奉陪到底。”周恩来补充说；“我们的边防战士太可爱了，机智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次胜利，沈阳军区肖全夫和前线指挥所指挥有方，珍宝岛所属的虎林县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在前面临机处置，措施得当。”毛泽东动感情地说：“珍宝岛，珍宝岛，岛上最有价值的不是珍宝，而是战士的牺牲精神。请孙玉国同志参加九大吧，让部队讨论一下。我想见见他。”周恩来欣然赞同：“我也正想向主席提这个建议呢。珍宝岛的英雄出席九大，让英雄在会上作报告，对全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孙玉国在珍宝岛上和苏修斗争了好几年，斥退了苏军

几百次挑衅，他代表珍宝岛的边防部队也最合适。”

周恩来和毛泽东又商量了一会儿，秘书拿来了四帅军事研究小组的报告，毛泽东详细地看了报告，作了批示，让周恩来组织实施。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立即要通了沈阳军区前线指挥员肖全夫的电话：“肖全夫吗？主席已经看到了前线的报告，主席很激动，高度评价了前线将士的牺牲精神，传令嘉奖前线部队。根据主席的指示，党的九大筹备组决定特别增选珍宝岛前线将士代表参加九大。我们建议孙玉国同志作为珍宝岛前线将士代表，你的意见怎么样啊？”电话里传来肖全夫哽咽的声音：“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感谢党的关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我们珍宝岛边防战士头可断，血可流，祖国寸土不能丢。”周恩来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激动地说：“祖国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现在请你们注意，一、我们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扩大事态。如果他们还要打，应坚决予以有力的回击。二、努力争取冲突不要扩大，用广播通知苏联边防站，让他们把打死的苏军尸体运回去。三、对陈绍光、王庆容、于庆阳等烈士要隆重安葬，要做好家属的优抚工作，要在部队宣传烈士的功绩，教育部队继承烈士遗志。”肖全夫的话在电话里响起来：“请总理放心，我马上向部队传达。”

珍宝岛一战，苏联军队吃了亏。远东军区调兵遣将，图谋报复，哈巴罗夫斯克的饭店旅馆住满了军官，新调来的大批坦克、飞机塞满了街巷花园，一个更大的侵略行动在远东军区司令部酝酿成熟。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临街的104扇窗户全部被砸毁，苏联人又把墨水瓶扔向大使馆的房子，使馆房屋的墙壁被墨水溅污得脏乱不堪。

苏军的入侵行动和对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罪行激怒了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在3月2日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3月4日，北京市人民围绕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苏军入侵珍宝岛、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苏联使馆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壮观的游行场面，以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惨剧又要重演，吓得要死。实际上周恩来责成谢富治早做好了安全工作，游行的人群排山倒海般地涌来，口号声如夏季的炸雷一样在使馆上空轰响，但没有一小块小石子之类的东西从人群中扔出来。苏联大使馆里没有飞进来一粒小石子，一个墨水瓶，一个臭鸡蛋。游行持续了整整五天，秩序井然，大使馆没受到丝毫损坏，世界都叹为奇迹。

日历撕到了3月15日，近4点时，苏军又大举入侵珍宝岛，在岛上设下埋伏。天亮后，孙玉国带领巡逻队登岛巡逻，直向苏军潜伏的榆树林走去，潜伏的苏军眼看着孙玉国一行越来越近，个个高兴，举起了枪。孙玉国这时突然命令部队站住，他仔细观察后，发现榆树林地物有变，知道苏军已有埋伏，带领部队走开了，在雪地里隐蔽起来。苏军指挥官、边防总站站长列昂诺夫上校命令苏军几十名步兵追歼孙玉国。装甲车冲过江面，遭到在岛上冰雪里潜伏了一夜的于洪东分队的痛歼。苏军在榆树中的潜伏部队没有想到中国部队也在这里

埋伏了部队，只好从冰雪里出来支援。不料想，肖全夫指挥中国江岸上的两个炮群一顿猛轰，苏军十几个士兵被打死，一辆装甲车被击毁。

列昂诺夫上校看攻击受挫，命令3辆坦克、3辆装甲车正面冲击。由苏军边防站站长杨辛中校率4辆坦克迂回穿插，企图切断中国军队江岸与岛上的联系，将岛上的孙玉国、于洪东指挥的部队一举歼灭。

苏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许多门大口径火炮齐射猛射，无数炮弹从苏联江岸上的炮阵地飞来落到珍宝岛上，被炮弹炸起的冻土和碎木像冰雹一样落下来。在炮火的掩护下，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冲了过来，孙玉国率巡逻队开枪抵抗。由于岛岸太高，苏军坦克爬不上去，便停在江面，用坦克炮支援步兵冲锋。孙玉国等人在前面用机枪火力把苏军步兵全打趴在地上，于洪东指挥各排用火箭筒打苏军装甲车。激战中，有人大喊："坦克从后面冲上来了。"于洪东转过头一看，只见4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绕过了岛南端，从中国内河的江汊的冰面上迂回过来。于洪东指挥反坦克炮反击，炮弹准准地落在苏军坦克身上，却没有钻透坦克，苏军坦克质量确属上乘。这几辆坦克正是杨辛指挥的坦克，刚才的一炮也正好打在他乘坐的坦克上。炮弹虽然没有炸毁坦克，却也震得杨辛昏头昏脑，他没有详细观察路况，便指挥坦克一马当先朝于洪东部队冲过来。

坦克轰隆隆地吼叫着，眼看就要轧过来了，于洪东和边防战士们不断地用炮火阻击。苏军坦克毫不在意，继续冲来，突然"轰"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杨辛中校的坦克的履带被炸断，瘫在那里。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用炮猛轰苏军其他几辆坦克，苏军坦克急忙后退，慌乱中轧碎后面的装甲车，苏军装甲车里的士兵做了同伴的轧死之鬼。于洪东则避开被打瘫的苏军坦克的射角，爬上坦克，拉开车盖，丢进去一颗手榴弹，盖上车盖，车舱里一声闷响，杨辛中校和几个坦克手被炸得四分五裂。

列昂诺夫损兵折将，再次整顿兵马，指挥20多辆坦克冲过江来，又被中国的反坦克炮和反坦克雷阵压制住。这反坦克雷不大，也就是一个拳头大，却很厉害，杨辛中校的坦克就是轧上了一颗反坦克雷被炸瘫的。珍宝岛边防部队把雷裹上白布，放置在江面上，大雪一盖，如同江面上密密麻麻的雪团，根本分辨不出哪是雷，哪是雪团。苏军攻击再次受挫。列昂诺夫恼羞成怒；又重整兵马，准备指挥70多辆坦克冲过江来，突然一颗炮弹飞来，正好落在列昂诺夫待着的指挥所顶上，一声炸雷，列昂诺夫和指挥所的其他军官一命归天。

珍宝岛暂时平静下来了。

苏联党和政府的首脑在经历了珍宝岛之战后重新研究对中国的政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经过这次达曼斯基岛（珍宝岛）一战，我们摸清了中国军队在边防上的布防。这么大的战斗，中国没有出动一辆装甲车作战，说明他们部队的配备重点不在边界，而在纵深，这是一个防御的架子，而不是进攻的架子。我们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同中国开战势必要进入中国，短期内进展顺利，但最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会极大地削弱我们同美国抗衡的力

量，不如向毛泽东建议谈判，避免边界发生冲突。”勃列日涅夫同意柯西金的看法，并建议说：“柯西金同志，你为什么不直接同毛泽东交谈呢?”柯西金愕然：“这怎么可能……”勃列日涅夫提醒他说：“你忘了，50 年代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友谊电话线路，现在你可以利用这条线路直接同毛泽东通话嘛。”柯西金兴奋地搓搓手说：“这倒是个有趣的办法。10 年不用了，我试试。”

3 月 29 日晚 8 点 30 分，北京电话局那条久置不用的友谊线的红灯突然亮了，一个小姑娘接上机子，问道：“喂，你是谁呀?”对方答道：“我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我要和毛泽东通话。”小姑娘一听是“苏修”头子，怒斥道：“呸，不要脸，侵略者，修正主义分子，也要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通话，你配吗?”耳机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找周恩来总理也行，我要和你们的周总理通话。”女话务员斥责道：“你做梦吧，我们中国人民堂堂正正，不和苏修讲话，打倒苏修!”喊完口号，这位小姑娘一下子扯掉电话。

机房勤务员（主任）见她喊口号，感到奇怪，问这位话务员：“你在对谁发火呢?”女话务员说：“还有谁，柯西金呗。”勤务员问道：“哪个柯西金?”女话务员不屑地白了他一眼：“还有哪个柯西金，就是新沙皇呗。”勤务员不信：“你骗我吧?”女话务员不耐烦地说：“向毛主席保证。”勤务员顿时脸色煞白，向军代表办公室跑去。不一会儿，局里的军代表五六个人和勤务员向机房快步走来，人人脸上都是一副严肃而紧张的表情。他们走到那位小姑娘跟前，军管会负责人问道：“刚才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电话找毛主席吗?”小姑娘爱理不理地说：“是啊。”军管会负责人又问：“是你把他骂了一通，扯断了电话?”女话务员自豪地说：“是啊，我把柯西金臭骂了一顿。”军管会负责人沉下脸来，命令道：“立即把她撤下来，隔离审查，听候处理。”两位随来的女干部立即把她扯出来带走。这时军管会负责人紧张得满头大汗，下令：“立即接总理，快!”电话接通了，军管会负责人报告：“总理，刚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找主席和总理，被话务员骂了一顿，扯断话路。”这时接线厅里静静的，周恩来恼怒的声音清晰地从话机里传出来：“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要擅自处理?你们是犯罪，犯杀头之罪!”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三回　古怪事江青成中委　荒唐案林彪进党章

话说周恩来得到北京电话局报告，得知柯西金打电话来要和毛泽东通话，但被无知而不守纪律的话务员切断的事情后非常生气，严厉申斥了北京话务局。但仔细一想，这也不能全怪那个话务员。“文化大革命”一起，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烂，阻拦火车、切断交通这样严重的犯罪行动不但不受到惩罚，反被认为是造反有功，受到重用，那么一个话务员切断柯西金的电话为什么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呢？所以周恩来接着又指示，北京电话局应当以此为教训，对员工加强教育，不要过多地追究话务员的责任。

隔离室里，那位切断柯西金电话的小话务员嘤嘤而哭，她实在想不明白，北京和全国人民每天都不知喊多少遍打倒新沙皇的口号，自己喊了几句，怎么就大祸临头了呢？她正哭着，军代表们走了进来。军管会负责人走到她面前，劝她别哭了。小话务员还是泪水涟涟。军管会负责人不劝了，问她：“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祸吗？”小姑娘张大恐慌的泪眼，嗫嚅道：“惹祸？”军管会负责人说：“是的，你的这一举动可能导致几千万人死亡。”小姑娘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但眼神的意思明显是“有那么严重吗？”军管会负责人耐心地解释说：“是的。你想想，柯西金使用这条多年不用的线路，找毛主席通话，自然是想通过最高级的通话达成协议，避免边境冲突。而你呢，一下子切断电话线，等于关死了谈判之门，这会使新沙皇铤而走险，对我国发动战争。战争一打起来，就不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这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啊！你严重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论罪是个死罪。”小姑娘吓得哇哇大哭，连连喊叫：“我不是有意的呀！我不是有意的呀！”军管会负责人说：“你不要紧张，总理有指示，这事不能全怪你，不要追究你的责任，关键是要吸取教训，加强纪律性。你回去上班去吧，好好想一想，写个检讨。”小姑娘见一场大祸顿时云散，不禁感动得哭了起来：“总理……”

周恩来得到报告，得知此事已妥善处理，也就放心了，但一想到避免战争的一个绝好机会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给断送了，不免遗憾万分。这时秘书送来了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周恩来又埋头看起文件来。文件中特别重要的是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个名单内部已讨论过多次，直到现在还不能定下来，只好继续磋商了。

此年，也就是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

行。作为会场和代表驻地的京西宾馆戒备森严。京西宾馆位于北京城西，距天安门广场有10里之遥，前临长安大街，刚修通的北京地下铁路正好从这里通过。宾馆内部有一座很大的高级礼堂，可坐1000多人，礼堂旁边是高达9层的大楼，代表们住宿、开会都完全在宾馆内，便于警卫。这个宾馆隶属中央军委，安全措施非常严密，九大选这里为会场，是非常恰当的。

4月1日上午8时，中央首长陆续来到京西宾馆，“红旗”轿车一辆又一辆鱼贯而入。门口警卫战士肃然立正，迎着进来的高级轿车敬礼。由于车辆很多，战士敬礼的右手好长时间都没有落下来。宾馆大楼的电梯也运行不停，男女服务员奔来跑去，一片紧张气氛。忽然，一群服务员聚在电梯口，口里嚷着“老帅来了，看老帅”。一会儿，电梯口的红灯亮了，电梯门打开，朱德、李富春、陈毅从电梯里走出来。这些服务员知道他们在挨批判，不敢上前亲近他们，但都肃然而立，恭敬地向老帅们行注目礼。朱德慈祥地向大家招招手，率领李富春和陈毅到了休息室。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等十几位将军和几名士兵代表正在闲谈，一见朱德进来，他马上跳起来喊了声口令：“立正!”朱德等人向大家招招手说“坐下坐下”后便进入里间去了，一个士兵问道：“首长，他们都是老右，你们给他们立正干什么?”韩先楚轻蔑地瞅他一眼，骂道：“你懂个屁!”

下午5时整，京西宾馆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代表，会场上静悄悄的，大家瞅着主席台，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忽然，会场里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代表们如听到了口令，一齐站起来热烈地鼓掌。在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和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从主席台的一侧走出来，不断地向大家招手致意。林彪在稍后一点摇着他撰写前言的《毛主席语录》，也就是小红本，再后面隔一小段距离是周恩来，他胸前佩戴着有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的长方形小徽章。令代表们吃惊的是，周恩来面容清癯，比以前瘦多了。在周恩来后面的是陈伯达、康生、董必武、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在主席台上依次就座。陈毅等三老四帅则被安排在台下第一排坐着。

毛泽东站起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场上顿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掌声、口号声差点把大礼堂的顶盖掀掉。不过，这座礼堂质量特好，从外面是一点听不到里面的声音的。行人从这里匆匆走过，看到士兵沿宾馆围墙持枪警戒，知道这里正在召开重要会议，但绝对想不到是开九大。

10分钟过去了，毛泽东把手往下压压，代表们又安静地坐回到座位上。毛泽东微笑地望望代表，大声讲道：“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场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很长，这是林彪正式亮相，叶群十分重视，来会场前又给他吃药，又给他打针，但林彪仍然显得体力不支，念政治报告时气喘咻咻。花了近一个小时，林彪终于把政治报告念完了，已累得浑身大汗，瘫

在座位里。他望望旁边议论风生的毛泽东，想到自己虽然已被写进党章草案，成为法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以自己虚弱之体，还能等到自己接班的那一天吗？

林彪的政治报告作完以后，代表们分小组讨论政治报告。4 月 14 日，代表们又集中起来开始表决。照例是毛泽东讲话，照例是掌声如雷。林彪又接着讲话，照例是气喘咻咻，照例是喊一大堆口号。接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讲话。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现在已经是大寨大队所在的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仍头戴白毛巾、身穿黑色对襟袄，以表示自己还是老农民本色，王洪文讲话后，他也发了言。大家都一致表示拥护政治报告，拥护党章。

接着，大会宣布："珍宝岛英雄孙玉国同志发言。"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只见孙玉国身穿新军装，潇洒利索，走到讲台前，"啪"一下向主席台左右的首长敬了个军礼，又向会场全体代表行了个军礼，才掏出发言稿。会场里一片啧啧的赞叹声，这么英俊潇洒，真不愧为珍宝岛的英雄。

大会发言结束后，毛泽东宣布："现在开始表决，同意林彪同志作的政治报告的举手！"只听"刷"一声，代表们一齐举起了右手。毛泽东看看会场，宣布："一致通过。"接着毛泽东又开始主持表决党章："同意党章的举手！"又是"刷"的一声，全体代表又都高高举起了右手。毛泽东看看会场，宣布："一致通过。"会场上又爆发出炸雷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很多新的内容，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一点写进了党章的总纲："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综观中外共产党史，还从未有过在自己的党章里写上接班人的名字的事，真是荒唐至极。

政治报告和党章一通过，剩下的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了，这是九大的高潮。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为一伙，江青和陈、康、张、姚、谢为一伙，互相之间开始了紧张的角逐。"文化大革命"搞了近3 年，现在到了重新分配权力的时候了，双方都使出了吃奶的劲。但毛泽东心里有数，把内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工作直接握在自己手里，具体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康生协助。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复杂的工作。在 4 月 14 日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瞧瞧左边坐着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又瞧瞧右边坐着的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心里思忖着，一边是"文革"新贵，一边是开国元勋，"文革"新贵都有毛泽东和林彪的支持，自然是都非进政治局不可，自己的任务，应该把那些老同志尽量拉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尽量减少"文革"新贵对国家的破坏。但是，据说胡耀邦、李志民、帅孟奇这些老同志还没有检讨，不检讨，那些"文革"新贵能让他们进中委吗？

会散了以后，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对胡耀邦等人说："你们作个检查吧，也好取得大家的谅解，进九届中央委员会，好为党工作。"大家没有说话，都把目光转向胡耀邦，等他拿主意。

胡耀邦个子矮小，貌不惊人，但极有主意。他是湖南浏阳县人，受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影响参加革命，1933 年 1 月被调到瑞金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1936 年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后又改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四纵队、三纵队政委，后又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指挥解放四川战役，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1952 年，经邓小平推荐来到北京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1964 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丰富的革命斗争阅历使他对是非的判断力极强。当周恩来动员他写个检讨应付一下那些人时，他也知道这是周恩来的好意，但他不想写检讨，头一摆，倔犟地说："不写，没有错误，写什么检讨。"其他人一看胡耀邦不写，也都不写了。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摇摇头走开了。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熊向晖又来报告："总理，4 位老帅经过研究，认为苏军在边界上的兵力虽然由原来的二十几个师增加到了 55 个师，百万大军陈兵边界，但不可能大打起来。"周恩来拿过四老帅的研究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我也是这么个看法，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要马上向主席报告。"熊向晖走了，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丰泽园，问道："主席休息了吗?"卫士回答道："主席没有休息。"周恩来说："我有重要情况报告主席。"卫士进来请示毛泽东："总理有重要情况报告。"毛泽东点点头："好，立刻请总理过来。"

周恩来坐车到了丰泽园门口，卫士已等在这里，见总理下车，过来要替总理拿公文包，周恩来笑着婉谢："谢谢，你们已经很辛苦了，我怎么能让你们拿公文包呢？你们责任重大，一定要把服务工作搞好，全国人民都会感谢你们的。"卫士一阵心热，总理啊，你总是对同志这么关心，这么体谅。

毛泽东在书房里正在等着周恩来，见他进来，指指沙发说："请坐，有什么重要情况呢?"周恩来说："四老帅有两个结论，一个是苏军在边界陈兵百万，但不会大打；一个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华政策有了松动，打开中美冰冻多年的关系的时机已到。"周恩来的这两个消息给毛泽东带来了喜讯，毛泽东脸上泛起了一阵红光，竟然很少有地催促起周恩来了："快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先说说第一个结论吧。"周恩来喝了一口茶水说："四老帅为什么认为苏军虽然在边界陈兵百万，但大打不起来呢？他们认为，苏军的战略思想从来重视集中优势兵力，实施重点突破，达到战役速决。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出兵我国东北都是集中百万大军进行突击。现在苏联战略重心在欧洲，他们主要是同美国抗衡，要抽出几百万兵力同我国大打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喝了几口茶，毛泽东又催问道："那么第二个结论呢？怎样解释?"周恩来放下茶杯说："苏联最近搞了个亚洲安全体系，收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橡胶，吸引日本开发西伯利亚的石油。交换的条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意苏联的舰船通过马

六甲海峡，日本同意苏联舰船通过宗谷海峡和津轻海峡，这就严重地触犯了美国利益。尼克松上台后，为了打中国这张牌，以同苏联争斗，好几次讲话表示愿意同中国接触。最近，尼克松还转托刚上任的法国驻华大使捎来了口信，愿意同中国谈判。陈老总建议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中美关系有了突破，就会大大加强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站起来，兴奋地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夸赞四老帅道：“这四个老总啊……姜还是老的辣噢。看来，我还得给他们再压压担子。”周恩来看出，毛泽东对四老帅的这两个结论很赞赏，便把四老帅的困难讲了出来：“九大上，有些人对四老帅的做法不大妥当，上海给陈毅同志写了封信，说是选他做右的代表，他们的日子不太好过，恐怕很难承担起更多的工作。”毛泽东又窘又恼：“还有这事？谁说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这就是一个创造，完全是胡闹。什么右的代表，我就爱和右派交朋友，你看我要和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了。”毛泽东说完，开怀大笑起来。

周恩来看毛泽东兴致很好，便提起酝酿中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来：“主席，这 4 位老帅进不进中委？我和康生同志研究了半天，还是想先请示一下主席的意见。”毛泽东在沙发上坐下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周恩来：“你的意见呢？”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我的意见是四老帅都进中委。万一林彪同志病了，他们还可以出来抵挡一阵子。不然，我们临时到哪里去找人呢？”毛泽东默然，一股劲儿地吸着烟，半天没有说话。周恩来以为毛泽东生气了，哪里知道毛泽东突然一挥手，果断地说：“三老四帅都进中委，一个也不要落下，谁要不同意叫他来和我辩论。”

周恩来又提出江青的问题：“主席上次指示江青不要进政治局，康生同志建议江青同志还是进政治局好。”毛泽东这次可是生气了：“我说了，我坚决不同意，我不能同江青共事，你们要她当中委，我就不干，她也不能进政治局。”

毛泽东一再反对江青进政治局，林彪也急忙表态：“不同意叶群进政治局。”不知怎么的，林彪现在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三老四帅仍然留在中央，是为什么呢？是牵制自己吗？他细细看了一下预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元老派占三分之一，文革小组占三分之一，再就是自己和黄、吴、叶、李、邱了，明摆着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格局。既然要牵制，那就是说毛泽东对自己还不放心。林彪一想到此，又开始出汗，不得不格外小心。

江青、叶群得知自己有被挤出政治局委员的圈子的危险性，顿时慌了手脚，四处活动，江青有中央文革一帮人给自己摇旗呐喊，她想着再把黄、吴、叶、李、邱拉过来，就稳稳当当地可以拉够选票了。江青找到黄永胜，恳切地说：“永胜同志，我看你能力很强，我要选你当常委。”黄永胜也很想当常委，但算来算去，知道常委是落不到自己头上的，江青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现在却主动要选自己当常委，无非是要自己投她一票。黄永胜客气地说：“江青同志，我的能力不够，但我要给你投一票。”江青满意地走了。

黄永胜跑到毛家湾，气呼呼地对叶群说了江青拉选票的事，临了说道："谁选她呀，那么狂，我就看不惯。"叶群一跺脚，指着黄永胜连说"大错，大错"。黄永胜愕然，问叶群："我错在哪里？连主席都反对她进政治局呢。"叶群又一跺脚，连说："蠢蠢！"她看黄永胜还不明白，便贴着他的耳朵说："你想想，江青进政治局，主席怎好说同意，当然是要做做姿态了。你可不要给个棒槌就当针（真）。再说，江青不进政治局，我还能进政治局吗？反过来，江青进了政治局，我一定也能进得了政治局。为什么？总得有人陪衬陪衬呀！所以，她就是个王八蛋，你也得选她，为了我。明白吗？我的傻将军。"黄永胜连忙说："我明白了，一定照你的话做。"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叶群拿起电话："喂？啊，是总理！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林副主席已经睡了！你明天写封信来，好，我明白了，我一定转告。"叶群放下电话，未等黄永胜问，就主动告诉他："总理刚才来电话，要送政治局委员名单给林副主席看，叫我挡住了。"黄永胜奇怪地问："为什么呢？"叶群不耐烦地说："我怕总理来了，林副主席为了表示谦虚，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勾了。"黄永胜恍然大悟，敬佩地说："我看你应该当常委才是。"叶群故作羞涩地说："你别抬我了。"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把名单寄到毛家湾，叶群打开看了一下，见江青和自己的名字都在上面，便令秘书拿去给林彪圈阅。秘书进到里间，对闭目养神的林彪念了名单，林彪一句话也没有说，用右手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圆圈，表示圈阅了。

经过反复的较量，4 月 24 日，九大代表选出了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届中央委员会又选出了政治局委员，委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有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李先念、陈锡联；有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李作鹏；还有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汪东兴。

叶群当了政治局委员，办的第一件大事是命令秘书们到北京饭店、前门饭店、京西宾馆 3 个九大代表们的驻地为女儿找驸马，为儿子找皇妃。这时九大使命虽已结束，但代表们还得学习座谈九大的意义。叶群指挥着找来找去，发现几个小伙子长得漂亮，身材也好，可一打听，都已结婚了。一个秘书倒是发现了个姑娘，非常漂亮，是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叶群忙把吴法宪找来，要他扮演一个关心青年人的老首长去摸摸姑娘的底。吴法宪领命出来，立即把姑娘找来，问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姑娘也老老实实地说了一些自己参加九大的感受。吴法宪突然问道："结婚了吗？"姑娘的脸一下红了，低声说："没有，我要好好为党工作，不想过早结婚。"吴法宪夸奖道："很好，不过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也可以考虑。"

吴法宪找姑娘谈话的时候，叶群、秘书们和林立果都藏在里面看，叶群对这个姑娘很满意。姑娘走后，叶群问道："老虎，你觉得怎么样啊？"林立果一

扭脖子说："不怎么样。"秘书把他拉到一边说："这姑娘挺不错的。"林立果语出惊人："主任找的人我都不要，她是想在我身边安个人，控制我。"秘书们一听，不禁面面相觑，这哪里有一点母子的亲情呢？大家懒懒地回了毛家湾。

秘书回来得正好，王光美专案组送来了专案报告，请林彪批示。林彪这次倒很干脆，拿起红铅笔批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四回 周恩来签密令释放美国客 尼克松破密码内定核战计

话说九大后，林彪为了树威，判处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惊，杀戒一开，不知多少颗人头就要落地，这还得了。他拿起铅笔在文件上重重地写了4个大红字："刀下留人"，然后把文件退给了周恩来，嘱他去办。周恩来立即把谢富治叫来，给他看了主席的批示，叮嘱他："当年晋绥杀了王实味，主席雷霆大怒，不知道批评了多少次。王光美要有什么事，你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当然知道王实味这件事。王实味原在北平读大学。抗战军兴，王实味来到延安，被分配做文学研究工作。一个从北平旧大学来的知识分子，初到延安这个陕北的山沟沟里，当然会感到很不习惯。于是，王实味在延安的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野百合花》的文章，发了发牢骚，引起了军队干部和地方老干部的不满。1942年延安大整风，开始批评《野百合花》，后来又有人揭发王实味是托派，王实味遂被关押起来。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延安即将成为前线，王实味被转移到当时是后方的晋绥解放区，关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的监狱里。当时由于是战争环境，随时要准备转移，晋绥公安总局请示康生（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专管肃反工作），康生指示立即处决王实味。于是，在一个傍晚，晋绥公安总局的几个青年武装人员，手持大刀，把王实味提出来，秘密处决。当时毛泽东知道后发了大火，要他们还王实味，可是人头落地不能接上。为此，毛泽东左批评，右批评，中共高级干部，哪个不知，谁个不晓。所以谢富治接到毛泽东批示后立即去秦城监狱视察，一点也不敢怠慢。

谢富治来到秦城监狱，找来了狱长等负责人，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然后去监房视察。狱长带他来到王光美的监室前，谢富治通过观察孔往里望去，只见王光美坐在自己的小床上一动不动，若不是他预先知道这是王光美的监室，他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王光美。

谢富治回来以后，把视察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知道王光美至少是现在没有了生命危险，便放心了。但是他立刻又得到报告，说刘少奇生命垂危，周恩来赶紧打电话，从医院抽了两名护士去看护。

忙完了这些事，周恩来站起来，在办公室的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这个沙发是毛泽东送给他的。说来也许有人不信，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办公室没有沙发，周恩来办公必是坐在办公桌后的藤椅上，累了就在办公室里走一圈算是

休息。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就让办公厅给自己做沙发时，多做了一个单人沙发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总算有沙发坐了。

周恩来坐在沙发上，一阵疲劳感充满了全身，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周恩来明白，“文化大革命”使自己的身体大大地超前透支了。自 1966 年以来，他很少睡过一个像样的觉，常常被红卫兵缠住“解决问题”，一谈就是几小时，甚至一天一夜。还有，要想办法维持工农业的生产，要提防江青、林彪这帮人射来的明枪暗箭，要想法保住那些老干部。而当他这样做时，还得经常注意研究毛泽东的想法，尽量利用毛泽东的支持去做好这些事。还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几十万出国作战的工兵和高炮部队，十几亿元的援越物资，哪一样不得周恩来去操心安排。有一个时期，美国轰炸厉害，粮食运不进越南，周恩来命令把大米装进塑料小口袋，封死后放到湄公河里往南漂去，越南人民能捞到多少就算多少。中国的新式武器出来，先装备越南。越南的土地上，到处堆着山一样高的大米、弹药。六管高炮、新式机枪遍地都是，越南的民兵也都是一色的冲锋枪。还有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总而言之，国家的千头万绪的具体工作，都得周恩来去安排，他怎能不累呢?

周恩来坐下来，唤来秘书：“给我泡一杯六安瓜片茶。”秘书奇怪地问道：“六安瓜片茶并不有名嘛，喝它干啥?”周恩来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呀！抗战初期，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叶挺将军送给我一筒六安瓜片茶，最近我经常想到叶挺将军，也就想到了六安瓜片茶。”

秘书泡好茶端来，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要通了乌鲁木齐部队司令员龙书金的电话。乌鲁木齐军区是新组建的，主要管辖指挥驻在新疆的部队，司令员龙书金原任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乌鲁木齐军区不久。电话要通后，周恩来嘱咐道：“龙书金吗？边界情况怎样？没有大事？我告诉你，外交无小事，你要严密注意边界上的情况。我以前曾给边界哨所、军区发过一个通知，边界上发生的外交纠纷动态，不论大小，哨所要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外交部，军区司令员必须要一一过目签字。你刚到新疆，可能不熟悉这个规定，要赶快把文件找出来读读，必须按规定严格执行，不能误事噢!”龙书金在电话里说：“放心吧，总理，我一定严格执行规定。”

中苏边境共长一万余公里。由于中部是中蒙边界，故中苏边境线可分为东线与西线。东线主要是苏联的俄罗斯与中国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接壤，西线主要是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靠近西线边界的是塔城、阿山、伊犁三个专区。这里水草丰美，风景宜人，原来两国牧民驱羊过界放牧乃是常事。中苏关系紧张以后，苏联边防军用大马力拖拉机在边界上犁出了一条宽十多米的松土带，用以检迹，若有中国边民越界牧放羊群，立即开枪。苏军更凭借武力经常越过边界到中国境内挑衅。各哨所的报告像雪片一样向乌鲁木齐军区司令部飞来。

六月的乌鲁木齐市，凉爽宜人。这时瓜果上市，千里飘香，异域风情，独

具魅力。天池是天山主峰博格达峰的融化的雪水汇集形成的一月牙形高山湖泊。人们坐车沿盘山公路而上，路宽仅能容一车通过。上下两个山口有专人拦截过往车辆，上午上山，下午下山，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车越走，路越窄，山越高。从车窗里往下望去，千山万岩均在脚下。经过5个小时的行驶，汽车终于在近午时分爬上了天池。只见一池如镜，湖面上倒映着雪山、森林。游山的维吾尔族姑娘在冬不拉的琴声中跳起了龟兹古舞，花裙翻飞，长辫飘舞，新疆本是好地方啊！

这时，周恩来仍在考虑着边界问题，毛泽东也不断地发出指示，周恩来连电龙书金：新疆要出问题，要龙书金加倍注意。

在处理了这些问题后，周恩来又在苦苦思虑陈毅提出的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建议。怎样打开呢？朝鲜战争、炮击金门、越南战争，两国积怨太深了，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台阶，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个台阶呢？

天遂人愿，7月初，一份紧急报告从广东飞来，落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前。报告称，广东抓获了两名乘游艇侵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周恩来看到报告，心中一喜，机会终于来了。他严令广东迅速查清上报，没有他的指示，绝对不许在报纸上提这件事。

广东省公安局很快查明，这两个美国人是来香港度假的美国学生，在游海时误入中国领海。周恩来接到了广东省公安局的报告后，又反复核对了有关资料，批示："立即放人。"并指示新华社写一条消息，客观报道此事，绝对不许在消息中用一些骂人的字眼。

两位美国客人被礼送出境，新华社的消息也非常客观。

尼克松立即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但什么也没讲，只是立刻责成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贸易和美国人去中国大陆旅游的限制。于是，一批一批的美国探险者好奇而不安地进入中国大陆。中美关系在悄悄地升温。

周恩来对此很高兴，但同时又对新疆很担心。龙书金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吗？

这时，边界上出现了异常情况，边界哨所的十万火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一封向乌鲁木齐飞来。原来塔城军分区近来注意到苏军在边界有异常情况，每到夜间，就能听到从苏联境内传来的坦克马达声。中国巴克图哨所升起五星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哨所会谈的信号，然而苏联哨所一反常态，没有反应。塔城军分区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北疆军区。北疆军区立即报告龙书金，报告苏军有异常举动，建议停止例行巡逻，弄清情况。

8月13日上午，中国边防巡逻队一行33人又开始例行巡逻。突然，6辆苏军坦克，300名苏联军人从埋伏点冲出来，围攻中国边防军人。接着4架直升机飞来，扔下几颗汽油燃烧弹，中国军队阵地全部成为火海。塔城军分区，北疆军区已接到巡逻队的无线电话报告，飞电龙书金请示方略。一团中国部队赶到出事现场时，苏军早已撤走，烧焦了的33名中国军人的遗体遗留在戈壁滩上。

败报传到北京，周恩来大惊，连忙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正在睡觉，卫士不愿通报，周恩来严厉地说："你们赶快叫醒主席，误了事是要掉脑袋的。"卫士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发脾气，料想有特别重大的事情要向主席汇报，便进去推醒了毛泽东。毛泽东硬被推醒，大为光火："我两天没有睡觉了，睡个把小时都不行？"卫士说："主席，是总理让我们把你推醒的。"毛泽东一下坐起来："总理？他在哪里？"卫士说："已经来了。"毛泽东吩咐："快请进来。"毛泽东为什么一听说"总理"马上就改变态度了呢？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周恩来是绝不会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的。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这样的事总共没有几回，今天总理这样做，一定有了非常紧急的情况。

周恩来一听说"请"，三步两步地走进来，不等毛泽东发问就报告说："主席，新疆边界上出事了，我们一个排让苏修偷袭打死了，简直是奇耻大辱。"毛泽东也吃了一惊："竟有这事？我前些时还特别关照过龙书金，西北要出事呢。"周恩来愤愤地说："出了这么大的事，一个排叫人家包了饺子。"接着，周恩来把事情的经过简要介绍了一下。说是简要，因为电报是龙书金打来的，报来的只是边界上的战斗经过，而这个经过又还是开头部分和战后目睹记，是怎么打的，现在还无法确知，所以只能是个简要情况了。

听完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深深地被震撼了。他拿起红铅笔，在龙书金的电报上狠狠地写了一行字。毛泽东把批件交给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查！派出军委调查组，从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查起，查龙书金、查王恩茂，查个水落石出，贻误军机者斩！"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后，向林彪通报了情况。林彪不敢阻拦，周恩来遂组织军委调查组，飞赴乌鲁木齐市调查。忙完这件事后，周恩来又布置熊向晖，请四帅研究组密切注意苏联和美国的情况，防备苏修将战争升级。

由于军情紧急，四帅军事小组的例会增加了。没有几天，熊向晖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吗？今天四帅要研究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想请你一道讨论。"周恩来一口答应："好，我马上就来。"

紫光阁五承殿，今天周恩来和四帅讨论的中心课题是如何看待美国《华盛顿明星报》的一条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消息称苏联大本营通过缜密的研究，决定对中国的所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如果苏联的目标能够达到，那么苏联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

这条消息真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一般中国人看不懂也看不到这条消息，但世界其他国家却为这条消息而深深不安。当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各为一万吨当量的原子弹，杀死了几十万人，迫使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现在中、美、苏的核武器的当量都是几十万吨、几百万吨。苏联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中国当然也要进行报复。中国核武器虽少，但有那么几颗落到莫斯科、基辅的话，也够苏联受的。另外苏联对中国实行核打击时，安知不会走火，把核弹打到美国的军队头上。那样的话，美国当然不会缩首挨打。如此一

来，一场核大战就要降临。按现在核大国的核武器当量总量，用世界总人口去除的话，每个人都可摊到25吨。一场核大战过后，紧接着就是因核战而形成的核冬天，核弹爆炸引起的尘埃将遮蔽太阳达3年之久，3年之内地球上将是寒冷与黑暗，到底还有多少人类和生物幸存下来，实在是很难说了。

在《华盛顿明星报》的这条新闻面前，世界战抖了。

怎样对待这条新闻呢？四老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周恩来和熊向晖也不时插话。

首要的问题是这条新闻是否可信的问题。熊向晖一直从事国际研究，对美国新闻媒介的激烈竞争当然是比较了解的。他知道，美国新闻媒介为了提高发行量，经常发表一些未经证实的国际新闻。他怀疑地说："《华盛顿明星报》的这条消息，会不会是报纸老板搞的一个噱头？"叶剑英摇摇头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苏联要和我们打一场地面战争的话，至少得投入400万军队，还很难有胜利的把握，苏联领导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打一场核战争，对我国的重要军事目标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对苏联来说费不了什么大事，因此现在存在着很大的苏联对我们搞突击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立足于打核战争。"

周恩来嘉许地朝叶剑英点点头说："剑英说得有道理。那么我再提一个问题，如果苏联有这个意图，那一定是属于最高机密，美国的报纸怎么会知道呢？"陈毅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苏联要对我实行核打击，首先要取得美国的谅解。不要说美国在亚洲有30万军队，美国还怀疑苏联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呢。所以美国看来是反对苏联实行这一计划的。另外，尼克松政府也急于联合中国与苏联对抗，因此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不好办，便通过报纸放风，这是美国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法。"

周恩来与大家议来议去，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他用笔敲敲桌子说："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基本清楚了，勃列日涅夫的手已经按在核按钮上了，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要研究一下各种应急方案。"

聂荣臻走过来，把一大幅地图摊开来让工作人员钉在墙上。他用指挥棒指着地图说："总理你们请看，这是苏联设在赤塔和扎维塔亚的军事基地，这是苏军设在蒙巴拉巴什的军事基地，这几个基地都是苏军的导弹发射基地。他们如果从这些基地发射导弹对我国袭击的话，那么导弹飞到东北哈尔滨、鞍山、沈阳等重工业城市的时间几分钟就够了，打到北京也超不过10分钟。这就是说，导弹作战，双方能用来躲避准备的时间只有五六分钟。"

聂荣臻是中国导弹部队的元戎，他的话自然有很大的权威性。徐向前担忧地说："这就危险了，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九、十两月主席可以离开北京到南方去避一避。"

周恩来感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特意在这几句话的记录下面画了几道红线。座谈会结束以后，他立即来找毛泽东汇报。丰泽园因要修理，毛泽东已搬到中南海东南的一所新居，房子里有个游泳池，大家据此给这所西洋式的宅第起了

个名字叫“游泳池”。

周恩来进了“游泳池”的客厅，向毛泽东汇报道：“主席，今天剑英他们议了一下，觉得《华盛顿明星报》的报道似为可信，确实存在着苏修对我国的重要目标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毛泽东放下《明史》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的办法是两条：一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想扔，我也准备扔，看谁能吓住谁；二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周恩来看看《明史》明白了，毛泽东这一句话是从明史的一个故事引申而来的。

原来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朱元璋也投军反元，逐渐自成一系。当时朱元璋看到陈友谅等起兵反元的人纷纷称王，也想称王。时有谋士朱升献策，建议朱元璋不要急于称王，以缩小目标，巩固根据地，加高加固城墙，在自己的根据地内发展生产，广积粮草，再徐图发展。朱升的这个建议合起来共9个字，乃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思忖的样子，便主动告诉他：“深挖洞，从现在开始，大家都挖防空洞。此事我讲了多少次了，大家就是不听，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噢。广积粮，要藏粮于民，部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我们在战争年代就是这个办法。淮海战役，国民党士兵为一个大饼死好多人，我们的战士却是顿顿白馒头加红烧肉。不称霸，这是对美国说的，也是对世界说的，现在不称霸，以后强大了也不称霸。”

周恩来佩服地说：“主席分析得太好了。4位老总分析了一下，认为苏修袭击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国庆节。今年的集会是不是不搞了，主席在此期间是不是先离开一段时间?”毛泽东又摇头，又摆手：“不，不！那怎么行呢？会一定要开，我还要上天安门。”周恩来一听脸就白了，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一旦导弹飞来，疏散的时间只有几分钟。毛泽东笑笑说：“当然我们也得搞点名堂，来他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怎样?”周恩来拍手赞成：“主席的这个主意好极了。”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全国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全国城市乡村都开始构筑地下避弹室、防空洞，统一组织，包干到户。560万中国军队全部进入一级戒备状态，连队喂养的猪羊一律宰杀吃掉，各级首长都进入指挥位置，日夜值班，枕戈待旦。中国导弹部队都已做好了发射准备，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中国的战争机器隆隆地开动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到报告，和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几经商量，认为这场核战争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尼克松问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办呢?”基辛格说：“你忘了，总统先生，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肯尼迪总统为了让苏联撤出驻在古巴的导弹部队，用破译的苏联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重要目标进行核打击的命令。当年由于赫鲁晓夫把导弹撤出古巴，肯尼迪总统没有用这张牌，现在总统先生可以用这张牌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五回 胡志明临终留憾言 柯西金归途传和意

话说尼克松与基辛格博士商议，决定用肯尼迪总统破译的苏联密码，对苏联134个重要目标实行核打击。这个计划内定之后，尼克松总统还要和内阁、议会中的一些人商量，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且说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到深夜，又是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他推开文件，照例撕下一张日历，下面的日历上写着的第二天的日期是1969年8月24日。他吃了几片安眠药正准备睡觉，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周恩来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急促的声音："总理吗？我是王幼平。胡主席突然病情加重，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我国政府再派医疗组配合抢救。"周恩来一听，顿时头上冒出冷汗："有这么严重？我马上想办法。"他放下电话，两颗大大的眼泪掉下来。胡志明这三个字一下把他拉回到青年时代，大革命时期的广州黄埔。那时周恩来刚从欧洲留学回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周恩来身穿军装，腰扎武装带，越发显得英俊潇洒，每天给黄埔一期的学生讲课、训话。在他的周围，团结起了叶剑英、聂荣臻等一批教官和蒋先云、熊楚、徐向前、陈赓、左权等一批共产党员学生。周恩来领导他们同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何应钦、胡宗南、陈诚等右派教官、学生进行斗争，用大棒子狠狠地回击他们的挑衅。黄埔岛上，一天到晚响着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啊，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青年时代啊！

这时，经常有一个清瘦的青年来找周恩来、陈赓等人。他叫李瑞，是越南青年，在俄国顾问鲍罗廷处当翻译。周恩来特别尊重他，两人经常在一起畅叙，情谊深似海，同志加兄弟。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时，李瑞还特地前来祝贺。

李瑞在广州一方面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一方面在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帮助下，积极准备建立越南的无产阶级党。他在廖仲恺的帮助下，组织旅居广州的越南青年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培训越南革命运动骨干。1930年，李瑞召集越南南部、中部、北部的共产主义党的代表开会，把这三个党统一为一个政党，定名为越南共产党，李瑞任领导人。

抗日军兴，国共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来到武汉，年底又去重庆，长期驻红岩工作。这时他又遇到了北来的李瑞，十年不见，今日重逢，两人思绪万千，唱和互答。不过李瑞这时已不叫李瑞了，改叫胡志明，是越南著

名的革命领袖，尽管他年龄不是很大，但越南人民都叫他胡伯伯，可见其威信之高。

胡志明来中国后不久，就在广西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恩来闻讯忙请冯玉祥和李宗仁出面营救，胡志明得以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倾全力支援越南的独立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胡志明也经常来中国休息、访问。这时胡志明还未结婚，由于胡伯伯在越南的威信很高，反而不好找越南女子，他曾托人给周恩来捎话，希望找一个中国女子为妻。周恩来明白胡志明的处境，也曾委托陶铸在广州物色了个漂亮贤淑的女医生，但终因此事牵涉到政治而不了了之。

胡志明也就一辈子没有结婚。

想想看，胡志明和周恩来的关系是这样亲密，那么周恩来一听到胡志明病危的消息，怎么能不伤心落泪呢？

周恩来抹掉眼泪，立即要通卫生部电话，命令他们立即组织第二个医疗组，专机飞赴河内挽救胡志明。为什么叫第二个医疗组呢？因为今年年初时，胡志明病情加重，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成第一个医疗组去了河内，他们和越南医务人员一起，经过几个月的积极治疗，胡志明病情明显好转。不料到了 8 月 15 日，胡志明不幸患了感冒，导致病情恶化，所以现在派出的是第二个医疗组。这个医疗组的成员，全是国内最有名气的心血管病专家。

第二个医疗组于 8 月 25 日 8 时起飞后，周恩来想想，再决定派第三个医疗组去。周恩来知道胡志明革命一生，历尽风险艰辛，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但却有个弱点，最怕打针，现在病危，免不了输液，得有个高手才成。卫生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特挑选了孔繁英去配合治疗。

幸亏周恩来心细，第三个医疗组到河内后，坐车直奔主席府，和已在那里的两个医疗组及越南医务人员会诊，决定了医疗方案。在场守护的黎笋、范文同、武元甲等领导人审视了这个方案，见方案上写着要输液，顿时个个面有难色，胡伯伯可是最怕打针的啊，给他输液出了事怎么办。输不输液？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常委在昏迷不醒的胡志明病床边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认为胡伯伯虽然怕打针，但现在要抢救他的生命，顾不得这些了，决定给胡伯伯输液。越南护士都不敢干，黎笋等人就请孔繁英输。

孔繁英是个经验丰富、技术高明的护士，是有各的“孔一针”。她领受任务后，立即做好了输液的准备工作，然后拿着针头往胡志明手臂上扎去。胡志明突然醒了，睁着眼睛四下看看，立刻看到了输液架和拿在孔繁英手里的亮晶晶的针头，神色顿时紧张起来。越南政治局常委们脸都白了，要是胡伯伯因为要给他打针发了火，讲出一两句对谁不满意的话，那他们可要倒霉了。

胡志明果然说话了，他问孔繁英：“你不知道我怕打针吗？为什么还要给我打针？”孔繁英也有些紧张，现在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是和胡主席说话出了问题，那马上就是破家之祸，可是胡志明问了，不回答不行啊。她想了想，

率直答道："胡主席，为了快些治好你的病，你就答应我给你打一针吧，我打针不疼。"胡志明又问道："这是谁的决定啊?"越南政治局常委们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们最怕听到的是这句话，此刻，都紧张地看着孔繁英的嘴巴。孔繁英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大家。"胡志明望望在场的越南领导人、中国医生，喃喃地说："既然中国同志认为有必要，那就打吧。"越南领导人互相看看，松了一口气。

现在焦点都集中到孔繁英身上去了，几十双眼睛都盯着她。孔繁英深知责任重大，来了个深呼吸，静静心，一针扎下去，引管里见血，一针成功。随后她麻利地把针头用胶布固定好，液滴一滴滴输进胡志明的身体里。胡志明朝孔繁英笑笑，随即转过脸去，他不敢看针头。越南领导、中国医生纷纷向孔繁英表示祝贺。

周恩来得知孔繁英一针成功的消息后，很是赞许了孔繁英几句，随即指示王幼平大使，为了尊重越南，没有越南方面的安排，不要前往医院探视病情，王幼平接电示后自然不敢马虎。9 月 1 日夜，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中国医疗组和越南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快至凌晨时，胡志明脸色有点红润，睁开眼，似有话要说。黎笋、范文同趋前聆听，胡志明吃力地说："我多么希望能看到独立、民主、统一的越南，可是我不行了……唉，老大哥、老大姐不要打了……"由于声音微弱，又是断断续续说出来的，黎笋、范文同听起来有些吃力，但基本意思还是听得很清楚的。

9 月 2 日凌晨，胡志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护人员拼命抢救，终无力回天，零时 47 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中国医护人员向胡志明遗体行致哀礼后，含泪退出。

周恩来立即得到了胡志明去世的消息，不禁大哭起来，但随即擦干眼泪，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和周恩来商量，由周恩来先行一步去河内向胡志明遗体告别，正式吊唁活动派李先念率团参加，这样安排既可以充分表达中国政府和党的领导人的悲痛心情，又可避开前来吊唁的苏联柯西金总理。

但是，越南并没有公布胡志明的死讯，周恩来明白这是越南要将胡志明的辞世日与越南国庆日错开。原来 9 月 2 日是越南国庆日，总不能把国庆庆典和吊唁活动放在一天嘛。9 月 3 日，越南宣布胡志明主席"今日逝世"。周恩来在征得越南方面同意后于 9 月 4 日动身去河内向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别。

飞机从北京起飞后，经过几个小时飞行，顺利到达河内机场。周恩来、叶剑英、韦国清一行轻装简从，住进了河内范老五宾馆。因为周恩来事先打过招呼，越南不要搞任何接待活动，所以周恩来到河内后，街上静悄悄的，外人一概不知此事。

但是越南领导人却知道周恩来到了河内，都跑到宾馆来看他。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大家一见面，不禁抱头大哭，泪洒宾馆。周恩来哭着问范文同："胡主席有什么遗言吗?"范文同悲痛地说："胡伯伯临终前，很遗憾他未能看

到独立、民主、统一的越南。”说完，范文同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周恩来也是泪湿衣襟。过一会儿，周恩来又问：“胡主席还说了些什么呢?”范文同迟疑了一下说：“胡伯伯还要我们转告你们，老大哥、老大姐不要打了。”周恩来叹口气说：“哪是我们要打哟！可是人家打上门来了，我们也只有陪着打。”

说话间就到了下午5时，越南领导人陪周恩来去主席府吊唁，然后又陪他到医院向胡志明遗体告别。不，准确地说是瞻仰。因为越南领导人已经决定长期保留胡伯伯遗体，已经对遗体采取了严格的防腐处理措施。

周恩来一进医院，看到安卧在鲜花草丛中的胡志明，不禁泪如雨下，哭得直不起腰来。越南同志更是悲痛万分，连守灵的卫兵也哭得满脸是泪，立刻又有两个卫兵替换了他们。

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周恩来急着马上要飞回去，但越南气象部门报告，航线上有大面积雷雨云，不宜飞行。越南领导人叫周恩来不要走，以防意外。刚好国内也来了指示，命令中国专机机组不要飞，待气象状况好转再飞。周恩来说：“不行呀，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呀!”执意要走，越南领导人只好命令机场做好飞机起飞的准备工作。飞机起飞后不久，就进入了雷雨区。这时只见飞机周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飞机忽上忽下，机翅晃动欲折。忽然，一个闪电划破夜空，把天空照得雪亮，紧接着夜空里红火乱迸，机舱里一片红色，宛如一团滚动的火焰。

卫士们紧张万分，一齐拥到了周恩来跟前，周恩来安详地抬抬手：“大家坐好，要相信机组的同志。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机外雷电流火，机内温馨如春，周恩来给大家讲着革命先烈的故事，人们都被故事吸引住了，竟忘了危险。

机组人员明白，千斤重担现在都压在自己身上了。他们想尽办法钻来钻去，终于发现了一个云层空隙，钻了出去，顿时天朗气清，繁星点点。机长张瑞霭把驾驶杆交给副手，到客舱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我们已经穿出雷区，脱离危险了，请您放心。”周恩来给他一块毛巾说：“我本来就没有担心嘛，快擦擦汗，听我继续给你们讲故事。”周恩来讲起了抗战时期在重庆红岩村的斗争生活，讲着讲着不禁唱起了歌剧《江姐》的主题歌，“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大家也都跟着总理唱起来，客舱里一片欢乐。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照例又是日理万机，眼看着到了9月9日。此日，越南在巴亭广场为胡志明主席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哀乐声中，胡志明主席的遗体被正式安放在灵堂中，供人们永远瞻仰。参加吊唁活动的代表团有32个，其中有柯西金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王幼平大使把吊唁的情形汇报给了周恩来，这一段时间，由于胡志明主席逝世，王幼平大使的汇报电话骤然增加了许多。

9月10日，周恩来又接到了王幼平大使的电报。他拿来仔细阅读，原来是王幼平报告，柯西金正式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提出，要在回莫斯科的归途中路

过北京，与周恩来在机场会晤。周恩来心里一阵高兴，这已是柯西金第二次在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了，这一次不能错过机会。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决定周恩来去机场与柯西金会晤。

柯西金是不赞成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计划的，他认为这个计划固然会给中国以沉重的打击，但也会招来中国的以牙还牙的核报复，还会引起美国的猜忌，后患无穷。他多次在政治局劝说勃列日涅夫放弃核打击计划，但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听。柯西金为了苏联的利益，决定再和中国进行一次直接接触，尽量达成双方不动用核武器协议，避免战争。

机会终于来了。胡志明主席病逝河内，中国和苏联自然都要派出高级党政代表团去参加吊唁，中国肯定要派周恩来率团吊唁，这不是中苏首脑对话的好机会吗？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到了河内，这时越南领导人告诉他，周恩来已先期来瞻仰了胡伯伯遗容后回国了，柯西金听了心凉了一半，但他又不甘心，请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向周恩来转达他想在北京会见周恩来的愿望。他在河内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北京的回电，只好起程回国。临行前，他把自己的回国路线告诉了中国大使馆，然后乘飞机回国。

飞机飞经苏联的中亚细亚的杜尚别，柯西金下飞机休息，突然机场上一名高级军官拿着一封电报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告柯西金："北京的电报，北京的电报。"柯西金一把夺过来，一目三行地看完电报，果然是北京发来的。电报告诉他，同意他与周恩来在北京会晤，专机降落的机场是北京南苑机场。柯西金看完电报后拍拍军官的肩，连说："哈拉硕，哈拉硕（俄语'好'的意思）。"随即去机场餐厅，吩咐服务员："来一杯杜松子酒。不，还是伏特加吧。"服务员端酒去了，柯西金春风满面，搓搓手，满意地捏捏手上的关节。

第二天，柯西金的专机起飞了，向南飞去，下午 3 时，专机在北京南苑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了。飞机停稳了，柯西金走出客舱，一眼就看到在飞机舷梯下等待着的周恩来，4 年不见了，周恩来明显地苍老了。

没有红地毯，没有乐队，没有仪仗队，没有鲜花，但有周恩来，这就足够了。柯西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中国对这次会晤的重视。周恩来同柯西金热烈握手，然后去机场的贵宾楼会谈。礼仪虽然简单（那是不得不如此），接待却很周到。柯西金心里一热，谈起了自己来访目的："周恩来总理，我很想直接和你对话，结束我们两国间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周恩来礼貌地说："柯西金总理，我很欣赏你的这种态度。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所以我们看到你的电报后同意了你来北京会晤。"柯西金说："我说，我们在边界问题上是不是有些误会？"周恩来不客气地驳斥说："柯西金总理，我不同意你们的这种看法。珍宝岛一仗你也看清楚了，我们在珍宝岛那里没有一辆坦克，一辆装甲车。而你们呢？在那里却有 100 多辆坦克。你们在整个边界上陈兵百万，从 1965 年以来，已制造边境纠纷 5000 多起，这怎么能用误会解释。"柯西金强辩说："你们不也是在边界增兵吗？"周恩来提高了嗓门："你们把坦克开到我们国土上来了，我

们还等着挨打吗？珍宝岛、新疆铁里克提两次武装冲突，都是发生在我国国土上嘛！”柯西金说：“这两块地方都是属于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也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可是你们要我们先承认沙俄与清朝政府签订的8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还怎么谈下去呢？”周恩来笑笑说：“你最好先去看看列宁1920年的讲演，看看他是怎么痛斥沙俄政府的。如果你们连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勇气都没有，那就等于关上了谈判之门。”

周恩来的雄辩令柯西金折服，他知道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这次短短的会晤中谈清楚的，便提议道：“周恩来总理，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我建议我们先停止边界冲突，我保证我们不首先挑起战争。”周恩来笑笑说：“我很赞赏柯西金总理为避免战争所作出的努力。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苏两国边界上的有些地段没有划定，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应通过谈判去解决。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我可以负责地保证：中国决不会挑起战争。但我们也不怕战争，包括核战争。”

55分钟的会谈结束了，周恩来邀请柯西金到餐厅入席。饭菜十分丰盛，柯西金等人吃得非常满意。最后双方通过了一项公报。公报非常简洁，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柯西金在机场和周恩来会晤后便又乘专机飞走了。柯西金走后，10月1日国庆节很快就要到来了。林彪已听说九、十两月最危险，借口视察老区到南方去了。毛泽东还一直在北京。这时勃列日涅夫的手已按到了核按钮上，毛泽东偏偏决定天安门广场的集会照样进行，自己也要登天安门，了解内情的人不禁捏着一把汗。

10月1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红旗翻飞，接受检阅的群众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整齐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招手致意。这时要是往这里扔一颗原子弹，那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但是，游行集会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参加完集会回来，周恩来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邓颖超责怪地说：“你还乐呢，我为你担了一上午心。可真奇怪，苏修怎么没有敢动手呢？”周恩来拿起热毛巾边擦脸边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告诉你了，我们最近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给苏修一个警告。”邓颖超奇怪地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登报呢？”周恩来得意地说：“兵不厌诈嘛，让勃列日涅夫慢慢琢磨去吧。他琢磨透了，我们的集会也早结束了。”

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确实还在琢磨。以前中国每完成一次核试验，新闻媒介都要大张旗鼓地报道。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报纸一字不提，显得非常神秘，唯一的解释是中国准备发射核武器，发射前进行两次高爆实验。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紧张了，中国的核弹要往哪儿打呢？中国自 1964 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后，以后又试爆氢弹成功，发射洲际导弹成功，中国的核打击力量已经完全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了。勃列日涅夫按着核按钮的手不觉有些发软。

这时，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份报告送到勃列日涅夫桌上。勃列日涅夫拿起第一份看了看放下了，又拿起第二份看了一眼，忽然暴怒地把文件扔在桌子上，大喊起来："不可能，这绝不可能。给我接多勃雷宁——"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六回　林彪发令现夺权野心　陶铸留言念死别弱女

话说1969年10月中旬，勃列日涅夫接到克格勃的两个报告。一个报告说是中国导弹发射部队已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经开通了。另一个报告说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做好了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计划。勃列日涅夫看到报告以后，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中美两国从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直接间接地交手打仗已经有几十年了，积怨这么深，美国怎么会站到中国的立场上去，帮中国说话。他要通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越洋电话，问道："亲爱的打瓦里希（俄语'同志'的意思）多勃雷宁，我这里有一份荒唐的报告，说美国站在中国一边，要对我国进行核打击。你在那边听到过这个笑话吗?"电话里传来多勃雷宁的声音："我最尊敬的打瓦里希勃列日涅夫，你所看到的那份荒唐的报告绝对没有错。几个小时前，我同基辛格博士见了面，他明确无误地告诉我，美国与中国的利益相关，如果苏联对中国实行核打击的话，美国只能认为这是苏联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将立即和中国组成盟军参战。他代表尼克松总统警告我，只要苏联的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那么苏联的130个重要目标将会在几分钟之内毁于美国的核导弹。基辛格博士还告诉我，尼克松总统已签署了一项命令，命令美国军舰停止在台湾海峡游弋。基辛格博士还说，他是念在私人情谊上把这些消息透露给我的，并且要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以免让他为难。"

勃列日涅夫问："你看这是不是放个空气球吓我们?"多勃雷宁说："不像。我最亲爱的打瓦里希勃列日涅夫，难道你忘了前些时中国礼送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学生离境，美国又放宽美国人去中国大陆旅游的限制？双方谁也不说什么，但配合得多默契呀！还有，请你不要忘了加勒比海危机……"勃列日涅夫不等他说完，大吼一声"够了"，"咔"的一声把电话放下。

勃列日涅夫放下电话后，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一饮而尽，不解地看着柯西金说："美国竟然帮中国的忙，两个打了几十年仗的老对手竟然站到一起去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柯西金镇静地说："这很好理解，如果我们打败了中国，那么我们的版图又会扩大50%，这50%可不是北极圈，我们的国家将会获得8亿劳动力，会独占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的军舰将会驻屯在大连、上海、广州、青岛这些优良的港口里。这些，我们知道，美国也知道。他们不愿意让一个强大的对手变得更为强大，大概这就是答案。"

勃列日涅夫脸色苍白，双手发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声："唉——我总算明白了。库兹涅佐夫呢？把他找来，请他去北京进行边界谈判。"柯西金高兴地搓搓手说："这就对喽。"

勃列日涅夫的手是否移开了核弹发射钮，中国领导人当然不会马上知道，战备工作照样进行。林彪行动快，动作迅速，可说是战备工作落实得最好的一个人。还在8月初，林彪听说勃列日涅夫打开了他那个昼夜不离身的宝贝密码箱，便连夜动身去南方巡视了，一头钻进山峦起伏的井冈山，再也不敢出来了。勃列日涅夫你要打原子弹就打吧，你核弹再多也不会往这穷乡僻壤的大山里打。林彪选的这个地方，比北京小市民的小防空洞可要强不知多少倍，你说林彪对自己的战备工作搞得多好。

林彪的车队沿山间公路缓缓而上，最后到了井冈山区的中心地茨坪。林彪一下车，看到面前是一所漂亮的小别墅，立刻吩咐秘书："我怎么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呢？当年在井冈山上我们都是住茅棚嘛。我看住井冈山宾馆就很不错了。"林彪的吩咐，谁敢不执行。其实，林彪完全可以不必这样显示自己的艰苦朴素，他要住井冈山宾馆不要紧，可苦了工作人员和宾馆来的客人。工作人员紧急行动，把客人统统撵走，于是，一个大宾馆成了林彪一人独占的行宫，弄得茨坪鸡飞狗窜，不得安宁。

第二天一早，林彪带了人去登黄洋界。也许是故地重游，再忆青春的缘故吧，林彪居然不用人扶，就来到了井冈山的制高点，也是扼制井冈山孔道的险隘黄洋界。这里居然还保留着当年黄洋界哨口的瞭望小楼，附近还依稀看得见当年红军工事的残迹。林彪知道，凡来井冈山参观的人必登黄洋界。一是这里高，可以俯瞰井冈全景；二是这里曾发生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林彪记得很清楚，那是1928年8月，红四军在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的催逼下，派出一部分向湖南发展，结果二十九团在路上被击溃，二十八团一个营长拉队伍逃跑。团长大胡子王尔琢闻报后急忙带了两个连去追，结果这个营虽然追回了，但王尔琢却被叛徒用冷枪打死。毛主席在井冈山得到败报，率一营部队下山接应，山上只留下了一营部队坚守。这时白军数团乘机偷袭，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发生了。

战斗发生时，红军处于绝对劣势，以不足一营士兵与数团白军战斗，困难可想而知。但黄洋界地形好，红军凭险抵抗，白军难以攻进，相持半日。这时红军拿出留下的迫击炮，打了一炮。山下的红区群众武装，四处摇旗呐喊助威。白军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返回来了，遂慌忙逃走。

毛泽东为了纪念这次战斗，还专门写了一首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林彪当时随二十八团出发了，没有参加黄洋界保卫战，回到根据地后才听说此事。当年部队每天都在作战，林彪也没有把这次战斗放在心上。直至几十

年后毛泽东的词《西江月·黄洋界保卫战》发表，这次战斗才引起了林彪的重视。他还特意在《毛泽东选集》中《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的空白处写了许多学习体会，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很高兴，着实夸奖了他几句。

现在，林彪站在黄洋界哨口，举起望远镜眺望，只见群山连绵，白云似海。他放下望远镜，想起了那次失败的南征，想起了在井冈山上披被站哨、南瓜充饥的艰难岁月，不禁思绪万千，流连忘返……

国庆过后，林彪又避弹来到苏州，住在姑苏城外一所幽雅而宽敞的别墅里。此地从外面看，其貌不扬，进入里面才发现别有洞天，曲径回廊，高楼水榭，极尽南方园林之秀美。这天一早，林彪就在客厅闭目养神，等待毛泽东的座车到来。

秘书进来报告："主席的车队就要到了！"林彪睁开眼睛，忙出来在外等候。一会儿，毛泽东的座车缓缓地开过来，林彪连忙上去迎接，把毛泽东请进客厅。这段时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冒着危险守在北京，林彪却早早地到了井冈山，因此林彪心里有些发虚，毛泽东会不会因此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呢？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吸着烟，问林彪："最近身体怎么样啊？爬山了没有？"林彪恭敬地说："爬了，爬了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毛泽东困惑地望着林彪，世界上最高的山？不就是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吗？此山可不是想爬就能爬上去的。1960 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试登此峰，最后只有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登上这地球之巅，开创了人类登山史的新纪录。此外，再没有什么中国人、外国人从北坡登上此峰。林彪就这身体去登珠穆朗玛峰？笑话。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疑惑，肯定地说："是的，我爬上了世界最高的山——韶山！"毛泽东不解地说："韶山？不就是个小土堆堆吧，算得上什么高山？又怎么能是世界最高的山？"林彪满脸是虔诚的表情："我认为韶山是世界最高的山，因为它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嘛。行星围着太阳转，我们革命战士永远紧跟毛主席走。"毛泽东笑笑，又问道："你最近都在读一些什么书呢？"林彪答道："我当然是在读毛主席的书呢。毛主席的书是我们革命战士的行动指南，要学懂学通必须下大力气。"他说着拿过茶几上的一本毛选呈递给毛泽东："这是我的学习体会，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打开书一看，只见书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体会。毛泽东翻翻放下说："也不要光学我的书，还要学习马列，你自己也可以编一部书嘛。"林彪固执地说："我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学习马列的捷径。"

毛泽东不说话了，悠然自得地吐了口香烟。林彪在一旁偷偷观察，发现毛泽东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神情，他放心了。

毛泽东走了以后，林彪在苏州的别墅里想了好半天。自己虽然是副统帅了，但还从来没有单独发布过命令，现在大敌当前，何不借此来个演练，看看自己的威信如何，将来有事，也好心中有底。于是他关起门来，写了两天，写出一个二百来字的"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要点"，用电话传达给总参谋长黄永胜。黄

永胜立即根据林彪的要点草拟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发全国全军。10月20日，全军、全国都在紧急传达“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城市人口开始疏散，工业转入战时生产体制，全军和总参的联系迅速加强。

毛泽东这时在杭州，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看一遍，抽烟想一会儿，又拿起来看，看完了又想。毛泽东初次看到这个命令，简直难以相信这是林彪干的。全军、全国立即进入战时体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有国家主席才有这个权力。当然，现在没有国家主席了，这个权力已由党中央主席接过来了，林彪怎能越权发布这样的命令呢？这是何等的大事，怎么事先连个消息也不通，招呼也不打，林彪想干什么？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那篇政变经又清晰地浮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他想起了秦王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当时唐高祖李渊虽然当着皇帝，但实权却在秦王李世民的手里。他依靠军队的支持，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自己的政敌，即是他的同胞兄弟建成和元吉，逼李渊逊位。林彪的这个一号命令和玄武门之变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一想到这里，掐灭烟头，在这个一号命令上重重地写了两个字：“烧掉。”

批件送到北京黄永胜那里，黄永胜顿时慌了手脚。作为总参谋长，他不经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就擅自发出林彪一号命令，是严重的违反纪律行为，毛泽东如果要追查的话，马上可以把他送进监狱。怎么办呢？解铃还得系铃人，他马上要通了林彪的电话，同千里之外的林彪进行密谋。林彪听说毛泽东反对发布一号命令，虽然有些吃惊，但也在预料之中。他暗授密计：“永胜，既然主席说很好，烧掉，那就烧掉吧，就当没有这回事。”黄永胜心领神会，签署了文件传达毛泽东的批示。他把毛泽东的批示改成“毛主席阅后，批示：很好，烧掉”。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很好，又要烧掉，逻辑上不通。其实这只是少数人的看法，大多数人以为林彪一号命令既为战备而发，当然属绝密，为了保密，纵然很好，也要烧掉。林彪、黄永胜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以售其奸的。

林彪的一号命令一发布，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来到陶铸被关押的住所，向他宣布了组织的决定：“决定对你实行紧急疏散，明天即离开北京。”陶铸没有说什么。汪东兴又把曾志叫到办公室，对她说：“根据中央决定，陶铸要立即疏散，离开北京，你怎么办？我们研究后决定，你可以随陶铸一起走，但必须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如果不愿意一起走，可以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和陶铸断绝联系。怎么办？你可以和陶铸商量一下，但必须尽快告诉我。”

曾志知道和他再讲什么也没有用，便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囚所。陶铸急问：“叫你去有什么事？”曾志摇摇头说：“没有什么。”陶铸怀疑地问：“没有什么？鬼才相信呢。你说吧，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曾志迟疑地说：“本来想晚点告诉你，现在干脆对你说了吧。汪东兴问我是跟你一起走呢，还是去广东插队——”陶铸听了脸色很平静，想都不想就让曾志离开他：“你不要陪我去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你跟我去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何苦去受罪呢？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们的亮亮，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你争取和亮

亮在一起，只要你们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死也瞑目了。”

曾志难过地低下了头，只听得陶铸难过地说：“亮亮，我的女儿，你受苦了。唉，你为什么要生在我们家呢？你若是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多好。”曾志抬起头来，分明看见两滴眼泪从陶铸的眼窝里掉出来。曾志慌了，从她认识陶铸起，这是第一次看见陶铸掉泪。

即将到来的离别是死别。早在半年多前，陶铸就患了癌症。经周恩来总理督促，陶铸被送进医院做了手术。前些天陶铸又感到发烧，经医生检查，是癌症扩散。身患重病，又被疏散，远离亲人，这不是死别是什么。当天晚上，曾志烧了一盆水，又一次为陶铸洗澡。在以往的岁月，由于两人都身负重任，很少在一起生活。在广州的时候，只有在星期六，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志才到丈夫、中共中央中南区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陶铸在军区大院里的寓所去会见陶铸。现在，她想在这最后的时刻，多为陶铸尽点妻子的义务。

分别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曾志一早起来，为陶铸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陶铸这时吃东西已很困难了，他强忍着疼痛，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吃完了饭。门外进来了几个战士和医生，医生为陶铸打了一针杜冷丁。陶铸拄起手杖，走到曾志面前，定定地看着她说：“我走了。别无牵挂，只是亮亮，你们要千万在一起啊！”曾志哽咽着说：“你放心吧。”她为陶铸打开车门，扶他坐好，珍重地道别：“再见！多保重。”陶铸也珍重地回答道：“再见，千万保重，亮亮……”

车开走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似乎都没有结束。曾志回到“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这是昨天陶铸亲自写给她的一首诗，诗曰：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志把这首诗反复看了几遍，用小塑料纸包紧，紧紧地缝进棉衣里。

运载陶铸的专机从北京机场起飞后，当夜也就是10月18日夜降落在合肥机场上。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迎接的亲人，有的只是士兵严厉的口令声：“干什么的？关灯！”在黑漆漆的机场上，陶铸被士兵架着走下舷梯上了一辆轿车。轿车疾驰着，最后来到一所部队医院。陶铸向四周环顾一眼，向这个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被送进一间特殊病房。窗子用木板钉死，蒙上大黑窗帘，一

丝光线也透不进来。他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权利也没有了，床头上挂着的病人的名字是“王河”。

陶铸在这所特殊的监狱里住了下来，每天在斗室散步活动。他不想死，他企图尽力推开死神。但死神被许多双看不见的手给推过来，陶铸无法与这么多双手抗衡。来合肥一个月，便已不能下床了。医院一再说明病情严重，请求给王河手术治疗，上面最后批准了。无影灯下，医生们打开了陶铸的腹腔，不禁个个目瞪口呆，只见癌肿瘤已布满了陶铸的腹腔，或大如蚕豆，或小如绿豆，根本不能手术治疗了，医生们又缝合了陶铸的腹腔，把他送回病房。

陶铸无法吃饭，医院只有给陶铸输液。癌症加上腹部的创口，陶铸疼得满床打滚。他坐起来，趴下去，用拳头顶住腹部，腿蹬来蹬去。双眼痛苦得闭了睁，睁了闭。有名护士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痛苦，偷偷地给他打了一针止痛剂，他才稍好过了些，但立刻被监护人员发现，这名护士受到严厉申斥。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病痛使陶铸的脸变了形。他拼命地同死神搏斗，拍打着墙壁，打得墙上刷着的石灰粉掉下来，掉了一床一身。

医务人员来到粉墙跟前，不禁大吃一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七回　刘少奇遗恨开封府　邓小平结谊南昌市

话说陶铸在合肥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护士虽然看着不忍，但因为没有上级的批准，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陶铸受罪。

陶铸病危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办负责人立即通知专案组赴合肥，处理有关问题。

这时，有关刘少奇病危的报告也不断被送到中办负责人的办公桌上。刘少奇是10月17日晚离开北京的。从1968年10月以来，刘少奇百病齐发，已完全不能进食，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1969年10月17日晚，中办负责人来到刘少奇的房间，通知他立即离开北京。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报纸上写了一行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偏过脸去，不看这行字。中办负责人命令：“立刻转移。”刘少奇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身上没有穿任何衣裳，医务人员遂拿了一条缎被裹在他的身上，把他往担架上一放，送进救护车，向机场疾驰而去。当夜，专机降落在河南省开封机场。几个医护人员登上舷梯，进入客舱，只见地板上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他没有穿任何衣服，一条粉红色的缎被裹着他的身子。患者大概至少有一年多没有理发了，银白色的头发有一尺多长，散乱地披在头上。这些医护人员仔细地看了看，个个暗中吃了一惊，这不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吗？怎么今日到了这个地步。有人不禁鼻子发酸，但也不敢哭出声来。

救护车疾驰着，来到开封市的一个小院。这个小院里有4栋3层楼房，前后左右都不临街。小院过去是金城银行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市人委的一个院子。刘少奇来前，地方部门已对小院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一切无关人员都被清理出去，围墙上架起电网，院外有重兵把守。

刘少奇在晚上被送进了小院西楼的一个房间。由于他的肺炎一直未好，晚秋深夜在路上颠簸，又没有穿衣服，受凉发烧，肺炎复发，呕吐不已。大家都明白，他已活不了几天了。但是刘少奇不想死，他主动配合医生、护士进行治疗，他想活着看到林彪、江青垮台。

刘少奇的卫士长老李眼看刘少奇生命垂危，而治疗却十分马虎，于是连夜赶回北京，向中办负责人报告。负责人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先休息一天，明天再汇报。”说完放下电话。卫士长老李无奈，只好等第二天再说。是日深夜，老李躺在床上，心却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开封。那里，国家主席刘少奇危在旦夕，

正翘盼着他的救援，他怎能安睡呢？他思前想后，直至很晚，才蒙眬睡去。忽然，电话铃声把他吵醒。他跳起来接过电话，原来是中办负责人来的电话："刘少奇已于昨日死去，你立即回开封去。"老李惊得半天都没有放下电话。他回过神以后，赶快取了一些衣物奔往机场。

次日凌晨，老李赶到开封，进了西楼，却不见刘少奇的遗体。医护人员引着他到了地下室，只见刘少奇的遗体被放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蒙着一个白被单。老李揭开被单一看，只见刘少奇临终时因痛苦挣扎，脸已变形，嘴部尚有血迹。老李悄悄地问护士："咋死的？这么快？"护士不敢讲。老李再三请求，护士看左右无人才悄悄告诉他："11 月 10 日晚他又开始发高烧，我们报告了领导，要求派人来抢救。不知为什么，抢救的医生一直没有来，无法确诊，只好按肺炎治疗。至 11 日深夜，病人体温上升到 41℃，瞳光反应消失，第二天 6 时 45 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小时后，抢救的医生才到这里。"

一切都明白了。老李强忍悲痛，把带来的一套旧衣服套在刘少奇光着的身子上，又给他剪去蓬乱的长发，刮了刮脸，算是整了容。目前他能做到的，就是这些了。

天亮了，专案组命令把刘少奇的遗体抬上来放在院子里，摄影师前后左右拍了好几张照片。拍完照，专案组又命令把刘少奇的遗体抬进原是金库的地下室过道里，锁上了半尺厚的铁门。

11 月 15 日零点，一辆六九吉普车驶进了这座小院，专案组人员指挥士兵把刘少奇的遗体抬出来，放在吉普车上。车子装不下刘少奇的躯体，就索性让两只脚露在车外。吉普车向火化场驶去，刘少奇遗体的两只脚在车外磕磕碰碰。深夜里开封市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辆车，只有这吉普车高速行驶着。

火化场已被告知有个"烈性传染病患者"的遗体要来火化，根据上面的要求，火化场只留下了两名工人，其他人全部撤离，一个排的部队在火化场上严密警戒。中办的一个人填写着火化单：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

现住址：××××部队

与死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填写完毕，他命令"火化"。刘少奇的遗体被工人推进了火化炉。

火化完毕，专案组负责人把参与此事的人召集到一起，宣布对今夜之事要严格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出去。随后他们定了一桌酒席，一是为自己压惊，二是庆贺他们完成了任务。

中办负责人接到刘少奇专案组的报告后，放下心来，总算没有出什么事。

没有几天，他又得到报告，得知陶铸已于11月30日22时15分死去，他又命令陶铸专案组速赴合肥处理。专案人员走进陶铸的房间后，只见他圆睁双眼，怒气冲天。专案人员吓得大叫起来："他没有死啊！"护士扶住他说："他死了。"说完，她走过去揉了揉陶铸的眼皮，合上了眼睛。

陶铸比刘少奇要幸运些，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他的遗体往合肥火化场拉去。陶铸的遗体穿着一件黑呢大衣，外面罩着白被单。火葬场已被告知，来火化的是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的遗体。火葬场上只留下了两名工人，其他人都奉令离开。监护人员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口罩，似乎是烈性传染病的医护人员。专案人员填写火化单，死亡人姓名：王河，骨灰寄存者姓名：斯亮。

火葬场办手续的人不知道，斯亮就是陶斯亮，是陶铸的独生女儿。

火化单填写好后，陶铸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

"文化大革命"中喊得震天的一句口号是"打倒刘、邓、陶"。刘、邓、陶三人中，刘、陶已遗恨仙逝，邓小平怎么样了呢？邓小平此刻正在江西南昌的一个步校中，过着囚禁的生活。由于毛泽东在九大上的一句话，邓小平没有遭到刘、陶那样悲惨的命运。

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以后，中办负责人通知邓小平、陈云、王震疏散到江西去。周恩来得知后深为忧虑。他知道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组组长程世清和林彪非常亲近，前些时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把林彪写成一个艰苦朴素到极点的清教徒，由于瞎话编过了头，人们都把这篇文章当笑话说。现在这么多老同志要到江西去，江西省手握大权的又是这样一个人，周恩来真不放心，想着应该给江西提前打个招呼。

10月18日上午8时，周恩来拨通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的电话。周恩来问道："你是程世清政委吗？"对方已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回答道："总理，我不是程世清政委。程政委下乡去了，杨司令员也下乡去了。我在看家，我叫程惠远，现在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周恩来一怔，主要负责人都不在，转而一想，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作用也很重要，因为具体事情都是他负责落实的，只是不知道他和程世清的关系怎样，便在电话里问道："我是周恩来啊！你是同程世清政委一道从济南部队调过去的吗？"程惠远回答说："我不是从济南部队去的，是从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调到江西的。"

周恩来听说程惠远是从中央调去的，不觉松了一口气，在电话里通知说："中央有个决定，请你向程世清政委和其他同志讲一下。最近一些中央首长要到江西蹲点调查，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陈云同志有秘书和警卫员跟随。王震同志是全家都去。都是老同志了，让他们住好一点，房子装上暖气。老同志去了后可以到处看看，适当参加一点劳动，到干校去玩玩，可不要把他们当劳力使，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身体又都不好。"程惠远答道："总理的意思我明白，我会尽力做好这件事的，总理放心吧。"

周恩来见这件事交代清楚了，便又交代第二件事情，这件事讲起来比较难讲好，周恩来不得不字斟句酌："还有第二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中央办公厅给你们打招呼了没有？邓小平夫妇二人也要到你们那里去……"讲到这里，周恩来听见程惠远惊叫了一声，知道他此时心情紧张，便解释说："对邓小平的问题，主席已经在九大说了话。主席说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九大后邓小平一直在家读书。他到你们那里，也可以搞点调查，参加一点劳动，住的地方也要稍微像个样子，出了问题咱们都不好向主席交代噢。我再次给你们打个招呼，这几个同志下去，你们要照顾好。"周恩来停了停，又意味深长地说："这几位同志下到江西，你知道是谁安排的吗？我告诉你，最近主席从你们江西回来，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你们好好领会主席的指示。"程惠远连连说："我明白，我明白，总理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程惠远把周恩来的指示整理出来后，立即向在家的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作了汇报，接着乘坐吉普车向与安徽交界的婺源县驰去。程世清正在那里蹲点，程惠远要向他面报周恩来的电话指示。婺远距离南昌有 350 公里，程惠远行至中途景德镇时，天色已黑，人困马乏，草草漱洗用餐后，就上床熟睡。忽然服务员进来把他推醒，原来是省革委会给他来了紧急电话。程惠远连忙披衣去接，只听省里负责人告诉他："现在传达林彪副主席一号命令，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很快就要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程惠远放下电话，好生奇怪，这个电话的精神和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到底服从哪一个指示呢？他不敢耽搁，第二天一早又驱车向婺源驰去。

程世清听了程惠远的报告后，半天没有说话，到底该听哪一个的指示呢？程世清毕竟是经过戎马生涯，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旋涡中滚过来的人。他想，下来的这几个人不同于其他人。陈云是党的元老，威高望重。王震是深受毛泽东信任，战功赫赫的猛将。他们在九大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虽然被称为党内第二个最大的走资派，但毛泽东在九大已明确讲了邓小平的问题不同于他人，明显含有保护之意，不可对此掉以轻心，何况总理已有明确指示。

那么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个万全之策，遂向程惠远口授回电："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 3 人先安排住滨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汇报与介绍，然后把邓小平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具体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去的地方，我们给装暖气。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 3 个人来后，每人给配一辆小车。下一段活动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作了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1. 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2. 陈云、王震同志确定来江西前，我们想派人去接他们是否可以？"

程惠远一字一句地记下了程世清的回电。记好后，程世清又反复核对了记录，确认无误后便命令程惠远速回南昌，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听了程惠远的汇报后，表示同意程世清的意见，又指示邓小平应安排在南昌郊区为好。程惠远决定把邓小平安排住在南昌市郊新建县内的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内。这所学校现在空着，校内绿树环抱。转过教学大楼，有一条小路通向高岗，高岗上有一栋两层小楼，小楼前后左右是宽敞的院坝，周围绕以冬青树篱组成围墙。这是原来步校校长的住所，号称将军楼。

10 月 23 日清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偕继母夏培根离开北京，在南昌住了几天，便乘车来到步校，在将军楼住了下来。几年来，邓小平遭批斗，又是在凄风苦雨中离开北京，心绪自然不佳。一进这将军楼，虽然校舍寂寥，但风景宜人，环境幽雅，他的心情为之一爽，洒扫房间、陈几安床。转眼寒冬已过，春雨霏霏，桃红柳绿。邓小平等 3 人，乘着春雨湿润，把院子开成菜地，种瓜点豆，养鸡喂鸭，小院平添不少生机。

军校旁边，有一个 100 多人的小厂，这就是江西省指定的邓小平劳动改造的工厂，厂长罗明，战争年代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参加过上党战役，真正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新中国成立后，罗明任公安部某局副局长，后因 1959 年反右倾下放江西，历经坎坷，现在调到这个小厂任厂长。罗明这天在办公室办公，一位军代表领着一个矮个的老师傅来到办公室。这位老师傅身穿蓝卡工装，脚蹬黄色力士鞋。罗明初未注意，后来定睛一看，天哪！这不是当年二野的邓政委吗？在自己的老上级、名震中外的方面军统帅、中共总书记邓小平面前，罗明竟愣住了。

军代表给双方作了介绍，邓小平过来和他握手。罗明连忙端水递烟，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工厂的情况，然后指着办公室旁边的一间空房说："这间房子空着，如果你累了，可以到这间房子休息会儿。"邓小平没想到工厂对他这么客气，连连表示感谢。

这个小厂是修拖拉机的。罗明考虑到邓小平年纪大了，也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让他当钳工，一个人在一个角落的钳床上锉零件，既安全，进度也完全可以由自己掌握。邓小平一听说让他当钳工，非常高兴："要得，要得。"他往钳台前一站就锉起来。罗明等人见他干活的架势蛮在行，零件也锉得合格，甚为惊讶，问道："……你怎么对钳工技术这么在行？"邓小平客气地说："你们以后就叫我老邓吧。小罗啊，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学习马列主义，到法国勤工俭学，学的就是钳工。白天做工，晚上读书，我还在火车头上当过司炉呢。"

罗明这才知道，老首长当年为了革命，还吃过这么大的苦，对他更尊敬了，虽然嘴上不好说什么，但行动上处处加以关照。考虑到军校到工厂得绕一个大圈子，罗明叫了几个人悄悄地修了一条从工厂到军校的直线小路。从此，邓小平从军校到工厂再也不用绕大弯子了。日复一日，邓小平在这条小道上来回奔

走，工人们干脆把这条小道称为“邓小平小道”。

说也奇怪，邓小平、卓琳到工厂是来劳动改造的，但谁也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什么大走资派。工人们明白，眼下是忠臣落难，他们不但不去歧视他们，反而为邓小平来厂劳动感到荣幸。这些工人在“文化大革命”前都看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描写甲午中日海战的电影《甲午风云》，此片中忠心报国、勇撞敌舰的管带邓世昌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于是他们仿照电影中士兵称呼邓世昌为“邓大人”的办法，在后面都悄悄地叫邓小平为“邓大人”。为了保证“邓大人”的安全，带班工长每天比邓小平早到20分钟，检查窗户地面和工作台，防止坏人捣乱。卓琳被分在电工班，和她一起的几个女电工成天缠着卓琳讲北京的风光建筑，从中南海水有多深问到国宴上菜有几道。她们也教卓琳做米酒，遇有生活上的难事，总是帮她解决。

“文革”以来，邓小平、卓琳第一次生活在一个温暖的集体里，心情愉快了许多。邓小平来时穿着十分合身的蓝卡工装明显地显紧了。每到夜间，邓小平与卓琳读书学习，谈及工厂工人的深厚情谊，总是非常感慨。同时邓小平也知道了工人生活还相当艰难，怎样尽快地让全中国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呢？在将军楼前面的小院里，每天晚饭后邓小平一圈又一圈地散着步，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虽然还处于被监管状态，每天上下班有军代表跟着，但总算有了个稍为安静一点的环境，日子也就打发过去了。只是有一件事令邓小平日夜不安，那就是大儿子邓朴方——胖胖的境遇。“文革”前，胖胖在北大物理系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邓朴方坠楼受伤，造成残疾。此后，他被医院撵了出来，寄宿在北京清河收容所，每天躺在床上，靠用铁丝编纸篓挣几个零花钱挣扎度日。邓小平希望能把邓朴方接到身边照顾，恰好中央办公厅也有此意，让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派人把邓朴方接到南昌，让邓小平的其他4个孩子，邓林、邓楠、邓榕、邓质方来南昌探亲。不久，邓榕上了江西医学院，邓质方上了江西工学院，邓林已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邓楠也已大学毕业。4个孩子都来到了邓小平的身边，该上学的又都上学了，邓小平生活在天伦之乐中，心情也格外愉快起来。

这些宽松的政策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自己寄予厚望？邓小平铺开纸笔，准备给毛泽东写一信，汇报一下自己来江西后的劳动体会，忽然听得几个人上楼来，接着几个军人出现在门口，军代表抢先一步介绍道：“这就是程世清政委，这是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同志。”邓小平指着木沙发说：“请坐，请坐。”程世清和陈昌奉在木沙发上坐下来。邓小平望望程世清，见他身穿将军呢制服，一副傲慢的姿态，便有点不痛快。陈昌奉过去见过面，他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在江西中央苏区时经常来他这里办事，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邓小平也不好同他打招呼。

程世清坐下来，喝了口茶，便问道：“你来江西劳动一段时间了，感觉怎么

样啊?”邓小平客气而不失身份地回答说：“我已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交给汪东兴同志了，我的情况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程世清碰了个软钉子，又扯起别的话题来，最后又问：“你在这里还有什么困难吗？我们尽量给你解决。”邓小平还是那句话：“我的意见已经在信里讲清楚了。”程世清见邓小平不愿多交谈，打了个招呼，和陈昌奉一起退出来了。

光阴如箭，不觉已到了 1970 年的 3 月，邓小平来南昌已经 5 个月了。这天，邓小平顺着“邓小平小道”来工厂劳动，他在钳台上正锉着零件，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八回 陈伯达身败庐山会议 林立果密建联合舰队

话说邓小平由于劳累，在工厂劳动时突然晕倒。罗明等人急忙把他扶到休息室躺下，炮团卫生队的医生闻讯急忙赶来抢救，工人们又端来糖水。经过抢救，邓小平醒过来了，休息了一阵以后，人们把他护送回将军楼。

这时，邓朴方已被送到步校。邓小平、卓琳看到儿子面容清瘦，病情严重，难过得掉下泪来。邓小平每天亲自动手为儿子洗澡，总是累得出一身汗。厂里知道后，便特意请了一个中年妇女照顾邓朴方，邓小平这才轻松了一些。

前几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在南昌生活劳动的情况。信送走后，一直没有收到中办的通知。他当然知道这封信肯定会送到毛泽东手里，只是不知毛泽东看了此信后有何想法。

远在南昌，不能听任何文件传达的邓小平不知道，此时毛泽东正忙于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对他的来信没有作什么批示。当然毛泽东看信后还是很满意的，也想到了当年在中央苏区邓小平陪自己挨整的情景，他准备过一段时间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这次九届二中全会一开始就有些不大对头。3 月 8 日，毛泽东向政治局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准备修改宪法。他特别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既然毛主席说了不设国家主席，那不设就是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都同意，江青更是高兴，唯有林彪不高兴。设国家主席，江青自知没有自己的份，周恩来也不会去当，那必然是林彪要当了，江青觉得这将是对自己极大的威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林彪非要设国家主席不可，听说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当天晚上就给毛泽东打电话："主席，我们都想请您出来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高兴地说："我说了，不设国家主席。"说完就放下了电话。林彪握着电话发愣。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又给游泳池打电话。毛泽东听说是林彪的电话，接都没有接，让秘书对林彪说："主席问候林彪同志好。"

林彪连碰钉子，并不死心，让叶群指使黄永胜、吴法宪制造舆论，说林副主席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吴法宪知道毛泽东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对叶群坚持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不理解，问叶群："主席已经说了，他不当国家主席，为什么非要设国家主席呢?"叶群瞪了他一眼说："吴胖子，你怎么连这点都不懂。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吴法宪这才明白林彪的底牌，原来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林彪自己要当国家主席。吴法宪已是死

心塌地地要跟林彪跟到黑，听叶群交底后马上出去散布舆论去了。

林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凝神不动，掂量着即将到来的这场暴风雨。上一年10月20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团来华谈判，以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又率团去苏联谈判，边界谈判虽未获得实质性进展，但边界冲突却停息下来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也已离开了核按钮。根据各种消息，主席对自己发布一号命令有了看法。最近，张春桥越来越受到重用，似乎有让张春桥接班的意思。虽然九大党章上明确写上了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会接毛主席的班。宪法、党章是人写的，人也就能修改它，只要主席一句话，还不就改了。林彪想到这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设国家主席，只要自己当上了国家主席才有权力对付江青那帮人。

深夜里，林彪把秘书叫来，吩咐他："你记一下吧，我有个建议要报中央。"秘书坐下来准备记录，林彪口授了他给中央的建议：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秘书整理好记录稿后，林彪拿过来反复核对了几遍。他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很满意，他想象着，毛主席接到这个建议后，一定会认为这是林彪忠心的又一表现，你看林彪一再拥戴自己当主席呢，江青那些人想反对也无处下手。你反对毛主席兼国家主席吗？那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个罪名扣到谁的头上都够戗。你们认为是我林彪想当副主席吗？我已写明了不当副主席。当然，主席是不会兼任国家主席的，最后这个国家主席还不是我林彪的？

中央政治局接到林彪的报告后立即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建议，冷笑两声：他这是学三国东吴孙权劝曹操做皇帝的办法呢。当年曹操接到孙权的劝进信后嘲弄孙权"是要把我放在炉子上烤呢"，坚决不做皇帝。现在林彪三番两次劝自己做国家主席，也是想把我毛泽东放在炉子上烤呢。他拿起红铅笔，在林彪的建议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本来他还想再加上"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但想想算了。

批件退下来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明白，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其中原因，大家也都明白。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如此几年，毛泽东深有大权旁落之感，搞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弄得国家伤筋动骨，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毛主席又站在一线，现在毛主席怎么会同意再设国家主席呢？

毛泽东的心理，江青看得清楚，林彪也看得清楚。江青看得清楚，有恃无恐，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林彪看得清楚，心里发虚，坚决要设国家主席。两人都不露面，都是指使参加宪法起草小组的手下人去争去吵。于是，宪法起草

小组内，以康生、张春桥为一派，以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为一派，两派相争，阵线分明，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的主要出场人又主要是张春桥、吴法宪。江青对张春桥面授机宜，林彪给吴法宪连电奖励。“文化大革命”中整人起家的两个集团——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的蜜月已经结束，双方进入了权力再分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

这样吵来吵去，不觉就到了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此月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江西九江机场全部戒严，大型喷气式专机不断起飞降落。从山上到山下的公路沿线，也全部由部队严密戒备，一辆接一辆的“红旗”轿车络绎不绝地沿山而上。

毛泽东坐专列到了九江。上山后，他先把政治局常委们找来，给大家打招呼：“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他瞟了一眼林彪说：“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林彪顿时感到后背发凉，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从美庐出来，林彪看了看庐山，只见白云如海，波涛滚滚，时隐时现，莫测高深。林彪一阵冷战，深深感到中国的政局就如同这庐山的云一样，显得波诡云谲。不知这场较量自己能否获胜，要是落个当年彭德怀一样的下场那就惨了。但是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要想中途退却那是没有出路的，拼命而行，说不定还会杀出一条路来。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了。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幕，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接着，康生代表宪法起草小组对修改宪法的历次主席指示和修改宪法草案起草的过程作一说明。这时，林彪突然要求发言。毛泽东眼里闪过几点火星，立刻意识到林彪今天的讲话是来者不善。前几天开会前的常委会，林彪一直没有要求在会上讲话，现在却迫不及待地要求讲话，看来是在下面商量好了，要搞突然袭击。当着这么多中央委员的面，不让他讲也不行，于是毛泽东点点头，让林彪讲话。

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林彪一上来就讲天才，讲毛主席是天才，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设国家主席，请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林彪的话完全打乱了会议进程，毛泽东绷紧了脸，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这时林彪讲得更带劲了，唾沫四溅地喊着：“谁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毛主席，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毛泽东听着林彪的讲话，心里明白，他这是在骂江青和张春桥，因为江青和张春桥就一直按着自己的意见，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称天才。毛泽东心里冷笑几声，什么天才，什么大树特树，还不是为了树林彪自己，好爬上国家主席的宝座。

开幕式结束后，林彪和江青都部署人马准备战斗。双方都明白，林彪上午的讲话等于叫了阵，下面就得各路军马上阵了。江青把张春桥叫到自己住的别墅，密商战略，最后还是康生出了点子，暂时守住阵脚，让他们充分表演，最后等主席发话了，一个反攻过去，保准让林彪他们一败涂地。

江青在紧张部署，林彪也在紧张调兵。黄永胜不在山上，叶群就只有靠吴法宪在一线指挥了。叶群通知吴法宪，叫他组织指挥李作鹏、邱会作在第二天的小组会议上发言，要多串联海军、空军和总后的一些军官。吴法宪因为上庐山后在宪法草案讨论中和张春桥斗得很厉害，林彪特意让林立果去电话对他表扬一番。吴法宪这时正是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干一番，接到叶群的指示后，他立即把上海和浙江的空军领导人王维国、陈励耘找来，要他们第二天发言时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论："谁反对讲天才就是反对毛主席。"

只是陈伯达还有点犹豫。他本来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理应站在江青一边，怎么站到林彪那里去了呢？原来江青在文革小组早就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陈伯达经常和江青发生争吵。他的名声很高，却没有实权。这时陈伯达看到林彪手下有5员将，人多马壮，便悄悄地同叶群挂上了钩，投到林彪这里来了。但是陈伯达胆小怕事，怕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发言砸了锅。他已听叶群说了林彪的讲话是毛主席看过并且同意了的，但他不怎么相信，叶群是撒谎撒出了名的人，他决定去林彪那里核实一下。

这天天黑时分，陈伯达趁着夜色，溜进了林彪的住所，吞吞吐吐地问道："我听叶群说副主席的讲话是毛主席看了的？"林彪大吃一惊，作噤声状："这事就谈到这里，不要说出去。"陈伯达赶紧不说了，林彪的话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大干了起来。

8月24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先由林彪定下的口径，在各组带头发言。叶群事先曾指示大家发言时要带感情，所以这些人在会上一个个都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吴法宪哭泣着说："这次讨论宪法修改中，有人要否定毛主席天才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有人还反对这个提法？我听了这话气得发抖。这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副主席讲话说他坚持天才论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讲话。我认为，20世纪的天才就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收回这句话。"李作鹏、邱会作也是慷慨激昂，杀气腾腾。叶群当过国民党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更是表演动人，声泪俱下。他们的发言各有特色，但无外乎要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更是找了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说到天才的一些语录，断章取义地编到一起，还真迷惑了一些人。许多中央委员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以来喊天才已喊顺了嘴，竟看不出林彪的天才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上了大当。

江青知道在庐山上将会和林彪有一场恶斗．但没想到他们的动作这么凶，又这么整齐。更使她吃惊的是陈伯达公然站到林彪一边去了，而且表现得十分活跃，竟成为林彪的一员大将。她把张春桥请来，二人拉上窗帘，商量下一步的计划。江青痛心疾首地说："没想到，夫子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我太大意，总以为他胆子小，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没想到这次他还真干了。"张春桥点点

头说："这是我大意了，我早看出他对我们是三心二意，只以为是意见分歧。现在看来，他原来是特洛伊木马，还不知道向那边送过多少消息哩。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把这些情况向主席汇报。这次他们的矛头是对着江青同志，对着主席的。"江青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就去，你把文元也叫上。"

其实不用江青汇报，毛泽东对庐山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当夜，他派车把林彪请来。叶群不放心，随车跟去，被留在客厅，只准林彪一人上去进入毛主席办公室。以往林彪去见毛主席时，毛主席总要客气地让座，有时甚至站起来握手。但这次毛主席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客套一番，只是用手指指指沙发，让林彪坐下，自己还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

好一会儿，毛泽东才放下批件，抬起头来，严肃地说："我说要把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有人偏要开成一个失败、分裂的会。几个人起哄，蒙骗了200多个中央委员，实为有党以来所未有。"林彪替自己的几员大将辩护道："那几个同志都是当兵的粗人，他们文化水平低，只知道对主席忠诚。"毛泽东严厉地问："陈伯达呢？他可不是粗人，大概是个天才的理论家吧。他从来没有和我配合过，这次配合得可好了，又是坚持设国家主席，又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大有把庐山炸平之势。此人是一个可疑分子，你要和他保持距离，我也会给其他同志打招呼的。"

看毛泽东的意思，陈伯达是保不住了。林彪心里明白，事情绝不会就此为止，今天搞掉陈伯达，明天就会来搞我林彪。他估计了一下形势。200多中央委员，造反上来的那些人是跟江青走的。原来的那些老干部对自己恨之入骨，巴不得自己倒霉。现在是主席没有讲话，只要主席一讲话，他们就都会联合起来向自己扑来，说不定自己立刻就会成为彭德怀第二。与其这样，还不如舍车保帅，徐图后计。主意已定，林彪装做恍然大悟的样子说："陈伯达原来有问题？幸亏主席提醒，我以后不理他了。"

8月25日，毛泽东把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召来开会。他生气地说："不设国家主席，我至少讲了六句。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么六句就是六万句，可有人还坚持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这次配合得可好了，三次庐山会议，两次他是反对我的，第一次跟彭德怀走，这一次又欺骗中央委员。从现在起，不要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了，华北组第6号简报收回。大家有意见没有？"自然是没有意见。毛泽东又问陈伯达："陈伯达，你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怎么老往北京军区跑，连林彪同志都不好讲话了。"陈伯达惊愕地看着林彪。林彪沉着脸，什么也没有说。

8月31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发给各中央委员了，文中历数陈伯达从来不配合的罪恶，批判陈伯达的坚持天才论的观点，文章还特别点出毛泽东和林彪对天才论的看法是一致的。

此文发下来后，陈伯达立即成了会议批判的对象，大家怒吼着要他交代。经过几天的批判以后，陈伯达狼狈不堪地回到自己住所。服务员都不理他了，

他知道自己完了，看来得降职使用了。正当陈伯达想着中央以后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时，几个军人走进来，“咔”地给他戴上手铐，粗暴地把他向门外推去。门外已停着一辆轿车，军人们把他塞进轿车，往山下驰去，随后又坐飞机到了北京，关押进秦城监狱。

形势急转而下。林彪一伙步步退守，江青一伙步步进逼。林彪在退却中订立攻守同盟，防止乱了阵脚。江青在进攻中步步进逼，毫不放松。毛泽东看了黄、吴、叶、李、邱的口径完全一致，避开要害问题、只扣帽子、不讲事实的检讨，知道他们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退却了。但毛泽东心中有数，下山后再给他们甩石头。庐山的会到此为止。9 月 6 日，庐山会议结束，大家都纷纷下山去。在九江机场上，林彪与黄、吴、叶、李、邱在飞机里合影，以示纪念。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下山，他就把黄、吴、叶、李、邱的报告拿出来审阅。先是看吴法宪的。毛泽东想起吴法宪在庐山上的表演，想起听到的许多消息，感到此人办事太不光明正大，便在文件上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 200 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批完吴法宪的检讨，毛泽东第二天又拿起了叶群的检讨。他对林彪的这个老婆一向没有好感，在检讨上批她“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到了此年 12 月，毛泽东在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上写批语，甩石头，又掺沙子，派纪登奎参加军委办事组，又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让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接管了北京军区。年底，毛泽东又决定召开批判陈伯达的华北会议。

毛泽东步步进逼过来，林彪集团恐慌异常。叶群紧张地问林彪：“人家一步步逼过来了，你快拿主意吧，总不能坐以待毙呀！”林彪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说：“搞文的我们搞不过他们，搞武的他们可不行，现在该是老虎出山的时候了。”

林立果看到林彪在庐山大败而归，急于出山一试身手，受了林彪的嘱托后，便踌躇满志地从后台走到前台，开始指挥一场真正的阴谋了。

林立果参军进入空军后，由于是帅府公子，吴法宪格外奉承，很快让他入了党，当上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副主任。1969 年 10 月，林彪把吴法宪叫到家里，问他：“立果在你们那里怎么样啊?”吴法宪谄媚地说：“立果很有思想，也是天才，是我们的榜样。”林彪笑笑说：“我把立果送到空军，是帮你的，你可以让立果更好地帮你。”吴法宪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这是首长对我的最大支持，立果是超天才，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吴法宪回去后，立即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拔林立果为作战部副部长，实际上是部长。不，比部长还大。吴法宪宣布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没

有中央的决定，没有军委的命令，吴法宪把人民空军私授给林立果了。

林立果掌握空军大权后，在空军中拉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空军司令部的一些处级干部成立了一个别动队，美其名曰研究小组。后来他们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后，林立果又出鬼点子说："我看咱们的小组就叫联合舰队得了。"周宇驰等人也都同意。于是，林立果正式把他的别动队改名为"联合舰队"，决心像二次大战时期率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那样，给毛泽东来个突然袭击。

林立果这时手里握有"联合舰队"这个秘密武装，北有空军司令部的支持和掩护，南有上海空军、浙江空军负责人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等人的全力支持，开始大干起来了。

不久，在南方边陲省份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暗杀事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九回　蓝天惊雷迫降总理座机　午夜迷案暗杀政委夫妇

话说九届二中全会后，林立果秘密组建了联合舰队，准备暗杀行动。此后不久，昆明接连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之事。这两件事都与中共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有关。

1970 年 12 月，也就是林立果的联合舰队组建后的第三个月，谭甫仁正在昆明军区大院内的办公楼上办公，机要秘书走出来，神色紧张地给他呈递上一张电报："谭主任，有密电。"谭甫仁接过电报，仔细读去，只见电报命令他，此月某日，将有一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机，该机经过昆明时，务必击毁之。

看完这封电报，谭甫仁脸色变得刷白，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无缘无故地把一架民航机打下来！谁知道这飞机里坐的是什么人，搞不好是要犯死罪的。但密令又不能不执行。谭甫仁回忆起了自己的革命经历，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以后在第四军、红一军团当兵，从战士当到团级干部。长征到陕北以后，又在林彪当师长的由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编成的 115 师里的 687 团当团政治部主任、115 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一开始，他又随部队出关，当到四野七纵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又任四野十五兵团政治委员。前些时从工程兵政治委员调任地位显赫的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执掌昆明军区。

怎么办呢？谭甫仁想来想去，想出了他认为是比较妥当办法。他立刻拿起电话，要通昆明军区空军司令部："我是谭甫仁。我命令，你们立刻准备好几架战斗机，听候调用。"第二天，谭甫仁进入作战室，空军作战室向他报告："发现一大型目标，是民航机，正由缅甸方面飞来，接近昆明。"谭甫仁立刻命令："战斗机起飞，包围民航机，使其在昆明机场迫降。"空军作战室接到命令后，立刻命令战斗机起飞。早已待命的 4 架战斗机马达轰鸣着起飞，近乎直线地往上爬升，天空中留下了 4 道长长的烟迹。战斗机爬升到预定高度后在云层里埋伏下来，等待目标出现。

民航机出现在昆明上空了，机尾上漆着五星红旗，是一架从国外进口的三叉戟客机。飞机稳稳地在蓝天中飞着，丝毫也没感到这里有什么危险。突然间，4 架战斗机从云层里钻出来，在民航机的上方飞过，又盘旋过来。带队机长命令着："立刻降落，立刻降落，机场电台引导频率……"民航机在几架飞机的包围中，按指定的机场开始降落，战斗机还在空中盘旋。

谭甫仁已率一批军人在机场等候，民航机带着巨大的啸声降落下来，在跑

道上滑跑一段距离后停了下来。谭甫仁坐车带兵疾驰到飞机跟前，准备逮捕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人。

舱门打开了，一位身穿灰呢大衣、浓眉大眼的老人出现在舱口。“周总理!”谭甫仁顿时吓得六神无主。迫降总理座机，这是死罪啊！周恩来缓缓地走下飞机的舷梯，严厉地质问满头冷汗的谭甫仁：“你为什么要迫降我的座机？是谁指使你这样干的?”谭甫仁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是总理的飞机，我该死!”周恩来神色冷峻地命令他：“你不要解释了，立刻向中央写出报告，交代清楚。现在你把跑道和航道让开，我要马上起飞。”

谭甫仁赶紧命令把跑道腾干净，战斗机飞走。在塔台的指挥下，周恩来的座机轰鸣着起飞了，谭甫仁看周恩来的座机去远了，才率部下回到军区。

一进自己住的将军楼，谭甫仁一下瘫在沙发上，半天都没有动窝，悔恨的泪水直往下流。他的夫人和姨妹下班回来，看他泪流满面，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了?”谭甫仁直晃脑袋，哭叫着说：“我要被抓起来了，我要死了!”谭夫人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谭甫仁说：“我收到一封电报，让我把今天路过昆明的一架民航机打掉。我想到九届二中全会后上层斗争复杂，万一这架飞机里坐着什么人怎么办，就多了个心眼，让战斗机不要击落，把它迫降下来。结果飞机迫降了，从飞机里走出来的竟是周总理。迫降总理座机，等于在空中行刺，这是死罪啊!”

谭夫人大吃一惊，想了会儿，又问：“总理下来后对你怎么样?”谭甫仁沮丧地说：“当然是狠狠地训了一顿，训完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也不听工作汇报，马上起飞回北京去了。他对我显然有戒心。”谭夫人激愤地说：“这是谁来的这封电报，这不是害人吗？把它交给中央，说明事情的经过。你没有照令办，应该说还有功呢，怕什么?”谭甫仁赶紧摇手止住她：“快别乱说，小心隔墙有耳。”

这时天色已黑。冬天本来黑得早，下午时，昆明刮了一阵冷风，吹来几片阴云，天就黑得更早了。夜色中，一个人影在将军楼的窗户下一闪不见了。谭甫仁吃过晚饭，没情没绪地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准备向中央起草报告，写了一半，感到一阵倦意，便去睡了。平常他是和夫人在卧室一起休息的，今天晚上因为写报告累了，就在办公室里睡下来了。

谭甫仁住的小楼位于昆明军区大院最深处，门外有哨兵日夜站岗。楼为两层，楼上是卧室、办公室，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房子不小，但只住了3个人，谭甫仁和他的妻子及妻子的妹妹。

在二楼值班的警卫参谋提着手枪坐在楼梯口的一张椅子上。他望望院里值勤哨兵的闪亮枪刺，对这种枯燥的生活感到厌烦。将军楼在军区大院深处。军区大院本来就门禁森严，哨兵林立。将军楼院里，又设有门岗、游动哨，戒备这么森严，还会有什么问题。警卫参谋想到这里，打了个呵欠，把手枪插在枪套里。

这时，一个高大的黑影像豹子一样轻巧灵便地从一块大石头后面走出来，三脚两步就闪进了将军楼，悄没声息地摸上二楼，推开谭甫仁的卧室，举起手枪，对着床上蒙被大睡的人扣动扳机。几声枪响，黑影又悄悄地拉门出来，朝谭甫仁的办公室走去。

大概是好久没有打仗了，也可能是感到小楼太安全了，谭甫仁被枪声惊醒后，丝毫也没有把这枪声同自己联系起来，以为是院里哨兵枪走火，准备出去训斥一通。因此，他既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也没有去拿手枪，其实枪就在办公桌的抽斗里放着。谭甫仁睡眼惺忪地打开办公室的门，走到过道里，正好碰上凶手杀气腾腾的眼神和对准自己脑袋的一支手枪枪口。谭甫仁一见凶手的模样，大吃一惊，急忙要逃走。就在这时，凶手的枪响了，谭甫仁本能地把头一偏，子弹从耳朵旁边穿过去了。谭甫仁转身向楼下跑去，枪声又响了，谭甫仁顿时感到似乎有一根火红的铁棍插入了胸膛，他疼得弯弯腰，又挣扎着往楼下跑去。枪声又响了，子弹穿进了腰部，谭甫仁重重地摔在楼板上。

谭甫仁的小姨妹听到枪声不断，情知不好。她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小心地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军人手持双枪，敏捷地逃下楼去。他的动作是那样的训练有素，小姨妹只看见一个穿军服的影子一闪，就再也没有看清什么。

被枪声惊醒的人都纷纷跑出来观看动静，只听见有人在黑暗里大声命令："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任何人都不能出来。"一队士兵持枪跑步过来，军官大声下着命令，在大院里布下岗哨，大院里全面戒严。

保卫部长在军区首长的指挥下，率保卫侦察干部进入小楼，只见谭甫仁倒在楼梯旁，血流满地。军区首长立即命令军区总医院做好一切抢救工作，务必要把谭甫仁夫妇抢救过来。一会儿工夫，两辆救护车赶来了，医生护士们七手八脚地把谭甫仁夫妇抬上救护车。

把谭甫仁夫妇送走后，军区保卫部开始查勘现场。他们首先把谭甫仁的小姨妹找来，她是这场凶杀案的唯一目击者，她提供的情况将会是解开这场凶杀案之谜的钥匙。谭甫仁的小姨妹惊魂未定，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听见枪声，穿好衣服把门打开一道缝看时，凶手一闪就不见了。但记得这人个子很高，有多高？就像卫队长那么高，身穿军服，好像对小楼非常熟悉。"保卫部长和干事们记下了她的话，又查勘现场痕迹。现场上除了血迹以外，留下了五颗手枪弹壳，此外再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由于楼房地板坚硬光洁，没有取到足迹，也没有取到指纹，看来要破案只能从谭甫仁的小姨妹的这几句话和5颗手枪子弹弹壳上下工夫了。

保卫部在小楼查勘现场的同时，军区总医院也在全力以赴地抢救谭甫仁夫妇。其实，谭夫人要害部位中了两枪，早已死去，但医生们还是采取各种办法抢救，希望能发生奇迹。但人已死亡多时，奇迹没有发生。

谭甫仁还没有死，但也是危险万分，已经量不到他的血压。几十个专家在拼命推开扼住了谭甫仁脖子的死神，但他们的力量太微弱了，谭甫仁还是被狰

狞的死神夺去了生命。

于是，抢救室里，留下了两具蒙着雪白长被单的遗体，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总医院的参加抢救的领导人和医护人员脱下帽子，向死者致哀和告别。

在军区9号楼里，专案会议已开了两个多小时。根据认真的分析，推测凶手是一个军人，对军区大院情况熟悉，个头在1.75米以上。专案组决定立即清查军区大院，院内任何人，都要交代晚上的活动；立即封锁车站、码头、机场，拘留所有符合凶手特征的人员进行审查。

刺杀是12月17日凌晨进行的，12月17日天刚亮，昆明火车站、机场都被大队大队的武装士兵包围。然后，军人们逐个查验旅客的证件和行李，对军人盘问得尤其仔细，一个又一个身高在1.75米以上的军人被拘留带走。与此同时，昆明全市到处军警密布，检查盘问行人，一片紧张气氛。

经过数天的搜查，专案组把各种资料信息往一起梳理，情况就明朗起来。经查询军区大院4道大门的岗哨值勤记录，从12月16日到12月17日，没有一个外人来过军区大院。检查了军区大院的所有围墙，也没有发现一处踩蹬、扒攀的痕迹。这就足以证明，12月17日凌晨行刺的凶手当夜就住在军区大院内。事件发生后，由于军区大院实行了紧急戒严，没有一个人离开过自己的住宅，也就是说，凶手至今还滞留在军区大院内。在车站等处虽拘留了一些人，经审查后确认他们与此案无关，便都放了。

搜查中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军区保卫部的两支手枪被盗，这更证明凶手是大院内部的人。于是，专案组加紧清查大院内部的人员，军人、家属、首长、士兵，每个人都要交代出12月17日凌晨自己的活动。清查很快取得了结果，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当夜的活动，而且都至少有两人作证明。

这就奇怪了，大家都知道，凶手就在大院内，但清查的结果是大院内每个人都与此案无关。

中央对谭甫仁被刺案非常重视，派来了由公安部、总政治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组成的中央调查组来到昆明调查此案。中央重视此案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像谭甫仁那样高级别的在位方面大员被刺。再是谭甫仁迫降总理座机一事，中央正在追查，突然关键人物被刺，这里面有没有更深的政治背景？

中央调查组来到昆明后，立即把专案组召集起来开会，保卫部长汇报了前一段时间的清查结果："没有查出可疑分子。"到底还是中央来的这些副部级的专业干部水平高，经验丰富。听完保卫部长的汇报后，中央调查组组长问："你们清查的都是一些在职的干部。我问你们，对那些特殊人物，如隔离审查对象查过没有？这些人中有没有非常熟悉小楼情况的人？"保卫部长吞吞吐吐地说："这倒是有一个。"组长立即追问："谁？"保卫部长说："卫队长，谭政委原来的卫队长。"组长眼睛一亮，大声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讲讲。"保卫部长喝了一口水，仔细地讲起来……

原来谭甫仁有个卫队长，此人身高1.80米，武艺高强，机警灵活，含而不露，没有必要，从不与外人接触，整日沉默寡言。此人解放战争时期入伍，身经百战，屡立大功。谭甫仁经过多方面的考核，选定他为卫队长，格外器重。卫队长呢，也是忠心耿耿，枕戈待旦，为谭甫仁的安全保卫工作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谭甫仁也很喜欢他，准备让他干几年后提他当师长。突然，卫队长的家乡前不久给军区来了一封信，说明卫队长曾参加过地主武装还乡团。这时全国都在清理阶级队伍，谭甫仁得到汇报后大吃一惊，原来日夜跟在自己身边的卫队长，竟是还乡团，这还了得，立即下令把卫队长隔离审查。

中央调查组组长听完汇报后，沉思了一会儿，又问保卫部长："这个卫队长你们清查过了没有？"保卫部长有点脸红了："没有。"不过他又解释说："卫队长已被隔离审查多日，门口有持枪哨兵日夜站岗，他还能有什么问题吗？"组长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死角也不能留，我们现在就问问去。"

保卫部长和保卫干事先行一步，他们把值勤的哨兵找来，问他们："卫队长最近情绪怎么样？"哨兵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些情况，总的情况是一般，没有异常反应。保卫部长又问12月17日凌晨站岗的哨兵："17日凌晨卫队长离开过隔离室没有？"哨兵坚决地回答："没有。我一直没有离开过隔离室的门口。"保卫部长见问不出什么来，便对保卫干事说："我说了此案和卫队长没有关系，现在怎样？明摆着嘛，卫队长要从隔离室出来，哨兵总不会看不见吧，走，咱们去瞧瞧卫队长去。"

保卫部长走到隔离室门口，问门口站岗的哨兵："他在干什么？"哨兵回答说："睡觉。"保卫干事一把把隔离室的门推开，由于没有后窗，房子里有些暗，他一下子看不清楚屋里的景况。等到保卫干事眯眯眼，看清屋里的景况时，不禁一股冷意袭上身子，原来卫队长正用一支手枪瞄着他，面目狰狞可怕，保卫干事正想逃出，卫队长扣动了扳机……

枪声一响，大院沸腾起来，卫队长一步跨出屋外，想寻路逃跑，不料警卫部队已经闻警喊杀着冲过来。卫队长一看无路可走，三脚两步窜进了一个厕所。警卫部队立即把厕所包围起来，开始喊话："喂，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赶快投降吧。你不为你着想，也不为你的家属着想吗？赶快投降吧，我们可以对你的家属不予追究。"

厕所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外面的指挥员命令继续喊话。在政治攻势的掩护下，一队从越南战场撤回来的强悍的侦察员身穿防弹背心，手持冲锋枪，慢慢接近厕所。正在这时，里面一声枪响，士兵们把身子一低。接着里面又是一声枪响，枪响过后，半天没有动静。

指挥员观察了一阵，把手一挥，侦察兵们猛地从墙上，从入口冲进厕所。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卫队长的尸体，血流了一地，两支手枪丢在一旁。

保卫部长捡起枪来，看看枪号，正是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手枪。经过弹道检验，这两支枪也就是杀害谭甫仁的那两支枪。现在完全可以断定，杀害谭甫仁

的凶手就是卫队长。

案件侦破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各种戒严设施开始取消。保卫部长耷拉着头，无精打采地往家走去。中央调查组组长望着保卫部长的身影，狠狠地吸了几口烟，眉头跳动着，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

当晚，在军区的一间保密会议室里，中央调查组成员和军区首长开着一个秘密会议。组长把案卷翻得哗哗响，提出了几个问题："凶手查获了，这个案子似乎也该了结了。从表面看，这个案子似乎是个挟私报复案。卫队长原来是很受信用的人，突然被隔离审查，顿起报复之心。犯罪的动机、心理、作案工具一应俱全。可是，有几个问题怎么解释？卫队长一直被关着，他怎么有可能从哨兵的鼻子底下溜出来，又去偷保卫部的枪，又去小楼杀人，跑出跑进，哨兵竟然没有看见，这可能吗？保卫部清查中怎么单单把他放过了，这又怎么解释？现在中央正在追查谭迫降总理座机的案件，偏偏这个时候谭被暗杀？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我看保卫部有问题，得清查一下。"与会者觉得有理，决定追查保卫部。

清查保卫部的工作刚一开始，就发现保卫部长问题较多，看守卫队长的哨兵是他安排的，枪是在保卫部的保险柜里给偷走的，又是他担保卫队长没有问题的，中央调查组决定对保卫部长进行隔离审查。一队士兵走进保卫部长的家的楼房，在他住的套房门口停下来敲门。半天没有回响。士兵们把房门撞破冲进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恐怖的景象：保卫部长吊死在床头上，舌头伸得老长老长……

线索被掐断了。谭甫仁一死，迫降总理座机的案子无从问起。保卫部长一死，谭甫仁被刺一案的案中之案成为千古之谜。

中央调查组结束了在云南的工作，回到北京。不久，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中央调查组组长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在地下室。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回　会斯诺邀美国总统访华　骂林彪说文化革命秘密

话说谭甫仁一案，凶手虽已自毙，但留下许多疑问，以后也没有什么公开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种传说在市面上很流行，但传说毕竟是传说，到底真相如何，一直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谭甫仁一案的前前后后充分地说明了上层斗争的激烈。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又甩石头，又掺沙子，又挖墙脚，现在开始直接不点名地批判林彪了。在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著名的美国记者、老朋友斯诺。30多年前，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进驻保安。当时长征刚刚结束，美国记者斯诺冒险来保安采访，留着大胡子的周恩来把他接到保安。斯诺在这里采访了好几个月，拍了很多照片，和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谈了数天，回去后写了一本书，名为《西行漫记》，相当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运动，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及红军将领的生平，使西方世界第一次得以真正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生涯。《西行漫记》出版后，顿时成为畅销书，埃德加·斯诺也一举成名。时隔30多年后，斯诺再次来中国大陆访问，周恩来又一次把他领到毛泽东跟前，不过这次可不是在陕北的窑洞里，而是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当时斯诺指着城楼前面的群众游行队伍抬着的大幅标语问毛泽东："你看我写的那篇文章怎样？"毛泽东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便对这位老朋友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可以嘛。你的那些错误有什么要紧？你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前几年，我什么也管不了，他们不听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导师，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的，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听了心里一动，他知道"四个伟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口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是林彪提出来的，现在毛泽东和一个外国记者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于是公开骂林彪讨嫌，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已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天安门上人来人往，毛主席身体不太好，不能久站，自然不能畅谈。国庆节典礼结束后，毛泽东又约见斯诺，两人一起进餐。进餐后，斯诺正式采访了

毛泽东。

话题先从1936年斯诺到保安采访说起。斯诺说了自那以后，自己多次想再访毛泽东，均未能如愿的憾事。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斯诺说："我常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毛主席摆摆手说："怎么是打扰呢？1965年，我就让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斯诺采访是要准备发表的，他得征求一下毛泽东的意见，是否同意发表，便问道："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太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毛泽东果断地说："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茶，又说起斯诺的这篇文章来："你写的这篇文章可以嘛。你的那些错误有什么要紧呢？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华盛顿（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名字），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哥伦比亚区。"斯诺笑了，心服地补充说："每个州里面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可讨嫌了。"他又笑着说："不过，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啦。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毛泽东停下来，让翻译冀朝铸翻译。冀朝铸是外交部的首席英文翻译，他把毛泽东的话翻得准确生动，斯诺不断地点头微笑。

毛泽东又讲起来，他现在要讲的是一个重要信息，希望由斯诺把这个信息传达给美国总统尼克松。

话题还从刚才的"美国每个总统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说起："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于美国也不利。"

接下来，毛泽东和斯诺谈了一些农村中的问题。斯诺说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毛泽东遗憾地说中国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地。斯诺说中国农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毛泽东连连摇头说斯诺受人欺骗了："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

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谈了一会儿，毛泽东又把话题引到尼克松身上来：“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翻译一边翻着话，一边偷偷看了看表，天哪，已经快两个小时了。毛泽东毫无倦意，谈兴正浓。翻译向外交部司长王海容使个眼色，王海容其实早就注意到了。过去主席会见外国客人，也就是握握手，坐下谈几句完了，顶多不超过20分钟，今天怎么谈了这么长时间呢？这会影响主席的健康。她看看表，询问地看了毛泽东一眼，毛泽东对自己的侄女挥挥手，让她不要影响谈话。王海容心里顿时茫然，主席今天怎么有这么大的谈兴？

其实，王海容不理解，毛泽东企盼这场谈话已有好长时间了。还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就感到孤寂。那时，不要说一般的高级干部，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跟前都是寡言少语，不敢多说话。毛泽东也感慨地说：“少奇他们在我面前也不敢多说话。”有时太孤寂了，毛泽东经常想起战争年代战友们中间的一些趣事。记得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担架上的谋友张闻天和中央队指导员刘英结婚。长征以来，刘英一直负责照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生活，在共患难的征途上，张闻天和刘英相爱了。到陕北后，毛泽东在前面指挥直罗镇战役，没有赶上张闻天和刘英的婚礼。回来后，听说他们结婚了，他马上就去闹新房：“你们就这么悄悄地结婚了，也没告诉我和恩来，我们不承认，你们要请客，请了客我们才承认。”由于打了大胜仗，长征又胜利结束，毛泽东很高兴，和张闻天、刘英逗了半天趣，直缠得刘英唱了歌、跳了舞才罢休。还有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经常在院子里举办舞会。地是土地，鞋是布鞋，乐队是胡琴加口琴，但大家却跳得十分带劲。毛泽东经常想起这些事，有时还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但这些都已成为历史，现在他们到他这里来，除了请示以外，再没有其他话好讲。毛主席只有和自己的卫士们在一起时，感到快乐、开心。这些卫士们都是些年轻娃娃，心眼实，手脚快。他们只要把工作做好了，可以随便陪毛泽东游泳，和毛泽东抢螃蟹吃，不小心在毛泽东跟前放个屁也没有关系。正因为如此，在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调离中南海去天津工作时，毛泽东和他抱头痛哭了一场，依依惜别。

“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更是难得有个人在一起聊聊。卫士们也在“文革”气氛的压力下，个个小心起来，不敢说笑。再说和他们也没有办法谈一些高深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是多么想找一个老朋友一起聊聊啊！好，恰在这个时候，老朋友斯诺来了。他是美国人，没有必要把毛泽东看成神，毛泽东可以和他直抒胸臆，谈个痛快。

毛泽东已经知道尼克松通过各种途径捎信给自己，要到北京来当面谈。周恩来还向他讲了一个美国大使追雷阳的有趣故事。那是1969年9月，美国驻波

兰大使斯托塞尔回国述职，在白宫与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相遇。基辛格是哈佛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国际问题，著有5本专著，和尼克松总统有很大的间隙。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基辛格还在那里大骂尼克松："我不信这家伙能管好美国！"谁知尼克松上台后，力排众议，第一个任命的官员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基辛格很受感动，鼎力协助尼克松，权倾朝野。斯托塞尔和基辛格博士这会儿在白宫相遇，基辛格请他回到华沙后，设法和中国大使接触，恢复自50年代开始，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华沙会谈。斯托塞尔答应了，并没有放在心上。一个月后，斯托塞尔回到华沙。基辛格见他毫无动作，乃电令他立即行动，不得有误。斯托塞尔照旧没有理睬。如是几次，基辛格火了，给斯托塞尔一封急电，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办的人来办。"斯托塞尔这才知道基辛格的厉害，马上采取行动，发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那是1969年12月3日，在华沙"波兰文化宫"，南斯拉夫主办了时装展览会。当时南斯拉夫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东欧和西方关系均较融洽，东西方外交官都把这个展览会看成是外交使节们聚会交谈的一个好机会。开幕那天，使节云集，场面十分热闹。

在这种场合，美国大使从来是记者和人们关注的中心人物。但是，今天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既不愿多与记者交谈，也无心与那些漂亮女郎们纠缠，而是东张西望，寻找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他终于看到了穿中山装的雷阳，便拨开人群，朝雷阳走去。雷阳初未注意，后来看见斯托塞尔照直向自己走来，而且举起手打招呼，雷阳顿时心里叫一声"糟"，赶紧离开会场，朝外面走。斯托塞尔紧追不舍，雷阳拔腿就跑。斯托塞尔边追边喊："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会谈十分感兴趣。代办先生，您别跑呀，我有话对您说……"但是雷阳停都没有停，飞快地跑出楼房，钻进汽车跑了。

可以说，在场的外交使节和记者都十分感兴趣地目睹了这场大使追代办的喜剧，这件事也成为各国报刊上的一条大新闻。

毛泽东当时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也笑得前仰后合。现在毛泽东同斯诺谈着话，不禁又想起了这幕喜剧。他笑着同斯诺说："尼克松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说了半天，两个人口渴了，卫士不失时机地端上新茶。毛泽东举起茶杯说："请，请。"斯诺打开茶盖，一股清香扑鼻而来。翻译趁这个间隙，也喝了几口茶，润润嗓子。

毕竟是故友相见，斯诺又提起当年在保安的初次见面。毛泽东感慨地说："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谈着谈着，斯诺就把话题引到"文化大

革命”上来，这是他来中国采访的一个重点。但是他不知道能有多少收获，不免小心翼翼。他放下茶碗，问道：“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这是挑战！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来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抓住时机，一下子把话题接到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上：“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毛泽东摇摇头说：“那还不是。湖南省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

斯诺抓住刘少奇被打倒的问题不放。他又问道：“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磕磕手上的烟灰说：“那就早了。1965 年 1 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斯诺问道：“是新版吗？”毛泽东说：“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接着，毛泽东又对斯诺说：“你问我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嗯，1965 年 10 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 年 8 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刘少奇是不是反对十六条？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说起个人崇拜来：“那时候倒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批林彪了，斯诺赶紧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

中南海这次老朋友聊天，足足有 5 个多小时。斯诺明白，他又一次获得了许多独家新闻。由于中国的地位，他这次回去后发表的新闻将比《西行漫记》更能引起轰动效应。可不是吗？他这次在中南海和毛泽东谈了 5 个多小时，毛

泽东对他、也是对世界舆论首次公开了他对尼克松总统的邀请，这将在世界上引起多大的轰动。通过这次会谈，毛泽东公开对他摊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底牌，公布了他何时有了把刘少奇搞下台的想法，这是国际上多少官员专家想知道的事啊！还有，毛泽东说林彪讨嫌，这又是中国政坛的一个新动向。因此，斯诺离开中南海时脸上堆满了丰收的微笑。

就在斯诺准备起程去美国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时，尼克松已经接到了周恩来的信。这封信从北京到华盛顿，走过了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先是，尼克松总统准备来北京的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访问北京时直接转达给了毛泽东，然后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总统写了回信，信交给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巴基斯坦总统很愿意为中美关系的突破提供方便，叶海亚总统专门指定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这项工作，所以张彤又把复信交给了舒尔坦，由巴基斯坦信使把信带给了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希拉里接到信后，立即约见基辛格博士，得到准许后，马上去白宫。

基辛格博士正等着北京的来信。希拉里来到白宫后，基辛格对他非常客气，眼巴巴地望着希拉里手里的那个大信封。希拉里把信取出来，给基辛格看了看。信上没有抬头，也没有署名。基辛格想把信留下，但希拉里紧抓住不放，他解释说：“我没有得到授权说可以把这个文件留在白宫，请你记一下吧。”基辛格拿出笔，希拉里念，他记。信中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基辛格征得尼克松的同意，也写了一封同样格式的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派出总统特使访问北京，为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作准备。

美国和中国同处于北半球，在 1970 年的冬天里，两国的天气一样严寒，但是一股暖流在悄悄涌动，逐渐化解着坚冰。

毛泽东接到基辛格的回信后，很是高兴。同时他也想到该给全国人民打个招呼了。中国和美国打了几十年仗，现在美国总统突然要来中国访问，这个弯子要转好。另外林彪的问题也应该透透风了。这时，秘书走来，把他和斯诺谈话记录送来。毛泽东看看，画了个圈，吩咐秘书说：“对汪东兴说，传达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秘书拿了记录走了。

毛泽东又打电话把周恩来找来，跟他商量说：“军委办事组掺进了李德生，不够，让先念再进去。你看怎么样?”周恩来当然是满口赞成。毛泽东又说：“审查陈伯达的任务由你和剑英负责吧。美国人来了，咱们得成立一个班子。你看谁来管?”周恩来说：“剑英就行，1946 年他在北平军调部和美国人打过交道。还有章文晋、熊向晖。当然，最好是陈毅同志参加，可是他现在连文件也看不到。”毛泽东生气地说：“怎么会发生这事？立即恢复给陈毅看文件。”

林彪看到三老四帅一个个开始受到主席信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又传发下来，林彪看到“讨嫌”两个字，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下一步……不，不能束手就缚。林彪立即要了飞机飞赴苏州，那里，联合舰队正等着他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一回 政变专家初试马 乒乓信使首访华

话说林彪看了传达下来的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记录，不觉吃了一惊，连忙带着叶群、林立果飞到苏州，商议应变计划。林彪在苏州的别墅警备森严，窗帘低挂，联合舰队的成员乘车进进出出，一派神秘紧张的气氛。

在苏州住了几天，林彪这位大政变专家对林立果这位小政变专家面授政变秘诀："一是要订一个秘密计划，二是要抓一支队伍。"林立果心领神会，拿着林彪的令箭来到杭州，开始组织政变。这是林立果登上联合舰队司令的宝座以来的初次试马，他深知，政变成功与否，牵涉到林家及联合舰队的所有成员的身家性命，不敢掉以轻心，一到杭州，就紧张地行动起来。

首先，他检查了一下林彪在花家山的别墅。这所别墅是杭州空军负责人陈励耘主持修建的，用料之讲究，设计之精巧，装修之豪华自不必说了，单是警卫设施，就让人咋舌。所有的门窗都安装的是防弹玻璃，门的夹层中一律装上了玻璃钢，步枪子弹只能将其打裂，但不能穿过。别墅门外，有一个连的武装战士日夜警卫，附近还驻有 4 个连待机，别墅院内和外面的山洼里各停着一架直升机，备不时之需。林立果看完后，非常满意，夸奖了陈励耘几句。恰好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从广州回来，3 个人在楼上密谈起来。

林立果在杭州活动了一个月，立即又去上海，在那里他们舰队有一个据点，他要在这个据点召开舰队重要会议，制定政变暗杀计划。

这时正是 1971 年的 3 月下旬，江南暮春，烟雨霏霏，柳浪闻莺。但林立果无心欣赏这些，他日夜思考的是怎样把这个计划制定好，好让首长尽快抢班夺权。

在上海巨鹿路，有一幢 3 层的楼房。从外面看，这座楼房毫无任何惹人注意之处。到晚上，楼里一片漆黑，似乎是座空楼。走进里面人们才会发现，这栋楼房装修豪华，灯火辉煌，人影憧憧。这座楼房就是联合舰队在上海的据点。这会儿，刚从杭州赶来的林立果正同舰队成员周宇驰、李伟信密谈，商议政变计划。李伟信也是空军中的一个处长，公开的职务是驻上海空军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3 个人刚开始谈，于新野也正好奉命赶到，4 个人在密室里喝着进口的美国酒，抽着进口的美国烟，商议着政变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几个人认为和平过渡的希望渺茫。林立果站起来，端了一杯酒，走到窗子跟前，把窗帘掀开一条缝朝外看去，外面灯火稀疏。他呷

了几口酒，慢慢踱过来。周宇驰问他："副部长，你说怎么办吧？"林立果猛地站定，反问道："怎么办？干！"他把杯子往地上一摔，满脸杀气。李伟信是上海空军的干部，知道这栋小楼弄起来不易。现在他看着酒污了昂贵的地毯，不禁有点可惜地找块布去擦。就在这时，林立果又提起一瓶美国酒，砸在地毯上，地毯被浸湿了一大块。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都吃惊地看着林立果。林立果铁青着脸说："干大事不能贪小利。现在咱们只有干。干成了，全中国都是咱们的。不干，或者干不成，咱们都等着上断头台吧。此毯再好，也与咱们没有关系了。"

3个人商议半天，最后决定要搞一个政变计划，要建一个教导队。政变计划由于新野来写，教导队由王维国、李伟信负责，在上海组建。会散后，李伟信和王维国商量建教导队的事，于新野留下来写政变计划。他拿起笔准备写时，第一个问题就把他难倒了。给这个计划起一个什么名字又妥当又隐秘呢？想了半天，于新野跑去求教林立果。林立果念叨着："武装起义，武……起义……"想来想去，忽然大叫一声："有了，就取武装起义的谐音、叫五七一工程纪要吧。"李伟信奉承地说："副部长果然是天才，我就想不出来。"

政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写好了，那么采取什么政变手段呢？这一点于新野可不发愁没有内容可写，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的政变经他们研究了多日，又看了大量的外国政变的资料，知道很多中外政变的办法。利用上层集会就是个好办法，中国历史上的鸿门宴，张学良杀北宁路总监，都是在酒席宴间设下伏兵干的。逼宫也是个好办法，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逼父亲李渊逊位；曹操杀掉汉献帝的臣僚，专权朝廷，明英宗夺门之变，都是逼宫的范例。逼宫的特点是先要杀掉皇帝跟前的重臣，使皇帝失掉支持，不得不束手就擒。此外，还可以采取炸专列，用飞机轰炸、暗杀、投毒等手段，还可以用炮轰，用火焰喷射器烧。

《五七一工程纪要》就这样出笼了。

政变计划一出来，林立果立即在上海岳阳路的一个据点里召开了"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是上海空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军政委陈励耘、南京空军司令员周建平，还有被林立果指定为南线总指挥的江腾蛟。林立果仿照当时一个国际会议的提法，把这次密会也称为"三国四方会议"。

"三国四方会议"开了整整一夜，林立果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部署了在南线打毛泽东专列的暗杀行动，天亮时会议才结束。餐厅已备好了早宴，林立果端着酒杯祝酒："祝贺我们的三国四方会议胜利结束，祝我们的革命计划成功，干！"大家一饮而尽，离楼而去。

4月中旬，上海空军的一个练兵场上，一支彪悍的部队正在进行训练。100多人，个个身高体壮，身佩双枪。例行的队列操练后，便是格斗、射击、驾驶。只见练兵场上，战士们跨越高墙，攀登楼房，个个如猿似鹰，身轻如燕。随着一声声枪响，一个个巨盘被击得粉碎。接着，每个战士左手托一块铸铁暖气片。

一声令下，战士们大喊一声，右手一齐劈向暖气片，只听“嚓”一声，所有的暖气片都被劈为两半。

王维国在训练场上观看着战士们出色的军事表演，连连叫好。他走过来想和战士们握手，被队长制止：“不要握，他们内功极硬，使惯了力，不知深浅，会捏碎你的掌骨的。”王维国吓得赶忙抽回手，叫队长集合部队。队长一声令下，战士们跑步集合。随着队长的口令声，战士们几秒钟便集合完毕，动作整齐划一，分外威严。王维国走过来大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响亮整齐地答应道：“为人民服务！”王维国说：“稍息！我们这支教导队抽的都是最好的战士，你们都是各部队最好的战士，能进这个教导队是你们的光荣。我们这个教导队直接受副部长指挥，也就是受林副主席指挥，我们要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林副主席，捍卫副部长！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战士们齐声喊道：“有！”

这支部队就是王维国按着“三国四方会议”的决定组建的教导队。王维国检阅完教导队后，立即给林立果汇报了教导队的训练情况。林立果高兴地说：“好啊！王政委，你真有办法。教导队还要学习一点野战技术，是一支野战军，指到哪打到哪！”

林立果把联合舰队的进展及时报告了林彪。林彪沉默了一会儿，伸出两个指头：“七八两月是关键。”林立果明白，七八两月毛泽东就要同林彪摊牌了。自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步紧逼一步，逼迫黄、吴、叶、李、邱检讨，一次不行两次。最近，他们中有的人又写了检讨交了上去，还不知道这份检讨能否通过，毛泽东又会甩出什么石头来呢？

这份检讨已经摆在毛泽东的案头上。毛泽东看了一遍，觉得这份检讨总算写了几句像样的话。适值4月15日要召开的批陈汇报会还有半个月要召开了，毛泽东决定再甩一些石头出去，便提起笔来批示道：“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写这个批示时正是3月30日，写完批示后，过了几天，他让秘书把这个批件和其他几个文件送给周恩来，预定4月15日召开的批陈整风会已定为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必须要让他知道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现在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周恩来的支持。

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又是一夜未熄。毛泽东关于批陈（陈伯达）整风汇报会的批示不断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明白，这次会议是一次剥离手术，是把林彪集团的外围组织剥离下来，以便夏秋适当之机解决林彪问题。他也知道，林彪自庐山会议以来经营了十多年，当了十几年国防部长，当了近十年中央副主席，在中央、地方和军队中安插了很多亲信，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现在毛泽东把主持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任务又交给自己，这个担子不轻。

为完成好这个任务，他已是夙夜筹思，又2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3月一过，办公室停止供暖。虽然从节气上来说已到了暮春，但北京的4月尚冷气逼人。周恩来这天在西花厅办公到深夜，秘书送来夜餐，一碗香气扑鼻的肉丝面，两个小花卷，一盘花生米。周恩来慢慢地吃完夜餐，又回到办公桌上。秘书进来送上一个文件，周恩来看看秘书写的文件简介，原来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呈报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周恩来看完这个报告，不禁想起了已经故去的贺龙元帅。

中国在过去是一个极不重视体育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政治腐败，生产落后，人民贫困，体育上也是毫无成绩可言。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只有一名，他就是来自大连的短跑名将刘长春，由张学良资助出国，但没有取得任何名次。后来国民党政府也派出过两批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名次，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给钱，都无法回国，沿街乞讨。后来还是一些华侨捐资让他们回了国。因此外国人把中国叫做东亚病夫。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决心改变体育上的落后面貌。毛泽东亲自点将，派贺龙元帅组建主持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到任后，本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精神，在全国大力开展体育运动，同时又狠抓竞技体育。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乒乓球项目上有了突破。1959年3月，中国21岁的男选手容国团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力挫群雄，登上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宝座，男、女队都已进入世界最强球队的行列。1961年4月，在中国北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四项世界亚军。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庄则栋连续三次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从此，奖给庄则栋的这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杯就永远地留在中国了。锦标赛有关领导当局则另铸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杯供比赛使用。获此殊荣的世界乒乓球运动员只有庄则栋一人。

但是，这支队伍的统帅贺龙元帅却在监护中因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已于1969年逝世。

在贺龙这件事上，周恩来尽了力，但他仍不时为自己没有保护好贺龙而愧疚。

现在，周恩来在西花厅面对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又想起了贺龙元帅，想起了几十年前一起在南昌举义的革命情谊，不禁流下了几滴热泪。他怕秘书进来看见，赶快把泪擦了，审视起这个报告来。

美国乒乓球队请求来华访问的事要从日本名古屋赛事说起。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周恩来在20多天前亲自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来的，毛泽东当即批示：“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中国队从“文革”以来，全部停止了一切比赛活动。这次又出山亮相，引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极大注意。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仍是宝

刀不老，连摘几项世界冠军，只是个个脸色铁青，不苟言笑，难以接近。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嬉皮士科恩可不管这些，他和中国运动员在一个练习馆练球。去赛场时，科恩一头钻入中国运动员乘坐的大轿车，扳住庄则栋的肩头攀谈起来。庄则栋倒没有像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那样惊惶失色，不仅教他球艺，还送他一件中国的山水织锦，科恩也回赠给庄则栋一件短衬衫，并给他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这件事被世界各国新闻媒介大力报道，其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正在举行的苏联二十四大的新闻。美国代表团领队还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想去中国大陆访问。

让不让美国代表团访华呢？周恩来想了一会儿，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搞不好会影响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准备工作，便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同意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不邀请美国队来华的报告——同时又在旁边用铅笔写道："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后，又将报告呈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画了个圈，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批件传达下去后，毛泽东不让秘书把批件拿走归档，他总觉得这里面还有点什么问题，得好好琢磨一下。这样到了4月6日深夜，周恩来突然坐车到游泳池来，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知道他深夜来访，定有大事相告。果然，周恩来一坐下，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现在认为，外交部和国家体委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是不正确的。"毛泽东一愣，脱口而出："为什么?"周恩来喝口茶，不慌不忙地说："主席，最近美国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来我国旅行的一切限制，我感到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美国总统想来，美国乒乓球队想来，让美国乒乓球队打打头阵，可以起到信使的作用，创造出尼克松访华的有利条件，也有利于我国干部群众的转弯子。因此，我建议请他们来!"毛泽东点点头说："噢，让小球推动大球，有道理，我再想想吧。"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反复掂量着这件事。到凌晨时，他蓦然明白，自己原来一直琢磨的也就是周恩来的这些话。这是美国人自己送来的好机会，怎么能把它放过呢。毛泽东把秘书叫来，吩咐他："立即通知周恩来，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领队宋中前几天已经得到了国内不邀请的指示，但他并没有通知美国队，因为美国队只是口头表示，尚无正式文件，宋中也没有必要正式通知，什么时候美国人再提起来时婉拒就是了。但现在他得到的国内指示是立即邀请。他知道这是主席的决策和伟大战略部署，不敢怠慢，在毛泽东于中南海作出决策的几个小时后，就给在名古屋的美国副领队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哈里森惊喜地拿起电话，要通了美国驻日大使馆的电话，美国大使又赶紧报告了尼克松，尼克松又惊又喜，马上回电批准。电报发走后，尼克松赶紧把基辛格召来，基辛格看完电报，一声不吭。尼克松催问道：

“你对此事有何看法?”基辛格半天才说：“总统，我们小瞧他们了，中国人是外交的高手。邀斯诺上天安门，中共报纸《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国国庆典礼时，只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斯诺和一个翻译，这是传递了一个多么强烈的信息啊！可是我们没有予以注意。现在又邀球队访华，这一手多么巧妙。总统先生，中国人不愧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我们的对手比我们高明。”

基辛格说完，又掏出一本美国的《生活》杂志给尼克松：“斯诺的文章发表了，我给你带来了，现在乒乓信使捎来了中国人的信息，也捎去了我们的信息。现在我们该动身了。我先去，为总统访华做些准备工作。”尼克松兴奋地说：“好。我们再议一下细节吧。”

得到尼克松的同意后，美国乒乓球队即从日本飞到香港。4 月 10 日，他们从香港进入深圳，从广州坐飞机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他们在北京的游览活动，特别下令关闭了 4 年的故宫对游人开放，迎接美国客人来参观。

4 月 14 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在北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也同时被接见。这绝不是让他们“陪读”。周恩来向来对人关心，作风细致。在北京乒乓球世界锦标赛上，上届女子单打世界冠军、著名的日本女运动员松崎君代，胜不骄，败不馁，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亲自对中国运动员讲话，要求他们学习松崎的优良体育风范。这次接见美国乒乓球队，周恩来也想起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在北京的乒乓球队，便把他们召来一起参加接见，他也可更多结交一些外国朋友。

接见开始后，周恩来意外地发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来延安采访过的美国记者罗德里克，周恩来惊喜地同他打招呼，两人紧紧地握手，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这次两个老朋友的巧遇，一下子缩短了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和周恩来之间的距离。周恩来——这位中国的传奇英雄原来是美国人的老朋友，而且，又是这么平易近人，重感情。披着长发的科恩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地问：“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这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英美国家上流社会是不赞成嬉皮士潮流的，中国当然更不会欣赏这种颇有点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但是，如果直接这么说了，那无疑会给这场接见罩上阴影。科恩的提问，比最刁的记者还要刁。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看着周恩来，看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美国领队斯廷霍文直骂自己，不该把这个嬉皮士带到这里来刁难中国总理。

周恩来不慌不忙地说：“看来，这位朋友也是嬉皮士喽。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说到这里，周恩来亲切地对科恩说：“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

变。你说是吗?”

大厅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周恩来的回答，既表明了自己明显的立场，又合情合理，循循善诱，没有一点政治说教和强加于人的意思。白皮肤和黑皮肤的运动员围着周恩来倾心交谈，而记者们却都拼命往电报大楼奔去。当天和第二天，世界几乎所有的大报都登载了周恩来的这番谈话，美国人热烈地议论着这个新闻，但科恩的母亲却在加州威斯沃德的寓所里手捧报纸哭了起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二回　叶海亚巧施遁身术　基辛格密访北京城

话说科恩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总理充满人情味的讲话后，不禁热泪横流，特意买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托人送给周恩来总理。

且说美国乒乓球队在中国访问结束后，乘飞机飞回美国。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尼克松总统就接见了领队斯廷霍文，详细询问了乒乓球队在中国的访问情况。斯廷霍文说："中国实际上是把我们当成外交使节来接待的。周恩来致辞时，没有说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而是说欢迎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代表团，说我们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说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但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斯廷霍文的汇报，《生活》杂志刊登的斯诺的报道，使尼克松热血沸腾，忽发奇想，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偷偷摸摸地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给北京传书送信呢？我为什么要派一个特使先去北京而让他占尽风头呢？我为什么不马上去北京呢？对，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由自己第一个访问中国。主意已定，尼克松立即把基辛格找来说："亨利，我觉得现在该是我亲自出马的时候了，我要马上去北京访问！"基辛格连连摇头，劝道："不行，去不得，去不得。"尼克松问道："为什么去不得？"基辛格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中国人的邀请。再说，中美两国隔离这么多年，牵扯到很多敏感问题，台湾问题就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必须先有人去把这些谈好，然后总统才能去。如果总统贸然前去，吵崩了，那将对总统很不利的。"尼克松一想也是，只好打消了立即动身的念头，等待周恩来总理的正式邀请。

尼克松的等待满打满算才不过5个小时，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带到了白宫。口信说："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尼克松看完信，欣喜不已。基辛格提醒他："总统，周恩来说的是公开接待。我认为应该秘密访问，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再公开也不迟。"尼克松拍拍他的肩说："亨利，我也是这个想法。你先给周恩来写封信，说明情况。为了使这次行动成功，必须完全保密，直到我们为总统的访问做好一切安排为止。否则，我担心阿格纽、罗杰斯和保守的反对派在国会里搞些反对活动，会破坏我

们的行动。”基辛格痛快地答应了，准备去写信。尼克松又叫住他：“别忙，咱们商量一下，看派谁去好。”基辛格说：“戴维·布鲁斯就很合适。”尼克松摇摇头说：“不行，他正在巴黎谈越南问题，派他去不合适。”基辛格说：“那谁去好呢？副总统阿克纽？国务卿罗杰斯？他们的目标太大，难以秘密进入中国。”尼克松笑着说：“我看你很合适，你去吧。”基辛格反对道：“我去？我目标也大。”尼克松拍拍他的肩，信任地说：“你去！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被人觉察。”基辛格开玩笑地说：“总统先生，你派我一个人去，到北京后你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啊！”尼克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敬道：“NO！NO！中国人不是北极熊，他们在历史上从不向外扩张，他们不会要我的阿拉斯加的。”

说是说，笑是笑，正事可一点也不能拖。基辛格从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回来，立即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口信，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让他捎给周恩来。自己则一头钻进飞机，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利门蒂。

加利福尼亚州位于太平洋西海岸，属美国西部，面积仅次于阿拉斯加和得克萨斯两州，是美国第三大州。美国西部虽然开发较晚，但后来居上，加州财力雄厚，为各州之冠。尼克松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以前美国历届总统，多出自东部，加利福尼亚州人担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是第一人。他当了总统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利门蒂设置了“西部白宫”。基辛格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也在附近的棕榈泉买了一幢楼。这次他来到加州后，便住进这幢小楼。

基辛格这次来棕榈泉，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有其他的目的。他既不去海边游泳，也不在沙滩上晒太阳，一头钻进小楼，看一大堆从华盛顿带来的有关中国的材料，这是他从自己和助手整理的重达一吨的材料中挑选出来的。基辛格一边看材料，一边等待一个神秘人物的到来，此人与他即将进行的北京之行有很大的关系。

大约是5月7日下午，一架小飞机飞到棕榈泉，一位美国男子从飞机上走下来，进了基辛格的小楼。基辛格伸出手满意地说：“啊，大使先生，你如期赴约。为此，总统也会感谢你的，请坐。”原来来人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基辛格关心地问：“你来这里的事，国务院不知道吧？”法兰肯定地说：“不知道。我接到你的信后，没有对任何人讲，只是向国务院请了个假，说是回国办点‘私事’，他们就批准了。”基辛格高兴地说：“很好，我的朋友，我再给你说一遍，今天我和你谈的事，只有总统、我、你三人知道，不得透露给任何人。”法兰点点头说：“明白。但是请你告诉我，是什么事这样神秘？”基辛格一字一顿地说：“我很快就要去中国访问。”法兰大吃一惊：“基辛格博士，这是真的？你真要去中国？去那个和我们打了几十年仗的可怕国家？”基辛格说：“是的，正是这样。”接着他向法兰介绍了中美两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秘密传送口信的有关情况，法兰暗自吃惊和羞愧。这么大的事，进行了这么长时间，又是自己国家的政府首脑，自己就住在巴基斯坦首都，竟然没有发现一点

蛛丝马迹，这不是失职吗？

基辛格看出了他的不安，安慰他说："你不要担心，这是有意避开你做的。现在该你出场了，历史注定你将在一个改变世界的国际大事件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法兰深受鼓舞，高兴地说："你说吧，基辛格博士，我该怎么做？"基辛格得意地笑笑说："我和总统研究过你的情况，知道你向来办事认真，就挑选了你。你的任务既简单又复杂，那就是协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安排好我秘密访华的具体环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基辛格的计划是经过反复思考定下的。用中国的兵法术语来解释，这个计划的要诀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基辛格将先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在这些地方，基辛格是只看不说，使记者们逐渐放弃采访的希望而离开。然后到巴基斯坦，在那里的一切，就将由法兰和叶海亚·汗安排了。

法兰听取了基辛格的介绍，明白自己将要在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激动不已。谈完话，即坐飞机回巴基斯坦，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美国国务院和驻巴使馆的官员们只以为他办完私事回职履任了。

法兰飞走后，基辛格立即结束了在棕榈泉的休假，返回华盛顿。原来他来休假是假，躲开华盛顿，在遥远而安静的棕榈泉约见法兰是真。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谢绝一切社交活动，等候着巴基斯坦大使的到来。

6月2日黄昏时分，华盛顿国际机场灯火辉煌，一架架大型客机飞的飞，降的降，一派繁忙景象。又一架客机飞来了，机身上喷涂着巴基斯坦的标志，夜航灯一闪一闪的。在塔台的导引下，飞机轰鸣着，对准跑道降落下来。飞机停稳后，巴基斯坦信使背着外交邮袋走出飞机，早有驻美使馆人员在门口迎接着，几个人坐上有巴基斯坦国旗的小汽车，向使馆飞驰而去。

基辛格正在白宫等待着周恩来的复信，忽然希拉里来了，赶忙迎接。希拉里递给他周恩来的口信，照例是没有抬头，没有署名——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3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乘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飞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读完口信，马上托侍从武官请尼克松总统暂时中止和尼加拉瓜总统的会谈，他有重要事情报告总统。尼克松三言两语地结束了会谈，走了出来。基辛格兴奋地告诉总统："周恩来的复信来了。"尼克松仔细看完口信，乐得嘴巴合不拢，对基辛格说："这也许是大战结束以后我收到的最重要的一封信。"他放下信，就去厨房里取酒。不一会儿，尼克松拿着一瓶名牌陈酿白兰地和两个大高脚杯出来，为自己和基辛格倒满酒，举杯祝贺道："我想，我国的人民会由于我们的行动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你的波罗行动成功，干杯！"基辛格

摊开双手，耸耸肩说："总统先生，600 年前马可·波罗到了元朝的大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他发现了中国。那么，我的波罗行动又能发现什么呢?"尼克松肯定地说："中国，还是中国，一个对美利坚合众国有重大利益的中国!"基辛格欣然举起酒杯："为总统的大度和英明决断干杯!"

1971 年 7 月 1 日晚上 8 时，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灯火辉煌，基辛格博士率办公室诸先生小姐离开基地，乘飞机开始了东南亚之行。随同他出访的有助手洛德、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亚洲问题专家斯迈泽，还有两名特工人员。非常惹人注目的是基辛格的随员中有好几个风姿绰约，美丽动人的妙龄小姐。

基辛格按照计划，在东南亚遛了一圈，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有口无心地应付记者。7 月 8 日他飞到巴基斯坦的时候，已没有什么记者对他感兴趣了。这正中基辛格的下怀，一头钻进轿车，往伊斯兰堡城里驶去。接他的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在车上告诉基辛格："一切都安排好了。"基辛格用手按着自己的胸脯说："愿伊斯兰的真主保佑我。"

基辛格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过伊斯兰堡的大街，最后在市内的豪华宾馆前停下来，基辛格一行住进饭店。是日傍晚，叶海亚总统将在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举行盛大宴会，一个外交史上最著名的遁身喜剧遂拉开帷幕。

政府宾馆是巴基斯坦的国宾馆，相当于中国的"钓鱼台"，虽然没有钓鱼台的古园风韵，却也气派不凡。叶海亚为基辛格举办的欢迎宴会虽未开始，但看看那衣着华丽的乐手，雍容华贵的嘉宾，也可知规格很高，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宴会没有准时开始，客人们感到反常，纷纷揣猜起来。

舒尔坦过来了，神情沮丧地告诉大家："尊贵的客人由于连续旅行，肚子疼痛，现正在治疗。"大家听了，情绪不禁低落下来，还想着客人的肚痛会马上好起来。不一会儿，叶海亚总统出来了，很遗憾地说："由于基辛格博士旅行劳累，身体不适，无法出席宴会，宴会只好改期，特向各位先生女士们道歉，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客人身体复原。我已经决定安排他到北边山上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客人们大部分都以为叶海亚讲的是真情。他们也经常旅行，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更何况，基辛格在印度新德里时挨了一顿鸡蛋西红柿，被包围在宾馆里，差点出不来了。

当然，有的人是不信的，以为基辛格另有目的，可能要去战乱的东巴基斯坦替叶海亚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的怀疑马上就消释了，因为第二天上午他们就看到，基辛格的车队在几十辆摩托车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驰过伊斯兰堡大街，往北边山区开去。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引人注目地坐在另一辆轿车上，车头上的美巴两国国旗迎风飘扬，分外引人注目。

纳蒂亚加利地处群山之中，天气凉爽，环境幽雅。基辛格一行进山后，在总统别墅下榻。舒尔坦请来一位医生为基辛格诊病。这位巴基斯坦医生向来分辨不出白人谁是谁，在他看来，白人都是一个样，大块头，白皮肤，大鼻子。他按照舒尔坦的叮嘱，进屋以后仔细地为基辛格看病，最后诊断为基辛格患的

是德里痢疾，给他打了针，服了药，留下医嘱而去。

基辛格在山间别墅养病，这里就不多说了。且说7月9日凌晨，正是伊斯兰堡一天中最凉快的时候，人们睡意正浓，谁也没有注意几辆军车悄悄地驶过大街，向机场飞驰而去。这时东巴基斯坦要求独立，那里打得正厉害。军事上形势十分紧张，军队调动频繁，已有9万部队调往东巴，几辆军车在凌晨出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凌晨时分，大部分人还在梦乡中，但有许多人享不了这个清福。在伊斯兰堡机场上，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特约记者贝格放弃了清晨的美睡，在机场上走来走去，希望能采访到一些独家新闻。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病倒，贝格总觉得不对劲，认为基辛格负有秘密使命，因此他紧紧地盯住了机场。

突然，几辆军用汽车开来，一直开到军用区的一架巴基斯坦大客机面前才停下来。贝格顿时注意到了这个异常现象，他紧紧地盯着军车，只见从军车里钻出了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随后又钻出了个戴着大墨镜和太阳帽的白人。贝格一眼就盯住了那个大鹰钩鼻子和那个大块头身材。他差点喊出声来，这不是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吗？虽然他化装了一下，但那个大鼻子和大块头是无法掩饰的。贝格看着基辛格下了汽车，同9个人钻进飞机，发动机立即启动，飞机滑向跑道。

贝格激动得浑身发抖，一条独家新闻叫他给抓住了。但是，且慢！基辛格不是在山里的总统别墅养病吗？怎么又会出现在机场上，可别弄错了。他装做无意地问身旁的机场负责人："那不是基辛格吗？"机场负责人点点头说："是的。"贝格又问："他去哪儿？"机场负责人答道："去中国。"

贝格顿时高兴得浑身发软，一条天大的独家新闻让他捕捉到了。他赶到电报局，立即向伦敦《每日电讯报》发出专电：

> 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电讯发到伦敦报社后，值班编辑三下五除二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口里骂道："这个贝格，搞什么名堂。基辛格明明在巴基斯坦养病，怎么会跑到中国去？满纸胡言。"

叶海亚总统精心编织的遁身术成功了！世界舆论都以为基辛格在伊斯兰堡的北部大山里睡觉呢，其实他已登上了巴基斯坦的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准备飞向北京。在叶海亚的指挥下，这架飞机的机组由中国领航员陪同，试航到北京南苑机场。中国外交人员——被周恩来指定的接待小组的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即搭乘这架飞机飞到伊斯兰堡。所以，当基辛格登上这架飞机时，中国的外交人员已在飞机里迎候他了。

基辛格对这几名外交人员很了解，但是现在在飞机里骤然相遇，他还是有点紧张与拘束。在他看来，穿毛式制服，严肃大方的章文晋是一派胸有成竹的样子。唐闻生出生在美国，按美国的法律她可以竞选总统，美国外交界都叫她南希，既聪明又活泼，说着一口纯熟的标准美式英语；而王海容呢？戴副眼镜，腼腆而文雅，看起来像个爱害羞的女学生。

舒尔坦走进机舱，向基辛格介绍了中国人，向中国人介绍了美国人。基辛格没有想到中国政府安排得这么周到，特别是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亲来巴基斯坦接他，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基辛格与中国外交人员和领航的机组人员客气而拘束地握手致意。

但是，基辛格的特工人员一进飞机却顿时紧张起来。他们问基辛格："怎么？亨利，你要跟中国人去北京？"基辛格说："先生，基辛格正在总统别墅养病呢，今天在你们面前的是奉总统命令前往中国的总统特使。你看，中国人在笑你呢，快坐下吧。"基辛格的话打消了机舱里的紧张气氛。等到飞机飞越中巴边界时，中国人、美国人已变成了朋友，围着一张桌子畅谈不已。

7 月 9 日，北京时间中午 12 时 15 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专机在北京南苑机场徐徐降落。出乎基辛格的预料，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亲来机场迎接。他陪同基辛格坐进豪华、高大、宽敞的"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基辛格的下榻地是馆内的 6 号楼。

基辛格稍事梳洗，即在黄华、冀朝铸的陪同下参观国宾馆。只见园内流水小桥，楼亭花树，好一派东方情调。叶剑英在钓鱼台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器皿高雅，美食如水，一道道地从桌子上流过去。基辛格出席过很多国家的宴会，那些宴会都简朴得很，只能吃个半饱。而中国人的宴会，一道菜就是 12 个大盘子。基辛格满意地说："你们的宴会上的菜这么多，会把尼克松总统吓得不敢来了。"叶剑英说："不会的，你回去告诉尼克松，我们中国人做的菜保证合他的胃口。"

宴会刚一结束，工作人员就来告诉大家，周恩来总理的车已出了中南海，很快就到钓鱼台了。中国总理来了，多少天来，基辛格研究这个中国伟人的传记，期待着与他会面，而现在马上就要见到他时，基辛格却紧张起来了。

周恩来马上就要到了，基辛格一行站在门口，排成一排，垂手站立，准备迎接。基辛格发现有的随行人员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不由得暗暗着急。

一辆大"红旗"驶到6 号楼门口停下来，周恩来身穿灰色中山服走出车来。基辛格细细打量，只见总理脸容瘦削，甚至有点憔悴，但目光炯炯，神色沉着，举止优雅。他走过来和基辛格紧紧地握手，笑着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余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一听，这话说得多么高雅，又多么坦率。他故作遗憾地说："可惜不能公开，要不世界都会大吃一惊。"基辛格说完，把自己的助手介绍给周恩来。这时他们意外地发现，周恩来对他们每个人的情况十分了解，这些美国人的拘束和紧张顿时消失了。

周恩来和基辛格开始会谈。这天的会谈主要是谈双方各自的观点，并不着急解决实际问题。谈着谈着，周恩来提起了7月6日尼克松刚发表的世界“五极”的讲话。基辛格由于在访问中，完全不知道尼克松的这个讲话，不禁茫然。周恩来看出来了，问基辛格：“是不是你们在路上还没有接到这个讲话?”基辛格默默地点点头。周恩来说：“那没有关系，我给你介绍一下总统的理论。总统认为世界将形成美、苏、中、西德、日本五极，我们基本赞成他对世界格局发展的这个判断，但是我们不同意说我们是超级经济大国，我们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周恩来完全没有利用美国人的失误为自己捞分，基辛格又意外，又高兴。他明白了，周恩来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对他那么崇拜。

会谈结束后，一回到6号楼，基辛格的随员们就抱怨起尼克松来了：“笑话，外交史上的笑话！美国总统的讲话，得由谈判对手向我们转达，不知总统是怎么想的。”基辛格感动地说：“周总理，人格伟大。要是换了赫鲁晓夫，早就搞小动作了。”

是晚，6号楼的灯光很晚才熄。4号楼也是彻夜灯火通明，周恩来领导的外交工作小组就驻扎在这幢楼里，这个小组是专门为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成立的。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叮嘱王海容：“你给主席通个电话，我、你、唐闻生，我们三人马上去主席那里报告会谈情况。”王海容答应着打电话去了。不一会儿，她来报告：“总理，主席让熊向晖也去。”周恩来心想，熊向晖虽在这个小组，但他主要在总参工作，主席叫他去干什么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三回 林立果布兵炸专列 毛泽东设计破奸谋

话说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同基辛格会谈。会谈从下午4时半开始，直谈到晚上11时才结束。随后周恩来准备带王海容、唐闻生去向毛泽东汇报。不料毛泽东通知王海容，让熊向晖一起来。周恩来不知毛泽东叫熊向晖有何重大事情，便把熊向晖叫上，一起从4号楼上了车，向中南海驶去。

熊向晖也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外交小组进驻了钓鱼台。他这时已调总参任某部副部长，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参加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外交小组进驻钓鱼台4号楼以后，他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际形势，配合谈判。熊向晖以为主席召他去，是想了解国际形势。他无心欣赏夏夜的景色，考虑着怎样向主席汇报。不知不觉，车子就在中南海毛泽东居所游泳池前停了下来。

周恩来一行进了毛泽东办公室，向老人家问了好。随后周恩来和熊向晖一左一右在毛泽东身边的两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王海容坐在熊向晖一侧的沙发上，唐闻生在毛泽东坐的沙发后面一把木椅上坐下来。大家坐好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我来汇报一下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挥挥手："不忙，不忙。"他把脸转向熊向晖，问道："你抽烟吗?"王海容代答道："老熊是个烟鬼。"毛泽东一愣："不是小熊吗，怎么成了老熊了?"熊向晖老老实实地说："主席，我今年已经52岁了。"毛泽东摇摇头："52岁就叫老熊？我不同意，还是叫小熊好。你抽烟吧，有你在，我就不孤立了。他们都是讲卫生，不抽烟的啊!"

熊向晖不客气地从毛泽东的烟盒里抽了支烟点上抽起来，毛泽东也为自己点上一支烟。熊向晖看看周恩来，示意总理可以汇报了，但周恩来却装做没有看见。他已看出来，毛泽东有话要问熊向晖。

果然，毛泽东又问熊向晖："你在总参任副部长?"熊向晖答道："是。"毛泽东接着问："那个参谋总长叫什么名字呀?"熊向晖奇怪了，主席问这个问题干什么？主席还能不知道总参谋长是黄永胜？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是参谋总长？想是想，说是说，熊向晖如实回答："总参谋长是黄永胜。"毛泽东吐口烟，语带轻蔑地说："噢，是他呀！他在总参批陈整风小结会上说了些什么呀?"

总参的批陈整风小结会是前不久召开的，王新亭副总长念了小结，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吴法宪的发言把黄永胜抬得很高，充分肯定了总参批陈整风

的成绩，极力称赞黄永胜主持总参以来，总参的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成绩，黄总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很满意的。黄永胜最后讲了话，谦虚地说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得还不深刻，比林副主席差得很远。

熊向晖是总参某部副部长，当然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如实汇报了会议情况，以为主席很满意。不料毛泽东听着听着。脸沉了下来。熊向晖讲完了，毛泽东冷冷地问："完了？就这些？"熊向晖点点头说："就这些。"毛泽东问道："你嗅出点什么没有？"熊向晖莫名其妙，只好回答："没有嗅出什么。"毛泽东气呼呼地问："黄、吴、叶、李、邱在庐山跟着陈伯达捣鬼，你一点也没听说？"熊向晖脑袋"嗡"地一响，黄、吴、叶、李、邱在庐山捣乱，这可能吗？须知，他们都是现今在中国政坛上红得发紫的人物呀！毛泽东看熊向晖吃惊得目瞪口呆，心里便明白了，转过头来问周恩来："5 个大将的检讨，发到总参了没有？"周恩来回答说："发了，军委和总参共发了 60 多份，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但是，现在看来，黄永胜都给扣下了，根本没有发下去。"

毛泽东把沙发扶手一拍，恼怒地说："5 个大将的检讨根本就是假的，黄永胜他们在搞阴谋，庐山的事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熊向晖心里一惊，主席这不是批林彪吗？林彪也有问题，他不敢往下想了，回过身来听周恩来汇报。

经过两天的谈判，黄华提出的联合公报方案，由于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观点，基本上为基辛格接受了，这就为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奠定了基础。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为 1972 年春天。

基辛格圆满完成了秘密使命，要起程回国了。宴会上，基辛格悄悄地对黄华讲："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黄华说："请讲吧。"基辛格认真地说："来北京之前，我和总统设想过和你们谈判的情景。我们认定你们一定会拍着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的口号，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越南。"黄华以为他在开玩笑，笑着摇摇头："我才不信呢。"基辛格的助手证实说："博士讲的都是实话。"黄华一愣，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一行后，又来到西花厅处理公文。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来，他一把抓起电话："主席要南巡？……好的。"原来毛泽东自和熊向晖谈话后，得知黄永胜根本没有把他们的检讨向下发，根本不认识错误。进入 7 月底以来，毛泽东又不断接到汪东兴等人的报告，得知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接触频繁，行动十分可疑。他估计林彪要发动政变了，便冒着危险，到南方巡视，和各地的封疆大员们打打招呼。

8 月 14 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出发，两天后到达武汉，8 月 17 日到了长沙，8 月 31 日到达南昌，9 月 3 日到达杭州。每到一地，他总是把那些手握重权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找来谈话，从武汉一直谈到杭州。

毛泽东和这些地方大员们谈的什么，是绝对保密的。林彪知道毛泽东南巡是针对着自己的，但就是不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恰好李作鹏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到武汉去访问，叶群便通过黄永胜转告李作鹏，要他到武汉后，找刘丰谈谈，务必要搞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李作鹏接受指令后，当天就把刘丰找到东湖宾馆，问道："林副主席很想知道主席和你们的谈话内容，所以我把你约来谈谈。"刘丰有点紧张，主席的谈话都是批评他们的，是务必要保密的，怎么能透露给李作鹏呢？李作鹏看他吞吞吐吐的，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想想你这个大军区政委是怎么当上的。林副主席垮了，你也得跟着完蛋。"刘丰想想也是，心一横，便把毛泽东来武汉时的谈话内容都告诉李作鹏了。

外国军事代表团在武汉结束访问后，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回到北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代表中国军方和他们进行会谈。下午 5 时，会谈结束，李作鹏等送走了外国代表团，即把黄永胜拉到一角落，给他讲了刘丰的密告。黄永胜听了，胆战心惊，把刘丰密报的毛泽东谈话内容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在北戴河的叶群。这正是 1971 年 9 月 6 日晚，离李作鹏从武汉回到北京还不到 4 个钟头。在这之前几个小时，周宇驰驾驶直升机送来了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密报来的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几个人关起门来，把这两份谈话记录放在一起比照，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就很清楚了。那么毛泽东谈了些什么呢？

毛泽东第一站是先到武汉，在这里他召集了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干部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谈话。毛泽东望着这几位封疆大员，扳着指头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接着，毛泽东历数十次错误路线的罪恶："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 年党的六大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1930 年罗章龙另立中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从 1931 年到 1934 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直到 1935 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同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 年彭德怀里通外国，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毛泽东停下来，喝口茶，望望憨厚老实的华国锋。他对这位出生于山西交城的父母官印象很好。华国锋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后随大军南下，出任毛泽东故乡——湘潭县委第一书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南巡，到了故乡，华国锋前来迎接。他不善言辞，但办事扎实。这位山西人身材高大，留着

寸头，生活朴素，也令毛泽东喜欢。在毛泽东看来，他是那种厚重少文的老实人。从此以后，毛泽东对他着意培养，由湘潭县委书记而韶山地委书记，而湖南省委书记。华主持修建了韶山铁路和韶山灌区，组织设计建造了韶山纪念馆。此时，他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喝了几口茶，又讲起来，直截了当地点林彪的名字："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突然袭击，带头发难。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彭德怀还下一道战书呢，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大概总认为有把握了。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对林还是要保，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要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他们要捂，连总参二级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好处。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吴、李、邱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通过她。"

华国锋心里明白，林彪问题已成为第十次路线斗争了，立即表态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坚决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挥。其他几个人也都表了态。

在长沙和南昌，毛泽东又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负责人谈了话。毛泽东指着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问道："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我就不信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

毛泽东9月3日到达杭州。陈励耘奉命前来见毛泽东。由于他心里有鬼，表情上不大自然。毛泽东责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怎样？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吓得面色苍白，支支吾吾。

林彪研究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情知毛泽东要摊牌了。他坐在沙发上闭着眼想了一会儿说："人家要来吃席，我们只有摆宴，绝不能束手待毙，要干！"周宇驰挥舞着拳头说："林副主席说得很对，我明天就回北京。"林立果说："现在是到摊牌的时候了。我命令，联合舰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

第二天下午，周宇驰要回北京组织行动了，林彪设宴为他送行。北戴河的秋天凉意袭人，海风萧萧。叶群、林立果频频劝酒。周宇驰也知道前途凶险，借酒浇愁，大有荆轲刺秦王的味道。盛宴结束了，周宇驰要走了，林彪突然抱住他哭泣起来："宇驰，我的全家的性命都交给你了。"叶群、林立果心里不是滋味。林彪，中外驰名的常胜将军，堂堂国防部长，多少国民党名将败在他手下，又有多少中共开国元勋被他打翻在地。而今天，他竟伏在一个空军司令部处级干部的身上哭泣求助。叶群、林立果心里难过，周宇驰也哽咽着说："首长

放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周宇驰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江腾蛟传达了林立果的命令，决定乘毛泽东的专列经过上海时干掉毛泽东。两个人商量定后，江腾蛟动身去上海组织暗杀行动去了。

周宇驰一走，林立果也准备接着走，可是他舍不得美貌妃子，便在北戴河多待了一天。叶群见他这个时候还在迷恋女色，哪里像个干大事的样子，便劝他快走：“大事成功了，天下的美女任你挑。在这个生死关头，你行动要快些啊！”林立果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妃子，带着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乘坐吴法宪专门派来的从英国进口的256号三叉戟专机，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林立果飞到西郊机场后，立即在机场大楼把周宇驰、李伟信、江腾蛟几个死党召来，拿出林彪的手令给大家看。只见一张16开的白纸上歪歪斜斜地用红铅笔写着几个大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收起手令，杀气腾腾地说：“大家都看到了吧，首长已经下了决心。现在我们只有死中求生，才有活路。现在我来部署一下行动。B—52正在杭州，下一步要到上海，我们就在上海动手。B—52就那么点人，很好解决。具体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火车，另外调几门高射炮平射，然后用教导队往上冲。如果这两个办法没有用上，就让王维国带手枪上专列把B—52干掉。上海的行动就由江政委担任前线总指挥。”

林立果说得很有信心，江腾蛟却直摇头：“这些办法不行。空军没有火焰喷射器，就是有，战士们怎么会肯烧主席的专列。向专列调炮，一动就会被发现。主席的专列都装了防弹玻璃，步枪子弹打不透。车上的警卫部队只要抵抗半小时，附近的陆军部队就会赶来。”

江腾蛟的话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这时候他们才发现，闹腾了半天，都是虚的，紧急关头，要什么没有什么。会场上冷了一会儿，周宇驰问道：“主席的专列现在停在什么地方？”江腾蛟说：“杭州笕桥机场。”周宇驰一拍桌子，兴奋地说：“有了！叫陈励耘把机场油库炸了，让汽油流到专列附近，然后叫教导队往上冲，对战士说抢救主席，战士肯定愿意干，然后趁乱……”他做个决断的手势。

林立果也兴奋地一拍桌子：“这是个好办法，看还有办法没有，咱们得多准备几手。”江腾蛟说：“我还有个好办法，请大家跟我来。”林立果等人随江腾蛟进了一间密室，江腾蛟拉开挂在房里的一道帷幕，露出一个沙盘，沙盘上是苏州硕放的一个整体模型，沪杭铁路从这里经过。江腾蛟按动电钮，一列玩具列车在铁轨上蠕动起来。列车行经硕放时，突然发出一声轻微的爆炸声，列车被炸翻成数截，七倒八歪地横在铁路两侧。

林立果大叫一声“好”，带头热烈鼓起掌来。江腾蛟冷酷地说：“只要有一连人，就可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1928年，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埋下炸药，炸翻奉军统帅张作霖的专列，炸死张作霖）。然后，

一连军队开枪猛扫……”林立果对这个主意拍手叫好，下了命令：“江政委统一指挥南线行动，先在杭州搞。杭州如果困难，就在上海干。鲁珉负责指挥硕放炸专列。江政委代号歼七，鲁珉代号歼八。现在开始行动。”

让林立果想不到的是，会后鲁珉想法把自己的眼睛弄坏，在家休息，与“联合舰队”切断了联系。

林立果这里调兵遣将，准备炸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察到阴谋临近。9月8日，于新野从北京赶到杭州，向陈励耘布置暗杀任务。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离开笕桥机场，往回退到绍兴，这里离杭州有一个多小时的行程。陈励耘得知后又悔又喜，悔的是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机场，不能放汽油去烧了；喜的是专列退到宁波，毛泽东要在杭州住一阵子，自己负责杭州的警卫工作，可以很方便地对毛泽东下手。

谁知还未等陈励耘等人准备好行动计划，毛泽东突然在9月10日下午3时下令把专列调回来。专列一到杭州，毛泽东马上登上专列，命令立即开车。陈励耘闻知赶快跑到杭州车站，果见毛泽东等人已经登上专列。车站上戒备森严，陈励耘心里有鬼，都不敢上去和毛泽东握手，眼看着专列驶离杭州，向上海开去。专列到达上海时，天已黑了。王维国带着手枪赶到专列停放的虹桥附近的吴家花园，但毛泽东没有下车，专列四周中央警卫团的士兵头戴钢盔持枪戒备。王维国不敢走开，在附近的一间房子里向林立果打了一夜电话，请示行动方案，但始终没有打通。

第二天，也就是9月11日上午9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和上海负责人王洪文，和他们谈了林彪问题。快到中午时，毛泽东让许世友等人下车吃饭，下午再谈。许世友坐车走了，王维国也跟着离开了吴家花园。

许世友等人一走，毛泽东下令立即开车。列车在江南大地上奔驰，出了上海，过了苏州，过了硕放，直驶北京。王维国赶快又给林立果打电话报告，这回倒是一下子打通了。

那么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打通电话呢？据说是林立果又弄了两个美女，玩了一夜，这会儿又在北京西郊机场大楼里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商议计划。电话铃响了，周宇驰去接，只听了一句，就大惊失色地问：“什么？”林立果情知有特别情况，接过电话说：“喂，我是，王维国出院啦？”林立果顿时脸色发白，瘫在沙发里，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号啕大哭：“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于新野忙问周宇驰：“发生了什么事？”周宇驰冷冷地说：“主席的专列突然开动，已经离开了上海，也过了硕放。”于新野一跺脚，指着林立果大骂：“都是你，贪图美女，误了大事，整整一天的时间叫你给耽搁了。”林立果没有说话，仍在哭。周宇驰则拿起一根棍棒，砸烂房里的名贵陈设。于新野也拿起一根棒子，开始砸，边砸边嚷：“砸！都砸烂它！我们不能享受，也不能留给他们。”

周宇驰忽然扔下棒子，嚷道："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开直升机去撞天安门，你们谁跟我去?"于新野说："我去!"刘沛丰也说："我去!"林立果擦擦眼睛说："算啦，都别去啦，现在转入第二套行动方案。"

毛泽东的专列沿途不停，星夜北上。叶群得到报告，披头散发地冲进林彪的房间，惊叫道："育容，老虎那里都泡汤了，主席的专列已经过了济南。"林彪慌了神，手忙脚乱地说："快！快！准备飞机，到广州去。"

原来林彪还有一个预备计划，准备在谋杀毛泽东不成的情况下，南逃广东，另立中央，和苏联合作，南北夹击北京。林立果接到林彪的命令后，立即开始部署逃难。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接到林立果的命令，准备接待南逃诸人。为了指挥方便，他特意让其他首长休息，自己到司令部值班，安排好后，他打电话告诉周宇驰："我已进入指挥位置……"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四回　林副帅叛国逃蒙古　周总理守京封空航

话说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接到林彪南逃的命令后，立即在广州准备车辆，安排警卫，自己进入空军值班室指挥，准备迎接林彪南来。黄永胜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多年，军区里自然少不了他的亲信。现在的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是“文化大革命”中提上来的，是林彪非常赏识的人物。林彪如果真的能够实现南逃的计划，中国将会出现非常复杂的局面。

林彪集团的南逃计划在紧张地施行中。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根据吴法宪的命令，直接与叶群联系，为林彪等人准备南逃飞机。他同空军某师副政委潘景寅商量，从各个机组中挑选了最可靠、技术最好的人组成机组，由潘景寅任机长。从英国进口的三叉戟256号大型喷气式飞机已经过检修和改装，正停在北京西郊机场，随时准备听候调用。胡萍又调了7架飞机，加紧检修，准备南逃。

9月12日，林立果向林彪请示了南逃方略，随后把林彪的指示向周宇驰作了传达，两人立即来到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在他们的秘密据点——一幢小楼里召开了联合舰队核心会议。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先后赶到。林立果正带着几个人烧文件，捆扎行李，房子里一片凌乱，正如同新中国成立以后拍的一些战争片中国民党军队败逃的场面。林立果顾不上多说，让周宇驰主持会议，布置南逃事宜，自己带了几个随从和两个美女匆匆去了机场。

周宇驰送走林立果，走到桌前，绝望地说：“我给大家传达一个新消息，B—52在上海说，这几年他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黄抓去了，现在又被林、黄抓去了。B—52要动手了，看来，他从南方回到北京就要解决我们。首长指示，立即去广州，黄、吴、李、邱明天也去。今晚由王副参谋长主持定下具体名单和计划。”

周宇驰走后，王飞根据周宇驰的交代，当晚主持联合舰队核心小组会议，具体地研究了护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会议中间，王飞命人从空军司令部警卫营取来30支手枪，参加行动的人每人一支。

然而就在这时，有人向中央告了密，使林彪的南逃行动计划一下子暴露了。

且说林立果从空军学院小楼出来后，立即乘车去了西郊机场，在256号三叉戟飞机前停下来，留恋地看了一眼熟悉的机场，带着刘沛丰等随从钻进了飞

机，256 号飞机在夜空里腾空而起。潘景寅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飞行员，驾驶技术高超。在漆黑的夜空中，飞机平稳地向北戴河飞着。林立果感到有必要对机组人员笼络笼络，便离开座位，走进机舱，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副主席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大家。"

飞机飞行着，机翼下闪过北京市的万家灯火。林立果俯视着北京夜景，心里默默地说："北京，再见了。"他知道此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禁有些伤感。

飞机经过一小时的飞行，晚上 8 时降落在山海关机场，这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林立果下了飞机后，把随从人员留在机场，自己开着吉普车向北戴河林彪别墅驶去。

在北戴河禁区，有许多两层的小别墅楼房，散布在海滨的山坡上，繁花奇木把这些小别墅装扮得特别漂亮。谁说人间无仙境，北戴河里美如画。在这些美轮美奂的别墅中，有一座别墅特别扎眼。此别墅位于莲峰山莲花石附近，是一幢青砖砌成的两层小楼。但奇怪的是，这座小楼竟然没有窗户——其实，本来是有窗户的，因为主人怕光、怕风，窗户都被木板封上了。

这座小楼就是北戴河中央疗养院 91 号楼，是根据林彪的要求专门为他设计建造的。庐山会议以来，林彪一直在这里居住，一是在这里搞阴谋活动方便些，二是怕有人暗害。申生在内则危，重耳在外而安，他一直记着春秋时期晋国政变的这个教训。

林立果回到 91 号楼以后，汇报了在北京商定的准备南逃的措施。林彪听了，冷漠地点点头，没有再多说话。自政变计划失败以后，林彪对这位老虎顿生恶感，感到他志大才疏，贪图享受，优柔寡断，拿他林彪的性命在开玩笑。他的政变计划搞了半天，没有一个是实的，事到临头，手忙脚乱，被毛泽东略施小计，联合舰队便被打翻了船。

林立果知道林彪对自己不满，细想起来，自己也确实没有把事办好，搞得这样被动。现在他只有出死力协助"首长"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还可将功补过，重新取得信任。

林立果一来，91 号楼就翻了天。叶群、林彪、林立果一天到晚关在林彪的房里嘀嘀咕咕，服务员在收拾林彪的行装，参谋收拾着机密文件、军用地图，一片紧张忙乱的景象。这一切都被林立衡看到了，心里顿生疑惑，林彪莫非要出逃？

林立衡是林彪、叶群的大女儿，是林立果的姐姐，生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林彪考虑作战计划时，总喜欢口里嚼着炒豆子，便给这个女儿起名为豆豆，上学后又正式起名为林立衡。对这个女儿，林彪、叶群不可谓不关心。1959 年以后林彪当了国防部长，林立衡的地位也扶摇直上，小小年纪，便已成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这个职务的级别是副师职，这是比较高的军队职级了。须

知，当年朝鲜战争中奇袭白虎团的排长，著名战斗英雄杨育才这时也刚刚升为副师长。

像所有的父母亲一样，林彪、叶群对儿女的婚事也极为关心，双管齐下，为儿子挑妃子，为女儿选驸马。黄、吴、李、邱一并出动，闹得鸡飞狗跳，最后总算为林立果选了个如意妃子，为林立衡选了个多情郎君。林立果的妃子叫张宁，身材修长，美貌动人。她的父亲原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与林立果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林立衡的驸马是张庆林，倒是贫寒出身，但相貌堂堂，才学出众，老实厚道，林彪、叶群特别喜欢。现在，全家要飞到广州另立中央，前途未卜，生死难知。林彪、叶群催着林立衡、张庆林在91号楼举行婚礼，结为夫妇，了却了一桩心事。

林立衡到底是在党教育下长大的青年，对林彪、叶群干的许多事不满意。林立果要搞政变，要南逃广州，林立衡耳有所闻。但她以为那不过是弟弟的胡思乱想，绝没有想到林立果早已制定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建立了联合舰队，布兵谋杀毛泽东。林彪、叶群、林立果也都严严实实地瞒着她。但林立衡根据这几天的异常情况判断出，林彪果然是要南逃广州。她急忙从给自己婚礼助兴的电影晚会溜出来，摸黑跑到54号楼中央警卫部队驻地，对姜大队长说："林彪要逃跑。"姜大队长是个营级干部，并不知道党内高层的斗争情况。但警卫生涯养成的政治敏觉性使他不敢忽略林立衡的报告，他立即把警卫团张副团长请来，林立衡把林彪准备逃跑的情况又说了一遍。三人一商议，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立即由张副团长拿起电话，向北京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听了汇报，紧张得冒出汗来，赶快向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拿起电话，只听汪东兴着急地说："总理，北戴河91号楼警卫部队张副团长打来电话报告，林彪要逃跑。"周恩来眉毛一挑，问道："情况可靠吗?"汪东兴在电话里说："张副团长判断，情况可靠，因为是林立衡主动跑来报告的。林立衡还说有一架大飞机今晚8点多钟送林立果到了山海关机场。"周恩来命令汪东兴："告诉警卫部队，提高警惕，密切注意91号楼，有事随时报告。遇有突发事件，来不及请示时，部队要采取断然措施，防止事态发展。"汪东兴说："好，我立即告诉他们。"

作为总理，周恩来现在只能这么说，因为林彪还是副统帅，另外林立衡的报告还要核实，他早就知道林立衡和家里闹意见，要防止报告里掺杂进个人情绪。

周恩来开始核查了。先查飞机，如果真有一架大飞机到山海关，林立衡的报告就是真的，因为林彪要逃跑，必须坐飞机走。周恩来要通了吴法宪的电话，问他："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吴法宪连忙否认："没有，没有。"转而补了一句："我马上去查一下。"周恩来命令道："迅速查清，立刻报告。"他放下电话，一想山海关机场是海军的机场，要去了飞机，李作鹏会知道的，便又打电话问李作鹏："你知道不知道，一架飞机飞到山海关机场去了?"李作鹏

说："不知道呀，我去查查。"

过一会儿，李作鹏查清报告了："总理，去了一架三叉戟飞机，停在机场，机号是256号。"吴法宪的电话也来了："我问了胡萍，是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去山海关了，是改装后训练飞行。"周恩来命令道："立刻把这架飞机调回来。飞回时，机上不许搭载任何人。"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出了故障，要检修，现在不能飞。"周恩来果断地说："你立即去西郊机场，查明情况，务必把这架飞机调回来，出了问题你去向主席交代。"

吴法宪在电话里听着周恩来口气严厉，不敢怠慢，赶快查问胡萍："今晚飞到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事情闹大了。"胡萍心里想，吴法宪你装什么正经呀，调飞机的事还不是你早就同意的。他心生一计，对吴法宪说："你不是说过，要改装一架飞机给林副主席用吗？这三叉戟就是改装试飞的飞机。"吴法宪说："飞机立刻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动。"吴法宪说："好，你等着，我马上来机场。"

林彪、叶群已经从胡萍那里得到消息，周恩来在查问256号飞机，知道阴谋败露，再调飞机南逃是根本不可能了。叶群尖叫着问林彪：一〇一，你说怎么办呀？"林彪不动声色地说："执行第三号计划！"叶群诧异地问："什么第三号计划？"林彪说："往北飞，到苏联去。"叶群怀疑地问："行吗？咱们刚才和人家打了一仗。"林彪点点头说："没有问题，你过来。"林彪对着叶群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叶群惊喜地说："是吗？你真是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你这个第三号方案为什么不早对我讲？"林彪卖弄地说："这样的事怎么能讲出去，只能见机行事。你赶快向周恩来打个电话，说我要动一动，稳住他。"叶群说："好的，我马上去打。"

这时已经是1971年9月12日11时20分，周恩来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周恩来拿过电话，听筒里传来叶群的声音："总理呀？还没有休息呀？林彪同志要我向您报告，他想动一动。"周恩来问："你们准备往哪里动呀？"叶群说："去大连。"周恩来又问："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群回答说："是空中动，我们要调几架飞机。"周恩来故意问："你们调飞机没有？"叶群说："没有呀，林彪同志要我向总理报告调飞机。"

撒谎！256号飞机已经摆在山海关机场，还说没有调飞机。叶群的这个电话不仅没有稳住周恩来，反而更进一步证明了林立衡的报告是真的。周恩来立即调兵遣将，防止他们逃跑。他先把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叫来，吩咐他："你带一个连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处理256号飞机，不能让人跑了，你明白吗？"杨德中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带着卫戍区的一个连走了。周恩来又把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找来，叫他带一营部队进驻空军大院，接管空军的领导权。李德生立即调来北京军区侦察营，全副武装开进西郊的空军大院，把处以上司令部干部集中起来，宣读了中央命令，接管了空军的指挥权。

其时，黄永胜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周恩来把黄永胜找来，命令他：

“从现在起，你在这里协助我工作，不能离开一步。”黄永胜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老老实实地在办公室坐了下来。

周恩来三下五除二就把黄永胜、吴法宪看起来了，随后又命令李作鹏：“你告诉山海关机场，中央命令，停在山海关的256号飞机，要有周恩来、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李作鹏眼珠一转，马上想出一个坏主意，他要通山海关机场的电话，对机场政委说：“停在你们机场的256号飞机，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中的一个人同意放飞才能起飞。”

叶群给周恩来打完电话后半个小时过去了，北戴河91号楼还在放着美国影片《大海深处》。忽然叶群跑进来宣布：“快停演，今天晚上就去大连，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林立衡听完，赶快和新婚丈夫张庆林跑到56号楼向警卫部队报告。叶群喊着：“快调车，老杨，快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从房子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林彪连帽子也没有戴。他们手忙脚乱地钻进汽车，汽车立即大开前灯开过来。警卫部队跑出来拦阻，跑步声、口令声响成一片。姜大队长抬起手命令汽车停下，林彪说：“冲！冲！”汽车横冲直撞地开了过来，硬是不顾部队的拦阻闯了过去。姜大队长举枪射击，其他战士也举枪射击。但一则车速太快，二则车是防弹汽车，子弹根本打不进去。

汽车上了公路，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前开去，不久就发现公路前方有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和一辆吉普车。按林彪座车的速度，一下子可以超越他们。可是那两辆车故意在路上扭来扭去，不让他们超车。这两辆车的部队正是北戴河警卫部队，是张副团长听了林立衡刚才的报告派出去拦截256号飞机的。车上的士兵用枪瞄准林彪的座车，林彪心里一阵悲哀。这些几天前还喊着向林副主席致敬口号的警卫战士，现在居然都用枪瞄着自己，什么叫虎落平阳，这就是了。

前方是铁路公路交叉口，大概是火车要过来了，拦阻杆正往下降，吉普车和卡车都停住了。林彪一看超车的机会来了，一拍司机的肩膀说：“冲！”卧车本来车身就低，司机猛一踩油门，车冲了过去。前面再没有障碍物了，汽车高速行驶着，车身都飘了起来。

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的“红旗”车驶进山海关机场，一直开到256号三叉戟飞机跟前才停住。叶群第一个跳下车，嚷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起飞，油车快开走。”林立果、刘沛丰提着手枪，乱喊乱叫。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还没有加满，叶群就叫开走。没有舷梯，他们就抓着驾驶舱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在上，林彪在下，叶群的鞋几乎踩着林彪的光头。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和留在机场的两名美女还没有爬上飞机，飞机就发动了，轰鸣着往跑道滑去。这时，执行拦阻任务的部队也赶到了，和机场一起关闭了跑道灯，跑道顿时漆黑一片。但是潘景寅技术高，他凭借着对一些模模糊糊的地面目标的分析判断，准确地把飞机开上了跑道。飞机滑跑一段后，潘景寅喊声“拉起！”飞机凌空而起。机场人员和拦阻部队看不到飞机的身影，只听见飞机起飞时巨

大的轰鸣声。过了一会儿，那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听不见了。

飞机飞走后，机舱里可能出现了以下事情：

林彪在飞机上俯视着黑漆漆的大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叶群、林立果也都活跃起来。林彪对林立果说："这个老潘的技术是很好的哪。"叶群点头同意："今晚真亏了他。"她走进驾驶舱，对潘景寅说："你们对首长很忠，首长很感谢你们。你们再加把劲，只要飞到伊尔库茨克，你们就立了头功。"

林彪在客舱里已经对林立果讲起了自己在苏联时的经历，他当年如何见斯大林，如何面陈战略计划，林立果等人听得十分入迷，只有叶群不太高兴。当年林彪去苏联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干部，是抗日英雄，苏联当然礼待。而今去苏联是叛国的元帅，避难来的，怎会有当年的风光。不过，总算逃出来了，可以免受刘少奇那样的折磨了。

窗外，忽有飞机的夜航灯一闪。叶群又一阵紧张："一〇一，窗外有飞机，会不会把我们打下来?"林彪毫不在乎地摆摆手说："不会的，他们不会打我。飞机不打，导弹也不打。"叶群疑惑地问："为什么呢?"林彪自我解嘲地说："我是副统帅嘛。打下来，主席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大家一听，都放下心来，又开始谈笑起来。

以上内容只是人们的猜测。

警卫部队没有拦住飞机，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报告。汪东兴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给李德生和吴法宪打电话，命令道："从现在起，不准任何飞机进北京！全国的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联名的命令，不准起飞!"发布了命令，周恩来又对吴法宪说："打开通话器，喊他们回来，他们在国内任何一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迎接。"

李德生和吴法宪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全国所有的空军和民航机场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出动了一个中队的战斗机在天空夜巡。通讯部门遵照命令，打开了无线通话器，呼叫着256号飞机："回来吧，只有回来，才是光明。你们只要回来，降落在国内任何一个机场，周恩来总理都亲自去接你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北京的喊话，林彪应是听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一声不吭。都到这步田地了，还能回去吗？既然不能回去，又有什么必要去回答呢？飞机侧侧身，一拐弯直飞蒙古人民共和国。吴法宪连忙向周恩来报告："飞机往蒙古飞了，要不要打下来?"周恩来说："你们严密监视，不要动它，我去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刚回到北京，他从上海北上后在丰台停留了好几天，找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谈话，几个小时前才进的中南海。一路上，他对怎样解决林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腹案，唯独没有想到林彪要逃跑。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毛泽东大大吃了一惊，同时又得意地笑了，林彪仓皇出逃证明了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威望。但是，要不要把林彪打下来？打下来倒是痛快，也很好办，边境线上有的是导弹。但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副统帅是毛泽东一手

提拔起来的，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突然被导弹给打下来，老百姓会怎么想。与其把林彪打下来，还不如让他飞走，让老百姓也知道，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林彪却硬要叛国，是林彪对不起毛泽东，对不起国家和民族。毛泽东想到这里，对周恩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周恩来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刻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他严厉地命令吴法宪："256 号飞机让它飞走，不要打。这是主席的指示！"吴法宪接到命令，很是奇怪。但命令就是命令。他来到作战室，只见雷达军官紧张地盯着雷达屏幕，那上面一个光点移动着，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雷达军官测测距离，飞机失踪的地方大约是温都尔汗，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小地方，距中蒙边境不远。

吴法宪明白，飞机已飞出了我军雷达监视范围。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并请求主席住到人民大会堂来，以保证安全。不一会儿，毛泽东由地道到了人民大会堂，对周恩来说："给我弄一架收音机来，我要听听林彪是怎样发表反华声明。"

这时已经是 9 月 13 日凌晨 3 时多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来来去去处理林彪问题。内勤送来早餐，是一碗香香的鸡汤肉丝面，周恩来三口两口把面条吃了，又抓起个小花卷就着面汤吃下去。刚吃完，电话铃声又响了，是吴法宪来的报告："雷达报告，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往北飞去。"周恩来果断地命令道："出动战斗机迫降。如不听命令，把它击落。"吴法宪答应道："是！"放下电话，他立刻给歼击部队下了命令。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五回 许大使果断启专线 叶参座忠义主军委

话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坐飞机出逃后，周恩来立即下令封航，禁止一切飞机在国内机场起飞，又派出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及民航机场，把机场控制起来。这时周恩来突然得到吴法宪报告，说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一直向北飞去。下了封航令，谁还敢大胆违抗军令起飞，肯定是林彪的死党。周恩来当即命令吴法宪："出动战斗机迫降。如果不听命令，把它击落。"吴法宪在电话里答应一声："是，如不听命令，把它击落。"

吴法宪放下电话，向隔壁的作战室走去。林彪逃跑了，对他是当头一棒，没想到庐山的事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想跳楼，可是李德生就在屋内，屋里、走廊里到处都是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吴法宪无奈，命令作战室下达作战命令，两架歼击机立刻腾空而起。这时直升机绕个圈子，又飞回来了，两架歼击机发出指令，命令直升机迫降，直升机降落下去。这里是怀柔县的一个村子，村里的民兵看见一架直升机降下来，立刻手持镰斧围住了它。怀柔县军代表、武装部部长、卫戍区副司令员闻讯都带部队赶来。直升机上有一驾驶员背部中弹，伏在驾驶座上，检查证件，得知他叫陈修文。野地里有两具男尸，一个较胖些，40多岁；一个较瘦些，也年轻些。审讯民兵抓获的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李伟信，他讲述了直升机起飞的经过——

原来林彪乘三叉戟仓皇出逃后，联合舰队的几个核心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每人带了两支手枪、一支冲锋枪和几口袋绝密文件，乘车跑到北京沙河空军机场，把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找来，说要执行紧急任务，命令他立即起飞。陈修文见来者都是空军司令部的大官，以为他们真要执行紧急任务，连外衣都顾不得穿，就爬上飞机起飞。起飞后，周宇驰拔出手枪指着他，命令飞往乌兰巴托。周宇驰已有40多岁，是空军司令部的办公室主任，权大位尊，吃得胖胖的。此人心狠手黑，空军很多人都怕他。陈修文虽然一点也不知道联合舰队的事，但听说飞往乌兰巴托，就知道他们要叛国，叛国的事绝对不干。陈修文在夜空中绕个圈子，把直升机开了回来。正好歼击机飞来迫降，周宇驰无奈，便命令陈修文降落。直升机降下来后，周宇驰一看机外景物，知道上了陈修文的当，当即连开数枪，打死陈修文，和于新野、李伟信逃下直升机。

周宇驰三人在荒地里逃了一段路，见民兵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知道逃不脱了，末日将临。周宇驰说："咱们今天是死定了，与其让人家捉去枪决，不

如自杀。我先把你们两个打死，我再自杀。”李伟信、于新野不同意，周宇驰说：“要不这样，咱们都自己把枪对着脑袋，我喊一二三，一齐开枪，怎么样?”李、于二人都同意了。周宇驰喊：“一、二、三!”三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满头是血，倒地身亡，李伟信却安然无恙。原来周宇驰数到“三”时，李伟信把枪举起，开了空枪。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到报告，知道直升机已经被迫降，正由卫戍区部队在处理中，便放心了。这时已经是9月13日凌晨4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被召到人民大会堂。李作鹏，吴法宪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坐立不安，邱会作什么也不知道。等了一会儿，周恩来进来了，严肃地说：“今日凌晨，我们党内出了一件大事。”他突然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往北跑了。”

朱德用拐杖直捣地，嘴里骂道：“这个三连连长，我早看出他是个奸臣。”黄、吴、李、邱脸色苍白，一声不吭，他们明白，下一步就轮到他们进监狱了。江青大嚷起来：“林彪一向镇压我，我要控诉。主席早在1966年就看出林彪要搞政变，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揭发他。我同林彪一直是在斗争，他镇压我呀!”

周恩来向政治局通报了林彪逃跑的消息后，又向全国各大军区、省委第一把手打招呼：“在庐山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孩子跑了。”打完电话，周恩来又下令全国军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现在让我们再来猜测一下林彪逃出国境后的情况吧：

三叉戟一飞出国境，机上顿时欢腾起来，平时面无表情的林彪也一反常态，把身子舒适地往背椅上一靠，高兴地说：“飞出来了，飞出来了。”叶群也高兴得手舞足蹈。林立果拿出一盒美国香烟，给自己和刘沛丰点上，有滋有味地品尝着这种进口香烟的滋味。

但就在这时，一个可怕的消息压下了人们的欢乐心情。天哪！飞机里只剩下不到三吨的油了，只够飞20分钟，无论如何飞不到乌兰巴托了。人们看看地面，黑漆漆的，根本看不清地面上的任何东西。现在只有迫降!

迫降？漆黑的夜空，陌生的地域，这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不过现在只能是死中求生。

飞机盘旋着向下降去。到最后一圈了，驾驶员一压手柄，飞机迅速下降。已经接近地面了，驾驶员猛地想起，副驾驶员没有上来，该由副驾驶打开的减速板和降低速度的反推力装置都没有打开，飞机以飞行的速度迫降，不是找死吗？但这时已为时过晚，机身一阵剧烈的震动，落地了！机舱外闪出一道亮亮的红光，这是飞机的腹部剧烈地同地面摩擦发出的光。林彪等人恐惧地看着窗外的红光，个个面无人色。突然，飞机向前一跃，机内的人被摔得七倒八歪。大火在舱内烧起来，林立果被烧得鬼哭狼嚎，林彪、叶群离火稍远点，但火舌也已经伸出舌头舔他们了。突然，飞机又猛往前一蹿，机体猛然碎裂，林彪等九人被甩出老远。

以上情节只是人们根据现场情况的猜测。

是夜，温都尔汗附近的一些居民看到草原深处一团大火升起，燃烧了一会

儿熄灭了，草原上又是一片沉寂和黑暗，他们立即向当局作了报告。失事现场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会温都尔汗西北 70 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蒙古有关部门于 9 月 13 日上午接到报告后，立即去现场勘查。原来温都尔汗就有一个简易机场，潘景寅在迫降前，如果稍微扩大一下盘旋直径，即可发现这个简易机场。蒙古有关部门人员在温都尔汗下飞机后，即乘汽车前往飞机失事现场。

失事现场苏布拉嘎盆地是一南北长 3000 多米，东西宽 400 多米的一个草原，地势开阔平坦，沙质土地上长着半人高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着陆的，飞机迫降的地点正好在盆地的中央。迫降时，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用飞机的肚子擦着草地着陆，飞机爬行过的 30 米长的草皮都被机腹擦光。飞机碎片散落在盆地里，隐约可见碎片上有“中国”、“民航”、“256”、五星红旗等字样和标记，一扇驾驶舱门上钉着的“旅客止步”的塑料牌完好无缺。飞机周围 800 米以内的茅草都被烧光，焦黑一片。机头以北 50 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八男一女。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他们的衣服全被烧光，个个赤身露体。在几具尸体旁边，发现了手枪。

蒙古有关部门人员勘察后，认定是中国军队飞机进入国境，因不明原因坠毁。蒙古国外交部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于 9 月 14 日上午 8 时紧急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通知了中国军队 256 号飞机坠毁一事，并声明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许文益向驻在国政府讲了一些外交话后回到大使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架干什么的飞机，但值此中苏边界冲突不久的紧张时期，本国一架有军人乘坐的大飞机突然进入蒙古境内，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搞不好，一场大战可能由此而起。现在最要紧的是向国内报告，可这时，蒙古国电讯部门偏又说线路不好，电报发不出，使馆又未及设立电台。许大使焦急万分，忽然想起 50 年代安装的热线——友谊电话线路来。这个线路是当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建立的，途经乌兰巴托，乌兰巴托也就装了这种专线电话。大使馆内就有一部这样的电话，许大使命令立即开封启用专线电话，并先去电信局打了个国际长途电话给外交部，叫他们马上打开专线电话，收听汇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正主持最高部务会议，紧急商讨林彪叛国后的外交上的对策。值班秘书突然推门进来，送来许大使的电话报告。姬鹏飞马上中断会议，到专线电话室听取许大使的汇报。姬鹏飞听完许大使的报告，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他马上打电话给西花厅，说有要事报告。可是周恩来一气忙了 50 多个小时，刚刚躺下，卫士们不愿意喊醒他。姬鹏飞严肃地对他们说：“立刻把总理叫醒，有特急报告呈送。误了事小心你们的脑袋。”卫士们无奈，只好把总理唤醒。外交部送报告的人已在门外等候，周恩来接过报告后一看，脸上立刻浮现了异常喜悦的神色，连声大喊：“备车，我去游泳池。”

毛泽东已经睡了，周恩来吩咐卫士马上把主席叫醒。卫士不敢，周恩来笑

着说："你赶快去叫，主席不但不会怪你，还要表扬呢。"卫士把毛泽东叫醒。毛泽东刚要发脾气，卫士说："总理叫我们推醒你的。"毛泽东"噢"了一声，洗洗脸，走出来。周恩来马上把报告递了过去："256 号飞机有下落了。"毛泽东一听，一把抓过电报来，飞快地溜了一眼，一拍桌子说："好！搞阴谋，搞分裂，是没有好下场的。"周恩来又把许大使断然启用专线电话，及时报回情况，姬鹏飞断然喊醒自己的事讲了一遍。毛泽东高兴得直夸："有觉悟，有决心，很好，应该通报表扬许大使和外交部。"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立即向外交部转达了毛泽东对外交部和许大使的表扬。许大使接到国内指示是 9 月 15 日，这天蒙古国政府准备了两架伊尔 18 飞机，让许大使等使馆人员和蒙古方面的外交、军事、新闻等方面的干部去温都尔汗勘察现场。蒙古方面的人很多，有 30 多人，中国大使馆去了六七人。飞机在温都尔汗的简易机场降落以后，他们又乘汽车去了现场。

现场上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情景，九具尸体七零八落地散落着。许大使逐个看去，只见第 5 号尸体个子瘦小，全身衣服烧光，受伤较重。此人颧骨较高，下巴较尖，秃头。这个脸形许大使似乎觉得很面熟，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8 号尸体是唯一的女性，她垂手仰卧，面部没有烧伤。把她翻过来，背上皮肤白皙，但有皱褶。许大使奇怪了，怎么这架飞机上配了这么老的空中小姐？2 号尸体受伤最重，面部烧成焦麻状，个子较高。在现场还发现 8 支手枪，1 支冲锋枪。蒙方人员还送来北京空军大院的一个出入证，上面的名字是林立果。

许大使不知林立果为何人。他也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这个飞机失事现场，就是林彪仓皇出逃的下场。那个似为熟悉的 5 号尸体，正是林彪。那位年老的空中小姐，正是叶群。那烧得最厉害的 2 号尸体，正是林立果。

许大使全然不知这些，只以为是一架飞机失事。他和使馆人员用莱卡相机拼命拍照，拍现场全景，拍飞机碎片，尤其注意拍尸体照片和他们生前用品的照片，足足拍了 7 个胶卷共 250 多张照片。蒙方人员并未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没有拍什么照片。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冷风吹来，发出阵阵尖啸声，蒙古士兵在远处的高坡上游动着。夕阳映照着凌乱不堪的失事现场，映照着 9 具肿胀狰狞的尸体，景象格外凄惨。蒙古方面的首席代表、外交部司长高陶布问许大使："尸体已搁置 3 天了，应该处理了，你们的意见是怎么办呢？"许大使说："国内的指示是火葬。"高陶布摇摇头说："这恐怕不行，我们蒙古没有火葬的风俗。再说，这个地方又没有木柴，怎么火葬？"许大使想想也是，便和高陶布商量土葬。高陶布说："死者不应埋在失事现场，应该给他们找一块风水好的地方。"他领着许大使来到失事现场外面的一个高坡上，指着这片较高的草地说："这里地势比较高，每天迎着升起的太阳，风水好，葬在这里很好。"许大使同意高陶布的意见，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

随来的蒙军上校立刻调了一队士兵前来挖坑。这时温度已降到零下 2 摄氏

度，这些蒙军士兵还穿着夏季单衣，冻得发抖。许大使叫人拿来几瓶二锅头酒。这是北京的老牌子名酒，劲大味香，蒙军士兵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酒，劲头立刻上来了，兴高采烈地挖起来。

当夜近 10 点墓坑挖好，许大使一行和蒙方人员又坐轿车回到温都尔汗的简易机场。这个简易机场真是简易之极，跑道是在草原上铺了一层红黏土轧出来的，机场上没有指挥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机场边上有几排平房，充做候机室、办公室。许大使等人和蒙方干部到市内的克鲁伦旅馆休息。在楼下餐厅用餐时，许大使见饭食粗糙，便拿出一些罐头和中国名酒汾酒酬谢蒙方人员的友好合作。有美酒罐头，饭桌上气氛活跃多了。许大使问："你们是怎么发现飞机失事的?"高陶布司长饮了口酒说："9 月 13 日凌晨两时半左右，失事现场附近的贝尔赫萤石矿值夜班的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声，随即发现东南方远处烧起一堆大火。按蒙古法律规定，任何人发现草场起火都要想法立即扑灭，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处罚，所以夜班工人立即唤醒矿上的工人一齐赶去扑火。当时火势很猛，透过火墙可以看到坠毁的飞机。工人们正扑着大火，牧民们也赶来一起把火扑灭。这时他们才发现 9 具尸体，立即报告了温都尔汗。省里立即调公安部队保护了现场。"许大使又问："工人们是否事先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是否看到飞机在空中着火?"高陶布摇摇头说："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夜航的飞机，飞机可能连夜航灯都没有开。你们一直说这架飞机是民航机，民航机夜航有不开夜航灯的吗?"许大使说："飞机上的中国民航 4 个字你都看见了嘛。不开夜航灯，肯定是驾驶员粗心大意。如果世界上的民航驾驶员都能按规定办事的话，不知可以减少多少因飞机失事而死去的冤魂。"说完，他又给高陶布倒满酒杯，浓郁的汾酒的香味立刻在房间里弥漫开来，高陶布拿起酒杯，舔嘴咂舌地品尝起来。

第二天，许大使一行和蒙古干部再乘车来到失事现场。他们又仔细地查勘了现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的尸体都没有穿鞋，也没有戴手表。他们又拍了许多照片，绘了图。

中午 12 时，开始入殓，蒙古方面已经拉来了 9 具白皮棺材，每个尸体跟前放一口。入殓是由蒙古士兵搞的，许大使等人在一旁监督，看着蒙古士兵把尸体装进棺材里。尸体已由许大使由北向南编成 1 至 9 号，1 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2 号尸体是林立果，3 号尸体是刘沛丰，4 号尸体是机械师邵起良，5 号尸体是林彪，6 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 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8 号尸体是叶群，9 号尸体是机长潘景寅。当然这些都是许大使以后才知道的，此时他只以为是失事遇难的民航同志。

尸体装殓已毕，9 口棺材由汽车拉到了墓地，蒙古士兵按编号把棺材放进墓坑。按蒙古的风俗，每具棺材上应覆以镶红边的长条黑布，现场上无法做，高陶布干脆下令先在 9 具棺材上横铺了一大幅红布，再铺上较小的一大幅黑布，使红布露出边，看来也就像铺了一大幅镶红边的黑布。这样一铺，墓坑顿时显得庄严

肃穆。许大使和高陶布执锨填了第一锨土，最后由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堆成一个大坟堆。按蒙古风俗，坟堆顶上应放一件死者生前喜欢的东西。现在他们是九人合冢，应当放一件他们共同喜欢的东西。当然最好是把有五星红旗标志的机尾放在这儿，可是机尾很高很重，汽车拉不动，最后就用汽车拉来飞机发动机的进气口环，压在坟顶上。许大使及使馆人员在坟前默哀，三鞠躬，葬礼仪式结束。

随后，许大使一行乘飞机离开了温都尔汗。秋风劲吹，草低云高，草原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蒙古包和一些平房。中午，飞机在乌兰巴托机场降落，许大使回到使馆刚洗了把脸，国内发来指示，命令使馆立即派人携带资料回来汇报。许大使当即让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带上报告、资料、照片回国报告。为了保证安全，许大使还安排中国建筑公司援蒙施工队的一位蒙族翻译同行。

孙一先从乌兰巴托登上国际列车，往北京进发。铁路两侧不时可以看到苏军的机场和军事基地，坦克、大炮和装甲车频繁地在公路上跑来跑去，车站上蒙军戒备森严。深夜，国际列车驶进中国的二连车站，车站内外，满是荷枪实弹戒备的中国军官和士兵。列车到达集宁时，只见车站上刚到一列军列，无数的坦克和重炮源源不断地从列车上开下来，机器的轰鸣声响成一片。许多部队喊着口令跑来跑去。孙一先困惑了，中蒙两国关系正在逐渐改善，为什么边界调来了这么多部队，气氛这么紧张？他百思不得其解。

孙一先到了北京车站，车站上已有外交部的官员在等他。车子把他送到外交部招待所。领导对他宣布了纪律，从现在开始，不许和任何人联系，也不许走出房间。孙一先奇怪了，一架失事飞机的事何以这么戒备森严？但这是纪律，他只有服从。

孙一先住的外交部招待所这套房子，布置相当豪华，是专供驻外大使回国述职住的。他在卫生间洗了个澡，有人把饭菜送来，相当丰盛。吃完饭，他看了一下材料，便在床上和衣躺下。他已经预感到，这架失事的飞机不一般，不能掉以轻心。

孙一先刚躺了会儿，突然有人敲门，孙一先打开门，来者是一个戴白边眼镜、短发齐耳的青年妇女。她以不容分辩的口吻说："我是王海容。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孙一先没有见过王海容，但知道她是外交部司长，通天人物，赶紧随她走出门来。

孙一先随王海容从北面的大门进了人民大会堂。在登上台阶时，两名值班的哨兵一下子过来把他挡住，经王海容解释，才放他过去。进了人民大会堂，孙一先被领到福建厅外，王海容让他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孙一先趁这个机会整理一下照片，心里想道，向谁汇报呢？既然汇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听汇报的人就不止是外交部长了。那么，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总参的黄永胜啊？

王海容很快从福建厅出来，伸手一指福建厅说："请吧！"孙一先推开福建厅的门，一下子看到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背影，是周总理！孙一先既高兴又惊惧，周总理来听汇报，可见这架256号飞机定有名堂，绝非一般飞机。周恩来

转过来，看到孙一先，忙站起身来同他握手："回来了？好，请坐。"他指着旁边的一位军人说："这是杨德中同志。"孙一先连忙向总理和杨德中问了好，按着周恩来的指示，坐在周恩来身旁。周围的椅子上还坐着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

汇报之前，周恩来先问孙一先："不是还有一个一起回来的翻译吗？哪去了？"孙一先回答说："他回家了。"周恩来严厉地问符浩："谁让回家的？"符浩回答说："我。"周恩来生气地说："你也是当兵的出身，怎么办事这么马虎，立即把他找回来。"符浩答应一声，立即打电话布置去了。周恩来生气地说："滑稽，真是滑稽。"

孙一先开始汇报。他介绍了个人的简历，汇报了去温都尔汗飞机失事现场处理现场的经过和蒙古方面的态度。说着，他拿出他在现场画的地图，具体说明温都尔汗的具体位置。大家围了过来，周恩来用右手指指着地图上的山海关，再往温都尔汗一划，点点头。孙一先顿时明白，飞机是从山海关起飞的，是叛逃，不是迷航。

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多了，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分管空军的李德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走了进来。周恩来说："你继续汇报吧。"孙一先又拿出一张现场图来，讲解着飞机坠毁的情况和9具尸体的位置。孙一先发现，周恩来疲累之极，坐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吴法宪神态异常，面色苍白，呆若木鸡，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

孙一先讲到了失事飞机的机翼根部有个大洞，怀疑是导弹打的。周恩来一听马上来了精神，嘱咐杨德中："这个要好好研究。"孙一先又拿出洗印好的照片，周恩来拿过去，一张一张细看，对尸体的照片看得尤为仔细，特别注意5号尸体的照片和8号尸体的照片，反复看了好几遍才放下来，脸上露出庆幸宽慰的表情。

汇报结束后，孙一先又回到招待所。他已预感到，256号飞机失事是非同一般的航空事故，是一件大事。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敢问，也没有人给他讲。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派人把他接来，一起坐车去西郊机场。机场办公大楼里灯火通明，一位空军副参谋长和西郊机场政委正在大楼里等着他们。杨德中进来后，放下皮包说："现在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飞机失事原因吧。"空军副参谋长说："是，我先来汇报一下分析结果。"他拉开一个帷幕，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飞机失事现场的一个沙盘，一架三叉戟飞机模型放在沙盘上。副参谋长说："256号飞机于9月12日在山海关机场起飞时，油未加满，机上只有10吨油。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需飞行半小时，用油有限，但起飞用油较多，共耗油3吨。在山海关机场刚加了一点油，飞机就强行起飞，这时，机上也就是有10吨多油。从山海关机场到蒙古温都尔汗的空中距离是1100公里，出境前飞机在内蒙上空绕了一个大圈子，共飞行两个钟头，耗油9吨多。这样，256号飞机到温都尔汗时，只剩下一至两吨油，被迫紧急降落。

迫降场地势开阔平坦，较为理想。飞机失事的主要原因是迫降动作没有做全，速度过快，机腹和右翼尖同时着地。三叉戟飞机的主要油箱在机腹，机腹剧烈摩擦草地，油箱升温着火。右翼尖触碰地面后，飞机受到震动飘了起来，在空中翻了个身，油箱爆炸，机体受震，飞机破碎，人被甩了出来，可能还没有死。如果不是草地起火，他们还可能会生还。但是现场都是半人高的草，飞机坠毁形成大火，机上9人终被烧死。”

杨德中问：“机翼根部的那个大洞是怎么回事？”副参谋长说：“我们去看看飞机吧。”

在停机坪上，一字排着十几架飞机，上面盖着苫布，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周围持枪警戒。副参谋长让打开一架252号三叉戟飞机的苫布，机舱已经打了铅封，不能进去了，飞机周围摆着拒马。杨德中来到机翼跟前一看就明白了，原来那个洞并不是什么导弹打的洞，而是一个检查孔。

飞机失事的原因弄清楚后，孙一先又被送回招待所，那位蒙族翻译已被送来招待所了。翻译直埋怨孙一先，跟他回国倒了霉。孙一先哭笑不得，也不知何日解除隔离。

杨德中从西郊机场回来，向周恩来汇报了飞机失事原因的分析结论，周恩来感到很满意，又叮嘱杨德中说：“中央决定逮捕黄、吴、李、邱，你要和东兴同志布置好力量。”杨德中答应道：“是！”

10月2日，中央办公厅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林彪出逃以后，黄、吴、李、邱终日绕室彷徨，深感大难临头。吴法宪几次想跳楼，又下不了决心。李作鹏经常晚上做噩梦，醒来大哭大叫。但半个月下来，中央并未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也明白，中央正在处理林彪事件，还顾不上他们。近日，他们常被召去开会，讨论军事方面的部署，所以对于今日去开会，四人也没有往深里想。

这时，政治局会议开始了，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隔离审查，黄、吴、李、邱已被逮捕。主席指示，解散军委办事组，军委日常工作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处理日常工作，办公会议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成员有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的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组成。中央决定，逐级传达中央文件，公布林彪事件。现在先在副部级、副省级传达。”大家对主席的决定自然是拥护。

这时，秘书走来说：“总理，有个电话。”周恩来走出来问秘书说：“谁来的电话？”秘书说：“医院。经切片检查，陈毅同志的癌细胞转移了，很危险。”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叹口气说：“一个好同志啊，就这么被林彪快整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六回 批林彪周恩来握政柄 悼陈毅毛泽东念忠良

话说1971年10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部署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有关事宜，忽然接到陈毅元帅癌症加重的报告，他指示部队301医院加紧治疗，心里却明白陈毅将不久于人世了。想到这里，周恩来不禁悲愤交加，陈毅的病完全是林彪、江青这些家伙害的呀。

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外交部开始逐级传达中共中央1971年第57号文件。首先，部里召集了司局级以上干部会议，由韩念龙传达中央文件，孙一先也被通知参加会议。一进礼堂，孙一先顿时感到气氛异常严肃，完全不同以往的此类会议。人员到齐后，首先由部办公厅宣布纪律，任何人都不得泄露中央文件的只言片语，泄露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党籍。宣布了纪律之后，开始传达文件，韩念龙弹弹麦克风，开始念起来："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蒙古、苏联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拦。中央政治局遂命令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孙一先听完这段传达，似有一盆冰水从头浇下来，浑身冰凉。瞬间，他的思维凝固了。过了会儿，他看看其他人，除了主席台上坐着的那几位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外，主席台下的人都是一副大惊失色的表情：副统帅叛国投敌，这还了得！"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毛主席好不容易挑选了这么个好接班人，这个接班人突然坐飞机叛国了，"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看起来毛主席也不是能预见一切的神嘛，起码，选林彪当接班人就犯了大错误。这些话，虽然人们没有讲出来，但孙一先却从人们的表情上意识到了这点，他不禁

想起了温都尔汗荒原上的9具尸体，想起了自己和许大使在叛国犯坟前致哀、鞠躬的情景来，不由得感到好笑。

孙一先回到办公厅，王海容笑问道："现在你明白了吧?"孙一先沮丧地坐下说："把我打死也不敢想到是林彪的飞机摔下来了。"王海容说："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孙一先从外交部出来，走在前门大街上，心里翻江倒海，思绪万千。过了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又下发了文件，附发了查抄出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毛泽东1966年6月写给江青的信，这封信就是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的那封信。这封信批评了林彪半个多月前的那次说政变的讲话。事过数年，现在才公开，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主席早就察觉了林彪是坏人。但老百姓马上提出了疑问，既然早就发现林彪是坏人，为什么还选他为接班人呢？后来中央又发了文件，对此作了解释，但终不能令人信服，反给人以文过饰非之感，民间舆论大哗，"文革"激情急剧冷却。

对民间的这种舆论反映，毛泽东一清二楚。后悔自己在林彪问题上栽了大跟斗。一气一急一悔，毛泽东忽然中风病倒，遂把政事委托周恩来去抓，自己专心养病。

周恩来受委托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后，逐步设法把一批老干部从监护中释放出来，安排了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准备邀请一些红军时期的元老开个座谈会，揭发林彪在历史上的反动言行。他特意叮嘱要请陈毅参加，因为陈毅从南昌起义时起，就是林彪的上级，熟知林彪在历史上的那些丑事。

陈毅早在9月20日就得到中共中央通知，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他听了通知，马上让人拿来酒杯，要饮酒庆贺，他的夫人张茜劝他："你刚刚做完手术，怎么能喝酒呢?"陈毅夺过酒杯说："就一杯，我终于活着看到了林彪垮台。林彪不死，天理不容。来，干杯!"喝完酒，他把白居易的《放言五首》找了出来，让张茜用复写纸全部抄下来。《放言五首》中的第三首是：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张茜明白，白居易的这首诗是借历史的两个人物来对比说明识别忠良与奸邪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人们或为流言所惑，误认忠良有二心；或为奸臣所蒙蔽，误认奸臣为忠良。周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王朝西周时的人，是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伐纣，攻下朝歌，灭商开周，都镐京（长安附近），史称西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后，未几死去，临终前把儿子成王托付给弟弟姬旦。姬旦又号周公，受哥哥之命辅佐侄儿，昼夜辛劳。正在吃饭时，忽有

公文或大臣来访，周公便立即吐掉嘴里的饭，来办公事，有时如此者再。正在洗澡时，忽有公文或大臣来访，周公便立即抓着湿漉漉的头发跑出来办公事，有时如此者再。周公的作风极像周恩来总理。当时武王的另外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不服气周公，制造流言，诬称周公将代成王自立。成王疑惧，质问周公。周公为流言所伤，深感恐惧，辞职归家。管叔、蔡叔、霍叔乘机勾结殷商顽民发动叛乱，成王这才知道周公的忠诚，重新起用他荡平叛乱，杀死叛乱诸叔及殷顽首领武庚。故历史上对周公评价很高，“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正是这一评价的真实写照。

和周公适成比照的是王莽。王莽是西汉末年人，为皇室外戚。西汉末年，吏治腐败，王莽身为外戚，位尊权重，但他一点也不搞特殊化，严格要求自己，儿子犯了小罪，侵犯了百姓利益，被他亲自下令处死，故王莽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轻而易举地代汉自立，建立新朝。在位数年，乱改朝政，民穷国乏，民间不堪其扰，终于爆发起义，王莽最后兵败被杀。

可见，要认清一个人的本质是很不容易的。

陈毅让张茜抄录白居易这首诗，述说了自己对林彪的仇恨和愤怒，也是提醒人们，斗争还没有结束。“周公恐惧流言日”中的周公，有双重的含义，自抗日战争周恩来驻重庆时起，他便有了“周公”这个美称。陈毅是用这首诗提醒周恩来，有人还要对他下手。

诗抄好后，陈毅让张茜寄给在外地的孩子们，没想到他们的朋友们又把这首诗抄传回去，这首诗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周恩来也知道了，连连称好，同时也更加明白了陈毅的悲愤心情。林彪是垮台了，可是他们一手干出的罪恶却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贺龙已于 1969 年被迫害致死，彭德怀还在牢中，罗瑞卿摔断了腿，而现在，死神又向陈毅逼近。

陈毅是在石家庄蹲点时发现有病的。1969 年 10 月，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老干部们都被赶出北京，陈毅被下放到石家庄蹲点调查。这时他就感到腹部经常疼痛，但得不到认真的诊治。当时陈毅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诉说病状，要求回北京治疗。周恩来当即批准他回京治病，这时已经是 1970 年的冬天了。

周恩来把陈毅安排在 301 医院治疗。这个医院的正式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地处北京西郊，交通方便，地铁从门前经过。医院科室齐全，设备精良，医生都是抽调的全军最好的医生。301 医院除为部队服务外，也为地方高级干部服务。院内专门在一角设有六层高干病房大楼，独门独院，戒备森严。有资格住在这些带套间的豪华病房的，至少是省部军级以上的干部。陈毅来时，高干病房已为他准备了房间。不巧的是黄永胜当时在庐山上败阵下来后，因心情不好，也住进了高干病房，一个人就占了 5 个单元的病房。他明知陈毅有病，却故意对医院领导发脾气说：“他要来，我就走。”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陈毅是元帅，是军委副主席，但不能过问军委的工作，连政治局委员也不是。黄永胜是上将，但在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是军委办事组组长，直接管着军

委的日常工作。医院领导怎么会因为陈毅而得罪黄永胜呢？过了段时间，黄永胜出院了，陈毅才住了进来。

住是住进来了，医院有关领导对医生交代了一番就走了。医生给点药，量量血压。直到1971年7月，陈毅疼痛难忍，医院才准备给动手术，但又不请医生会诊，也不作全面检查，随便诊断一下，就说是阑尾炎。结果陈毅的腹腔打开后，医生们大吃一惊，陈毅的阑尾好好的，而在靠近肝区长了结肠癌瘤，医院慌忙将阑尾手术方案转为结肠癌手术方案。

周恩来对陈毅的病情很关心，特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参加手术，实际上是监督手术过程。保健医生发现诊断有误，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十分恼火，叫来医院负责人，在电话里问他："你们怎么搞的？为什么把陈毅的病诊断错了？阑尾炎和结肠癌很容易区别开来嘛。"医院负责人自恃有林彪和中央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的支持，对周恩来的责问应付了几句。放下电话，这位医院负责人立即赶到邱会作家里向他汇报。邱会作是总后勤部部长，直接管着301医院。他听了医院的报告，冷笑两声说："陈毅手术发现癌是好事，他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吗？"

周恩来知道301医院不会给陈毅认真治病，想着让陈毅转院，往哪里转呢？突然，他想起了归国华侨、著名镭放射专家吴桓兴，便立即拨通吴桓兴的电话："您是吴桓兴院长吗？我是周恩来呀，陈老总得了结肠癌，已经在301医院动了手术，我想让陈老总转到你的医院治疗，你看行吗？"吴桓兴院长说："行啊，行啊！我们的医院小，条件差些，但我会努力给陈老总治病。"

周恩来立即下令，要301医院把陈毅的病历转给吴桓兴院长。吴桓兴拿到病历仔细阅读起来。看完病历，他惊讶得差点叫起来，没想到301医院对陈毅的病是这么草率，病历上，没有一页专家会诊记录，连必要的一些病理检查也没有做，怪不得周总理要把陈老总转到这里。

陈老总坐着车来了，吴桓兴为他做了全面检查，仔细地制订了医疗方案，亲自动手为他治病。几个疗程下来，陈毅的病情大有好转，这时已是五一节了。

1971年五一节之夜，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这正是林彪准备政变之时。毛泽东坐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着广场上欢乐的人群，心里却还想着庐山的事情，神情不太愉快。这时，林彪也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本来应该早来的，却一直没有来。这会儿来了也是神情尴尬。毛泽东也没有理他，只和西哈努克亲王说话。林彪坐了一会儿，也不向毛泽东打招呼，抬起屁股走了，毛泽东沉着脸看也没有看他。

林彪走了不一会儿，周恩来扶着一位老军人走过来了，老远就向毛泽东打招呼："主席，你看谁来了？"毛泽东一看，原来是陈毅。陈毅走过来行了个军礼："主席，您好！"毛泽东站起来，伸出手与陈毅握手，关切地问道："陈老总，病怎么样了？好了没有？"陈毅笑着说："好了，好了。"毛泽东宽慰地笑笑："那就好，那就好。"在这个五一节之夜，毛泽东对陈毅格外关心，在和林

彪即将进行决死搏斗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感到了这几位老帅的可爱。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北京吧。.

陈毅接到参加老同志揭发林彪的座谈会的通知后，欣喜异常，准备发言提纲，他要把历史上的林彪的真面目揭出来，让人们看清林彪的本质。

金秋十月，北京城没有往日国庆后的喜庆气氛。由于林彪叛逃，中央取消了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本着内紧外松的方针，全国处于一级战备的紧张气氛中。陈毅的车驶进中南海，即发现一队队的士兵全副武装地在树底下警戒待命。老同志座谈会开始了，陈毅第一个发言，他从南昌起义讲起，揭露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人们这才发现，林彪在历史上也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哩。陈毅的发言一下子把人们带回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中去……

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参加了南昌起义，被编在陈毅的这个团里，任特务连连长。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汕头失败后，周恩来病重去了香港，剩下的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到了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1928 年又由朱德率领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部队整编成红四军，毛泽东任前敌书记，陈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林彪仍任连长。后来林彪的军事才能被毛泽东发现，逐渐升为营长、主力团 28 团团长。1929 年初，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进军闽西、赣南，战斗频繁。这时已升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疑问，照这样干法，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主张把部队拉去打城市，打下城市有吃有喝。毛泽东当即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流寇主义，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长征中，林彪也产生过动摇思想。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林彪大喊大叫，说这样走来走去把部队都拖垮了。他给彭德怀写信，叫彭德怀出来领导，当即被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知道后把林彪叫去批评了一顿："你是个娃娃，懂什么，多走路是必要的。"果然，红军四渡赤水，佯逼贵阳，调动云南龙云部队驰援贵阳。红军锋头一转，趁云南空虚直插金沙江，强渡金沙江，把百万追兵扔在河对岸，跳出了重围。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下不了决心先打锦州，战役胜利后又下不了决心迅即挥师入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该由他率十三兵团出国作战，但林彪称病不出。

老同志对陈毅揭发的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经陈毅这么一讲，才明白林彪在过去和毛泽东也较过劲，并不是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听着陈毅的发言，有些人也想到了 1959 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军队中排斥异己，培植亲信，破坏军队训练等许多错误来，准备等陈毅发言后接着揭发批判。

陈毅激动地讲着："这个特务连连长，把总司令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说成是他率部队与毛主席会师，把朱德的扁担说成是他的扁担，简直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

讲到这里，陈毅的鼻子里忽然流出一股鲜血，大家立即喊医生，要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一检查，癌细胞已扩散了，医院再次做了手术，但已无济于事。到了11月2日，陈毅突然呕吐不已，以后就基本上不能吃东西了。

听说陈毅病危，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医院探望。叶剑英去探视时，陈毅望着他，似有很多话说，但又没力气说出来。叶剑英俯下身子细听，才听见陈毅断断续续地说着“党中央”、“红军”、“一直向前”、“战胜敌人”。叶剑英明白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捏紧拳头，对陈毅说：“我们永远是党中央领导的红军，一直向前，战胜敌人。”陈毅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1972年1月6日，陈毅停止了呼吸。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朱德、刘伯承、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华国锋、吴德、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名流到医院向陈毅遗体告别。

陈毅的丧仪报告很快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丧仪的规格很低，因为陈毅现在只是中央委员，丧仪由军委主持，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周恩来看着这份报告，愤愤不平地想道，陈老总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他的丧仪却是这么简单，太不像话了。但是，他除了叹气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在报告上批了几句话以后转送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受林彪事件的打击，前几天休克一次，经过抢救，现在好些了，这会儿正躺在病床上，听秘书张玉凤念文件。念着念着，张玉凤念到了关于陈毅丧仪的报告。毛泽东打断张玉凤，急问：“怎么，胖子去世了？”张玉凤点点头说：“是的，前天去世的。这是悼词。”毛泽东拿过悼词，细心地读起来，读完后把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不满地说：“追悼会也不是谈‘过’的时候嘛，什么‘有功有过’的。”

看完悼词，毛泽东又拿过报告，报告写明，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毛泽东放下报告，嘴里还念叨着“有功有过，有过有功。”他忽然吩咐张玉凤：“调车，我要去参加胖子的追悼会。”张玉凤大惊：“主席，这么冷的天——”毛泽东挥挥手：“快调车！”张玉凤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忙出去通知调车，又让人给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她不敢在外耽搁，赶快回来给毛泽东换衣服。

毛泽东在家里不论睡觉办公，都穿一件宽大的睡袍，里面穿着薄毛裤。张玉凤取来制服，要给他换上，毛泽东说：“不用换了。套在睡袍上面就行了。”张玉凤给他穿好制服，还要穿制服裤，毛泽东不耐烦地说：“不用了，你给我披上大衣。”

毛泽东就这样穿着大衣，大衣下露着毛裤，戴上帽子，匆匆忙忙地上车走了。他走得这么急，是怕赶不上追悼会的时间。

八宝山公墓礼堂冷冷清清，没有领导，没有工作人员。只有张茜领着孩子们在等待开会。毛泽东到了公墓，没有人出来迎接。毛泽东边下车边吩咐秘书：

“看张茜来了没有？来了请她过来。”

张茜正在休息室休息，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一听说毛泽东请她，吓了一跳，赶快随秘书过来，果然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张茜紧走几步问候道：“主席，您怎么来了？”毛泽东由张玉凤扶着站起来，握住张茜的手，不禁潸然泪下，几年前那位漂亮的外长夫人哪里去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容憔悴，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张茜替陈毅道歉道：“陈毅年轻时不太懂事，做过一些错事。”毛泽东打断她的话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陈毅是个好同志，他有意见就当面说。”

接着，毛泽东对陈毅的四个孩子问了几句话。没说几句，只见一队战士跑进来迅速布好警戒，汪东兴从一辆卧车里跳下来，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来迟了。”话音未完，周恩来坐着汽车到了。接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负责人、国家领导人、国务院领导人、解放军各部门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坐车来到。公墓广场上，轿车如海，公墓礼堂里，大员如云。

毛泽东还在同张茜和孩子们谈话，周恩来在旁边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大贡献，立了大功劳，这已经作了结论。”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又似有意无意地说：“邓小平的问题跟别的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还是要保的。”

陈毅的追悼会开始了，礼堂里站满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站在最前边，向覆盖着党旗的陈毅的骨灰盒三鞠躬。

周恩来致悼词，他看看礼堂里黑压压的国家、党、军队的领导人，心里在说：陈毅同志，你放心地走吧，毛主席亲自来参加你的追悼会了，你安息吧。

追悼会完了，毛泽东坐车走了，周恩来把陈毅的四个子女叫到一个房子里，问他们：“你们听见主席对陈毅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了吗？”四个子女点点头说：“听见了！”周恩来说：“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大家都要很好地学习，对不对？”四个子女点点头说：“对！”周恩来说：“你们要节哀，要继承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

周恩来坐车走了，陈毅的四个子女却思索起来，总理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七回　尼克松初进中南海　乔冠华再战钓鱼台

话说陈毅元帅饱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气，致成肠癌，不治辞世。毛泽东闻讯，硬撑病体前去八宝山公墓悼念。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去八宝山了，心中一喜，连忙通知在京的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党、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赶赴八宝山，出席陈毅元帅的追悼会。

追悼会前，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陈毅夫人张茜谈话，谈到邓小平属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听后心中又是一喜，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句最高指示传播出去，促成邓小平再次出山。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以后，刚轻咳几声，电话铃响了起来。周恩来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章文晋从杭州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打的时间很长，周恩来听着先是惊诧，继而气愤，最后脸色铁青地对章文晋说："你们不要走开，我马上向主席请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把周恩来气成这样呢？原来基辛格上年7月访华以后，中美双方达成协议，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7月15日，中美同时发表公报，向世界公布这件事，顿时成为世界爆炸性新闻，其轰动效应不亚于一支外星人队伍降临地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七一五"公报发表后的瞬间，全世界所有的电波几乎都在传送着这条消息，全世界所有的政府官员、记者、外交官都在读着这条消息，所有的情报机构都发出指令要求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可是不久，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一份份情报摆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办公桌上：9月13日，一架军人乘坐的三叉戟中国民航机"误入"蒙古境内，在温都尔汗坠毁。紧接着，中国政府下达封航令，3天之内，中国没有一架飞机起降。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军队已进入一级战备。中国领导人已有一个星期没有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庆祝国庆节的彩排停止，所有林彪的题词及赞颂林彪的标语一夜之间从所有的大街上消失了。

尼克松、基辛格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些情报，猜到中国内部肯定出了大事，他最担心的是这是否会影响已经开始了的中美接近。如果中美接近由此中断，那么尼克松将在政治上受到莫大的损失，在十几个月之后的大选中能否连任大成问题。如果中美接近的进程如期实现，那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事实很快证明，中国人是守信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久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黄华那里得到确实消息，中国政府要继续为改善中美关系而作出努力，邀请

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决定不变。尼克松、基辛格听到中国政府的这个保证，才托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不久，周恩来总理再次邀请基辛格博士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准备。准备工作除了安全、通信、宣传、日程等方面的安排以外，主要是准备会谈公报，公报必须在尼克松访华前写好。公报中要谈的问题很多，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周恩来坚持要基辛格写上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基辛格当然早就和尼克松总统达成共识，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必须要考虑到尼克松总统的处境。多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把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当做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现在一下子要把国民党抛掉；这个弯子拐得太大，搞不好要翻车的，但弯子必须要拐。周恩来坦率，但一摆出原则就不容对方讨价还价。基辛格想来想去，想找一个办法，既符合周恩来的要求，也让国内那些保守派、国外的政治家、台湾的国民党人都能接受。

这位哈佛教授果然点子多。他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府说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说只有一个中国，大肆镇压“台独”分子，我为何不利用这一点呢？于是他向周恩来提出：“关于台湾问题，我国政府的立场可以这样写，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周恩来听了点点头说：“博士到底是博士。”

基辛格完成了联合公报的准备工作，结束了在中国的几天访问，于10月26日回美国了。尼克松总统得知联合公报的基本内容都已谈妥，便决定再派黑格将军率团来华，为总统访问作具体安排。中国政府也紧张地作一系列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他每天听取熊向晖等人的汇报，发出指示，西花厅的灯彻夜亮着。周恩来把秘书们的“造反”建议早扔到脑后了，但是，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文化大革命”使他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周恩来明显地老了，每天靠吃药维持着工作精力。

这个时期让周恩来操心的还有一件事，说起来也是一件大喜事。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于10月否决了美国和日本政府提出的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得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又保留蒋介石集团代表权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2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提案。10月25日晚上，提案通过后，联合国大会一片欢腾。消息传来，一个问题即摆在中国政府面前，要不要组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外交部已经习惯于多年来把联合国大会看成是资产阶级讲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表决机器，决定不去。他们给毛泽东的报告还没有写好，毛泽东的电话已经打到人民大会堂了。周恩来接过电话，只听毛泽东说道：“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毛泽东催着马上就组团去，并且指定“乔老爷”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乔老爷”本名乔冠华，抗战时期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和中共代表团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1951 年曾和伍修权将军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伍修权在联大发言，痛斥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在世界引起震动，号称“伍修权大闹联合国”。现在乔冠华担任外交部部长。

乔冠华为什么又叫做乔老爷呢？原来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国内一家电影厂拍了一部故事片《乔老爷上轿》，描写了一个姓乔的秀才路见不平，救助弱女的故事，整个故事阴差阳错，引人发笑。一时间，许多姓乔的人都被朋友们戏称为乔老爷，乔冠华被戏称为乔老爷，也是由此而来。

乔冠华受命组团，和黄华副团长率代表团飞赴美国纽约，11 月 15 日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就座时，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我作为大会主席，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接着 57 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词，乔冠华和黄华在席位上开怀大笑，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外交官的信心。最后乔冠华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讲话，感谢朋友们的支持。他讲完话后，又有许多国家的代表走过来表示祝贺，会议气氛之热烈，为联大有史以来所少见。

与此同时，被赶出联大的台湾国民党代表悄悄地提着行李，黯然神伤地回去了。

周恩来始终注意着中国代表团在联大的活动。新华社送来了内参和图片，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乔冠华和黄华在联大中国席位上笑得前仰后合的情景，周恩来看着也笑了。指令把这张照片和其他一些图片由新华社发给全国各级宣传部门张贴宣传。年底，乔冠华和熊向晖回到国内，周恩来马上又交给了他们一项任务，乔冠华负责中美联合公报的最后谈判工作，熊向晖负责接待即将来华的黑格将军，具体安排尼克松访华的有关事项。

问题就出在黑格将军来华后的行程安排上。黑格将军叫亚历山大·黑格，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周恩来估计随尼克松来的美国人不会少于 50 人。基辛格告诉他，不是 50 人，而是 700 人。周恩来倒着实吃了一惊，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些人中有官员、保卫人员和记者，到底是超级大国的总统，出行也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这要是到了一个小国，还确实一下子找不到这么多房子供 700 人住。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方面自然不成问题，但是怎么住，怎么走，得具体安排。

1972 年 1 月 3 日，也就是在陈毅元帅逝世前 3 天，黑格带着 18 个人的先遣小组来华。到京后，周恩来指示熊向晖把总，召集公安部、广播事业管理局、外交部、邮电部、中国民航总局的有关负责人与黑格将军带来的人分口谈判，进行安排。1 月 6 日，周恩来又与黑格进行谈判，安排好了有关事项。

1月7日，黑格按着安排好的尼克松总统的行程，起身到尼克松总统将要去的上海、杭州实地考察。黑格到上海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靠打砸抢起家的王洪文躲着不见，由副主任徐景贤出面接待。宴会上，徐景贤起立祝酒，黑格不知道按东方人的习惯，他应该致答词，一来黑格想着打前站的事，二来他觉得自己是为总统打前站的，也没有想到这是欢迎他的正式宴会，也就想不起来致答词。这只是黑格的一个小疏忽，事后侧面向他提醒就可以了。孰料上海这一帮造反派头头胡闹惯了，完全不把中央的大事放在心上，竟然大整起黑格来了。第二天黑格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他们把黑格叫出来提抗议。黑格到底是美国客人，他们不好过分放肆。要是换了别人，这帮人的造反派脾气早上来了，不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才怪呢。

黑格离开上海，又到了杭州。尼克松将游西湖，黑格先游一趟试试。正是三九天气，杭州虽是南方，然而湖面上冷风吹来，也让人有些受不了。杭州方面已得到上海整黑格的通知，游船里什么都没有放，只有清茶一杯。黑格一心想着完成任务，对中国的怠慢不去计较。北京外交部来的带队的章文晋眼见黑格受此冷遇，恐怕出问题，用电话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章文晋的电话后，立即驱车来到游泳池，向毛泽东报告了上海、杭州整黑格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生气，告诉周恩来："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的话，他们整黑格是不顾中美关系大局，对抗中央方针，必须写出检讨。杭州要补课，黑格途经上海时要加温，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10斤糖。"

周恩来从游泳池出来，立即打电话到杭州，把杭州的领导人严厉批评一通，指示他们马上对黑格加温。杭州、上海的领导人接到电话通知，得知主席动怒，个个吓得屁滚尿流，杭州立即举办盛大宴会宴请黑格。黑格第二天飞经上海机场停留时，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跑到机场，在候机楼举行盛宴招待黑格，排着队逐个向黑格劝酒，气氛至为热烈。临上飞机时，黑格等每人都得到了10斤重的一盒糖果，糖盒做得十分精致漂亮，缎面闪闪发光。黑格完全给弄糊涂了，上海这帮人何以前倨而后恭。他当然不知道是毛泽东下了命令，所以只能长叹一声：神秘的东方啊！

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全力以赴地准备迎接尼克松总统了。这天他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检查乐团排练情况。根据计划，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要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尼克松总统，宴会时要演奏宴乐。演奏任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担任，演奏的曲目有中国的歌曲，也有美国的歌曲。美国的歌曲是《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堆里的火鸡》，这两首曲子在美国很流行。当时挑选这两支曲子时，尽管遭到江青和她的亲信、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和副部长刘庆棠的反对，但几经讨论，还是定下来了。

周恩来来到东大厅，观看了乐团的排练，只见队伍整齐，军容威严，吹奏熟练，乐曲十分动人。这些乐团演奏员从"文革"以来，每天吹奏的就是那么几个曲子，猛一吹奏轻松愉快，并有异国风味的美国歌曲，都有一种新鲜感，

因此吹奏时表情十分丰富，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一曲终了，周恩来上前勉励大家："同志们辛苦了，大家吹得十分动听，使我忍不住听了一阵。这两支曲子是尼克松总统就职时他亲自挑选的两支曲子，你们是用自己的管乐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服务。"乐团演奏员听了总理的表扬，个个眉飞色舞，指挥银棒一挥，大家又认真地演奏起来。

周恩来检查了各部门准备情况，都已诸事妥当，各就各位。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着尼克松总统从大洋彼岸飞来了。

1972 年 2 月 17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的草坪上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然后神态庄严地登上直升机去机场。总统座机"空军一号"早已作好起飞准备，尼克松登上飞机后，一声令下，座机拔地而起，向东方飞来。尼克松坐在飞机上，俯视着机翼下的万顷云涛，思绪万千。他看了许多北京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影资料，也熟知北京欢迎外国元首时倾城而出，夹道欢迎，张灯结彩的盛况，他想象着自己到北京后受到十里大街夹道欢迎的情景，心中十分得意。

空中小姐送来了午餐和饮料，不同以往的是既给客人送来刀叉，又分给每人一双筷子。尼克松熟练地拿起筷子，随心所欲地用筷子夹着肉块。空中小姐吃惊地看着，天哪，总统竟会使用这两根魔棍夹东西吃。尼克松看空中小姐惊诧的表情，更得意了，用筷子夹来夹去，尽情地表演了一番这套杂技。空中小姐们不知道，尼克松为了访华，已经偷偷地苦练半年筷子功了。

经过长途飞行，尼克松的座机飞到了南苑机场。尼克松走出舱门，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机场上没有姑娘，没有鲜花，也没有红地毯。一面美国国旗，一面中国国旗并排在旗杆上空飘扬，倒是那由 300 多人组成的仪仗队令人心头振奋。

欢迎是低调的，但又合乎礼仪，特别使尼克松兴奋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他出舱门前，已在舷梯下等着。天气阴冷，刮着风，周恩来却没有戴帽子，表示了主人对客人的真诚欢迎。

尼克松走出舱门，马上有一名随机而来的保卫人员站在舱门口，把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挡住。尼克松早就想好了，他要一个人先走下飞机与周恩来握手，以便记者的镜头全集中在他和周恩来的身上，让全世界都知道，尼克松纠正了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不与周恩来握手的错误。

尼克松一走出舱门，周恩来就鼓起掌来，还有几级舷梯时，周恩来和尼克松同时伸出了手，尼克松紧走几步走下舷梯，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相摇晃着，足足有一分钟。周恩来感慨地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阔的海来和我握手，已经是25 年没有交往了啊！"尼克松说："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当我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和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仪仗队指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员身材高大，穿着呢子礼服，军容威严，向尼克松行注目礼。随后是分列式，动作整齐划一，姿势威严大方，步

伐铿锵有力，军人们举着带刺刀的步枪，从检阅台前正步走过。尼克松觉得这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为出色的仪仗队。他从这支小部队身上，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的车队驶往钓鱼台，所经大街没有彩旗，没有欢迎的人群。相反，整个大街空荡荡，行人稀少，车辆停驶，一路绿灯。尼克松心里颇为失望。

其实，尼克松大可不必介意。当华盛顿还悬挂着国民党“大使馆”的青天白日的旗帜时，怎能指望北京举行盛大的仪式来欢迎他呢？尼克松很快地觉察出来了，仪式是低调的，但欢迎是热诚的。尼克松一行刚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宾主互相介绍之后，即被请去出席午宴。宴会十分丰盛，菜像流水一样一道道地端来，没完没了，每道菜都是烹调与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杰作。茅台酒和其他酒、饮料摆满了桌子。尼克松苦练了半年的筷子功大放异彩，令中国主人赞叹不止。

更叫尼克松心里热乎的是，午宴完毕，尼克松刚盥洗完毕，周恩来即来对基辛格说：“毛主席现在想会见总统，请你一起去。”基辛格没有想到毛主席这么快就要会见总统，连忙上楼去请尼克松。一推门，只见尼克松正在脱衣服想去淋浴。基辛格也顾不上礼节了，气喘吁吁地说：“总统，快，毛泽东主席要会见你，就是现在。”尼克松又惊又喜，连忙穿好衣服走出房来。坐在高级防弹车上，尼克松品咂着来华后的感受。他知道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深居简出，很少会见外宾，即使要见，也得预约。像这样客人一下飞机，即刻约见，实在是个例外，尼克松进一步体会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热诚欢迎。

尼克松坐着车，在游泳池停了下来，周恩来陪他进入毛泽东的会客室。房间布置极为朴素，除了满架满桌的书，别无长物。尼克松进了房间后，毛泽东由张玉凤扶着站起来，向尼克松伸出了手，尼克松用两手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了上去。两人笑着，互相打量着对方，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袖，一个是著名的反共分子，但历史却让他们相会在中南海。

毛泽东招呼尼克松坐下来，抱歉地说：“我已不能很好地讲话了。”不过尼克松感到主席可能是中风导致行动不便，但目光锐利，思维敏捷，如同闪电。基辛格寒暄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学生研读主席的著作。”毛泽东很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真诚地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泽东笑笑，一下子把话题转到了台湾：“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尼克松很有兴味地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毛泽东会意地笑了，周恩来代毛泽东回答了这个问题：“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们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周恩来的话使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会谈的气氛很轻松，毛泽东又饶有兴味地谈到基辛格第一次秘密来华的趣事。尼克松夸赞地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尼克松所说的姑娘是指随同基辛格来华访问的那几位小姐。基辛格插嘴为自己辩护："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尼克松笑着看了一眼基辛格说："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做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毛泽东打趣地说："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了？"尼克松指着基辛格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麻烦可就大了。"周恩来补充了一句："特别在大选的时候。"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在美国大选中，私生活问题常被用来作为攻击对方的炮弹。

说到大选，毛泽东又笑起来："上次选举，我投了你一票。"这话多风趣，尼克松也幽默地说"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毛泽东很开心，又很认真地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尼克松也开心地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尼克松接着谈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比如，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毛泽东知道尼克松引用的是他的词《满江红》里的一个句子，扳着手指头，笑着说："'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尼克松自嘲地说："像我这种人，还有匪帮，概在打倒之列。"

毛泽东探身盯着尼克松，微笑地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他指指基辛格说："他们说，这个人也属于不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毛泽东幽默而友好的谈话又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对尼克松的欢迎和接待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和毛泽东的谈话结束以后，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这也许是尼克松见过的最盛大的国宴，在可以检阅仪仗队的宽阔的宴会大厅里，排满了宴会圆桌。乐队

奏着《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堆里的火鸡》。周恩来把一杯茅台酒倒在一个盘子里，点燃它，盘子里燃起了蓝色的火焰，最后火焰熄灭，盘子里滴酒不剩。尼克松早就知道，茅台酒是中国的国酒，曾于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得过金奖，今日一看周恩来的表演，感到此酒果然名不虚传。他和周恩来频频干杯，听着《草堆里的火鸡》——这支他最喜欢的歌，深深地感到中国人的细心和强有力的、尽善尽美的组织和安排，感到了这个国家的伟大。

宴会过后，热情的主人安排客人在北京市内游览，基辛格没有去，关在钓鱼台和乔冠华就中美联合公报举行最后谈判，谈判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乔冠华是谈判老手，基辛格经验丰富，双方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就是在措辞上主张不同。乔冠华主张干脆了当，基辛格主张措辞委婉。双方各展手段，决心一试高低。周恩来和尼克松闻讯也来参加会谈。尼克松知道中国人喜欢坦诚会谈，便直率地讲了自己的处境：措辞过直，会使他在国内受到各种攻击，影响大选，影响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周恩来听了深以为是，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采纳了尼克松的意见，使中美联合公报既坚持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又充分照顾了尼克松总统的处境。

大功告成，尼克松举行告别宴会，随后去杭州参观。在西子湖畔，大家在“花港观鱼”景点欣赏金鱼，中国陪同团的两名漂亮的姑娘因事找周恩来，急匆匆地从九曲桥上走过来。基辛格开玩笑说：“瞧，这么漂亮的中国姑娘在追我。”这几天来，大家都熟了，姑娘们毫不客气地回敬基辛格：“博士先生，你最好站稳点，别掉下湖去喂鱼。”基辛格一听开心地笑起来，尼克松也笑着拍拍基辛格的肩：“亨利……”周恩来也笑着开玩笑说：“基辛格博士，你应该感到荣幸，我们的姑娘这是第一次和外国客人开玩笑噢！”

尼克松在杭州游览完后，又坐飞机去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准备在上海发表。突然，周恩来得到报告，美国人要推翻公报，重新谈判。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八回　烈士暮年再批“左”　“文革”新贵又逞狂

说话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到上海以后，根据双方的协定，就要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突然跟随尼克松访华的国务卿罗杰斯提出，美国在公报上让步太多，必须对公报的15处进行修改。尼克松很恼火，对基辛格说：“公报我已经点头同意了，现在又突然提出修改，中国人会怎么看？这不是我们说话不算数嘛。”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说：“是啊，可是，明天公报就要发表。”尼克松想想，叹口气对基辛格说：“亨利，要不你再找乔说一说。”基辛格脸色沉重地说：“好吧，不过，真难启齿啊！’’

宴会过后，基辛格找到乔冠华，说了尼克松的为难之处，希望对公报再作一些修改。周恩来设身处地地考虑了尼克松的处境，认为可以考虑对公报再作一些修改。他立即打电话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宽容而坚决：“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于是，乔冠华再和基辛格谈判修改，吸取了罗杰斯的一些意见。周恩来又主动去看望了罗杰斯。罗杰斯主要是对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意见，见周恩来主动来访，十分感动，二人结下友好情谊。

1972年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是晚，中国政府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告别宴会，宴会甚为热烈。第二天一早，周恩来送尼克松总统去机场。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总统大大地夸赞了一番中国翻译唐闻生的精湛的翻译水平，称她为自己的“中国之声”。这位文秀的中国姑娘脸红了，不知道怎么办。周恩来完全听懂了尼克松的话，笑着对唐闻生说：“翻出来嘛。”唐闻生不好意思地翻了，大家都笑着向她祝贺。

“空军一号”起飞了。夫人帕特还沉浸在欢乐的友谊气氛中，她对丈夫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尼克松说：“是的，他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只是，他总是生活在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且说周恩来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去游泳池看望了毛泽东，汇报了尼克松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的信息。毛泽东淡淡地说：“现在是不能去，国民党的旗子还挂在华盛顿嘛。事情刚刚开了个头，我和你恐怕都等不到那一天了。”毛泽东说这句话时，充满了感伤情绪，周恩来也默然了。

说真的，周恩来这时也有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他的心脏病已经犯了两次，

现在他洗澡都要有卫士和医生在场帮忙。但是，周恩来想不到的是，一种更可怕的疾病已经向他袭来。

送走尼克松以后的第三个月头上，保健医生照例对他进行一月一次的检查。5月11日，医生化验尿样，突然一惊，尿样中发现了4个红血球。按照一般情况，老年男人的尿样中有一两个红血球是正常的，但4个太多了一点。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血管硬化或者尿道畸形；或者是有了结石，使尿中有血；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有了肿瘤。医生想再检查一次，但又怕总理追问，就转弯抹角地跟周恩来提出还要再化验一次。周恩来看医生吞吞吐吐地解释取样的原因，心里明白了，坦然地对医生说："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说穿了，不就是怕我长肿瘤吗，明天查。"

第二天，周恩来留了尿样，医生们赶紧化验，又做细胞检查。化验结果出来后，医生们心都往下一沉，在总理的尿样中查出了癌细胞。他们不愿相信这是真的，请来北京医院（这是所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的一所医院）、协和医院（这是一家历史很长，医疗水平非常高的国家级大医院）、肿瘤医院（全国最好的专业医院）的专家会诊，希望专家们能推翻这个化验结果，可是专家会诊的结论是无情的——周总理患了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专家们也怕会诊有误，建议再在天津、上海同时分头化验，检查结果完全一致——膀胱癌。

怎么办，根据中央的决定，医生们严格保密，不让周恩来知道他患癌的消息。周恩来似乎也没有想到他会患癌，从来没有向医生们问问病情。医生们心里难过，只有想方设法治好周恩来的病，在吴阶平教授的指导下，医疗小组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但是，医生们很快发现，周恩来的情绪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有时工作太累了，会叹口气说："老了，不行了。"有次医生去为他量血压，看见很少有空闲的周恩来，拿毛笔在信笺上随意写着一首古诗，医生看时，抄录的竟是曹操的名篇《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医生鼻子一酸，两颗泪掉下来，原来周恩来早就知道他患癌了，他已经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已经向他逼近，但他还要用最后的生命时间冲刺。

周恩来转过头来，看医生满眼含泪，开导他说："你今天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医生说："总理，你得适当注意休息，主席最近又指示要你节劳。"周恩来望望桌子上堆得像山一样高的文件，叹口气说："你快量吧，我还要陪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呢。"

杨振宁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华裔科学家，现在美国定居工作。他是新中国成立前从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的，毕业后就留在美国，加入了美国籍，后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中将的女儿结婚，本人曾因在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而获诺贝尔物理奖。自诺贝尔奖金设立后，华人获此殊荣的不过区区数人而已。

杨振宁一去美国数十年，由于中美交恶、朝鲜战争等原因，未能回来过。

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杨振宁这才能重访桑梓。周恩来正想整顿一下叫“文革”破坏得乱七八糟的大学教育，便请杨振宁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参观。这两所大学杨振宁熟得很，他不仅在这两所大学上过学（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的理科全部合并到北大了），而且还有不少过去的老师、同学留在这两所大学。

杨振宁到北京时，清华、北大在“文革”中停止招生5年后，刚刚录取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按照中央的规定从工厂、农村、部队中推荐上来的“优秀”知识青年。中国远在两汉时期就采取推荐的办法选拔人才。但是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不可避免地掺杂进去了过多的人际关系，结果大量门庭显赫、有钱有势的人被推荐上来，而有真才实学的寒士基本上被排除在推荐之外。当时，为了造成推荐的舆论，许多准备被推荐的人还得认真地表演一番。现在被推荐的知识青年连表演一番都不需要，许多知识青年给农村中的生产队长、工厂里的车间主任送上一份厚礼，即可被推荐上来。当历史早已淘汰了推荐制，代之以相对公平合理的科举制度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又把一千多年前那套办法重新捡了起来，一下子倒退了一千多年，在推荐中发生的各种丑事更是数不胜数。

应该指出，被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乏真才实学者，但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偏低，思想素质一般。这些人入学后，本应抓紧时间补补小学、初中的课程，多认几个字，可是江青、张春桥这些“文革”新贵偏要他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于是一些工农兵学员今天指责这个教师灌输封建，明天又在课堂上批判那个教师专讲资修，搞得这些教师手足无措，天天应付斗争和批判，哪里还能认真讲课。

杨振宁到清华和北大参观访问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学校。杨振宁回到宾馆后忧心如焚，毕竟是炎黄子孙，切盼着中国富强。杨振宁这些年来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看到日本战败后经济迅速崛起，正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经济大国。靠的是什么，正是教育，是人才。而中国呢？不仅“文革”中烧掉了许多宝贵的图书，贬斥了不少名教授，而且停学5年，简直是荒唐。现在恢复招生了，又把两汉的那套举荐制度搬了出来，难道中央领导就不知道这种“察举征辟”的毛病吗？须知，世人早已对这种举荐制度作了结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清白寒素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下去，自己的桑梓之国不但赶不上去，恐怕要远远地落后下去。

当然杨振宁也知道，中国政府待自己的岳父岳母不薄。杜聿明战败被俘，政府不但不杀，反而在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改造后赦免了他，安排了工作，后来又接岳母从美国回来居住，“文革”中多少中共领导人被打倒，但在毛泽东的严厉命令下，红卫兵对自己的岳父岳母动都不敢动一下。那么现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提出批评，会不会惹中国领导人不高兴呢？

但毕竟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振兴桑梓的责任感使杨振宁大胆地对大学

的理科教育提出建议，内容很多，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要抓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孰料，毛泽东对杨振宁的讲话非常重视，说他讲话实在，批示周恩来要认真改进。这正合周恩来的心意，他把北大校长周培源找去说："你回去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回去后，立即写了一个计划报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周培源的信后立即作了批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

周恩来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想趁活着时多纠正一些"文革"以来的错误。这个时期来访的客人很多，日本田中首相也准备来华访问，恢复中日邦交，这又是件大事，周恩来忍着病痛，忙着处理外交、内政的各种事务。

8月13日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周恩来办完事后坐车往回走。他把头靠在座椅背上，利用这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车子在长安街的快行车道上行驶着，路上行人稀少。突然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插入快车道，司机紧急刹车，还是把这位违章的姑娘挂倒了。周恩来被刹车惊醒，司机和秘书已下车把姑娘扶了起来。周恩来从车窗里探出头，急切地问道："受伤了没有?"秘书说："没有受伤，只是衣服挂破了。"姑娘听到车里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她有些慌了，连说："没事，没事。"周恩来吩咐秘书："你们赶快拦辆车，把这个小同志送到医院检查一下。"

秘书们很快叫了辆车，周恩来走过来，把这位姑娘扶到车里，叮咛说："小同志，你不要害怕，好好检查一下。以后骑车可千万要小心噢，要走自行车道，记住了吗?"姑娘点头。这时交通警察赶了过来，周恩来对交警说："这位小同志一时粗心，她已经吸取教训了，你们就再不要为难她了。"

小刘摔倒后，只是上衣撕破了一点，人和车都没有受伤。秘书陪她检查完以后，又送她回了家，好好安慰了一番就走了。小刘无意中拦了周恩来的座车，心里很不安，总怕上头追究下来。第二天晚上，她下班回来后，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正是那位秘书，她心里紧张了。那位秘书走进来问道："小刘，没有什么问题吧，总理不放心，让我来看看。"小刘激动地说："没有，没有，我不是好好的吗?"秘书仔细审视了一会儿，确信什么问题也没有，才松了口气说："好了，这下总理可以放心了。"他又从皮包里掏出一件玻璃纸包着的衬衣送给小刘："这是总理掏钱买的，赔你。"小刘接过衬衣，叫了声"总理"，激动地哭了起来，秘书抚慰了几句，回去复命了。

周恩来听秘书汇报小刘一切正常才放了心，想想又说："你再去公安部一趟。我有个想法，前些年我看行人过马路没有个躲车的地方，建议公安部在马路十字路口的大街中间设立安全岛，让过马路的人有地方躲躲车，实行这么多年，效果还是好的。现在车多起来了，自行车和汽车互相争道，很不安全。是否可以用水泥做成墩子，再用钢管把墩子连起来，形成隔离线，使汽车和自行

车各行其道，互不越线，开车的放心，骑车的安心，可以减少交通事故，花钱也不多。你和公安部的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

秘书领命走了，另一个秘书又走进来，兴奋地对周恩来说：“总理，邓小平的信主席批下来了！”周恩来眉毛一扬，急促地命令秘书：“快打开，快！”秘书打开档卷，把毛泽东批阅的邓小平的信取了出来，双手递给周恩来。

邓小平的信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写给毛泽东的。当时，邓小平和卓琳被通知到厂里听文件传达，这是邓小平到江西以来第一次听中共中央的文件传达。听了文件，他们才知道是林彪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卓琳指着文件上印着的叶群和黄永胜、李作鹏在一起的照片，对工人们说：“叶群在延安的时候，生活作风就很坏。”邓小平却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特别的表示，回到将军楼以后才对卓琳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过了几个月，陈毅的子女给邓小平传递了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听了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对自己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揭发了林彪的许多问题，表示了在毛主席领导下好好为党工作几年的决心。没想到主席很重视，8 月 14 日就把信批下来了。

周恩来打开邓小平的信，只见毛泽东批示：

>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阅后，感到这是邓小平复出的好机会，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问题。江青等人虽然不同意邓小平复出，但有毛泽东的批示摆在那里，不敢过分胡闹。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这个决定先送毛泽东审阅，再发往全国。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推开家里的门，问道：“小超，吃饭了吗？”邓颖超说：“还没有呢。”周恩来看看表说：“正好，我也没有吃，咱们一起吃顿饭吧。”邓颖超笑笑说：“真稀罕，今天这股风是从哪里刮来的？”

周恩来尽管工作很忙，但进城以后，只要不出差，不开会，都要挤时间每天和邓颖超一起吃一顿午饭。“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切都打乱了，江青一帮人四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周恩来则四处救火，防止把国家给烧光了。放火的人多，又打着“文革”的旗号，明火执仗地大烧特烧。救火的人少，还得防

着、躲着，周恩来很少有时间和邓颖超在一起吃午饭。林彪事件以后，批林批陈批“左”，外交局面逐步打开，大学开始招生，干部们也逐渐解放出来，叶帅主持军委工作，王震、陈云等老干部逐渐公开亮相，现在邓小平也即将复出，周恩来心里高兴，决心抽点时间和邓颖超吃顿午饭。

邓颖超摆好饭桌，周恩来端起碗，忽然“扑哧”笑了出来。邓颖超奇怪地问：“你笑什么?”周恩来说：“我笑唐闻生。”邓颖超问：“唐闻生有什么可笑的?”周恩来提醒她：“你记得吗？那一次我们会见外宾，唐闻生是怎么介绍的吗?”邓颖超当然记得。

那是在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会见外宾，邓颖超一般不去作陪，但那次由于礼仪上的需要，邓颖超陪同周恩来会见。宾主互相介绍时，中方礼宾官员本应用“夫人”这个称呼介绍邓颖超，但“文革”之中，谁敢用这个“资产阶级称呼”呢，礼宾官员便用了一个中国人人皆用的称呼“爱人”来介绍邓颖超。中国人都是这么在官方场合称呼自己的妻子的，因此这么介绍，大家都没有感到有问题。但是在西方，“爱人”这个词是“情人”的意思，唐闻生就老实把邓颖超翻成是“Lover”，周恩来连忙纠正：“我和邓颖超结婚都 50 年了，怎么能说是‘Lover’呢?”其实，客人们都知道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夫人。

邓颖超一想至此，颇有感慨地说：“也真难为了小唐，文化大革命闹得人们连夫人这个词都不敢用，你叫人家怎么翻啊?”周恩来点点头说：“是这样，不把极左思潮批透，一切工作都无法搞，我得快点吃，人民日报社的老胡可能已经来了。”

周恩来匆匆吃完饭，赶到西花厅办公室，人民日报社的几位负责人已经来了。周恩来说：“你们和新华社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你们回去后好好把这个问题抓一下。最近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和科学会议，都把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你们的行动怎么这么缓慢呢?”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鲁瑛把得很紧，不让批啊!”周恩来生气地说：“你们的党性呢？批极左是中央的路线嘛。”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几个负责人接受了批评，回来后准备组织发表龙岩写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突然张春桥、姚文元又把他们找去谈话，阴阳怪气地说：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这几位负责人回来后觉得很奇怪，这两个讲话的精神完全相反，听谁的呢？他们研究了一下，听周恩来的，龙岩的文章照发不误。

10 月 14 日，龙岩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管全面工作，也抓宣传工作，另外组织了一个组织宣传组具体主管宣传，成员主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姚文元看到龙岩的文章后大为恐慌，如此批下去，不就慢慢批到自己头上来了吗？他立即跑去对张春桥说：“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张春桥的眼睛转了几下，鬼主意就来了，他点拨说：“给洪文说一

下，让上海市委写作组给鲁瑛打电话摸摸情况，我估计是哪个人讲了什么话。情况摸准后，在上海开个工人座谈会，用工人的手打他们。”

10月底，张春桥等人摸到了底细，在上海找了几个工人秀才在上海文汇报社开会。一个写作组的人拿着《人民日报》登的龙岩的文章，故作气愤状，对这几个工人说：“这是康办（上海市委设在康平路，故称康办）传过来的，要大家看一看。这样对待群众，对待文化大革命，行不行？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篇文章就有问题。”一有问题，二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三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讨论座谈的调子就定下来了，这几个工人秀才就照着这个调子批判龙岩。文汇报社和写作组根据座谈的情况写了个纪要，登入《文汇报》11月4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让人乘飞机携带《文汇情况》和其他材料到北京送给姚文元和张春桥。

姚、张把《文汇情况》立即批给鲁瑛，要人民日报社好好讨论一下：上海工人都感到受了侮辱，提出了抗议。鲁瑛拿到批件，大肆在报社开展“讨论”，围攻理论部。理论部和报社的几个负责人感到这股风不对，是反对中央批极左的路线，他们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发生在报社的围攻中央机关报的情况。

周恩来当然知道这些情况和背景，也知道姚、张是冲自己来的，但他不相信毛泽东会支持他们，因为批“左”是中央定的路线嘛。

毛泽东接到人民日报社的几个负责人的报告之后，很不高兴。林彪之死，使全国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产生了急剧变化，听说他给江青的那封信发到全国以后，不但未能使群众信服，反而引起了许多议论和猜疑。如果再听任周恩来批极左，批到最后，还不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如果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身后人们怎样评价自己呢？想到这里，毛泽东把周恩来召来。

毛泽东提起了人民日报社的那封信：“我看那封信不对。林彪的实质是什么？是极左？是极右，叛党叛国。我看还是要批右，左少批吧。”

如此一来，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就进行不下去了。

人民日报社的那几个负责人还不知道毛泽东批了他们。这天，他们被召到大会堂开会，一进房间，就看到张春桥、姚文元盛气而坐，茶几上摆着他们写的信。告状的信转交给被告来处理，原告还会有好日子过吗？果然，姚文元眼睛一瞪：“你们分裂中央，是反党！”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十九回 数功绩五将帅平反 谋军权“四人帮”烧荒

话说人民日报社的几位负责人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姚文元拍着他们写给毛泽东的信，大骂道：“你们敢给主席写信，主席已经批下来了，你们完全是在分裂中央，你们是一伙反党分子。现决定，立即停止你们的工作，交报社群众批斗。”这几位负责人当即被押回报社。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批斗以后，姚文元把他们流放到一个僻远的山村劳动改造，报社内凡是支持过这几个人工作的干部都被赶出了报社，鲁瑛完全控制了《人民日报》。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过问《人民日报》的宣传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完全变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

处理完了批极“左”的问题，就到了1973年的新年。毛泽东身体不好，心情又不愉快。张玉凤他们这些秘书、护士、卫士弄了些烟花给毛泽东放起来，毛泽东倒是笑了笑。

秘书把一份文件拿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的报告。毛泽东看了看文件，便圈阅了。中央办公厅即于3月份发出文件，向全党全国通报邓小平复出的中央决定。奇怪的是，从1967年起，全国8亿人喊了3年的“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而当邓小平突然又复出任副总理职务时，全国反应平静，认为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倒是邓小平有点不自然。1973年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奇迹般地出现在宴会上。外国记者惊讶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走过来，用英语向记者们介绍道：“请认识一下，这位是新任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记者们清醒过来，竞相鼓掌，表示向他祝贺。邓小平鞠了一躬，感谢记者们的合作。外国记者们再也顾不上听西哈努克讲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的那些故事了，一窝蜂地向电信大楼跑去，占住国际线路，报道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记者们跑了，邓小平静静地坐在宴席的椅子上，没有什么人同他说话，他也不同什么人说话，坐在那里，显得有些孤独。毕竟脱离工作6年了。

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大为沮丧。本来周恩来已身患绝症，江青等人就等着他住院治病，到那时政府大权还不是他们的。谁知周恩来还未走，又来了个邓小平。不知为什么，江青不怕周恩来，倒怕邓小平。她在50年代时就多次听毛泽东说过，那个小个子，绵里藏针，前途无量。邓小平进国务

院还没说一句话，江青已有些惶惶然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要邓小平继承总理职务的意思，他看中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38 岁的王洪文，把他调到北京参加中共十大的筹备，而且内定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 年 8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令代表们诧异的是，和以往任何一个代表大会都不同，毛泽东并没有在《东方红》的乐曲中出现在主席台上，而是早早就在主席台上落座。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先退场，然后护士扶着毛泽东站起来退场——原来毛泽东因病已站不起来了，又不想让代表知道他的病情，只好事先入场，最后退场。

这次十大，毛泽东最满意的是又选了个接班人。他扳着指头对政治局委员们说："王洪文农民出身，又当过兵，最后又在工厂当工人，工农兵都经历了，是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啊！"毛泽东可能不知道，王洪文是农民出身，但不大会种地；倒是当了两年兵，又在工厂确实干了几年，当了保卫科副科长。此人擅长打砸抢，胸中可是无点墨，好在毛泽东也不要求。就这样，这个坏分子因破坏有功，38 岁就当了党中央第二副主席，在十大选出的 5 位副主席中，位于周恩来之下，其他人之上。

毛泽东也着实注意培养这位接班人，经常拉着他参加会见外国客人，让他长长见识。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已于上年 9 月访华，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随后西德总理勃兰特来访，中国与西德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些盛事王洪文没有赶上。好在中美关系冰河既开，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络绎不绝，倒给王洪文提供了不少实习机会。

毛泽东对自己新选的这位年轻的接班人很满意。十大刚结束，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华访问，毛泽东指着王洪文说："你看他，很有前途。"不料，蓬皮杜对王洪文理也不理。王洪文很憋气，决心在下一次会见外宾时好好表现一番。

机会终于来了，1973 年 11 月，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来华访问，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两位总理谈了一会儿，一位中国外交部官员走来，递给周恩来一个便条。周恩来问惠特拉姆："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惠特拉姆估计是去见毛泽东。周恩来陪他上了车，向中南海驶去。

果然是毛泽东要会见惠特拉姆。他由张玉凤扶着，同惠特拉姆握手，嘴里抱怨着："我的腿不好使了，听觉也不太好。"惠特拉姆已注意到，毛泽东身边站着年轻的王洪文。他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局促不安，好像是一个老考不及格的小学生进了教授室。

一般外国的来访者很少问到中共政治局的事。但惠特拉姆不一样，他问了很多刚结束的十大的情况，里面牵涉很多资料。凡是涉及这些问题时，都由周恩来总理代为回答。王洪文也想开口，总插不上嘴。

突然，惠特拉姆问起了王洪文："主席，王在十大后的飞升已是世界闻名，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大家都一齐把头转向毛泽东，看他怎么回答。毛泽东对此提问有些不快，头一摆，生硬地说："不知道。"惠特拉姆开玩笑地说：

“你和周长征时，据我所知，王还没有出生呢。”王洪文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周恩来立即插话把他打断了。

王洪文一直想表现表现自己，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会谈快结束时，他好容易找了个空插话，说了几句令世人笑绝的话：“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就已经像毛泽东和周总理那样，开始干革命了。”他的这番表白令在场的中外人士目瞪口呆。唐闻生把这句话翻出后，毛泽东脸色顿时变了，惠特拉姆满脸是又吃惊又好笑的表情，翻译们个个撇嘴。这个王洪文果真是造反上来的，说起大谎来连磕巴都不打一个，连五岁的小孩子都懂得，一岁的婴儿恐怕连革命这个词还不会说呢。

毛泽东看着王洪文这么不争气，心里很伤心。惠特拉姆想让气氛活跃些，谈到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毛泽东已无心讨论了，直率地说：“我和周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我已疾病缠身，我已和马克思打过招呼。”

周恩来看看表，暗示客人谈话该结束了。毛泽东指着王海容打趣地说：“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太多。”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有感于王洪文的浅薄，派他和邓小平一起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王洪文水平很低，又不愿意吃苦，哪肯下大力气调查研究，他把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看成是一次轻松的游山玩水，每到一地，都要大吃大玩。邓小平则每天会见各地负责人，谈工作、解决问题，了解基层情况。

周游全国已毕，邓小平和王洪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王洪文没有什么可说的，讲了几句套话就交差了。邓小平倒是谈了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建议对全国进行整顿。

他们在汇报的时候，毛泽东很少讲话。汇报完了，毛泽东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毛泽东指着王洪文说：“你先说说。”

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心里“哼”了一声，这是现在小学生都熟悉的一句话。他转过头来又问邓小平：“你说呢？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邓小平尖锐地说：“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毛泽东的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王洪文似有愤怒之色，邓小平面无表情，神态安详。

王洪文心里很得意，以为邓小平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他竟敢把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描绘得这样可怕。不料毛泽东点了支烟悠悠地抽起来，抽了几口才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你算是说准了。我死后中国肯定要发生内战。唉，人才难得啊!”

王洪文被晾到一边，毛泽东不怎么理他了，看来此人破坏可以，建设不行；打砸抢可以，正经事一样也干不了。王洪文的浅薄大大地扫了毛泽东的兴，打了毛泽东的脸。倒是周恩来怕王洪文面子上下不了台，劝他说：“以后要加强学

习。当了副主席，责任大了，不比从前……”王洪文神情沮丧，不说一句话。

从此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越来越重视，对王洪文越来越冷淡。王洪文看到自己地位危险，加紧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靠拢，四个人形成了一个帮派，一些本该上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文件，他们四个人批阅一番就发下去了。

这时，毛泽东下令，让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在这里，要想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得先看看中国军队的组织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时期，一直是把部队分成野战军和地方部队。这样，就有了一、二、三、四、华野共五路野战大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主要划分为八个大军区，这八个大军区均以大军区驻地城市命名，他们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兰州军区。“文化大革命”中，军区司令员调动频繁。但有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却一直没有动，调换去的军区司令也已在位几年了。毛泽东感到他们对自己军区的部队太熟悉，对其他军区的部队不太熟悉，不利于战备，于是向政治局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政治局经过讨论，自然是同意了。

八大军区司令集中在北京，由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的命令。王洪文这时也被指派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想在将帅面前树立王洪文的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也就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许世友！”

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王洪文在上海，最怕贴近上海的这个南京军区司令。他壮着胆，又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得“咚”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往茶几上一磕，发出了巨响。王洪文抬眼望去，不光是许世友，杨得志、皮定均这些老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王洪文胆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吭。王洪文这才尝到了军队的厉害。

周恩来开始救场来了。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刚才还是很傲的将军们，现在听话得很，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名点完了，周恩来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这样一个调法：北京军区李德生调沈阳军区，沈阳军区陈锡联调北京军区；南京军区许世友调广州军区，广州军区丁盛调南京军区；武汉军区曾思玉调济南军区，济南军区杨得志调武汉军区；福州军区韩先楚调兰州军区，兰州军区皮定均调福州军区。命令颁布后，限各军区司令带少量秘书、警卫战士在 10 天内进入新的司令岗位。

军区司令对调了，他们来到不那么熟悉的部队工作，要互相了解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样做是否有利于战备确实是个问题。北宋时，中央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经常调动部队指挥官到陌生的部队去工作，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结果导致指挥不灵，将士猜忌，屡战屡败。

对调命令宣布以后，毛泽东又说今论古地讲起话来，内容不外是说服将军们服从命令。讲着讲着，毛泽东忽然讲起了贺龙："贺龙看来搞错了，这是林彪搞的，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犯了错误。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这不好，我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从现在起，邓小平参加军委领导工作，任总参谋长。"

毛泽东的话，对军区司令们是个莫大的安慰。五个将帅平反，是对他们，也是对军队战绩的肯定，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更是让他们信服和兴奋。须知八大司令中，一半人是原来二野、三野的，当年淮海大战，渡江南进，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直接统率和指挥二野、三野作战，邓小平是他们的上级呢。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平反有点晚了。贺龙已于1969年在监护中病故。杨、余、傅、罗瑞卿总算活着见了天日，他们被中央军委接回北京。1974年9月30日，杨、余、傅参加了新中国成立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在灯光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他们相遇了。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看到了杨、余、傅，但他们没有过来和这几个将军打招呼。回到钓鱼台以后，张春桥忧心忡忡地说："军队最难办。"姚文元也跟着说："军队最危险。"江青咬牙切齿地说："我恨不得有把杀人的刀。"张春桥扳着指头数着说："八大军区，除了丁盛以外，根本不听咱们的。丁盛的南京军区司令也是空的，南京军区的军长们对丁盛应付，有事都去问广州的许世友。特别是摆在无锡、苏州一线的六十二军，是南京军区的主力，齐装满员，装备极好，军长、政委都是许世友的警卫员和机要秘书，根本不理丁盛，对上海威胁很大噢。"姚文元想想说："洪文现在参加军委领导，让他想想办法，怎么样？"张春桥满脸是看不起的表情："他啊？闹闹安亭事件可以，在军委可就只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本来有个叶老头在军委，现在又加上邓小平。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一个是总参谋长拿着实权。说实话，洪文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了。"江青恶狠狠地嚷道："放火烧，军队是块荒地，还没有放过火呢，要放火烧荒。"张春桥点点头说："对，现在是个好机会，我告诉你们——"

张春桥为什么说现在是好机会呢？其中确有原因。原来在上年，也就是1973年5月，毛泽东把江青找去，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了江青："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毛泽东提出批林要批孔。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又把王洪文、张春桥找去谈话，这次可是直接批周恩来了，他给王洪文、张春桥念了一首自己写的批评外交部的诗："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8月5日，毛泽东又把江青找去，听江青汇报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的准备情况，毛泽东画龙点睛地说："法家主张中央集

权制、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他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

毛泽东讲到这里，直接说起了《人民日报》批极左的事：“人民日报说林彪极左，上海不同意，说是极右。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又朝回搞呢，这是王若水组织的。”

外交部是周恩来管的，《人民日报》批极左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外交部“势必搞修正”，《人民日报》“又往回搞呢”，当然是批周恩来了。毛泽东还把自己新近写的评法批儒一首诗叫江青记下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江青把这首诗记下来，以为有机可乘，回去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传达了，他们立刻商议了行动计划。

其实，还在一个月前，江青等人就已经开始批回潮了。为了维护“焚坑事业”，否定周恩来领导的恢复教育秩序的工作，他们在东北找了块石头，向周恩来扔去。这块石头就是在全国出了名的白卷事件。此年春，辽宁省进行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试，有个叫张铁生的青年在文化考试中成绩很差，物理试卷是0分，化学6分，语文38分，数学60分。张铁生早已料到自己水平太低，不会被录取，便在考卷背后写了一封信，骂别的考生都是大学迷，吹自己表现胜似老黄牛，乞求大学录取他。

这时的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是毛远新，他的父亲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毛泽民抗战时期在新疆牺牲，新中国成立以后毛远新一直在毛泽东跟前生活，后来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所大学就是陈赓大将当年创办的那所大学，不过毛远新入学时，陈赓已经病故。

“文化大革命”一起，还在求学的毛远新奉令造反，有毛泽东提示，他造反的水平当然就高多了。不久，从哈军工毕业的毛远新开始走上领导岗位，短短数年，就升为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毛远新早已从“四人帮”那里得到了密示，这时看了张铁生写的那封信，便加了编者按语，修改了张铁生的信，发表在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上。《编者按》说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斥责文化考核是鼓励知识青年闭门读书。“四人帮”如获至宝，立即让《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说是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大问题。

以后，“四人帮”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日记。这位小学生叫黄

帅，因受了老师的批评，写了几篇日记表示不满，这也难以苛责这位小学生。谁知此事叫“四人帮”的一个干将谢静宜发现，立即修改小学生的日记，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大批师道尊严。后来“四人帮”又不知怎么知道了河南有个“马振扶事件”，立即大轰起来。

“四人帮”称赞张铁生是白卷英雄，白卷能当英雄，读书自然无用。小学生日记发表后，小学生所在的北京中关村一小自然是教学秩序大乱，全国中小学生也群起效仿，教学是谈不上了。不过这些还没有直接危害教师的人身安全，“马振扶事件”叫“四人帮”一宣传，可就不得了，教师人人自危。

且说河南省唐河县有个马振扶公社。公社有所中学，中学里有个初中女学生叫张玉勤。在英语考试中张玉勤不会答题，便也在考卷背面写了点个人感受。她写的可不是信，而是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 ABC，照样干革命。”老师看了打油诗，批评了她几句。这位女学生听了不高兴，再加上其他原因，投水自杀。“四人帮”的干将，把持清华大学的迟群和谢静宜赶快报告江青。江青大做文章，说这是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情况简报，要求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王洪文亲自打电话要求把校长、教师判重刑，结果马振扶公社中学校长和张玉勤的班主任被判重刑。

此案一出，举国哗然，教师、校长人人自危。哪个校长、教师不负有教导之责？要教导必要说，因教导学生就要判重刑，那不是全国所有的校长、教师都要进监狱？看来“焚坑事业要商量”了。所幸后来进监狱的教师数量有限，但学校的教学是无法搞了。教师被批斗致死致残者不知有多少。

“四人帮”放起的这几把大火把即将复苏的教育事业的萌芽又给烧光了。

1973 年 12 月，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次批评把叶剑英也包括进去了，因为政治局是周恩来主持，军委是叶剑英主持。

就在毛泽东接连批评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却已被查出肝区有癌，住进了 301 医院，江青等人欣喜若狂，猛在报上发表文章，批林批孔批周公，

张春桥把这一段的形势一分析，江青、姚文元都感到现在形势很好，几把火烧掉了教育复兴，现在该烧烧军队了。他们都知道，军权是权中之权。没有军权，万一泰山倾倒，手无寸铁，不可想象。几个人商议一番，又给王洪文打了电话，便开始行动了。

1974 年的 1 月，正是三九寒天，天气格外冷。“四人帮”把《人民日报》的鲁瑛等几个人叫来开会。人到齐后，江青问鲁瑛：“《解放军报》登的那篇文章你看了没有？”鲁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文章啊？”江青恨铁不成钢，气呼呼地说：“怪不得人家说你是个草包，连一篇稿子也念不下来。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知道。”她拿出一张《解放军报》扔给鲁瑛：“你看看吧。”鲁瑛接过一看，原是 1974 年 1 月 17 日的一张《解放军报》，报纸的第三版《党的生

活》专栏中登了一篇不足1500字的短文，题目是《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短文介绍了空军某党委按照毛主席的著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有关精神和周恩来总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1973年在空军党委会上的一次讲话的精神，搞好党委一班人团结的经验。鲁瑛看完了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江青恶狠狠地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毛主席的教导，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扬了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做这样的错误宣传，岂不是要取消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吗?”张春桥批评鲁瑛：“你的政治嗅觉怎么这么差呢？你看梁效写的批孔文章多好，‘孔子到了老年，身患重病，端着右胳膊，跑来跑去，到处碰壁’”。说着他站起来端起右胳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学着淮安口音喊了句“同志们好”。江青、姚文元都笑起来。江青指着鲁瑛说：“明白了吧，他害怕了，就说要讲谅解。”鲁瑛这才明白江青批林批孔的底细，赶紧答应道：“首长放心，我知道怎么办。”

鲁瑛回到人民日报社后，找了几个记者，对他们说：“《解放军报》的那篇讲谅解的文章有问题，洪文指示要写文章批评，春桥指示这篇文章怪得很。你们到连队去搞个座谈，要战士出来说话。我现在给你们传达一下江青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判……”

记者们奉令来到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把4个战士召集起来，给他们传达了江青对《解放军报》的批评，要他们学习江青的指示，给军报写批评信。战士们不知怎么回事，既然是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他们就写了。批评信送到姚文元那里，姚文元觉得火力不够，和张春桥、江青商量后，自己就大改起来。改好后，“四人帮”连给原来写信的战士看都不让看一下，就在信上批阅起来。江青边批边对张、姚说：“我要把这篇文章变成一把锋利的匕首。”姚文元提议：“要军报自己写一个编者按发表这封信。”批件传到王洪文那里，王洪文给军报下令：“报社要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军报阶级斗争的盖子。”

一切准备好了以后，鲁瑛给解放军报社领导打电话：“你们1月11日的那篇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几个战士看了后，写了个意见给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看后，认为几个战士是勇敢的，是对的。请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是江青、春桥、文元的指示，是对军报的爱护和照顾。”

《解放军报》在如此高压下，被迫写了一个按语，“四人帮”又把按语大砍大改，等于重新写了一篇按语，指定要在一版显著位置用大号字标出发表。《解放军报》无奈，只好在2月15日把这个按语和批评信刊出了。

信件刚登出，王洪文和张春桥就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开得很晚，江青、姚文元情知有重大人事变动，一直不睡，等着张春桥回来。半夜时分，张春桥回来了，奇怪的是王洪文也跟着来了。江青、姚文元急迎上去，江青性急地问王洪文：“会开得这么晚，都商议了些什么事?”

王洪文兴高采烈地说："好消息，我们胜利了。中央免去了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春桥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笑着说："不是免去，而是中央批准了李德生同志的辞职请求，要我承乏。"王洪文摆摆手说："都一样，都一样。"江青喘口气，咬牙切齿地说："好，现在我们可以放火烧荒了。"王洪文说："现在我们夺了总政，下一步我们要夺总参。"姚文元担心地说："我们在总参没有人啊！"张春桥出主意说："把孙玉国调来，珍宝岛一仗，他由一个连长提成沈阳军区副司令，现在是该他出力的时候了。"王洪文一挥手说："对，把孙玉国调到总参来，让他去砸盖子。"

3月5日，江青把于会泳、刘庆棠找来，还把陈亚丁等几个部队上的人找来，面授机宜。陈亚丁原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这时他在部队中没有职务。陈亚丁一来，江青就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汇报会开始后，江青气狠狠地说："军队的问题最严重，最危险，我们的话根本不听，军队执行的根本不是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他们不普及样板戏，看封存片最严重。"接下来，江青就大骂了，从军委领导到军区司令，她骂了个遍："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

讲到这里，江青转过头来对陈亚丁说："亚丁，你去夺权，把军队的文化工作管起来。"陈亚丁连忙答应："我一定把首长的话传达下去。"江青满意地点点头，对其他人说："看来不夺权不行，要夺权。你们要放火烧荒，去放火嘛。我现在要管管军队，我是有军籍的嘛，我已经去领军装了。"陈亚丁散会后，找了几个人，把江青的"三五"讲话传达下去，要他们放火烧荒。于是江青的这个讲话很快流传到了全国和军队，一些军队里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向军区、兵种领导贴大字报，军队里开始出现混乱。

张春桥、王洪文也没有闲着。

3月5日晚上，张春桥陪江青讲话后，就一心琢磨着整军报。这时他已当上了总政治部主任，指派一些人到连队去煽动，要战士们盯着军报，有些战士受他们的指使，三天两头到报社来贴大字报，张春桥则抓住这些事件，批来批去。3月31日，张春桥看时机成熟，命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一律转发新华社的电讯，一下子切断了军委领导通过军报指导全军工作的渠道。

王洪文呢？他在江青讲话的第二天就跑到总参谋部，在这个地方放火烧荒，召集总参干部开会，要大家揭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这时孙玉国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这个班都是年轻将领，号称"虎班"，王洪文亲自掌管。他把"虎班"的青年将领都调到总参，叫他们用"炸弹"炸总参。这些青年将领知道整垮总参，他们就可以取而代之了，一个个挽袖擦掌，在总参猛砸起来。

"四人帮"搞这么大的动作，自然瞒不过毛泽东。这时毛泽东不仅站不起来了，而且眼睛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看不见了。他得到军委的报告后，心里很

不是滋味。自己已是八十老人，重病在身，江青也不体谅，老是找麻烦。两个月前，江青就已给毛泽东找了个大麻烦，她在1月15日突然召开在京部队万人大会，指使迟群、谢静宜在会上乱讲，江青自己也不时放炮，大批军队领导三箭齐发。叶剑英当即给毛泽东写信告了一状，毛泽东当时就把江青骂了一通，扣发了江青讲话的录音带。怎么她现在又胡闹起来了呢？

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意思是防止回潮，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想在全国再搞一场大动乱。他一再讲，“文化大革命”搞了8年了，该结束了，可江青就是不听，现在她又在军队胡闹，真正是找死。邓小平的警告又在他耳际响起来，“发生内战，一场混乱”。邓小平讲的是他死了以后，现在自己病成这样，江青要是把军队惹翻了，恐怕邓小平的话就要提前应验。想到这里，毛泽东气恼地说：“什么讲话？放屁。”张玉凤问道：“主席，你说什么？”毛泽东说：“江青的讲话收回，查一下这件事。”张玉凤说：“总理已经住院了，你的话传给谁啊？”毛泽东说：“邓小平，从现在起，邓小平协助总理工作。”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开始追查放火烧荒事件。江青慌了手脚，还是张春桥鬼点子多，对江青说：“釜底抽薪。”江青想想，明白了，把陈亚丁、于会泳几个人又找来，和张春桥、王洪文一起对他们做工作。张春桥说：“陈亚丁，江青同志当时可没有讲这些话，这些都是你乱说的，懂吗？”陈亚丁早已明白今天来是对口径，便赶忙点头承认：“是，我传错了话，是我乱讲的。”张春桥安慰他：“你就是爱乱讲，其实是个好同志，我和江青都了解你。”

3月21日，王洪文、张春桥领着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到了中南海颐年堂，一些政治局委员已在这里等着了。张春桥一进来就说：“今天我把当时在场的人都带来了，大家可以问问他们。其实，江青同志3月5日晚上根本没讲那些话，也不可能那么讲，有些话也不是后来传的那样。”讲到这里，张春桥指着于会泳说：“我在场，他们也在场，我没听到，你们听到了吗？”于会泳连忙说：“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刘庆棠也说：“我们都没有听到。”

王洪文说：“既然江青同志没有讲，怎么后来传成那样？”陈亚丁低着头说：“那都是我讲的，我在传达中讲了很多自己的意思。”王洪文故做气愤地说：“你这是在造谣嘛。”陈亚丁连连点头：“我造谣、我该死。”张春桥拦住说：“好了，你现在是要赶快去消除影响。”陈亚丁连连称是。

政治局的人知道他们是做“戏”，但也不好多说什么。毛泽东可不答应，指示一定要把问题追查清楚。“四人帮”无奈，只好授意陈亚丁写了六点更正，“四人帮”审查后，交给中央应付了事。

陈亚丁顶了罪，保护了江青，江青也不想让他受罪。在把六点更正交中央后，江青在第二天去前门南侧的天桥剧场出席一个大会，特意把陈亚丁叫上。在天桥剧场，江青讲了一遍批林批孔后，又讲到放火烧荒这件事上来：“其实，我当时不是那么讲的，那些话我根本没有讲，也不可能那样讲。怎么后来传得那么邪乎呢？现在中央已查清楚了，是陈亚丁同志传错了。陈亚丁是个好同志

啊，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亚丁来了没有?”

陈亚丁正在台下等着这句话，马上站起来回答：“来了。”江青亲热地招呼说：“你上来。”陈亚丁走到主席台上，江青握住他的手问：“亚丁啊！你还乱说不乱说了?”陈亚丁连忙回答：“不乱说了。”江青说：“你写的检查我看到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打起精神好好干!”

江青回到钓鱼台以后，又气又怕。气的是又挨了主席的批评，怕的是放火烧荒没有烧成，还叫火把屁股给烧了。

秘书拿着一个印章走进来，江青没处撒气，骂起秘书来。秘书也不恼，把那个印章递过来说：“首长，你看这是谁的印章?”江青拿过来一看，惊喜地说：“这是哪里来的？宝物啊！价值连城。”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回　倒总理王洪文长沙告状　委重任周恩来北京组阁

话说江青放火烧荒，毛泽东发现后下令追查。江青迫不得已，让陈亚丁写了检讨应付过去。回到钓鱼台，江青又气又怕。可巧秘书送来一方印章，江青一看，原来竟是新出土的吕后的印章。她惊喜地说："这是玉玺啊！"把玩了一会儿，江青对秘书说："过些天，我要到天津小靳庄去讲儒法斗争，你给我写个讲话稿吧。要把武则天、吕后写得充实些，特别是吕后，她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战争年代，她和丈夫刘邦住在一起，为刘邦分忧解难。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政局不稳，刘邦在外带兵剿灭叛乱，吕后镇守长安，施用巧计，杀掉彭越、韩信，把彭越煮成肉酱。韩信在未央宫被活捉后，说刘邦许他三不杀，吕后就把他装在布袋里杀死。刘邦晚年得病，都是吕后处理政务。刘邦死后，吕后就处理国务，实际上是女皇帝。"

说到这里，江青又暴躁起来，喊叫着："女人为什么不能当皇帝？这是儒家思想。西汉武帝之前，法家是占上风的，那时女人的性生活很自由。你知道吗？那时女人可以有面首，就是男妾，男的小老婆啊！吕后这个人不简单啊。刘邦死后，她基本上铲除了那些居功自傲的将领，把领导班子保持下来了，才有后来的文景之治。我们现在的路线斗争，是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继续。现在就有大儒，称病不出，就像韩信一样，关键时期住进了医院。所以啊，我们评法批儒就是要打倒守旧的儒，让改革的法家上台。"

6月初，江青带着讲话稿来到天津小靳庄，这是江青抓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的一个点。江青在这里不抓生产，却要大家放下锄头开赛诗会，报纸上很是吹了一阵。江青来到小靳庄，大吹了一通吕后，大骂了一通现代的儒，暗示大家："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要知难而进。"

江青在天津讲话后，"四人帮"赶快布置许多人吹风，由于前面烧荒受了批，他们不敢公然传达江青的讲话，就让一些亲信四处吹风，说江青的天津讲话对当前运动提出了新问题。这时，国务院科教组，也就是"四人帮"的大将迟群召集梁效、罗思鼎这些写作组的成员和顾问在北京召开注法会议。姚文元把这些人召来，面授机宜："要把会议开好，不仅要注释法家著作，而且在政治上要有积极的成果，要开成一个白虎观会议。"这些梁效们拼命攻击周恩来领导的复兴教育的工作是回潮，但他们自己却利用职权弄来了许多资料，还聘请了一些史学家做顾问。

所谓梁效，乃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织的两校联合写作组，取两校的谐音名为梁效。罗思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名称，大概是“螺丝钉”的谐音。这是“四人帮”控制的两个主要的写作组，一南一北，互相呼应，梁效的地位又高于罗思鼎。这个写作组由迟群直接控制，直接听命于“四人帮”，因此梁效的文章一出来，全国大报马上转载，小报紧着和大报对宣传口径，形成了小报抄大报，大报看梁效的怪现象。

梁效们听了姚文元的指示后，赶紧准备着开20世纪70年代的“白虎观会议”。白虎观会议是东汉时期汉章帝于建初五年开的一个会议。是年，汉章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写成《白虎通议》，独尊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姚文元开“白虎观会议”，当然不是为了独尊儒术，而是要独尊吕后，抬当今女皇江青上台。

“白虎观会议”期间，江青、张春桥连连发出指示，康生也不时启发、引导，结果这个“白虎观会议”成了一个“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会议。会议的《情况简报》既不送中央，也不送毛泽东，单等着骂大儒、抬吕后的那些材料搞好后，在报纸上连连发表，逼中央表态，让江青上台去除掉那些“彭越、韩信们”。

毛泽东虽然重病在身，但知道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开“白虎观会议”；也有情报说江青打着毛主席思想的宣传员的身份到处给部队、单位送材料，引起了这些单位的不满；社会上也风言风语。他想提醒江青，正巧江青求见，毛泽东让她进来。江青进来问了问病情，就向毛泽东告起状来：“主席，总理住到医院里，不好好治病，成天找邓小平、李先念这些人谈话，我看是迫不及待地想代替主席。”毛泽东心里有数，一针见血地驳斥道：“我看不是总理迫不及待，而是你迫不及待。”一句话说得江青哑口无言。

江青走后，毛泽东感到有点口渴，张玉凤端来几块西瓜喂给他吃。毛泽东吃后心里舒服了许多，对张玉凤说：“以后江青求见，再不要放她进来了。”张玉凤为江青求情：“见见何妨，人家老太婆怪可怜的。”毛泽东叹口气说：“我给她说了很多话，她是根本不听不执行。到处出风头，树敌过多，见她何益?”

毛泽东躺下，让张玉凤为他念诗。张玉凤近来和毛泽东谈今论古，学识有所长进。她顺手拿起一本毛泽东爱读的诗读起来：“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说：“停一下，我问你个问题。刘邦死后，吕后为什么掌了权?”张玉凤猜测道：“大概是儿子小，当妈的疼儿子，就得帮一把吧。”毛泽东说：“这你是听别人说的吧？哼，还不是梁效的那一套。我告诉你吧，刘邦在世时，还有个小老婆戚夫人，长得很漂亮，刘邦很爱她，想把戚夫人的儿子立为太子。吕后听到后，就把商山四皓，就是四个老头儿请来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师。这四个老头儿名气大得很，刘邦都怕，只好对戚夫人说，人家已经结成帮派，不能动了。结果刘邦死后，吕后的儿子当了皇帝，这就是汉惠帝。可是汉惠帝太怯弱，吕后就专了政。”张玉凤近来老听人说吕后吕后的，她只知道吕

后是个法家，还不知道吕后有这样的手段，好一会儿没有吭声。毛泽东猜出了她的心思，又说："怎么样，又叫人家给哄了吧。吕后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她掌了权，是怎么对待戚夫人的呢?"毛泽东停下话头，让张玉凤猜。张玉凤猜不出，毛泽东说："她把戚夫人挖了眼，弄成哑巴，砍掉腿、胳膊，放到厕所里，让人来看'人猪'。"张玉凤听了，顿时毛骨悚然，她真怕江青当了女皇后，也把她们这些主席身边的护士、秘书变成"人猪"。

毛泽东又说话了："现在有人想学吕后，也拉个四人帮。你去给他们说，叫政治局的委员们过几天到我这里开个会，我有话说。"张玉凤问："几号呢?"毛泽东想想说："7 月 17 日吧。"

7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来到游泳池开会。议了几件事后，毛泽东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停停又说："我今天正式宣布，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政治局委员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江青又是"哇"的一声哭起来跑掉了。毛泽东板着脸问："洪文、春桥、文元呢?"三人都答应了一声，毛泽东警告他们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当众批评了"四人帮"，王、张、江、姚情绪低沉。回到钓鱼台，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秘书把罗思鼎的大头目叫来密议。姚文元担心地问罗思鼎："春桥给你们批的东西，你们都保存着吗？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我给你们批东西还是很注意的。"张春桥提醒说："国外敌人的报刊上，老是说你们办的《学习与批判》里登的文章是影射那个人的，这个问题你们要注意一下。"罗思鼎问道："那还要不要批儒评法?"张春桥头一摆，坚决地说："要！继续搞，怕什么，大不了杀头。将来要杀头，也先杀不到你们头上，无非是先杀我，我这颗头本来早该杀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姚文元胆气也壮了一点，教训罗思鼎说："要好好学习春桥同志的革命坚定性。我和春桥从写批《海瑞罢官》那时起，就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了。现在我们的形势比那时好了多少倍，要有信心。你们放心，不会有事的。亲不亲，一家人嘛！"姚文元说着还把大拇指往上指指。

罗思鼎明白姚文元的意思。姚文元说："你明白就好，你们写文章，一要注意高度评价吕后。吕后当政时期，政治清明；二要注意研究文景之治，吴王刘濞清君侧的两面经验都要研究；三要研究康熙平定三藩的经验。"

几个人商量了一番后，又一起去看江青。江青早已不哭了，一见罗思鼎，亲热得不得了，用上海话和他拉了几句家常，对他说："你们的'白虎观会议'开得好啊！这是'八七'会议，我们是在斗儒，'八七'会议时是主席同陈独秀斗。"

"白虎观会议"结束后，罗思鼎回去独出心裁地写了一个故事登出来。过

了几天，姚文元拿着一个剧本兴冲冲地来找江青，江青说："文元，什么事这么高兴?"姚文元把剧本递给江青说："江青同志，你看这个剧本写得多妙!"江青接过剧本问道："谁写的?"姚文元说："就是洪文在浙江的那位战友。"江青冷笑道："他就会砸玻璃，哪里会写剧本?"姚文元说："你先看看嘛!"

江青打开剧本一看，原来是个以秦代为背景，描写农民和儒生斗争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周理的儒生。农民甲喊道："赵高，周理他们又要搞井田制，我们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又要当奴隶做马牛。"农民乙喊道："为什么坑得这么少？为什么不把周理一道坑?"江青看完剧本，感到真痛快，继而惋惜地说："洪文的这个把兄弟文化水平还是低了一点，落字不少。'周理'中间的'总'字都给落了。"姚文元赔着笑说："那我们不是又得挨批了吗？他能写明是周总理吗?"江青被提醒，顿然醒悟，才知刚才自己恨迷心窍，忘记了现实，赞叹地说："这个剧本写得真巧，有意思，像这样的东西可以多写些。"

江青和她的那些同党密友抗拒毛泽东指示，继续拉帮结派，猛吹吕后，这且按下不表。且说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以后，看夏至已过，又是立秋，不禁怀念起少年时代在湘江橘子洲头与萧三、蔡和森等人游玩的情景。他清晰地记得，那时他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每到秋天来时，他总爱和新民学会的一班朋友来到橘子洲头游玩。这时酷暑已过，秋凉可人，站在湘江中的第一大岛橘子洲头远眺，只见岳麓山一带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再俯视湘江，只见江水北去，百舸争流。大家都是一些胸怀大志改造中国的青少年，望着这大好河山，不禁慷慨悲歌，赋诗抒怀，纵论天下，把酒临风，经常是湘江里银光点点，月明星稀时才回学校去。

毛泽东近来容易动感情，特别是回忆起当年那些豪歌壮举时，不禁泪水涟涟。金风动乡愁，毛泽东是个活生生的人，也未能免俗，便由张玉凤陪着，坐专列到了长沙。

在长沙城，毛泽东登上了橘子洲。他的一只眼患白内障已失明，一只眼还能看得见东西。在橘子洲头，他极目远眺，依旧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俯视湘江，也依旧是江水北去，百舸争流。但蔡和森呢？夏曦呢？向警予呢？他们都在哪儿呢？逝去的少年时代还能回来吗？

张玉凤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感受，她担心毛泽东受凉，把他劝回宾馆。

宾馆的桌子上有一封电报，是王洪文、邓小平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不吭一声，几十年前和周恩来在李大钊家客厅里初次相会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回忆着，眼里流出了泪水。他明白，自己和周恩来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了。百年以后，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事业谁来继承呢?

江山靠谁守？毛泽东数来数去，只有邓小平雄才大略，威高望重，堪当此任。他对张玉凤说："总理病重住院，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得有人主持。你给他们说说，我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

江青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又急又恨，深感在自己通往女皇的道路上又多了

一层障碍，这时又恰值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紧张地筹备中。这次大会要对政府职务进行安排。谁进国务院，谁不进国务院，意味着谁握实权，谁不握实权。江青着急，张春桥也着急。江青想在这次大会上由她作政府工作报告，组阁当总理。张春桥想由总政治部主任升为国防部长掌握军权，王洪文想当总参谋长。“四人帮”明白，要实现野心，必须先把江青推上去组阁。要把江青推上去，就得把周恩来推下去，直接推周恩来不好办，先推邓小平，他刚刚复出，主席还不太放心，好推些。

但是，推邓小平总得有个借口啊，恰好此时，新华社送来了1974年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江青一看大喜，终于找到一块大石头了。

这一期《国内动态清样》写的是什么事呢？原来是有关“风庆轮”的一篇报道。“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新造的一艘万吨轮，轮船下水后，首航罗马尼亚，把1万2千吨大米运到该国后返航到上海港，航程3万2千海里，共在大海上航行了150多天，9月底返抵上海港。

这条船在航行中，由于远航的需要，也装备了一些从国外进口的仪器，这实在是一件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国外大部分造船业，为了节省经费，缩短工期，保证质量，基本上是互相合作的，你造船身，他造主机，我造仪器，专业化的分工使他们的工艺水平越来越精湛。中国由于过于强调什么都要是自己的，工艺水平又上不去，在这种情况下，船上装一些进口的高级仪器又有什么不好呢？须知，在风浪滔天的大洋上，大自然的魔眼只认质量，可不管你是什么精神，什么主义。

但是，让极左思潮弄昏了头的一些船员和工人都反对这样做，理由是，堂堂中国工人阶级造的大船，为什么要安装外国人造的仪器。这纯粹是无理纠缠，要照这个道理，根本不需要造船，因为堂堂工人阶级造的大船应该航行在堂堂中国的领海上，为什么要跨洋在别国的领海上航行呢？更不应该从国外进口大型客机了，堂堂的中国工人阶级怎么能坐外国大老板公司造的飞机呢？

当时国务院派到“风庆轮”上的李国堂副政委批驳了这些谬论，毅然率“风庆轮”远航。于是有人就告了状，说李国堂是资产阶级买办。新华社记者了解此事后，写了篇内参，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这个刊物是新华社办的一个特殊刊物，专登一些国内重大动态，只印20多份，报送中央政治局。

江青完全理解这件事，她也知道国外的一些工业产品比中国的要先进。她本人特爱洋货，不仅许多日常用品是进口的，就连看的电影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她闹了半天文艺革命，弄得全中国八亿人民八台戏（样板戏）。其他戏剧、电影一概没有。江青把自己窃取别人作品搞出来的样板戏吹上了天，但回到房里，很少看样板戏，看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电影和录像片。

但是，为了找一块大石头，江青无题找题，开始大闹起来。她拿出笔在《清样》上写道：“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部？交通部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江青唯恐此事闹不大，又向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也都一个个批示起来，把“风庆轮”事件说成是路线问题。王洪文批的更邪乎，把李国堂扣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揭发批判。

邓小平也看到了这份《清样》，到底事件真相如何，当然还得调查，他不赞成江青的意见，因为他得对“风庆轮”负责，为远洋轮船上的船员和旅客负责。

10 月 17 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江青一下子把“风庆轮”事件端了出来。她把《清样》拿出来，逼着邓小平表态：“你对这个事件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复出后，对江青等人一直很客气，这时他耐着性子解释：“我已圈阅了，对这个问题总得调查一下。”江青吼叫起来：“你就是对新生事物不满意。你现在必须表明，你对批洋奴哲学是赞成还是反对？有人把美国的仪器都安到大庆去了，丢中国人的脸，这事你不知道？”邓小平见江青无端发难，恨不得把自己吃了，像这样，政治局会议还怎么开。他再也受不了这位三流演员的气了，拍案而起，怒斥江青：“你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

会议叫江青搅得开不成了，邓小平拂袖而去。张春桥包藏祸心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江青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召到她住的钓鱼台 17 号楼，商议对策。几个人从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说起。江青一拍桌子嚷道：“老娘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邓小平和我吵，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啊！我早就看出来，他反对文化大革命，他的检查根本是假的。可是，他为什么早不吵，晚不吵，非要这个时候吵呢？”张春桥吸着烟，悠悠地说：“大概是觉得主席提他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有本钱了吧。他现在跳出来，也与四届人大有关，想当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江青咬咬牙说：“美得他！所以啊，现在咱们不能等着，要斗争。不斗，四届人大一开，大儒当总理，二儒当第一副总理，又兼上总参谋长，那我们可是白干了一场。”张春桥不慌不忙地说：“斗？怎么个斗法？光这样吵不行，关键是要让主席知道这个情况。”

王洪文半天插不上话，这时毛遂自荐地说：“我去，我到长沙找主席谈谈去。”张春桥一喜，赞许说：“洪文去最好。”江青催促道：“要去就赶快去，立刻去。过两天邓小平就要陪外宾去见主席，一定要赶在邓小平前面。”王洪文说：“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王洪文坐着进口的美国制造的波音客机（专机）飞到长沙，张玉凤把他领到毛泽东的书房里。王洪文问候道：“主席，身体还好吗？”毛泽东淡

淡地说："还不是老样子。你来有什么事啊?"王洪文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委员，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文元、江青和我开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风险来的。"

毛泽东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问王洪文："到底是什么事呢?"王洪文做气愤状说："还不是风庆轮的事？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邓小平管管这个事，邓小平拖着不答应。江青同志提议要批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邓小平不但不同意，反说江青强加于人，无法合作，扔下大家走了。看来邓小平还是以前那一套，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我们四个猜测，邓小平有这么大的情绪，可能与四届人大酝酿总参谋长有关。"

毛泽东仍然没有表态，反问起周恩来的病来："总理病情怎么样？有没有好转?"王洪文诡秘地说："总理好像忙得很。他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经常谈到深夜。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诸同志，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他们去得这么频繁可能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系。江青、春桥、文元他们担心得很，怕出事，他们等着我回去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听着听着，脸色阴沉下来，他最见不得的就是拉帮结派，林彪事件给他的教训太深刻了。王洪文汇报完，毛泽东不客气地训了他一顿："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谈，有意见当面谈，这样搞不好。你要多注意，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

王洪文顿时如一盆冷水浇下来。回到宾馆以后，中办的人通知他，就长沙告状事必须向主席写出检查。王洪文无奈，只好在长沙写检查。

邓小平并不知道王洪文已去长沙告状，通知王海容、唐闻生随他去长沙陪同主席会见外宾。突然江青把王唐二人找去，二人来到江青住的 10 号楼，江青对她们又热情又客气，让茶端糖，虚情假意地亲热了一番才提到正题："主席不久要在长沙会见外宾，你们俩一个是礼宾司副司长，一个是美大司副司长，自然得去。所以找你们来谈一件重要事情，希望你们向主席报告。"

王、唐这两位三十出头的姑娘明白了，原来是江青要她俩利用经常陪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向主席告状。告谁呢？她们饶有兴趣地听下去。这天正是王洪文飞到长沙的中午，江青还不知道王洪文告状碰钉子的事，对王、唐说："昨天，也就是 10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风庆轮问题。小平同志借故和我吵，扬长而去，使政治局的会议无法开下去。总理在医院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经常到他那里去，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串联，小平、总理、叶帅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他们就像林彪 1970 年一样搞篡权活动，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

王海容、唐闻生听着暗惊，没想到江青告的是总理、邓小平、叶帅，她想把政治局一锅端啊！王海容、唐闻生虚与委蛇，假作答应下来。

过了半天，王洪文从长沙回来了，他没有找周恩来、叶剑英汇报，而是一

头扎进钓鱼台，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禀报了他的长沙之行。江青等万没料到毛泽东没有去怪邓小平，反而斥责了他们，半天无语。江青站起来说："不行，还得去干！风庆轮问题告不成，就告他们进口设备，造成贸易逆差。叫王海容、唐闻生去告。"张春桥点点头说："我赞成，既然告开了，就一定要把他们告倒。"

当天夜里，"四人帮"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张春桥给他们讲了半天国内财政收支困难和贸易逆差增大的情况，他不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破坏造成的恶果，反而倒打一耙，恶狠狠地说："这都是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的。"

张春桥讲完，江青鼓励王、唐二人："你们到主席那里把这些情况反映一下，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王、唐二人满口答应。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到了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他们的谈话。周恩来默默地听着，最后才说："这是他们四个人商量好了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找事同小平同志闹，小平都忍了，现在是忍无可忍。"唐、王二人记住了周恩来的这些话，10月底陪同外宾去长沙时，把周恩来的话都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脸色很难看，对唐、王说："一个小小的风庆轮事件算什么大事，先念已经去调查了嘛，怎么江青老纠缠个没完没了，还这么闹。她有野心，想组阁，你们不要理她。小平敢顶江青，说明小平思想性强，我还要他担更大的担子呢。文化大革命搞了八年，该结束了，国家要稳定了。"

讲到这里，毛泽东又问唐、王二人："你们说，文化大革命应该如何评价？"唐、王二人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成绩很大。"毛泽东又问："怎么，就没有一点问题？"唐、王二人不敢回答。毛泽东伸出三个指头："我说三七开，你们同意不同意？把我的话传给小平同志，总理也快来了，我也要对他说，三七开吧。"

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周恩来准备去长沙报告四届人大筹备的情况。已是12月下旬了，三九寒天。周恩来动过手术后身体十分虚弱，为保证周恩来病情不出问题，卫士、秘书、医生、护士一起研究了多种防护措施，组成了强有力的医疗小组随机前往。

12月24日下午1时，周恩来的专机从北京起飞，2时到达长沙。周恩来问前来迎接的人："王洪文到了吗？"接待的人回答："在北京，还没起飞。"原来毛泽东是通知王洪文一起来的，王洪文因为睡过了头，直到晚上7时，才飞到长沙机场。周恩来同他会了面，一起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是下午就要听汇报的，却被告知王洪文在北京睡觉没来。毛泽东很生气，对王洪文再不抱一点希望了。当周恩来汇报了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就批评起王洪文来："你们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江青有野心，不由她组阁。总理仍然是总理，四届人大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

毛泽东看看周恩来苍老而清瘦的面容，补了一句："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

难得。我提议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政治局讨论讨论吧。”

王洪文眼瞅着邓小平掌握了实权，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可怜巴巴地望着毛泽东：“还有我呢。”但毛泽东看也不看他。汇报结束时，毛泽东说：“恩来再住几天，我还有话呢。”

周恩来在长沙住了下来，情绪很好。12 月 26 日那天，周恩来把秘书、医生、卫士请来，宣布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我请大家吃饭。”秘书问：“都请谁呀?”周恩来手一划拉说：“就是住在这楼里的人，再加上省里的，军区的同志，还有那两位小姐。”秘书明白那两位小姐是王海容、唐闻生。秘书想到蓉园宾馆3 号楼还住着王洪文呢，请示总理：“请不请王洪文?”周恩来脸一板说：“不请!”

王洪文得知周恩来请客没有请他，冷笑两声，咱们走着瞧吧。他想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整周恩来的办法。

究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一回 持真理烈女断嗓 悼元帅总理安魂

话说王洪文去长沙告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此年年底，王洪文和周恩来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因贪睡晚起，误了钟点，又挨了毛泽东一顿批评。毛泽东听完总理的汇报后，当场批示由周恩来任总理组阁，“四人帮”妄图由江青组阁的梦想全部落空。

受此打击，王洪文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心生一计，准备向总理再下毒手。回到北京后，他立即一头扎进钓鱼台，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长沙之行。江青等人听说四届人大还由总理组阁，邓小平要正式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国务院除了张春桥要担任副总理外，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一概无缘，不禁暴跳如雷。王洪文诡秘地说：“我们应该尊重主席的决定，积极支持总理的工作。主席这次在长沙说了，要我们不要跟着江青批东西，那我们就不批了，请总理来批吧，这样总行了吧。”张春桥笑着点点头说：“很好嘛，我看总理那里，就请洪文多请示，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我呢，就照主席这次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文元呢，就抓批经验主义吧。”江青拍着手称赞道：“春桥就是点子多，你就是我的萧何和陈平。”四个说笑一阵，分头行动去了。

且说周恩来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后，毛泽东要他不要走，再留两日，他还有事要和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也就没有走。第二天，周恩来得到通知后又去了主席住地。毛泽东招呼说：“坐吧，我的腿也站不起来了，不能迎接你了。”周恩来诚挚地说：“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要主席健康，就好办了。”毛泽东没有说话，定定地瞅着周恩来，过一会儿才问：“恩来啊，我上次提议，颖超同志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你为什么给勾了呢?”周恩来回答说：“主席，这样做对大局有好处，她是理解的。”毛泽东摇摇头：“这不好，老同志了嘛，又是女同志。”周恩来笑笑没有说话。

毛泽东叹息一声：“要是全党都能这样要求自己就好了，不可能啊。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还是要加深学习噢，学点马列主义。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周恩来听着主席的谈话，掏出两粒药片吃了下去。毛泽东关心地说：“不要逞强了，要好好治病。现在大局已定，小平把担子担起来吧，你要好好治病，我已说过多次。”周恩来感激地说：“主席，四届人大开完了，我一定好好治

病，主席也要多保重啊！”毛泽东又叹口气：“文化大革命，八年了，没有经验，新生事物，总是有缺点的，三七开，就三七开吧。现在应该抓抓生产了，要安定团结。”周恩来也不禁疲惫地叹口气说：“是该安定团结了。”

周恩来从长沙回来后，就主持召开了四届人大，这已是1975年的1月了。四届人大于此年1月13日开幕，1月17日闭幕。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了《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选举朱德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通过了国务院人选，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副总理和大部分部长都由老同志担任，“四人帮”进入国务院的，只有张春桥（副总理）。另外，江青的亲信于会泳担任了文化部长，仅此而已。关键性的一个部——国防部部长由叶剑英担任，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公安部部长则由新调到中央的原湖南省委书记、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担任，华国锋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布，到本世纪末，国家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八亿中国人民的这一心愿。

也许是由于累的吧，周恩来近来总是感到消化不好，大便不畅。四届人大闭幕后，他又住进301医院。医生对他做了食钡检查，其他部位没有异常，但在大肠内接近肝的部位发现一个核桃大的肿瘤，如果这个肿瘤扩大，必然堵塞食道。

钡餐透视结束后，周恩来问医生们：“你们都发现什么了？”医生们低着头不敢回答。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要告诉我真实情况，我要安排工作，你们老瞒着我，是会误事的。”医生们无奈，只好告诉他，在大肠接近肝的部位发现肿瘤。周恩来顿时明白了，这个病位正是40年前长征经过草地时患肝浓疡病的位置。当年此病穿肠后便痊愈了，没想到40年后又长出了肿瘤。推究病因，是进城后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进行根治，又加上气、累而致病变。

周恩来把自己对病变的分析对医生们说了，医生们深以为然。既然知道了病根，很快研究出了治疗方案，准备手术。但是周恩来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十分虚弱，先得输液，否则，经受不住手术。

医生们开始做术前的准备了，但周恩来病床前堆着如山的文件要他批，姚文元甚至把报社通讯员送来的错字连篇、狗屁不通的稿子也堆在周恩来病床前让他修改。周恩来命令秘书：“给他们说说，以后文件都送小平那里去，现在小平负起责任来了嘛。”

周恩来讲了话，“四人帮”不好再往他这里送文件，可他们又怕矮壮深沉的邓小平，不敢刁难他，王洪文想用周恩来病重钻空子搞阴谋的想法落空了。

但是，王洪文并没有甘心，在同江青商量后，动不动一个电话打到医院，要周恩来亲自主持参加会议。周恩来知道他们是故意捣乱，但他想在临死之前把一些问题理顺，好让邓小平工作起来更方便些，也就拔掉输液的针头去参加会议。

这天，王洪文又打来电话，要周恩来立即参加江青主持的一个会议，医生们告诉他，总理正在输液，王洪文蛮横地下令："输液也得来。"周恩来毅然拔下针头，对秘书说："调车。"

到了会议室，只见"四人帮"说说笑笑，并没有什么事要议，周恩来扭头就走。江青追问一句："总理，我们批孔批了半天，你是什么态度啊?"周恩来冷冷地说："五四运动时期我们就已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一句话噎得江青说不出话来。邓小平知道此事后，立即把"四人帮"的活动报告了毛泽东，同时下令政治局委员不得再干扰总理养病，需要开什么会由他通知总理。江青怕邓小平，也不敢再随意跑到总理那里去闹，这且按下不说。

且说江青被周恩来狠狠地刺了一句，想撒泼，周恩来已坐车走了。她又故伎重演，大哭起来。姚文元奇怪地说："总理过去都是逆来顺受，很少刺人，今天怎么厉害起来了?"王洪文幸灾乐祸地说："你们不知道，总理的肝部又发现了癌，医生都说还有一年。"姚文元恍然大悟："怪不得呢，肝火旺盛啊。"江青又嚷起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张春桥看看表，笑着说："咱们这伙四人帮啊，我得退席了，去给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无产阶级全面专政问题。"江青吩咐道："春桥，你要讲透，不杀一批，他们不知道老娘的厉害。"张春桥拎起皮包说："这个任务我包了。文元，你的批经验主义得赶快上马啊!"江青嚷道："对，快上马，总理就是经验主义的代表。"

张春桥在全军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传开，全国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本来，"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制造了无数的冤案，冤狱遍及全国。全面专政之说一出，更是警笛长鸣，人头滚滚。其中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批斩张志新一案，可说是奇而又奇，冤而又冤。

张志新是怎么入狱的，前文已经备述，这里不再重复。且说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在盘锦干校被捕后，立即被关进盘山监狱。来狱不久，法院的法官即来到监狱对她进行审讯。张志新穿着黑的囚衣，被带进审讯室。审讯员照例问道："姓名?"张志新没有回答，审讯员提高嗓门问："姓名?"张志新掠掠头发说："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不可以用对待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

法官几次讯问，张志新每次都拒绝回答审讯。法官无奈，只好说："你不回答也行，那你就谈谈，到这里来以后，有什么想法，对个人问题怎样认识?"张志新说："9月24日批斗后逮捕了我。我认为，我的言行不构成犯罪。"法官问道："你始终以为没有犯罪，始终不认罪，劲儿到底别在哪里?"张志新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说的都是事实，是真理，我没有向任何人乱讲，包括我的爱人，我是按照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向党讲心里话，这是党章的要求，也是党员的权利，怎么会是犯罪。"

法官默默地听着，他把党章、律法的条文想来想去，觉得张志新确实构不成犯罪。因为党章上没有一条条文规定一个党员对另一个党员在组织内提出批评是反党大罪。律法也没有条文规定说一个公民对另一个公民提出批评就构成

犯罪。反之，党章上一再强调党员有权向组织反映自己的想法，律法也强调公民有言论自由。这位法官想来想去，确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党章和律法的尊严，便在张志新的审讯结论中写上了自己的判断："张志新纯属思想问题，构不成犯罪，无法判刑。"

张志新一案是毛远新直接抓的，这个结论自然要送给毛远新看了。毛远新一看，拍案大怒："好嘛，张志新这么猖狂，把审判员给拉过去了，这是反改造，要严加管制。这个审判员已经站到阶级敌人立场上去了，马上给我撤下来，送农村监督劳动。"

此令一下，地动山摇，盘山监狱马上加强了监管，给张志新上了背铐。新来的法官虽然熟悉党章、律法，但有了前车之鉴，他也不敢书生气十足了，一来到监狱的审讯室，就声色俱厉地审讯起来："张志新，你为什么猖狂地反对林副主席？"张志新针锋相对地回击道："这是我的看法，这不是反革命行为。"法官一拍桌子："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党、反革命！"张志新反问："党章上哪一条规定一个党员批评另一个党员是反党、反革命？"法官一拍桌子，喝道："你不要党章、宪章的，现在是按公安十条办罪！"张志新问道："那宪法、党章还要不要？"一句话问得审判员说不出话来。

审讯结束后，张志新回到狱房。高墙黑影，云重星稀，镣铐铿锵。张志新夜不能寐，用戴铐的手写诗言志。她先在纸上写下三个大字"谁之罪"，"文革"以来国家民族及个人的悲惨遭遇一齐涌上心来，她在纸上悲愤地写道：

在漫长的岁月里，
在尖锐的斗争中，
夺去党的具体领导，
她可知怎么行？
呼唤没回应，
喉干泪水尽，
在战友的带领下，
她锻炼成长，
红心献革命，
永不忘誓言！
为真理而奋斗，
誓死捍卫党。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人?!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人?!

张志新是天津一个知识分子的女儿，父亲酷爱音乐，张志新姐妹三人受父亲影响，也都酷爱音乐，能曲善奏，妹妹张志勤后来还成为专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写完《谁之罪》，张志新为这首诗谱了曲子，轻轻地哼起来。

法官捧着张志新写的《谁之罪》和“万言书”，手在发抖，心在激跳。他心里明白，当今天下的人谁不在骂秦桧和妲己，人们只是敢想而不敢怒，更不敢言，张志新却敢想，敢怒，敢言，一次一次向秦桧和妲己投去了投枪和匕首。他的良心被感动，毅然违背上头要判张志新无期的旨意，判了她 15 年徒刑。

这次的判决案卷没有送到毛远新手里，因为辽宁省政法部门知道这样的判决送上去只会受到毛远新的申斥。政法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亲自来到盘山，想亲自审判，被张志新训了一顿，他恼怒地责令法院从严判决，推翻原判，判处她无期徒刑。

1970 年 10 日 26 日，被判无期徒刑的张志新从盘山监狱转到沈阳监狱，5 年的铁窗生涯没有销蚀掉她的斗志，于是，一份新的张志新案情报告送到了毛远新的办公桌上。

1975 年的 3 月，关内已是桃红杏白，但关外的沈阳城却还是寒冷的冬天，毛远新的办公室里暖气开得很足，他呷着香茶，审视着报告，脸上的杀气越来越重……

原来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后并没有屈服。她被转到沈阳监狱后，用每月仅有的两元零花钱买了几十本马列著作和毛选。没有纸张，她就在手纸上写读书笔记，批判极左思潮。1970 年 12 月 25 日，是她入党 15 周年纪念日，她在手纸上写下了《迎新》，诗曰：

十五年前的这一天，
我庄严地宣读了誓言，
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为人类解放而献身，
十五年后的这一天，
我严肃地接受党的“审判”，
不是我违背了誓言，
也不是党来把我屈冤，
为什么还没有落案？
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
追求真理，坚持战斗，
奔向党指引的航线。
驾驶起生命的航船。
铲私根，战恶浪，永向前，
勇敢地去接受考验，
用胜利去迎接春天。

写完，她用仅有的一点白纸做成小白花，又用床栏的紫红颜色弄了一点红水，把纸花染红，打开藏在身边的党章，让党旗露出来，然后把党旗放在桌子上，摆上小红花，对党宣誓，永不违背入党誓言。她轻轻地哼起国际歌："要为真理而斗争……"

毛远新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份案情报告，越看越恼，此人怎么这么顽固，林昭、遇罗克、史云峰这些人的案情比她的轻得多，但都被处决了，张志新这么顽固，她就不想想后果，不想想丈夫和孩子的命运，怎么办呢？是杀还是不杀？

毛远新在办公室考虑着张志新的案情，想到了中央上层的斗争。四届人大一开，邓小平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兼第一副总理，江青、王洪文、姚文元被冷落了。他清楚，自己的命运是和"文化大革命"系在一起的，"四人帮"倒了，自己也得下台。想到这里，他更清楚了张春桥宣讲全面专政的深意。是啊，不把那些走资派的社会基础扫掉，他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容易的事。要杀，要开杀戒！

主意已定，毛远新把省政保部门负责人召来，指着案卷问道："张志新这么猖狂，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负责人回答："能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不能采取的措施也采取了，上重铐、背铐、关小号、延长工时。"毛远新摆摆手："不要说了，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你们还对她这么仁慈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毛远新一声令下，专政机器迅速运转起来。4 月 3 日，张志新被带到审讯室，法官宣布：改判张志新死刑。张志新拒绝在审判书上签字，法官也不管她，立即招来几个警官，给她戴上背铐，带入一间囚室，把她锁在一根铁钩上，带来 4 名女犯围着她，警察持枪在屋内外警戒，这是决囚前的例行监护措施。

张志新被锁在铁钩上，浑身不能动弹，被多次刑讯和凌辱过的身体虚弱不堪，但她头脑异常清醒。她早陪过法场，在今晚诀别人世的时刻，她心安理得，只是想起幼子、弱女和白发老娘来一阵心酸。

待决室外面来了一队警察，他们进了房，把张志新从铁钩上解下来，挟着出了囚室。张志新以为是深夜处决，想喊叫抗议，却被一只大手捂住嘴。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她押往刑场，而是把她带到了小楼上的一间房间，房间里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等着。这些人把张志新推进来，仰面按倒在一张矮床上，死劲地压住她身体的各个部位，一个穿白大褂的手里拿着锋利的手术刀，切开张志新的喉部，一刀割断她的声带，几针缝合了伤口。警察一把把她拉起来。伤口疼得要命，张志新大声喊叫，却没有一点声音，人们只能从她张合的无声嘴巴上看到她在抗议。

第二天凌晨，张志新被推上囚车。上午 8 时，囚车离开沈阳监狱驶向刑场。上午 9 时，囚车在刑场停下来，张志新被推下车，一声枪响……

毛远新把张志新的案卷调去审查，他翻看着现场照片，见被处决后的张志

新脖子上缠着一条黑带，奇怪地问："这是什么?"政法部门的那位负责人回答说："临刑前，怕她进行反革命宣传，就割断了她的声带。处决后拍照时给她脖子缠了块黑布，掩盖掩盖。"毛远新摆摆手："不要说了。我很快要去北京，你们要把工作做好。"

毛远新要去北京干什么，这位政法部门的负责人是不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是机密的任务。

毛远新离开沈阳，坐飞机到了北京，下了飞机直奔游泳池，毛泽东欣喜地接待了他："你在外面锻炼一个时期了，现在该熟悉一下中央的事情，先给我当联络员吧。第一件事情，你告诉邓小平，贺龙的追悼会可以开，悼词我也同意。"

毛远新答应一声，通知中央政治局，贺龙的追悼会可以开了。姚文元是管宣传的，谦和地，甚至是谄媚地望着毛远新："主席说没说要报道?"毛远新摇摇头说："主席没讲。"姚文元说："那就不发消息了。"

6月9日，贺龙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毅然拔掉针头，要去参加追悼会，医生劝阻他说："总理，你站都快站不起来了，哪还能去?"周恩来叹口气说："同志们，你们不知道啊，1927年大革命失败，多少人都往蒋介石那里跑。贺龙同志是军长，不去升官发财，毅然把自己的队伍交给党，参加领导南昌起义，这样的好同志硬是被活活整死，我难过啊！我没有保护好贺胡子，心里有愧啊!"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前，已经来了一些人，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突然，一辆大"红旗"轿车驶进广场，人们马上认出来，这是周恩来的车。总理来了！人们一下围了上来。周恩来从车上下来，人们一看不禁呆了，总理简直瘦得不成样子，过去很合体的制服，如今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大家难过得低下了头。

周恩来一下车，无暇顾及其他，就问："薛明呢？薛明同志呢?"工作人员领他穿过走廊，到薛明休息的房间去。周恩来一边走着，一边悲痛地喊着："薛明？薛明啊!"薛明闻声迎出来，抱住总理哭了起来。周恩来歉疚地说："薛明啊，我是来向你检讨的，我没有保护好贺胡子啊!"薛明哽咽着说："总理，你别说了，你比谁都难，看，都病成这样了。你要保重啊!"周恩来摇摇头说："没有用了，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人们闻声大哭起来。周恩来向司仪说："今天我来致悼词。"薛明担心地问："总理，你的身体……"周恩来叹口气说："贺龙同志把一切都献给了党，难道我还不能为他致致悼词吗?"

追悼会开始了，司仪喊道："三鞠躬。"周恩来随着司仪的指挥，恭恭敬敬地向贺龙遗像三鞠躬。人们鞠躬完了，周恩来还在鞠躬，一共七鞠躬才停下来，泪水早已浸湿了他的衣襟。

司仪宣布："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

周恩来用发抖的手拿着悼词开始念起来，不，是讲起来。对于贺龙，周恩来是太熟了。在他的眼前，闪过了北伐时的铁军旗，南昌起义时的总指挥部，洪湖里的红旗，会宁城下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令周恩来遗憾的是，他一直暗暗地予以保护和同情的彭德怀元帅刚死不久，连个追悼会都不能开。元帅英魂，不能安息。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二回 毛远新联络吹冷风 邓小平整顿遭大忌

话说周恩来开完贺龙的追悼会后回到医院，病体更加沉重。这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又开始大批经验主义，大评《水浒》，大批“投降派”，宣称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迫使周恩来不能安心养病，他得时刻提防着“四人帮”射向他的明枪暗箭。就是在这样的严重时刻，周恩来仍然操劳着国家大事。

这天，周恩来吃过药，抬头一看日历，已是7月7日。他吩咐护士秘书：“扶我起来，今天我要会见克立总理。”医务人员把他扶起来，给他套上显得宽大的旧制服，拿来了那双特制的肥大布鞋。周恩来在医生们的帮助下，费劲地把肿胀的脚套到鞋子里去。

泰国总理克立是来华签署中泰建交公报的，具体的谈判工作已由克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谈好了，今天到医院是来和周恩来总理正式签署建交公报的。周恩来的手战抖着，费力地在公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服务员端上酒来，克立总理端起了一杯酒。周恩来总理端不住酒杯，由护士帮着举起酒杯向克立总理敬酒，随后他和克立总理坐在沙发上进行了短暂的会谈。周恩来诚挚地说：“克立总理，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入侵泰国。”克立总理感动地掏出一张纸条，探身向前，要周恩来亲手把这句话写下来：“我要把它复印几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的脖子上。让泰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事，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周恩来抱歉地说：“我病得厉害，手发抖，实在写不了。你放心，中国人民从来是说话算数的。”克立总理关心地说：“我充分理解这一点。衷心祝愿总理尽快康复，我将在泰国热烈企盼着您的来访。”周恩来摇摇头说：“我恐怕要辜负总理的盛情了。”克立默然。

会谈结束以后，周恩来硬撑病体，不顾克立总理的劝阻，坚持把他送上轿车。在送别前，周恩来再次对克立总理庄严地说：“总理，我再说一遍，中国永远不会入侵泰国，我们永远是友好邻邦。”克立在车里摇着周恩来的手说：“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我国人民和政府的友好情谊。”

克立总理走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扶着周恩来往回走，新华社摄影记者前后左右地又拍起照片来，这已不是拍新闻图片，记者是想多拍一些总理的图片资料留给人民永远瞻仰。一个工作人员提议：“总理，趁记者

在，请你和我们合影留念吧。”周恩来停住了，神色凝重地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一句话说得人们心情沉重得抬不起头来。原来“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写大标语、大字报时，或翻阅旧照片时，都在被打倒的人的脸上、名字上打××。总理此话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又有一场政治暴风雨要降临了？

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发表后，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了克立总理，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陪同接见。克立总理驱车来到游泳池以后，毛泽东在张玉凤的扶持下迈着僵硬的两腿朝前挪了两步。毛泽东握着克立总理的手，大声地嚷起来。但是，由于他中风后口齿一直不利索，女翻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张玉凤朝夕相伴在毛泽东跟前，她能听懂毛泽东的话，在张玉凤和泰语女翻译的帮助下，毛泽东和克立总理交谈起来。

克立总理礼貌地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反问道：“有什么用呢？唉，几乎每一个来见我并令我欣赏的人回国后都面临灾难。”确实，当时访问过北京的田中角荣、恩克鲁玛、苏加诺等外国政治家回去后都因国内政局动荡下了台，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也面临着被弹劾的危险。

也许是感到会谈的气氛压抑，毛泽东开起玩笑来，他指着唐闻生说：“决不可相信一个美国姑娘。”大家笑了起来。他又指着邓小平说：“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邓小平爽朗地笑了。虽是一句开玩笑的话，邓小平却从中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这个时期，邓小平正在抓整顿。这年5月，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大家把经济搞上去，把理论学好，要安定团结；再次批评江青等人，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他生气地问江青四人：“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5月23日和6月3日，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四人帮”，使“四人帮”有所收敛，为在全国全面整顿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就在全国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邓小平首先开始整顿军队。克立总理于7月上旬返国后，邓小平即和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系统地纠正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存在的种种问题，撤回了“三支两军”人员，端正建军方向，克服军队中的一些不正之风，整编部队。以叶剑英为首，成立了六人小组，专门研究配备军队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军队正在整顿中，邓小平又将整顿的斧头砍向江青在文艺界的一霸天下。“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从文化领域开刀的，这是“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经他们近十年的破坏，文艺界一片萧条，凄凄惨惨戚戚。当时电影界冲破江青的禁令，拍了两部电影《海霞》和《创业》。《海霞》经邓小平同意在全国放映。江青横挑鼻子竖挑眼，骂《海霞》中的人物衣服好，人漂亮，是专挑“大美人”，又给《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禁止放映。此片编剧无奈只好向毛泽东

写信反映情况，毛泽东接到信后把《创业》调去看了一遍，看完后说："此片无大错，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他在信上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由《创业》的问题又引起了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思考。他觉得现在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这个意思他在前几天已经讲了，但由于江青的阻碍，文艺界动得不快。于是毛泽东把批示的信转给中央政治局，希望他们切实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正合邓小平的心意，他召集文艺界有关部门领导人开会，要他们切实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一批刊物和文艺作品解禁。毛泽东对要解禁的刊物和作品提出了个名单，按照他的指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批准举行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纪念演出会，解禁了一批电影故事片，出版了鲁迅著作，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善。

江青对这些变化恨之入骨。因为是毛泽东批示的，她也不敢在政治局反对，但这事老在心里翻腾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没有两个月的时间，她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了。这个机会就是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大寨大队是怎么出了名的，前文已经备述。本来，大寨大队自力更生改变山河的精神令人佩服，可是他们却忘了一条"因地制宜"，不发展林业和畜牧业，单打一搞粮食生产。"文革"一起，由于政治的需要，大寨大队成为一个万能典型。来一个运动，需要什么经验，大寨马上就能拿出一套。最后调用部队、机关人力财力，负责为大寨造小平原，这就使得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开始变馊了。此时大寨大队是全国农业的旗帜，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的县都要建成大寨式的县，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会场设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大厂房里。这个厂房刚盖好，还没有装机床。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等副总理参加了会议。本来没有她江青的事，她却硬挤来参加。邓小平第一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讲话，正式宣布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队伍、文艺进行整顿。

邓小平鼓舞人心的全面整顿的口号在这个集中了全国要员3700多人的大会上正式提出来了。

江青预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对他们的巨大威胁。邓小平讲话时，她不断地插话予以打断。在会议期间，她还跑到虎头山上拿起铁锹，摆了个劳动的姿势。她又接见大寨大队干部社员讲话，又是自我吹嘘，又是透露小道消息，又是骂宋江架空晁盖，又是吹吕后。讲着讲着，她就攻击起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来："有一个电影厂，它名义是全民所有制，它是现代化的厂啊，但是它搞'三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叫三大自由呢？就是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

盈亏，导演中心制。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把我们党完全不放在眼里。他们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过问，尽出毒草！你们看过毒草片没有？看过吧?”

邓小平发现江青在背后私自讲话，攻击毛主席的批示，十分气愤，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从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清样中也得知江青乱讲话，十分恼怒，明确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事情还没有完，过了几天，毛泽东突然接到朱德的一封信。朱德来信还称毛泽东为“润之兄”，毛泽东微笑一下，往下看去，未看数行，勃然大怒，不假思索，提笔就批：“孤陋寡闻，愚昧无知。30 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毛泽东生这么大的气是为什么呢？原来朱德的这封信揭露了《红都女皇》事件。说起此事来，还得回到 1972 年。此年，一个外国女作家来华访问，极想在中国采访当政要人，以便回去写一本畅销书。江青也正想找个外国人，为她写一本书，与此人一拍即合，即邀她来谈话，大肆篡改历史，吹嘘自己，把自己的照片赠送给她，并在照片上题了“江上有奇峰，偶尔露峥嵘”的歪诗。为讨她的喜欢，江青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鼓励她也像斯诺一样，为自己写一本《西行漫记》，为此还送给外国女作家许多党内机密材料。

这位外国女作家回国后，写了一本江青的大传《红都女皇》，果然轰动，畅销一时。中国驻外使馆发现后，立即报告中央，中央想采取补救措施，但为时已晚，致使党和国家的声誉受到极大的危害。毛泽东本人的形象也被污损。

像这样的事，毛泽东能不生气吗？

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苦笑两声。他能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吗？周恩来用笔批了个“缓办”，把信退了回去。

9 月 20 日，医生对周恩来进行一次手术。周恩来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联想到当前的评《水浒》，骂投降派，他估计江青以后还会用伍豪事件对他进行陷害。于是，他要来了自己以前关于伍豪事件的讲话录音记录稿，手抖着签上自己的名字，下面又写上“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签完字，周恩来在医生的扶持下进入手术室，他愤恨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医生打开周恩来的腹腔，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已无法手术，医生们只好缝好伤口，随即向邓小平副总理报告了病情，邓小平难过地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邓小平作了批示，医生们想尽办法减少周恩来的痛苦。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已不能下床了，大小便全在床上。秘书、医生们为使他舒服些，特意设计了一个便盆。重病中，周恩来仍在学习毛泽东的诗歌《鸟儿问答》。他又把秘书找来，让他为自己写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请求中央批准自己死后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此事周恩来已向邓颖超讲过几次，他怕邓颖超难过，不愿意这样

处理自己的骨灰，所以特地向中央写了申请。

邓小平接到秘书转来的申请后，难过得想大哭一场。但是，他不能，繁重而艰险的全面整顿任务在等着他去施行。他知道，周恩来——他心目中的兄长正期盼着他去完成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任务。

秘书拉开门走进来，轻轻地说：“小平同志，耀邦同志他们已在会议室等着你呢。”

邓小平来到会议室，胡耀邦、胡乔木等人站起来，邓小平和大家逐一握手。胡耀邦本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工作了一段时间，即被邓小平调到共青团中央担任第一书记，后来又去担任陕西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靠边站。九大时，他本来已被内定为中央委员，当康生和他打招呼时，胡耀邦理也不理，遂被康生等人取消中央委员的候选资格。邓小平主持工作，全面整顿开始后，即把这位正直敢闯的得力干部解放出来，让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兼第一副院长，主持科学院工作。

胡耀邦今天是来汇报制定《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情况的，这个文件又叫做《汇报提纲》。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制定的。原来邓小平复出后，深感要整顿，必须把被胡作非为的造反派掌握的权力夺回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知识分子歧视侮辱的作风，发展科技，必须系统地消除“文革”以来的左祸。为此，邓小平委托有关部门起草了《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论总纲》三个文件。《工业二十条》已在9月初制定完成。这个文件规定要把那些“勇敢分子”、坏人夺去的权力夺回来，绝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做“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个提纲下发全国后，很快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按此文件抓铁路运输，收效很快，铁路混乱状况很快改观。冶金、机械、矿山等工业系统的生产也直线上升。赵紫阳领导的四川省成绩也很突出。现在中科院的《汇报提纲》也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定稿了。

胡耀邦性格活跃，好说好动，性格倔犟，拿起《汇报提纲》先感叹了一番：“这一个多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是拼了一点老命的。”

《汇报提纲》写得很好，准确地表达了马列主义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基本观点，批判了极左路线破坏科技工作，迫害知识分子的各种谬论，理直气壮地鼓励科技人员大搞科研。

胡耀邦汇报中，邓小平不时插话。汇报完毕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头，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邓小平说：“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搞好科研后勤。”邓小平又望着周荣鑫说：“搞科研就得有人才，教育必须上去，要恢复高考制度。不能公平合理地选拔人才，谁还愿意读书，你这个教育部长要抓抓。”

胡耀邦开玩笑地说：“现在动不动就抓辫子，批回潮、批经验主义。过去几年一些同志讲了几句实话，就说是什么分子。荣鑫，小心人家也给你扣个大帽

子，有人专门开帽子工厂，看你不顺眼，就给你一顶。”周荣鑫一直当国务院秘书长，四届人大周恩来、邓小平特别点将，让他当了教育部长。这时，周荣鑫听胡耀邦说“四人帮”要给他扣帽子，头一摆说：“不怕，我不怕他们抓辫子。”邓小平笑笑说：“对，不怕，怕什么?”他幽默地说：“你们的辫子还有我多？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得很。”与会者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汇报提纲》制定好后，胡乔木主持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也制定好了。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三项指示为纲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四人帮”非常惊恐，拼命抵制。把持清华大学的迟群、谢静宜封锁消息，极力抗拒整顿，攻击党中央。清华大学教授、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其他三个人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他们于8月和10月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信先寄给邓小平，再由邓小平呈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信后，没有吭声，这个问题他还得仔细考虑一下。近来，他身体不好，无法主持政治局会议，特意调毛远新这位侄子来当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一来，就给他吹了一些冷风：“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看主流还是看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我看有些人就是要倒三七开，否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成绩不讲，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以后，毛远新不断地来吹冷风，什么工业战线又开始搞管卡压了，文艺黑线又来了。邓小平全面整顿开始后，他来得更勤了。这天，毛远新又来了，毛泽东把刘冰来信的事对他说了。毛远新忧心忡忡地说：“现在邓小平同志刮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比1972年批极左风还凶。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是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其实，不用毛远新多讲，毛泽东也看出邓小平这么全面整顿下去，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又吹起冷风来：“主席起用小平同志是个英明的决策，可惜邓小平不知悔改，继续走资。对铁路上的一些问题进行全面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全面整顿似乎是个路线问题。”

毛远新的这句话说到毛泽东的心事。当时，自己支持邓小平整顿，是想把一批混乱的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形象，可是现在看来，问题正在走向反面，该反击了。他对毛远新说：“他就是那老一套，黑猫白猫啊。不思悔改，要翻案。”毛泽东拿过刘冰的信，递给毛远新：“这是清华大

学刘冰写的信，是告迟群、小谢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停停又悲愤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一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泽东越说越悲愤，毛远新记下了毛泽东的话，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来个认定。这近乎是乞求了，但邓小平不干。他引用毛泽东批评他的话——毛泽东前不久曾说过，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我不能写这个决议。”

毛泽东听毛远新说邓小平不干，脸色沉下来说：“看来我该给大家打打招呼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三回　悼伟人中华大地遍灵堂　送总理北京长街尽泪痕

话说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准备打招呼，康生又来向毛泽东吹风，毛泽东下了打招呼的决心。他让秘书打电话把毛远新找来，吩咐道："你再去找小平同志商量一下，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他只要同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好商量。"毛远新答应道："好的，我立刻找小平同志谈谈。"

毛远新出来，找到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一次婉拒了毛泽东的要求，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

毛远新走了，邓小平闷闷地抽着烟，知道毛泽东不会原谅他的这一立场。从江西起，他就和毛泽东一起工作，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们结下了珍贵的战斗友情，也留下了不少的沟沟坎坎。反"围剿"、打日本、揍老蒋，他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政治斗争策略，不惜冒着被王明杀头的危险为毛泽东的路线和地位去抗争。进城以后，在国内一些问题上他逐渐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尤其是1957年以后，"左"的东西抬头，他感到毛泽东的许多做法离开了中国实际。他常常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不同意见，有时只好用沉默来表示反对。毛泽东很不高兴，说他耳聋，每次开会都坐得远远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后来流放江西，复出后受命整顿，立即就碰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不想使毛泽东伤心，他也知道"文化大革命"成了毛泽东的一大心病，但是不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怎么能达到整顿的目的，又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和企盼。

医院打来了电话，报告周恩来病重。邓小平放下电话，立即调车向解放军总医院驰去。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多了。"邓小平看着他瘦削的脸，本想告诉他主席最近态度有变化，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不忍心再让病人添加精神上的痛苦。

其实，不用邓小平说，周恩来已经知道政局发生的变化。医务人员每天都在给他读报，他从报纸上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词语上知道邓小平又要挨批了。形势一天天恶化，但是周恩来回天无力。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住地摇头叹息。

医生们听说周恩来情绪不好，都跑来探视。周恩来掀开被单，翻身下床，医生们惊问："总理，你这是怎么啦？"周恩来叹口气说："同志们，你们以后

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现在不工作，就不是总理。”医生们纷纷安慰他，说他们正在想办法，要努力治好总理的病。周恩来感激而又不安地说：“同志们，我谢谢你们，你们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可是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住在这个地方很不安，这么多专家在这个地方为我一个人服务，你们各有各的工作，而我只不过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何必拖住这么多人。”医生们劝道：“总理，您病成这个样子住在这里，还有谁会说三道四的呢？这些专家当然也要为别人看病，但您也是病人，为您看病也是很重要的呀！”周恩来见专家们都来劝慰，感到反而给他们增添了麻烦，也就答应不出院了。

到了11月底，周恩来的病情已严重恶化，邓颖超每天到医院探视。周恩来见她每天奔波，心中不忍，请秘书们来，对他们说：“同志们，大姐每天来医院看我，她年纪已经大了，又是一个人，你们有时间陪陪她吧。不要让她心中难过。”秘书们其实早就想这样做了，顾虑到周恩来可能随时有事喊他们，再则总理对他们要求特别严格，不经他的同意，不能在工作时间去陪邓大姐，所以不好去陪，现在见总理主动提出来，便立即分出两个女同志去陪邓颖超。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周恩来对邓颖超要求非常严格，不该她知道的事，周恩来从来不讲，秘书们也不敢讲。有次秘书忍不住给邓颖超透露了中央抓王、关、戚的事，被周恩来知道后好一顿批评。邓颖超也是坚持原则，从来也不向秘书打听什么，也从来不要秘书为她做什么，公私分明，但这次她接受了总理的安排，每天由秘书陪着去医院探视。秘书们也知道总理的病到了最后时刻，想到朝夕相处的、亲如父兄的周恩来总理即将与他们诀别，都如撕肝裂肺般的痛苦，但他们尽力在总理和大姐面前挤出笑容，不让自己的悲伤情绪去影响总理和大姐。

中央领导人得知周总理病重，不断地来医院探视。到了12月间，总理已到弥留阶段。这天，叶剑英元帅到医院来探视总理，周恩来昏迷中不断地发出呓语：“剑英……黄埔……”医生们上前去唤醒他：“总理，叶帅看你来了。”唤了几遍，周恩来慢慢地睁开眼睛，叶剑英俯下身子问候道：“总理，我来看你来了。”周恩来看看医生们，没有说话，医生们便都退出去了。这时周恩来才急问叶剑英：“小平同志怎么样了？”叶剑英忧虑地回答道：“主席已经指示政治局召集全国各地重要领导干部打招呼，要大家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已经展开了所谓的大辩论，围攻刘冰同志。主席已经把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定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小平同志已经被取消了主持政治局工作的资格，只分管外事工作。”周恩来问道：“现在政治局会议是谁主持？”叶剑英冷冷地说：“就是那个从一岁就开始干革命的副主席。”

周恩来一阵疼痛，他忍着疼对叶剑英说：“剑英，从黄埔起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主席对你评价很高，现在形势险恶，小平同志看来以后难以主持工作了，中央威望最高、又握有军权的就是你了，不能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在他们手里。”叶剑英点点头，说：“你放心吧，总理。”说着，他把大姆指往上指指，

又往下指指，又伸开五指，做了个果断的抓的动作，周恩来欣慰地笑了。

医生们送来一小碗饭，喂给周恩来吃。周恩来忍着疼痛，一口口地吃下去。吃了几口，他疼得实在受不了，满头大汗。叶剑英不忍，难过得背过身去。周恩来对医生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他紧紧抓住床单，咽下一口饭，念叨着："一、二、三…"好容易吃完饭。

叶剑英要回去了，拉着周恩来的手说："总理，你要保重。"周恩来用坚毅的神色望着叶剑英说："你放心，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我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活一天也好。你们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周恩来话没有讲完，疼得昏过去了。

从此，周恩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时，他就低吟《国际歌》，邓颖超俯下身子，只听周恩来说道："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就这样，周恩来战斗着度过了1976年的新年。1月7日晚，医生们来到床边为他进行治疗。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嘴唇一动一动的。医生们俯下身来，才听清楚："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说完，他又昏迷过去了，再没有醒过来。

1月8日清晨，接班的医护人员来到病房，只见周恩来胡子很长，脸色青灰，呻吟声已极其微弱，身上插着输氧管、输液管、鼻饲管。医生们盯着心电图。突然，心电图上的曲线抖了几下。不好！医生们果断地按响警铃，住宿在病房楼上的专家们像听到战斗信号一样，飞速下楼，紧急抢救。同时，医疗组长马上报告了邓颖超和汪东兴，邓、汪飞速赶来，只见医生们已移开屏风拆掉活动床头，紧张地进行抢救。医生们为了从口腔中插进一根管子吸痰和加压给氧，使劲地喊着："总理，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周恩来微微地点点头。医生们心中一喜，总理醒着，立即给他插管吸痰。突然，一直按着总理脉搏的医生紧张地报告："没有脉了!"心电图也随之嘟嘟地发出警报，拉成了一条直线不动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往日安静的病房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几十名医生、护士、秘书和工作人员在病房里哭成一团。邓颖超没有哭，坚定地对哭泣着的汪东兴说："我向中央提出一个请求，根据恩来的遗愿，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存骨灰。请中央批准。"汪东兴哽咽着答道："这三条我都反对。"邓颖超劝道："你去向中央反映嘛，这是总理的遗愿。"汪东兴说："好吧。"

汪东兴辞别邓颖超，急匆匆赶到颐年堂。中央政治局正在这里开"帮助"邓小平的会。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猛烈开炮。叶剑英冷坐一旁，不言不语。邓小平沉着面孔，不时反击。不是政治局成员的毛远新却和王洪文一起坐在沙发中央，主持会议。

汪东兴推开门走了进来，神色木然地在门旁站住，眼泪哗哗地流下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唰”地站起来，叶剑英声音战抖地问：“是不是总理……”汪东兴哽咽着答道：“是的，总理已经去世了，就在刚才。”闻听总理去世，政治局委员们个个神色大变，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满脸悲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交换着幸灾乐祸的眼光，陈永贵、吴桂贤几个工农出身的委员则哭出声来。

叶剑英转过头来，严肃地提议：“我建议为总理默哀三分钟！”王洪文说：“同意，请大家起立，默哀三分钟！”哀毕，汪东兴说：“邓颖超同志请求中央，根据总理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李先念立即起来反对：“不行，这样搞，全国人民会答应吗？”邓小平赞同地说：“我同意先念的意见，遗体告别、追悼会一定要搞。”王洪文说：“我也赞成先念的意见。是不是请远新同志先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指示。”

汪东兴已经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报告了游泳池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把汪东兴写的一张纸条放在进厅的桌子上。这几年来，毛泽东的卧室除张玉凤几个贴身秘书、护士外，一般人不能进去。下面有事报告，都是写在纸上放在这张桌子上，然后由张玉凤再拿给毛泽东。1月8日上午10时，张玉凤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便拿起来，猛一看，怎么？周总理逝世了？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一看，确实上面写着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张玉凤慌慌张张地向毛泽东卧室跑去，报告说：“主席，总理逝世了！”毛泽东望望张玉凤问：“你说什么？大声点！”张玉凤啜泣着重复道：“主席，周总理已经去世了。”毛泽东接过字条一看，果然写着总理已经去世。

毛远新来了。张玉凤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把毛远新引了进来。毛泽东问他：“对小平同志帮助得怎么样了？”毛远新谨慎地说：“江青、春桥对他进行了帮助，其他许多委员也都提了意见，但邓小平就是不肯认真检讨。剑英、先念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毛泽东关心地问道：“国锋呢？他的表现怎么样？”毛远新想了想说：“国锋给人的印象不深，他发言总是火力不足，但对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视，几次发言谈他学习主席指示的体会。”毛泽东“噢”了一声，把话题转过来：“你来有什么事吗？”毛远新回答道：“总理去世了。政治局议了一下总理的丧事安排，提出了这么几点想法：总理的丧事要坚持节约的原则，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不邀请外国使节来京参加悼念活动。”毛泽东点点头说：“很好，我看可以转发全国照办。”毛远新又汇报道：“邓大姐向中央提出请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北京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政治局经过讨论，意见分歧较大。江青、春桥同志倾向于同意邓大姐的意见，先念等人反对。大家要我向主席请示。”毛泽东不假思索便作了决定：“遗体告别、追悼会还是要搞——当然是在北京由中央开的追悼会，外地、基层都不要搞。骨灰的处理要尊重总理个人的意见，总理已经给中央写过报告，中央是同意了的，我也同意。我死后，也要撒掉。”毛远新答应道：“我马上去传

达。”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以后，邓颖超不好再坚持了。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以后，决定立即发出讣告，在北京医院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命令三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北京医院位于一个小胡同里，遗体告别室是北京医院的一间小会议室，拥挤不堪，与一个大国的享誉全球的周恩来总理的身份不相称。之所以这样安排，老百姓心里是很明白的——那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节约。

从1月8日开始，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举行，告别室里响着悲壮的哀乐，经过精心化妆的周恩来遗体仰卧在鲜花翠柏之中，遗体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

首先来向遗体告别的是政治局委员们。第一个是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虽然入“帮”较早，但毕竟成色不足，在告别仪式上慌手慌脚。接着而来的是张春桥，他确实有心计，知道告别仪式将在电视上播出，现在是利用周恩来的威信为自己捞取干部群众信任的好机会。所以在告别仪式上，他竭尽表演之才能，泪流满面地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随后又抱住在一旁守灵的邓颖超失声痛哭。由于表演过分失真，反使电视观众讨厌。

表现最坏的是江青，她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红毛衣，让毛衣红领露在军服小敞领口，向周恩来遗体行礼时，竟连帽子都不摘，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北京市的电视观众气得大骂，“脱帽！脱帽！”有的人竟气得抄起小板凳向电视砸去（这时的北京电视台，即是中央电视台，节目因受技术条件限制，还不能向全国同步转播节目）。

和“四人帮”的表演截然不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进来时，满脸戚容，哀愁地向总理遗体行礼，然后拉着邓颖超的手，难过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深情尽在不言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朱德委员长，以九十高龄的衰年，不顾医生的劝阻，来向总理遗体告别。他望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引路人，悲伤地喊着“恩来，恩来”，他多么希望周恩来会一跃而起，像几十年前在德国初次相遇那样，与他促膝谈心。但是，催人泪下的哀乐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了。战友已去，何处安魂？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又将右手举到帽檐下，庄严地行了个军礼。战友啊战友，你安息吧，你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就在这时，中央关于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的命令下达了。其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机关、部队、学校、公社都在绑扎花圈、设立灵堂。总理最后住院的北京医院的职工们一夜之间把全院所有的庆祝元旦、预防煤气中毒的标语全部撤下来，换上了悼念总理的标语。卫生部长刘湘屏知道后派人来追查，北京医院党委冷淡地接待了他们，三言两语把他们打发走了。全院职工又分部门设立灵堂、沉痛悼念，医院党委不表态，暗中支持，最后党委干脆出面组织了全院的悼念大会，党委书记带头向总理遗像三鞠躬，悼念大厅内外，人们哭成一片。许多人望着总理逝世的北楼，多么想去中央悼念大厅向总理遗体告别，

但是为纪律所限，他们只能在自设的灵堂里向总理致敬。

和北京医院一样，全国几乎所有的单位都不顾上面的禁令，自设灵堂，悼念总理。

在北京，只有一家机关没有设立灵堂，那就是北京民政局机修厂。他们在总理逝世的1月8日，就接到中央的命令，在最短时间内，为周总理制造一台高级送体车和不锈钢火化工具。工厂接到任务后，立即全厂总动员，职工们把悲痛化为实际行动，决心研制出最高级的送体车。技术员成秉仕在设计图纸时，含泪想到，周恩来总理为人民辛劳一生，听说他上厕所时，一边解手一边谈工作，廖承志有次跟进厕所，周总理蹲在马桶上和他商议问题，应该设计出这样一种车，可以使总理遗体轻轻地、缓缓地、平稳地落在炉面上，不要惊醒他，他太累了。

经过全厂职工精心的设计制造，一台锃光瓦亮的不锈钢送体车制成了。成秉仕顾不得休息，带着两个助手星夜护送送体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炉进行安装调试。安装完成后，经过几次试验，运行良好。但成秉仕仍不放心，对两个助手说："你们在外面按电钮，我要躺在车上亲自试试。"助手要争着进去，成秉仕把他们推开，躺在车上。助手按动电钮，送体车徐徐把成秉仕送进火化炉，轻轻地、缓缓地、平稳地把成秉仕落到炉面上，一点震动也没有。

成秉仕从火化炉爬出来后，盯着炉膛看了一会儿，又取来一捆雪白的绢纸，不能让总理就那么躺在炉膛上仙化，他要让总理躺在柔软、雪白的炉面上仙化。于是，他第二次爬进炉膛，细心地在炉面上铺上白色绢纸，把炉膛四壁都贴上绢纸。炉膛铺好后，成秉仕和助手又把炉子擦拭一遍，才流着眼泪离开。

1月11日下午4时，灵车开到北京医院，在沉重的哀乐声中，6名礼兵把周恩来的遗体轻轻地抬进玻璃棺中，军乐队吹奏着哀乐作为前导，然后是两名提着步枪的礼兵，再后是手捧周恩来遗像的邓颖超，最后是6名抬着玻璃棺的礼兵，再后是送灵的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委员。送葬者迈着缓慢的步伐，把周恩来遗体送上灵车。灵车是用一辆大轿车改装的，车头上挂着黄黑两色的大花，分外引人注目。

在摩托车的引导下，灵车顺着长安街向八宝山驶去。灵车后面是一长串无穷无尽的黑色小卧车。

中央今日为总理出殡的消息早已传出去了，从凌晨一时开始，北京人就从市区、郊区、远郊县向长安街拥来。等到天亮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十里长安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早已挤满了为总理送行的人们。这里既有老将军，也有国际工作者；既有青年，也有妇女；既有老人，也有中学生。他们在三九天的寒风中从半夜等到第二天下午，为的就是最后看总理一眼，为总理送行。

下午4时多，灵车徐徐驶上长安街。所有的车辆全部停驶，大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交通警察孤零零地一个个站列在马路中间。

灵车缓缓地驶过来了，一瞧见灵车车头上挂的那朵醒目而庄严的大花，人

们的心一下子就碎了，长安街两旁顿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许多老人、妇女哭得晕了过去，年轻人悲痛得用头撞着电线杆柱子，一些人哭得跪倒在地上，用手拍打着路面，泣不成声。

灵车继续缓缓地行驶着，长安街两旁的人群哭声连成一片，人们哭着喊着，“总理啊，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总理啊，你走了，我们靠谁呀！”

但是，灵车还是默默地向前行驶着，车顶上的喇叭里不断传出邓颖超的声音：“谢谢同志们！谢谢大家。”

灵车开到八宝山殡仪馆，4 名身着崭新蓝呢中山装的青年工人从灵车上抬下玻璃棺，轻轻地放到送体车上。人们围着车子，手抚玻璃棺，痛哭不已。邓颖超流着泪，看着棺里的周恩来，不住地喊着：“恩来，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同志个个大哭。

时间到了，吴桂贤扶开邓颖超，汪东兴轻轻拉开其他人。王洪文下令开炉，工人们哭着蹲在地上，理都不理他。王洪文看看邓颖超，意思是让她出来做做工作。邓颖超强忍悲痛，劝工人们开炉，工人仍不干，哭着嚷道：“我们要求保留总理遗体。”邓颖超劝不动，只好请求王洪文：“副主席，就请你送一送恩来吧。”王洪文说：“好吧！”百万市民送总理的哀伤场面使王洪文也有些伤感，他向总理遗体鞠了一躬，神情悲肃地按动了电钮。

送体车静静地把总理遗体送进炉膛，铁门“啪嗒”一声关闭了，邓颖超顿时天旋地转，手向前伸着，似乎要抓住总理，自然是什么也没有抓着，她不禁撕心裂肺地喊了声：“恩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四回 周恩来借长风融山河 华国锋因老实代总理

话说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在八宝山仙化以后，邓颖超捧着骨灰盒由原路乘车返回。冬天的黑夜到得很早。灵车返回时，长安街上已是灯火齐明。聚集在长安街两旁的人仍在寒风中守候着，灵车徐徐地开过来，人们只见灵车来，不见总理回，止不住号啕大哭。直至深夜，聚集在长安街两旁的群众才散去。

灵车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停下来，邓颖超手捧骨灰盒，由吴桂贤扶着，慢慢走下灵车。在军乐队和礼兵的引导和护卫下，邓颖超捧着骨灰盒，满脸悲怆地向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去。

从1月12日开始，首都人民群众络绎不绝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周恩来总理。吊唁大厅的正中央的桌子上，安放着周总理的骨灰盒，一面党旗覆盖在盒上，盒子上方的墙上，挂着周恩来总理的大幅遗像。从早到晚，参加吊唁的人排着长队，天安门广场上满是慢慢移动着的人流，无穷无尽，无声无语。人流缓缓地向劳动人民文化宫流去，从早到晚，从不间断。

姚文元和张春桥等人看到人们这么悲痛地悼念周恩来总理，大为恐慌。恰在这时，新华社、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来报告，请示如何组织报道全国人民悼念总理活动。张春桥嚷起来："不能报道，不能以死人压活人！"江青恰好进来，看看报告，冷笑着说："怎么，主席说话不算数了？要向主席示威是怎么着？"姚文元点点头说："江青同志讲得好，这是向主席示威，不能报道。"于是，他拿起电话向新华社下了命令："不组织报道。"这一句话传下去，新华社的大通稿、北京电视台的荧屏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人民日报》的版面上一字不提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反之，《人民日报》在周恩来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天，即1月14日，在一版刊登了题为《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的长文章。这篇文章是姚文元亲自跑到人民日报社布置刊登的。文章强奸民意，说全国人民这些天来都关注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

人们读了这篇报道，都大为惊愕和气愤。明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可是这家报纸却硬说人们都关注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指鹿为马，强奸民意，太过分了！人民愤怒了，开始了抗议行动，大批抗议信件涌到该报，有的信封上写着"戈培尔编辑部收"。众所周知，戈培尔乃是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但戈培尔的这句名言在英雄的中国人民面前却失去了作用，人民不仅痛斥这家党报的堕落，

还一群一群地直接到报社门口去抗议，痛斥该报造谣宣传，吓得鲁瑛去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求援，调兵保护报社。

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情绪开始爆发，一些讽刺、痛斥“四人帮”的诗词在民间迅速流传开来，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酝酿中。

1 月 15 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的追悼大会。尽管开会的时间被严格保密着，但全国人民还是知道了。追悼大会刚开始，全国的火车、汽轮、工厂一齐拉响汽笛，上海黄埔港里的外轮也都拉响汽笛，向周恩来总理致敬。上海市委领导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被汽笛声震得坐卧不宁，立即密告了张春桥。

追悼大会结束后，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要洒在祖国的大地上。邓颖超领着西花厅的秘书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向总理的骨灰肃立默哀。然后她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捧起一捧骨灰，哽咽着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说着，泪水从她的脸上哗哗地流下来，秘书们也悲痛得大哭起来。

晚 8 时许，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和西花厅办公室的几个秘书护送周恩来的骨灰，随着邓颖超来到通县机场，车子在一架苏制安—2 小型飞机旁停下来。这是架专门用来喷撒农药的飞机，现在即将起飞执行喷撒总理骨灰的任务。

一名空军将领早已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秘书们每人怀抱一只装着骨灰的小白布口袋登上飞机。一颗红色信号弹升起，飞机轰鸣着飞向天空。年轻的驾驶员胥从焕稳稳地操纵着驾驶杆，飞机飞到京郊南口上方，驾驶员凭窗下望，只见机翼下是蜿蜒的长城，他打开喷撒器，周恩来的一部分骨灰从喷撒器飞出，化为一阵长风，去轻吻着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飞机又飞到密云上空，驾驶员再次打开喷撒器，周恩来的一部分骨灰从里面飞出，化为一丝淡云，轻轻地飘落在燕山丛中……

周恩来总理的英魂，深深地与祖国大地铸在一起。他没有墓地，也没有墓碑，但中国的每一座大山都是他的丰碑，每一条河流都倾诉着他对人民的怀念。晚 12 时，安—2 飞机喷撒完总理的骨灰，在通县机场安全降落。秘书们向一直守候在机场上的邓大姐报告了喷撒情况，邓颖超才放了心，和大家一起乘车回去休息。

总理去了，谁代理总理职务呢？毛泽东在考虑着这个问题，政治局委员们在考虑着这个问题。叶剑英找了个机会晋见毛泽东，推荐李先念代理总理职务，毛泽东“哦”了一声再没有说下去，叶剑英看出毛泽东不太愿意，话不投机，便退了出去。

叶剑英退出来后，即调车去了西山，这里是军委的办公区，警戒森严，山下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路口有数道岗哨，不经允许，任何人都插翅难进。

这天，叶剑英正在山上休息，秘书进来报告：“王震同志来了。”叶剑英“哦”了一声，连忙吩咐：“快请。”王震的车沿山道而上，在叶剑英的小楼前

停下来。叶剑英迎出来，握着王震的手问："什么风把你吹上山来了?"王震笑着说："是右倾翻案风把我吹上山来了。"叶剑英警觉地用手捂住王震的嘴："嘘声!"他看看四周，把王震拉到屋里，提醒他说："以后说话要注意，这种时候……"王震恼火地说："我越想越气，他们都快把小平吃了，我们这帮老家伙今天被说成走资，明天被说成回潮。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说着他伸出4个手指。

叶剑英没有说话，只是把大拇指朝上指指，又倒过来朝下指指，然后伸开手指，做个抓的姿势。王震起初不懂，问叶剑英："参座，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叶剑英笑而不答。王震再仔细想了一会儿，顿时明白了，参座的意思是主席现在健在，不宜动手，只能等主席百年之后再行动。王震佩服地说："还是参座想得周到，我给参座当个参谋长吧。"叶剑英点点头，没有说话。

王震辞别叶剑英下山，他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但他万没料到，在山下的一幢房子里，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了。王震的车一过去，此人立即用无线电话机报告了毛远新。原来毛远新早就在这里设立了暗哨，监视着西山的这块禁地。他最近已连续接到监视报告，说李先念、陈云、王震等连续上了西山，他准备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在卧室里正考虑着代总理的人选。他的白内障经过手术治疗已痊愈，眼睛已经复明，所以又能够看线装书了。他放下线装书，数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字，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数来数去，也定不下代总理的人选。

就在这时，毛远新来了，一来就问候道："主席吃饭还好吗?"毛泽东指指沙发，让他坐下，问道："政治局会议开得怎么样啊?"毛远新站起来，拉了一把椅子往主席床边挪挪，坐下来汇报道："春桥同志最近狠狠批评了小平，说他架空主席，妄图夺权。"毛泽东摇摇头说："言过其实，他对文化大革命有想法是真的，夺权嘛，还不至于。此人我了解，从不拉帮结派，当然主持工作是不行的了。"

毛远新说："主席不知道呢，总理逝世后，小平、先念、陈云、王震接二连三上西山。"毛泽东警觉地问："他们上山干什么去了?"毛远新说："还不是上山找剑英串联?主席还不知道，总理一去世，剑英就上了西山。"毛泽东眼睛睁大了，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又问毛远新："他们上山谈什么呢?"毛远新说："大概是为了商量推荐总理的人选吧。"

讲到这里，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毛远新："那么政治局对新总理的人选有些什么议论?"毛远新小心地回答道："江青同志提议春桥担任，政治局多数同志也认为春桥比较适合。"毛泽东又紧问一句："你看谁合适?"毛远新迟疑了一下才说："邓小平是不行了，先念也不太适合，我真说不好，请主席指示吧。"

毛泽东闭上双眼，似乎睡意蒙眬，但思维却在飞快地跳跃。他明白了，"四人帮"没有听他的话，还在拉帮结派。毛泽东最讨厌的就是在党内搞帮派，张春桥当总理，妄想，那么谁来干呢?突然一个名字像闪电一样在他的脑海中闪

了一下，他问毛远新："华国锋怎么样？"华国锋？毛远新愣了一下，让华国锋当总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没有吭声。毛泽东断然说："我就要这个没能力的。国锋厚重少文，从不搞阴谋诡计，不拉帮结派，他当总理，我放心。当然得先锻炼一下，就是代总理吧。"毛远新赶紧表态拥护："主席选得好，国锋同志最适合当总理。"

毛泽东由华国锋的厚重少文又想到了西山，对毛远新说："剑英既然有病，那就先养病吧。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向政治局传达下去。"

代总理的人选确定后，毛泽东如释重负，开始训导起侄儿来："远新，你好像对国锋有些看不起。"毛远新"哦"了几声，窘得说不出话来。毛泽东抚慰道："你的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国锋能力不强。但历史上往往是这样的人才能负起重任，不负先主委托。我给你讲一个西汉的故事吧——"

那是西汉高祖末年，刘邦病危。吕后问刘邦："你百年之后，何人可以托付大事？"刘邦答："萧何。"吕后又问："萧何以后呢？"刘邦答："曹参。"吕后又问："曹参以后呢？"刘邦答："周勃，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者必周勃也。"最后到底是周勃左袒，夺取北军，铲除吕氏势力，重新振兴汉朝——

毛泽东讲到这里，叮嘱毛远新说："你是学工的，读历史书少，要好好在这方面补课。学工的脑筋活，不像学文的脑筋死，学一点就能用上。"

毛远新口里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谁说的学文的脑筋死，这位大伯父就是学文出身，可他的脑筋有多活。他早就看过大伯父的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那里面写到，大伯父在一师读书时，历史和古文都是顶呱呱，但数学物理经常不及格，数理丢分文史补，全靠文史的高分把总分拉及格。大伯父也不爱图画课，有次静物写生，大伯父用直尺在图画纸上打了一条直线，又用圆规在直线上划了半个圆，题了句唐诗"半壁见海日"便交上去了。

另外，毛泽东关于周勃安刘氏的典故也令毛远新不安。周勃铲除的是吕后势力，那么华国锋将要铲除谁呢？理应是邓小平之类，但是，最近一直以吕后自居的却是江青啊！

莫非，江青也将重复历史，被现代的周勃铲除？毛远新不禁打了个寒噤。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五回 祭清明悼念周恩来 讨国贼声援邓小平

话说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为代总理以后，毛远新赶快出来找到王洪文，请他召集政治局会议，传达主席重要指示。王洪文不敢怠慢，赶紧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找来。颐年堂里，16 名政治局委员个个正襟危坐。大家都知道，毛远新今天要传达的肯定是主席关于代总理人选的指示。谁当代总理，与每个人的政治前途有密切的关系。王洪文、张春桥自以为代总理人选非自己莫属，所以更显得紧张不安。

毛远新打开笔记本，传达代总理人选："毛主席指示，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代总理。"会场上没有一点声音，王洪文、张春桥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毛远新又缓慢而大声地传达一遍："毛主席指示，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

王洪文、张春桥还是没有反应过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叶剑英、陈锡联带头鼓起掌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情况下最理想的人选。

张春桥涨红着脸，一副失落相。江青仍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问毛远新："主席是这么讲的吗?"毛远新苦笑一下说："谁还敢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我再读一遍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指示，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江青无话可说了。邓小平抢先表态："我衷心拥护主席的英明决定。"江青无可奈何地也表了态："我坚决拥护主席的决定。"王洪文、张春桥是打掉牙齿和血吞，也勉强表态拥护主席决定。

会议决定，立即发出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党全国通报：中央已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张春桥表面上举手赞成中央的决定，回到钓鱼台以后，却是闷闷不乐。过了几天，也就是 2 月 2 日，中共中央 1976 一号文件下达，传达了华国锋和陈锡联任职的决定。秘书把文件送给张春桥，张春桥冷笑两声说："又是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去年中央发了一个一号文件，宣布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不出一年就垮了，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张春桥满怀不悦地提笔写下了一行字："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随后信笔写道：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又过了些天，秘书又报告说：“上海的老马他们来了、住在京西宾馆，首长要不要去看他们?”张春桥点点头说：“晚上去吧。”秘书说“好，我准备一下。”

2 月 12 日晚上，两个人从钓鱼台的一栋小楼里走出来，一高一矮，都穿着军大衣，帽子戴得低低的，嘴上捂着大口罩，在门外黑影处，他们上了小卧车。车子缓缓开出钓鱼台大门，直朝西驶去，十几分钟后，车子在京西宾馆的大门口停下来，门卫看了看车号，摆手让进去了。

卧车在宾馆大楼前停下后。那个中等个子的人对另一个说：“你先在这里等着，我上去一下。”说完，关上车门向大楼走去。门岗向他要证件，此人说：“你们向上海的马天水打个电话，就说新华社记者来送材料来了。”门岗要通马天水的电话，说了几句，然后放下电话说：“请进吧。”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接到门岗电话，在房间里等着记者到来。那位记者进来后，马天水问：“材料呢?”记者摘下口罩，马天水惊喜地叫起来：“啊!春桥同志!”张春桥脱掉大衣，往沙发上一坐说：“宾馆里住满了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人，人多嘴杂，不能不化装一下。”随后他压低声音说：“中央这次打招呼，是准备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已被停职检查。但是，中央同情邓小平的大有人在，斗争还很复杂，估计形势还将会有更大的变化，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王秀珍——这位上海纱厂的劳动模范，“文化大革命”中跟着王洪文造反起家的女工，现在的上海市委书记为张春桥抱不平：“中央为什么要让华国锋当代总理? 论水平、能力、贡献，都应该是春桥同志嘛。春桥同志当代总理是人心所向。”张春桥正色道：“话不能这么说，我们都要服从中央的决定。”王秀珍一拍桌子，激愤地说：“就是杀头坐牢，我也主张春桥同志当代总理，我已向中央写过信了，我还要写。”

张春桥赞赏地看看这位女工，摆摆手说：“勿谈哉，勿谈哉。上海怎么样，有什么新动静吗?”徐景贤说：“有点风吹草动。不过，他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张春桥提醒他说：“不能大意噢。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杀他几个，看谁还敢动?”徐景贤说：“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回去后要抓一抓。”

中央打招呼会议结束后，姚文元也到京西宾馆看马天水他们。一进宾馆的房间，姚文元就神色紧张地说："你们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快回上海去，马上回去。"马天水惊问道："出了什么事吗?"姚文元把几份材料扔在桌子上，神色严峻地说："现在斗争形势非常紧张，北京市发现多起反标事件。这些反革命分子公开张贴反动标语，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政治谣言越来越多，一些反动诗词在到处流传。你们看看，什么拥护三项指示为纲、拥护全面整顿，什么砍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了，但是被他扶上台的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猖狂得很。这股风不是独立的，上海也有动静。你们赶快回去，要迎接大的斗争。"马天水等人听了姚文元的话，顿时紧张起来，赶快坐飞机回上海去了。

这时的上海、南京等地，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海的马天水们竭力压制上海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上海《文汇报》不但不报道人民的悼念活动，反而连续刊登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文章。上海人民怒不可遏，互相传抄诗词，寄托自己对总理的哀思，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马天水等人回到上海后，立即布置追查政治谣言，布置批邓任务，指示要追查风源。他们要上海注意，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党内那个才死去不久的最大的走资派，就是他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上海的大小印刷厂开足马力，印刷上海市委的通知，一天一夜就印了500多万份，紧急送到各单位。

这份通知激怒了上海人民，革命风暴正从黄浦江畔开始兴起。上海，正如一个炸药库。人民的不满和愤怒已到了极点，只要一点即爆炸。终于，人民的愤怒在3月5日这天开始爆炸了。

3月5日，是一个历史上温馨的日子。13年前的这天，毛泽东为全国学雷锋运动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新华社播发了消息，报道了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学习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雷锋同志题写的题词，坚持学雷锋的先进事迹。其实，"文化大革命"，把一切优良的社会美德都斥之为封资修，打砸抢成为时尚，学雷锋运动早已被破坏殆尽。邓小平复出后，曾尖锐地批评了社会道德风尚败坏："雷锋叔叔不见了"。这且毋论，问题是《文汇报》抄到新华社的通稿后，按着上海市委的意见，公然删掉了通稿中的周恩来题词，登在3月5日的《文汇报》上。

这是"四人帮"和上海市委公然践踏人民的神圣感情，公然攻击周恩来总理。事情远不止此，《文汇报》紧接着又刊登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文章公然点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图穷匕首现，"四人帮"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上海和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从3月5日开始，人民群众的抗议电话，似暴风骤雨，震撼着《文汇报》大楼。报社大楼的外线电话，日夜不停地响着，抗议信件、电报、汇成了一股怒潮，冲击着《文汇报》编辑部。接着，

数万名来自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群众在文汇报社门口愤怒声讨《文汇报》，“保卫周总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愤怒的抗议声，如大海怒潮，不可阻挡。

不无讽刺的是，在抗议声中，几个人把十几张大字报贴在《文汇报》大门口。人们一看，大字报上抄写着1957年反右派时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大字报抄写者在按语中说：“当年反右斗争，文汇报是资产阶级的喉舌。现在文汇报故伎重演，重蹈覆辙，又成为一伙新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

上海市委得知文汇报社被围，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马天水紧张地说：“在北京时，文元、春桥就提醒我们要迎接新的斗争，上海现在果然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大家看怎么办?”王秀珍分管民兵工作，立即提议：“对反革命分子不能手软，立即调动民兵和部队镇压。”徐景贤说：“我同意，不过部队不要出动，动用民兵就可以解决问题。”马天水说：“好，大家没有意见，就这么办。”

当天，马天水、王秀珍调动数千民兵，头戴钢盔，手持大棒，冲进文汇报社门前的人群中，乱打乱抓，打死打伤群众无数，被捕的群众塞满了提篮桥监狱。

上海惨案激怒了江南人民，南京市人民群众陆续结队走上街头，抬着周恩来遗像和花圈，举着横幅游行示威。群众一边游行，一边喊着口号，“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要法西斯专政!”“人民是主人不是奴隶!”“梁效梁效，专会造谣!”游行示威的群众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数十万人，浩浩荡荡地汇集在南京雨花台（这里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员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人们悼念先烈的圣地），焚烧花圈，发表演说，朗诵诗歌，悼念总理，声讨国贼。

江苏省委书记彭冲闻讯赶来，面对着人民的爱国热情，热泪盈眶，和群众热烈拥抱，激动地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与此同时，数万名工人、学生、机关干部来到南京站，把一幅幅大字长标语贴在站内即将开走的旅客列车上，“揪出中央的赫鲁晓夫式野心家!”“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敬爱的杨开慧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开谢罪!”“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新牌修正主义者×××!”“把文汇报的黑后台×××挖出来!”

旅客们这时也纷纷从车上下来，帮助刷贴大标语。忽然，一队学生走来，把一幅长标语刷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人们读去，只见标语上赫然大书5个字：“打倒张春桥!”人们顿时欢呼起来，火车司机拉响汽笛，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忽然，一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冲到站台上值勤的公安干警面前，指着大标语，口出秽言：“他们在贴反标，他妈的你们为什么不管?”一个公安干警抽出手枪，回骂道：“他妈的你敢反对周总理，你是哪个单位的?”年轻人盛气凌人

地说："我是上海市委的。我命令你们，立即把他们抓起来！"干警眼一瞪，吼道："我看，你完全是冒充上海市委干部的坏分子，给我铐起来！"两个干警上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手铐押走了，人们拍手称快。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开动了，带着"打倒张春桥"的醒目标语，驶出车站，向北京开去。4月1日，南京市70万人抬着巨大的周恩来遗像，举行声势浩大的悼念游行。彭冲等江苏省委领导又一次在游行现场表态："悼念周总理是合法的"，"我们和人民站在一起"。上海市数万人再次包围文汇报社，高呼口号"全国人民拥护邓小平"、"坚决把上海帮从中央赶出去"。杭州市人民用钢筋焊成5米高的巨型花圈，还做成几十米长的"总理伟大！小平不倒！若倒小平，天下不平！"的大标语。花圈摆放在大街中央，标语悬挂在百货大楼，数万人一队的游行队伍接连不断。在武汉，群众在长江大桥口摆放着4米高左右的数万只花圈，守桥部队派出哨兵日夜守护，不许坏人破坏。数万群众在大桥上召开悼念大会，大喊口号，"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途经这个九省通衢的列车，都被刷写上了大字标语。

列车继续飞驰着，清明节前夕列车抵达北京时，天安门广场已是花圈如云，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刷满大标语，"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政客的喉舌——文汇报！""第一副总理爱人民，人民爱第一副总理！"大标语的空隙中，贴着许多小字报和诗词，"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有魔鬼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革命者鞠躬尽瘁虽死犹生。"……

在广场上，到处都有人在朗读诗歌、演讲，北京市公安局的便衣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许多群众骑着自行车在监视他们，随时提醒人们躲开。

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贴了一首诗，人们立即过来传抄：

清江摇桥恶浪翻，
黑天黑地皆惨惨。
项羽英魂白天降，
扫荡阴霾见青天。

又一个青年走了过来，把一首诗贴在基座上，人们哗啦一声都涌过来围看，只见此诗不同他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围看者不禁叫一声"好"，纷纷抄录起来。

又有一人前来贴了一首诗：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到了4月3日夜，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聚集了100万人。一个戴着黑呢小帽，竖着大衣领子的矮个子老人在广场上被挤来挤去，随着人潮的涌动一会儿移向西边，一会儿移向东边。广场上到处是激昂的演说声，两只大气球被固定在广场上空，气球上悬挂着两条巨大的标语："怀念总理"，"自由民主"。广场上草坪和树枝上都缀满了白色小花，每一根灯杆和旗杆上都挂满了花圈和花篮。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挂着一幅特大的周恩来遗像，遗像周围缀满了花圈。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金水桥南侧的国旗旗杆，搭了十几道彩门，彩门悬挂着巨幅标语。在国旗旗杆的大理石台座上，摆着一只巨大的花圈。台座上有人慷慨激昂地演说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突然，广场南侧传来惊心动魄的呼声："同胞们，军队来了，大家都去保卫花圈啊！"人们顿时山崩地裂般地喊起来："走啊，保卫周总理啊！"

人民英雄纪念碑台座上，果然站满了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他们平端着枪，神情紧张。一个年轻军官站在前面，用电喇叭喊道："奉中央命令，这里要修理，请大家回去休息。"回答他的是广场上几十万人有节奏的喊声："解放军——回去！解放军——回去！"阵阵喊声确如春雷不断炸响。年轻军官的喊叫声完全淹没在这火山爆发般的怒吼中。

刚来广场的那位矮个子老人身不由己地被推挤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跟前，他目睹这一历史性的壮观场面，不由得想起了在巴黎见过的工人斗争场面，想起了自己和周恩来、陈毅、赵世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聂荣臻一起和法国政府驱赶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无理措施斗争的情景。他心中感叹道，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谁要想愚弄人民，只能得到历史的惩罚。

突然，一个留小平头的小伙子拿着扩音器跳上基座，迎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黑洞洞的枪口，对士兵慷慨激昂地喊道："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叫侯玉良，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今天，首都百万人民来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的枪口应该对准那些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怎么能对准你们的父老兄弟呢？你们听听人民的呼声吧！"

广场上上百万人震天动地地喊起来，气壮山河地吟诵道：

敬告工农子弟兵，
请你们聆耳听。
今天人民悼念周总理，
今天人们把民主自由争。
是非你们应看清，
莫给恶魔当帮凶。
不要忘，你们的枪刺，
是工人的双手来制造！
不要忘，你们的躯体，
是农民的粮食来铸就。
你们的父老兄妹在盼望你，
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
怎么能，把锋利的刺刀，
刺向神圣的天安门广场。
工农子弟兵，
快听听人民的喊声：
谁要镇压群众，
请你们掉转枪口把他崩！

士兵们听着上百万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低下了头，但仍平端着枪。一个老军人霍地跳上基座，一把撕开军衣，露出伤痕累累的胸膛，朝士兵们喊道："同志们，请你们看看我。这些伤疤是谁留的，是日本鬼子、国民党给我留的。谁救活了我？是老百姓，是他们用血、用乳汁救活了我，你们不是都看了《红嫂》吗？我就是被《红嫂》用乳汁救活的那个八路军。你们怎么可以把刺刀对准红嫂呢？我是北京军区副师长，你们不隶属我的部队，但我恳求你们，撤走吧！"

年轻的军官低下了头，喃喃地说："我也是热爱周总理的。"他转过身，命令部队："集合，撤！"群众拍着手掌，为他们让开一条道，那位矮个子老人也拍着手。一个人转过头来，不经意地看了看，觉得此人面熟，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等那位老人在两个年轻人的保护下走了，他才一拍大腿，兴奋地喊道："邓小平来了！"人们都四顾惊问，"在哪儿？在哪儿？"此人说："就在我旁边，我看着面熟，可就没有想到是他，唉！"

邓小平来广场了！人们纷纷传诵着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其实，这完全是个误传。

这段时间，不仅邓小平没有来过广场，而且他的子女也没有来过广场。那个似乎是邓小平的矮个子老人只是一个早年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普通的

老知识分子。张春桥在当晚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提醒大家说："天安门广场上的闹事有大人物在背后活动。"姚文元紧跟着说："有人在天安门广场演说，说主席要把江青同志赶出政治局，多亏周恩来保了下来。"江青脸红脖子粗地喊道："放屁，把那个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枪毙。"

华国锋点点头："情况的确很严重，很恶劣的，必须想个妥当的办法。先请吴德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吧。"吴德说："好吧，我介绍一下，现在纪念碑前送的花圈达2073个，花圈上写的单位有1400多个。昨天拂晓前清理过一次，投入了5000民兵，3000公安人员，公安人员都着便衣。广场上的人数今日达到100万。"江青盛气凌人地指着吴德的鼻子训斥道："反革命分子这样猖狂，为什么不反击？你这个市委书记怎么当的？你马上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全部拉走！"华国锋想想说："今天是清明节，这样搞是不是会使群众不满，再多放两天，过了清明节就清理是不是更好些？"张春桥反对说："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江青拍手称好："对，赶快调大部队进城来。"张春桥摇摇头说："不好，不能调部队，不能开枪。出动民兵，靠民兵解决问题。"李先念摇摇头说："还是要稳重、谨慎些，尽量避免和群众发生冲突。"江青立即起来驳斥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又反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哄而上，围攻李先念。

华国锋听着委员们争吵，最后大家不吵了，他才说："根据大家的意见，一、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二、明日拂晓，全部清走花圈；三、由公安部负责组织在全国追查政治谣言；四、要做好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准备，调5万民兵进入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北京卫戍区再调5个营的部队，民兵和部队全部戴柳条帽或钢盔，每人配备短木棒一根。北京军区要有机动部队待命。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多数委员都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事情便这样定下来了。

会议散了以后，王洪文等人去调部队和民兵，姚文元去准备新闻报道，大家都分头行动起来、

江青回了钓鱼台，一下车，就命令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立即到钓鱼台来。刘传新放下电话后，立即赶来。江青非常亲热，请他坐下，故作关心地问："传新，你想立功不？"刘传新说："想，不知怎么立法？"江青诡秘地说："明天上午，你出动两辆广播车，到天安门广场跑几圈，喊一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走资派的口号，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刘传新担心地说："这恐怕会引起群众的愤怒，他们要砸广播车怎么办？"江青冷笑两声说："就怕他们不砸呢，砸了就好了，物极必反嘛。"刘传新想了想，恍然大悟："我明白了。"

4月4日深夜，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大部分走了，还剩下数千人守护着花圈。突然，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三联"指挥部里冲出两万民兵，一万警察，500名军人，他们按照预先划定的区域分片包围了广场，驱散了数千名留在广场上的群众。随之，大卡车、大吊车隆隆

地驶进广场，民兵、战士、干警把广场上的所有花圈、花篮、彩门、标语，包括周恩来的遗像扔进卡车。大吊车伸出长臂，把那些用钢筋焊接的超大型花圈吊上卡车，贴在广场上的诗词也被清洗干净。到深夜12时，广场上已是空空荡荡，一片大劫后的狼藉景象。

就在这时，一辆大“红旗”轿车从中南海徐徐开出来，在广场东南侧的“三联”指挥部楼前停下来。轿车停下后，车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出出进进的民兵们一看，原来是王洪文。

第二天一早，几十万人涌进广场，一看所有的花圈都被搬走，顿时火了，围住“三联”指挥部，呼叫着口号：“还我民主!”“还我花圈!”“我们要邓小平!”几百名民兵和警察挥舞着木棒，不断地击退涌来的人群。

突然，一辆公安局的广播车驶进广场，大呼：“党内那个走资派是克己复礼的孔老二!”“反击右倾翻案风!”“周公是复辟的总根子!”这种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的反动言行激怒了人们，哗地把广播车围住，掀翻在地，点火烧车，黑烟、大火升腾起来，“三联”指挥部小楼也燃起了大火，广场上顿时烟火升腾，一百万人的吼声汇成抗议的声浪，数万人手挽手向人民大会堂冲击，要求与政治局对话，数千名军人挽着臂膀，在台阶上排成数道人墙，居高临下地阻挡着冲来的人群。

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里，政治局委员们拉开窗帘，俯视着广场上的骇人场面。张春桥指着广场，对邓小平说：“天安门广场事件，你是要负责的。”纪登奎大吼一声，“这是犯罪!”华国锋招呼大家：“别看了，过来开会吧。”张春桥走过来，对华国锋说；“不能再软弱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姚文元连连敲着桌子：“调部队，快调部队，在广场上杀一批，他们就老实了。”华国锋拿不定主意，王洪文说：“还是按照昨晚定的方案，由民兵和部队带短棍解决问题。我昨晚问了一下，民兵和部队都调齐了。”华国锋还是拿不定主意，“广场上有100万人哩……”张春桥鬼主意多，眼睛一转一个点子上来了，他对华国锋说：“动武不能在白天，傍晚最好。先让吴德同志喊话，大部分人听了喊话会离开广场，剩下的都是骨干分子，我们就可以动手了，也不会伤了看热闹的妇女和娃娃。”华国锋一听，果然好计，问大家：“就这样定了吧，大家有没有意见?”其他人没有补充意见，华国锋大声说：“好，就这么定了，请远新向主席汇报吧。”

毛泽东躺在幽暗的卧室里的床上，毛远新在床边的小凳上坐下，对毛泽东说：“主席，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严重的事件。一些人以悼念总理为由，在天安门广场贴反动传单，进行反革命煽动。今天他们又砸了公安局的广播车，烧了民兵指挥部，汇集在广场上的人有百万之多。政治局今天开会决定采取果断措施。”

毛泽东满脸不悦，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民间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令他十分不快。他隐隐感到这里包含着深深的对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也

就是对他本人的不满和抗议。特别使他不快的是，中国人开始不听话了，中央明明通知，各地不要搞悼念活动，但人们就是不听，这不是故意跟自己对着干嘛。毛泽东对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性质和处理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想法。昨天，他签阅同意了政治局调兵的建议，今天上午江青来看他时汇报了事态的进一步进展，他基本同意江青的用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建议，但又否决了她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建议。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毛泽东立即说了一句令世人寒心的话："君子动口也动手!"

但对邓小平，毛泽东还是网开一面，他用红铅笔在纸上写道："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指示后，一致拥护，随即几个军人走来，把邓小平带走隔离审查。张春桥大喊："反击，立即反击!"华国锋一声令下，部队和民兵开始整装准备出击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协助华国锋指挥，他们不时地看着表，焦急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4月5日下午6时25分，装设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华灯灯柱上的扩音器响了。吴德在扩音器里不断地重复着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革命群众立即离开广场……"

广场上的一些人陆续离开广场，但还有数千人停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晚9时25分，广场上的华灯突然熄灭，5万民兵，5个营的战士、3000干警手持木棒，从天安门广场四周的院子里和建筑物里冲出来，一部分人封锁了广场，大部分人冲进广场，举起木棒狠打，天安门广场一片惨叫声……

黎明时分，天安门广场除了民兵、战士、干警外，再没有一个群众。十几辆清洁车来回在广场上转圈，清扫垃圾，然后又来了十几辆洒水车冲洗广场上的血迹，他们直干到天明才基本清洗干净。

第二天，毛远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来到游泳池，向毛泽东报告了行动的过程，毛泽东称赞说："士气大振，好！好!"毛远新说："前天政治局会议，春桥同志对邓小平当面说，你看看天安门的情况，人家要你出来当纳吉。"毛泽东点点头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广场，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说着，还用力挥挥手。

毛泽东又提议华国锋正式任总理，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春桥心里不痛快，表面上还装得十分高兴。大家见大事都定下来了，也就告别主席回去了。

当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几项决定：一、中共中央认定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三、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出游泳池，江青兴奋地一挥手："走，我们去吃一顿，庆贺胜利。"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跟着江青赴庆功宴去了。他们走后，游泳池又是一片寂寞。游泳

池放映员在电影厅里为毛主席放映达式常主演的新片子《难忘的战斗》。毛泽东看着看着，眼泪流了出来。屏幕上出现了解放军解放上海后举行入城式的盛大场面。只见许多女学生跳到坦克上，为战士献花。毛泽东哭着问护士长吴旭君："你是上海人，当年你也献了花吗?"吴旭君说："是的，当年我爬到坦克上为解放军献了花，那幅情景和电影上演的一模一样。"毛泽东听了，顿时哭起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六回　凶兆现吉林陨雨　大劫来唐山地震

话说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毛泽东心中倍感寂寞。几十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人，现在几乎都已被他打倒，但这并不能说明自己的胜利，只是表明，党内的大部分同志和全国人民群众已不再是在心里想，而是直接用行动来否定“文化大革命”了。他的三七开的让步并不能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谅解。自己健在，尚且如此，百年之后，又将如何？遍观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几个是可以信托的人。因此，在观看《难忘的战斗》时，昔日轰轰烈烈的创业生涯引起了他的伤感。毛泽东——这位戎马一生、志坚如钢的老革命家竟放声哭起来，影厅里陪同毛泽东看电影的人也哭成一团。电影是无法再放下去了，人们哭着把昏过去的毛泽东抬回了卧室。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变本加厉地开展起来，各个单位都在追查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调查谁写过诗词，调查谁说过周恩来的好话，全国一派恐怖气氛。中国的天空上乌云低垂，中国的大地上警车嘶鸣。生产停顿，国库空虚，商品匮乏；逃荒要饭者剧增，许多省份的城市居民只能靠每月三两油的供应定量度日，不少地方大员都得到了二两、三两的美称。这还是好的呢，有些地方连这每月三两的供给油都没有，居民去买油，营业员在粮本上写上“欠供”二字。欠上一年了，营业员奉令把粮本上的一串“欠供”一笔勾销，所以有些大员又得到了“欠三两”的美称，民怨沸腾，骂声载道，灾异接踵而来。

天安门广场事件过去后的第 17 天，也就是 4 月 22 日，护士小孟过来，给毛泽东读一段刚发表的新闻。这是新华社关于东北吉林地区突降陨石雨的报道。小孟刚念了一段，毛泽东警觉地坐起来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催小孟：“往下念，我听着。”小孟又重新念起来：

新华社长春4月21日电　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星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星与稠密的大气层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3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两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最大的3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

小孟读完了这则新闻，毛泽东又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两滴眼泪从他的眼里流淌出来。小孟慌了，连忙问："主席，你哪里不舒服?"毛泽东叹口气说："看来我是熬不过今年了。"小孟心中一阵难过，安慰毛泽东："主席，你不要多想，你会长寿的。"毛泽东苦笑了一下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死的。我问你，你听到老百姓有些什么议论?"小孟摇摇头说："不知道，管他这个干什么。"毛泽东喃喃自语道："偏偏是这个时候，落了这么些石头，老百姓肯定有议论。"小孟说："不就是一颗陨星掉下来了嘛，主席怎么这么关心?"毛泽东摇摇头，说："你小，不知道啊——"

毛泽东想什么呢？他想到了历史。中国史书上经常记载陨石坠落的新闻，并引以为国家发生重大事件的兆示。在儒家经典中，有"天人感应"的一种理论。这种学说认为，人间有什么变化，"天"就会有相应的兆示；国家百姓康泰，便会有凤凰飞翔，麒麟作舞，喜雨降临，宝贝出现，这都是瑞兆；如果国家奸臣当道，国政不修，便会旱涝交加，凶怪猖狂，是为灾兆；天降巨星，每每意味着国家有大人物辞世。遍观《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写到诸葛亮、赵云等一代名相名将去世时，都预先有大星在夜空降落。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是不相信这些的，但现在他怎么也拂不开这场陨石雨投下的阴影。3块最大的石头，兆示着谁的死亡呢？难道是兆示着总理、总司令和自己的辞世吗？总理已经作古。总司令也是90高龄的人了，身体不好，自己也是沉疴日重，风烛残年。难道总司令和自己都熬不过今年吗？

毛泽东心烦意乱地想着，拿着报纸又看了一眼，"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出现陨石雨？他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人感应"之说应验，中国的大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在周恩来总理辞世后，朱德委员长又病逝了。

周总理病逝后，朱委员长经常独自落泪，念叨着"恩来，恩来"。经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已九十高龄，还经常看文件，会见外宾。夫人康克清劝他保重身体，朱德叹口气说："恩来不在了，我要多干点。不然，那帮家伙更猖狂了。"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朱委员长的肺炎复发，但仍坚持工作。不久，由于一次有意无意的安排上的失误，使朱德的病更加重了。

那是6月21日，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安排上的失误，朱德在会见大厅里等了很长时间，感冒了，住进医院后，又并发了肠胃炎和肾病，高烧不退。弥留之际，他还在喊着："革命——到底！"

7月6日下午3时，朱德委员长病逝。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3块大石头如果真是凶兆的话，那么，两块已经应验了，第3块的凶兆，也就是那块举世无双的最大的一块陨石的凶兆，又将应在谁的身上呢？那些像大雨一样倾盆而降的陨石雨又兆示着什么呢？民间谣传顿时大起，中央领导也非常紧张。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来到游泳池，劝毛泽东搬到新建的202新屋去，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修的，毛泽东不愿搬："一动不如一静，这里就很好。"

张耀祠为什么一再要毛泽东搬家呢？原来自1966年邢台大地震以来，中国大震不断。1975年2月4日，海城地区又发生了大地震。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在中南海新建了202新居，但是，毛泽东在游泳池住惯了，不愿搬家。张耀祠见主席不愿搬，也就没有再劝，因为据报纸报道，中国的工农兵地震科学工作者，已完全掌握了地震预报科学，相信他们也会准确地预报出来北京的震灾。

报纸的报道并非虚言。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房倒屋塌，死伤惨重。地震发生后，周恩来乘坐直升机去灾区看望群众。他对赶到邢台的地震科学工作者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自古到今，人类还没有想出制伏地震这个恶魔的办法。但是，中国年轻的地震工作者牢记周恩来的嘱托，调查研究邢台地震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很快就找出了一套办法，当时就成功地预测出了邢台地震后的一次大余震。

事过9年，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夺取了世界地震预报的桂冠。1975年2月1日，国家地震局发出警报，中国辽宁省海城地区将于2月4日晚7时30分左右，发生强烈大地震。辽宁省委接到警报后，立即飞电各地，限令2月2日之前，海城地区居民全部撤出住所。此令一下，海城地区全体居民立即在院子、广场等空间安全处搭起地震棚，搬出家财，然后在地震棚里等着地震的到来。

2月4日下午，海城地区大地上，警钟长鸣，广播喇叭里传出一道道迅速撤离的命令，干部们逐屋检查，看是否有人在屋里，公安干警、部队战士、民兵们持枪待命，群众则大睁着双眼，等着目睹中国地震预报奇迹的出现。

晚7时35分，一阵沉闷的隆隆声自地下传出，猛地，大地晃了一下，7.3级大地震准时发生。在此瞬间，海城市内一片尖叫声，这不是遇难者的惨叫声，而是严阵待震的人们的惊叹声。

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准确地预报出了大地震，地震

科学工作者立即成为海城地区最受欢迎的人。

事过一年多以后，国家地震局又在为北京是否会发生地震而激烈地争论着。早在 1974 年，那还是在周恩来总理活着的时候，国务院发出文件，批转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指出京津唐地区近几年内有可能发生强震以后，地震科学工作者就瞄准京津唐地区。1976 年春季，北京地震队发出强烈警告：京津唐地区已进入临震状态，大震的魔影已经逼近。

但是，这时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们都忙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又要追查政治谣言，根本无暇顾及业务工作。主持地震局工作的胡克实因为参加了《汇报提纲》的讨论，被停职检查。地震预报室找不到领导，只好在领导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通报了震情分析。朱德委员长逝世以后，北京地震队发现，北京地区将很快发生大震的五项气象指标均已达标，他们于 7 月 24 日向国家地震局预报中心发出紧急警报，京津唐地区极有可能在 7 月 28 日左右发生 7 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国家地震局预报中心负责人忧心如焚，再三请求局领导听取汇报。几个副局长被缠得无法，只好抽出时间，听取震情预报分析。听完后，一位领导问预报室主任："你们的意见呢？你是否能保证京津唐地区会在 7 月 28 日大震？你也明白，现在是什么形势。如果虚报，被上面认为是以地震压批邓，这个罪名你我都担不起。"预报室负责人语塞，他不能保证，现在科学还没有发展到使地震预报能像量体温那样准确，万无一失。

领导拍拍他的肩头："再研究研究吧！"

预报汇报结束后，预报室负责人又派出一些人去唐山再做一些调查，那里出现了一些异常物候现象和生态现象。

地震队员乘坐的汽车往唐山进发，一路上酷暑蒸人，闷热异常。路旁有卖西瓜的，队员们下车买瓜解渴。他们一边吃瓜，一边同老农聊天，老农历阅人世，谈吐风趣。队员们笑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闻吗？"老农用芭蕉扇挥赶着苍蝇说："近些时来，新鲜事可多了。我家房里的老鼠昨天都从洞里钻出来，聚在院子里发愣。东庄上更出现了一件奇事，十几只黄鼠狼在村口的大树下跑着作揖，叫个不停，好像大难临头。我们村口的那口井也有了妖怪，井水忽高忽低。高时，用手就可以提水，低时，几丈长的井绳还够不着。"

老农正说着，忽然传来一阵嗡嗡声，队员和老农望去，只见无数蜻蜓排成一里宽二里长的队形，嗡嗡地向西飞去，蔚为壮观。大家都看呆了，老农却不在意地说："这有啥稀奇，前几天还飞过去了一群，比这多得多，我还以为是苏修的飞机来了呢。唉，不知为啥，如今怪事多着哩。从海里回来的人说，他亲眼看见海里出现了火龙，一闪就不见了。"

队员们听了，面面相觑，感到问题严重，上车加大马力向唐山市驶去。

一进唐山市，队员们发现了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向来副食缺乏的唐山市，如今鲜鱼大丰收，街上到处是卖鱼的，价钱也非常便宜。渔人们边卖鱼边说："奇了，这几天鱼都争着往网里钻，赶都赶不走，真是怪事。"一位老人叹息着

说："莫不是鱼儿都躲劫来了，千万别出事呀！"

怪事接连不断，地震队员们晚上熄灯后，那只日光灯管仍然在闪闪发光，旅馆外面的一堆钢筋上不时迸发出闪亮的火花。地震队员们经过一天的奔波，太累了，无暇去管这些有趣的怪事和民间四起的猜测、传说，他们撕掉7月27日的日历，在明天，也就是7月28日的日历上写下了几件要办的事情后，就上床睡觉了。

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大自然在向人们发出警告，一场大劫正在悄悄地降临。

7月27日晚，唐山地区鸡鸭在窝里扑腾，骡马挣断缰绳，嘶叫着狂奔而去。整个唐山地区，狗吠声连成一片。在骚动和不安中，7月28日的凌晨到来了，此时，只见天色阴沉，天幕上挂着一片红黑色的怪云。突然，天空里明亮起来，眨眼间又黑暗下来。

时钟的指针指到了3时40分，突然，天际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红光，宛如大火映红了天际。接着，一声尖厉而古怪的声音从天空中响着划过，地上冒出了闪闪的电光，直刺夜空。一阵"呜—"的隆隆声自地下传出来，大地猛地晃动一下，发出可怕的一声巨响，随之就猛烈晃动颤抖起来。唐山大地上，惊雷滚滚，电光闪闪，狂风阵阵，刹那间，唐山市被夷为平地。

唐山市已成为一座大坟墓。倒塌的房屋浮起的尘土，形成了一张巨大无比的尘罩，罩住了死寂的唐山。断壁残垣上，挂着许多逃生未成的人的遗体，有的年轻的母亲，在惊醒逃生的一刹那间，没有忘记抱上自己的孩子，结果一起被落下来的楼板砸死在窗口上。由于地震发生在拂晓，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除了极少数因故不在屋内的人以外，唐山市80万人全被压倒在废墟下。

唐山市并没有死，大震发生后仅半个小时，一辆红色救护车鸣笛向北京开去。这是刚从废墟里钻出来的唐山开滦煤矿唐山矿工会主席李玉林和本矿职工曹国成、崔志亮、袁庆武，开车去向党中央紧急报告灾情。

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两市的一些旧房都倒塌了。被地震惊醒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急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商议对策。

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震中在哪里。但是，这个问题连地震局也搞不清楚。李玉林的救护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门前，他们被立即领进紫光阁，只见屋里一片紧张气氛，电话铃声不断，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趴在桌子上看地图。李玉林一进来就哭了："首长啊，唐山100万人都给压底下了。"吴德走过来，他以前当过唐山市长，熟悉情况。他问李玉林："英国人在开滦盖的总管理处大楼还在不在？"吴德知道，这座楼非常坚固，墙有一米厚。李玉林回答说："塌了，全塌了。"吴德叹口气，政治局委员们明白了，震中就在唐山市，唐山——中国的煤炭生产基地，集中了钢铁、陶瓷等工业的百万人口的大工业城市已不复存在了。

李先念紧紧地抓着李玉林的手说："你说，唐山现在需要什么，你说出来，我们尽量满足你们。"李玉林哭着说："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

李先念立即问陈锡联："老陈，快，派军队，要多。"陈锡联命令："接沈阳军区，接北京军区，接空军司令部……"李先念一连声地下令，"叫卫生部来人，还有商业部、煤炭部、民航总局。叫他们快来人。"

调部队的命令立即下达了。地震发生的7月28日当天，十万解放军部队乘车紧急赶往灾区。从北京、辽宁、河北地区通往唐山市的所有公路上，都挤满了驰往灾区的军车，发动机隆隆的吼声直冲云霄，广阔的田野上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

当十万救灾部队奔赴唐山的时候，唐山开始苏醒、剧痛。暴雨像翻了缸似的往下倒，雨水渗进废墟，于是，从废墟上流出道道血水，血水又汇集成道道血河，在废墟上流淌着。埋在废墟下的80万人，死者死矣，受伤者开始苏醒，呻吟，几十万人的呻吟声从废墟下传出来，形成一片嗡嗡的嘈杂声。幸存者开始努力从废墟里往外爬，他们爬出来后，就开始营救其他的幸存者。你救我，我救他，爬出废墟的人不约而同地向唐山空军机场涌去。但是，唐山空军场站只是个团级单位，场站里只有一个40多人的医务所，根本应付不了成千上万的伤者。

就在这个时候，十万大军赶到了，战士们跳下车，跑步奔上废墟。这个时候，军队指挥官发现自己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凭经验只带了少量的铁锹、铁镐，但唐山的大地上堆着的却是山一样高大沉重的楼房的遗骸。战士们无法，只好用手去一点点地挪开沉重的楼板，寻找求生者。10天以后，上面才陆续给部队配发了吊车、电锯、凿岩机。被压在废墟下的人在黑暗的地狱里，无水、无食、空气污浊，天气酷热，即使还活着，也到了生命的极限。战士们白天黑夜地在废墟上干，只要发现有人还活着，立即用水管送进水，用钢筋串上馒头送下去，大声鼓励："挺住，一定要挺住。"

压在废墟下的生还者，大部分在震后的一两天内被亲人、邻居、同事救出。自然这些人被埋得都比较浅，容易被救出，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营救那些埋在大地深处的受难者。

入夜时分，喧闹了一天的废墟安静下来，但是，解放军不能休息。他们趴在废墟上，细心地搜寻着受难者从地下深处发来的求救信号。

地下还有活人吗？还有。

一对部队上的新婚夫妇，正在用一把菜刀敲击着一截暖气片，不断地把求生的希望传出废墟；两个医院的护士靠着一瓶葡萄糖水维持着生命，等待着被营救出去；一位街道居民，喝着床底下的一盆洗脚水，在苦苦地熬着；一个孩子吃着枕头里的高粱花子，直到获救；比较幸运的是一位水果店的职工，被压进废墟后，吃着水果店的水果，又解饥，又解渴。

所有被埋在废墟中的人们，一开始都曾拼命地扒着，挖着，希望钻出废墟。一部分人成功了，一部分人没有成功。钻出废墟的人有的丝毫无损，有的身受重伤。赶到灾区的全国数百支医疗队的帐篷前，堆积着无数被截肢的胳膊、腿。

在生还者中间，有一支一万多人的矿工大军。地震发生时，他们正在井下挖煤。说来也怪，地面上的房屋成了一片废墟，地下矿井里却没有发生倒塌现象。地震发生后，矿井里断了电，一片漆黑。各个矿井里的党委书记、矿长等领导干部带着矿工沉着地从陡立着的几百米高的扶梯上爬出矿井。除了几个人因迷路死亡外，一万多矿工全部回到了地面。

剩下来的事就是埋尸。部队又一次走上废墟，把已经腐烂的尸体挖出来。遇难者死状极惨，被砸扁头的、戳穿胸膛的，砸得稀烂的，废墟上堆满了奇形怪状的遗体。战士们把遗体用棉被捆扎好，埋到郊外用挖掘机挖出来的巨大的墓坑，然后推土机吼叫着把堆满了遗体的墓坑用土填平。

据事后统计，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是24万人，伤残人数是16万人。为世界历次地震绝无仅有。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来到唐山的地震队员，在大震中也是死的死，伤的伤。他们想向国家地震局报告，但是一切电讯系统均被毁坏，正焦急间，国家地震局派来的调查人员赶到了。他们急忙问："北京怎么样?"局里的干部告诉他们，局长已被中央召去了，是吉是凶，还很难说。接着，给他们讲了地震发生后局里的混乱情况——

7月29日凌晨3时42分，北京发生了猛烈的震撼，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这里也是房倒屋塌，通县一带尤为厉害。被地震惊醒的国家地震局值班室里，人们慌乱地惊问："震中在哪里？震中在哪里?"但是，通信混乱，仪器落后，无法确定。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话筒里传来华国锋的声音："叫你们局长。"地震局局长刘英勇接过电话，报告说："我是刘英勇。"华国锋命令道："立即来中南海汇报。"刘英勇放下电话，对那些担心地望着他的干部说："你们别管，我是局长，坐牢杀头由我去，你们好好地工作，先把震中弄清楚。"

刘英勇一走进中南海紫光阁，华国锋就问："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嘛，这么大的地震也不报告。"刘英勇嗫嚅着说："我们已经测出京津唐地区近几年内要发生地震，但没有估计到地震现在发生，震级又这么大。"吴德插话说："我已经问过北京地震队，他们在7月4日就向你们报告了7月28日左右北京要晃一次房子，有没有这事?"刘英勇吞吞吐吐地说："我不太清楚。"华国锋和吴德愕然，华国锋恼怒地斥责道："这么重要的报告你都不清楚，你这个局长干甚哩?"刘英勇为难地说："我们局党委按照上级的指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哩，批胡克实哩。上级催得很紧，一直在开会，所以……"

华国锋默然，继而命令说："现在的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北京，你要留在局里值班，随叫随到。"刘英勇赶紧答应了一声"是"。

刘英勇走后，华国锋赶紧拿起电话，吩咐汪东兴："得赶快让主席搬家，还会有余震。"

汪东兴听完指示后，和张耀祠一起来到毛泽东卧室，只见张玉凤、孟锦云等几个姑娘扯着一块布单遮在毛泽东的床的上空。汪东兴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干什么呢?"毛泽东好笑地代她们回答："这几个娃娃怕有余震，在保护我呢。"汪东兴也感到可笑，房子塌下来，岂是一幅被单可以挡住的。但他不敢笑，郑重地劝毛泽东："主席，游泳池的房子时间久了，怕不结实，请你搬到202去吧。"毛泽东叫姑娘们一起去，姑娘们收起被单走了。

毛泽东没有动，神色严峻地问道："震中在什么地方?"汪东兴小心地回答说："还确定不下来，地震局已经派人去调查去了。不过，肯定不在北京，越往东走，房子倒得越厉害。"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大响。汪东兴拿起电话，听了几句，把电话放下，报告毛泽东："华总理打来电话报告主席，唐山有人开车到国务院报警，震中在唐山。"毛泽东急问："震情如何?"汪东兴缓缓地说："据来人报告，唐山全平了。"

毛泽东惊得坐起来："全平了？那就是说，几十万人都给砸下面了。"汪东兴似有不忍地点点头。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七回　巨星坠毛泽东辞世　元戎出叶剑英掌军

话说唐山大地震以后，毛泽东每天听震情汇报，当他听到唐山有24万人死于地震时，不禁老泪横流。

从此，毛泽东病体更加沉重，自己也知道不行了，把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找来，断断续续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毛泽东讲到这里，喘息起来，过了会儿继续说道："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中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张春桥知道这是主席在交代后事。回到钓鱼台以后，他把姚文元、江青、王洪文、毛远新请来密议对策。

"主席交代后事了。"张春桥坐下来后说："主席很不放心百年以后的事，咱们也得有个准备。"江青说："对，该想到这个问题了。那个人表面上老实，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在一些大事上总是黏黏糊糊的，我很担心。"张春桥点点头说："是得注意，不过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主席百年以后，形势肯定大变，那时军队就起大作用了。可是军队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主席百年之后，真正掌实权的是那个手握军权的大人物。"

江青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对军队暂时想不出好办法，唯一的办法是抓8341部队。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上台，就是抓住了警卫部队，解决了贝利亚才干成的。汪东兴和我交情长，我可以想想办法。"

张春桥说："江青同志水平很高，抓住了问题要害，不过我们在外面还要有军队支援。康熙皇帝去世，诸子争夺皇位，四子雍正多年经营，在京内取得九门提督隆科多的支持，在外取得大将军年羹尧的军队支持，制伏诸子，取得皇位。这个经验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

王洪文一拍桌子说："抓不住军队抓民兵。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里没有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民兵的基础上组建正规部队，搞第二武装。"

姚文元对军队的事不怎么在行，一直没有说话，见大家对这个问题议得差不多了，建议说："我看咱们对将来的分工得商量一下，从现在起就开始准备。"张春桥说："这好办，江青同志当然是党中央主席。洪文同志就主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当委员长吧。文元自然是副主席，管外交、宣传、文教。远新呢？最适合当国防部长了。"江青假作谦让道："我看中央主席还是春桥来当好些。"王洪文说："江青同志你就不要谦让了，春桥还是当总理吧。"张春桥点点头："我看咱们这样分工就很好，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四人帮"密议后，张春桥和王洪文又去202值班。唐山地震后，毛泽东已由游泳池搬到能抗8级地震的202新居，政治局委员们就在202的客厅里值班。

到8月下旬，毛泽东的病已到了最后阶段，政治局委员们轮流来到毛泽东病榻前，与毛泽东诀别。9月8日，叶剑英来到202。天安门广场事件后，他被毛泽东宣布"生病"，停止参加政治局会议，所以到最后才轮到与毛泽东诀别。

叶剑英走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停下来，伤感地看着弥留中的毛泽东，只见他脸色蜡黄，形容憔悴，眼睛紧闭，嘴巴半张。叶剑英心中一阵难过，这难道就是长征路上那个不屈不挠的毛泽东，那个指挥千军万马打江山的朝气蓬勃的统帅？50多年的战斗情谊似潮流般地涌出。

忽然，毛泽东的眼睛睁开了，眼光在空中搜寻着，最后看到了站在床边的叶剑英，那双混浊的眼睛突然睁大了，嘴巴张合着，似要说些什么，可惜叶剑英的眼睛已叫眼泪给遮住了，没有看清毛泽东的这一表情，走了出去。

到底是张玉凤对主席的情况熟悉，一眼看出毛泽东有话对叶剑英说，忙追出去报告："叶帅，主席有话对你说。"叶剑英立即转过身快步走到病榻前报告："主席，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他俯下身子准备听毛泽东讲些什么，但是毛泽东却已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那双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定定地看着叶剑英，似有无数的话要对他讲。叶剑英知道主席在想什么，大声地说："主席，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很好地帮助他的。"毛泽东的脸上顿时流露出欣慰的神情，闭上眼睛。

叶剑英刚走，江青就闪进来。毛泽东病重不能说话后，她就从钓鱼台搬到了毗邻202的新居201。动不动就过来指手画脚。现在她又嫌护士们没有给主席擦背，坚持要给主席翻身。医生、护士们告诉她，主席现在的情况绝对不能翻身，一翻身就会出问题。江青蛮横地下令："我才不听你们的鬼话呢，翻，我要亲自给主席擦背。"

医生、护士无奈，只好在江青的严逼下给主席翻身，江青拿着一条温水浸湿的毛巾，开始给主席擦背。毛泽东胸部受压，呼吸急促，脸色青紫，江青一看大事不好，赶紧借故溜走。这里医生、护士忙着抢救，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的呼吸才平稳下来。

孟锦云来了，张玉凤向她交了班，便回去休息。回廊里汪东兴在值班，张

玉凤对他说："主席怕快了，你们也要有个准备。"汪东兴说："我马上通知他们来。"张玉凤交代完了就要走，汪东兴却拦住她，伸出手来，命令道："把钥匙给我！"张玉凤奇怪地问："什么钥匙？"汪东兴板着脸说："就是主席文件柜上的那些钥匙。"张玉凤不想交："主席还没死呢。"汪东兴冷笑说："是的，但主席已不需要办公了。按中央制度，这些文件须由中央办公厅接收处理。"说到这里，汪东兴又劝她："这些东西是惹祸根，你留着有百害而无一用，不如早交出来，脱离关系，以免杀身之祸。"张玉凤惊问道："有这么严重？"汪东兴矜持地微笑着说："你成天在主席身边转，难道忘了，主席讲邓小平水平高，是为什么来着？"张玉凤想想也是，便把一大串钥匙交了出来，汪东兴拍拍她的肩："好了，你回去睡个好觉吧。以后你的工作安排什么的都包在我身上了。"

张玉凤走后，汪东兴立即叫来一个班的战士和几个办公厅机要局的干部，把毛泽东在游泳池和202的所有文件柜一律封存锁死，任何人都不能动了。

办完这件事，汪东兴才打电话请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到202来。他们来后，在门口往里看看，只见毛泽东神态安详地睡在床上，孟锦云坐在床跟前的椅子上，紧紧地盯着毛泽东的神色变化。华国锋朝大家轻轻地挥挥手，大家便蹑手蹑脚地退到客厅里等着，谛听着屋里的动静。

忽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低声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时已是晚上7时，孟锦云按响急救警报器，医生、护士赶紧跑进来，拉过吸氧器，放到毛泽东的鼻子前。毛泽东先是用手推了推，似乎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平静下来。医生给他戴上输氧器，毛泽东又安静地睡着了。

到了晚上，张玉凤来接班了。她守候在毛泽东的身边，看着气息奄奄的毛泽东。整整5年的时间，张玉凤陪伴着这位比父亲还要亲的老人。其间，他们也吵过架，红过脸，毛泽东甚至吼着要把她赶出去，她也哭着还嘴："谁不让我滚，谁就是狗。"毛泽东一听张玉凤骂自己是狗，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工作人员，似乎要给她点厉害看看。但谁也没有认真看待这件事，他们都明白，主席离不开张玉凤。果然，主席要吃饭、喝水，还是唤张玉凤。在这5年里，张玉凤不仅照料他的生活，也负责为他保管文件，代笔圈阅。他们一起谈古论今，犹如父女，更像朋友。张玉凤得到了不少见识。

但是现在，张玉凤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即将离世，一想起今后再也聆听不到他的教诲，不禁一阵心痛。

秋初的夜静静的，院子里只有秋虫唧唧。忽然，中南海不远处的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响了，钟声越过地震棚、四合院传进中南海。张玉凤顿时一惊，一看表，已是午夜零点，1976年9月9日来到了。

9月9日，这是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日子。49年前的今天，年轻的毛泽东下达了秋收暴动的命令，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创建革命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由此走上了事业的辉煌，成为伟大的领袖。49年后，又是9月9日，他

马上要结束人生的历程。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命运之神故意作了这种安排？

忽然，毛泽东紧闭了三天三夜的眼睁开了，眼睛里闪出一丝生命之火，喉结上下滚动，嘴巴微微张合。张玉凤俯下身去，想听听他说些什么，但毛泽东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地攥住了张玉凤的手，又望了她一眼，便闭上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玉凤取下毛泽东开始变冷的手，走出卧室。政治局委员们一并站起来，汪东兴问道："怎么样？"张玉凤没有回答，脚一跺，号啕大哭起来。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顿时明白了，立即冲进主席卧室，只见医生们还在进行抢救，但回天乏力，心电图示波器上是一条直直的黄线，连抖动也不抖动一下。几分钟后，医生们停止了抢救，把一张死亡诊断书递到华国锋面前，请他签字。华国锋看了看，泪如泉涌，勉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华国锋签完名，憨厚地站在那里，哭着数叨着，就像是一位北方农村的农民。王洪文想起毛主席把他从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工厂副科长一下子提为领导中国的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一下子跪倒在主席床前，大喊一声："主席啊！"便泣不成声。江青住在隔壁，听见202哭声震天，知道主席辞世，神色慌张地赶来，果见主席静静地卧在床上，政治局委员、工作人员、医生们都在顿足痛哭，几十年的夫妻之情顿时涌上心头，同时，失去了强大的政治靠山的恐惧感也使她痛惜着伟人的去世，她扑在毛泽东遗体上，悲痛地哭喊起来。其悲痛状，犹如一位有着一大群小孩的贫困的农妇失去了赖以养家的丈夫。

华国锋出去召开政治局会议去了，汪东兴还留在卧室里东瞅西瞅，看卧室的桌子上、床上是否还遗留有文件。江青正用毛巾擦拭着毛泽东的脸，见汪东兴搜寻文件，蓦地想起一件大事，问身边帮忙的张玉凤："主席已去了，主席的书籍、手迹该由我来继承，你把柜子上的钥匙给我！"张玉凤一听，顿时想到汪东兴的那些话，果然是"惹祸的根子"，她回答说："汪东兴同志已拿走了全部钥匙。"江青顿时火了，恶狠狠地问道："你为什么给他？"张玉凤委屈地说："他是中办主任呀。管着这些事，他要我不给，行吗？"江青想想也是。

江青这时忧心如焚，主席的文件柜里放着几份证明她叛变过的材料呢，那是康生临死前交给毛泽东的，主席没有表态，现在主席一死，这份档案不定什么时候爆炸呢。她也不给主席穿衣服了，跑到外面书房里，揪住汪东兴："东兴，把主席房间的柜上的钥匙给我，我是未亡人，论理论法该由我继承主席的遗产。"汪东兴摇摇头说："不行啊，江青同志。主席的书籍、文件、手迹都牵涉党的利益，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该由党来保管。再则，主席走以前亲自吩咐我把这些文件管起来，不许任何人占为私有。所以我实在不好答应你的要求。"

汪东兴说得很在理，江青也不好驳他，牙齿一咬，计上心头，想出了一个

置汪东兴于死地的绝招。

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来到了会议室开会。华国锋还陷在悲痛中，哽咽着念叨着毛泽东的恩情。陈永贵号哭着，不断地用毛巾擦着鼻涕眼泪。叶剑英虽然悲痛，但知道这不是哭的时候，便提醒华国锋："该开会了，主席的丧事怎么办，要赶快研究个办法出来。"

华国锋顿时被提醒，擦干眼泪说："对，咱们赶快商议一下，主席的丧事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地议了一阵，定下了几件事：通过了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通过了中央军委要发布的全国军队一律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通过了中央对各省区市的紧急通报，定下了发布讣告的时间，决定再过16个小时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讣告。

这几件大事定下来以后，大家正要分头行动，突然江青从主席的卧室披头散发地跑出来，对着华国锋喊道："不能散，都不要走。主席的死因可疑，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死了？肯定有人谋害主席!"政治局委员们脸上闪出一丝惶恐和愤怒的神色，都转过头来看着汪东兴，因为只有他才能随便进入主席卧室，这几天来又是他经常在这里布置值班、抢救等行动。

汪东兴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趁病危谋害主席，这是何等大的罪名，又是何等巧妙的陷害。死者死矣，不能为生者作证。古往今来，从中到外，不知有多少大臣死于这种罪名。他愤怒地站起来斥责江青："你这样说有何证据?"江青示威地挺身向前，指着汪东兴说："我当然有证据，我给主席刚才穿衣服时，看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胸前还有一块黑斑，这不是中毒的症状吗?"汪东兴无言以对，他知道这是江青因夺取文件不成对他发难，但他又无法辩解，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

此时的华国锋在这种时候异常镇静，没有急于表态，想了想，站起来走进毛泽东卧室，看了看主席的遗容，又问了问医生，走出来宣布道："我刚才看过了，又问了问医生，主席是正常病逝，胸前的那块黑斑是死斑，是正常现象。"

华国锋的话立即平息了一场风暴，汪东兴感激地看了一眼华国锋。

会议散了，政治局委员们按照商定的分工去行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毛泽东宣布叶剑英"生病"，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时候陈锡联觉得应该请叶剑英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了，他也没有去问华国锋，也没有请示政治局，主动走到叶剑英跟前说："叶帅，军队还是得您挂帅才行。"叶剑英微微一笑，欣然上车，来到京西宾馆。参加军委会议的将军们见叶帅又复出视事，莫不欢欣鼓舞。

在京西宾馆礼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叶剑英端坐在主席台中央，威严而沉稳。陈锡联站起来宣布："同志们，首先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叶帅身体很好。从今天开始，叶帅又要亲自领导我们军队的工作了。现在请叶帅讲话!"叶剑英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一眼台下如云的将军们，缓慢而庄严地命令起来："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军委的工作仍由我主持。

我命令，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命令，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全军要百倍提高警惕，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指挥，做到令行禁止……”台下的将军们对叶帅的讲话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陈锡联传达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和中央的决定。将军们都是党内高层人士，早就知道主席不行了。尽管如此，当他们听到主席逝世的消息时，还是禁不住哭了。但是，军人到底是军人，他们明白自己肩上的重担，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大会散了以后，他们一个个来找叶剑英请示方略。叶剑英也不断召开大会小会、调整干部、改组机构，徐帅、聂帅也帮着找人谈话。经过一番紧张地部署，叶帅在徐帅、聂帅的帮助下，牢牢地握住了军队大权。

其实，叶剑英一直掌握着军队的领导权，自“生病”靠边以后，陈锡联遇事还是经常向他请示，代管总参的杨成武三天两头上西山向他汇报工作，地方手握重兵的大军区司令许世友、杨得志、李德生、韩先楚也是隔三差五派人来西山汇报工作。前不久，他们几个来北京时，叶剑英还分别找他们谈了话。

军委会议开完了，将军们各自乘飞机，坐火车，回返指挥岗位。叶剑英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留下来，和聂帅、徐帅一起找他再一次谈话。

“小许，”叶剑英问他，“广州军区调理得怎么样啊?”许世友虎生生地一摆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问题，我已牢牢地抓住了部队，丁盛原来在那里也没有多少市场。”叶剑英看看徐、聂二帅，二帅点点头。叶剑英一拍膝盖说：“好！我再问你，南京军区的部队你还指挥得动不?”

许世友迟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南京军区的部队不听自己的指挥，这不是实话，说他们听自己的指挥，岂不是有越权之嫌？想了一下，许世友还是照实回答：“六十军那个军，是南京军区的基本部队，我和他们的关系自然比较深些。”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会意地一笑。徐向前笑着说：“六十军的军长叫聂凤至，政委叫魏金山，一个是小许的警卫员，一个是小许的秘书，当然他们是听小许的了。”

叶剑英又一拍膝盖说：“好！咱们来看看这个部队的布防情况。”参谋进来，把一张军用地图摊在桌子上，许世友指着地图说：“六十军现在布防在苏州、无锡、南京一线，全军近十万人。”说着，指着地图介绍起六十军各师和军直部队的人员装备及驻防情况来。

听完许世友的介绍，叶剑英吁了口气，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突然坐起来，对许世友说：“小许，我给你一个任务。”许世友问道：“什么任务？我一定完成。”叶剑英命令道：“从现在起，六十军还划归你指挥，立即命令聂凤至，切断与南京军区的一切指挥联系。六十军的任务是监视上海，防止上海出现叛乱，如果上海出现叛乱，立即以果决和必要手段镇压之。”许世友明白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站起来行了个军礼，大声地说：“老帅们放心，有我许世友在，那几个王八蛋休想掀起风浪。”

正在这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进来了，他是来找叶剑英签署全军立即进入

一级战备的命令的。叶剑英拿过命令看了一遍，在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叶剑英”三个大字。

总参谋部的作战室里，立即警灯闪闪，铃声大作，叶剑英的命令被无数电话、电报传达到全军。军营里，公路上，传送命令文件的吉普车、摩托车络绎不绝。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果决地回到了全军的统帅岗位上。

军委会议结束之后，叶剑英关心地对徐、聂二帅说：“我上西山了，你们也得小心一点，不断挪挪地方，别让他们一网打尽。”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从9月11日开始举行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卧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体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党旗，8名礼兵守护在遗体周围。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为一组，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

现在要讨论的是谁来主持主席的追悼大会，谁来为主席致悼词。这事看起来简单，其实复杂，致悼词者应是党内最高领导人，谁致了悼词，他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就确定了。

谁致悼词呢？理应是华国锋，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想致。这一来，一些人就不敢讲话了，你望我，我望你，不作一声。叶剑英却自有主张，绝对不能让那上海帮致悼词，这可是牵涉党、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他毅然提议：“国锋同志是第一副主席，自然是国锋同志致悼词了，洪文同志就主持会吧。”

王洪文、张春桥不满，但别的政治局委员已一片声地附议赞成了。张春桥冷笑两声，望望华国锋，心里说，别高兴得太早。他推推眼镜，慢声慢气地问：“国锋同志，你是第一副主席，我问你，主席的遗体你打算怎么办？”华国锋笑笑说：“中央不是作了决定吗？主席的遗体永久保存，供后人瞻仰。”

张春桥阴险地闪了闪眼睛，逼问一句：“可是，我听专家说，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过了3天的遗体，便无法永久保存了。国锋同志主持工作，为什么不采取防腐措施？医生说，主席的遗体已经变质，无法保存了。”

无法保存，那就得烧掉，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永远不复存在，这还了得，陈永贵、吴桂贤顿时痛哭起来。江青马上懂得了张春桥的意思，站起来指着华国锋的鼻子大骂：“华国锋，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这事你得说清楚。”张春桥痛心疾首地说：“国锋同志，主席这么信任你，而你却对主席的感情这么淡薄。主席的遗体因你而毁坏，我们政治局无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不可饶恕的错误啊！”王洪文等也继起责问华国锋，要他说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华国锋知道张春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这话不好明说，只是诚恳地不断解释，由于忙乱，一时想得不周到云云。王洪文紧逼一句：“这些话你别对我们说，请你到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解释去。”华国锋勃然大怒，顿生一计，不如以退

为进。他一拍桌子，吼叫着说："这个责任我不能负，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职。"说着，他站起来推开椅子要走。叶剑英伸出手，一把拦住他："你不能辞职，你要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是毛主席的决定，我看谁敢推翻主席的决定?"他扫视了一眼会场，立即把张春桥等人给镇住了。

叶剑英望着满头大汗的华国锋说："你也别紧张，越南胡志明主席的遗体是过了3天后越共政治局才决定保存的，现在不是很好吗？何况主席的遗体还不到3天呢。"

张春桥、江青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叶剑英该去守灵了，华国锋把他送出来。叶剑英见外面无人，提醒他说："要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主席遗体。现在有人要借这个问题发难。"华国锋感激地说："我马上护送主席遗体去医院，以后请你多帮助。"叶剑英点点头说："你放心，除那几个人外，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以后，你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汪东兴走来了，他是护送叶帅去守灵的。叶剑英叮嘱他说："东兴，你要注意保护好国锋同志的安全。"汪东兴使劲一点头说："叶帅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互相握手告别。这一瞬间的握手，使他们感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彼此间建立了初步的信任感。

送走叶剑英，华国锋立即护送毛泽东的遗体去305医院作防腐处理，同时给越南发电请派遗体防腐专家组来华。办完这些事后，他回了家，等着越南专家组的到来。

忽然，秘书用内线电话报告："湖南张平化打来电话，要向你汇报重要情况。"华国锋说："算了吧。我现在太忙。"秘书一改常态，提醒华国锋："别的电话你都可以不接，这个电话非接不可，张平化有非常重要情况汇报，一定要接，我转过来了。"

华国锋感到，一定发生了非常之事，否则秘书不会这么紧张。那么到底发生了甚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九十八回　诡借遗体闹政变江张逼宫　逼上梁山动杀机华汪求援

话说湖南省委书记兼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张平化深夜给华国锋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天，也就是9月11日上午9时，省委值班室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电话通知，让我们有事直接找米士奇同志联系。电文如下：中办，米士奇同志来电：湖南省委：中央领导指示，在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凡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要及时请示中央，可直接找米士奇同志联系。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

张平化念了电文，问道："华书记，你知道这个情况吗?"（华国锋原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故张平化习惯地称他为华书记）华国锋惊讶地问："怎么可能呢？昨天中央办公厅值班室设在人民大会堂，是我的值班室主任亲自在那里值班呀！又怎么冒出个米士奇呢?"张平化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米士奇是王洪文的秘书，这是有人要切断你和各省区的联系，这事可非同小可啊！我已经问过了，湖北、江苏、山东都收到了这个通知。中央应当立即发一个通知，撤销这个通知。"华国锋感激而又热情地说："平化同志，你做得很对，中央马上要发通知，你们有事，还是找中办联系。"张平化大声说："华书记，你放心。"，

华国锋放下电话，又气愤又悲伤，自己尽量在政治局息事宁人，但没想到王洪文竟一下子切断了自己和各省区的联系，他一个人不敢这么干，肯定有人支持他，这些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人，他们组成了一个阴谋集团，要夺中央的权。

怎么办呢？华国锋首先想到了叶剑英。但他打了好几个号码，就是找不到叶剑英。无奈之中，他拨了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立即回话了："国锋同志，我到你那里去吧，给你看一样东西。"

半个小时后，汪东兴就来了。自华国锋前几天驳回江青对汪东兴的诬陷以后，汪东兴已向华国锋身边靠拢。他明白，一旦江青上台，他这个掌握了中央无数机密的中办主任将死无葬身之地，唯一的出路是先下手把他们抓起来。这样做，必须要有两个人支持，一个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一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前者是毛泽东生前亲自指定的中央最高领导人，政治号召力很大；后者是几十年来主掌军戎，威高望重的全军统帅。汪东兴也早已看出，华国锋被上海帮逼得走投无路，差

点辞职，已有动手之心；后者则是早已视上海帮为死敌，只等主席去世，投鼠不必忌器。现在的问题是自己和这两个人中间还未沟通，这层窗户纸还不便捅破。一下子逮捕两个政治局常委、四个政治局委员非同儿戏，搞不好要掉脑袋。但此事又不能慢，慢了就要发生不测。所以汪东兴这几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抓住一切机会向华国锋进言，暗示他应及早采取措施。

华国锋这时比汪东兴还急。汪东兴一进办公室，华国锋就急切地问："东兴同志，你知道不，洪文同志在勤政殿私设中办值班室，隔绝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汪东兴悠然地说："怎么不知道，勤政殿里装设了17部电话机，已和各省市联络了46次。"华国锋一惊，这家伙情报这么准确，他有些生气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汪东兴赔着笑说"我正要向你汇报呢，你的电话就来了。我今天还要给你看一样更厉害的东西。"说着，汪东兴把一份文件递给他："这是辽宁的那位白卷英雄张铁生的谈话，这家伙现在已是人大常委会委员，朝阳农学院党委书记，毛远新的大红人呢。"

华国锋"嗯嗯"地答应着，匆匆翻看这份文件，不由得脸色大变，一副又气又急的样子。只见谈话记录上写道：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华国锋同志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当然的老大。但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这个老大是不是可靠！我的担心就在这里。我认为他这个人思想是右的，执行路线是保守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真正认识，没有真正理解，对儒法斗争也有过一些研究，但发表的意见、观点是反动的。最早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江青同志就唱了反调。在去年养猪会上，他也有个讲话，后来还发了个二十号文件。他的这个讲话，其中许多话充满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还有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同志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的。据我观察，他在讲话中历来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能当好一把手，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他们会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对去年七、八、九月的右倾言论不知他是否认了账？是否同邓小平划清了界限？我看是没划清，感情是对路的。

远新同志说，邓纳吉有可能重新上台。我也有这个担心，现在政治局还有人支持邓纳吉，华就是一个。

华国锋看完谈话记录，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不觉骂了句山西粗话。

汪东兴提醒他："张铁生这个讲话可不是在家里随便聊天，他这是在辽宁省委、省团委的公开讲话。据我所知，还有一些像张铁生这样的人，在全国到处散布对你的不信任感。这些人都是大有来头的，如果不是中央有大人物在支持他，给张铁生一千个胆子他也不敢讲。"

华国锋惊问："谁支持他呢?"汪东兴伸出4个手指一晃："就是他们，这个讲话毛远新已经送给江青。你看着吧，不久他们就会用这个讲话在政治局发难。"华国锋粗鲁地骂道："这个婆娘!"他断然下令："东兴同志，你赶快发个通知，切断各省与勤政殿的联系。"汪东兴一拍胸脯。"这个好办，我只是担心——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是防不胜防啊！我再告诉你一件事，近来全国有很多人给江青写信劝进，举她当女皇，其中还有一些省级干部哩。"华国锋又惊又气地问："还有这事?好，她来当女皇，我还回湖南去。"汪东兴冷冷地说："只怕到那时，你连个老百姓都当不成，他们说不定在秦城给你准备好了房间哩。你去读读《史记》上的《李斯列传》吧，读了你就会明白了。"

华国锋莫名其妙地问："甚？读那做甚?"汪东兴笑笑说："我给你说说这个故事吧——"

那是秦朝始皇末年。始皇东巡，死于途中，宦官赵高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夺取政权。当时在始皇跟前的两个中央最高负责人一个是赵高，一个是李斯。李斯是丞相，赵高用高官厚禄引诱李斯，征得李斯的同意，秘不发丧，矫诏赐死太子扶苏、统帅蒙恬，夺取军权，扶持公子胡亥登基。赵高专擅朝政，指鹿为马。此时赵高的最大威胁是李斯，他矫诏逮捕李斯，严刑拷打，逼李斯承认谋反，遂处李斯腰斩。临上刑场时，李斯深悔当初没有果断地除掉赵高，反遭其害。他哭着对一起绑赴刑场的儿子说："你我今日想当一个老百姓，都是不可能了啊!"

华国锋听完这段故事，浑身毛骨悚然，汪东兴见话已点到，也就告辞了。

汪东兴走后，华国锋在房子里呆坐了半天。汪东兴的话没有把问题点透，但意思最清楚不过了，他是在劝自己果断地除掉江青。现在看来，这步棋自己不走也不行了。但这样一来，老百姓会怎么说，他们会不会说自己忘恩负义，主席尸骨未寒，就逮捕主席夫人。再说，这么大的事，没有党内有力同志支持，也是不能干的。这时，他想到叶剑英，只要叶剑英支持，这事就十拿九稳，但不知他是什么态度。

忽然，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华国锋一惊，一把抓起电话："叶帅——越南专家组——太好了!"

深夜里来的这个电话使华国锋大受鼓舞。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他信心百倍地去参加守灵。江青一见他就嚷开了："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国锋不动声色地说："好！好！等一会儿就开。"

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吊唁大厅接待完来吊唁的外宾后，除守灵的几

个外，都来到大会堂湖南厅举行会议。江青和华国锋吵了一通后，便挤出几点泪水说："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张春桥居心险恶地说："现在是国锋同志负责，主席的遗体自然是国锋同志负责了。"姚文元摊开一堆文件，朝大家扬扬："这是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江青迫不及待地喊叫起来："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江青的话使一些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悲愤地哭起来，纷纷指责华国锋犯罪。江青等几个人暗自高兴。叶剑英、李先念安如泰山，纹丝不动，瞧这出戏怎么往下唱。

华国锋看时候差不多了，站起身来问道："你们闹够了吗？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的努力工作，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

政治局委员们顿时鼓起掌来，江青等人却一下子泄了气，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华国锋又说："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

会议厅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华国锋关心地对大家说："肚子都饿了吧，散会!"江青喊道："我还有事……"但谁也没理她。

主席的遗体保存问题解决以后，江青等人仍不断地寻找各种借口和华国锋吵，并且要把毛远新塞进政治局，被华国锋一口拒绝。这天晚上，华国锋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见桌上放着一个大信封。一看封皮，啊，是叶帅来的。他打开封皮，里面既无信，也无文件，只装着一张今天也就是9月16日出版的一张《人民日报》。报纸上头版登着一篇通栏大标题的文章《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文章里有一句毛主席临终嘱咐："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叶帅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一道粗杠，又在后面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这是什么意思呢？华国锋记得很清楚，主席对自己的临终嘱咐是"按过去方针办"，为什么姚文元要改成"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呢？想了一会儿，华国锋明白了，原来这是他们要以领受主席临终遗嘱自居。既然毛主席的临终遗嘱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那么他领受的"按过去方针办"就是假的了。谁都知道，主席在临终时只会把遗嘱留给自己托付党和国家大事的人，如此一来，"四人帮"自然是主席最器重、最信任的人，自然应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自己呢，不仅要乖乖地交出权力，而且还会以伪造主席临终遗嘱而被打入死牢，怪不得叶帅这么重视。

现在，"四人帮"已把"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写入《人民日报》社论，造成既成事实，自己怎么办？华国锋急得在屋子里直转圈子。猛然，他想到悼词，对！只要在悼词里不写上这句话，"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句伪造的遗嘱就会被人们看穿，对，把住悼词。

华国锋主意已定，按电铃召来秘书，吩咐在主席追悼大会召开前，王洪文、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来，都不要接，就说我不在。我是真的要离开几天了。说完，让秘书调车，离开家，坐车走了。

华国锋离开后，果然张春桥打电话找华国锋，要把“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写入悼词，可是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张春桥急得直跺脚，但一点办法也没有。

华国锋到哪里去了呢?

华国锋搬到中南海的一所院子里，这是汪东兴给他找的。他搬过来后，汪东兴还专门抽调了一连湖南籍的警卫部队保护他。在这里汪东兴找他更方便了。

转眼间几天过去了，9 月 18 日下午 3 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100 万人参加了大会。根据中共中央通知，全国的火车、轮船、工厂的汽笛鸣笛 3 分钟致哀。当天晚上，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追悼大会的消息，江青成为消息中的主要人物。第二天的报纸更荒唐，在唯一的一张图片中，江青被摆放在中间位置，而华国锋却被挤到角落里。照片是真的，但经编辑剪裁后，就成了这样一幅画面，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江青似乎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气得把报纸一扔，粗鲁地骂了一句。

话音刚落，忽然中南海东侧，响起一声锐利的枪声，夜里听得十分刺耳。华国锋一惊，连忙派秘书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秘书走了，警卫部队跑来跑去在加强戒备，口令声、跑步声、操枪声响成一片。

不一会儿，秘书来了，身后跟着神色紧张的警卫团长汪东兴。华国锋慌忙问道：“是甚事？哪搭响枪?”汪东兴狠狠地骂道：“他娘的，把手伸到中南海里来了。国锋同志，我们已查清楚，是中山公园里响枪，王洪文调了 3 千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进驻了中山公园，刚才的枪声是民兵枪支走火。”3 千民兵，华国锋倒抽一口冷气。王洪文调这么多民兵干什么？华国锋惊问道：“你怎知道这么详细?”汪东兴说：“我是中办主任、警卫团长，墙外来了这么多武装部队，我能不知道吗？我还告诉你，王洪文他们命令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派大批便衣要进中南海，被我挡住了。”华国锋自嘲地说：“公安局长派便衣来对付我这个兼公安部长，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汪东兴正色说：“他们可不是自家人。国锋同志，事已至此，我就明说了吧，你要壮士断腕，痛下决心，立即把他们抓起来。当断不断，反为其乱，人家已经把枪抵到你胸口上了，再不下决心，则恐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下一次的枪声，就不是走火了。”

华国锋取了支烟，用颤抖的手点上（华国锋平时不抽烟），回过头来严肃地说：“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现在只有干。问题是怎么干，靠谁来干?”汪东兴一拍胸脯说：“你只要点头，一切都由我来布置。”华国锋扔掉吸了一口的烟说：“干！干！干！抓了再说。”汪东兴兴奋地说：“好，我下去布置。”华国锋唤住他：“慢！这事光咱们俩还不行，还得把叶帅拉上，他后面有很多人呢。”汪东兴想想，一拍胸脯：“这事也包在我身上，我请陈云同志找他商量。”华国

锋点点头说："很好。"汪东兴关心地建议："国锋同志，你是不是也挪挪地方?"华国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摆摆手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的警卫团了。从今天起，咱俩就是绑在一根线上的两只蚂蚱。"汪东兴激动而又感激地说："国锋同志，我一定像保卫主席那样保卫你。"

汪东兴走了，华国锋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叶帅对这事是什么态度。他知道叶帅这些人恨透了"四人帮"，但在这生死关头敢不敢豁出命来干还是另一码事。这一个时期以来，叶帅除了参加一些最必要的政治局会议和吊唁活动外，都一直住在西山，就是来开会，也是会一散就走，叫人根本找不到。他对当前的局势是怎么想的呢?

仅仅过了一天，汪东兴满面春风地给华国锋打电话，请他到自己的办公住宿地南船坞来一趟，有要事相告。华国锋明白，准是有人从西山回来了，他急忙乘车去南船坞。

南船坞位于南海湖里，有一小石桥与陆地相连，桥头上有哨兵站岗，安全幽静。即使这样，汪东兴尚且不放心，一直把华国锋领到最里间。华国锋着急地问："那事怎么样了?"汪东兴小声地说："成了，叶帅让陈云同志转告你，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要抓就要把那4个人一起抓起来。叶帅说，你是第一副主席，请你拿主意，他保证全力支持。"华国锋追问一句："叶帅是这么说的吗?"汪东兴保证说："一点没错，叶帅是这么说的。"华国锋还不放心。是啊！此事非同小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不得不谨慎。汪东兴的话他相信，但是最好能当面跟叶帅谈一下。

汪东兴看他又迟疑起来了，暗自着急，提醒他说："国锋同志，此事不能拖长了，夜长梦多。我再告诉你两个新情况，上海正在日夜突击给民兵发枪，据可靠消息，上海已有10万民兵穿上了没有帽徽领章的军服。他们也把手伸到了警卫团，在拉拢一些指挥员，现在我可以绝对地保证中央警卫团服从你的指挥，但时间一长，那边风一大，我就不敢说了。"

华国锋着急地在办公室转来转去，"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正着急间，秘书提进来一只木箱："叶帅派人送来的，要马上请汪主任亲启。"

汪东兴挥挥手，让秘书退出，割断捆绳，打开箱盖，里面是一箱黄澄澄的猎枪子弹，中间并排4颗被涂成黑色，分外惹人注目。汪东兴立即明白了叶帅的用意，他把4颗黑色的子弹递给华国锋，华国锋收起子弹，吩咐汪东兴说："从现在起，你给我盯紧那4个人。"

那4个人现在也是活动频繁。9月21日上午，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借着开卫生会议的机会到北京探听风声。一进宾馆，还未喘口气，张春桥就派车把他接到钓鱼台16号楼。两人坐定后，张春桥就问："上海准备得怎么样了?"徐景贤小声说："你放心吧，已经发了5万多支枪，800门炮，几条轮船已被改装成军舰。这事开头抓得不紧，后来丁盛来了一趟，跟马老谈了一次，马老非常重视，督促着，才发得这么快。"张春桥问道："丁盛都讲些什么?"徐景贤说：

“丁盛到上海后，找我、马老、王秀珍谈话。丁盛说，要准备打仗，真打起来，六十军他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军长、政委都是许世友的人，靠不住，不巧的是这个军还正好摆在南京、苏州、无锡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张春桥不解地问：“这个六十军是南京军区部队，为什么竟敢不听南京军区司令的指挥?”徐景贤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往沙发上一靠说：“还不是有人在支持他，这个军的军长、政委都是许世友以前的警卫员和秘书，只听许世友的，根本不理丁盛。听说，军委里有人也支持六十军这么干。我还听说，把六十军摆在上海跟前，就是叶剑英和许世友的主意。”张春桥听了，阴着脸说：“看来人家也没有睡觉，早把子儿布好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决心要大，动作要快。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要准备经受大考验，打大仗。党内要出问题，还是在中央出。”徐景贤记下张春桥的讲话，准备回去传达。张春桥说：“你再向洪文讲一下这个情况。”

徐景贤来到钓鱼台2号楼时，王洪文正摆弄着一支小型冲锋枪，见徐景贤进来，放下枪招呼他坐。寒暄几句，王洪文就单刀直入地问道：“我让马老发的那批枪发下去了没有?”徐景贤忙不迭回答：“发下去了，发半自动步枪五万两千多支，自动步枪两万五千多支，机枪五百挺，迫击炮三百门……”王洪文听完汇报，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光发轻武器怎么行。要组建坦克师、装甲师、重炮师，打仗没有重武器怎么行？还要搞军舰，上海是个大海港，没有军舰怎么行？来不及的话，先改装轮船。”徐景贤为难地说：“上海没有控制坦克呀!”王洪文眼一瞪：“军队的许多重武器都是上海生产的，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造重武器呢？景贤，这是个大事业，我们要把上海民兵办成我们的黄埔军校。”徐景贤嘴里连连答应，心里却在想，这个臭流氓到中央后到底长了点见识，还知道有个黄埔军校呢。

谈到这里，王洪文又问毛远新：“你从沈阳军区调的部队到哪里了?”毛远新说：“有两个师正向北京运动。我对军队的问题真担心，一旦有事，仓促组建的民兵师不是正规部队的对手。现在那些将军们都络绎不绝地上西山找叶老头，来者不善啊!”王洪文说：“你可以派人上山探听探听嘛。”毛远新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山上戒备森严，不是军委的人根本进不去。听说杨成武又调了一个加强团到了西山，各路口高地都架上了机枪，插翅难进。”王洪文冷笑两声，拍拍小型冲锋枪说：“我就不信这个邪，是龙潭，我也要去闯闯！调车!”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九十九回 老书记划策帅府院 叶元帅定计南船坞

话说王洪文乘车连夜赶往西山，留在钓鱼台的秘书给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打了个电话，说王洪文上西山了，请他给西山的警卫部队打个招呼。杨成武接到电话，连连跺脚，这个时候，怎么能让王洪文上西山？他到西山去要干什么？杨成武本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把王洪文挡在山下，可王洪文是军委常委，他没有理由阻止王洪文上山。于是，他便赶紧把这一紧急情况通知了在西山的叶剑英。

叶剑英搬到西山以来，傅崇碧、王震、陈云、杨成武、李先念等人不断地上山来找他，这些人中的每一位的后面都联系着很多人。傅崇碧，这位北京军区副司令的后面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广州军区副政委钟汉华、军委成员罗瑞卿、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这些人现在都在解放军总医院养病。主席逝世后，他们看到形势险恶，特别委托傅崇碧上山看叶帅，请叶帅壮士断腕，速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王震呢，还在主席逝世前就已成了叶剑英的参谋长，在外面做了不少联络组织工作，话没点透，但大家都明白王震的意思，将军们都同意王震的主张。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自然经常要上山请示工作，他向叶帅汇报了“四人帮”突击发枪、组织第二武装，加紧图谋叛乱的情况。叶剑英叮嘱他加紧与各军兵种总部、大军区的联系，让许世友加强对摆放在上海附近的六十军的控制，由军委直接出面，扩充六十军的部队和装备。杨成武下山后，立即派出了数十个军委工作组到各大军区、兵种司令部去工作，工作组一把手全是在军内战功显赫的将军。这些工作组到任后，协助许世友、杨得志等司令们进一步清除了部队中的可疑分子，对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则加强了控制，防止丁盛、孙玉国等人背着军委调兵。陈云上山，则是代表了华国锋和汪东兴，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华国锋在政治上有号召力，汪东兴执掌 8341 部队。叶剑英遍读史书，知道这支部队的厉害。历史上多少次宫廷内的政变，都是依靠了内廷卫队。西汉初年，吕后在未央宫抓捕韩信，靠的就是宫廷卫队。春秋时，楚成王的儿子商臣，策动宫廷卫队发动政变，包围成王。成王好吃熊掌，向儿子请求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逼他自尽。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二次世界大战快进入尾声，德国国内发生了推翻希特勒的政变。希特勒紧急中策动指挥部队行动的连长倒戈，连长转而指挥士兵逮捕了参与政变诸人。李先念上山，

则是代表了一大批党内老同志，一想到这里，叶剑英就想起了前不久和一名老同志的一次会见。

那是9月16日下午，叶剑英在城内住所午睡刚起，忽然秘书紧张地跑进来报告："首长，客人来了。"叶剑英惊觉地问："谁?"秘书欣喜而小心地附耳一番。叶剑英一摆手："快请。"

秘书领着客人进来，叶剑英迎上去握握手，便挥手让秘书退出，把客人领进内室，关紧房门。这时叶剑英才问："你怎么跑出来的?"客人说："刚才司机要去试车，我乘警卫不注意，就上了车，直奔你这里来了。"叶剑英神色严峻地说："这段时期，你要特别注意安全。平常在家，把门关死，我让杨成武派一些兵在附近驻下来，一有动静，你就鸣枪。"说着，叶剑英打开柜子，取出把精致的小手枪递给客人。

客人藏好手枪，对叶剑英说："主席去世了，形势很复杂，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他们死，我们才能活。我是不能动了，全党、全军都把希望放在你身上。"叶剑英点点头说："我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不知你有何高见?"客人伸出三个指头说："有上中下三策供你选择。"叶剑英急问："哪三策?"客人说："征得华国锋和少数主要政治局委员同意合作，采取极隐秘、快速、果断动作，闪电式地突然逮捕四人帮，再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合理、合法，稳妥可靠，此乃上策；由你代表军委出面，指挥军队行动解决问题，然后挟兵势之威，逼迫不服者就范。这个办法虽然省事，但以后的麻烦较多。此乃中策。"

说到这里，叶剑英问道："那么下策呢?"客人冷笑两声说："下策吗?那就是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表决，正式罢免'四人帮'。但现在政治局的情况你是清楚的，恐怕不但罢免不了'四人帮'，搞不好反让'四人帮'阴谋得逞。苏联赫鲁晓夫用中央委员会搞掉马林科夫的教训不可不注意。"

叶剑英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对，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争取华和汪。"客人小声说："老夫再献一策，你把今天的这份报纸给华寄去，华看了之后会比咱们还着急。"叶剑英尚不明白，客人指着社论中"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主席临终遗嘱说："他们伪造主席遗嘱，先声夺人，是想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夺取政权。如果阴谋得逞，第一个被开刀问斩的将是保留主席遗嘱的华国锋。"

叶剑英用红铅笔在"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句子下，重重地画了两道粗线，又在后面打了个大问号。客人临走时说："叶帅啊，要快打慢，不能让他们先动手。"叶帅点点头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走在他们前面。"

客人走了以后，叶剑英立即让秘书把报纸寄给华国锋。

随后，邓颖超、王震又来看他，叶剑英与他们密谈了抓'四人帮'的问题，临上西山时，特别嘱托王震与杨成武经常保持联系，保护好邓小平。

自与客人会面以后，捉凶大计已定，叶剑英决心争取华、汪合作，在老同

志和军队的支持下快打慢，闪电式地擒获“四人帮”。华国锋、汪东兴已经向他初步转达了他们的想法，但是叶剑英还想与他们面谈一次，当面敲定，这事又不好过于匆忙。所以，这几天来，叶剑英表面上流连于山色峰景之间，其实忧心如焚。

这天傍晚，叶剑英独坐西山峰顶上的“风雨亭”，看着一轮夕阳渐渐西沉。九月的西山，满山红遍，分外撩人，叶剑英不禁吟起唐诗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夕阳把天际映成一片火红，山上的树叶沐浴在一片红光里，使叶剑英想起了广州暴动中那血与火组成的历史画面，他轻轻叹口气，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国怎能让坏人篡夺，不能百年之后，愧对先烈。

忽然，叶剑英发现不远处的25号楼亮起了灯光。25号楼是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准备的一座房子，自周恩来病重后，一直空着，今日忽然灯亮，是谁上山来了呢？他忙派秘书去问。过了一会儿，秘书紧张地跑回来报告：“叶帅，王洪文上山来了，住进25号楼。”叶帅大为恼怒，问秘书：“谁让他上山来的？”秘书无奈地说：“他是军委常委，杨总长挡不住啊。”叶帅一想也是，吩咐秘书、警卫员们：“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可得警醒点儿。”号称“马头”的那位贴身警卫拍拍腰间枪说：“首长，你放心，谁敢来邪的，我立马让他见阎王。”按照警卫体制，叶帅的警卫部队和警卫员都是军委配属的，不由汪东兴统辖的警卫团管，叶帅对他们是放心的。

估计王洪文上山，肯定要来“拜访”，叶剑英率警卫秘书回到自己住的15号楼内，对秘书嘱咐一遍。

王洪文坐着车来到15号楼。其实，两楼相距仅几十步，何必这么摆谱。叶帅的秘书迎出来，对王洪文抱歉地说：“副主席，叶帅不在家。”不在家？王洪文没有说话，满脸是狐疑的神色。秘书忙解释说：“叶帅真的不在家，他出去了。”出去了？王洪文假作关心地批评秘书：“叶帅出去了，你为什么不跟着？叶帅要出点事，你担待得起吗？”秘书连连点头：“副主席批评得对，我一定改正。”王洪文眼睛一闪：“叶帅到哪里去了？我们赶快找找，这个时候，叶帅可不能出一点事。”秘书忙招呼工作人员：“都来跟我找叶帅。副主席，你先坐会儿，我们去找叶帅去。”王洪文决断地说：“坐？还有闲工夫坐着？我和你们一起去找叶帅。”

秘书阻拦不住，便让王洪文和他们一起去找叶帅。他们刚到门口，就见叶帅和几个警卫战士及女秘书从山路上走过来，叶帅手里拿着一枝西山红叶，边走边嗅：“西山红叶啊，别看还没红透，可散发着一股清香味噢。”

王洪文远远喊了一声“叶帅”。叶剑英站住了，脸上现出惊喜的脸色，回答了一声“副主席”。秘书急步走过来，埋怨地说：“叶帅，你只顾着欣赏西山风光，让副主席等了好一会了。”叶剑英笑着说：“对不起，对不起，只恨桑榆晚，偏爱西山秋”。叶帅说着便咳起来。王洪文命令秘书：“赶快把叶帅扶进

去。记住，以后再不要让叶帅在外面待这么晚了。”秘书说：“是，是。”他一把接过警卫手中的二胡，扶住叶帅说：“老人家，回家去吧。”

王洪文看着叶帅进了家，微微地笑了：叶帅老了！

王洪文一走，叶帅和工作人员哈哈大笑。原来，刚才的这一幕都是演给王洪文看的，让王洪文相信，叶帅现在每天都在贪恋西山秋色，他事不问。王洪文果是阅历浅，叫叶剑英给哄了。他看叶剑英迷恋山水，无暇他顾，便放心地四处打猎、游玩去了。

鹤飞去兮，西山欠缺，
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翻然敛冀，宛将集兮，
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
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
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
其下有人兮，
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
躬耕而食兮，
其余以饱汝，
归来归来兮，
西山不可以久留。

西山不可以久留。叶剑英正要吩咐手下搬家，忽然山下传来电话，李先念副总理已到山下，没有带车，要求上山见叶帅。叶剑英听了顿时皱起眉头，王洪文近在咫尺，这位国务院的四大名旦之一的李副总理怎么偏在这个时候上山来了。本想不见，以免惊动王洪文，打草惊蛇，可是又一想到李先念把车藏于山下，独身上山，定有重大事情相告，便立即派儿子叶选平开着家里平常采购用的那辆旧吉普车，去山下把李先念带上来。

吉普车上了山，恰好王洪文又出猎去了。其他人也没有去管这辆采购车。李先念在叶帅住宅门口下了车，立即闪进楼里，一见叶帅，不及寒暄，掏出手绢擦起汗来。叶剑英惊问道：“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上山来了？”李先念喘着气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叶剑英明白了，挥挥手，让叶选平、张燕都退出去，开大了收音机，顿时，《智取威虎山》的新京剧唱腔淹没了屋里的一切声音。

叶剑英插上门，对李先念说：“说吧。”李先念神色严峻地说：“他们要动手了！”叶剑英微微一惊，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先念说：“昨晚华来找我——”

原来，昨天晚上，江青、张春桥又把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请去，递烟倒茶，异常热情。张春桥问他："你听谁的指挥?"李鑫回答："我听党中央的指挥。"张春桥说："现在主席不在了，江青同志就代表中央，今后你要听江青同志的命令。"李鑫回答："是！今后我听江青同志的命令。"江青接着问了问中央警卫团的部署情况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及警卫情况，然后说："你把那一个营的预备部队切实掌握好，10 月 10 日之前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让你抓谁，你就抓谁。现在一些走资派想乘主席去世之机，推翻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警卫战士一定要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李鑫回答说："是!"江青又许愿说："事成之后，你来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

江青、张春桥为什么敢找李鑫谈这么大的事呢？原来近些时来，张春桥一直在观察李鑫，经常找他谈话，发现李鑫对汪东兴似有怨气，便着意拉拢，暗示他控制警卫团预备部队，参加政变，李鑫也欣然表示同意。他觉得时机成熟，这才约江青和李谈话，点透机关。

李鑫走后，江青和张春桥密议一番，觉得各种准备工作基本成熟。外有卫戍区、民兵的支援，内有警卫团做内应，只要动手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抓起来干掉，反对者必然是群龙无首。然后再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宣布他们的罪状。很多中央委员是造反上来的，自然是站在他们一边。罪名也定好了，就是伪造主席临终遗嘱、图谋叛乱。反正舆论工具早已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给他们安的罪名舆论早已散布出去了。商议了半天，江青和张春桥决定 10 月 10 日正式动手。

江青和张春桥哪里知道，党心、军心、民心早已站在反对他们的立场上了。李鑫表面上对他们答应得很好，一转身就向汪东兴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汇报了"四人帮"的阴谋。汪东兴早就防着"四人帮"向警卫团伸手，特命李鑫向张春桥靠拢，取得他们的信任，以掌握他们的行动计划。听了李鑫的汇报，汪东兴急忙带着他来见华国锋，神色紧张地说："国锋同志，他们要动手了!"接着把"四人帮"的密谋告诉他。华国锋听了，惊出一头汗，连问汪东兴："怎么办？你们有什么好主意?"汪东兴说："老李有个好主意。老李，你说呀!"李鑫扬扬眉毛，做个果决的手势，断然说："学苏联处理贝利亚问题的办法，以开会名义秘密逮捕。"华国锋心中似有不忍："主席的夫人呢，主席泉下有知……"汪东兴打断他的话，冷笑两声说："她算什么主席夫人，主席在世时都讲过，'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动手抓他们，正是继承主席遗志。"华国锋又犹疑地问："抓这几个人非同小可，谁去抓呢?"汪东兴刚毅而果决地说："一切问题我全都考虑好了，你只要下决心，其他的工作都包在我身上。"

华国锋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狠狠地说："我下决心了，就按照你们的办法办。"汪东兴大受鼓舞，抽出一支小手枪给华国锋："为防万一，请你拿着。"华国锋过去率队从山西走到湖南，背过、带过各种型号的手枪，他熟练地打开

枪机，取出子弹交给汪东兴，只在弹盒里保留了一颗子弹，然后把弹盒“咔”一声安在手枪上，一推栓，子弹上了膛，关上保险，放进衣袋。

汪东兴不明白华国锋的意思，问他：“国锋同志，你这是……”华国锋淡淡地一笑说：“行动成功了，用不着这个。失败了，我也只需要一颗子弹就够了。”汪东兴明白了，华国锋的意思是行动失败，他将用这颗子弹自杀殉国。汪东兴顿时浑身发热，向华国锋保证说：“国锋同志，主席不在了，你代表中央除凶安国，一定会取得胜利。这颗子弹，你就给敌人留着吧。”

华国锋准备星夜上西山和叶帅联系。他深知，没有叶帅的支持和合作，这事就难成功。汪东兴认为这太危险，建议找李先念上山和叶帅联系，请叶帅下山，当面敲定计划，华国锋同意了，亲带 4 名警卫员坐车去西城皇城根找李先念。汪东兴不放心，又带了十几个警卫战士坐吉普车随行保护。华国锋来到李先念家，语气紧迫地说：“据非常可靠情报，‘四人帮’马上要动手了。你去西山一趟，请叶帅下山共商大计。”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华国锋点点头说：“我已下死决心了，请叶帅下山，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报纸发表消息，以正视听。”李先念点点头说：“你下决心了就好，我明天就上山去。”

第二天，李先念去香山植物园参观。参观中，突然甩开人群，从展室后门上车直奔西山。

李先念讲了华国锋下决心的前因后果后，叶剑英明白，决战的时刻到了。他对李先念说：“请你回去转告华国锋同志，明天我下山去看他。”

第二天，叶剑英调车下山，临行前嘱咐叶选平：“立即离开西山，搬到玉泉山去。”

李先念已把会谈的结果通知了华国锋。叶剑英进城后直奔中南海华国锋的住处。两个人打开收音机坦诚相见，一是一，二是二地密谈起来。

两人首先通报了“四人帮”加强策划政变的一些情况。叶剑英说：“事情很清楚，他们要动手了，我们慢了，就要遭毒手。”华国锋说：“是的，所以我请你来，赶快想个法子。”叶剑英说：“‘四人帮’干尽坏事，天怒人怨，党心、军心、民心是站在我们立场上的。但是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只能采取特殊的斗争方法。我已想好了，可以用抓黄永胜的办法来抓他们。”华国锋问道：“你的意思是——”叶剑英说：“是的，利用开会，把他们召来，立即逮捕。”华国锋迟疑地问：“这行吗?”叶剑英鼓励他说：“你不要怕，你是第一副主席，只要你决心下得狠，一定能成功。”华国锋说：“好，我是什么思想准备都做好了。”叶帅点点头，又问：“汪东兴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了?”华国锋说：“我正想请你到东兴那里一起谈呢。”叶剑英一口答应下来，“可以，干这事离不开东兴同志。”

第二天，也就是 9 月 27 日。叶剑英在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后，立即带着 3 名警卫坐车来到汪东兴在南船坞的办公住地，汪东兴和华国锋已经在

等着他。叶剑英进到里屋后，汪东兴在桥头、屋外加派了岗哨，便向华、叶汇报了新得到的情报："据可靠消息，上海十万民兵已齐装满员进入战备状态，还有几十万二线民兵在动员中，民兵的武装战船已经在上海港拦截海军船只，重要部门已由民兵部队控制起来了。上海市区已经刷出大标语，要求王洪文当党中央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江青当军委主席。王洪文已调上海民兵来北京组成新的中央警卫团，毛远新私调沈阳军区两个师已到山海关，北京郊区的一个坦克团已做好了进城的准备。"

华国锋、叶剑英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汪东兴又补充了一句："上海的红纸、鞭炮已销售一空，说10月10日有特大喜讯。"

叶剑英点点头："事情是再明显不过了，现在咱们商量一下具体办法吧。"他问汪东兴："你能保证行动成功吗？这可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噢。"汪东兴说："没有问题，这一点你们尽可放心。"叶剑英摇摇头："还是要小心些，直接参加行动的必须是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武艺高强的军官，要选那些和"四人帮"有深仇大恨的人，比如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前的贴身警卫，国锋同志从湖南带来的贴身警卫，我的贴身警卫。人不要多，20个左右就够了。"汪东兴说："这容易。"

华国锋说："这个办法很好。明天，我让新华社发个消息，宣布国防部长叶剑英会见施莱辛格，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叶帅还是全军的统帅。"叶剑英欣然同意，又提出几条措施：一、"四人帮"被捕后，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通过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议；二、立即改组上海市委和上海警备区；三、立即派人带部队控制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夺取舆论工具。叶剑英伸出4个指头说："关键是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人锁起来了，有军队摆在那里，谁敢附逆！"汪东兴陡起杀气："附逆者就地处决！拒捕者就地处决！"叶剑英剑眉一扬，斩钉截铁地说："对，在这种时刻，必须果决，决心要狠，手要狠，否则，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主要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什么时间动手，在什么地方动手。华国锋说："前些时，张春桥要求召开常委会，讨论编毛选五卷的问题，我看就以这个名义请他们来开会，他们不会不来。"叶剑英同意，又补充说："把姚文元也叫来开会，他不是常委，就说请他做一些文字工作。没有理由请江青，就在201抓她。动手的时间呢？"华国锋说："我看不宜早，也不宜迟，定在10月6日吧。"汪东兴补充说："10月6日晚上吧。这种事只能在晚上干，地点就选在怀仁堂，这里好布兵。"

华国锋、叶剑英都同意这个地点。叶剑英提醒华、汪："这是个关键环节，咱们再仔细推敲一番，还有参加行动的名单和整个计划得再商量推敲，要反复推敲，要想出几套应急办法，必须是万无一失。"

于是，三个人在密室内商议起来，反复推敲论证每一个细节。最后三人觉得差不多了，叶剑英准备离开，华国锋、汪东兴拉着叶帅的手，决战前的激动

使他们反而默默无语。三人最后约定，行动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外出，尤其不要应约到钓鱼台、201 去。

叶帅紧紧地握握华、汪的手，准备告辞，忽然值班军官打来电话，江青闯进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回 敢死队誓师中南海 “四人帮”就捕怀仁堂

话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正在商议逮捕“四人帮”的事，忽然军官报告，江青闯来了。三人大惊，汪东兴连忙把华、叶二人送到屋后码头，由值班军官驾交通艇把他们送走。

交通艇走远了，汪东兴才迎出去，把江青请进来。江青因为被在外晾了一会儿，很不高兴，一进来就骂开了：“好你个汪东兴，主席才逝世几天，你就对我摆起架子来了。”汪东兴赔着笑说：“江青同志，别误会，刚才我正在厕所……”江青一捂鼻子，连连嫌恶地摆手：“别讲了，别讲了。”

汪东兴请江青坐下，问道：“江青同志，你找我有什么事?”江青故作亲热地说：“现在主席去世了，中央主席空着，长此下去不好。我想在政治局提出问题，先找个能继承主席遗志的，有能力、威信高的同志代理一下主席职务，三中全会时再予以追认。我们都是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的人了，你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汪东兴反问道：“主席不是已经指定国锋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吗？现在正是主席丧事期间，咱们还是先集中精力把主席的丧事办好。这事办完了，再来办选举主席的事。这不仅是我的想法，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这么想的。国锋同志也理解这一点，表示再等一段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江青问：“什么时候?”汪东兴说：“国锋的意思是最快也得到12月中旬。”江青心中一喜，又说：“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应深入到基层中去，同群众一起度过这个节日。”汪东兴问道：“你看都去哪里啊?”江青想想说：“让叶帅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让国锋和洪文去首都钢铁公司，春桥和文元去北京重型机械厂，我去电车公司。”汪东兴心里明白，嘴里不说，只是让江青去找华国锋，征求华国锋的意见。

江青见话不投机，也就不再谈了，起身告辞，汪东兴把她送上桥头。

江青走了，汪东兴在屋里急得团团转。他凭直觉，就感到这是个阴谋，江青提出的几个工厂，都是首都工人民兵主要力量集中的地方，万一“四人帮”在这里暗设机关，对华国锋、叶帅分别动手，那可就全砸了。汪东兴果断地拿起电话，向华国锋汇报了这一情况。没想到江青已找了华国锋提出了这个要求，华国锋到底是忠厚老实，缺乏中央斗争的经验，竟答应了。汪东兴大惊，再三陈述利害关系，华国锋为难地说：“我已同意了，一些政治局委员也同意了，不去不好。”

汪东兴放下电话，心凉了半截，惶急中想起了叶帅。好，找叶帅，只有叶帅才能阻止这个阴谋，他急忙拿起电话拨叶帅的号码。叶帅听了汪东兴的报告，又气又急地说：“啊呀，国锋同志怎么这么轻信，这种时候他还一个人离开北京。你放心，我来劝他。”汪东兴放下电话，擦了擦头上的汗。

且说华国锋正准备着到首都钢铁公司去，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叶帅打来的。叶帅在电话中问：“听说中央领导同志都要去工厂?”华国锋说：“是的。”叶帅说：“这不行啊。这么多中央领导下去，前呼后拥，将会严重干扰基层群众的生活。我不去，你也别去。”华国锋想想也是，便同意了：“好，我们都不去了，让基层的同志好好休息几天吧。”

这时，江青、王洪文已指挥一些人做了精心的准备，一旦华、叶到来，便制造爆炸事件，趁混乱干掉华、叶，一举夺权。

正在高兴的当口，华国锋忽然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了不干扰基层群众的生活，让大家过好节，原定中央领导同志去基层的计划取消。江青想反对，但是华国锋的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无法反驳。

江青放下电话，坐车来到钓鱼台，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找来，通报了这个变化以后，问道：“华是想不出这个主意来的，这会不会是叶的主意?”王洪文说：“不会不会，叶现在身体很不好，又咳又喘，哪有精力顾这事。”江青气恼地说：“主席刚去世，华就这么不听话了。我连这么点事都定不下来，以后还怎么工作?”张春桥劝道：“你也别生气了，他没有几天日子好过了。我还有个主意——”张春桥放低声音，把他的想法端了出来。众人一听叫好，王洪文拍着胸脯说：“具体行动我来指挥，叫刘传新抽100名便衣上天安门，中山公园的3000民兵做好战斗准备，调山海关的两个师星夜奔赴京城。只要抓住了华、叶，一切都不成问题。”张春桥点点头说：“我们是北靠沈阳，南靠上海。我已派人向上海市委下了动员令。文元同志在舆论上也得有点准备。这次干不成，就让李鑫在中南海动手，或者追查华国锋伪造主席临终遗嘱。三样中，一样得手，都可以解决问题。总而言之，10月10日之前一定要解决问题。”

10月1日晚，根据江青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天安门城楼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四人帮”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汪东兴也深知其中奥妙，密布岗哨。中央警卫团一个营的部队手持冲锋枪，全副武装地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各个人口和制高点，城楼四周站满了武装警卫。

是日晚7时，会议准时召开。城楼里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汪东兴无心听，全神贯注地注意楼外的动静。忽然，他隐约听到城楼下传来一阵嘈杂声，急忙走出楼外。只见城楼下100名警察嚷嚷着要冲上楼来。武装哨兵“哗啦”一声一齐拉开了枪栓。带班军官大声命令：“你们再敢前进一步，我就下令开枪。”说着，他拔出手枪，推上子弹，严阵以待。警察们虽有短枪，但自知不是警卫部队的对手，不禁后退三步。

过了一会儿，一辆轿车从公安部的方向开过来，一个人下车后和警卫部队

的带班军官讲了几句什么，值班军官命令副手搜检了他的身上，便放他进来了。

这是谁呢？汪东兴正在猜测的时候，那人已上了城楼，走过来了。汪东兴摸摸腰间的手枪，迎了上去。原来来人是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此人是随同王洪文在上海打砸抢的小兄弟。王洪文到中央后，把他调来北京，担任了公安部副部长，实际执掌公安部大权。

汪东兴迎上去问："是祝家耀同志啊，你有什么事吗？"祝家耀说："我找洪文同志。中央今天命令北京市公安局抽100名干警上天安门城楼执行保卫任务，警卫团就是不让上来，我要找洪文同志报告。"汪东兴笑中带刺地说："城楼上的警戒由警卫团负责，这是警卫条例中写得明明白白的，干警上来做什么？你快让他们撤了。"祝家耀不听："我要找洪文同志报告，这是中央的命令，你无权干涉。"说着，他就要往里闯。两个游动哨兵早过来把他用枪指住，汪东兴严厉地说："你快退下去，否则我要履行职务。"他"唰"地抽出手枪，对准祝家耀。见此阵势，祝家耀无奈地退走了。汪东兴命令两个哨兵："把副部长送出去，传我的命令，从现在起，不许放任何人进来，违令者军法从事。"

祝家耀被押送出金水桥，一挥手，100名干警全撤了，祝家耀也坐车回了公安部。

真险，刚才稍一大意，让祝家耀找到王洪文，今晚就要出事。王洪文当然是要干警上城了，他是副主席，一张嘴谁好反对。100名干警上了城楼，双方力量立即会起变化，因为部队大多散在楼下，楼上人数不多。如果"四人帮"乘机突然发难，追查华国锋伪造遗嘱，城楼上的这些不明真相的人还不是跟着跑。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场政变马上就可发生，100名干警动起手来，天安门城楼上就是腥风血雨。汪东兴早知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把大批心腹调进了公安局，加强训练，战斗力颇强，以备不时之需，这100名干警大概就是这些人了。

汪东兴想到这里，有点后怕，同时也觉得城楼上部队人数少了些，忙命一个连的警卫团部队上楼增援。

王洪文、华国锋、江青等人都听到了城楼上杂沓的脚步声。王洪文、江青以为干警上楼了，好不得意。华国锋、叶剑英却疑虑起来。正在这时，汪东兴进来了，神态安详地在主席台一边坐下来。华国锋侧脸看看他，汪东兴写了一张条子，没有折叠传给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江青传条子时看了一下，原来是汪东兴通知华国锋，新增一连警卫团士兵赶到城楼，城楼上一切正常，并无闲杂人员，请放心开会。

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看了条子，脸色顿时不自然起来。华国锋、叶剑英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散会以后，人们步出楼门，只见城楼的空地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个个端着冲锋枪，神色凝重，岿然不动。华国锋听了汪东兴的一番汇报，才知刚才天安门城楼上还有这么一回热闹事，若不是汪东兴果断处置，这会儿的天安

门城楼上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呢。

华国锋知道，天安门城楼上不是密谈之处，便下楼回家，准备把此事通知叶剑英，但叶剑英却去玉泉山了。玉泉山是中央领导人的休养地，戒备森严。自王洪文上西山后，叶剑英怕遭他暗害，立即搬到玉泉山。其间，又不时到西郊的军事科学院军委部门驻地休息，外人根本摸不清他的确切住址，华国锋想找他也找不着。但在10月4日上午，叶剑英却带警卫三人突然赶到华国锋家。

华国锋知道叶帅有要事相告，屏退左右。叶剑英打开收音机，掏出一张本日新出的《光明日报》放到桌子上，对华国锋说：“你看看，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华国锋看时，原来一版登着一篇题目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社论。社论杀气腾腾地宣布，“谁反对毛主席的临终遗嘱谁就是修正主义头子。”华国锋暗吃一惊，“四人帮”果然是要用临终遗嘱问题搞政变了。叶剑英说：“现在千钧一发，就看谁走在前面。军队已做好了准备。杨成武已把28军调到塘沽一线，堵住了沈阳部队入京的大门，李德生已下令开到山海关的毛远新私调的两师人马立即回防。上海的东海舰队和附近的六十军已做好一级战备，上海有人捣乱，他们就会马上行动。我已令彭冲控制南京军区，防止丁盛出问题。现在不知东兴那里怎么样了，这是关键的一环啊！”

华国锋深以为然，但他深感自己缺乏经验，难以把握。叶剑英想想，断然说：“我去东兴那里一趟，再好好落实一下。”华国锋感激地说：“全靠叶帅了。”叶剑英摆摆手说：“不要客气了，这是主席临终给我的嘱托。我答应主席，全力以赴支持国锋同志，主席听了才松了手。”

经过叶帅反复推敲，最后敲定了行动计划。汪东兴当即把华国锋请来，拿出几份会议通知，请他签字，华国锋看也没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0月5日晚，汪东兴腰插手枪，和衣而卧，听着外面的动静，随时准备起来战斗。天亮后，他才放心地睡去。两个小时后汪东兴惊醒，起来擦了把脸，整整军容，喝了一瓶补剂，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浑身有力。

他先把办公厅几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找来，问了问敌情，见没什么变化，便单身一人来到一座不大的四合院，这里似无人居住，院门紧锁。汪东兴走到门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哨兵，打开门锁，让汪东兴进去，又把门拉上，潜伏在树后，留神地观察着周围动静。

院子里静悄悄的。汪东兴推开正厅大屋，一群英武的军官一下子站起身来。这是汪东兴和叶剑英精心挑选的敢死队，今夜他们就要扮演中国现代史上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的主角。他们共有18个人，全是跟随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多年的贴身警卫军官，身高力大，武艺高强，机敏过人。今天，他们个个腰挂双枪、匕首，趁天未亮，从中南海的休息地集中到这座院子中来。

汪东兴点了点名，18人一个不少。汪东兴随即进行战前动员：“同志们，现在有几个大反革命分子策划反革命阴谋，妄图推翻党中央，推翻毛主席指定

的革命接班人，解散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警卫团，搞反革命政变，我们能答应吗?”

18 个军官低声怒吼道：“不能!”

汪东兴挥挥拳头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要上台，不仅千百万人要人头落地，你们也将逃脱不了他们的毒手。现在党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要我们把他们抓起来，你们敢不敢干?”

大家又是一声响应：“敢!”

汪东兴说：“好，我现在宣布，今晚 8 时，根据党中央命令，我们在怀仁堂逮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大反革命。”

由于保密，事先并未对这些人说明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现在他们陡然听说要抓这几个大人物，顿时愣住了。汪东兴冷笑两声说：“你们害怕了?”这 18 名军官自参加警卫工作，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临来时，华国锋、叶剑英又分别找他们谈了话，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哪有怕“四人帮”的道理。从刹那间的惊愕中清醒过来后，18 个人一齐低吼：“不怕!”

汪东兴满意地点点头，又给大家鼓劲说：“对，不怕。这几个人干尽坏事，天怒人怨，孤立得很。中央警卫团将和你们一起行动，一个营的部队将配置在怀仁堂和丰泽园，直接支援你们的行动。叶帅已经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战斗准备，总参直属部队已在附近布防完毕。陈锡联同志和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几位司令员将和我们一起行动。我们的胜利是必然的。现在我领大家宣誓。”

军官们举起右手，跟着汪东兴宣誓：

“我们向党宣誓!”

“服从命令！保守机密!”

“勇敢行动！不怕牺牲!”

“誓死保卫党中央!”

宣誓完毕，汪东兴把 18 个人分成 4 组，指定了组长，让大家在大厅里反复演练。看看差不多了，他让停下来，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大声说话，不许出屋，饭菜会有人送来。由于要采取行动，为壮行色，饭菜特别丰盛，酱牛肉、烧鸡、糖醋大排、滑溜里脊、肉包子、大米饭，每人还发了一小瓶啤酒，一盒中华烟。

吃过午饭后，大家在屋里的床上躺着休息，养精蓄锐。下午 3 时，队长喊了一声“起”，大家一下跃起。美餐之后又好好地睡了一觉，个个精神焕发。军官们用冷水痛痛快快地洗了脸，整整武器，拉拉衣服，便由汪东兴指挥，分 3 批秘密地进入怀仁堂，悄悄地埋伏下来。

晚 7 时，华国锋乘高级防弹“红旗”轿车从中南海的秘密住地出来，在怀仁堂前停下了车。车场上已经停着汪东兴的防弹“吉姆”轿车，看来汪东兴来了。华国锋在车里观察了一阵，见无异常动静，便下了车，带警卫沿着被电灯

照得明亮的长廊往里走。突然，从走廊旁边的套房中冲出几个军人，为首的警卫团副团长请华国锋把警卫人员留下来。原来汪东兴为了确保行动成功，决定所有的随行人员一律留在外面，以防不测。华国锋朝警卫挥挥手，让他们留下来。

华国锋独身一人进了怀仁堂的正厅。正厅紧挨着戏台，戏台后是剧场。正厅约有20多平方米，正好开常委会。房间里的一应物件均已搬走，只摆着两把高背沙发椅。房间一侧摆着一架屏风。华国锋进去后，汪东兴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点点头说：“一切都已布置好了。”

话刚说完，叶帅从西山赶到了，一进正厅就问汪东兴：“敌情有没有变化?”汪东兴摇摇头说：“没有，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请假。”叶帅点点头，对厅内的布置研究一番，又低声和华国锋、汪东兴研究了几个问题。忽然，在外面指挥行动的警卫团副团长脸色铁青地匆忙走进来，低声报告说：“张春桥来了。”

汪东兴拔出苏制连发无声手枪，手往下一劈，命令道：“坚决按计划行事。”警卫团副团长低声答了个“是”，便匆忙走出去了。正厅里，华国锋、叶剑英坐在椅子上，虎视着大厅门口。汪东兴端着手枪闪到屏风后面，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他将可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

电报大楼的钟声又远远地传过来了，正是1976年10月6日20点整。

汽车响了，张春桥的汽车驶到怀仁堂门前停下来。张春桥下了车，带着警卫员往里走。第一行动小组组长纪和春跑过来，恭敬地立正，行了个军礼：“首长好!”张春桥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国锋同志和叶帅都到了吗?”纪和春回答说：“来了，也是刚来，正等着您呢。请随我来。”说着，领张春桥往里走。张春桥的贴身警卫“老虎”也跟着往里走，被门口的4个哨兵拦住。张春桥警觉地问：“这是怎么回事?”纪和春说：“我忘了向‘老虎’交代。按规定，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入会议室，首长你是知道的。国锋同志和叶帅的警卫也都留在外面。”张春桥当然知道常委会上不能有带枪的闲杂人员进去的道理，便命令警卫员“老虎”留下。

纪和春领着张春桥往里走，进了小门，拐了两个弯，走廊里灯突然灭了，从旁边的套房中冲出几个军人。张春桥还没看清楚周围的情况，纪和春已来了个扣嗓，把他从地上夹起来，另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张春桥没想到对方行动这么快，恐怖地呜噜着，冲出来的那几个军官反剪了他的双手，“咔”地上了手铐，把一块手绢塞进他的嘴里，提着他来到大厅。大厅里，华国锋、叶剑英并排坐在沙发椅上，怒目盯视着他。汪东兴手持短枪在屏风后站着。华国锋站起来庄严宣布：“张春桥你听着，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宣读完毕，纪和春当即又把一副手铐铐在张春桥的脚腕上，另一个

战士把一大块黑布蒙住他的眼睛，提着走出怀仁堂后门。那里已有一辆车在等着，4 个人把张春桥往汽车里一塞，轿车便轻轻开动起来，最后在一个大院里停下来，纪和春押着张春桥来到一个大院里防空地下室的入口处。这个人防工事异常坚固，里面照样有卧室、书房等房间，中央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去处。

汪东兴已在这里布下了一连兵力，连长是汪东兴的极为信任的干部。他见犯人押到，便派值班军官带路，把张春桥押进一间房子，“哐啷”一声锁上铁门。

张春桥躺在地铺上，浑身动都不能动一下，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把蒙眼的布都浸湿了。惨败啊惨败，十年经营，一朝辉煌，最后就这么几分钟沦为死囚，他不服啊。这一夜，在地下室走廊里值勤的几个哨兵都听见张春桥似狼一般绝望而凶恶地整整嘶吼了一夜。

纪和春行动组完成任务以后，不敢怠慢，留下两人守在关押犯人房间的门口，他和另外一人到上面吃饭、喝水、休息一会儿后，又下去把另外两个人换上来。连长也是丝毫不敢怠慢。屋顶上架起了机枪，门口有哨兵把守，地道入口处的铁门紧紧锁着，4 个哨兵持枪警戒，附近的房间内都架设了机枪，埋伏了重兵，已是十分保险了。连长还是不放心，反复查哨，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但是，这样一个重兵布防的地方，从外面看不到丝毫异常情况。

怀仁堂前，又是一阵汽车响，王洪文的高级“红旗”轿车到了。王洪文带着警卫员下了车，警卫员照例被留下来，王洪文照例被作为值勤军官的第二行动小组组长领着往里走。进了小门，拐了两个弯，长廊的电灯忽然熄灭，周围顿时漆黑一团。王洪文刚想呵斥，行动组组长一个绊子，把他弄翻在地，从一侧套房里冲出来的行动组把王洪文紧紧地按倒在地上，给他铐上手铐，王洪文挣扎着说：“我是来……”没容他说完这句话，一块手绢塞进他嘴里。

在里面动手的时候，外面的警卫战士同时动手，下了王洪文警卫员的枪，把他押走了。

王洪文被提进正厅后，又是华国锋给他宣读了中央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王洪文突然挣开警卫，向前扑去，被行动组组员一脚踢翻在地，提着送到后门口的轿车上，送往那个大院的地下室。

姚文元还没有来。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后，反复看了好几遍，只见通知上写着：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十月六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签字）：汪东兴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姚文元看完通知，又喜又忧。喜的是可以参加常委会议，对自己以后进入常委有好处。忧的是他觉得这个通知似乎暗藏杀机。按会议议程，完全不需要他去，开会地点又设在荒冷的怀仁堂。他怕出问题，去找张春桥商量。

张春桥也接到了通知，姚文元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他，张春桥笑着安慰他：“你想得太多了，开这个常委会是我向华提出的。”姚文元一听才放了心。回来对秘书和警卫员说：“我今晚去中南海开会，你们都回家吧。”

7 时 40 分，姚文元的高级“红旗”轿车开过来。姚文元挟着皮包下了楼，临上车前，对送出来的妻子金英说：“我可能回来得很晚，你先睡吧。”

金英没睡，她在等待姚文元开会回来，但等到天亮，姚文元还没有回来。她给各处打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模棱两可。她哪里知道，姚文元离开家仅半个小时后，就被锁进了那个大院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

怀仁堂的行动圆满结束。汪东兴即打电话给待命的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命令他马上逮捕江青和毛远新，这时正是 8 时 30 分。

张耀祠接到命令后，立即命令两个行动小组马上行动。张耀祠亲率一个强悍的十人行动小组，身带短枪和微型高速冲锋枪向中南海 201 住所奔来。这个住所位于毛泽东居住的 202 住宅的隔壁，江青一直想搬到这里来，毛泽东不许。毛泽东病重后管不了她了，江青就乘机搬了进来。

深秋的冷风从湖面上吹来，月光洒在中南海，亮的地方很亮，暗的地方很暗。亭台楼阁，繁木佳树，都在朦胧的夜色中静静地伏着。

行动队来到 201，两个警卫战士见是副团长到来，刚想立正敬礼，就被逼住下了枪。他们笑着问张耀祠：“副主任，这是从哪里说起?”张耀祠命令道：“没你们的事。我命令你们，仍在这里守着，不许任何人走出来，有功者赏，违令者斩!”

张耀祠进来后，命令把大门关上，留下两名队员潜伏在门后的灌木中，随即往里冲去，把江青的秘书、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张耀祠带了 4 个队员来抓江青。

江青有个怪毛病，睡觉要把门留个缝。在延安时，毛泽东为此训过她多次，她却依然故我，没想到她这个坏毛病可大大地便利了张耀祠。他一把推开门，冲了进去。江青正看录像片，张耀祠进来打扰了她的兴头，怒喝道：“谁让你进来的?”张耀祠也不说话，一挥手，4 名队员扑上去。两名女军官扭住她的手，戴上了手铐，往外拖去。江青哭喊着：“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一名女军官立即用手绢塞住她的嘴，把她架上门口的汽车，张耀祠亲自率队员把她押送到那个大院。

江青被关起来后，张耀祠又率几名武装战士来到 201，布了岗，切断一切

对外联系。

现在再说行动组的另外一路。这路人马由毛主席的老卫士李连庆率领。来到中南海毛远新的住处后，李连庆留下几名队员潜伏在门外，自己带着几名军官推开毛远新的卧室。毛远新和李连庆很熟，但今天看见他们手提短枪，脸色铁青，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李连庆一进来就举着手枪让毛远新把双手搭在墙上，毛远新乖乖地照办了。二名军官一个箭步跨过去，从他怀里抽出手枪，浑身搜检一番，见无其他武器，便给他戴上手铐。李连庆说："走吧，给你换一个地方。"毛远新想给自己在沈阳的娇妻，一个温柔漂亮的上海姑娘打个电话，李连庆坚决拒绝了，带着他上了车，往那个大院而来。

5 名主要案犯全部就捕，锁在了地下室。10 月 6 日晚，在地下室走廊里警戒的武装哨兵听见案犯们哭喊了一夜。他们后悔低估了对手，后悔自己动手晚，叫人家占了先……

正在这时，北京军区的几位将军带着部队风风火火地向中南海赶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一回　老将军领兵夺喉舌　玉泉山戒严定国是

话说逮捕“四人帮”的10月6日晚9时9分，几支部队由北京军区的几名司令、政委率领着，快马加鞭地向中南海奔来。他们是中联部部长耿飚，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率领的部队，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赶来领受任务的。

原来早在筹划行动时，叶剑英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行动成功后立即占领首都的几家新闻单位，尤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谁去呢？叶剑英想来想去，决定派耿飚、秦基伟、迟浩田去执行这个任务。这几个人都在北京，他也比较熟悉。名单定下后，叶剑英找他们谈了话，要他们随时听候命令。

10月6日晚9时，耿、迟、秦三人接到电话，立即率领部队赶来。他们让部队停在外面，自己过去领受任务。一进怀仁堂，三人急切地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说：“解决了。”华国锋过来下了命令：“耿飚同志，请你去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耿飚拿着华国锋写的手令，叫上北京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和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警卫营所属团的团长，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团长即把营里所有干部召来，命令大家从今天起一切行动听从老将军耿飚的指挥。战士们学了不知道多少遍毛选，从毛选的关于平津战役的文章中熟知杨、罗、耿兵团的“耿”就是耿飚，所以都乐于听从耿飚的指挥。耿飚挑选了一个班，让卫戍区副司令员带着控制了广播室。耿飚自己带了一个班，把电台所有台和部室的负责干部集中到一个大会议室，门口放上几个哨兵，不许出去，吃饭睡觉都在大会议室。耿飚就在这里指挥他们撰写广播稿件，又出动部队控制了电视台和市电台。

与此同时，迟浩田带着部队控制了人民日报社，秦基伟带着部队控制了新华社、光明日报社，首都的所有新闻媒介都被严格地控制起来了。

叶剑英在怀仁堂得到耿飚、迟浩田、秦基伟的报告后，笑着对华国锋说：“现在该轮到我们说话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逮捕“四人帮”后，应该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在这非常时期，叶剑英、华国锋不能在中南海长久停留。两人上了一辆“红旗”车，向西郊的玉泉山驶去，两车警卫人员一前一后，随护而去。

华、叶离开中南海后，汪东兴即给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打电话（“四人

帮”当然除外了），请他们立即动身前往玉泉山9号楼参加政治局会议。委员们接到电话，大为惊诧，为什么把会址选在离京几十里的玉泉山，但谁也没有去问，都纷纷调车，往玉泉山而来。

玉泉山是中央军委重地。到过北京名胜颐和园的人都知道，在昆明湖岸往西望去，青山如黛，一突兀高峰上有一宝塔，直指蓝天。塔影倒映在湖水中，山水一体，似乎宝塔青山就在后园。其实这是园林设计上的“借景”，玉泉山离颐和园还远着呢。由于这里山高树茂，山泉淙淙，历代皇帝都在这里修建离宫别馆，作为休养之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便成为中央军委的基地，筑有别墅式小楼多座，供中央领导人休息。

政治局委员们上山后，即被领到叶剑英下榻的9号楼的大客厅里就座。山道上、树林里、空场上、走廊里，到处都是持枪警戒的士兵。大客厅门口站着4名腰挂手枪的中年军官和4名手端冲锋枪的士兵，大客厅窗子外面也站了十几个军官和士兵，枪刺在月光下闪着寒光。政治局委员的警卫都给下了枪，在离会场远远的一间大房里休息。政治局委员一看这个架势，知道今晚的会议非同一般，个个闭着嘴，等待着华、叶、汪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华国锋和叶剑英进来了。叶剑英招呼汪东兴，请他过来坐，三人便一起坐在一张长沙发上，面对着二十几个政治局委员。嘀咕了一阵，便由汪东兴宣布开会，请华国锋讲话。华国锋看看会场，严肃地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互相勾结，发动反革命政变。为了挽救革命，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于今日晚8时，将‘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

叶剑英看有些政治局委员眼睛扑棱扑棱地翻着，不知道隔离审查是怎么回事，便吼了一句：“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了，锁起来了！”

叶剑英说完，威严的目光扫视着会场。李先念自然是有思想准备的，带头鼓起掌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使劲鼓掌，大厅里掌声经久不息。

华国锋、叶剑英又相继作了长时间的讲话，详细列举了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多次斥责；讲了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严密防范，说明解决“四人帮”完全是秉承主席遗命的正义之举。

由于华国锋、叶剑英久受“四人帮”之害，洞悉其阴谋，这次又是破釜沉舟，担着天大的风险粉碎了“四人帮”，所以个个都讲得慷慨激昂，以至哽咽。

早在1974年7月17日，当时正是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毛泽东气得想与江青离婚。他问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孟夫子，如果全国人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孟锦云哪里敢谈这样的事。毛泽东也不勉强她回答：“孟夫子，不要你回答，你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是我听法院的，还是法院听我的，那可要大大热闹一番噢。”

可能正是毛泽东考虑到这个原因，没有提出和江青离婚，但他决心要点点

江青他们。1974 年7 月1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他又批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毛泽东又在会议上宣布："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并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大搞阴谋活动，企图搞垮周恩来总理，由他们组阁。为此，他们特派王洪文于 1974 年 10 月 7 日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的这种做法，让他回去后多跟总理、小平同志谈谈，责令他写了检查。王洪文到北京后，违背主席的指示，把主席的谈话内容私告了江青、张春桥。江青不改悔，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 1974 年 11 月 12 日的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批示，又批评了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江青把毛泽东的批评当耳旁风，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立即戳穿了江青的鬼把戏："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接着，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他又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1975 年5 月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严厉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但是，"四人帮"趁着毛泽东病重，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非常担心"四人帮"加害于他，在周恩来病逝后，选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堵住了"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毛泽东病重期间，一再向叶帅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迟早要出大乱子。在叶剑英同他诀别时，毛泽东还握着叶剑英的手不放。

毛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本不想这么快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是"四人帮"突击向上海民兵发了几十万支枪，组织了56 个师的正规军规模的民兵部队，伪造主席遗嘱，私调部队，策反警卫团哗变，在天安门城楼上准备发难。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么"四人帮"就要动手了。据可靠情报，上海已得到通知，10 月 10 日有特大喜讯，市面上鞭炮、红纸销售一空。党内许多老同志都非常着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叶帅讲完话后，汪东兴详细讲述了"四人帮"拉军队、搞民兵、动警察、

伪造遗嘱的政变阴谋。他拿着抄检出来的王洪文与毛远新私自准备的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四人帮”拟订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名单，以及政变后准备镇压的黑名单，对大家说：“在座诸位都上了黑名单，他们的反革命政变要是成功了，在座诸位都得上断头台！”

这个消息顿时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大家争先恐后表态，一致拥护逮捕“四人帮”。叶剑英适时提出建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大家举手一致同意。

会议还通过决议，成立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立即召集地方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进京，传达中央的决定。会议结束后，为了保证安全，规定政治局委员暂勿下山，分住在玉泉山上的各个小楼里。所有小楼的电话都被切断，楼与楼之间，有哨兵站岗，委员们之间不得来往。

这次会议开了足足一夜，会散时已是10月7日上午6时了。逮捕“四人帮”，许多政治局委员如释重负，虽是一夜未睡，但并不感到疲劳，进到自己住的小楼后，要来酒菜，临窗远眺，峰翠山青，把酒临风，好不痛快。

叶剑英回到楼上卧室后，心潮如海，难以入睡。突然，他想到应该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邓小平，他拨通了邓小平的电话，告诉他：“那四个人已经在晚上给抓起来了！”邓小平放下电话，满脸喜色。卓琳问道：“谁来的电话？什么事？这么高兴。”邓小平笑嘻嘻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已是早晨7时了，叶剑英、华国锋毫无睡意，连续发布命令，逮捕“四人帮”的死党。忽然，秘书送来一封电报，叶剑英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上海民兵准备暴动。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二回　政治局谈笑定上海　老百姓歌舞举金杯

话说10月7日早晨，叶剑英接到东海舰队的电报，称上海市委突击发枪，第二武装叛迹已显。叶剑英看了电报后，即找中共中央新任主席、中央军委新任主席华国锋商量，华国锋问道："上海民兵现在共有多少人?"叶剑英答道："有38个师，7个独立团，两个高炮团，共100多万人。"华国锋一惊，只听说上海民兵发展很快，没想到有这么多。叶剑英提醒华国锋："这100万可都是按着正规军的规模编组的，现在是只差戴帽徽领章了。"华国锋着急地说："他们一旦闹起来可不好收拾啊!"叶剑英一摆手："不怕，有六十军和东海舰队呢。老夫倒有一计，以水浇火不如釜底抽薪。"叶剑英详细谈了自己的想法，华国锋连连称妙，暗自佩服，到底是老革命家，看透了这些造反派的卑劣心理。他立即让汪东兴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司令员周纯麟发电报，让他们进京开会。

马天水接到中央通知后，先打电话请示张春桥，电话打不通，又找王洪文和姚文元，也无人接电话。马天水感到奇怪，又把徐景贤、王秀珍找来商量，大家感到问题严重，是不是三人在北京出了事，王秀珍劝马天水不要去北京。马天水说："中央通知我去，我怎能不去，你们在家好好准备，我去北京看看。"王秀珍等人觉得马天水去北京看看也好，便送马天水去机场，周纯麟已在机场等候，两人上了飞机，往北京飞来。到北京机场后，他们被护送住进京西宾馆。

马天水在宾馆忐忑不安地住了一夜。这次开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上面纹丝不露。他看看其他省区来的领导们，也都是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但宾馆戒备如此森严，想来定有重大情况通报。

第二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和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一看王洪文和张春桥没有来，知道事情不妙，硬着头皮听听华国锋要讲些什么。

华国锋在主席台上和叶剑英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便大声宣布开会。会场上人们坐直了身子，聚精会神地准备听取中央重要决定。华国锋拿起一份文件，开始宣读起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长期以来在中央拉帮结派，组成反革命集团，多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病故后，他们又疯狂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为了挽救革命，及时地制止'四人帮'的政变阴谋，党中央被迫在10月6日晚八时采取断然措施，把王洪

文、张春桥、江青、姚文远隔离审查。”

大概一颗原子弹扔到头上，人们也不会受到这么大的震动。与会者中大部分省委书记与军区司令恨透了“四人帮”，但没想到胜利却是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所以个个惊喜交加，一齐热烈鼓起掌来，争先恐后地发言控诉“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纷纷要求将“四人帮”置之典刑以平民愤。

只有马天水的发言与众不同，他吞吞吐吐地说：“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话，我怎么过去没听说过？是不是把他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马天水一语未完，上海警备司令周纯麟站起来，指着马天水的鼻子训斥道：“老马，你好糊涂！你中‘四人帮’的毒太深。”他转过身来，对华、叶表态：“从现在起，我们上海警备区与上海市委断绝一切关系，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领导。”华国锋大声称赞了周纯麟的发言。叶剑英冷冷地说：“‘四人帮’被逮捕了，但是斗争还没有完。凡是跟着‘四人帮’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都将受到严厉追查。”汪东兴在一侧站起来说：“我告诉大家几个新消息。‘四人帮’的死党迟群、谢静宜已被北京市委逮捕，军委保卫部长徐海涛、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昨天夜里已经畏罪自杀。”

汪东兴宣布的几个消息给会场带来了一股肃杀之气，马天水颤抖不止。叶剑英又抚慰说：“其实，有些人跟着‘四人帮’办过一些错事，中央是既往不咎的。大家都是老同志，受够了‘四人帮’的气，总不会为他们去殉葬吧？”

叶剑英讲这话时，还特别看了看马天水，意思是这话就是对你讲的，你赶快站过来吧，马天水感到身上一阵温暖。

回到宾馆后，周纯麟受他的老首长李先念之托，劝马天水服从中央决定，把王秀珍、徐景贤叫到北京开会，稳住上海形势，将功折过。马天水摸摸脑袋，叹口气，只有这么办了。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上海的王秀珍、徐景贤，对他们说：“我是马天水，情况我已摸准了。他们三个没有事，工作很忙，正在筹备一个中央会议，让你们马上到北京来，共商大计。”

徐景贤、王秀珍接到电话后，起初还半信半疑，但又一想是马天水打来的，也就以为是真的，于 10 月 10 日乘飞机到了北京，照样被安排住进京西宾馆。他们不知“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临来京前，虽然有人从北京打电话给他们说“我娘心肌梗死”，但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只是住进京西宾馆后，发现这里戒备森严，不能出去，才觉得问题严重。两人在房间里，研究了一下形势。徐景贤有些担心，怕回不去了。王秀珍冷笑两声说：“怕什么，上海一百万民兵都做好了准备。我们回不去，他们在上海马上动手，上海港一死，看中央放不放人？”

两人密议了半天，眼看天就黑了，吃过晚饭刚回住室，马天水、周纯麟来了。王秀珍生气地问：“你们到哪里去了？怎么也不来接接我们。”马天水尴尬地笑笑说：“这不来了嘛。”周纯麟清清嗓子说：“好啦，现在我传达一下中央的重要决定——”周纯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逮捕“四人帮”的决定。这个

可怕的消息把王、徐二人震得跳了起来。王秀珍脸色煞白，眼冒火星，愤怒地质问："这事是谁干的，凭什么抓他们?"二人又哭又喊，周纯麟大声申斥道："这是中央的决定！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你们敢不服从？你们眼里还有中央吗?"

周纯麟的一顿申斥，骂得徐、王二人不敢吭气。华国锋听到周纯麟的报告后，第二天派一些政治局委员同他们谈话，再次劝说他们认清"四人帮"的罪恶，服从中央决定，协助中央做好上海的工作。徐景贤、王秀珍态度软下来了，但仍没有表态。

同徐、王谈话的政治局委员回到玉泉山后，向华国锋、叶剑英汇报了谈话情况。叶剑英冷笑两声说："我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他们是怕自己的乌纱帽丢了。这些人啊，只知道争权夺利，哪有什么信仰?"华国锋问道："那么我们怎么办?"叶剑英挥挥拐杖说："对他们说，只要服从中央决定，官继续做，放他们回去做工作，这叫以沪治沪嘛。"华国锋、汪东兴有些担心，怕放虎归山。叶剑英很有信心地说："别怕，我了解他们的思想。只要有官做，他们什么都干。只要他们按中央的决定去做，将来可以适当减轻对他们的处分。"华国锋、汪东兴都觉得这个办法好，便命人把马、徐、王在夜里接到山上来，进一步劝说他们。

当天夜里 10 时，马、徐、王、周被接到玉泉山 9 号楼，华国锋、叶剑英和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接见他们，政治局委员们依次和他们谈话，愤怒揭露"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马天水等人看到人们对"四人帮"义愤填膺，深知"四人帮"坏事做绝，天怒人怨，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华国锋看火候已到，劝他们道："你们看到了吧，解决'四人帮'是政治局全体同志的决定。不这样做，国家就要陷入混乱。你们过去没有认清'四人帮'，算不得多大过错，我们对他们也有个认识过程嘛，是主席多次提醒我们的。你们应该放下包袱，协助党中央做好上海的工作。"

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连连表态，"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服从中央指挥"。叶剑英笑着说："你们有这个认识就很好。中央信任你们，放手让你们工作，原来是干什么的，现在还干什么。明天你们就都回上海去，继续主持上海的工作，有什么困难提出来，中央帮你们解决。"

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完全没想到中央继续让他们主持上海工作，颇感意外，连忙表示回去一定做好工作。

马天水等回到上海后，商议一番，感到首先必须止住民兵的暴动。本来马天水 7 日离沪后，王秀珍等人已经下了动员令，民兵开始集中了，各种武装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各民兵指挥部的通信系统在紧急互相沟通。深夜里，武装奔袭演习持续不断，上海滩上整夜都是汽车、摩托车的马达轰鸣声。王秀珍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深恐民兵暴动这部叛乱机器再运转下去会碾碎自己，便商定由徐景贤出面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点点头，要通了上海市委的电话："喂，我是

徐景贤。我们在北京很好，你们不要乱动啊，一切等我们回去了再说。”

上海的那些人，弄不清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忽然，有人紧急向他们报告，美国之音和英国的 BBC 广播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大家不信，决定还是等马天水他们回来了再说，现在就是动手，也是群龙无首，谁也不听谁的。

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终于在 12 日回来了。13 日上午，他们召集上海市委委员在锦江小礼堂开会。今天这里警卫森严，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同大家握手后，马天水便正式宣布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陈阿大、黄涛这些跟着王洪文打砸抢起家的小流氓顿时炸了锅，大骂“马天水、徐景贤出卖了我们”，大喊着要拼命。徐景贤站起来呵斥道：“你们真是目光短浅，你们这样闹，只会加重他们的罪行。”马天水板着脸说：“两条：一是不通也得通；二是要闹也不准闹。谁不表态通电拥护中央的决定，谁就不要离开这里。”

马天水的话镇住了黄涛这些人，上海市委委员轮流发言表态，“四人帮”经营多年的老巢，一下子土崩瓦解了。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逮捕“四人帮”的通报，上海同全国其他各省市一样表态拥护。这时中央向上海派遣了工作组，苏振华、聂凤至指挥的六十军和东海舰队陆战队浩浩荡荡开进上海，进占各战略战术支点，解散所有的民兵指挥部，收缴民兵枪支弹药。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组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东海舰队政委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任命公开发表前，他们已带了一个团的陆海军部队进驻康平路。未几，他们召来中共上海市委全体委员，宣布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黄涛等人实行隔离审查，马天水等人马上被等候在屋外的武装士兵冲进来戴上手铐押走了。接着，他们又整顿市委的原有组织，指令上海警备区接管民兵工作，大刀阔斧，扫涤“四人帮”在上海留下的污泥浊水。

华国锋接到上海新市委的报告，松了一大口气，上海问题总算兵不血刃地解决了。秘书给他送来一大堆报纸，还有信件。

华国锋正翻阅报纸、信件，忽然接到耿飚的电话。耿飚报告说：“华主席，街上买螃蟹的人很多啊，都要买三公一母，酒都快卖光了，看来老百姓都知道了抓“四人帮”的消息，保密已无任何意义，不如公开发表消息，以动员群众揭批“四人帮”。”华国锋接到电话后，让耿飚再等等。耿飚感到再拖下去不好，直接给叶帅打了电话，叶帅一口答应：“立即广播。”他放下电话，又向华国锋提议公布“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华国锋见叶帅同意了，他也就同意了，下令广播。耿飚立即组织撰写消息，于 10 月 21 日公开广播了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全国顿时欢腾起来，各省市纷纷通电拥护中央决定。北京市立刻有一百万人上街欢庆胜利，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政府驻地城市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整个神州大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家家都是金杯斟酒，开怀畅饮。

经过这一时期的揭批“四人帮”，人们在欢乐中发现，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全国各种问题堆成了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冤狱遍于全国，经济濒临破产。人民企盼着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整顿这副烂摊子。人们知道，普天之下，只有邓小平才能当此大任，但华国锋却无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把自己的发式改成留发向后梳，就像毛泽东的发式一样，到处向人们挥手致意，处处模仿毛泽东的动作，俨然以英明领袖自居。

叶剑英很着急，邓小平不出来工作，怎么得了。恰好儿子叶选平看胡耀邦回来了，这是叶帅专门派他去向胡耀邦通报逮捕“四人帮”的消息的。叶帅问选平：“耀邦说些什么?”选平说：“他托我向父亲转达三句话。”叶帅问：“哪三句话?”叶选平说：“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一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一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帅点点头说：“耀邦可说到点子上了，我马上找华主席说去。”

叶帅来到玉泉山9号楼华国锋的办公室，对他说：“华主席，得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小平复任，人心大顺呀!”华国锋扶叶剑英坐下，谦恭地说：“叶帅，你听我说——”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三回 华国锋失误两年徘徊 邓小平定题遵义会议

话说叶剑英找华国锋提起邓小平复职的问题，华国锋满心不乐意。他不愿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其中原因很多。华国锋可能也想到了，邓小平复出必然会威胁到他的地位，他冒着杀头的风险捉了“四人帮”，可不是为邓小平铺平上升的道路，可这话又不好向叶帅讲，只好把毛主席搬出来：“叶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定下的。现在刚粉碎‘四人帮’，我们就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别人会怎么看？现在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吧。”叶剑英说：“那可是要抓紧噢。”华国锋说：“我会注意这个问题的。”

叶剑英走后，华国锋想了半天，他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逐渐向他逼来，要逼着他让邓小平复职，逼着他否定“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也知道全国问题成了堆，但他认为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错，错在“四人帮”捣乱。“文化大革命”必须维护，批邓必须坚持，只有这样，才可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恰在这时，汪东兴来向他请示宣传方针，华国锋不习惯地用手梳梳刚从寸头改成向后梳的大背头说：“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

华国锋又叮嘱汪东兴：“我们一定要把住一个防线，那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汪东兴明白华国锋的用意，立即答应了。接着汪东兴又问华国锋：“现在人民日报社提出周总理的忌日到了，他们收到了很多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要准备发表，你看怎么办?”华国锋果决地说：“悼念周总理要符合悼词的口径，那是毛主席圈阅过的，不能改。”

汪东兴接受了华国锋的指示后，命令人民日报社不要发那么多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发4篇就够了。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们接到电话后气坏了，“四人帮”不让悼念周总理，“四人帮”被打倒了，怎么还不让悼念周总理，不管他，发，发个够，于是《人民日报》开始连续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人民群众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怀念周总理，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台的台壁上刷上了长长的一条大标语：“‘四人帮’背叛毛主席的指示，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烈要求中央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

汪东兴对此很恼火，他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怎么？你们想推翻中央的悼词，给周总理另外写一个悼词啊？”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有气，顶了他一句：“这是人民的意愿，你总不能不让人民说话吧。”汪东兴语塞。

这时李鑫送来他主持撰写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是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撰写的，集中强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汪东兴看了很满意，批示在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

汪东兴批发了社论后，秘书又送来《红旗》杂志社的报告：“1975年春，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汪东兴想都没想，就在报告上批示：“这两篇文章经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不能点名批判，可以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

2月7日，《人民日报》为尊重组织原则，不得不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发表后，报社不断地接到群众的抗议电话，质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按此社论的观点，邓小平不能复出，几千万人的冤案不能平反，“四人帮”的反动流毒不能批判，岂不是继续让“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祸害中国。

叶剑英看了这篇社论后，非常生气，认为这也太过分了。这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连续开会，筹备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逮捕“四人帮”以来几个月的工作。叶剑英在会上又敦促华国锋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环顾政治局全体委员，问他们：“我建议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其他人没有说话，李先念首先响应：“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大家看着华国锋，只见他沉着脸，不吭一声。叶剑英问他：“华主席，你是什么态度呀？”华国锋勉强地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要好好考虑一下。”说完，他便宣布休会。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回到住室，马上有人送来华国锋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用的讲话稿，这是华国锋特意派人送来再次征求叶剑英意见的。叶剑英说：“有两条要修改一下，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来人回答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我们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估价已改得很好了。”叶剑英听了满意地说：“这样很好，我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了。”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与会者自然都接到了会议发下的各种文件，其中有一份文件是关于“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李冬民后被平反）。与会者不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这个文件是什么意思。会议开始后，华国锋开始讲话，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叶剑英听着就觉得不对

劲了，他提出的那两条意见华国锋都没有用，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能平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不能变；继续批邓是经过考虑的，还要搞。

讲着讲着，华国锋把那份“李冬民案件”材料举起来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愿，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我们如果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散会后，陈云、王震找到叶剑英，商量怎么办。叶帅斩钉截铁地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是党心、人心所向，是任何人挡不住的。”陈云愤愤不平地说：“我认为清明节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工作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要在小组会上说，登简报。”王震接上陈云的话，气鼓鼓地说：“我也要放一炮。我是个直筒子，藏不住话，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 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陈云、王震带头发言，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央领导工作。许多人也先后发言，表示赞同陈、王的意见。华国锋知道后，嘱咐汪东兴不要把他们的发言登简报。这一下可惹恼了老同志，华国锋召集会议都困难了。他一看不好，只得让步，对大家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还是给邓小平、天安门事件留了个尾巴。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邓小平没有恢复中央领导职务，但批邓是不能再搞了。华国锋明白，不让邓小平出来是不行的，但他又想用个办法拴住邓小平，使他复出后不致影响到自己的地位，便派人找邓小平谈话，要求他出来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声明：“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

华国锋听来人报告说邓小平不愿意写文件，很是恼火：“他还想不想出来工作?”这时，秘书进来，递给他一封信。华国锋一看，是邓小平在 4 月 10 日写来的，信里告诉他：“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华国锋一惊，这不是在批我的“两个凡是”吗?好厉害啊!

华国锋坐在那里，好半天没有动，继而又问派去谈话的汪东兴：“邓小平说

到‘两个凡是’的问题没有?”汪东兴回答说:“说了。邓小平对我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主席又说过,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

华国锋听了默默无言,他无法驳这些话。他也觉得,“两个凡是”的防线快要崩溃了,用“两个凡是”的观点来解释不批邓就首先解释不通,而为邓小平平反就是自己在工作会议上宣布的,自己首先就没有遵守“两个凡是”的要求。华国锋取了一支香烟,狠狠地抽起来。

经过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终于退让了。1977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追认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十届三中全会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时,全国各条战线上积留的问题成堆,科学文化教育战线的问题尤其严重。“文化大革命”就是首先拿这条战线开刀而发动起来的,整顿这条战线对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学文化教育战线的工作。他在许多大会和场合上反复强调,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是红线,而不是黑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尊重人才,尊重脑力劳动,并宣布自己愿做科学文化教育战线上的同志们的“后勤部长”。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又在大会讲话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邓小平的讲话,推倒了林彪、江青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科学教育文化战线的知识分子深受鼓舞,许多长期以来深受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重新与人们见面,各种被解散的文艺团体陆续恢复活动,1977 年,国家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社会的尊重,许多城市的图书馆门前,天未放亮就排起了等候入馆的人龙。

经过党和国家的努力,经济战线的整顿恢复工作有一定的进展,被废止的企业规章制度陆续被重新建立,企业生产上的混乱情况开始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财政收入有所增加,1977 年全国 60% 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再次宣布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产生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报告。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同时，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这时国民经济虽然摆脱了“文革”所造成的瘫痪、半瘫痪状态，但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提出了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这个规划中关于钢和石油产量的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石油产量的指标是在没有勘探资料的条件下的空想。以后钢铁和石油企业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尤其严重的是华国锋这时想通过大规模举借外债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他这样做时，没有考虑到这样过急过快地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中国是否能消化得了，举借的外债是否有偿还能力。华国锋的这种做法，被时人称为“洋跃进”。虽然由于计划不切实际很快被停止执行，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这对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亟须休养生息的中国国民经济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

华国锋之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在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没有能力和胆识解开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事情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不想批判极左思潮。邓小平讲话中却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虽然没有点名叫阵，但两种思潮的阵营是泾渭分明了。

此时，出来了一支突击队，率先向“两个凡是”冲击。这支突击队就是胡耀邦领导的理论研究队伍。这时胡耀邦已就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在党校办了一个刊物，叫《理论动态》，专门登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理论文章。

这一天，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给胡耀邦送来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问："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理论室的同志告诉他，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约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很好，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决定撤下来进行修改，使文章进一步触及当前现实问题。文章经过七八次修改，又送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进一步修改，现已定稿，要求发表。

胡耀邦听了汇报，看了文章全文，马上拍板："发!"于是，1978 年 5 月 10 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在理论界和政界顿时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叫好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邓小平听说后，让人把《光明日报》找来，看完后说："这篇文章很好，符合马列主义，扳不倒嘛。"他决定找个机会给予支持。过了几天，恰好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大讲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坚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大为振奋。

且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全国人民的思想顿时活跃起来。中国，就好像是一个瘫痪的病人被打开了"痦门"，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全党的思想已基本上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端正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清算极左思潮，确立新的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决定性的一战，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一决雌雄。

1978 年 11 月，经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王震、李先念、邓颖超及许许多多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不得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5 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 388 人，经北京市公安局于 1978 年 4 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者被平反、恢复名誉。

在党的代表正确路线的老同志的压力下，华国锋在 12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被迫作了检讨："去年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都讲得绝对了。去年2 月7 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

就好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历数思想僵化所带来的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又着重指出，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讲话，为5天以后，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报告的主题。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王震、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选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拨正了革命航向，其意义不下于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故时人称这次全会为第二个“遵义会议”。邓小平为这次会议定下了主题，是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这次全会上，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

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全党、全国开始进行拨乱反正，不觉就到了1979年的9月。

9月3日这天，邓小平一早来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文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提醒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耀邦同志已在常委会议室等候。"邓小平看看表，"哦"了一声，便走出办公室，去参加常委听取"两案"审理的汇报会。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四回 建法制开历史审判 判主犯平“文革”冤案

话说1979年9月3日，邓小平离开办公室，前去中央常委会开会的会议室，准备和其他常委一道，听取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关于“两案”审理的报告。

“两案”即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重视民主法制的建设。十年“文革”浩劫当中“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惨痛教训太深刻了，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呼唤着民主和法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人民的要求，庄严宣告：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把立法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完善各种法律，使人们有法可依。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坚决废弃“文化大革命”中所采用的脱离党和人民的监督，离开法律程序的专案组这种办案方式。由于“两案”的主犯原来都曾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所以中央责成刚成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先对“两案”进行清理和审查。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组长由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担任。

经过近9个月的工作，胡耀邦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两案”的审理情况。胡耀邦汇报完毕后，常委们都望着邓小平，请他拿主意。邓小平吸着烟，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判刑的人中，罪恶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的多少，判几个人，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作为一案。把它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判，按集团，起诉书把他们的罪行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把他们的主要罪行，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小的罪行不一定那么细。不在于小的罪行。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主持会议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担心地说：“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胡搅蛮缠。比如江青，她给你说这是毛主席讲的，那是谁讲的。甚至可能攻击中央的一些同志。”邓小平断然地说：“江青胡搅，可以把她怎样损害毛主席的具体事写出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了将来审判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两案”的审

判作了部署。

这次会议之后，对“两案”的清理和审理工作大大加快了。公安预审和检查侦讯结束后，1980 年 9 月 28 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6 次会议作出决定，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作出《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决定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庭，任命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决定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拉开了序幕。

1980 年 11 月 18 日下午，由 16 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北京城的西北方向开去，沿途经过的十字路口，都是绿灯闪烁。隔三差五，就可以看到停在路边的警车和全副武装的部队。

晚上 8 点钟，车队在严密的警卫下，驶近了昌平县的一所古堡式的建筑，这里就是著名的秦城监狱，现在它是关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地方。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逮捕，他们先是被关押在北京顺义县的一座兵营里，1976 年 12 月被移送到秦城监狱关押。这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被移送到这里关押。“两案”的几十名案犯也都先后送到这里关押。

监狱当局尽管事先已得到押解犯人的通知，但还是按照规定，一丝不苟地查验了来人的各种证件，办理了有关手续，这才让车队驶进监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已吃过晚饭，接到出庭的命令后，收拾了一下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便上了汽车。

车队出了秦城监狱，以每小时 50 公里的速度向城里开来。前导车在前开路，指挥车居中指挥，最后是两辆机动和救护车。黄、吴、李、邱们乘坐的车在指挥车的前面和后面，每部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戒车。

车队经沙河、清河、中关村一线向城里驶来，一路绿灯。沿途道旁，哨兵们排成两列，夹道警戒。警车和装满武装部队的卡车摆放在沿途重要地段，随时准备闻警出动。巡逻车闪着警灯，拉着警笛在路上往来巡逻。负责押送案犯的图们将军坐在指挥车里，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车队的行进。晚上 8 时 35 分，车队顺利地驶入西郊的空军学院，图们将军让电台发出“安全到达目标”的信号，押解行动胜利结束。

空军学院是空军的最高学府，远离市区，便于警戒，因此被选中作为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的地方，法庭设在学院的大礼堂内。为了确保安全，事先已对礼堂和关押主犯及工作人员居住的三座大楼进行了严格仔细的检查，随后武装哨兵便封锁了这几座大楼和礼堂及其周围营区。一支精锐的武装部队开了进来，接着又是一支摩托化机动分队开了进来，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审判工作的

进行，防止案犯被劫持，并随时准备处理各种意外事变。

第二天午饭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后来被从秦城监狱押来的江腾蛟被武装警卫送上几辆小轿车，在沿途军警的严密保护下被押送到北京城中心的一所僻静的院落。过了一会儿，押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的武装车队也到了这所小院前。十名案犯下车后，被武装警卫带进了小院里。这所小院的门牌是北京正义路甲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一个院子，审判“两案”的特别法庭就设在这座小院的礼堂里。

当天，也就是1980年11月20日下午2时许，旁听审判的人们举着特别法庭发给的旁听证陆续走进礼堂，在礼堂的旁听席上坐了下来。这时他们才有机会仔细地打量布置得非常庄严的礼堂。只见礼堂主席台上的幕布上，挂着一个特大的国徽，国徽下呈台阶状地摆放着特制的可供60个人使用的桌子和椅子。在主席台下靠近乐池的地方，一溜排地摆放着10个铁栏格子，这便是被告席。

旁听者打量完这些布置，礼堂——特别法庭响起了长长的警铃声，人们顿时安静下来。等一会儿，又是一阵长长的警铃声。铃声响过之后，身着统一服装的法官和检察官鱼贯进入法庭，分别在主席台上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们的两种颜色的服装把主席台一分为二，右边的一半是检察官，左边的一半是法官。书记员和辩护律师也都在主席台下靠墙两侧的书记员席和辩护律师席上坐了下来。

下午2时56分，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庄严宣布：“现在开庭！”

这时，特别法庭里悄无声息，人人脸上都是肃穆的表情。

接着，江华大声命令：“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书记员将提押票交给着装严整的法警，法警随即来到候审室，押解着王洪文，穿过旁听席中长长的走廊，送进被告席中的一个铁栏格子里，面对主席台站好。

随着江华的命令，十名主犯依次被押进法庭，在被告席上站好。

当案犯一一被带进法庭时，旁听席上的人们不禁扭过头去，看着案犯被扭着双臂带进来。这些人在过去都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文革”中干尽了坏事，今天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的被告席，审判他们是一件令人十分快意的事。另外，这些人从报纸、电视上消失已久，人们也都想看看他们今天是什么样子。

除了没有往日的狂傲和稍稍显老外，十名主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身着崭新的卡其布绿军装（当然没有帽徽领章），脸色红润，头发黑亮。江青在被告席里还不时用手捋捋自己的头发。

现在，他们站在被告席里，静等着法庭的命令。也许与几十年的军事生涯有关系吧，黄、吴、李、邱显然比其他案犯站得要直。直到江华命令他们“坐下”时，他们才在被告席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江华大声宣告：“根据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今天三时许，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起公诉的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公开审判！”

依照法律程序，江华宣读了长长的特别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及书记员、辩护人名单。然后江华宣布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很长，共四十八条。黄火青念到第二十三条后，接着由副厅长史进前读完后面的二十五条。接着，黄火青接过起诉书，宣读十名被告名单，并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其他案犯另行处理。

起诉书念完后，江华宣布：“对本案十名被告人，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被告人，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从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你们有辩护的权利和最后陈述的权利。把被告带下去，现在休庭。”

休庭后，黄、吴、李、邱、江被押送回空军学院。王、张、陈、姚押往市内的看押点，江青则被押送回秦城监狱。

特别法庭自11月20日开庭以来，经过一个月的审讯，进入了法庭辩论。在这一段时间，人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表演，其中江青、张春桥在法庭上极为猖狂。张春桥身穿中式棉袄，坐在被告席上咬着牙齿，一言不发；江青则大喊大叫，咆哮公堂。

12月24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于上午9时开庭，进行法庭辩论。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宣布开庭，命令法警：“传被告人江青到庭！”几名女法警和男法警随即把江青带到被告席。曾汉周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11月26日、12月3日、5日、9日、12日和23日上午，先后六次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举手：“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曾汉周说：“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看着长长的起诉状，又一次控告江青：“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六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随着江文的又一次控告，迫害狂江青的罪恶事实又一次被揭露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勾结林彪，害死了贺龙、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元老。任弼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逝世，罗荣桓元帅“文化大革

命”前逝世，但他们的家属仍被江青迫害。周恩来、陈毅实际上也是被江青害死的。迫害之狂，甚至害到毛泽东头上。

毛岸英牺牲后，未亡人刘思齐十年不嫁。毛泽东一再劝她改嫁，并亲自托人为思齐介绍对象。

当时，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向毛泽东推荐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毛泽东派人了解，得知他出身贫寒，老实正派，便介绍给刘思齐。刘思齐不愿让父亲继续为她的事操心，再加上杨茂之身高体壮，仪表堂堂，在苏联时有一面之缘，也就同意了。1962 年 2 月，两人结婚，婚后杨茂之常陪刘松林（思齐改名）去看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女儿有了家，也很满意。

“文化大革命”中，杨茂之、刘松林被江青迫害关进监狱，毛主席知道后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释放。

至于被江青害死的一般人那就更多了，为了掩盖自己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的那段秽史，她把当时知情的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害死，把了解她底细的著名电影演员舒绣文、上官云珠害死。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扬帆关了起来。潘汉年夫妇死于狱中，扬帆侥幸活着，已是双目失明，精神失常，他们的冤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昭雪平反。

现在，1980 年 12 月 24 日上午，北京正义路甲 1 号特别法庭上，检察员江文继续在控告：“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判刑。”

讲到这里，江文特别提醒法庭：“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乱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

江文发言完毕，曾汉周对被告说：“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咆哮起来：“那就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曾汉周严肃地说：“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江青嘲弄地说：“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演不成啊！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曾汉周严厉申斥说：“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庭。”江青更加放肆起来：“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再一次警告她：“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江青不但听不进警告，反而进一步咆哮公堂，侮辱法庭。曾汉周按铃警告她：“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江青站起身要求：“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曾汉周允许了。江青说：“打狗

看主人，就是说啊，打狗要看主人……”江青的这篇辩护词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到这时候了，她还迷恋着造反有理，真是满纸荒唐言，一副凶残相。

法庭辩论结束，曾汉周命令：“把被告人江青带下去，现在休庭。”

1981 年 1 月 23 日，在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审判以后，特别法庭开始宣判。庭长江华站起来庄严宣读判决词：“……判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死刑……”江华看看江青，只见在法庭上咆哮不停的江青脸色发白，浑身颤抖，露出了一副怕死的可怜相。江华接着念道：“缓期两年执行。”江青听了，顿时面露喜色。

特别法庭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 20 年，陈伯达 18 年，黄永胜 18 年，吴法宪 17 年，李作鹏 17 年，邱会作 16 年，江腾蛟 18 年。以上 7 名主犯均被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接着，北京和上海的法院开庭，判处毛远新、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王秀珍、徐景贤等人长短不等的有期徒刑，江青等十名主犯立即被押到秦城监狱服刑。

江青被关在秦城监狱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关着她一个人。虽被判极刑，生活上还是过得去的，也没有人来揪斗她。楼下空地甚多，江青放风时就在那里散步，四周是几丈高的装着电网的围墙。刁斗声声，警铃阵阵，监狱生活自然不好受，但是1966 年、1967 年时，多少被红卫兵揪来斗去的老干部企盼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避难而不可得。周恩来想办法让卫戍区搞了个特监，把一大批老同志送到这里来，但他们也还得经常出去挨批斗、受审讯，经常被打断肋骨，哪有江青住在这里舒服。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刑后，在秦城监狱服刑。1983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江、张二犯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将他们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江青在秦城监狱里服刑，可以读报、读书。她的女儿李讷经常到狱中探望她，给她带来大量的书报和可口的食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的老年病症越来越明显，头发照样乌黑，脸照样白皙，但行动却越来越不便。监狱当局准许江青保外就医。医院的病房与监狱一墙之隔，但这里的条件比监舍又好多了，生活起居有护士照料。

但是，江青念念不忘中南海的那栋房子，一再要求回到那里去住。1991 年 6 月时，江青又患上了癌症。在病痛和绝望之中，她用一条带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洪文在服刑期间患了肝癌，病死狱中。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于 1983 年保外就医，在指定城市安置，允许他们的妻子和一名子女陪住。

黄永胜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不久病逝。

吴法宪随妻子住在济南，每天写回忆录，陪妻子买菜做饭。周围群众对他还比较客气，菜场营业员还经常让吴老头不要排队，提前上来买菜。

李作鹏住在太原，每月有200元生活费。他住山西省委两套新建的单元楼，因打家具与邻居发生口角，经省公安厅和省委做工作才平息风波。

邱会作被安置在西安，每天写回忆录。他的妻子胡敏是个大夫，正好照顾他的起居，他每月有200元的生活费。

黄、吴、李、邱刑满释放后，都拿着释放证，到居住地派出所报了户口。江腾蛟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到太原，山西省体委给他提供了一套单元房。

“两案”的审判工作结束时，正是1981年的春季。这时中央中央正在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五回　邓小平领讲建国史　王光美泪洒停机坪

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生动现象。

但这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一方面，有些干部和群众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更为危险的是党内极少数人不但不与这股自由化思潮进行斗争，反而间接直接地予以某种支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破坏全国人民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严重的后果。

有鉴于此，邓小平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共中央认为，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必须正确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准备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既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

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邦协助邓小平主持这项工作，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拟定的《决议》提纲，他感到提纲铺得太宽了。他认为提纲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然后，邓小平讲了提纲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新中国成立 30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参加提纲起草工作汇报的中央负责人逐字记下了邓小平的这三条要求，领会着三条要求的深刻含义。

接着，邓小平又谈起了一些历史问题：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

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过了十来天，邓小平又针对提纲的修改，讲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个历史问题——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

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决议》提纲起草小组遵照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修改提纲。不觉已到了夏末。

这天，邓小平正在伏案工作，秘书进来报告，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要求采访，问邓小平是否愿意接见。邓小平想了想，断然说：“见！我来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邓小平为什么说这番话呢？原来法拉奇并非一般记者，而是遍访全球的一个名记者，她向以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而著称。她提问尖锐，风格泼辣，哪壶不开专提哪壶，世界各国著名政界领袖差不多都领教过她的厉害。基辛格是何等厉害人物，也被法拉奇逼得吐露内心的秘密，最后慨叹：“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所以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把接受法拉奇采访当成是一场考试。

1980 年夏，世界各国都注视着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风云人物在中国，她要到中国采访邓小平。

邓小平对形势和任务作了认真的分析后，满怀信心地准备着迎接西方女记者的“考试”。

8 月 21 日，法拉奇乘坐一辆高级轿车来到中南海邓小平的办公室。

这位女记者果然厉害，她坐下后不讲一点客套，一下子就提出来世界所关

注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回答是明快而肯定的："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们永远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毫不客气，马上提出来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知道她的意思，他一点也不含糊地明确解释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直率明快的谈话很满意，邓小平也想继续借她的笔去向世界宣传党的路线，谈话继续下去。这次法拉奇直接向邓小平防线的薄弱处进击："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按中国人的理解，法拉奇的这个提问近乎揭短了，但邓小平没有在意，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以为邓小平放松了戒备，来了个突然袭击，把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邓小平面前："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从来没有被打倒过……"邓小平知道她说的是周恩来，他动情地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亏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又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采访结束了，法拉奇很满意，邓小平的敏锐、坦率、机智使她佩服。她要问的问题，邓小平都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里没有个人的恩怨，没有推脱责任，

有的只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历史的成熟的考虑和对未来的构思。

法拉奇的采访记很快在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又被世界报纸转载，也被中国印出来，成为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决议》讨论稿写出来了。1980 年 10 月，讨论稿交党内四千人讨论，以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在《决议》讨论稿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要求调整他的职务。华国锋也要求辞去中央主席的职务。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他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此之前的 1980 年 8 月至 9 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已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任命赵紫阳接任国务院总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决议》指出，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共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这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正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立即为彭德怀和陶铸举行了追悼大会。这天，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显得分外肃穆，礼兵在两人的遗像两旁站着，两个骨灰盒也都恢复了死难者的真实姓名："彭德怀"、"陶铸"。大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陈云分别致悼词。邓小平走进礼堂，望着悬挂在墙上的巨幅遗像，顿时百感交集，为创建共和国而一起度过的战斗岁月一幕幕掠过他的脑海。他心里轻轻地说，战友啊，你们的奋斗汇入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洪流；现在，党同他们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党的工作重心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你们就安静地休息吧。

开罢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邓小平又开始为平反刘少奇的冤案而奋斗。这件工作难度更大，但由于符合党心人心，进展也很快。1978 年 12 月底，邓小平首先下令把王光美从监狱释放出来，恢复工作。1979 年春节，邓小平又批准王光美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度过 13 年冤狱生活的王光美出现在人群中时，大会堂里轰动了，人们争着过来和她握手问候。人们钦佩她，在极端恐怖和残忍的迫害中，她始终保持着对国家主席和丈夫的忠诚，没有一丝的动摇。可以说，在经过这场大动乱后，人们才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典型的东方女性的美德。

但是他呢？

他来了！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对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后，他来了。一只骨灰盒，上面覆盖着党旗，正面镶着刘少奇的照片，写着刘少奇的名字，当中央专门派到河南开封运载刘少奇骨灰盒的专机在北京的机场降落后，在哀乐声中，王光美慢慢地迎上前去，从专使的怀里双手捧住骨灰盒，把脸颊紧紧地贴在骨灰盒上，胜利而感伤的泪珠滚落下来，洒在停机坪上。她就这样站在那里，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整个的心思完全沉浸在对丈夫的追念和哀悼中。她用心轻轻地呼喊着：少奇，你没有白死，你的殉难已经唤醒了人们对法制与民主的呼喊。我们胜利了，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在此前后，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党和政府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为 1955 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在 1978 年 4 月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又为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为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平反。截至 1982 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三百多万名干部的问题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党还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从 1979 年 1 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成分一律定为社员。

从1979年1月起，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从1979年11月起，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开始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原工商业者的成分也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

这方面的调整还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支持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等等。

在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也依次展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六回　农村包产换新颜 沿海开放促腾飞

话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和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已把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已得到扭转。但是，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陈云致书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认为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要有两三年的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李先念也致书中央，建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他提醒大家，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邓小平积极支持陈、李二人的意见，他在1979年3月30日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谆谆告诫大家说："我们对于被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我国的经济状况，要有个清醒的估计，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这次调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前进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但是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停下来整顿。退一步才能进两步。"

讲到这里，邓小平特别提高声音强调说："同时，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

党中央接受了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紧接着，党中央于此年，也就是1979年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党中央领导下，调整大见成效，经济形势比较迅速地好转，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一

场伟大的革命开始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党和共和国采取了一切由国家统一管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概而言之，即计划经济制度。这种体制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使得党和国家可以调集有限的资金技术力量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设起了一大批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重工业企业，搭建起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骨架。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这种一切由国家管起来的计划经济已越来越难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国家负担过重，各种社会活力的生长也受到妨害，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简称为改革开放。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农业合作化以后，由于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农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农村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又有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国家对农业给予巨大的投资，但是，农业生产力仍然发展缓慢，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有较大的提高，1978 年，全国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于是，共和国历史上悲壮的一幕拉开了。

那是在 1978 年，在一个叫小岗村的小村里，村民们正在开着一个秘密会议。谁也不曾想到，这次会议竟会掀起一股强大旋风，席卷神州大地。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乡，共有 18 户人家，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县里至今还有规模巨大的朱家皇陵。但皇家瑞气并没有给凤阳带来福气，倒是十年九荒，农村姑娘媳妇只好身背花鼓走四方，靠在街头打花鼓乞讨度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凤阳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但从 1956 年开始，政策越来越“左”，农民被限制得越来越死，凤阳县成了全国著名的贫困县。到 1978 年，全县生产队的固定资产只有 1800 多万元，不要说发展生产，连偿还国家的贷款都不够。

小岗村自然也一贫如洗。18 户人家，7 户人家穷得连门也没有，其余 11 家的门是用高粱秆涂上牛粪当门。十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好几户穷得没床、没饭碗、没筷子，过着半原始生活。

实在无法过下去了，凤阳农民又是身背花鼓走四方。但现在此路不通，他们很快被遣送回来，交队里批斗，因为他们的乞讨给社会主义脸上抹了黑。

小岗村农民实在没法过了。1978 年，全队 18 户农民秘密开会，决定瞒着公社，把土地分开，包产到人。但是，这在当时是违法的，队长要被送去坐牢的。于是，全村人立下誓词：万一事发，队长被捕坐牢，全村人供养他们的家人。誓词写好后，人们在誓词上按了鲜红的手印。

这时安徽农村正在推行包产到组，实际上只不过是把生产队划小。就这，引起了许多农村干部的反对。小岗村包产到户，在一些人看来，成了分田单干，

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梨园公社准备派出干警民兵，捕人查处。中共凤阳县委书记得知后，慨然拍板："群众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让他们试试吧。全县几千个生产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也才复了一个嘛。"

公社干部不服，竟告到省里，惊动了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他亲自来到小岗村视察，最后郑重宣布："我批准你们干！谁要告，就说是我批准的。"万里不但称赞了小岗村，回到省委后，立即召开会议，在全省推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中国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改革就从小岗村发起，而安徽、而全国。

四川省这一年也实行了类似的小岗村的办法。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广东工作多年，又长期主管广东省农业，当时他就很赞同邓小平提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即为大包干。这种办法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仍是集体的，由生产队按一定的比例把土地分给社员耕种。每年收获，社员除交公粮和给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提留外，其余全部归己。由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基本是手工劳动，这个办法一下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解决了饥荒问题。为此，赵紫阳没有少挨批。

"文化大革命"后期，赵紫阳复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未几又调中国第一大省四川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四川有千里沃野耕作之地，有万里江河舟楫之便。自秦始皇时李冰父子发动四川人民造都江堰以来，千里岷江，独益四川，四川遂成为富甲全国各省的天府之国。但是，赵紫阳到四川时，四川省农民是种地大呼隆，开会好打盹，一工五角钱，不如鸡下个蛋。农民想搞点副业吧，喂鸡、养鸭，都被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广播里一天到晚喊抓阶级斗争，学大寨经验。农民缺吃少喝，大量外逃。从南津关开往宝鸡的货车上，每天都有大量农民，特别是年轻妇女扒乘外逃，远走河西走廊，为的是找一碗饭吃。其凄惨之状，令人酸鼻。

赵紫阳看到此等惨状，果断下令实行责任制。这一招果然有效，可惜不久，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中断实行。粉碎"四人帮"以后，赵紫阳又在四川试验推行责任制，很快改变了农民缺粮的状况，为此，四川民间流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同时，安徽也流行着"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1979 年 4 月，党中央在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时，又提出十二条主要措施，其中第一项是"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接着 1979 年 9 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强调："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中央的决策极大地鼓舞了农民，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始发挥出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不久，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人，紧接着有许多地方干脆像安徽凤阳小岗村一样，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人。凡是实行大包干的地方，农民的生产热情都非常高涨。但也有不少干

部心存疑虑。邓小平于1980年5月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人，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这些地方只要生产发展，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1980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引导农民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后来，中央又发布文件，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到1983年初，全国9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人，其中大多数实行的是“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包干到户。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生产出来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一倍。

为了总结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新的完善的党章，1982年9月1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邓小平首先致开幕词，他在致辞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解释道：“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思想，胡耀邦在大会上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十二大提出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邓小平的多次倡议，十二大确定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

十二大决定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党的十二大闭幕后两个月，也就是1982年11月至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一次修改宪法，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的规定。第二年，即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这次会议提出，今后五年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订和推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大会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开完后，万里回到中南海书记处。实际上，他负有协助胡耀邦抓书记处之责，书记处办公处位于中南海内，是一栋很大的老式青砖平房，中间是长长的宽敞的走廊，两侧分布着许多办公室和会议室。走廊里，人来人往，脚步轻轻；办公室里，文件翻飞；打字室里，机声嚓嚓；会议室里，轻声絮语；一派大战时总参谋部的紧张忙碌景象。

万里分工主管全国的农业改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以来，农民自发地改革汇成了改革的大潮。中共中央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和八亿农民的呼声，于1982年初下发一号文件，肯定了大包干。

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小岗村1978年全队产量不到1万斤，平均每户500斤。而现在，也就是1982年秋，单是严立富一家就卖了小麦12000斤。也就是说，现在有的一家人卖掉的小麦，就超过了过去全队的小麦总产。这还不算什么。另一户陈兴家，1978年以前家穷得只有一只破碗，而现在家里盖了楼房，买了两辆卡车、一辆小卧车。

小岗村、凤阳县、安徽省，全国农村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万里怎么不喜呢？他和赵紫阳又去找邓小平，介绍正在筹备的各省农业书记会议的筹备情况。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经验，准备开始在农村推行多种经营，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进一步把农业搞活。邓小平听完介绍后，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1号文件，把全国的农村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农民开始步入商品生产的大潮。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1号文件，强调要进一步深入搞好农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发展商品生产，加强社会服务。

三年里，一年一个1号文件，中国农村也就一年一个样。这个现象引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记者的注意，有的记者把这种现象列为一个式子：1+1+1=？前几年在科学的春天里，著名作家徐迟报道了青年数学家陈景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1+1=1的奋斗事迹。那么现在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的1+1+1=？记者们经过调查，得出了结论，这个式子中，第一个“1”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第2个“1”是螺旋上升的历史，第3个“1”是农村包围城市，打入城市。三个“1”加起来，等号的另一边是“振兴”，即1+1+1=中国农民、农村大振兴。

这篇报道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人们击节称赞。这时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忙着，原来他们取来了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1978年秘密实行包产到户时写的那张誓词，把它作为文物正式由馆里收藏起来。

记者们消息灵通，很快把这件意义深远的事报道出去。新华社在新的一年里，接连派出一批批记者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供中央参考。

在大批记者纷纷赶往改革先进地区的时候，有一个人民日报记者李克林突发奇想，全国农村改得这么热闹，大寨怎么样了？想到就走，她又来到了过去经常来采访调查的大寨大队。

啊！大寨变了。以前，来大寨学习割资本主义尾巴经验的，借学习参观之名出来公费旅游的，记者、外宾挤满了大寨的山路；夜晚，炸山造平原的炮声和体现大寨人豪迈气概的口号声、歌声闹得人睡不着觉。但现在，记者望去，只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虎头山上人声寂，大寨村里无外人。只有那座高级而庞大的国际旅行社大楼旁的垂柳在秋风的拂动下，发出缕缕响声，似乎在向熟悉的女记者述说着大寨往日的业绩和红火。

女记者向村里走去。一进大寨村，才发现这里热气腾腾，人们谈吐自由（过去，社员不准和记者、外人交谈），百业兴旺。后山煤矿绞车隆隆声不断传来，一车一车的煤运出矿井。个体运输户的汽车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大寨果园里果实满枝，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大寨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大寨人也不吃大锅饭了。现在大寨是集体壮大，个人富裕，人均纯收入大幅增加。记者走东串西，人们神情愉快，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细问之下才知，以前大寨七斗八斗，斗得人们话不敢讲，头不敢抬，吃了大苦，干尽蠢事。

记者过去搞过大寨报道，自感对他们帮了倒忙。她握着大寨老英雄贾进才那因长年累月开石垒坝而变得像树根一样的手，向他们道歉。大寨人宽厚地说："也不怨你们，那时候不那样说行吗？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什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

大寨不吃大锅饭，大寨永贵在何处？陈永贵从副总理岗位上退下后，住进了木樨地的部长楼。闲居无事，想想过去，觉得有些事办错了，给国家带来许多的损失，还是实行包产到户好，只是身体日差，不能再去种地，甚感遗憾。

这段时期，邓小平为了总结全国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轻车简从，深入农村调研。在四川省，他顶着烈日在农村考察，由于天气热，邓小平解开短袖衬衣的扣子，敞着怀，拄着一根捡来的木棍，在崎岖的坡地里大汗淋漓地行走着，登上一个沟坎，小路旁有一石凳，一个老婆婆摇着芭蕉扇坐在石凳上休息。老婆婆看邓小平满头大汗地拄着木棍走上来，心疼地用芭蕉扇指着石凳说："忙啥子哟，坐下歇一会儿吧。"邓小平也有点累了，坐在石凳上和老婆婆摆起龙门阵来。

变了，农民变得富裕起来了，到处都在盖新房子，家家都是鸡栖豚栅半掩扉。看了四川，邓小平又坐车南下去看深圳，这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年头，即1984年的1月下旬。经过几天的旅行，1月24日抵达深圳，第二天就去看深圳的渔村。

一进渔村，邓小平就激动了，这哪里是渔村，简直就是一个别墅区，只见

几十幢格式统一的两层小洋楼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林荫大道上，小汽车进进出出。

渔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对邓小平说："我们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养殖业、运输业和来料加工业，1979 年人均收入达到近 2 千元，1981 年户户收入过万元，去年人均收入近 3 千元。"邓小平算了一下，平均每个劳动力月收入 439 元，他高兴地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

邓小平此行的目的，是来考察深圳特区的发展。建立经济特区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早在 1979 年 4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办特区的问题，他对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委会于 1980 年 8 月第 15 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

自那时以来，经济特区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国人的议论。邓小平这次来深圳，就是要实地考察一下特区的建设。

在深圳，邓小平在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陪同下，视察深圳市的企业。通过考察邓小平了解到，深圳办特区以后，共与外商签订了协议 2378 项，协议投资 118 亿港元，1983 年的工业总产值，比 1979 年增长 10 倍，职工和农民生活水平也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至几倍。

特别令邓小平兴奋的是，办特区前，深圳蛇口是人口外流外逃的口子，办了特区以后，不但人员不外流了，相反，人才回流，资金回流。

深圳、珠海特区的成绩表明，办经济特区，确实是促进中华经济腾飞的一个好办法。

梁湘在陪同邓小平视察过程中，一直希望邓小平能讲几句称赞深圳的话，但邓小平喜而不露，只是说："你们讲，我听。"直到邓小平回到广州，也没有说一句称赞深圳的话。与此成为强烈对照的是，邓小平离开深圳，在珠海特区考察期间，立即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特区好"。

正当梁湘失望的时候，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了词："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的题词又一次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84 年 4 月，中国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共 14 个港口城市。1985 年 2 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 年 4 月，

海南建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这样，中国在沿海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而且带动了其他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更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邓小平结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的考察后回到北京。此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飞抵北京，祖国的统一大业即将出现历史性的进展。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七回　筹统一设计师倡一国两制　收主权邓小平说香港驻军

话说1981年5月25日，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国母的逝世，引起了炎黄子孙的无限悲痛。宋庆龄治丧委员会郑重邀请宋庆龄先生在美国和台湾的亲属宋美龄、蒋经国等人来北京参加丧仪。

自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宝岛，到1981年32年间，台湾省的发展变化较大。退守宝岛之初，国民党人心惶惶，生怕解放大军兵临宝岛，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准备万不得已时流亡他国。未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到台湾海峡。台湾国民党人才得以偏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具有一定的规模，被公认为是经济上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蒋介石在台湾连任四任“总统”，1975年4月5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他的大儿子蒋经国担任了“行政院长”，1978年又当了第六届“总统”。这时，当年来台的国民党大员陈诚、于右任等人也是先后辞世，尚在的也大都垂垂老矣，思乡之情，更加迫切。于右任先生辞世前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即统一后，台湾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向台湾省同胞提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方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也就在这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国民党军据守的岛屿，金门也随之停止了对厦门的炮击。此后，海峡两岸关系更趋缓和，1980年5月宋庆龄先生去世时，宋美龄和蒋经国虽然没有来，但宋庆龄先生在美、台的其他亲人来了不少。

宋庆龄先生的国葬于6月3日在北京举行，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

邦主持国葬仪式，中央军委主席、中国新时期工作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致悼词。国葬仪式结束后，由邓颖超护送宋庆龄的骨灰去上海万国公墓安葬。

在南下的旅程上，邓颖超心潮滚滚，感慨万端。32 年前，正是她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南下迎接国母宋庆龄北上参加政协会议的。自那时以来，风风雨雨，雷鸣电闪，经历了几多的辉煌，又承受了多大的教训。所幸的是，现在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重整旗鼓，真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只是祖国统一大业还没实现，国母辞世，其胞妹美龄和长子经国未来北京参加丧仪，国母地下有知，该是多么遗憾啊！

邓颖超在旅程上又想起了周恩来在世时对李宗仁先生的关心，对黄埔同学的教导和爱护。可惜的是李宗仁先生于 1967 年因病不治逝世，那位末代皇帝溥仪先生也因病不治于同年逝世。他们都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但邓颖超坚信，在邓小平主席一国两制的新构想下，祖国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统一。

台湾同胞热切地盼望着祖国统一。

说来也巧，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日子，即 1979 年 1 月 1 日，也正是《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表的日子，两国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应邀去美国访问讲学，到 1982 年时，大洋两岸的交流更加全方位地开展起来。

1981 年 12 月 18 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应美国有关方面邀请来美讲学完毕后，准备从旧金山取道香港回国。他买了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机票。由于飞机超员，新加坡航空公司经过交涉，得到台湾航空公司同意，请没能搭上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旅客搭乘台湾航空公司的班机去香港。赵荣琛教授未能搭上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便上了台湾航空公司的班机。

台湾班机起飞后，经过 13 个小时的飞行，于 12 月 19 日晚 9 时降落在台湾省台北机场，赵荣琛教授从波音 747 飞机上走下来，准备换乘去香港的班机。

一踏上台北机场的土地，赵荣琛教授心里一阵激动：美丽的宝岛，祖国的土地。这是隔绝 32 年后，第一个大陆人踏上台湾省的土地。他想起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氏兄弟三人，他们都以演忠义关云长的戏而著称，现在却是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一个在他方。何年何月他们兄弟三人才能一起团聚呢？

赵荣琛感叹着走进了候机楼，准备换机。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 个年轻的机场警察和工作人员走到赵荣琛面前，请他拿出机票和证件检查。赵荣琛做好了应付意外事件的准备，因为，毕竟金门海面的炮声刚刚平息下来。赵教授拿出护照，他是人大常委，护照自然是公务护照，4 个年轻人不禁大为惊奇，一个大陆官员来到台北机场，这还了得。赵教授笑问："怎么，害怕吗？"4 名警察中的头头急忙说："不不不，您是贵客，请稍等一下。"

头头走后，赵教授心里很不安。一会儿，来了五六个人。为首的一个 50 岁

模样的人，大概是个负责人，亲热地握着赵教授的手，抱歉地说："事先不知，让您久等了，请进客厅。"说着，拥着老教授走进摆满鲜花的客厅。桌子上已摆满了烟茶糖果，大家请教授抽台湾名牌烟长寿烟，喝台湾产的乌龙茶。那位负责人感慨地说："唉，很难得来一次，应该热情招待。如有招待不周，还得请先生多多包涵。"赵荣琛感动地说："我只是一个旅途经过的普通旅客，你们招待得太周到了。"那位负责人感慨地说："唉，难得来一次，不容易，不容易。"说着，把那盒长寿烟送给赵教授："留个念意儿吧。"赵荣琛笑着接过烟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了个全国人大常委的消息一下子在候机楼传开了，又来了一些人围住了赵荣琛，争着打听北京的情况。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握着赵教授的手，打着京片子问："乡长，我也是北京人。您能来这里，我们很幸会。吉祥、广和楼、哈尔飞这些老剧场都还有吗？"赵荣琛笑着说："有，有！不过就是变样了。吉祥、广和楼都还在原来的地方翻建扩大了。哈尔飞扩建后现在叫西单剧场，原来在一个小胡同里，小胡同早成了大马路，西单剧场就在西单大马路边上。北京大变了，你回到北京怕许多早年间熟悉的那些老地方都找不到了……"

赵教授又和这位乡党聊起北京的小吃豆腐脑、豆汁、切糕，一个是情切切想打听个心满意足，一个是意殷殷说了个详详细细。这里可真用得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老话了。

正聊得起劲，一个服务员端着一大盘烤鸡、牛奶、面包、火腿、鸡汤来了，赵教授已经在飞机上吃过饭了，连称不饿。可人们一定要请他吃一些，赵教授只好破例加餐，以满足同胞的照顾之情。

吃过夜餐，人们请赵教授自拉自唱一段京剧，他们要听听真正的乡音。赵教授这两天嗓子不好，便给他们拉一段小开门。他取出随带的京胡，神采飞扬地拉起了小开门。人们听着来自京剧家乡的乡音，个个如痴如醉，老者已是泣不成声……

第二天，赵教授刚起床，那些人又来了，请他吃饭，又请他第一个上了飞机。在舷梯下他们连连挥手："有机会再来呀！"

飞机飞远了，机场上的人们仍在翘首远望。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台湾同胞看到中共中央对台湾省同胞的关心，对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视。台湾同胞开始设法回来探亲，访问。

先是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女）于1987年9月下旬初访大陆。他们本来是去日本采访的。到东京后，二人突发奇想，何不乘此机会去大陆采访一次，如果能获得允许，大陆成行，这必将在中国历史上大书一笔。两人向台湾报社请示，报社也有此意，同意他们去大陆采访。李永得、徐璐二人乃向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提出申请，中央政府很快批准了二人的申请，李、徐二人便从东京乘飞机到了北京。负责接待的中新社负责人在舷梯下握住二人的手，感慨地说："等了38年，终于把你们等来了。"

大陆、台湾隔绝38年后，突然来了两个台湾记者，对于大陆人来说，犹如来了两个外星人一样新鲜。李永得、徐璐二人顿时成为中国记者眼中的头号新闻人物，整天被一大群大陆记者围着。李永得过去从别人那里听说，大陆的记者都是些奉令办事的记者，从不去抢新闻，没想到大陆记者抢新闻的劲头和本事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甚至比他们还“赖”，一天到晚把镜头对着他们。

李永得、徐璐在北京采访完毕后，便去厦门采访。从前的前线现在风平浪静，厦门岛上特架设了一架高倍望远镜，供游人眺望金门岛。李永得自然是眺望一番了。他趴在望远镜前，向对面眺望，金门岛上的汽车、游人历历在目。他看了一会儿，离开望远镜。一个大陆记者问他：“金门岛上也有这样的望远镜吗?”李永得点点头说：“有。我就从金门岛上看过大陆。”大陆记者问：“那时你心里有何想法?”李永得说：“我想着什么时候能亲自到大陆看看就好了，没想到今日终于如愿。”

李永得、徐璐回去后，台湾当局按照戒严法令对他们起诉，后经多方斡旋，仅给以警告了事。有的台湾报纸放出消息来，说李、徐二人来大陆实际上是台湾当局放他们出来探探路，为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准许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铺平道路。台湾当局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未知真假。不过，李、徐回去没有几天，国民党中常会便于10月14日颁布了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的有关规定，去台老兵，迟暮之年，总算可以再见桑梓了。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安部发布命令，声明将不再追究去台人员在大陆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其他罪行，为他们回到大陆探亲创造了条件。那些原来在战争时期被俘的战争罪犯已于1975年被全部赦免，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等都被安排了工作。台湾来大陆探亲的同胞日益增多，两岸之间的商业，文化交流也逐渐开展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邓小平在这个时期，还推动着收回香港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准备，邓小平邀请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谈判归还香港问题。

撒切尔夫人年过不惑，极有决断，自出任英国保守党领袖以来，雷厉风行地整顿党务，锲而不舍地说服选民投她的票，终于领导保守党在1979年的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入主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成为英国和欧洲的第一位女首相。

1982年春，英国与阿根廷关于大西洋中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争端大起。马岛靠近阿根廷，阿根廷军政府出兵收复马岛，英国朝野上下哗然，是战是和，议论纷呈，莫衷一是。关键问题是英国离马岛太远，如诉诸战争，必须远涉重洋作战。万里出兵，凶险莫测。撒切尔夫人力排众议，毅然下令英国海军组成特混舰队远征马岛，在“无敌号”和“卓越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攻击机的掩护下，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成功，全歼马岛阿根廷守军，夺回马岛，重现英国海军威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撒切尔夫人也因此而获得“铁娘子”美称，在国内威信大增。

1982 年 9 月，中国政府邀请撒切尔夫人访华，谈判归还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挟收回马岛之战威，态度异常强硬。来华前发表声明："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然后，满怀信心地乘坐英国皇家空军飞机飞赴北京。9 月 22 日，她乘坐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是日，天朗气清，秋高气爽。撒切尔夫人仪态万方地下了飞机，前往国宾馆下榻。天安门广场和钓鱼台国宾馆，中英两国国旗迎风飘扬，沿路上空悬挂的彩旗上下翻飞，使北京呈现出浓郁的迎宾气氛。

9 月 24 日，撒切尔夫人去人民大会堂拜会邓小平。邓颖超已在大会堂门口迎候，在新疆厅两人小谈片刻后，撒切尔夫人即告辞往福建厅拜会邓小平。

与邓颖超早在门口恭候的情景相反，福建厅的大门紧紧地闭着，没有任何迎候的气氛。撒切尔夫人走过了从新疆厅到福建厅的一半路，福建厅仍无任何动静，铁娘子不免有些不安。当她拖着步子离大门约有 20 步时，福建厅的门訇然大开，邓小平面带笑容从里面迎了出来，往前走了几步，与铁娘子握手。铁娘子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很高兴看到你。"邓小平答话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位，但我认识的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绵里藏针，铁娘子心里很不是滋味。邓小平招呼铁娘子坐下，铁娘子正襟危坐。邓小平在沙发上一靠。一个满脸紧张，一个状甚轻松。闲谈几句后，记者们被请出去，邓小平和撒切尔言归正传，谈起归还香港的问题来。

撒切尔先声夺人："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她语气逼人地阐明了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铁娘子自信，凭着自己的雄辩和马岛之战的声威，一定可以压住邓小平。

但是，铁娘子错了，她听到的回答是斩钉截铁，不容讨论的断语："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接着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阐明了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构想，除了在香港驻军这一条外，香港的一切内部事务，由香港自己管理，香港将是中国高度实现自治的特区，港人治港。

最后，邓小平摊了牌：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但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两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主权的日期。

铁娘子没有料到邓小平这么厉害，她的雄辩在这里派不上用场，马岛之战的声威对中国人也不起作用。中国人有自己的底牌，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也不是阿根廷。而英国的皇家重坦克营则早在朝鲜战场上被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全歼。撒切尔夫人面对的是有着一支打败过几十万美军的英雄部队的中国。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脸色阴沉，心神不定，表情落寞。她从福建厅出来时，邓小平也没有送她。铁娘子心神不定地步下人民大会堂的几十个台阶，在倒数第二个台阶处，慌乱中没有走稳，摔倒在台阶下，高跟皮鞋、黑色手袋

摔得老远。

1984 年 5 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和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许多港澳记者首次应邀进会采访。邓小平很关心港澳记者对会议的报道，新华社和有关部门每天把香港记者对“两会”的报道汇编成材料，供邓小平参阅。

秘书轻轻地走进来，送来 5 月 22 日香港报纸的报道。邓小平看后拍案大怒。原来有家香港报纸报道前任国防部长在 5 月 21 日出席人大会议湖南省小组会议时，就香港驻军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在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邓小平放下报纸，怒气冲冲地点上一支“熊猫”烟，狠吸一大口，心里生气地想着，这个同志，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中国军队不能在自己的领土香港驻军，那还谈到什么主权？他立即通知大会秘书组，叫他们安排一下，自己要会见港澳代表委员。

港澳记者们得到通知，请他们在第二天，也就是 5 月 24 日到大会堂集中，有重要人物接见。记者们猜来猜去，估计是邓大人要出来接见，连忙做好准备。第二天，他们早早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准备接见时向邓小平提问。到人民大会堂后得到通知，果然是邓小平要接见政协和人大的港澳代表，并且得知这次接见，记者不得提问，谈话时，记者不得入内。

人大、政协中的港澳代表委员在台阶上排好队。等了一会儿，邓小平出来，与港澳代表、委员握手，与他们合影，记者们赶忙拍照。接着邓小平朝大家笑笑，领头步入东大厅，港澳代表委员跟着鱼贯而入，邓小平回过头来问：“记者们为什么不进来，让他们进来。”会议组织者又赶紧通知记者，可以进去拍照 5 分钟。港澳记者顿时像老山的解放军战士听到攻击命令一样，争先恐后地冲入东大厅，举起照相机、摄影机一阵猛拍，灯光闪烁，机声轧轧，煞是热闹。5 分钟时间到了，工作人员过来，把记者往外推。一直坐着不发一言的邓小平突然开口了：“有这机会，我和记者讲几句话。”

记者们又惊又喜，这下又可以采访到好新闻了，回去后说不定可以加薪晋级。他们拿出采访本，紧张地看着邓小平。邓小平吐了一口怒气，对记者们郑重声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我本人和负责具体工作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的发言人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

接着邓小平又对记者们说：“我要辟个谣，那两个同志讲的香港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豪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讲到这里，邓小平面色激动，连咳数声，记者们飞奔出人民大会堂去发新闻。

记者们跑出去后，邓小平又对代表、委员们说：“驻军是象征性的，是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象征。港人治港是最广泛的自治啦，除了驻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象征了。”邓小平又进一步解释说：“应当估计到九七年后会有人捣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乱不可能不出现，不出现才怪，有了军队就不能胡作非为了，等到乱了再派军队，就不同了。”

按照政治学的原则，在领土驻军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主要象征。自 1982 年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会谈后，中英谈判时断时续，时晴时阴。英国当然是不愿意归还香港，对英吉利人来说，香港犹如女王皇冠上的东方明珠，怎舍得归还，但是这个想法于理不通，诉诸武力又不现实，英吉利人的福克兰情绪对中国人不起作用。于是英国政府、港英当局对谈判设置种种障碍，阻碍香港回归祖国，用驻军问题挑起风波就是一种手段。但他们哪里是邓小平的对手，一个个都败下阵去。中英两国政府终于就归还香港问题达成协议，1984 年 9 月，英国代表来到北京，准备草签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4 年 9 月 26 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布置一新，在大厅中央摆置着一张铺着崭新的墨绿色绒布的长桌，桌子中央插着中英两国国旗。

9 时 55 分，中英两国政府的代表鱼贯进入西大厅，在“松柏长青”的屏风前排好队，中国政府代表周南、英国政府代表伊文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 3 份协议文本上签字。过了几个月，中英两国对协议进行了审议后，开始准备签订联合声明。12 月 19 日下午 5 时半，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大厅里弥漫着激动和庄重的气氛，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桌上插着中英两国国旗，中国政府赵紫阳总理和英国政府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各自国旗的一边坐下来，用中国的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联合声明规定，香港将于 1997 年归还中国。

签字仪式结束后，赵紫阳和撒切尔发表讲话。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热烈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一件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邓小平这时是轻松愉快，撒切尔夫人却是有苦难言。归还香港，实在是英国政府迫于压力，忍痛割爱啊！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发表，香港社会平静，股票指数上涨，但在澳门却引起了一阵议论。香港问题一解决，邓小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澳门了。

说往事，甚荒唐。英国人强占香港，还打了一场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清朝政府订了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而葡萄牙人侵占澳门时，连个不平等条约也没有订。那还是在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 1553 年，葡萄牙人以晾晒衣物为借口，登上澳门。此后他们又贿赂明朝的澳门地方官员，在岛上建筑房屋，正式定居，以后又修建城墙炮台，私设官吏。到了近代，中国国势日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政府单方面宣布侵占澳门。清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曾想

交涉收回澳门部分权益，但葡萄牙政府根本不予理睬。1951 年，葡政府竟宣布澳门是他们的一个“海外省”，想长期霸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日益强大，葡政府被迫于 1974 年撤走 5000 名驻澳葡军。1979 年中葡建交时，葡政府在中葡有关协议中承认澳门是葡萄牙治理下的中国领土。

现在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怎么办？葡萄牙政府和澳门总督高斯达将军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在征得政府的同意和授权之后，高斯达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的第 10 天就急急忙忙发表谈话说：“葡国政府随时等候解决澳门问题，葡国对澳门不会固执，如双方认为时机成熟，即可解决。”

葡萄牙政府见机行事，顺水推舟。邓小平当仁不让，寸土必争。中葡两国政府经过谈判，终于在 1987 年 4 月 13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赵紫阳总理和席尔瓦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声明上签字，邓小平主任，李先念主席出席了签字仪式。仪式结束后，邓小平、李先念满面笑容，举杯祝贺。根据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对澳门行使主权。

香港、澳门回归有期，中国及海外华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这是后话，就不多说了。

1984 年好事不断，就在邓小平于这年春颁布命令，表彰老山边防前线部队的时候，北京附近的某地，坦克隆隆，汽车轰轰，一支合成军团开着无数坦克、大炮、导弹突进到这里，最奇怪的是军团中还有一支人数可观的女兵部队，个个身材苗条，美丽如仙，分外惹人注目。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八回　贺盛世北京隆庆典　让建设中国大裁军

阅兵是检阅军队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一种盛大仪式，同时也是提高士气，振奋人心的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在莫斯科被德军重兵包围的极其严酷的形势下，毅然于十月革命纪念日，也即是苏联国庆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显示了必胜的信念，给苏联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也极其有效地提高了部队士气，受阅部队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

阅兵失败的也不乏其例。埃及总统萨达特为了纪念十月战争中埃及军队一举突破以色列防线的胜利，在开罗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极为壮观。突然，一辆炮车在阅兵台前停下来，几个士兵端着冲锋枪朝检阅台冲来。萨达特还以为是来向他致敬的。谁知这几个士兵冲到检阅台前，端枪朝萨达特猛扫，又向检阅台连扔手榴弹，检阅台上顿时枪弹横飞，鲜血迸溅。萨达特受重伤，很快不治死亡，被打死、打伤的外宾及政府官员横倒竖卧，阅兵场成为屠场。

随后，继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为萨达特举行国葬，许多国家的总统、总理及高级官员出席葬礼。开罗市民为了一睹萨达特夫人的芳容，一拥而上，冲散了送葬队伍。载着萨达特遗体的炮车被扔在太阳底下无人照管，美国总统被挤掉了鞋，其他政府高官也被挤得东倒西歪。世人叹息不止，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走上富强之路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阅兵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就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到 1959 年，共和国举行了 10 次阅兵式，一次比一次精彩，显示了国力的逐年提高。此后因经济困难，政治动乱，阅兵也就不搞了。

邓小平复出后，即指示总参谋长杨得志，要恢复阅兵，它对培养部队作风有实际意义，不能说阅兵、搞分列式就是形式主义，队列出战斗力。于是，在华北实兵演习、邓小平阅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1984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 35 周年阅兵。1983 年 12 月，邓小平任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为阅兵领导小组组长；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为阅兵总指挥；任命北京军区参谋长周衣冰为阅兵副总指挥。1984 年 3 月 2 日，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审阅批准了阅兵总指挥部的阅兵方案。邓小平一声令下，秦基伟即调受阅部队在北京附近的训练基地集中。调来的受阅部队计有：仪仗队一个，军事院校方队 6 个，徒步方队 5 个，海军、空降兵、女卫生兵、武装警察方队各一个，302 坦克导弹方队 2 个，炮兵方队 7 个，火箭布雷车方队 1 个，523 轮

式装甲输送方队1个，63式履带装甲输送车方队3个，坦克方队6个，海军导弹方队1个，地空导弹方队2个，战略导弹方队1个，男女民兵方队各1个。

受阅部队共10370人，重武器计有飞机117架，导弹189枚，坦克装甲车250辆，大炮126门，火箭布雷车18辆。轻武器共为6429支（挺）。

每个徒步方队为14个排面，每排25人，共352人。机群为9机编队，战车方队为4个排面，每排4辆。

全部受阅武器都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其中19种都是刚出厂的具有现代世界水平的武器。

受阅部队，除飞行部队在南苑机场集中训练外，其余全部调到训练基地进行强化训练。

五黄六月，天气越来越热。阅兵村里，口令阵阵传来，受阅徒步方队进行着艰苦的训练，每一步都要恰好达到规定的步幅，不能多一厘米，不能少一厘米，汗水浸透了衣服，打湿了阅兵场。

这年的国庆阅兵，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党的十二大以后，国家经济建设比较顺利，通过前几年的经济调整，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即1981—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接近完成，预计到1985年底，“六五”计划将全面和超额完成。到那时，工农业总产值将由7700亿元增加到1333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8665亿元。按198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

“六五”计划的顺利发展，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音。由于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也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许多过去定量供应，凭票购买的商品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粮油的供应虽仍凭票定量供应，但由于肉、蛋、奶已敞开供应，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人对粮、油的消费量已大大减少，许多人手中都留存着大量粮票，粮油的供应取消粮票、油票，敞开供应的日子已不远了。

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预计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28年间每年提高2.6%的幅度。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预计到下年，即198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五五”时期增长一倍，在世界各国中所占的位次明显上升。

同时，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也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迎来了少有的太平盛世。国庆阅兵，举行这样隆重的庆典，既是对盛世的祝贺，也是对全国人民进一步奔小康的激励。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10月1日国庆节到来了，35万盆鲜花把北京装饰得分外美丽。天安门广场是花和红旗的海洋，广场上的10万名男女青年不断地举起花和彩旗。从天安门城楼望去，广场上一会儿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国徽，

一会儿出现了“祖国万岁”、“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特大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修缮一新，金碧辉煌，14 个巨大的宫灯挂在城楼上。城墙中央，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伫立在广场南侧的正中央，广场前面两侧，立着马、恩、列、斯的画像。

阅兵部队已在夜里集结在东长安街上，等待军委主席检阅。

10 时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庄严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大会开始。”1200 人组成的军乐队在广场北侧的正中央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礼炮声隆隆响起，万人仰头肃立，向国旗致敬。

国歌的旋律刚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黑色敞篷轿车出了天安门城楼，停在金水桥南头。他身穿深灰色中山服，扶着车上的栏杆，站在车上。阅兵总指挥秦基伟乘着黑色敞篷车从东长安街徐徐驶来，在金水桥头停住。秦基伟向邓小平行了个庄严的军礼，大声报告：“军委主席：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邓小平听完报告，命令开始检阅。他的车在前，秦基伟的车在稍后一旁随行。邓小平不断向指战员们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车子附近的方队官兵则高呼“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并向军委主席行注目礼。

阅兵完毕，分列式开始了，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伴随着军乐团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仪仗方队护卫着八一军旗率先走过来了。几十万人聚集的广场上鸦雀无声，只听得一声声震撼人心的口令声不断地在队列里响起，“正步走!”“向右——看”。天安门城楼下，几百人正步前进时发出的铿锵而有力的脚步整齐而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一个个方队踏着正步走了过来，似山，似海。但那整齐威严的队伍和走姿，使人感到他们比山更雄伟，比海更壮阔。

忽然，一声清脆的女子口令声响起，“向右看”，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望去，原来是女兵方队走过来了。大盖帽，蓝短裙，长筒皮靴，女兵们分外飒爽英姿。领队的两名女军官右手敬着军礼，领着方队“咔—咔—咔”地正步通过了天安门。

忽然，隆隆的飞机声从上空传来。人们抬头一看，中国空军的歼击机、轰炸机成 3 架编队、6 架编队、9 架编队，拉着长长的彩烟掠过天安门上空，人们不由得鼓起掌来。这时，天安门前，马达隆隆，铁流滚滚，各种战车排成整齐的队形继徒步方队以后驶过天安门前。

阅兵结束以后，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突然，游行队伍中的几个北大学生把他们前一天晚上做的一条横幅打开来，上面只有四个写得不那么漂亮的大字“小平您好!”陈希同立即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会心地笑了。

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身着新式军服的部队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却惦记着前一天晚上总参军务部送来的大裁兵方案。我国的军费是世界上几个大国中最少的，1984 年，我国的军费开支只有美国的 2%，但我军人数却是美军的两倍，有限的军费让人头费耗去了相当大一

部分，影响了部队质量的提高和装备的改善。员额多，结构又不合理，军官和士兵比例是1:2.4。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人数是两个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这样庞大的机关，不用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邓小平分析了世界形势，断然对杨尚昆说："我看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又解释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现在机关这么庞大，没等你司令部二十几个领导画完圈，敌人早就冲过来了。下决心，搞一次精简整编革命，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经过军委的反复讨论，盘子定下来了：军委三大总部人员精简一半；11个大军区合并精简成7个，取消4个；军以上单位裁掉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各级领导班子限设副职；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改由士兵担任，3年内转业60万名干部。

裁军的总兵额是100万！

100万中绝大多数是军官！

杨尚昆现在最担心的是昆明军区，不知他们能否经受得起一个新的整编计划的冲击。

国庆阅兵一个月以后，中央军委、三大总部、海军、空军两总部、11个大军区的司令、政委来到京西宾馆，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问大家："这次阅兵怎么样？"将军们笑了起来，那还用说，棒极了。邓小平看出大家的心思，严肃地说："阅兵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将军们心头一震，邓小平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提出军队高层领导老龄化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座的许多头发白了的老将军要退出领导岗位。

中国的百万大裁军就从将军们这里开始了。

裁军，说起来难做起来更难。退出现役，对将军们来说，意味着要交出将军楼，交出汽车，意味着再也没有一呼百应的火热景象，意味着没有许多生活上的方便，意味着……但为了中国军队的建设，为了中国建设的发展，将军们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

经过反复的讨论，裁军的盘子定了，大军区的司令、政委于1985年5月20日再次来到京西宾馆，听候中央军委颁布整编命令。

11个大军区司令、政委聚到一起来了，他们拥护中央军委决定，但还是希望别把自己这个军区取消。倒不是为自己，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得到通知不进入新的领导班子，他们是为着自己的部队着想。一手训练、编组、壮大起来的部队，犹如自己养大的孩子，怎肯舍得给精简整编到别的军区去。这些部队里，有多少选好准备提拔的好苗子，有多少等待家属随军的基层干部……

昆明军区张铚秀心里却很坦然，下棋看戏兴致很好。也难怪，昆明军区是

二野主力兵团四兵团的老底子，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山、法卡山战役，军区再度辉煌；此时小霸仍很猖狂，前线枪声不停，指挥不能中断。有这几条硬杠杠，中央军委还能撤销昆明军区？再说，张铚秀已得到通知，让他们准备接收成都军区的干部。

但是，张铚秀没有注意到，已内定要撤销的成都军区的领导们忽然愁貌换喜颜，成天关起门来嘀嘀咕咕。

6月3日，下午，整编命令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宣布了：昆明军区被取消，合并到成都军区。

对于军委的决定，张铚秀毫不迟疑地表示坚决服从，但回到宿舍以后，思前想后，夜不能寐。他倒不是为自己的职务着想，根据军委的命令，他马上就要离休了，他想到的是昆明军区的部队。自从接到军委关于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的决定后，为了接待成都军区的干部，新盖的宿舍楼停止分配，该提拔的干部停止提拔，为的是给成都军区合并来的干部准备好宿舍和位子。

此刻，张铚秀特别想起了那场悲壮的、威震中外的收复祖国神圣领土老山的战斗。

老山位于中越边境中国一侧。中越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友好交往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立即腾出手来大力支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的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

1956年以前，中国派出陈赓、韦国清等高级将领到越南，帮助越南组训部队，这才有东溪大捷和奠边府大捷。这时中国向越南供应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由于是收缴的杂式装备，中国没有计值。但谁都知道，没有任何军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从敌人手里夺取这些武器，几百万战士捐躯沙场。

援越抗美期间，中国又派出十万高炮、工兵部队到越南北方，以便越南抽出部队去支援南方。

从1965年开始，中国又出动大量汽车、人力向越南运送各种物资。到1968年3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中国派往越南的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总计达32万多人，伤亡5千多人，援越物资超过200亿美元。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援下，越南人民英勇战斗，迫使美国于1968年11月宣布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1973年美国军队从南越撤走，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立即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越南人民抗美战争的胜利。谁知就在此时，越南在中越边境上开始挑起边境冲突。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越南热衷于推行它的地区霸权主义，企图建立所谓“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对此当然持反对态度，越南当局恩将仇报，全国刚一解放，就采取反华仇华政策，公然侵占我国领土，杀害我国边境居民。中国政府多次向越南当局提出举行边界谈判的建议，但都被越南当局搁置一边。越军出兵侵占柬埔寨后，越南当局竟把中国看成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

中国一直以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重，对越南当局的反华挑衅再三规

劝与警告，但越南当局自恃有苏联的支持，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南疆的安宁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的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1979 年二三月间，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南侵略者实行自卫反击战，打击了越南当局的地区霸权主义气焰，使中越边境地区获得一个相当时期的安定。

1984 年 4 月，中国边防部队又进行了收复老山的战斗，师政委亲临主攻营进行战斗动员。他讲了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后，问战士们："小霸恩将仇报，侵占我神圣领土，我们能答应吗？"战士们齐声大吼："不答应！"政委说："对，祖国的神圣领土，一寸也不能让小霸占去。"

主攻营要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收回老山主峰。此刻，军营中的卫生队、通信连的女兵们着装整齐，把一杯杯出征酒双手递给战士们。营长臧雷举起酒杯，祝酒："第一杯酒，献给 1979 年以来为祖国牺牲的烈士和被敌人杀害的群众。"

全营战士把酒杯举过头顶，再泼洒在大地上。

"第二杯酒，为我们营接受了主攻老山的战斗任务，干杯！""第三杯酒，为夺回老山交还给祖国人民而干杯！"

饮完三杯出征酒，战士们庄严宣誓："冲锋在前，撤离在后，牺牲个人，保全集体。"这时战士们身后响起了大炮声，这是我军掩护进攻的炮声。万炮震敌阵，战士们端上枪，随着炮火延伸，开始向老山主峰冲击。

越军用中国援助的地雷布了道道雷阵，用中国援助的高射机枪组成了严密的火网。主攻营向前勇猛地冲击着。九连八班班长黄秀峰负伤了，左肩被打了一个洞，他用急救包裹扎后，又向主峰冲击。忽然"轰隆"一声，一颗地雷爆炸了，黄秀峰顿时痛得倒在地上，醒来一看，一条小腿已没有了。他脱下衣服，把断腿包上，往前爬着，死也要死在主峰上。

部队继续冲击着。忽然 17 岁的小战士贾云科又负了伤，副班长命令他下去。贾云科连伤口也不扎，问副班长："你能不能介绍我入团（加入共青团）？"副班长说："当然可以啦！"贾云科大叫一声"好"，扛着火箭筒冲上去，架起火箭筒就朝敌人阵地上轰击。越军用中国支援的高射机枪平射，大口径机枪子弹打得钢质火箭筒上都是洞，贾云科壮烈牺牲了！

主攻营前仆后继勇猛冲锋，终于冲上了主峰。越军不甘心，又向主峰发动反扑。新兵张向华端着机枪猛扫，机枪手戴友红一个人打死了 100 多越军。越军伤亡惨重，开始败退，张向华、戴友红端起机枪扫射追击，突被冷枪打死。

突然，敌人的重炮开炮了。老山主峰上浓烟滚滚，火光熊熊。我军的重炮立即回击。一些越军在大炮的掩护下，又向主峰冲来。排长史光柱指挥全排反击，突然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他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黑暗中，只觉得脸上挂着一小串什么东西。史光柱以为是一根草叶，用手扒去，突然一阵钻心的疼，这才知道是眼球被炸出来了。他把眼球塞进眼眶，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胜利了，红旗插在老山主峰上。营长臧雷和教导员一起来收敛烈士遗

体，只见从冲击出发地到老山主峰的道路都被鲜血染红了，牺牲的战友个个手握武器，怒睁双目，做向前冲击状。他们含着泪，为烈士合上眼睛。烈士啊，主峰收回来了，你可以瞑目安息了。

部队换防了，主攻营撤了下来。臧雷来到烈士墓前，给每个烈士献上一支点燃的香烟。史光柱弹着吉他，唱着一首烈士们生前喜爱的歌：

我自豪地当上了一名士兵，
每月只有几块钱的薪金。
不够买一瓶茅台酒、一条大中华。
但我富裕的心头缀满珍珠。
在为祖国而战的道路上前进，
不为当一名将军改换门庭，
不为得一枚勋章炫耀终生。
为了婴儿的憩睡更甜，
为了母亲的笑脸更美，
啊，为了这一切，
我宽厚的肩膀
愿挑起所有的不幸。

战士们和着琴声，跟着史光柱唱着。泪水模糊了他们的眼睛，豪壮之情在他们的心中荡漾，“烈士啊，你放心前行，你的未竟事业我完成；祖国啊，请你放心，我们用血肉，筑成了南国长城……”

这时，救护车开来了，史光柱、安忠文、陈洪远、张川被送上救护车，前往昆明市总医院。四英雄的光辉业绩在报纸上发表了，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其中有许多是姑娘的求爱信。史光柱、安忠文两个人双目失明，他们不愿意让姑娘为自己作出牺牲。让她们生活得更愉快吧，史光柱弹起吉他，动情地唱道：

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

史光柱正唱着，突然一个姑娘推开门走了进来。护士一看，是位身材苗条、清秀动人的姑娘。护士问她：“找谁?”姑娘说：“我找安忠文。”护士点点头，把她领到安忠文跟前：“小安，昆明纺织厂的姑娘邓阳昆找你。”安忠文连连摆手：“不见，不见。”护士笑了起来：“人家已站在你床边了，她是多么漂亮啊!”

安忠文、护士都知道邓阳昆。她前几天给受伤最重的安忠文写信，要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安忠文让护士代笔谢绝了，没想到姑娘自己找上门来了。

沉默了一会儿，安忠文才说："我的眼睛看不到了。"邓阳昆说："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安忠文还是不同意，"和我一起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邓阳昆说："这些，我早就考虑到了。"安忠文不说话了。又沉默了一会儿，安忠文叹口气说："你再想想吧，不要后悔。"邓阳昆说："想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丈夫，我来服侍你。"

邓阳昆的到来使史光柱几个英雄思考着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对着20岁的人生，严重伤残的身体，应该怎么去生活？战士的责任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一个新的战斗任务摆在他们面前，向祖国人民汇报：老山前线的战士们是怎样看待理想、奉献人生的。

几天以后，张铿秀乘飞机回到昆明，十几辆轿车排列在机场上，前来迎接的军区领导默默无语。张铿秀把东西放下后，即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为烈士们献上一个花圈。他又来到老山守备部队，仔细地检查了战备情况，直到成都军区派人接管了指挥权，他才放心地从山上下来。

其实，保留成都军区，取消昆明军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昆明军区地处边陲，很难对西南军事进行有效地领导，成都军区正好位于西南的重要战略中心和支点上。邓小平取消老部队组成的军区，正好说明了他的整编部队的决心。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军区也都愉快地服从了撤编的命令。

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百万的浩繁工程胜利完成。

且说1985年9月，正当中国裁军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国家教委主任李鹏给邓小平送来第一个教师节的安排方案，征求邓主任的意见。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九回　振兴中华赤子望归国　报效祖国荣氏庆团圆

话说邓小平向来非常重视教育。1975 年全面整顿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给拖住了。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为此，他指导胡耀邦等人撰写了《汇报提纲》。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邓小平几句“黑猫，白猫”呀，然后提议政治局否定这个决议：“反对的请站起来!”邓小平当即站了起来。毛泽东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鉴于没有人站起来反对，我提议一致通过决议。”

1977 年 7 月邓小平复出后关心着国家教育和科技事业的振兴，自告奋勇地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仅半个月，他就邀请 33 位著名专家和教授举行座谈会。开始在科技战线和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毅然否定了祸害中华 10 年的“文革”时出笼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为知识分子正名。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庄严宣布：“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自那时以来，全国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突飞猛进，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国家又拿出重金，派遣几万名留学生赴美、日等国留学，邓小平还觉得不满意，必须要养成全国尊师重教的优良风气，他提议设立“教师节”。经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决定把每年的 9 月 10 日定为教师节，邓小平也欣然同意。

此时即 1985 年 9 月，第一个教师节就要到了，李鹏经组织教委研究后，提出了庆祝方案。邓小平看后，欣然同意。

这天，李鹏正审阅着准备在教师节向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讲话。根据计划，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去教师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祝贺节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教师节给全国教师写信，祝贺节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教师节大会上发表讲话；李鹏则要在 9 日向电视台、电台记者发表谈话，向全国一千多万名教师和全体教育工作者祝贺节日。

李鹏正看着基本定稿的谈话稿，门轻轻地推开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几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推开门进来了。李鹏赶紧站起来，走过去把邓颖超扶住，问候道：“邓妈妈好!”邓颖超慈爱地拉住他的手说：“我今天有空，来看看你。你现在当了副总理了，担子重了，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把工作搞好。”

李鹏连连说："邓妈妈放心，我一定按照你的嘱咐去做。"邓颖超笑着说："这就好，这就好，当年的孩子，如今都挑大梁了。家华现在也工作得很好。华明（叶挺将军的儿子）在深圳领导着一个科技公司，搞得也不错，要是你们的周伯伯还活着，不知道多高兴呢。"

李鹏扶着邓颖超的膝盖，向邓妈妈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心得和体会，邓颖超高兴地笑着。忽然，她想起了一件事，对李鹏说："江姐的儿子彭云到美国留学去了，听说在那里很苦。一下子出去了几万人留学，都很不容易，和你们当年在苏联留学不一样，应该派人看看他们，鼓励他们学成回国，能给他们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下，还都是孩子啊，漂洋过海的。"说着，她眼睛有些湿润了。李鹏连忙让人取来热毛巾，双手递给邓颖超，汇报说："教委已经想到了，年底就要派一个慰问团去美国慰问他们，顺便也就招聘。"邓颖超点点头说："这我就放心了，你忙，我不多坐了。"李鹏把邓颖超扶上汽车，送走了邓妈妈。

到了年底，国务院中国留学生工作组出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李鹏又召见他们，讲了一些注意事项，工作组遂于 12 月 28 日乘波音飞机飞赴美国，中国留学生主要都在美国学习。

工作组在旧金山一下飞机，乘坐出租车去预定的旅馆。出租车司机年纪已四十开外，外表整洁，温文尔雅，与常见的司机不太一样。工作组中有英语说得好的，便同他聊起来："你开出租车几年了？"司机回答说："两年了。"组员问他："以前干什么工作？"司机回答说："在大学里当教授。"组员愕然，他把话给大家一翻译，人人惊诧。他们都知道，美国的教授收入很高，待遇优厚，社会崇敬，远不是出租车司机可比的。这正好和中国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远远超过教授的情况相反。大家不禁问他："那你为什么来开车？"司机叹口气说："在美国，竞争很厉害。因为我在学术上落后了一点，就被学校解雇，至今无人聘用。"

工作组默然。由这位落魄的教授，他们一下子体会到了中国留学生的艰辛的留学生涯。国家经费困难，每月只能发给留学生 300 美元的费用。这笔钱在国内是一个大数字，但在美国仅足以糊口而已。比起公费生来，自费生的境况就更惨了，他们完全得靠打工维持学业，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假期更得拼命干。吃尽千辛万苦，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留在美国，过高等华人的生活。这已成为国内许多人的定见，舆论沸腾，议论纷纷，许多人已经建议国家对留学生收取高额培养费。

中国留学生工作组不相信国内的这些议论，但也担心此行收获有限。孰料，他们到旧金山的消息传开后，一些留学生自动找上门来，向他们表示要回国服务。其中有些是已经在美国找到了待遇优厚的工作的留学生。

工作组组长记着李鹏的嘱托，在马里兰大学找到了江姐的儿子彭云。工作组组长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认识了彭云。那是 50 年代，大学里充满了革命的激情，经常有老革命到学校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作为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著

名烈士，江竹筠的英名传遍了神州大地；报纸上，刊物上登出了江姐怀抱儿子彭云的遗照。到了60年代，反映中美合作所烈士斗争生活的小说《红岩》出版了，神州大地掀起《红岩》热。不知有多少人来到红岩村革命纪念馆，瞻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老革命家在重庆红岩村的光辉革命业绩；不知又有多少人来到离红岩不远的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遗址，凭吊江姐等革命烈士的英灵。那时，彭云已上中学了。

但“文化大革命”把一切倒了个个儿，周恩来长期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四川地下党的工作是直接由南方局领导的，为了扳倒周恩来，林彪和“四人帮”把四川地下党的斗争一笔抹杀，四川地下党的成员都被打成特务、叛徒，遂使烈士的英名蒙尘，江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退了。事过十几年，没想到在美国又碰到了彭云，一个已成了留学生的彭云。

工作组组长仔细看着彭云，果然是江姐的儿子，面庞极像他的父亲——在华莹山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后，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口示众的暴动领导人。

工作组组长不知说什么好。他们似乎很熟悉，应该有很多话说，但现在却什么也说不出。由于烈士蒙尘，遗属受害，工作组组长不知该提到江姐还是不该提到江姐。彭云倒是很爽直，连连问起国内情况。工作组组长给他讲了一个上午，临了问道：“小彭，你看在美留学生学成后，会有多少人回国服务?”彭云不假思索地说：“至少有一半!”组长紧问：“为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国内待遇菲薄，工资很低，住房紧张，科研条件差?”彭云说：“我给你讲一件事吧。有一个自费留学生到了美国，举目无亲。他想找一个住的地方，按照广告找去，出租的房子有的是，但都不租给他。什么原因呢？表面上说得很客气，实际上就因为他是黄种人。日本人也是黄种人，在美国却神气得很，租房子一点儿没有问题。说到底，就因为他是中国人。后来一个老太太租给他房子。老太太孤身一人，住着一栋二层楼房，实在太孤寂了。这位仁兄住进去后，手脚勤快，经常帮老太太干一些事，聊一些外面的新鲜事。老太太突然发病后，他叫了车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安排治疗。老太太想儿子，但儿子不来。还是这位仁兄经常到医院去看她，端茶倒水。老太太临终前留下遗嘱，把她的房子赠给了这位仁兄，这位仁兄又把它改为中国留学生活动中心。”

彭云讲完这段故事，感慨地说：“中华不振兴，祖国不富强，即使留在美国，也永远有一种孤寂和抑郁感。这就是我们前几代的留学生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裕生活，回国工作的原因。”

工作组长点点头，理解了这些海外赤子的心。

中国留学生工作组在美国几个月，遍访了在美学生，给他们带去了祖国的问候，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了。他们回国后统计了一下，从1978年以来，中国派出公费自费留学生共3万8千人，已回国者达1万6千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即将返国或准备学成返国。

邓小平知道这个消息后很兴奋，指示李鹏要把派留学生的政策坚持下去，

今后还要多渠道派更多的留学生出去，留学生回国服务的方式可以更灵活些。

1986 年 6 月的北京，暑热逼人。邓小平看着国家教委的报告，想着怎样使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更上一层楼。这时秘书进来轻轻地说："小平同志，荣氏亲属观光团已到北京了，你见不见?"邓小平喜悦地问："已经来了？当然见，明天就见，在人民大会堂见。气氛要热烈，场面要隆重。"秘书答应着出去布置去了。

啊，荣氏亲属观光团到京了，这是国家的一大喜事啊！邓小平抽着烟，透过烟雾，荣毅仁——中国第一大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风风雨雨的遭遇浮现眼前。经过 36 年，他们这一大家子终于在北京又相聚了，邓小平可以想象出久别重聚的荣氏亲属在北京的欢乐景象。

确实，荣氏亲属此刻正沉浸在全家合聚的天伦之乐中。他们是 6 月 15 日到北京的，200 多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瑞士，容氏亲属观光团团长自然是最年长、也是辈分最高的大哥荣尔仁了。在他的指挥下，200 多位荣氏亲属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了北京，下榻在香山饭店。久分再合，200 多名亲属和荣毅仁一家拥抱、亲吻、欢跳，说不尽的离别话，流不尽的重聚泪。

荣毅仁设宴为亲人洗尘。饭毕之后，大哥荣尔仁和自己的胞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荣毅仁在房间里闲谈。

荣尔仁问："二弟，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当年上海易手之时，很多实业家都到香港、美国去了，你为什么不去?"大哥的问话一下子把荣毅仁的思绪拉到 1948 年。

荣毅仁祖籍江苏无锡。1896 年，他的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在上海开设钱庄，创办实业。至 1948 年，荣家在全国各地共有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等类工厂 24 个，其中单在上海就有十几个纺织厂，荣家是上海、也是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外人只看到荣氏企业的红火，哪里知道荣家创业的艰难。日军侵华，占领上海，横征暴敛。抗战胜利，荣德生又被绑架，花了 50 万美元才买回一条命。此后，"国军"三番两次架起机关枪，敲诈钱财。荣家一日数惊，不堪其扰，荣德生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命令儿子荣毅仁担负起领导荣氏企业的重任。

上海解放前夕，荣毅仁已把妻子儿女送到香港，荣德生却表示至死也不离开故土，叮嘱儿子说："国民党是失尽人心，共产党来了，总不会比国民党更坏吧，不要把工厂迁走。"荣毅仁听了，又把妻子孩子从香港接回来，准备迎接解放。

1956 年，荣毅仁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实行公私合营，震动了海内外。毛泽东极为赞赏，在历次运动中都保护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荣毅仁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然，这中间也受了不少委屈，但是和那些屈

死的建国功臣名将比较起来，自己受到的这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听完弟弟的介绍，荣尔仁感慨地说："父亲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看你现在事业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上海的那24个工厂，美国权威杂志《幸福》把你列为世界50名最有知名度的实业家之一，又担任了国家这么大的领导责任，父亲泉下有知，定会欣慰而笑，就是我们荣氏家族也都有根了。以前我们大家散居各地，很少见面，这次一说回国探亲，一下子就来了200多人，都是亲侄子、亲侄女、亲侄女婿，还来了重孙，四世同堂哩。"

荣毅仁笑笑说："是这样，一半人都是初次见面。说起中信公司的发展，还要感谢小平同志的领导。是他在1979年1月，亲口对我说，"你来牵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你管，事情由你拍板负责，要排除干扰，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中信发展了，小平同志很高兴，给中信题写了'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词。"荣尔仁笑笑说："我们也要报效祖国，多作贡献。这次我们来，一是探亲，二是看能为祖国做点什么。荣氏一门，人才济济，总该为祖国有点贡献才是。"

两个人正谈得高兴，中南海来了几个官员通知他们，第二天，即6月18日邓小平同志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大家。荣尔仁一听，又惊又喜，没想到刚到北京，邓主任就要接见，即刻让孩子们通知亲人做好准备。

第二天，荣氏亲属探亲团200多人和荣毅仁一家按时坐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很快出来与大家会面，200多人争着和邓小平握手，有个小伙子握手时脱口而出"邓大人！"邓小平随和地笑着纠正："邓小平。"大家更乐了。

荣毅仁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的大哥荣尔仁，邓小平问他："高寿？"荣尔仁说："今年79岁，比邓主任小好几岁哩。"邓小平祝福他长寿。荣毅仁一一介绍去，最小的一位是荣尔仁大哥的外重孙子尹兆光，才一岁两个月，牙牙学语。邓小平疼爱地抱过来，亲了几下，教他："叫太爷爷。"小孩不会叫，只是笑着，妈妈怕影响说话，忙把小孩抱了过来。

邓小平招呼大家坐下，让大家喝茶，自己靠在沙发上又点了支烟，很香地吸了一口，环顾四周，愉快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聚会在北京，怕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吧，天伦之乐啊。我向你们热烈祝贺。"大家都热烈鼓起掌来，邓小平笑着点头致意。待掌声停了，邓小平动情地说："你们荣家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创造了一个好条件，使你们能够像今天这样很好地团聚。你们的团聚是件喜事，我们还要争取整个民族的大团聚。"

邓小平又叮嘱大家，到了北京，就是到了家，好好看看北京，多看看长城。随后邓小平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荣尔仁回到香山饭店，组织大家去颐和园，却发现好几个年轻人已不见了，打问之后，才知他们到清华大学考察讲学去了。荣尔仁笑笑："这些孩子，也太性急了些。"他到香山饭店各个房间看看，见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着怎样结合自

己的专业和经营领域报效祖国。只有一个房间里冷冷清清，原来是自己的盲侄女和她的美国朋友。荣尔仁心里一酸，把侄女拉到自己跟前坐下，劝慰起来。

荣毅仁的侄女荣智顺年轻的时候就双目失明，多少年来和半盲的一个美国朋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着一爿咖啡小吃店，苦苦度日。与荣氏亲属探亲团中的那几十名成绩辉煌的董事、经理、教授、博士比较起来，她是个人生道路上沟坎较多的一个。来京前，荣氏亲属中的一些人看她眼睛不好，劝她不要来了。但荣智顺执意要来。在亲属的带领扶持下，她参观了故宫，登临了长城，亲身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现在，荣氏亲属在邓小平讲话的鼓励下，纷纷献计献策，报效祖国，荣智顺却默默无言。一个盲人能干些什么呢？荣尔仁见状不安，忙来劝慰，后见无效，又来拉荣毅仁去劝。荣毅仁进来，拍拍智顺的头，鼓励说："智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关键是要为祖国献上一份爱心。你这次克服困难，回来探亲，说明你对祖国是有爱心的，对我就很有启发，我们都要像女排那样，为振兴中华而拼搏噢！"一席话说得智顺笑起来了。这时大厅里飘来荣智江的歌声："爱，我心中的歌。"荣毅仁一把拉起智顺："大家都在那里跳舞呢，二伯送你去，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热闹热闹。"

荣毅仁把荣智顺送到大厅，回到房间又和哥哥荣尔仁叙起话来。两人由刚才的谈话说起了国家女排，荣尔仁钦佩地说："国家女排可为国家争了气，我们这些海外华人也都面上有光。已经四连冠了，要是再胜一次，可就是五连冠。"荣毅仁提议说："女排正在打热身赛，为9月大赛作准备呢，咱们看看。"说着，他打开电视机，体育比赛解说员的声音立即响彻全屋。无独有偶，香山饭店里到处都跟着响起了解说员的声音。此时此刻，不知有多少人家在观看女排的热身赛。国家女排能否在这年9月的第十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上实现五连冠的世界奇迹，成为亿万中国人注目的大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十回　邓小平谈笑平学潮　解放军豪壮战塔河

话说1986年9月，中国女排在第十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上，又一次夺得冠军，实现了在世界排球大赛中连续五次夺得冠军的目标，创造了五连冠的世界奇迹。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这时正值国庆节临近，女排五连冠的辉煌战绩又为国庆增添了喜庆气氛。

不幸的是1986国庆节后，刘伯承元帅因病不治于10月9日逝世，接着叶剑英元帅也于10月22日病逝。全国人民怀念两帅丰功伟绩，怀念叶帅粉碎“四人帮”的特殊历史贡献，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邓小平心中尤其不平静。刚去世的这两位老帅同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战斗情谊，两帅的追悼会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实际的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致悼词，丧仪极其隆重，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都下了半旗。

此时，邓小平又把报道刘帅和叶帅丧事的报纸打开来。读着悼词，他想起了难忘的1937年，他和刘伯承、张浩率八路军129师誓师出征的场景。那是9月的一天，大雨倾盆，刘伯承进行誓师动员后，下令：“换帽子!”全师1万3千多人取出挎包里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黄军帽戴在头上，把红军帽小心地折叠起来放进挎包。刘伯承师长骑马检阅了部队，领头宣誓，气壮山河。读着悼词，邓小平又想起了八年抗战，刘伯承将军和自己一起指挥部队转战太行，全歼日军观战团等许多战斗的胜利和破击平汉路的那许多日日夜夜。读着悼词，邓小平想起了1947年战略反攻时二野挺进中原的紧张气氛。追兵大至，兵阻淮河，刘伯承亲探水情，指挥部队十几万人马徒涉淮河。邓小平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刘伯承站在船头上训斥不调查研究的先行旅长的话：“粗枝大叶，害死人！害死人啊!”幸亏刘帅探明淮河可以徒涉，要不是这样，那就危险了。读着悼词，邓小平想起了长征路上草地里那个不平常的夜晚，是叶帅，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紧急军情，使中央脱离危险。读着悼词，邓小平又想起了粉碎“四人帮”前后叶帅对自己的保护……

邓小平看着报纸，眼圈有些红。刘帅，叶帅，几十年的生死战友啊！一旦辞世，真叫人心里不好受。他点了支“熊猫”烟，猛抽几口，稳稳自己的情绪。

邓小平抽着烟，望着窗外凋零的树木。几缕深秋的风吹进来，他感到一阵

寒意，把窗子关上。不好，几只苍蝇乘窗子打开的瞬间飞进来了。邓小平拿起蝇拍，速拍几下，把苍蝇拍死，用蝇拍铲着扔进垃圾道。

秘书又送来几张报纸，还有一份手抄稿，报告说："这是方励之最近发表的一个谈话，我给你抄了一份送来了。这几张报纸上登有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文章，还有中宣部长的讲话。"邓小平点点头："放下吧，我就看。"

邓小平没有看材料，却打开电视机，津津有味地看起一场足球比赛实况录像来。他一边看一边满意地咂咂嘴说："这电视机硬是要得，要是六十多年前就有了这玩意儿，我也不用当了衣服看足球。"人们有所不知，邓小平原来是个足球迷。六十多年前在巴黎勤工俭学的时候，为了看一场足球赛，当了衣服买球票，正如他为了款待初到巴黎的周恩来，当了衣服摆便宴一样。邓小平这种貂裘换酒的豪爽劲，使他在三次沉沦，三次复出的惊涛骇浪中，始终处变不惊。

邓小平看着球赛，为他偏向的球队着急，不禁喊叫起来。秘书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跑进来，却发现是老人家在看球呢。他偷偷一笑，掩门出去。邓小平看看表，呀！看了 20 分钟了，不能看了，还有公事呢。他关掉电视机，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看方励之的谈话，呀！这个方励之是走得越来越远了……

方励之是中共党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创办于 1958 年，办校虽晚，但由于直属中国科学院管辖，院长郭沫若亲兼科大校长，很快使科大与清华、北大齐名、在前沿科学专业设置上还独领风骚，是多少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重点高等学府。"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高校被迁往安徽，濒临关门。"文化大革命"后，由国家出资在安徽合肥兴建校舍，不如在京时信息灵通，办事方便，这里就不多说了。

方励之是天文学家，前几年被任命为科大副校长。他不观天文，偏好政治，一年 365 天，天天忙于写文章、搞讲演。他的文章、讲演也是与众不同，说来内容很多，概括起来不外乎是五条，一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二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三是说共产党已经变黑；四是说大学要独立办；五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好。

最近方励之又对科大学生发表讲演，他奇怪地问学生："你们科大的学生怎么不动呢？你们怎么没有一点儿闹事的迹象，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非常紧张。"

邓小平看完方励之的讲话稿，"啪"地打开烟盒，抽出支烟使劲地蹾蹾，生气地按铃叫来秘书，吩咐他说："这个方励之哪里像一个共产党员，还有王若望、刘宾雁，报纸上发表了他们那么多文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像这样的党员还留在党内干什么？我这里有一个批示，你让中办送给耀邦同志，请他抓一抓。我们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邓小平的指示送给胡耀邦以后，胡耀邦没有布置传达。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讲话的主要观点他是反对的，但怎么样处理好这个问题，胡耀邦还没想好。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

1986 年 12 月 4 日晚，中国科技大学校园里，突然出现了异常气氛。一些学生宿舍里，学生在制作横幅、标语。另一些人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在各系之间联络。突然，一个消息传来，副校长方励之要给学生讲话。许多学生听说后往礼堂走去，学生越聚越多，喊口号，唱歌，情绪像一堆一点就着的干柴。这时候，方励之在一些学生的簇拥下，来到礼堂，学生们顿时鼓起掌来。方励之俨然摆出导师的姿势，朝学生们一挥手，喊道："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学生们顿时鼓起掌来。他又讲，学生又鼓掌。方励之很高兴，学生们终于叫他给鼓捣起来了，

第二天，科大一千多学生排着队，喊着口号，走上了合肥市大街游行。几百名警察排成队，封锁了道路。学生们根本不怕，照直冲过去，把警察队伍冲散，笑着把他们推到一边，走过去了。

科大的学生一闹，上海的一些大学也骚动不安。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些学生把老校友、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请到学校辩论。江泽民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们认清形势，不要闹事，但一些学生不听劝告，上街游行。学校派出多人劝说他们回校，市政府也派出一些领导同志同学生谈心，学生们颇为感动，许多人拒绝参加游行，上海的风潮平息了下来。

邓小平惊闻合肥、南京、上海发生学潮，有些社会上的坏人乘混乱之机调戏妇女、砸烧汽车，暗暗叹息，果然出事了。他早就预料到，改革开放的窗子一打开，肯定会飞进来一些苍蝇、蚊子，污染人们的思想，因此他在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发出过警告，要警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1979 年 3 月，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四项基本原则。随后，司法部门对狂热鼓吹自由化，明目张胆地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有意给外国人提供绝密情报，严重触犯刑律的几个人判了刑。以后全党又对精神污染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抵制，取得了一些成果。

1983 年 10 月，邓小平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一针见血地点出，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宣传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他指出，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强调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

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后果。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明确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要求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

这个《决议》所强调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闹出学潮。邓小平想到这里，深深感到到胡耀邦同志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再由他管全党的思想工作是不行了。唉，这个同志，平反冤假错案，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立了大功，怎么在这个大是大非上软弱无力呢？看来，得推他一把了。

邓小平把秘书找来，要他打电话，请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专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到他这里来，商量一下平息学潮的问题。

秘书打电话去了，邓小平默默地注视着窗外，只见冷风刮得窗前的柳树摇曳不止。邓小平触景生情，叹息一声，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胡耀邦动作快，接到电话一下子就来了。他心情沉重，学潮的发生，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坐下来，就掏出烟默默地吸起来。

胡启立来了。这位清华毕业生高高的个子，黑黑的头发，年轻而潇洒。他向自己的老上级，“文革”前在共青团中央一起共事的胡耀邦打了个招呼，便文静地坐在一旁。最后到的是赵紫阳。到底是在地方工作多年，国内出了这么大的事，他的神态依然很稳重，看不出一丝惊慌的表情。当然，他是主管政府工作的，思想战线上的失误不是他的主管工作范围内出现的问题。

秘书和服务员给他们泡好茶，便过来请邓小平到小会议室去。邓小平撕掉12月30日的日历，便走过来了。三个人站起来迎接他，邓小平握握大家的手，请大家坐下，自己也抽出“熊猫”烟来点上。

大家向邓小平汇报学潮发生的情况，邓小平仔细地听着，不时插话。他心里有数，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不能不管。这几天，不断有消息传来，北京的一些学生要到天安门广场闹事。

北京市政府已经颁布了关于游行示威的一些规定。邓小平当年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就知道，外国有一套对付游行示威的办法，游行示威必须向政府提出申请，得到批准方可游行，游行也不得在交通繁忙地段和国家重要地方举行。北京市政府的规定也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办法。邓小平对此是赞同的。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法制，依法办事。天安门广场绝对不能冲。

讲了这些意见之后，邓小平把话题转到治本上来："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讲到这里，邓小平问胡耀邦："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闹起事来后，上海人要看一看。谁是这个保护层呢？"

胡耀邦默默地抽着烟，没有吭声。等了等，邓小平说："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

正在商议的时候，秘书进来报告，据可靠消息，北大的学生于后天也就是1987年元旦要到天安门广场闹事，有一些学生聚集在北京日报社大门口焚烧报纸。邓小平果断地说："天安门广场不许冲，凡冲天安门的，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

赵紫阳点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建议说："我看咱们制定个具体方案吧。"大家欣然同意，邓小平看着自己的这位老部下，赞赏地点了点头。

谈话结束后，首都高校党委都紧急行动起来，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同时和学生对话，尽可能解决学生提出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多数高校的学生们拒绝了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的串联。所以元旦这天，只有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游行。警察阻止他们的非法游行，为首者和警察撕闹起来，当场被拘留，第二天教育后释放。停留在广场的学生也被北大党委用大轿车接回本校。

虽然学潮没有在北京大闹起来，但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学潮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胡耀邦也感到自己有负全党重托，提出辞去党的总书记一职。中共中央政治局遂于1月16日举行扩大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要求，继续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总书记一职由赵紫阳总理代理。

赵紫阳出任代总书记以后，主持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传达邓小平在12月30日与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三人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要点和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接着，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到5月，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克服，局面被控制住了。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

快。”

为了切实加强思想理论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通过各种形式，切实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全面正确理解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用先进典型教育群众，尤其是青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成为有理想，讲奉献的四化新人。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方法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1985年，解放军英模报告团在全国巡回讲演，史光柱等战斗英雄们浴血守疆、报效祖国的英雄事迹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边防战士那种“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崇高情操，成为亿万人民的座右铭。

又如198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冒死扑救大兴安岭火灾的英雄事迹，再次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英雄的崇敬。

那是在5月的一天。

赵紫阳在办公室准备打电话找些人来写写文章，阐释邓小平加快改革开放的思想。同时，他也想找人写一篇文章，论述一下他的一些关于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党委转变职能只管党员发展教育，相当于一些机关党委的想法。忽然，李鹏打来电话：“赵总理，据美国泰勒斯卫星云图显示，大兴安岭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云图上大兴安岭地区是一片黑红色！”赵紫阳一惊：“不会吧，林业部部长杨钟从来没有提起过啊！”

赵紫阳知道，大兴安岭林区，面积相当于浙江省，是国家的最大的一片大森林。他得到李鹏的报告后，立即委托李鹏处理这件事。

俗语云，水火无情。李鹏虽然没有与火打过交道，但自从苏联留学回来后，一直与水斗智斗勇。先是在水电站当技术员，后来当工长、副厂长、党委书记，一直当到水电部部长。甫到任，就发生了长江特大洪水，水头下来，与武汉市的江堤差不多一样高了，长江沿线几百万人上堤斗洪。长江洪水还没有下去，黄河又发生特大洪水。李鹏是水电部长，自然是抗洪总指挥，南北奔波，昼夜调兵，终于把南北洪水制伏，没有造成大的损失。那是何等的紧张，每一个毛孔都张开着，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之事。此时，大兴安岭绿色宝库烧起了大火，他命令林业部部长杨钟立即查清火灾，亲自报告，他自己也派人打电话了解火情。

情报很快报上来了，大兴安岭果然发生特大火灾。大火烧红了半边天空，火头已向漠河县城扑去……

这时，漠河地区恰是狂风大作，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漠河县城西侧的大森林上空，陡然出现了一个高入天际的黑红色恶魔，它在半天空里晃晃黑红色

的脑袋，张开血盆大口，向脚下的漠河县城扑来。

县委书记是一个由女知识青年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她看大火扑来，拿起电话，果断地向广播台、电视台下令："立即播出以下命令：县委命令，县城里的男女青壮劳力，一律自带工具去西山打防火道。中学立即停课，全体师生参加打防火道的战斗。"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女书记拿起电话，只听得地委副专员问道："你那里火情怎么样啊？"女书记汇报说："西山梁子起了一点火，我已派人打隔离带去了。"副专员关切地问："能不能顶住？要不要从图强派一些人支援你们？"女书记自信而坚决地说："请领导放心，我在漠河在。"副专员不放心地说："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啊。从现在起，我让办公室每隔一个小时和你们通话一次。"

然而事与愿违，大火的火舌无情地被大风送过隔离带，呼啸着朝县城扑去。被大火围裹起来的人们纷纷拔腿逃命。有的人背着老母，拉着孩子无法逃走，乃把孩子埋在沙丘下的沙坑里，自己背着老母逃走，孩子幸赖沙丘的掩护活了下来。有的妇女面对着幼小的孩子和瘫痪的丈夫饮泣不止，无奈大火逼人，只好生离死别，也有许多人危急中钻进了自家的菜窖，火倒是烧不进去，不料大火吸走了菜窖的空气……大劫过后，漠河一片焦黑，街巷里到处都有烧成焦炭的遗体，真是惨不忍睹。

大火洗劫了漠河，又朝地委所在地图强扑去，接着又是阿尔木……

这时，中央已组成了扑火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担任。中央已知漠河、图强、阿尔木三颗林区明珠葬身火海，冲天的大火已向大兴安岭重镇塔河逼近，下令飞调 1 万森警部队，3 万解放军部队驰赴塔河。带兵的主力师师长一脸大胡子，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师远征，到火区后，部队立即开挖宽阔的隔离带，打出防火区。时间紧、任务重、火情险，全师两万多人与大火抢时间、争生存，个个挥汗如雨，很快完成任务。接着又向大火进攻。火焰冲天，500 米以外灼热难耐。打火已难进行，最好的方法是在林间多打隔离带，把大火包围起来，分别围扑。两万多指战员烟熏火燎，大胡子师长昼夜指挥。这时中央又调飞机赶到大兴安岭撒播干粉，企图造云播雨，无奈云散天蓝，天公偏不作美，形势真是危急到了极点。

李鹏得知塔河危急的报告后，即乘飞机来到塔河，察看火灾现场，督促灭火部队迅速扑灭大火，前线指挥部重新部署力量，确保塔河，扑灭火头。部队分成东西两线。大胡子师长的络腮胡子本来就厉害，一个星期没有刮脸，更是须多如猬，活像戏剧中的猛张飞。经 20 天苦战，大胡子终于没让大火窜过隔离带。

5 月 26 日，由于人工扑打，加上天降大雨，燃烧了 20 天的森林大火终于熄灭了。大兴安岭林区失火面积相当于一个葡萄牙。特别是由于大兴安岭这一把大火，使得松嫩平原已经开始沙化的土地受到巨大的生态失衡的威胁，风沙紧逼大平原的时间当不会太久了。

祖国最大的绿色宝库经历了这么大的浩劫，人们震怒了，纷纷要求调查这次火灾发生的原因。陈俊生在塔河设置国务院办公室，指导灾区的救济物资的分配，部署恢复建设工作。6 月一过，要不了多少天就是处于高寒地区的大兴安岭的冬天，得赶快建起越冬的房屋。另外，林区的秋天，树干风大，更要注意防火。国务院塔河办公室在部署这些工作的同时，组织了一大批专业人员调查起火原因。起初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天灾难免，不仅大兴安岭在烧，而且边界北边的苏联境内也是大火冲天。这些专业人员都是办案老手，其中又有大批林区防火工程师，他们哪肯相信这些话，继续调查。这时又有很多记者参加进来。大兴安岭着火的消息一传出，大批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背着照相机，扛着摄像机，坐飞机，乘火车，骑马，步行来到林区。访领导，下基层，见人就问。来得早、情况熟、资料多。他们告诉调查组，大兴安岭这把火，既不是“厄尔尼诺”现象，也不是有华人血统的美国青年歌手费翔唱一曲名歌《一把火》唱出来的（火前，费翔来华演出，因唱《一把火》在中国听众中引起轰动），而是有的林业局雇佣的盲流临时工违章使用割灌机引起大火。调查组专家们一听就明白，马上深入调查，这才发现大兴安岭林区管理异常混乱，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首先大兴安岭林区的首府加格达奇就不伦不类。世界著名的大兴安岭林区，50 年代初期唱遍中国的“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野鸡獐鹿打也打不尽”的歌曲，引起了多少人对大兴安岭林区美丽景色的遐想。谁知大兴安岭林区最高首脑机构驻在地的加格达奇——一个美丽的城市，既不是市，也不是县，只是一个区。原因就在于大兴安岭是林业部直属的森工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加格达奇要升为市、县，马上就会引起三家的争执。

林区工作第一位的是防火，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但防火投入大，直接收益却等于零。说到防火，谁都不管。另外，林区道路也不太通。须知，林区公路不仅可便利生产生活，更是防火的隔离带。一旦有火，也可很便利地运送扑火队伍。但大火前，大兴安岭林区道路仅为吉林省伊春林区（小兴安岭地区）的二分之一，发达国家林区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公顷仅有 1.1 公里。清朝年间，以河流道路为依托开设的防火道也都长满了灌木，把森林连成了一片。当大火卷来时，大兴安岭林区犹如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巨人，听任大火的宰割。

调查组访问、调查，触及到火灾的直接起因，原来五把大火都是由于盲流违章使用割灌机烧起来的。这种割灌机漏油，又爱冒火星，林管区早已下令，防火戒严期禁止使用割灌机作业，但就是没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视。于是，这几个盲目流动到林区的临时工拿起割灌机作业，油漏火起后，他们不吭不报，一走了之。

人民愤怒了，党愤怒了。万里代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大兴安岭森林大火问题，万里拍着调查材料，严肃地说：“今天的大会，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

的大会。”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免去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免去杨钟林业部党组书记职务。林业部和有关部门失职人员也受到了应得的处罚。

为了加强大兴安岭林区的防火和治安问题，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组建一支林区森林武装警察部队，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编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森警部队正式编入武警序列。森警部队全体指战员热泪盈眶，他们今后再也不是没娘的孩子了。在扑火中屡立战功的被人民群众称为“红孩儿敢死队”的森警部队穿上了红色防护服，开始紧张的训练，准备为人民立新功。邓小平又签署命令，嘉奖扑火有功部队，这里不再赘述。

且说大胡子师长在大兴安岭苦战月余，奏凯而归。忽然军部来电，命他迅速来军部报到，参加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十一回 共和国频传四化捷报 十三大确定基本路线

话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其间真是捷报频传，凯歌连片，不胜记述。

先说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粮食产量猛增。一大批劳动力解放出来，开始兴办乡镇企业，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1987 年时，全国乡镇从业人数达到 8805 万人，产值达到 4764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50.40%，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民收人大为增加，农业投入增长，农村繁荣，同时也在提供财政收人，发展出口创汇，促进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一大批中小城镇迅速崛起，缩小了城乡差别。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决定》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此要解决以下主要问题；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行使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职能；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确实建立按劳分配的分配体系；积极发展包括集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外资企业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决定》特别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决定》精神的指导和推动下，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从 1985 年起全面展开。经过两年的努力，到 1987 年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首先是多种经济形式有了明显的进展。公有制经济仍然在我国的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两年来，我国又有一大批全民所有制大企业建成，公有制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同时，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有了很大的发展。据 1988 年初的统计，1987 年的全国工

业总产值中，集体经济的比重已由 1978 年的 22.4% 上升到 34.6%，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则由几乎是零上升到 5.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 2.1% 上升到 25.60%。据统计，全国城镇从事个体工商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人数已由 1978 年的 15 万人增加到 569 万人。

多种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原来与现实生产力水平很不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经济格局。不仅大大地增加了社会财富，活跃了商品生产，方便了城乡居民生活，而且对安置就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方式。本着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许多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形式的改革。1987 年，全国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企业已占总数的 80%，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增强了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又其次，调整改进了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 120 种减少到 60 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银行筹集的比重已从改革前的 23.4% 上升到 68.80%。

随着以上改革的实行，财政、税收、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此外，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相应展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对外开放方面，由于建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以点带面的对外开放格局，吸引了大量外商来华投资。到 1987 年时，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已引进技术改造项目 5000 项，成交额达到 34.5 亿美元，全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项目 10350 项。在累计协议金额 625.09 亿美元中，外商直接投资等的金额就有 257.73 亿美元。

从 1979 年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不断。

在工业战线上，先后建成的重大工程项目有京通铁路、重庆长江公路大桥、济南黄河公路大桥、天兰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等重大工程。

在科研战线上，先后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如成功合成核糖核酸、杂交水稻高产优质世界领先地位、喉癌切除硅橡胶成型术研制成功、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成功地发射两颗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地发射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南极长城站落成、发射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定点成功、超导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等。

在体育战线上，我国运动员荣获第九届亚运会金牌总数和团体总分第一，又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又在第十届亚运会上获金牌总数第一。

在教育战线上，新成立了一批大学，国家建立了学位制度，几年来我国已培养出一大批博士和硕士。

在宣传战线上，大批报纸、杂志创刊，通过邮局公开发行的报纸将近两千

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各接近600家，还有1万多台电视插转台、录像台。

在外交战线、国防战线等战线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改革和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由于对农村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放松了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1984年粮食大丰收后的几年中，粮食生产徘徊不前，加上人口过快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与此同时，工农业比例关系又出现了失调的问题，工业生产增长过快，基建投资过大，摊子越铺越大。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发展过快，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跟不上去，出现了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加工工业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又下降。这说明，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问题。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和国出现几次急于求成的重大失误，总根源是由于大家对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现在出现的问题，还同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分不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是正确地对国情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确定今后工作的战略步骤；再一个是提出党在今后工作的基本路线，保证改革和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这时，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和赵紫阳等中央负责人谈了自己对十三大报告的设想："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

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中央成立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十三大主报告起草小组，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开始工作。

3月19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谈了对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这个总的设计思想是党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初步考虑，报告主要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十二大以来我国出现了哪些历史性的变化。第二部分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第三部分讲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第四部分讲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第五部分讲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第六部分讲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包括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和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党的干部、党的风气。第七部分讲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着重阐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指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的理论探索。

邓小平仔细地阅读了这封信，感到这个总体设想不错，便在信上写道："这

个设计好。”

于是，十三大的主报告便按照这个总体设想加强起草。主报告的初稿写成后，经过两次大的修改，然后，把报告稿发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党组、部队的各军兵种党委和社会科学界广泛征求意见。9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第五稿。以后又经过两次修改，到十三大开幕时，赵紫阳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已是报告稿的第七稿了。

1987 年的国庆节过后，中共十三大代表陆续来到北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大会指定宾馆。代表们不是各地要员，就是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

10 月 25 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于上午 8 时多，坐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虽然 83 岁了，但身体还挺硬朗，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大厅后，正碰到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从对面走来。邓小平高兴地同大姐握手。邓颖超高兴地向邓小平表示祝贺：“小平同志，向你祝贺十三大的召开。”邓小平笑着说：“大家一起祝贺，向大家祝贺，今天是党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邓小平看到 88 岁的聂荣臻元帅坐着轮椅过来，和邓颖超一起迎了上去，大家互相握手问候。记者们过来，给他们照了个合影。正巧赵紫阳过来提议：“老同志们乘这个机会合个影吧。”李先念、彭真欣然同意，走到聂帅跟前，在邓颖超和邓小平两边站住，新华社记者和其他采访的记者立即拍起来。

胡耀邦从一侧走过来，饶有兴趣地看着老同志们合影。记者们发现了，立即把镜头对准他。胡耀邦笑着说：“照年长的老同志，万里同志来啦！正在和聂帅谈话呢，还不快抢镜头。”记者们果然抢拍起来。

上午 9 时整，开会的铃声响了。邓小平和陈云、徐向前等人说笑着向大会主席台走去。彭真对赵紫阳说：“今天就看你的了。”赵紫阳很有信心地说：“没问题。报告的主体设想，小平同志很赞成，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改了七稿，基本是成熟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荣毅仁、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等几十位来宾也应邀参加十三大。

开会的时间到了，邓小平站起来宣布大会开始。赵紫阳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他作的报告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赵紫阳的报告首先回顾了九年来经济建设的成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九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现在看来，到本世纪末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由 1980 年的 7100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 2.8 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是完全有把握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严重经济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或者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十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还有部分地区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也有了改善。

——城乡广开门路，城市新就业的劳动力达到七千万人。农村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八千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了非农产业。

——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扭转了过去那种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局面。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显著改变，逐步转上大体协调发展的轨道。

应当说，这九年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九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

九年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党领导人民在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领域，进行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推进建设与改革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及时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的结果。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健康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觉悟，进一步积累了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正面教育和正确批评来反对错误思想的经验。在全面改革的深刻变革中，保持安定团结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逐步发展。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人民政治生活日趋活跃。爱国统一战线空前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各民族的兄弟团结更加巩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进展。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展开。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事业欣欣向荣。九年制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实施。

——国防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军队的整编和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在裁军百万的同时，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新的进步，防卫作战能力有了新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抢险救灾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

——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

……

邓小平坐在主席台上，听着赵紫阳作报告，不觉忘了大会不准吸烟的规定，习惯地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点上抽起来。不一会儿，台下的代表们传上来

一张字条，主席台上的一位中央领导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着："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这位中央领导人想了一下，还是把纸条递给了邓小平。

由于纸条是从下面的会场上传到主席台上的，所以立即引起了代表们的注意，这张字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字条递到邓小平手里以后，大家更感兴趣了，许多人看着邓小平，希冀从他的动作上作出判断。只见邓小平接过字条，展开看了一遍，立即微笑着掐灭香烟。代表们马上明白了字条的内容，一股热流顿时在代表们的身上流过。党的领袖和党员之间这样平等相处，邓小平这样虚怀若谷，诚恳接受代表的批评，自觉执行大会的规定，诚乃我党之福，国家之福。代表们敬爱地望着邓小平，也真希望他少抽烟，因为抽烟是有损身体健康的呀。

邓小平掐灭了烟，歉意地朝大家笑笑，又凝神听起报告来。

报告接着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做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我们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教育我们，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便开始分析认清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而分析以往发生失误的认识上的原因。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就指出，我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

决议》也都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十三大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使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国情呢？经过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努力，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定，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

这种情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十三大的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十三大的报告明确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十三大的报告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第二步，到本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三大的报告指出，经济体制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

赵紫阳报告后，大会进行分组讨论，其间又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1400 多名中外记者忙着采访发稿，这里就不多说了。

1900 多名代表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后，在大会表决时，全体举手通过了十三大的报告。11 月 1 日，大会闭幕。

后　记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笔者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时，就萌生了以中国传统的说史演义的文学形式表现革命史的想法，并开始搜集整理一些有关重大事件的资料，作了大量笔记，试写了若干篇章。虽然这些笔记和文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在“文革”初期加以销毁，但却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既然是说史演义的文学创作，就免不了虚构。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创作，几易书稿，终于写成了这部书。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和缺点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　涛

于北京玉渊潭观湖亭

国旗飘飘

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书前17回追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难历程，后94回讲述新中国成立后38年间的辉煌成就和挫折徘徊。

作者以史诗般的笔法，重点记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历次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领袖们的坎坷命运，风云人物的升降沉浮等。



责任编辑：刘　飞
特约编辑：刘　硕
美术编辑：伍民力